

斗争之路

——米高扬回忆录——

供内部参考

斗争之路

——米高扬回忆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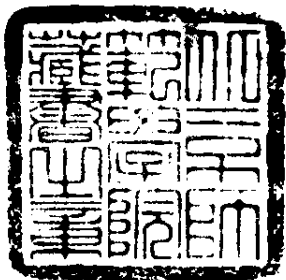
〔苏〕阿·伊·米高扬著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1972 年毕业生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20914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320914

作者的话

我很早就注意到，人越是上了年纪，他就越是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以往的生活作某些总结，以便把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传给接替我们的后代。这是自然而然的、合乎规律的。对于那些在发生重大社会、政治变革的时期里度过自己人生道路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是我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的一个见证人和参加者。我有机会接触不少非常有趣的人物。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会见过这些国家的政府领导人、社会政治活动家、文化界人士和其他人士，以及许多普普通通的人。我同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杰出的活动家多年在一起共事。当然，我个人和列宁的多次见面以及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不免感到有些胆怯和疑虑。

我不是作家，我写的也不是文学作品，只不过是真实地叙述我自己一生中所目睹和所参加的一些事件，以及同我一起工作过和我所接触过的一些人物。在那些年代里我们大多数人还是青少年。一般说来，在发生重大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的时代里，青年的成长是特别迅

速的。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里，往往十四五岁的男女青少年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他们的才干增长得很快，到十八、二十岁时就成了成熟的政治工作人员，甚至成为领导干部。

我写的是回忆录，不是历史；写历史应该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部事实和事件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科学分析。我并不奢求对本书所涉及的事件进行那种系统的、尤其是全面的描述，因为我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

我再说一遍，这本书只是回忆我个人经历过以及看见过和听到过的事情。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

在那些遥远的、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年代里，我们通常是谁都不写日记的，哪怕是对所发生的许多事件、无数次的会见和谈话的简单记录都不作的。我们大多数人不仅没有保存本人的演说稿，而且连演说提纲也都没有保存下来。那时我们通常是不写这些东西的，因为发表演说不是照稿宣读，而是跑到就讲，经常是即席讲话。只是在发表极其重要的演说时，才拟一个简短的草稿或提纲，即使是这样的草稿也几乎都在演说之后就立即销毁了。起初我们没有女速记员，记录经常是由文化程度不很高的人作的，记下的不一定是主要的东西，而是次要的东西。一个小时的报告只作一小页记录，而且还不总是准确的。无论如何，现在要使用这些记录是困难的，虽然这些记录也有助于回忆以往经历的某些细节和事实……

当时我们没有“为了写历史”而把那时的文件和资料

收集保存起来，这一点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我记得当我最初读完了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书里列宁所写的跋。列宁写道，发表了这部著作后，他已经拟定了该书的下一章的大纲。可是除了题目以外，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他。列宁写道：“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他说：现在“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①

我们不能很快看到列宁这部著作的新章节，自然是十分遗憾的。可是，我记得很清楚，列宁所描写的情绪，当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十分亲切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的回忆录，其实也正如其他任何回忆录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片面性。书中叙述的那些事件，我记得是什么样，以及在当时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我是如何领会认识的，我就叙述成什么样。在叙述过程中我顺便也讲讲自己现在对其中某些事件的态度。

我是以一个参加者或目击者的眼光，而不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所叙述的事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与我本人密切相关的某些事实和事件较之其他事件——从历史学观点看来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事件——重视得多的缘故。我本人没有直接参加或亲眼看见的、当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76页。——译者

时给我印象不深的或者根本就与我无关的事件，在本书中只作简单扼要的描述，或者根本不写入回忆录。在南高加索当然有很多杰出的人物、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外工人政治积极分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我在回忆录中举出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另一些人在本书中则连提都没有提到，虽然这些人无疑是完全应该提到的。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我现在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人的姓名都记住。

一般说来，一部回忆录，如果记述真实的话，在我看来其价值首先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当时人们所目睹的具体历史资料。这正是我们的回忆录所能给予读者的主要益处。

因为这是个人的回忆，所以作者的名字在文中出现的次数相当多，尽管我尽力不超越客观地反映生活真相所必需的范围。况且，据我看来，个人的机缘、个人的感受，对于广大的读者不是没有兴趣的，他们一般都希望知道许多历史事件的直接参加者是怎样认识这些事件的，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的，他们当时想些什么，他们又是以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所有这些，不仅有助于人们对许多事实和事件的本身了解得更加清楚，理解得更为深刻，而且还有助于人们对这些事实和事件当时发生的环境、当时人们的心情、当时人们的期望和宿愿、快乐和忧愁等等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读者在我写的这本回忆录中能够得到这些东西，那我就有理由认为我的目的达到了。

成 长

童年时代的回忆

家庭和父母；学校；到梯弗里斯；入教会中学。

关于幼年时期，我首先回忆起的是一些零星的片断。有时甚至感到不太理解，对年代久远的许多事情，我怎么没有记住一些别的，而恰恰是下面这些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故乡萨纳英，在亚美尼亚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在狭谷两侧陡峭的山岩上分布着几大片上百公顷可耕的山地。在这些山地后面，耸立着丛林密布的群山，而在群山和丛林的后面，则是一望无际的高山牧场。漫山遍野绿草丛生，山花到处可见。

我们的村庄就在山坡下，紧挨着山地。我还记得村里的那些栉比相邻的小房子……

在我的童年时期，这里曾是沙俄辽远的民族边区许多落后的村庄之一。没有文化，没有权力，任人欺压的……

下面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那时我们全村只有两个识字的人，而且是当地修道院的神父和修道士。其

余的人全是文盲(我的父母当然也不例外)。他们连什么是真正的学校，什么是教师和教科书都弄不清楚，至于什么是报纸或者杂志那就更不用提了。……

我就在这里出生，并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们米高扬一族很久以来就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并且住得很“紧凑”。我们和格沃伯伯两家合住在一座小房子里。小房子共有两间屋子、一个地下室和一个凉台。紧挨着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半截露出地面的小屋，住着我的祖母瓦尔季捷尔和我的一个叔叔瓦尔坦。在我们的房子前面，沿着山坡有两座不大的房子，房顶连在一起，这平平的房顶也就是我们的“院子”。那里住着格里沙伯伯和维利汉伯伯。靠他们家下边一点住着姆克尔季奇伯伯，再稍远一点住着基戈尔叔叔……

不知为什么我记住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一个人

在房顶上玩。

我想出了玩“磨面”的游戏：头朝下俯躺着，用手抓起屋顶上的土往下撒，这样就好象面粉从真的磨上洒落下来一样……

这个游戏使我特别着迷，根本没有察觉身子顺着房顶往下滑，一下子滑落下去摔了个倒栽葱。我的脸碰到了地上，鼻子也碰破了。我又害怕又疼，就大叫起来，向母亲跑去。母亲给我擦了擦鼻子，结果平安无事。

看来，我所以想起来玩“磨面”的游戏，是因为几天前

父亲曾带我到真的磨坊去过。我们的村子在一块高地上，两个村子合用的磨坊却在峡谷里。磨是个小水磨。为了磨一口袋粮食，我和父亲在那儿呆了一整天。后来又有一次我们是头天晚上去，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我还记得，那里有许多农民，他们坐在装粮食的袋子上，等着轮到自己……

我六、七岁时，有一次我和堂兄弟们在院子里玩。当时正是秋天，傍晚时天气凉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到维利汉伯伯家去。他家里有一个炉灶，炉灶前低挂着一个小白铁灯。不知是哪个小孩不小心碰掉了点着的灯，灯掉在我的堂弟——格里沙伯伯儿子的身上。一刹那间煤油洒了他一身。顿时他全身着了火，在屋子里乱跑。我们吓得向街上跑去。满身是火焰的堂弟在前面跑，我们跟在他后面拚命地叫喊着。

我们跑得很快。风把火焰吹起来了；就象一个大火把在街上移动一样。这孩子的烧伤非常严重，皮肤全都烧黑了。因为没有医生，几小时以后他就死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事后这个活的火把还久久地在我的眼前晃动……

通常在秋天我的父亲去树林砍柴，准备过冬用。有几次他带我去了。去的时候，他让我骑在毛驴上——这是当时我们家唯一的运输工具。骑在这匹“马”上，我当然快活极了。在树林里我帮助父亲捡干树枝。回来时就

只好步行了。

我记得父亲带我到遥远的森林里去的情景：那里长着许多野苹果树和野梨树，我们从清早一直到晚上都采摘果子，装到筐里，然后驮在挺能耐劳负重的小驴上……

我和母亲经常到离家不远的树林里去摘石枣。我兴致勃勃地爬上树帮母亲摘。我们常常能摘很多石枣。

我还记得我和邻居及亲戚常去暖和的狭谷采核桃的事情。狭谷的树林里，沿着河岸长着许多高大的核桃树。比较灵巧的小伙子往往爬到树上用木棍打核桃，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在石头缝里捡。采到的核桃然后按家分。到傍晚的时候才回家。

从8月底我去梯弗里斯^①上学以后，就不再参加这些活动了，而大自然的这些礼物通常是在9—10月采摘的。

我记得除了食用新鲜的石枣以外，大部分我们把它晾干，冬天煮成大家都爱吃的果子汤。野梨和野苹果一般腌在桶里留到冬天吃。其中一部分晾干，大部分野果用来作果烧酒。

我回想起来，当天刚蒙蒙亮，我们大家都还睡在床上时，父亲就起来了。他走近窗台，那里放着母亲给他准备的简单的早饭：面包、干酪，还有一点烧酒。他倒一小杯酒，吃一点就干活去了。我不记得父亲喝醉过。甚至作

① 今称第比利斯。——译者

客或参加婚礼时，他也不过只喝一两杯。我的哥哥和母亲完全不喝酒，我们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1905年秋天，随着革命的开始，农民起义的浪潮波及到我们地区的一些村庄。农民开始夺地主的土地。后来这一浪潮也波及到我们村子。但是占有这块土地的阿尔古京斯基公爵一家的势力很大。因此我们村子里的农民一直没下决心夺地。而且不久沙皇当局就从哥萨克步兵中调来了讨伐队。

讨伐队起初出现在别的村子，并且开始进行镇压。在邻近的阿赫帕特村，不仅夺回了土地，而且逮捕了许多农民积极分子。

哥萨克步兵也到我们村来了。他们驻扎在村边。农民们，特别是妇女，都极力避免被他们看见。而我们小孩子却对他们很感兴趣，充满好奇心。一次，我们鼓足勇气，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胆怯地向他们走去。他们支起帐篷，在那里升火做饭。我们变得更大胆了一些，走近他们的跟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些哥萨克人没有赶我们走，也没有骂我们。因为我们不会讲俄语，所以没法跟他们搭话。

过了一天讨伐队就开走了。

记得1906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亚美尼亚的一个主教平日在梯弗里斯主持教务，但常到古老的萨纳英修道院的别墅来。他劝巴库某亚美尼亚石油企业主出资修

建一条经过陡峭的山坡通往我们村子的好走的路，以便四轮马车畅行无阻。那时我们农民没有四轮马车，当然也就不需要这样的路，只有主教自己才需要这样的路。后来为了修建这条路花了将近六、七千个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们村的许多农民都参加了修路。

1906年夏天路修成了。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的大恩人”——石油企业主第二天将从巴库乘火车来，要我们村子出一辆好的大车，载着这位贵客在新修的路上走一趟，因为贵客想亲自看看这条路。

次日，我们小孩子和村里的许多居民在修道院的院子里等待客人。在修道院里为客人准备了一个房间。大车进了院子时，我们看见了这个“大恩人”，立即哎哟了一声。这个人个子很高，年纪已经不小了，身体胖得出奇，而且是个瘫子。

客人到后，没有立刻把他送到预先准备好的房间里去，忽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农民，他面向人群（这些人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嚷道，还有一部分修路工钱没有付清，他们为此张罗奔走而没有结果。他提议把“大恩人”绑在树上，直到他给巴库打电报让把所有应付的钱送来才放他。

马车停在泉口附近，旁边长着一棵大的老梨树。“客人”要说点什么，但是没让他说。六、七个农民吃力地把他抬起来，用绳子绑在树上。

他开始解释起来，声称他并无恶意，他一点儿也不知

道有欠债的事，相反，他以为所有的钱都付清了，并且还期待着村里的人们将很感激地接待他呢……

农民们根本不相信他，立刻喧哗起来。

倒霉的企业主只好让跟他来的一个人给巴库打电报。他被绑着，签了字。此后他哀求给他松绑，让他在什么地方躺一躺。农民们决定给他松绑，把他送到一个房间里去，但在没有收到钱之前不放他出村。事情果然是这样做的。

过了一天钱送来了。包工头全部付清了农民的钱，而“大恩人”急急忙忙地滚回去了。

农民们因为得到了胜利而兴高采烈。

这条路我们村用了六十年。说实在的，我们很少用它。有了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以后，这条沿着陡峭的山走的路，又有许多急转弯，就明显地不适用了。直到 1966 年才修建了另一条适合于小汽车和公共汽车通行的很好的柏油马路，来往运送家住山地农村，而在狭谷的炼铜厂工作的工人们。

我再说一件事，它可以使人了解当时农民的心理。

那时候筑路由农民服劳役。干这种活不给钱，因此，农民常常千方百计地逃避它。

有一次下了通知：这个星期天所有能干活的男子都要去修整道路，路段——从我们村到火车站，约三公里长。那时我大约九岁，但我请求父亲带着我去。我们带上铁锹就去了。

还在那时，农民对于这种活的态度就给我留下了印象。他们牢骚满腹，没精打彩、懒洋洋地干活。只要县警的眼睛稍一“放松”，路上的石块就没有人收拾了。显然，农民是被迫干活的。我那时怎么也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我想，清路主要是为了他们自己，“当权者”是很少走这条路的。到后来我才明白：在当时这是农民对长期所受压迫的自然反应，是对与他们为敌的政权深恶痛绝的表现。

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古老的修道院。我们常在那修道院的院子里玩，有时也碰见住在那儿的一个修道士。他个子很高，黑头发，是一个非常安静和谨慎的人。所有的人们，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小孩子，都很尊敬他。

有一次，我见修道士正在看一本什么书。我对这本书发生了兴趣，这使修道士很高兴。渐渐地，他开始教我识字。过了几个月我便能用亚美尼亚文看书和写字了。

我父亲在梯弗里斯一个木匠师傅那里做了约六年的帮工，在这个各民族聚居的大城市里，他经常和各族的人来往，慢慢地各种语言都会说一点。自然，他知道的不外乎一些最简单的生活会话，会用的也就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那么几句话。可是他教会我用他所知道的各种语言从一数到一百。他对此感到很高兴。而我只不过是背熟了这些数字而已，根本不知道怎样用这些数字去运算。

记得那年基戈尔叔叔家里举行婚礼。参加婚礼的人很多。大家都站着，因为没有坐的地方。为了使亲戚和来

客们感到惊奇，父亲把我举到肩上，要我“用各种语言”从一数到一百。我乐意地这样作了。父亲很满意，而所有在场的人，象后来有人对我说的，都惊得目瞪口呆。一个小孩子竟会用亚美尼亚语、俄语、格鲁吉亚语、阿塞拜疆语和希腊语数数，这在他们看来真是件神奇的事。可能他们还以为我真的懂得这些语言呢。

我刚刚学会看书和写字以后，便把这事告诉了父亲。在此以前，他一点也不知道我在学习。这时他就想让我受真正的教育。但是我们村里没有学校。

这时候，有一个亚美尼亚知识分子意外地来到了我们村子。他显然不是本地人。看来，他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山村来，是为了躲避当局的迫害。

在我们村一住下，他马上就去找村里人，其中也找了我父亲，他建议在村里开办小学。况且修道院里有一小所空房子，共两、三间，完全可作为校舍。

他自愿做这个学校的教员，只要求给他最微薄的报酬——够糊口就行了。我想，他可能是个民粹派。

父亲和另外两个农民同意每人出四个卢布。不过这十二个卢布，不仅要他教我们三家的孩子，还要教村里的其他孩子。有二十几个孩子报名入学。他教我们写字、读书和算术，还经常给我们上体育。特别注意对我们进行日常教育：要我们学会管理自己，要我们注意清洁，饭前洗手，饭后漱口（好在我们校旁就有泉水）。他还要我们

衣着整洁，自己刷鞋补衣。一句话，要我们养成起码的文明习惯。他自己虽然是个单身汉，但穿着整洁，这方面他是我们良好的榜样。

他总是给我们想出各种各样有趣的游戏。记得在春天，有一次他带我们到野地里玩球。球是他自己做的。后来，他鼓动我们搬掉修道院里的石头，并在那儿种上果树。想到我们会建起自己的果园，我们和他一起兴致勃勃地把石头搬走。但是果园没有搞成。家长们偶然听说自己的孩子不读书而去搬石头都生气了。不知为什么，我父亲特别生气，他要求立即停止做这种“无聊的事”。我们都很伤心。而我们那位善良的好老师，似乎比谁都更伤心。不久，他便离开了我们村，学校也就关门了。

我们整整一年没有上学，而我读书的欲望已是无法抑制了……。

第二年夏天，梯弗里斯教区的亚美尼亚主教来我们村避暑。他就住在修道院里，占了原来我们小学的房子。而且他还决定要把这房子扩建一番。

父亲被临时借用搞这一建筑，去盖瓦屋顶。我自己要求去帮他。通常他坐在屋顶上，而我从下面有时用右手，有时用左手给他递瓦。

有一次，大概我被什么东西吸引住了，把瓦递得不是该递的地方。父亲还是习惯地把手伸下来等着我给他递瓦。但由于我心不在焉，活儿不得不停了一下。

“你怎么不递瓦呢？”父亲叫了起来。

我回答说，我不是在递吗？当我一看把瓦递到什么地方时，才知道自己错了。父亲很恼火，气冲冲地朝我脑袋上打了一下。

应该说，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打过我。当时我虽然说不出有多么疼，但内心却感到非常委屈。于是我对父亲说，以后再也不同他一块儿干活了。

确实，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同父亲一块儿干活了，而他自己也不勉强我一块儿干。大概他也感到，他当时做得不对。

主教看我老是跟着父亲转，有一回他问我会不会念书。我回答说，会一点，但很想上学，可我们这里没有学校。

他说：不一定非在村里上学，到梯弗里斯去也可以……

我从未想到有这种可能，当然喜出望外，立即把和主教的谈话告诉了父亲。父亲走到主教面前对他说，如果能把他儿子安置到梯弗里斯上学，他将非常地高兴。主教回答说：

“秋天你把儿子带到梯弗里斯，我把他安置在梯弗里斯教会中学念书。”

我们感到无比幸运。

1906年8月底，父亲带我去梯弗里斯。当时我是第一次乘火车。

在梯弗里斯，父亲把我带到亲戚家——母亲的堂

妹——姨母维尔基尼娅那里，她的丈夫是拉扎里·图马尼扬。记得她家住在峡谷里，没有一条马路通到她的家，我和父亲只得走小路。

姨母家里有五个小房间。她和丈夫、孩子就住在这里。父亲请求姨母，允许我在上学期间寄住在她家。但姨母说父亲带我来得太迟了。她已收留了两个也是亲戚家里的孩子，他们也要在梯弗里斯上学。

父亲开始到处打听，设法把我安置个地方。不久，他找到一个妇人，只有她和她儿子住在一个房间里。她儿子比我大一岁。父亲同她说妥了：每月六个卢布，留我在她家当“寄宿者”。

但当时不仅是要安排我的住处，更主要的是要我上中学。

不知为什么父亲不想立即去找主教。他想起了我们有个叫马尔季罗斯·西莫尼扬的同乡在主教那儿当厨师。他是父亲的好朋友，还是个识字的人。于是我们就来到了主教家的厨房里。

父亲同马尔季罗斯寒暄了几句后，就请他替我写个入学申请书，因为父亲不识字。父亲口述，马尔季罗斯执笔写。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过了许多年后，亚美尼亚的同志们从教会中学的旧档案中找出了父亲托马尔季罗斯·西莫尼扬执笔写的这个申请书的原件，并把这一有趣的文件的影印品寄给了我。

申请书是用亚美尼亚文写的，译成俄文是这样的：

致亚美尼亚涅尔谢相教会中学
最尊敬的督学先生们

萨纳英村居民

奥瓦涅斯·米高扬上

申 请 书

我不想写长信耽误督学先生们的宝贵时间。我只说，我作为一个父亲，对自己的孩子们有着良好的意愿。我是一个贫穷愚昧的农民。但我也愿意我的儿子成为一个识字的人。并且我深信，托庇督学先生们，我的儿子总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对自己、对我们农民都有益处的人。所以，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抱着美好的希望把他带到城里，请督学先生们给我的儿子阿纳斯塔斯在涅尔谢相中学的角落里随便安排一个座位。他生于1895年10月12日。他的出生证明我将在最近期间送上。我的儿子会读书，会写字。还补充一句，他很有才能。

因奥瓦涅斯·米高扬不识字，故请马尔季罗斯·西莫尼扬代笔。

1906年9月11日于梯弗里斯市

对这张申请书我还想说明一下：我父亲其实不是农民，而是木匠。但当时在正式文书上，人们不是按阶级和职业来划分的，而是按等级分成小市民、农民和贵族。因为我的祖父是农奴，而父亲又住在乡下，所以他通常也把自己算做农民……

我被准许参加入学考试。

当时学校里学习期限是十一年：预科四年，本科七年。经过知识测验，我被编入二年级预备班。

父亲回乡村去了，我在城里感到很孤单。他安排我住宿的那家女主人对我还算不错。然而我们之间一直没有形成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我是非常需要的。因为我那时还是第一次离开父母。

女主人的儿子和他的同学瞧不起我，把我看成是“乡下佬”。常常恶意地嘲弄我。有一次他们甚至打了我。起初我对这些还能耐心忍受，但后来，我忍无可忍了。我决心不能再在这里呆下去了。

我想到了马尔季罗斯·西莫尼扬，就去找他，并向他诉说了我这难过的生活的一切，请他给我买一张票，让我回家到父母那里去。他满足了我的请求。

回到家里，我对父母说，我再也不去梯弗里斯了。

我还记得父亲那么闷闷不乐和母亲哭哭啼啼的情景……

父亲认为，既然我开始上学了，那就应该继续下去。

他对我说：

“我们回到城里去找维尔古什姨母，我去尽力央告她，让她收留你。”

我执意不肯，但看到父亲一再坚持己见，又想到我应该学习，最后终于对父亲说：

“爸爸，我同意你的意见。可就是，没有妈妈我哪里

也不去。”

我们开始准备启程。父母亲准备了干酪、奶油、干红枣和家里做的甜食。我们三人——父亲、母亲和我很快就又出发到梯弗里斯去了。

……我回忆起父母亲同维尔古什姨母谈话的情景，就象在眼前一样。我们都坐在凉台上的桌旁。父亲再三请求维尔古什收留我。

姨母回答说：

“我把他放到哪里呢？我这儿连给他睡觉的地方也没有。”

父亲仍然坚持着。在他的强求之下，维尔古什终于答应给我睡在厨房角落里的沙发床上。

但我仍然不想离开父母亲自己一个人留在梯弗里斯。妈妈在这里又住了些日子，不久，她也该回去了。

但是，这一回孤单的感觉没有延续多久。虽然姨母家的孩子比我小些，但他们都很快同我好起来了。

我开始上中学了。渐渐地，我对环境习惯了，和孩子们也熟识了。他们对我很好，很快我同他们相处也轻松愉快了。

* * *

我已经说过，我的学习愿望是非常强烈的。学起来并不吃力。

我在唱歌方面却不走运。事情是这样的：从一年级起我们就开始学唱歌。起初，我非常喜欢这门课。我觉

得，自己有一付好嗓子，唱得也好。但出乎意料的是，当我升入中学本科一年级时，发生了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我们以前从不认识的新音乐教师，突然把我一个人叫出来（在这以前通常我们都是大家合唱），让我随便唱一支熟悉的歌儿。（看来，他想检验我的辨音能力和“歌唱能力”。）

我毫不怀疑自己能唱得好，因此，非常自信地高声唱了起来（我的声音确实很大）。但唱了不到一分钟，老师用音叉击了一下桌子，气冲冲地喊道：“停！”

我惊惶失措。然后又羞又委屈，满脸通红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原来因为我的辨音力很差，任意乱唱走了调。于是老师（后来我们才知道他是当时音乐界有名的人物——作曲家罗曼诺斯·麦利克扬）很快就摸透了我的歌唱“才能”。

从此以后，上音乐课时我总是默不作声地坐着，甚至避免和老师的目光相遇。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次，老师又叫到我，让我写几段乐谱。我完成得似乎还不错。然后他让我唱，我拒绝了。他坚持要我唱，于是我向他声明：我在教室里将永远不再唱歌了，至于音乐理论，我将完成这门课程的一切要求。

一年之中麦利克扬好几次想让我唱歌，但他都未能成功。学年结束时他给我的音乐课打了一分，要我补考。这并未使我不安，因为大多数科目我都得了五分或四分。我相信，不会因为我唱歌不好而让我留级，或者开除。

结果正是这样。在补考音乐理论时我得了四分，但唱歌我又拒绝了。于是给我的音乐课评了“3-”。这样，我升到了二年级。后来在教会中学毕业时我拿到的毕业证书里，音乐课还是给我打三分。这样我的音乐前程也就不光彩地结束了。

不久，在另一门课上（这回已不是次要课程）——在神学上，我又陷入了相当尴尬的处境。

幼年时每逢星期日我们全家都上教堂作礼拜。我还清楚地记得，这座十至十三世纪的古老建筑物是用深色的、凿得很平的大石头砌成的。教堂的墙壁、屋顶、地板都是用这种石头砌成的。我记得，当需要跪下时，——我跟在父亲后面重复他所做的一切——觉得膝盖冰凉。

自然，那时我没有思索过祈祷是什么意思：对上帝的存在我没有产生过怀疑。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中学二年级我与神甫——我们的神学教师——发生冲突为止。

神甫是个严厉的、从未有过一丝笑容的人。他没有温和地对待过我们，不准我们开玩笑，因此我们对他也并没有产生什么特别的好感。他显然是个很不聪明的人，硬说：有上帝存在，世上的一切都是上帝主宰的，是按上帝的意旨做的，上帝在一切方面都是公正的。但他举不出任何根据，却要我们必须相信他的话。

我逐渐开始思索这一切，于是我（而且不只是我）开始产生了怀疑：“既然上帝如此万能，如此公正，为什么当人们生病或挨饿时他不帮助人们呢？……”“为什么一些

人拥有一切(尽管他们也不是好人,而有时甚至是坏人),而另一些人(善良的人和好人)却在讨饭呢?……”

这样的“为什么”在我脑海中与年俱增。

神甫的一切解释,什么上帝惩罚有罪的人,而降福给做好事的人以及其他类似的“证据”,都不能使我信服。我开始经常在课堂上与神甫争论。这一点触怒了神甫。他看到我的同班同学开始赞同我所讲的话。我的同班同学也参加了争论。

这样继续了整整一年。

我成了班里关于上帝问题的如此激烈的争论者,以致于我的同学已开始不叫我阿纳斯塔斯,而叫我阿纳斯特瓦茨。亚美尼亚语的意思后者是不信上帝的人。这个诨名一直叫到我中学毕业。

应当说,在所有这些争论和辩论进程中,特别是当我独自一人沉思时,不知为什么对上帝的存在我是完全不相信了。当然,与其他人一样,我还继续一本正经地学所谓的“神学”课。表面上这门课我不是落后的学生,老师也很难找我的碴儿。不过年终他还是给我打了一分,让我补考。

这门课我是懂的,因此在补考中我答出了所有的问题。当然,有无上帝的问题没有涉及到。我得了三分并升入了下一年级。这个三分就一直跟着我到底:毕业证书上也是三分。

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已经快十五岁并认为自己是个

坚定的无神论者时，我与母亲发生了一场争执，事后我对这件事很后悔。

母亲是个笃信宗教的妇女，严守一切斋戒。干一整天的活，正如常言所说，仅靠一点面包和土豆或吃些有植物油的稀饭度日。无论干酪，还是酸牛奶，什么荤东西她都从不沾口。但她却总是尽量给我们孩子们吃各种乳制品。

我看见她那样地刻苦生活，身体渐渐弱下去。就劝她和我们吃一样的东西。她拒绝了。有一次我说她这是戕害自己，损害自己的健康。

“没有什么上帝”，我对她说，“即便有上帝的话，与你吃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然而无论我怎样劝她哪怕是吃点奶做的食品，对她都一点也不起作用。

“上帝保佑”，她说。“我将永远不会这么做！”

我急了，甚至对她大喊大嚷起来。以前我从未这样做过，因为我非常爱母亲。

她恳求我不要因为吃饭的事对她纠缠不休，不管怎么样反正她都不会违背斋戒的。于是我忍耐不住了，并且由于烦躁，我把落到我手边的第一个盘子扔到地上摔碎了。而我们家的盘子并不很多。然后我跳出家门，跑了出去。

过一会儿我醒悟过来，寻思着：“我多糊涂！是啊，母亲是相信这套清规的。大概，她坚守清规是她信教的表

现。”

当我回到家里时，母亲非常温柔地接待我；好象我们之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以后在与母亲的谈话中，我再也没有提过斋戒和上帝的事了……

有一年夏天，我们全家坐在凉台上吃晚饭。我们的整个晚饭都是土豆泥。我不饿，往自己的盘里盛的不多。但母亲想让我多吃些，尽管我推托，她往我的盘里还是盛了几小勺。

结果我没吃完，盘子里剩了些土豆。

父亲坐在旁边看见了说：“盛在自己盘子里的东西就该都吃完。”

“你吃不完，为什么还盛那么多？不能这样对待上帝的恩惠！”

我反驳说，我不能再多吃了，本来我就没有盛这么多，是妈妈硬给我盛的。

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回事，但他回答我的话的是：挥手打了我一巴掌。并不很疼，但我却觉得十分委屈。我从桌旁跳了起来，尽管天已黑了，我还是跑到了长得很高的小麦地里。

听见后面在喊：“回来，别跑了！”但我还是跑到很远的地方躺下来，让人看不见我。但很快我就听到了母亲、弟弟、妹妹和父亲的声音。他们全都出来找我。我听见他们喊：“阿尔塔舍斯，你在哪儿？”（家里叫我阿尔塔舍

斯。)

我没吭声。

天渐渐黑了。我很害怕在村外野地里过夜。我非常怕狼(那时在我们这一带常常有狼),但是,我也不愿意所谓自动回去,因为我受了父亲的委屈,觉得他不公正,而且自尊心也不容许我走“回头路”。

使我暗自高兴的是,亲人们终于发现了我。

起初我故意犟着不愿跟他们走。但他们因找到了我很高兴,我也因此而高兴。亲人们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回家去。

这事以后,父亲再没有动手打过我。也许是因为他受到了母亲的责备:虽然当着我的面母亲什么也没跟父亲说,但我猜到了,他们之间因为我发生过一场不小的争执。一般说来,我们和父亲的关系总是非常亲热的。

我不记得父母亲之间吵过嘴。甚至于当他们责备我们孩子们的时候,一般也是不提高嗓门的。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我已经七、八岁了。有一次母亲正在收拾房间,用扫帚扫粘土的地。一个邻居找来了,要借三个卢布。我父亲把钱借给了他,并嘱咐他尽快地还钱。等邻居走后,我母亲就埋怨起父亲来了:

“你就这样把剩下的一点钱都借出去啦!你知道他还不还!我们自己一个钱都没有啦。难道你要让我们去讨饭不成!”

她把这话重复了好几遍。我以为父亲要大发雷霆了，但是他在房间里来回走了一会儿，随后走到母亲跟前，做了一下手势，仿佛要拧她的嘴巴子，然后说：

“别说了，奥塔尔的女儿！（奥塔尔——我母亲的父亲的名字。）这事你管不着！”

那时很少有哪个农民有钱，即使有的话，通常也是勉强够用。农村完全是自然经济：每家自己种菜自己吃，自己织布自己缝衣服，做鞋子，做帽子，现钱只是用来交税，买茶叶、糖、布匹、煤油和火柴。所以在我们村子里只有几户人家喝茶放糖，而且只是含着糖块喝。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涅尔索斯已经去世了。但是我却很清楚地记得我的祖母瓦尔季捷尔，译成俄语就是“蔷薇花瓣”的意思。与这不太相称的是，她是个身材又高又大的妇女，面孔很严肃，经常穿着一件长长的、拖到地面的黑裙子，拄着一根拐杖。

记得有一次我和母亲正在家。祖母咚咚地拄着拐杖登上凉台朝我们走来，进入屋里向我母亲问了些什么。

按照旧风俗，出了嫁的妇女没有权利同男人或同比自己年长的妇女交谈。所以母亲在我耳边小声地把要回答的话告诉我，我大声地重复给祖母听。（现在看来这一切好象是怪事，甚至是可笑的。但风俗毕竟是风俗！）

我一直觉得母亲有些怕祖母，或许母亲是由于受旧民族风俗和传统的教育，一见祖母不知怎么的就很拘束。从各方面来看，祖母尽管很严厉，但她是一个很好的妇

女。她劳累了一辈子，生养了八个孩子，而这在农奴制度下不是那么容易的。大概，正因为这个缘故，她很严厉（或显得严厉），因此我们这些孙子们跟她不是那么特别亲密……

童年时，入教会中学以前，我参加过几次农村的婚礼。婚礼在我们村往往是秋季举行。人们聚集在一个房间里。如果天气暖和，就都到街上去。很热闹，吹着唢呐，敲着鼓……我们这些男孩子很快活，觉得很有趣。

照例姑娘们聚集在一边，小伙子们在另一边，相互对望着。每个小伙子都有一个自己喜爱的姑娘，而且希望能引起对方的注意。小伙子之间好象进行着友好的竞赛。但如果几个小伙子同时都喜欢一个姑娘，有时结果就很不妙。小伙子通常带着匕首。有一次，同时爱上了一个姑娘的两个小伙子发生了激烈的争辩，接着就吵起来，打起架来，其中一个用匕首戳了对方一刀。那个小伙子倒了下去。幸亏他身体很结实，仍然活了下来。然而也常常有另外一种结局。

婚礼开始之时，即把新娘从另外一个村子送到本村时，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通常站在房子的平顶上观看这支送亲的队伍。场面是很吸引人的。

新娘的亲属骑着马向新郎村子里的人“介绍”新娘。这支队伍一边走，一边鸣枪、吹奏唢呐和敲鼓。在村子里马儿徐缓地前进，走在前面的是表演角斗和跳舞的青年

人。常常要邀请许多亲戚和全村的人参加婚礼。参加婚礼的人一般都要送一两个卢布或者价值相当的礼品。当然，不是非送不可，不过不带礼品来参加婚礼会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不管怎么说，举行婚礼是要花一大笔钱的，而这种礼品对新郎、新娘家的花费是一种特殊的补偿。

我已经说过，父亲曾在梯弗里斯工作过几年，他的外表有好多地方变得象当地车间的师傅一样。他衣着整齐，戴着城里的帽子，而不是高加索那种普通的皮帽。他系着一条银色的宽腰带，穿着城里的鞋，跟我们村里人穿的自己做的鞋是不一样的。

父亲有一些怪脾气。他很早就有一个银勺，一直把它放在高加索人过去普遍穿的大的翻袖上衣里边的袋里。当他去作客时，就拿出这个勺吃饭。饭后仔细地把勺擦干净，小心地放进衣袋里。看来，他讨厌用那时每家都有的自制的木勺。

父亲虽然不识字，可是在衣袋里他经常带着笔记本和铅笔。在这个本子里记着只有他自己一个人能看懂的“象形字”：干了多少天活，主人应该付给他多少钱等等。

我大约十一岁时，算术学得还不错。有一次父亲意外地对我说：

“给我算一道题。”

我拿出铅笔和纸。

“我作了这么些天工。倘使每天应该给我这么些钱。

主人一共扣掉这么些。你算算，最后我还能挣多少？”

父亲出的题是很简单的，但是是意外的，不知怎么的我甚至有些惊惶失措、心慌意乱起来，怎么也不能很快地列好算式。父亲看着我，看着，看着，于是伤心地说：

“甭费劲了！等你在纸上算出来，我早已心算好了。我很奇怪，如果老师这样教你们，连最简单的一道题都算不出……，那还给你们老师吃饭干什么？”

当我还是家中最小的一个孩子时，父亲总是和我一起玩。大约过了五年生了妹妹。当她开始呀呀学语的时候，父亲就不管我了。这时父亲一有空就照看妹妹。又过了五年，当生了第五个孩子，我的小弟弟阿尔焦姆——家里管他叫阿努沙万（后来成了飞机设计师）^①时，也发

^① 正值本书印制时，总设计师阿·伊·米高扬逝世了。1970年12月10日各报刊载了下列消息：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

讣告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无限悲痛地通知，卓越的飞机设计师、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两次获得者、列宁奖金和国家奖金获得者、工程技术部队上将、科学院院士阿尔焦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因长期患重病于1970年12月9日逝世，享年六十六岁。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苏联部长会议

——原编者注

生了同样的情形，但是是对妹妹采取不管的态度。这一次父亲又把一切注意力都放到他身上。既忘了我，也忘了妹妹，虽然他也是慈父般地对待我们，喜爱我们。

当弟弟刚五、六岁时，父亲在我们面前同他谈话就象同平辈谈话一样。父亲平常不多说话，此时却变得非常爱说了。他早先同我的那些亲切的谈话，给我留下了十分愉快的回忆。

弟弟稍大了一些，父亲就让他放我们家那两只羊。放羊这件事不是好差使。我回想起当年放羊的情景是多么辛苦：羊总是在长满灌木和树林的多石的陡坡上奔跑，跑得很快，我好不容易才能追上。我们那时穿的都是自己做的鞋（一种没有硬底的鹿皮鞋）。由于在多石的山坡上奔跑，这种鞋很快就磨出了窟窿。脚指头碰在石头上碰出了血，走起来很疼。虽然我的鞋尖和后跟里都垫上一块皮子，但也无济于事。因为走着，走着，这些皮子很快就滑走了。

至今我总忘不了放羊时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有一回我在山坡上赶羊赶累了，坐下来休息，盘算起什么事来。当我清醒过来向四周一望——羊已经不见了。我东找西找，弄得精疲力尽，羊还是没有找到。我感到很难过，傍晚时回到家里，不知怎么对父母说。

母亲见到我，很伤心，但没有责备我，她说，我们的羊跑到不知谁家的麦地里，被人家捉住了，并关起来了。因为糟踏了人家的麦苗，父亲只好赔给人家二十个戈比。

那时在农村是相当可观的一笔钱。

父亲一句也没说我,但我自己很难过,很久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

当放羊的担子落到弟弟身上时,我不能不同情他,尽管我感到这座“山”终于从我身上卸掉了,感到轻松。

那时我产生了许多新的兴趣。我已经读了很多书,并且对一系列问题分析得不坏,有时比父亲还好。这一点父亲自己也是清楚的。

有趣的是,我从梯弗里斯回到农村过暑假时,父亲从未问过我,升级了没有,怎样升的,得了几分。不知他为什么不好意思问我。而我自己也什么都不对他说。我同母亲的关系就比较随便。我把生活、学习情况一下子就全告诉了她,她听了很高兴。

我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全家都已睡在我们的软床上了(那时在工厂工作的哥哥睡在单独的一张木床上),显然,父亲以为我们都睡着了。他问母亲我学习得怎样,升级了没有。母亲夸奖我学习得很好,说我顺利地升入了下一年级。看来,父亲对这些是很满意的。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对我显得比往常亲切。

又有一次,也是在我们已睡下的时候,父亲忽然对母亲说:

“听我说,我想应该让阿尔塔舍斯离开学校到工厂去干活啦。”

母亲反驳说: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他不是学得很好吗？让他继续上学吧，他会成人的。”

父亲回答说：

“我怕他最后会发疯的。”

母亲惊奇地说：

“你胡说什么，奥瓦涅斯！为什么他一定会发疯呢？”

这时父亲讲，离我们不远地方的一个名叫什么的公爵，这个公爵因为“老是读书”而发疯了。

“我们的阿尔塔舍斯也是这样”，他下结论说，“读啊，读啊，从早读到晚，看吧，以后也会因为这些书本而发疯的。”

“不会的，奥瓦涅斯！”母亲回答说。“阿尔塔舍斯已经懂得很多了，让他继续学下去吧。”

他们争论了好久，我一直等着争论怎样结束，可是没等听到——我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父亲对我说：

“阿尔塔舍斯，我送你到工厂去干活，你看怎么样？”

“这是为什么？爸爸，你是知道的，我学习得很好，我还想上学，我总是有机会进工厂的。”

“那么，你不愿意进工厂了？”

“不，爸爸。我很高兴放暑假的时候去工厂干活，帮助你和妈妈。但我不愿放弃学习，也决不放弃！”

我所以敢这样大胆地跟父亲说，因为那时父母亲没有为我花费一个卢布。当时我的确学习得很好，因此从

事救济特别穷困学生的亚美尼亚慈善协会供我免费吃饭，并支付我和我同住的三个学生的房钱。除此之外，我自己也挣一些钱，我给那些家庭富裕但功课跟不上的同班同学补课。作家庭教师我每月可以得到三至九个卢布，就当时来说这对于简朴的生活算是很不错了。

父亲没有再争下去。但利用我的同意，他还是决定让我在暑假期间去工厂干活。看来他的打算是，我干几个月之后，习惯了工厂的环境，也就会永远留在那儿干活了。

我同父亲到炼铜厂。在厂内办公处有一个负责招工的是我父亲的熟人。父亲请求他替我安排个工作。那个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父亲说，不管他同我父亲的关系怎样好，无论他怎样愿意满足我们的请求，他都不能收留我。

“我不能为了收留你的儿子而解雇一个工人”，他说。然后他又俯身小声对父亲说：

“即使厂里有空额，我也不能收他。你看看他，能叫他干什么用力气的活啊！”

那时我的样子的确不象个干活的人。当时我是个又瘦又弱的小伙子。长的样子要比我的实际年龄小得多。

父亲没有争论，而且也无法争论。就这样我进工厂的事彻底吹了。

有一次，我得知一些农村的孩子们经常到树林去摘

复盆子，卖给工厂里那些工程师的妻子们。这样他们可以挣得一些钱。我决定采用他们的“经验”使母亲高兴高兴。天不亮我就离家到山里去，下到很窄的狭谷边上，那里长着很多复盆子。由于很可能遇到熊，我不由得有些害怕。大家都知道，熊是很喜欢吃复盆子的。然而我克服了恐惧心理，在日出前就到达了目的地。我采好了一满篮成熟的芳香的复盆子后，下到狭谷里，一直朝工厂走去。经过工程师们的住宅时，把复盆子卖得四十戈比。这比我当锻工的哥哥一天的工钱还要多。我把钱给了母亲。她很高兴，我更高兴，因为我对家里总算有了一些帮助。

这以后我还去采过四、五次复盆子，每次都可卖得三十到四十戈比，我把钱都给了母亲……

维尔基尼娅姨母的女儿，我的表妹阿什亨在学校学习得不错。但是，不知为什么老师总是侮辱她，在班上当着大家的面无缘无故粗暴地指责她。阿什亨的自尊心很强：她受了委屈就不再用功了。于是新的责备接连而来。受到的责备越多，她学习得就越差。其实，她是一个相当聪明的女学生。结果留级一年，到第二学年她又有四门功课需要补考。

维尔基尼娅姨母要我把阿什亨带到农村去，帮她在夏天准备补考，否则她会被学校开除的。我当然同意了。

那时父亲给我们住的旧房子又添盖了一间屋子，并

把整个房子都换成瓦顶。只剩下最后的整修工作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房子地基的主人突然说，地不是我们的，我们无权在这里盖房，不准父亲继续把房子修建完。因此，房子的一面墙就这样没有完工。然而夏天在这间没盖好的房子里是完全可以住的。况且主人并没有要求我们把它拆掉。

于是我们就安排阿什亨临时住在这间房子里。我住在阁楼上，在那儿学习和睡觉。家里其余的人都住在下面。

我开始给阿什亨补课，每天下午给她讲两、三个小时的课。上午她完成我给她留的作业。我们之间很严肃，不谈任何题外的话。我尽力帮助她。阿什亨自己也很努力，很用功，认真地完成我留的全部作业。空闲休息时，她通常是和村里的女孩子们到田野和树林里去采摘野花和草果——麦地里长的一种可以吃的草。

应该说，父亲很喜欢阿什亨。他很愿意同她谈话，对她很热情，也很关切。

记得有一件可笑的事。我已经说过，我家有两只羊，没有牛。但夏季我们有足够的羊奶。我们喝羊奶，还用它来做干酪和酸奶。

养羊通常到冬天就困难了。冬天饲养羊是件麻烦事。因此，冬天父亲就把羊交给邻村阿克涅尔村的一个熟识的农民喂养，我们给他一定的报酬，到春天再牵回来。

我现在想说的是一个春天，不知为什么这个农民没有及时把羊送回来。我们很不放心。

于是，父亲要阿什亨给我们的“养羊人”写张条子，让他把羊尽快地送来。阿什亨答应了。父亲说：

“写吧，然后把你写的读给我听听！”

阿什亨开始读：

“牧养先生……”

父亲立刻大声笑起来。父亲听到如此郑重地称呼一个贫苦的农民，忍不住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并且笑了很久，还一再重复着：

“牧养先生，先生，先生……”

可阿什亨却生起气来了：

“那么让你儿子写得更好些吧。”她委屈地说完以后就从屋里跑了出去。

然而不知为什么父亲没让我干这件事。

革命的少年时期

酷爱读书；罢课；我们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第一次读列宁的著作；我被列入宪兵的黑名单；上前线。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很早就酷爱读书。凡是到手的书我都读了。在中学头几年我因为还不懂俄语，只读了用亚美尼亚文出版的书。

我十分感兴趣地读了亚美尼亚作家拉菲的历史小说《达维德老爷》、《萨姆卫尔》等。亚美尼亚人民反对外来压迫者而斗争的崇高精神十分吸引我，拉菲的小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斯·格·邵武勉称拉菲是亚美尼亚人最喜爱的小说家之一。

我还津津有味地读了亚美尼亚古典文学作家奥瓦涅斯·图马尼扬的作品，这位作家是我的伟大的同乡，我后来有幸亲自认识他。他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生动逼真地描写了故乡的自然风景和农民的生活。尤其使我神往的是书中描写的我所熟悉的故乡洛里的风土人情。我很喜欢在图马尼扬的语言中有很多我们洛里方言，但这丝毫没有损坏亚美尼亚文学语言，反而使它丰富了。

我还读过希尔万-扎德、帕伦扬等作家的作品。我翻来复去地诵读亚美尼亚无产阶级诗歌的创始人、老革命家阿科普·阿科庇扬的诗，并且很激动地读了舒山尼克·库尔吉尼扬歌颂革命者的英雄主义和怒斥沙皇制度的豪迈诗篇。当时我非常喜欢库尔吉尼扬翻译的著名的意大利女诗人阿达·涅格拉的诗，她的早期作品无疑是进步的。

后来，不记得是受谁的影响，我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很大兴趣。

那时，我已经掌握俄语，能够自由阅读俄文书籍了。起初我看了一些通俗的自然科学小册子，兴致勃勃地读

完了克·阿·季米利雅捷夫的《植物的生命》和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人类原始和类择》，这些书使我对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和发展的观念，发生了真正的转变。这些书给我的自觉的无神论奠定了基础。我还开始读帕拉丁的著作《植物生理学》，但它并没有使我感到兴趣。

后来，我又热中于化学。这是从课堂上的作业开始的。当我知道了德·伊·门德列耶夫时，我决心在暑假把他的《化学原理》一书带到家乡去仔细钻研。开头两百页左右虽说很困难，但终究把它读完了。可是再往下我就读不懂了，因为需要有高等数学方面的扎实的知识才行，而我没有这方面的知识。这使我感到非常苦恼。有一个到我们村来度暑假的中学教师穆恰扬见我读这本书，感到很惊讶，并劝我不要再往下读了，说这是供大学生看的书，无论我怎么下功夫，现在也无法理解。

我所处的社会环境对我的思想的形成无疑是有影响的。我的家乡离现在的阿拉维尔迪炼铜化学联合工厂有两公里，这个联合工厂在目前国内所有的炼铜厂和电解铜厂中是最老的企业。1970年是该厂建厂两百周年。

1801年这家工厂所在地由波斯转为俄国管辖。当时从乌拉尔调来了专家，在炼铜方面，用比较先进的生产方法代替“亚洲方法”。1888年这家工厂连它的矿场租让给了法国股份公司。革命前该厂最高铜产量年产三千八百吨，占全俄炼铜总量的四分之一。

我父亲是这个工厂的木匠，哥哥是锻工。有一段时

期，我们家住在厂内的工棚里，只有一间房。工棚的另几间房子里，每个床板上睡五、六个人。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看见工厂的工人生活是多么的贫困，他们一天干了十二小时的繁重劳动以后，回到家里是多么的疲惫不堪。

我在城里上学以后，夏天到家乡过暑假，经常到工厂同工人接触。有一次回家后，生平第一次到了采铜矿的坑道。我在那里所见到的一切，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我不会忘记，哥哥下工后怎样翻过陡峭的山回到家里。他精疲力尽，简直是瘫在床上，缓缓气，天刚蒙蒙亮，他又爬起来上工去了。

工厂约有三千工人在极度艰难的条件下做工，其中有一千名左右是外国工人，都是北伊朗的单身汉或移民，他们干的是最笨重的活。矿工一般都是希腊人，他们住在离矿井不远的村子里。工人们虽然来自不同民族，但是从来没有发生过民族纠纷。

高级管理人员豪华奢侈的生活同工人们极端贫穷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高级管理人员占有带网球场的漂亮住宅(这样的房子那时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工程师的太太们穿着女式骑马服，骑着非常漂亮的马到处游玩。

工程师和厂方高级管理人员(约十五人)都是法国人。而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是办公室

的职员。绝大多数工人都是文盲。

我把在工厂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同学们。我就在书中，特别是从革命历史书中，寻找对这些现象的解释。

有一个姓叶列缅的人在我们班学习，他比我大约大两岁。虽然他的学习平平常常，但是他读书很多，被公认为我们中间读书最多的人。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看到多卷本的蒙森《罗马史》中的一卷，对这书发生了兴趣。

同叶列缅交谈后，我感到自己对历史知道得太少了，同时也感到历史很有意思。起初我打算立刻把《罗马史》的各卷都读完，可是后来又一想：“如果光是罗马的历史就要读好几卷，那其他的历史我还要读多少卷呢？”而我当时最感兴趣的还是现代史。

我弄到了一本让·若列士写的《法国大革命史》。这本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把所有最重要的事实和日期分别摘抄在几个小本上。把自己的这些摘记反复重读了几遍以后，最后我终于能把这些摘记背诵出来。

我还读过有关记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书，可是这些书不知怎么都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法国革命则以那些激烈的事件，特别是那些革命鼓动者和首领们，如马拉、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光辉形象，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我简直对它们如痴如狂。

过了不久，不知怎样弄到了季·伊·皮萨烈夫作品的第一卷。这以后，我可以说一口气读完了当时出版的

皮萨烈夫文集的全部四卷。应该说，皮萨烈夫对我世界观的形成，对我的一般教育以及性格的养成，起了很大的作用。读了他的作品后，我感到心中豁然开朗，好象摆脱了许多陈腐的偏见和成规。对自己产生了很大的信心，逐渐养成用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中的许多现象。总之，季·伊·皮萨烈夫使我成熟起来。

读完皮萨烈夫的作品后，我又开始看维·格·别林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他们的著作引起了我对俄罗斯古典文学的极大兴趣，并且帮助我克服掉了当时头脑里形成的对艺术作品的错误的观点。

应该说，在这之前我喜欢阅读的主要是一些历史书，认为只有这些书反映的才是真正的事实，真人真事。而我对艺术作品不大喜欢。我认为这些书里的一切都是虚构的，脱离实际的现实生活的，一切都是作者幻想的结果，因此我不认为这些书对自己有多大关系。特别是在读过那些论述爱情问题的作品以后，我就更坚定了自己的这种看法。

阅读别林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使我打开了眼界。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我了解到艺术作品的崇高的社会使命；懂得了艺术作品即使有时没有反映具体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然而却是由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和性格，由作家用创造性的想象力加以概括和综合而成。

我开始贪婪地阅读伊·谢·屠格涅夫和伊·阿·冈

察洛夫的长篇小说。而《前夜》、《罗亭》、《奥勃洛莫夫》这几部作品我简直是转眼间就“全吞下去了”。

接着看了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复活》、《哈吉-穆拉》、《老板和工人》等给我的印象很深。但我看不懂《克莱采奏鸣曲》这本书。当我长大了再读这本书时，才明白我当时的水平是无法理解这位伟大作家的这一作品的。

记得，我曾多么激动地读了艾·伏尼契的《牛虻》！接着我又看了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

车尔尼雪夫斯基启发我读了傅立叶、托马斯·莫尔、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作品。当然，他们作品中的很多内容我领会得还很肤浅、很粗略，但是我以心向往的兴趣阅读这些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书。书中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有趣的，而主要的是我觉得在这些书里找到了当时激动我心弦的许多问题的答案。

稍后我还读了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可是读了以后，却使我的心情变得忧郁而沉重……

魏列萨耶夫的《医生札记》一书引起了我很大的兴趣。我还饶有兴味地读了加尔洵的作品。

多么奇怪，当时我喜欢的不是普希金的不朽的诗篇，而首先是他的散文。我兴致勃勃地读了《普加乔夫起义史》、《上尉的女儿》、《杜布罗夫斯基》等作品……

在外国文学中，那时我读了狄更司、杰克·伦敦、维

克多·雨果、亚历山大·仲马、易卜生的作品，并且对席勒的《强盗》一书记忆很清楚。应该指出，我们的有进步思想的俄语教师卡帕纳克扬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对古典文学作品的爱好。

当时我继续在中学学习。象以前一样暑假回家探望父母。在家里读很多书。秋天返回梯弗里斯。

……我想起我们刚开始在用亚美尼亚粉红色凝灰石建成的美丽的新校舍里上课的情景，这房子是1912年巴库石油企业主百万富翁曼塔舍夫建造的。

这座校舍位于梯弗里斯城郊的一块高地上，从这里可以眺望全城的美丽景色。学校里有明亮的大教室，设备齐全的教学实验室。可是校舍的四周却空荡荡的。我们只好自己动手栽植了许多树苗，后来这里变成了美丽的公园。

在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校舍和其他房子一样，用来作医院了，而我们又搬回到梯弗里斯灰尘最多的、设备很差的旧校舍。

* * *

……我想起了战前不久在我们中学发生的一件事。

不知为什么在我们班上教书的一个老师，在学年当中就离开了学校。派来接替他的是在此前曾在舒沙市亚美尼亚中学教过书的名叫阿赫纳札利扬的新老师。

一开始我们大家和新老师就发生了不愉快的关系。他对我们很粗暴，总爱挑剔小事情。

起初我们大家都忍着不吭声。但越来越忍不住了……终于有一次，当老师又任意粗暴地对待一个同学时，我们都起来反抗了。

有几个同学站起来对老师说，他们不想再容忍他的侮辱，不愿再听他讲课，而且今后再也不上他的课了。

老师跑出教室，显然是找校长去了，但校长不在。过了一些时候学校里的一位受尊敬的老师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他开始查问我们“造反”的原因，并要求我们遵守纪律，因为正如他所说的，“老师不是由学生挑的，而是由校方派的。”

我们仔细听完了他的话，但坚定地表示，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可是我们再也不想上这个老师的课，要求撤换他。

他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后就走掉了。我们讨论了当时的情况，决定全班实行罢课——不撤换这个憎恨我们的老师，我们就不上课。

当时正是春天，于是我们商定好第二天在梯弗里斯植物园集合，再次讨论今后怎么办。

当我们在那儿集合到一起时，发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这样做对吗？

大家一致认为我们是对的。为了“团结一致”，我们甚至就此进行了表决，决心坚持到底，直到校方满足我们的正当要求为止。

就这样持续了几天。为了大家在一起，避开父母们

的压力，鼓励和支持我们中比较软弱、动摇的同学（而这样的人是有的），我们每天都在植物园集合。

但是，我们越来越感到来自父母们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大起来。原来是校长把我们一些同学的父亲叫去了，对他们说，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回校上课，就要被开除。

情况变得复杂化了。但是我们决定坚持自己的主张，个个都许下诺言：没有大家的一致同意，谁也不回校，不当内奸。

又过了一个多星期，父母们的压力在继续增加。一些同学感到反抗不过而想屈服。

有一个星期天（星期天我们不集合），我在街上碰见了低年级的安德烈阿西扬同学。他问我：

“你知道吗，罢课已经停止了。”

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从未做过这个决定。

于是他告诉我，这是他从阿利哈尼扬同学那儿知道的。就是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所有参加罢课的同学都被叫到主教那里，于是他劝他们结束罢课，星期一去上学。他对同学们说：老师已受到训斥，他会改正的。

我感到奇怪：

“那为什么谁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也没叫我去呢？”

应该说明：叶列缅和我是罢课的总头儿。他们没有叫我，而叶列缅被叫到主教那儿去了，他是最先屈服的一个，并号召其他同学星期一去上课。

第二天我只好和其他同学一起去上学。

我当时不怎么抱怨大多数同学的行为，因为他们的心情总是可以理解的。但叶列缅的行为却使我很气愤。所以当我看见他时，就走到他跟前，非常严厉地对他说，我认为他是叛徒，今后不想同他发生任何关系，也不和他握手。

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我们不大喜欢的那个老师变得“温顺”了。而我同叶列缅的关系也渐渐和好了，并又成了要好的同学……

* * *

为1910年开始的工人运动的新高潮所引起的革命浪潮，在1911—1912年间也波及到了我们学校。记得在高年级同学中对各政党的议论多么纷纭！当然我们同班同学中也有这种议论。我们互相争论，最后终于决定，为了不致于在选择加入哪个党这一问题上犯错误，我们自己应该独立学习一些必要的革命书籍。为此，我们组织了政治学习小组。我记不清是根据谁的建议，我们决定从学习考茨基的《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这本书开始。

我们这个小组里有六个人。大家相互了解，彼此信任，不愿吸收更多的成员，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可靠些。

在1912—1913整个学年内，我们定期在一起学习。我们逐章通读了考茨基的全书，顺便讨论着，看谁懂了多少。这种方法对我们掌握这本相当难懂的书，帮助很大。

下一学年，我们小组略有扩大——达到十四个人：我

们吸收了一些低年级的学生，还有以其组织者叶列緬为首的已解散的文学小组的一些成员。

我们只好同他们一起再次学习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但学的是波格丹诺夫的书。同时我们这些“老组员”又读了其他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如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和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

有一次，我们听说，象我们这样的小组在一些梯弗里斯中学，在各民族学生都用俄语上课的商业学校，以及在多半是格鲁吉亚人学习的贵族中学里都已组织起来了。

我们决定同这些小组取得联系。于是，1914年春天召开了第一次各小组代表会议，每小组派一名代表参加。

会议是在一个女学生柳夏·利西诺娃的住所举行的。柳夏后来是莫斯科的大学生、共产党员。十月革命时，她在莫斯科街垒战中英勇牺牲，并安葬在克里姆林宫墙旁边。

柳夏在这次会议上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她是个聪明、博学、有相当理论修养的姑娘，而且外貌长得也很吸引人。那时我非常喜欢她。

过了不久，1914年夏天，我当时正在家乡，柳夏完全出乎意料地全家到我们村避暑来了。通常白天我们两人都读书，彼此不相见。但每晚我都遇到她、她的女朋友、还有一个中学生，大家亲切交谈，玩槌球戏（在没有遇到她们以前，我是不知道这种游戏的）。

几乎每晚见面时我们都在一起谈论读过的东西，并

就我们感兴趣的政治问题交换意见。

从和柳夏的多次交谈中我了解到：她是叶列娜·季米特里叶夫娜·斯塔索娃所喜欢的学生。当时这位老师在梯弗里斯任教，柳夏在她的影响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那次会议上另一个命运不寻常的姑娘是女学生热尼娅。在老共产党员鲍格拉特·鲍利扬的影响下，她也成了一个女布尔什维克。中学毕业后她到了巴库，嫁给了鲍利扬的弟弟。鲍利扬就是后来牺牲的二十六个巴库委员中的一个。热尼娅·鲍利扬住在莫斯科，于1970年逝世。

虽然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男女青年参加了那次会议，但不知怎么的，只有这两个姑娘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记忆里……

就在1914年春天，我得到了尼·伊林^①写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本书。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我到我远房亲戚达努什·沙维尔江家里去，他在梯弗里斯当律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成员之一）。

我同他谈了自己的生活并告诉了他关于我们学习的情况。达努什已经知道在中学里有秘密政治小组，对此很赞成。

分别时，他把一本书递给我说：

^① 列宁当时用的笔名是弗拉基米尔·伊林，不是尼·伊林。后面讲到的列宁的假名应该是尼·列宁或弗·伊林。——译者

“阿纳斯塔斯，仔细读读这本书吧！这是一本非常有益的书。用不着客气，以后常到我这里来吧，我不仅愿意告诉你们小组应读些什么，而且愿意帮助你们弄到在市立图书馆找不到的书。只是你们今后对这些书要小心谨慎一些！”

他马上又向我说明了这本书作者的真实姓名：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家和领导人乌里扬诺夫—列宁。为了便于秘密工作，有时他使用尼·伊林这个假名。

这样由于沙维尔江的介绍，我第一次知道了列宁。

应该说明，在我最初的党的政治生活中，达努什·沙维尔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关于这方面我以后再谈。

无论是沙维尔江，还是斯塔索娃和鲍利扬，都给了我们这些小组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我和我的同学，中学秘密小组的一个成员，两人一起读了列宁这本书。记得使我们非常惊异的是列宁在统计资料方面做了那么多细致的和极端复杂的工作，这些资料反映出了俄国经济的深刻变化，证实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和它以后灭亡的必然性。

……还是在1914年春天，当学校的课程实际上已经结束时，我遇到了一件意外的事。老实说，直到最近我还在想，这件事在哪儿也不会有记载，但我的朋友们偶然在档案馆中发现了提及这件事的材料。所以我想说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那时我同两个中学的同学住在一个房间里，我们一

起向房东付房钱。

有一次我到离我们住处很远的梯弗里斯城郊的一个同学家里作客。突然，我同屋住的同学喘着气焦急不安地跑来对我说，刚才警察到我们住处去找我，然后进行了搜查，拿走了一些文件和笔记本。他们知道了我现在在哪儿以后，找我来了，显然是要逮捕我。

我的朋友最后说：“我等他们走后，就跑了出来，穿过几家院子跑到这儿来告诉你。”

真的，两个警察急急忙忙地向我所在的房子奔来了。

当然我没等他们来到就出了后门，沿着偏僻的小巷偷偷地隐匿起来了。

我怕有埋伏，当然没回自己的住处，而是到一个同学家去过了一夜。第二天买了一张火车票就到家乡去了。

在档案馆里还保留着一份有趣的文件——梯弗里斯省宪兵处长帕斯特柳津上校 1914 年 5 月 22 日签发的对我进行“仔细、严密搜查”的搜查证。证上写着：“凡搜查出来的一切未经检查的出版物、所有一切书信、照片、名片和通讯录，以及一切违禁物品或者足以证明被搜查人的罪行或嫌疑的物件，均应编成清单，然后必须查封，写明这些物品属何人，在何处发现的，连同搜查记录火速送交上述宪兵处。

被捕人的证件以及贵重物品（如若应该没收）必须编制特别清单，封在一个单独的包裹内，详细注明属于何人，亦上交宪兵处。被搜查人应视搜索结果予以拘留。

在被搜查人住处发现的无证件又未向警察局报告的人物，或虽持有证件，但情属可疑者，应一律拘留，直到查清他的身份为止。”

他们对我进行了搜查。关于这点宪兵在报告书上是这样写的：

“……在搜查期间发现被捕人米高扬的裤袋里有两小片信纸，一片上写的是俄文，一片上写的是德文；六张便条，上面写的都是亚美尼亚文和俄文，其中一张便条是写给列万·埃瓦江的：‘列万，我建议下次集体会议在我这儿举行。’底下署名是：‘阿·米高扬，4月18日’”。

应该说明，城里各校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代表会议当时称为“集体会议”。埃瓦江是梯弗里斯商业学校秘密小组的领导人。

这样，来势汹汹的宪兵在我的住处并没有捞到多少“油水”。

我始终不大理解，为什么警察局要对我进行搜查，而且还要逮捕我呢？他们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我那时还不是党员。我唯一能设想的是：可能有人把我们小组和我读什么秘密书籍的事向警察告密了。

看来，由于警察在我那儿没有找到特别可指摘的东西，他们才平息下来了。

* * *

当帝国主义战争爆发时，我正上完中学五年级在家乡度假。

新学年照常开始了。但前线的局势使我们很激动。

土耳其前线的战争与亚美尼亚人有直接关系，因为只有俄罗斯军队在反对土耳其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居住在土耳其境内的近两百万西部亚美尼亚人才有摆脱土耳其桎梏的希望。

为了前往土耳其前线支援俄罗斯军队和西部亚美尼亚人的解放运动，开始组成了亚美尼亚志愿军。

同学间展开了争论——究竟去不去前线。有民族主义情绪的老师，尽管极力赞扬青年中的义勇运动，但却反对我们放弃学业去当兵。其主要理由是亚美尼亚需要受过教育的人，而这样的人目前还很少，因此要成为真正有益于本民族的人，还是应当继续学习。

我们几个特别有好战情绪的学生，认为亚美尼亚志愿军有可能加入民族解放运动。在争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举了保加利亚人在争取本民族解放斗争中站在俄罗斯军队一边反对土耳其的例子。记得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我们还援引了英国著名诗人拜伦的高尚行为作例子。拜伦勇敢地支持了希腊人为摆脱苏丹土耳其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虽然他是个瘸子，还是上前线当志愿兵去了……

总之一句话，老师越是劝我们不要去前线，我们要去的决心就越坚定。说实在的，我们都担心在最后一分钟校方同我们的父母亲及亲属商量好，以不够应征年龄为理由而阻止我们上前线。因此我们干什么都背着家里人。

报名当了志愿兵后,1914年11月的一天,我们什么也没有和家里说,在纳弗特鲁格车站我们坐上了军用列车,顺利到达朱尔发这个边境城市。在那里我们经过了一星期的短期训练,随后就上了前线。

记得在上前线的前夕,我的一个要好的同学阿拉姆·沙赫格亚利江的父亲,他住在离我们不远的纳希契凡城,突然来到军营硬把自己的儿子带回家去了。但这样的事只发生过一次。

我们被补充到安德拉尼克义勇队,这支义勇队驻扎在靠近土耳其边境的波斯领土上。

中年的安德拉尼克当时已是一个著名的军人,有关他在苏丹土耳其的亚美尼亚人游击战中和在保加利亚人民解放斗争中的英雄事迹,流传着一些传奇。他胸前佩戴着保加利亚的最高勋章。他在亚美尼亚人中声名很高。正如我们后来知道的,他在士兵中也享有无可非议的威信。

值得指出的是,1907年前,安德拉尼克曾短期地并且只是形式上参加过达什纳克党,后来就同这个党断绝了关系,并一直被认为是独立的爱国者和人民英雄^①。

^① 1918年我在反击土耳其进攻巴库的前线担任红军旅政委的时候,在《巴库工人》报上读到一条关于安德拉尼克(他自1915年以来就没有音信)的报道。报纸上刊登了两份电报,一份是1918年6月14日安德拉尼克打给高加索非常委员会邵武勉的。安德拉尼克报告说:当时他的部队所在的纳希契凡县已宣布

我们来到前线时正赶上在这一带向敌人进攻。

周围都是山地，没有道路。山上积满了雪。敌人没有对我们顽抗，至少战斗是不太激烈的。一连几天进攻都很顺利。我们占领了山谷中许多小村庄(十至十五户)。房子空空的，居民们早已迁往后方。到处一片荒芜，非常贫乏。

后来虽然敌人在这里没有向我们进逼，但我们接到了开始撤退的命令。据说南边的土耳其军队绕道转入了反攻。在没有敌人追击的情况下，我们渐渐靠近了俄国边境，我们部队就在朱尔发驻扎下来。

和我一起到前线的几个同班同学抱怨行军的艰难和疲劳，都打算回家。长官也没有反对他们离开。我由于个人自尊心，不愿随他们走。刚到前线还没有一个月，

为俄罗斯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请邵武勉报知有关领导，他的部队完全受俄罗斯中央政府统辖并服从其指挥。第二份电报是邵武勉的复电：“致朱尔发人民领袖安德拉尼克。您的电报已收到。电报全文已转告莫斯科中央政府。我个人祝贺您这位真正英雄……”

在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后，安德拉尼克虽然身在新成立的亚美尼亚资产阶级国家中，但对依附英美和与邓尼金相勾结的达什纳克政府的政策，他是不能与之妥协的。他离开了亚美尼亚，经过巴统到保加利亚过侨居的生活去了。

很有意义的是，苏维埃政权在亚美尼亚建立后，安德拉尼克为了表示对苏维埃亚美尼亚的崇敬，把自己的军刀赠给了埃里温博物馆。

在这里什么事也没干就走，我认为简直是儿戏。

在短暂的休息之后，我们这支义勇队进到了波斯的阿塞拜疆境内霍伊亚城地区。义勇队的所有队员差不多都是巴库工人。他们都是纯朴的人，很好的人。虽然我比他们都小，但他们对我却挺尊重。他们把我看作是知识分子，然而对我作为一个普通士兵，和他们一起服兵役，共患难，表示好感。

不久，我们这支义勇队在波斯境内，参加了同土耳其进攻军队的大会战。在我们这一段战线有三支亚美尼亚义勇队与俄罗斯军队并肩作战。我们占领了有利的防御阵地，很好地在高地的小丘上挖了战壕。相反，土军的阵地是在平原上。

清晨，激烈的战斗开始了。土耳其军队尽管伤亡很大，仍然继续进攻。我们在战壕里用步枪向他们射击。只见进攻的土耳其士兵纷纷倒在我们炮火下。

土军以散兵线前进。土军的大炮向我们阵地打来，但大部分炮弹都在战壕外面爆炸。虽然如此，我们的损失也相当大，特别是由于榴霰弹的爆炸。当然，和倒在我们面前的敌军尸体数量相比，我们的损失还是小的。

傍晚，天刚黑，土军的散兵线紧紧靠近离我们战壕几百米的小山脚下，在那里卧倒隐蔽起来。互相射击停止了，出现了暂时的平静。

过了一会儿，当我们正利用喘息机会吃东西的时候，下来一道准备夜间进行肉搏战的命令。俄军司令部认

为，土军不会等到拂晓，而会趁天黑看不见时就发起拚刺刀冲锋。

应当说，经过最初几次战斗，我对战争环境已有些习惯。而现在一场肉搏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和其他战士一样情绪很好，没感到特别害怕，但坦白地说，当前这场肉搏战，对我是不大合适的。我没受过拚刺刀的训练，因此我对同志们说，用刺刀作战我还感到困难。我请求一个同志在夜战时把他的手枪给我用：我愿意带手枪去作战，而不是用刺刀去打仗。说实在的，用刺刀去扎进人的身体，我连想都不愿去想。我心理上没有这种训练。而步枪和手枪却没有使我产生这样的感觉。

拿到手枪以后，我的心才安定了。

为了不致于在敌人突然袭击时措手不及，命令我们轮流在战壕睡觉。大概是同志们爱护我，因此没有叫醒我。直到太阳出来时我才睁开了眼。

这时，一个土耳其人也没有了。原来为了掩护撤退，他们伪装准备夜间进袭。一夜之间他们连同伤员全撤走了。战场上留下来的只是被击毙者的尸体。

我们走下小山，往前走去。以前我根本不能想象这眼前的一切，遍地都是东倒西歪、横七竖八的尸体。我们在他们中间走着。有些士兵去搜寻死者、特别是军官的衣袋，显然是为了寻找值钱的东西。这使我非常反感。

这是当时我目睹的一次最大的战役。土耳其人遭到重大伤亡后开始败退，我们进入了土耳其境内。以后我

们参加的战斗就比较小了。

当我们接近亚美尼亚古老的都城之一凡恩的时候，发生了第二次大的战斗。我认为这次战斗和第一次战斗相比流血较少。但土耳其军队在这里同样遭到了惨败。

正在这个时候，我的身体状况开始急剧恶化。因为我从小就不吃肉，只要吃一小块，身上就起斑疹。只是到了1918年，在巴库，我才逐渐习惯吃肉食。到前线以前，我总是以乳制品，特别是干酪代替肉食，一日三餐总是面包加干酪。到前线后就没有这种可能了。我简直是靠面包和粥生活，瘦得很厉害，出现了营养不良的现象。由于长时间的行军，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同时又来了新的灾害：在准备进攻凡恩的时候，我得了很严重的疟疾。忽冷忽热，发高烧。隔一天就发作一次。

1915年4月初，进入凡恩城以后过了几天，我和其他伤病员一起被送到了后方。开始在埃里温，后来又转到梯弗里斯。此地设有专门接收亚美尼亚伤病员的医院。

凡恩城绿树成荫，到处是果园，果树林中隐现着整洁的平房。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离城不远，我看见了三面环山、明亮如镜的凡湖……

在医院里因为奎宁吃得过多，差点使我变聋。由于虚弱，我仍然头晕，甚至昏迷不醒。但疟疾发作的次数减少了，最后完全停止了。

……5月中旬，我出了医院，感到身体很结实了。

仔细想想我在前线时所发生的一切，我感到很难说获得了什么益处。唯一使我感到快慰的是，当我上前线的时候，我还完全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幼稚的孩子，而回来的时候，我觉得我已变成一个生活经验丰富的大人了。

一次春季行军，那时我的身体还很健壮，我们遇到了倾盆大雨。全身都湿透了，而雨仍然下个不停。我们只好就地宿营。我们很想烧起一堆火来暖和暖和，至少烘一烘身上的衣服。但附近既无木柴，又无干树枝。我们累得几乎站不住了，非常想睡觉。

我们每个人就在这潮湿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躺下来，盖着淋湿的军大衣睡着了。刚躺下时，我想大概会着凉得肺炎的。可是当我们醒来时已是阳光灿烂。我们幸福地走出帐篷，把衣服脱掉晾起来，让阳光暖和着身子。

后来使我们非常惊奇，经过这一夜竟没有一个人伤风！

从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中，使我形成了一种看法：一个人当他没有亲身经受危险的时候，他是不了解自己的。现在，我很满意我亲身经历了艰险，并且毫不含糊地坚持下来了。这种想法产生了一定的满足感。

还在医院的时候，我就听说住在土耳其境内的西部亚美尼亚人惨遭迫害的情形，这消息使我非常震惊。土耳其反动的苏丹政府对他们进行了野蛮的镇压，屠杀了近五十万亚美尼亚和平居民。

我认真思索着当时发生的一些重大事情，感到非常

需要一个有能力的人很好商量和解答问题。我非常想见见沙维尔江，因为我把他看成是比自己年长的指导者和善于出主意的人。

沙维尔江很亲切地接待了我。他问我为什么上前线之前不找他商量商量。我说，当时也曾有过找他的想法，但我怕他也象其他大人一样阻拦我去。

接着，他在谈话中向我详细地讲述了列宁对当前战争的评价和布尔什维克在这场战争中的策略。不久，在秋天的时候，他向我介绍了1915年10月在巴库由邵武勉主持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高加索党组织会议的决议。这些决议是邵武勉根据列宁对帝国主义战争和我们对这一战争的态度评价写成的。这些决议中还指出了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对当时组织起来的民族义勇队的否定态度。

沙维尔江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一份在日内瓦出版的、用很薄的卷烟纸印刷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这份报纸上刊登了列宁的文章《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不是一篇简单的文章，这是布尔什维克中央关于战争问题的政治纲领。

我向沙维尔江要了这份报纸，还有党纲和党章。他把这些都给了我。此外，他还主动赠送给我一本列宁的小册子《怎么办?》。

我立即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珍贵的文件。读政治书籍，还从来没有使我产生过这样强烈的印象。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列宁的著作中，许多使我当时伤脑筋的问题都得到了答案。特别吸引我的是《怎么办？》这本书，它确定了我的政治观点。

列宁论据的无可辩驳的逻辑性，他关于战争和战争的阶级背景、以及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立场等问题的尖锐而明确的提法，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很亲切、很理解，我从内心非常赞成，也受到直接鼓舞。

我懂得了，对于一切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口号，是：为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而斗争。

学习了列宁的这些文章以后，我又到沙维尔江那儿去同他交流读后的感想。正象达努什所说，他为我的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这使我更加欢欣鼓舞，于是我决定向他诉说自己的宿愿。

“你知道吗，达努什，我决心要入党……，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我已具备了入党条件。”

接着我抑制住内心的局促不安，问他能不能帮助我实现这一真诚而强烈的、考虑已久的愿望。

达努什笑了笑告诉我，用不着着急，应该为这决定性的一步作更充分的准备，应该读一些书，好在我已养成了阅读严肃的政治书籍的习惯。

“此外，我介绍你认识几个党内的同志，这样经过五六个月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

他建议我在这段时间一定要读一些列宁的著作，

特别是《进一步，退两步》一书和《论民族自决权》一文。后者是大约一年前连续三期刊登在布尔什维克主办的彼得堡《启蒙》杂志上的一篇著作。此外，他还劝我看看邵武勉和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小册子，以及普列汉诺夫的《我们的意见分歧》一书。

我向他表示感谢，告诉他我很快就要到农村去，打算在那儿开始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

我告诉沙维尔江：“我想这不妨碍我认真学习你推荐的那些书。以后我还有三个多月时间。我打算从9月1日返回中学补习一切拉下的功课。”

达努什赞成我的计划。我从他那儿拿了书和他告别，约好秋天再见。

这以后我还参加过一、两次我们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学习（我不在梯弗里斯时，小组也没有停止活动），不久我就回农村去了。

“我的大学”

入党；党最初给我的任务；中学毕业；回忆老同学；在教会大学里；我们的老师；关于农业问题的争论。

母亲对我的归来感到无比高兴。父亲也很满意，但他不喜欢过于激动地表露自己的感情。母亲曾十分担心我死在战场上。现在我活着回来了，而且没有受伤，她很

高兴，决定按照古老的风俗大事庆祝一番。我百般反对，认为没有必要庆祝，但母亲坚持非庆祝不可，谁也无法改变她的决定。庆祝的方法是这样的：买了一头羊，在最近的一个星期日在修道院的院子里，把羊宰了，切成块，把生肉分给来修道院聚会的乡亲们。这完全是按老风俗作的。

在那年夏天，我的收获相当大。当然，首先是读完了沙维尔江在我回村前给我的那些书，并且作了摘要。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读完这本书后我弄清了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分歧产生的根源和实质。

记得，我那时没费多大劲就学懂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著作，对此我很高兴。我所读过的书籍对正确地形成我的世界观、对于明确地理解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民族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途径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切无论是后来在党的日常实际工作中，还是在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系列专题演说中，都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但是，当我着手研究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时，就发生了真正的困难。

记得我读完《资本论》第一章，有许多地方简直不懂。但并没因此而泄气。于是我读第二遍。这一次，有些在读第一遍时不懂的东西，开始变得清楚了些。

我决定试着笔述我读过的东西的大意。于是重新再

读,并作笔记。

但是真奇怪!我本想用自己的话把读过的东西作简短的摘要,而实际上却变成了冗长的笔记,并且很多是马克思的原话,不会用自己的话和简略的语句来作摘要……

但我决定仍然继续作这种“摘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对马克思的著作的理解感到越来越容易了。我逐渐习惯了他的风格和写作手法,往下读就完全顺利了。不管怎样,离家以前我已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我很满意已经取得的成果。

8月底我回到了梯弗里斯,自然,第一件事就是决定去看望沙维尔江。

我给他讲了自己学习的成果,告诉他从读过的书中懂得了些什么,怎样理解的。还谈了今后在中学里活动的计划和如何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

分别时,沙维尔江给了我一份最近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并把自己藏书室里所没有的书写了一份相当长的书目,让我带着它到本市普希金图书馆去找在那儿工作的女共产党员贾瓦伊拉·捷尔-彼得罗相(著名的卡莫的姐姐)。据沙维尔江说,她会按书目给我找到他所推荐的全部书籍。

以后我还不止一次地去过。捷尔-彼得罗相在提供马克思主义著作方面成了我的第二个“恩人”。

我觉得自己更加勇敢和自信了,到沙维尔江那儿去

得更多了。他介绍我认识了共产党员阿斯卡纳兹·姆拉维扬和谢尔戈·哈诺扬。

我还认识了一些党员积极分子：工人卡霍扬（顺便说一下，他是我邻村的人）和加拉加什等人。

卡霍扬是阿赫帕特-阿拉维尔德区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这个夏天以及后来每逢我回到村里，我都在阿拉维尔德炼铜厂的工人集会上遇到他。卡霍扬的年岁比我大很多，有着丰富的党的实际工作经验。他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使我和许多工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所有这些会见使我熟悉了当时许多政治事件和党的组织生活。

有一次我向沙维尔江提起了他答应帮助我入党的事。

“好吧！”他回答。“我认为现在你入党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了。我们的积极分子很了解你。可以考虑接受你。”果然，1915年11月我被吸收入党了。

党立即给了我任务：在青年学生中作宣传工作，并培养他们中的最优秀分子入党。除此之外还告诉我，在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小组里不仅要读书，而且还要讨论目前政治形势问题，力求使小组成员学会把学习革命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有关战争的迫切问题，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任务和民族问题，成了我们座谈会的主要问题。

学得最好的同学甚至开始写起论文来。记得，阿拉姆·沙赫格亚利江准备了题为《妇女问题和社会民主党》的论文。我的论文题目是：《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党》。

1915年冬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论文，甚至在小组里进行了讨论。

这些文章的原文都没有保存下来，但回忆起它们的内容时，应该说，都是些不成熟的作品。对所讨论的问题我们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新见解。说实在的，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这些东西不如说是将那些就讨论的问题读过的东西加以汇总而编成的。

但就是这对我们来说，也是巨大的成绩，无疑是得到了益处的。

1915—1916新学年开始前，我回到了中学，并请求校方准许我进入上前线时离开的那个六年级，同时保证在上半年学完六年级的课程，各门课都要考试及格，下半年升入七年级，即最后一个年级，同大家一起毕业。实际上也就是一年学完两个年级的课程。

我的学习负担很重，因而无暇他顾。无论假期还是节日我都在学习，而且要抽时间读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们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继续活动着。应当说明，从我中学毕业直到革命开始，小组一直发挥着作用。领导小组活动的先是安德烈阿相和阿利哈尼扬，后来是沃斯卡尼扬。

1915年12月我顺利地读完了六年级，并开始上七年级。

我的学习变得轻松了，因此能抽更多时间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越来越吸引我，有时我整天整天地读，真是废寝忘食。

那时我住在我同班同学和好友格沃尔格·阿利哈尼扬的单人房间里。他的父亲比较富裕。当我秋天从农村回来时，格沃尔格住在他家二层楼的单人房间里。这所不太大的房子座落在亚美尼亚教堂的庭院里。他要我住在他的房间里，而自己却搬到父母那里去住。尽管我劝他在房间里再放一张床，我们俩人住在一起，但他拒绝说：“你很用功，我在这里会打搅你的。”

离毕业考试还很远，我整整一个多星期没到学校去，在宿舍里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谁也没有打扰我。只是阿利哈尼扬偶尔来一趟，告诉我一些学校发生的事情。

有一次晌午我拿着已读完的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市立普希金图书馆去还书。

我不慌不忙地在街上走着，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我完全出乎意外地碰上了我们的校长胡农茨。这人高高的个子，身材魁梧，胖胖的，举止端庄而傲慢。因为他有钱，在城里颇有势力。我们学生都不喜欢他，同样他也不愿意接近我们。

我正在想什么事，没立刻发现他。

突然他出其不意地拦住我，相当傲慢地问道：

“上课时间你在街上干什么？”

不知道我哪来的勇气，我用相当傲慢的调子回答他说，我没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尤其是在街上。我不客气地脱口而出，继续往前走。他注意到我手里拿着书。

就在那天学校放学后，阿利哈尼扬和一个与我要好的同学来找我。他们说，在学校里正在酝酿着一场与我有关的争吵。他们从和我们所有学生都很亲近的学监西马克那儿得知，校长碰见我以后，非常恼火地回到学校，并立即到教员休息室向在场的教师讲述了我的行为，扬言必须把我开除出校。

我已经说过，我已有一个多星期没到校了。当然这些时间我不仅是用于读书。和平常一样，我每周要给跟不上班的学生补两次课。这是我的收入，因为很难指望父亲的供给，而哥哥又在前线。

阿利哈尼扬和与他同来的同学劝我第二天就去上课。

“你是知道我们校长的脾气的！”他们竭力想说服我。“如果你明天还不到学校去，事情就难办了。”

我只得同意。第二天我来到教室。老师们什么也没说我。他们抓不着我什么“小辫子”，而且他们知道，即使我在这些天功课落后了些，也会很快赶上的。

最后一堂课快结束时，校长走进教室。他气呼呼地向全班讲述了我街上如何不愿同他讲话，不回答他的问题。他说，我身体很健康，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十天

不来上课，不知在干什么。此外，他看了教室日志，发现以前我还有数次无故旷课。

“我作为一个校长，不能再容忍学校有这种不成体统的事，现在要谈的是米高扬能否继续留在学校的问题。”

大家都注意听他讲。我虽然很气愤，但仍克制着自己，表面很平静。和往常一样，我坐在最后一个位子上。我这样做完全是故意的，因为坐在那里，上课时读别的书比较方便，老师不会注意。

校长讲完后，教室里鸦雀无声。

我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大概说了下面这些话：

“校长先生！显然，您很难理解我和我的行为——因为我和您是不同阶级的人。您很难想象，我们怎样和靠什么生活。您是很容易说话的。您刚才说了那么多欺侮人的、不公正的话，甚至威胁要开除我。确实，您的权力是很大的，这一切您都可以办得到，但首先请听我说完。”

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想出来的，我当即决定趁机进行公开的革命宣传。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这时不仅对校长而且是向全班说，“您的儿子坐着马车来上学，尽管他学习不好，游手好闲，总是留级，您不得不花一大笔钱给他雇家庭教师补习。大概，您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您是否给您儿子讲过，究竟说过些什么，说实在的，我们对此并不感兴趣。

我这就回答您在街上给我提出的问题，也顺便回答

您今天侮辱我的话。

您知道吗，我的哥哥现在在前线，父亲年纪已经不轻了；他要养活全家，向他要钱，对我来说是有愧于良心的。

我靠作家庭教师挣钱生活，这仅仅够我吃饭。我住的房间是一个要好的同学免费让给我的。然而，我半年内顺利学完了一年半的课程，并且成绩很好，关于我的品行也没有任何坏的评语。

您想知道我没来上课时干些什么吗？我这样回答您：给我的学生讲课，读我感兴趣的有益的书。我明白，我做这一切并不妨碍我学习和参加考试。

尽管离毕业只剩三个月了，您还是用开除学籍来威胁我。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权力在您手里。您可以问老师，所有科目我都能考及格。当然，如果同意让我留在学校的话，我将按时到校上课。”

我的话充满青年人的火气，但语调十分平静和坚定。不管愿不愿听，校长只好听我讲完。

我觉得，我的话给他留下了某种印象，尽管他竭力不表露出来。但他也不和我争辩，只是说问题等以后再作最后决定，就走出了教室。

同学们很兴奋，围住了我，对我深表同情。

“好样的，说得真好，就应该这样！”我的心情轻松了一点。

第二天早上我按时上课去了。

过了两、三天，我们不耐烦地等待教务会议的决定，

但一直没等到。又过了几天，课间休息时，我们的同情者——学监西马克悄悄地把我叫到一边说：

“已经讨论了你的问题，跟校长进行了长久而激烈的争论，才从讨论程序中取消了这个问题。”他补充说：“以后你将准时到校上课的声明，起了很大作用。”

我很感激西马克通知了我这个喜讯。我想顺便说一下，西马克那时已是我们党的党员，他对我们是有影响的。后来他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

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我的毕业考试十分顺利。只有倒霉的唱歌和神学我得的还是固定的三分，虽然其他三门宗教课在我的毕业证书里都是四分。普通科目我都得了五分，只有俄语得了四分，这倒是公平合理的，这是我的口语给造成的。虽然俄罗斯文学和书面作业我都得了很出色的分数，但那时我几乎没用俄语进行过口语练习……

* * *

回溯在中学上学的那些岁月，令人惊奇的是：很多的中学同学，特别是我们年级的学生，后来都成了知名的苏维埃的和党的活动家！当然，这是有其原因的。很清楚，这并不是中学本身有什么特殊的功绩，而是由于一定的客观环境所造成的。

第一，家庭贫穷或者家庭不很富裕的孩子们一般都到教会中学去上学。而有钱人家则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收

取学费的文科中学、实科学校^①或者商科学校去念书。因此，在教会中学里便形成了在物质条件差不多的环境，——一种最易接受革命思想的民主气氛。

第二，我们上学的年代，正处在两次俄国革命之间革命势力增长的时期。革命不断高涨，把所有的迫切向往革命的以及与革命休戚相关的人都吸引了过来。自从1912年下半年我们在中学组织起马克思主义小组以来，这个小组就不断地吸收新的有能力的和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他们在1915—1918年都相继加入了共产党，并且积极地从事党的活动。

此外，中学里相当高的教学水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大部分老师都在德国、瑞士、法国受过高等教育。他们中许多人持有自由民主观点。

还应当指出，虽然我们的学校在俄语中叫做教会中学，但实际上名不符实。学校的行政人员中没有一个信教的，这并不是偶然的。教师中间只有一个教神学的神甫。在我们的教学大纲中除了一门神学外，还有四门一般涉及教会史和神学的宗教课，但给我们授课的都是普通教师，而且这些课程一周不超过两小时。别的时间全用于学普通科目，即数学（包括代数、几何）、地理、文学、物理、化学、植物学、动物学、心理学和生理学。与文科中学比较，我们只学一种外国语——选学法语或德语（文

^① 实科学校——一般不教授拉丁语、希腊语，主要教授自然科学、现代语言及绘画。——译者

科中学里必须学希腊、拉丁、德、法四种语言)。确实,我们除了学现代亚美尼亚文以外,还学古亚美尼亚文。另外,我们学校还增设了亚美尼亚史地和教育学等课程。开设教育学的目的,实际上是要在我们中间为亚美尼亚学校培养教师。

这一切都是可以得到解释的。因为在沙皇制度下的俄国,禁止开设用亚美尼亚文教课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只有一些教区小学、教会中学和教会大学例外。因此为了不触犯沙俄的法令,许多学校表面上叫做教会学校,而实质上是十一年中等教育学制的亚美尼亚完全中学。诚然,凭着我们学校这样的毕业证书是无权入俄罗斯高等学校的,但凭这样的毕业证书在欧洲上高等学校则无任何障碍。那些物质条件够不上到国外上学的学生,通常就留在亚美尼亚当小学教师。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中学是在1824年由亚美尼亚大主教涅尔谢相开办的,并以他的名字命名。在亚美尼亚文中,我们中学叫梯弗里斯涅尔谢相亚美尼亚教会学校,而不是教会中学。我从未听说过当年我们学校某个毕业生曾去从事宗教职业。

我想,举一些记忆最深的梯弗里斯中学毕业的同学,也许是件有意思的事:

格沃尔格·阿利哈尼扬——曾在梯弗里斯、巴库、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列宁格勒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后任共

产国际一个部的主任。

埃卡兹·科斯塔尼扬——党的优秀组织工作者。多年担任亚美尼亚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后转任工会红色国际书记。

瓦甘·巴利扬——党的重要负责人，苏联交通部政治部副主任。

纳波列昂·安德列阿相——曾在高加索积极从事党的工作，被选为莫斯科某区党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委员。以后担任苏联食品工业副人民委员。两次党代表大会有表决权的代表。

苏连·阿科普扬——曾任维亚茨基州（现名基洛夫州）委第一书记，后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监察员。

卡罗·阿拉卞——国内战争结束后他受过高等建筑学教育，后来成为苏联建筑部门卓越的领导人之一。他长期担任苏联建筑协会的领导工作和苏联建筑科学院的副院长。莫斯科有一个街道就用他的名字命名。

沙瓦尔什·阿米尔哈尼扬——曾在创立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中起了重大作用，以后在莫斯科，是苏联交通部的领导干部之一。

阿拉姆·沙赫格亚利江——先在亚美尼亚，后在莫斯科从事党的重要工作。

阿尔塔克·斯塔姆鲍利茨扬——曾在南高加索积极从事党的工作，后进联共（布）中央附属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曾任鄂木斯克铁路政治部主任，在联共（布）中央组

织部工作过。以后任利西昌斯克市委书记。

格沃尔格·格旺江——党员积极分子，曾受过高等医学教育，成为苏联卫生部门出色的组织者。长期担任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人民委员。

格沃尔格·阿鲍夫——诗人，科学工作者兼文艺理论家，亚美尼亚古代文献研究所所长。

瓦甘·叶列缅——先在亚美尼亚，后在南高加索联邦^①任财政人民委员。

加列金·加尔达希扬——是南高加索共青团的组织者之一。国内战争结束后受过高等医学教育，成了一个有才干的外科医生。他和奥奇金一起当过苏联著名外科医生罗扎诺夫的主要助手。后来他是苏维埃亚美尼亚卫生人民委员。

奥瓦涅斯·波戈相——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亚美尼亚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立埃里温大学校长。

达尼埃尔·兹努尼——长期担任亚美尼亚共和国电

① 南高加索联邦——是1922年3月12日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会议上成立的。1922年12月13日在南高加索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改组为南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ЗСФСР）。1922年12月30日加入苏联。根据1936年苏联宪法，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加盟共和国分别加入苏联。——译者

影事业的领导人。

苏连·阿维季相——著名的医生。

捷列马克·阿鲁丘尼扬——受过高等教育，后来成为教授。

阿鲁丘恩·格里戈梁——曾领导过区党组织的工作。在和达什纳克党^①的斗争中表现得很积极，在斗争中英勇牺牲。

谢尔盖·帕尔萨达尼扬——老共产党员，经济工作者，国内最大联合养花场的领导人。

季格兰·加尔斯强——曾担任莫斯科一家杂志的编辑。

阿尔焦姆·巴勃卢缅(叶图姆)——老共产党员，党的机关报和刊物的负责人。

米哈伊尔·萨尔基相——阿布哈兹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主要的 X 光射线学家，现已退休。

沙姆尔哈尼扬——亚美尼亚著名的戏剧家。

德拉斯塔马特·捷尔—西莫尼扬——后来为亚美尼亚反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五月起义的领导者之一，后来成为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出色活动家。

^① 达什纳克党——是亚美尼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反革命政党，出现在 19 世纪 90 年代。该党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与孟什维克及阿塞拜疆木沙瓦特派结成联盟反对苏维埃政权。达什纳克党人在 1918—1920 年协约国武装干涉时期曾在亚美尼亚掌握过政权，在被驱逐后，成为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译者

塔捷沃斯·曼达梁——上海起义的参加者，工会红色国际的领导人之一。

格沃尔格·佩里哈尼扬——亚美尼亚有名的动力工程师。

古尔根·沃斯卡尼扬——党和苏维埃的著名工作者。

谢德拉克·马尔卡梁——原保安机关中心部门的领导者。

叶尔万德·科恰尔和米卡耶尔·马兹马尼扬——党员积极分子，在雕刻和建筑方面成绩卓著。

阿尔塔瓦兹德·叶基阿扎里扬——老共产党员，曾任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现在从事科学活动；科学博士。

谢缅·萨尔基索夫——医学院士，脑科研究所所长。

奥瓦涅斯·班纳扬——在很多地区担任党的负责干部，一段时间曾任新俄罗斯克市委第一书记。

我中学的同学，无论是同年级的，还是高年级的，或者是低年级的，远远不止以上这些。他们很早就走上了为党和苏联人民的伟大事业而忘我工作的道路。应当指出，在他们之中还有卓越的苏军统帅、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盖伊（勃日什克扬）。

我不能不再举一件引人注目的事实。我保存了一张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我的住宅里照的照片。这是我和同志们的合影，其中六个同志和我一起学过，并且是马克

思主义小组的成员。他们是：来自列宁格勒的阿利哈尼扬(阿里汉诺夫)、莫斯科的阿科普扬、亚美尼亚的阿米尔哈尼扬、阿塞拜疆的阿尔塔克(斯塔姆鲍利茨扬)、顿河州的巴利扬。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就这样，我们亚美尼亚涅尔谢相教会中学出了七个参加全苏联党代表大会的有表决权的代表！

我的许多同年级同学都已经去世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中的阿利哈尼扬、斯塔姆鲍利茨扬、科斯塔尼扬、巴利扬、加尔达希扬、阿科普扬、叶列缅、马尔卡梁后来成为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牺牲品，不过死后全都恢复了名誉，他们的无可指责的共产党员的声誉完全得到了恢复……

* * *

毕业考试还没有完全结束，我跟其他同学一样，对毕业后干什么考虑得很多。

为了成为一个有学识的马克思主义者，并献身于革命工作，那时我决心继续进修政治，并把它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

我必须再用两、三年的时间完全致力于政治学习。我认为，只有感到自己已是一个具备一定理论水平的马克思主义者时，才能更坚定和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我内心充满着这一愿望。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决心进亚美尼亚教会大学。它设在古城厄奇米阿津，是亚美尼亚唯一的一所高等学

校，教会中学的应届毕业生不通过考试就可以直接入学。这所学校不收学费，而且学生全部免费并可寄宿。考虑到我的经济状况不大好，后一个条件对我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我决定进教会大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对我是一个理想的解决办法。我毕业证书上的优良成绩，是录取我进大学的有力保证。

教会中学的大部分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同学们也都作出了同样的决定。

我还保留着 1916 年 7 月 16 日写的入学申请书。译成俄文是这样的：

厄奇米阿津亚美尼亚教会大学
最可敬的校董会格沃尔克扬：

涅尔谢相中学毕业生

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

申 请 书

我于梯弗里斯涅尔谢相亚美尼亚教会中学毕业后，渴望继续深造，请求最可敬的校董会领导准许我进一年级就学。

我的学业证书的抄件随申请书一并寄上，出生证明将随身携带，如果需要可参看我的学业证书的抄件，上面注有我的出生日期。

阿纳斯塔斯·米高扬

1916 年 9 月 18 日我收到了通知书，说我已被录取

为教会大学一年级学生。过了两天我向梯弗里斯军事长官呈交了在大学毕业前延期应征入伍的申请书。

我的请求得到了同意。

大学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条件是非常有利的。沙维尔江给了我相当多的书籍。我大学的朋友也读这些书籍。我们是三餐制。住的是很明亮的房间，虽然在我们的房间里约有二十张床位，但到处都很干净整齐。

大学里有严格的作息制度：早晨六点起床，七点吃早饭，八点开始上课。晚上九点睡觉。

除了大学三个年级外，教会中学也和我们在同一个楼房里。因此，用现代的话说，这是一所中等和高等教育真正的联合学校。

大学里除了校长和希腊语教师外，其他所有的人都是普通人员，不是神职人员。我们主要学习亚美尼亚的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亚美尼亚的历史地理；亚美尼亚文学和语言——从远古学起。

实质上，大学培养的是亚美尼亚学专家，而不是教士。

我很快地就熟悉了新的环境，过了几天我就根据教学基本大纲和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需要订出了自己的学习计划。

我和同班同学阿拉姆·沙赫格亚利江弄到了一盏煤油灯，我们通常夜里三点钟起床（当大家还在睡觉的时候），然后到我们年级的教室学习，在那里一直学到早上

七点吃早饭的时候。我那时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卷是夏天我还在农村时就读完了)。应该说明,学了《资本论》第一卷后,第二、三卷我领会起来就容易多了。看完第三卷之后,接着我又读了马克思的两部尚未完成的笔记,众所周知,这两部笔记收在《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里。

阿拉姆那时刚学《资本论》第一卷。正象我当初那样,他很吃力地攻读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我尽一切力量帮助他。

我们每天学三、四个小时,一般学到早饭前。当时我们都还年青,这点负担并不感到很重。虽然我记得很清楚,头几堂课我们还是觉得有些疲倦。

我和阿拉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教室的角落头。旁边有一个书架。在上面我们放有十几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和其他作者的书籍。

我还记得,在全年级上大课时,我悄悄地取出两本考茨基的《土地问题》(德文版和俄文版),全神贯注地读着,真是“一箭双雕”:既理解了书的内容实质,又掌握了德文。

问题在于:大学里要学两门“死的”语言:拉丁文和古希腊文。我几乎不学它们,而决心较好地掌握一门德语,以便能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这些学习我进行得相当顺利。

我上大课时学德语,老师们没有发现,或者装作没有

发现。他们一般很少到我们最后一排来。不管怎样，我是没有受过罚的。

到厄奇米阿津不久，我们就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所有来自梯弗里斯的同学都参加了这个小组。另外还有两个舒沙教会中学的学生也参加了：其中一个托夫马相，立即参加了我们的活动，而萨尔基斯·达尼梁是过了几个月以后参加的。

我们小组定期在一起集会。虽然小组参加者的理论水平参差不齐，但学习却搞得很有意思。我们个人自学马克思主义著作，当全体聚集在一起时，主要是讨论当前一般政治问题，或讨论每个人在阅读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按期收到在梯弗里斯用亚美尼亚文出版的《派卡尔》周报，热烈讨论报上发表的某些文章。这使我很感兴趣。

1916年12月我写了第一篇文章寄给《派卡尔》编辑部，请求发表。这是一篇尖锐的论战性文章，是针对达什纳克党的一个知名人物在刊物上发表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言论而写的。发表在《派卡尔》报上的这篇文章，编辑部未作任何修改，但书刊检查机关却用剪刀认真地对它进行了删剪。结果在文章发表时，有三处空白代替了剪去的段落。书刊检查机关没有改动文章的批判部分，而是剪去了阐明我们立场的几个地方。

当我们小组的成员相互都很了解之后，开始考虑我

们应该怎样向和我们在一个楼里居住、学习，常常见面的另一些大学生以及中学高年级生扩大自己的影响的问题。

必须说明，从梯弗里斯来的那部分同学在政治上要比当地青年成熟得多。当我们在一起进行一般辩论时，发现当地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一无所知，只有三年级的学生马努克扬例外。他读过一些亚当·斯密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这方面的书。但是他从来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基本上是从众所周知的歪曲马克思学说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立场来评判马克思主义的。

我那时还不熟悉亚当·斯密的著作，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书倒已读过。所以当我们开始辩论时，不得不去翻阅亚当·斯密的书。

我记得我们围绕着劳动价值学说发生的激烈争论。马努克扬在这个问题上起劲地坚持奥地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柏姆-巴维克的观点，而柏姆-巴维克反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自己的“边际效用论”。对于水平低的人，这种理论较之马克思学说更容易接受，因为要理解马克思学说需要有真正的理论修养。因此，每当我为捍卫马克思理论而发言时，常常感到，远未说服所有在场的人，使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尽管根据许多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在辩论中一直占上风。

为了摆脱现状，我求助于我们年级的教授阿绍特·约涅相。我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水平的老马克思主义者，在

德国留过学，是科学博士。

我问约涅相，他有没有关于严厉批判柏姆-巴维克理论的书，并解释道，我在辩论中常缺乏足够的论据驳倒他的理论。

过了一天，他给了我一本奥地利杂志《马克思研究》，上面刊登一篇有关这个专题的文章。我借助字典读完了它，这篇文章在以后的辩论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应该顺便提一下，阿绍特·约涅相在苏维埃政权胜利后成了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现在是亚美尼亚科学院院士，在亚美尼亚社会思想史这个领域中从事着巨大的科学研究工作。

当时他给了我们大家、特别是我以极大的帮助。他介绍我们认识了格沃尔格·阿塔尔别克扬。阿塔尔别克扬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那时住在厄奇米亚津，也就是那个后来在1918—1919年在北高加索同反革命作斗争中出名的阿塔尔别克扬。以后他又在南高加索联邦担任领导工作，1925年在一次飞机失事中和米亚斯尼克扬、莫基列夫斯基同时遇难。

约涅相还介绍我们与有学识的、有才干的文学家布尔什维克马金茨扬相识，他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在亚美尼亚起过重大作用。

同这些有经验和有学识的老马克思主义者见面和认识，在很多方面都帮助我们这些那时还很年轻的共产党员的成长。

我大学里的同学波戈相精通格鲁吉亚语。我认为格鲁吉亚语在未来的革命工作中很有用，因此请求他教我读、写、说格鲁吉亚语。在几个月中我是那么努力地跟他学，以致能不太费力地读同学订阅的格鲁吉亚文报纸。遗憾的是，由于半个世纪没有用格鲁吉亚语进行口语实践，所以那些年掌握的一点格鲁吉亚语的知识全都忘光了。

后来我又和舒沙来的托夫马相商量好，在他进修阿塞拜疆语的同时也教我学这种语言。他欣然答应帮助我，订购了有关书籍，我们努力学起阿塞拜疆语，很快我就学得很不错。后来这对我在党的实际工作中很有用处。

* * *

我想谈一谈那时我们大学生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也许是有益处的。

我们的校长加列金神父，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的人，个子有些矮，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和漂亮的胡子。他十分沉着，稳健，从不提高嗓门说话，无论对大学生或中学生都从不粗暴行事。

我们大学有个制度：早晨上课前，各年级学生都要在走廊的两侧排成两行，通常老师站在走廊的尽头。大家一起唱《我们的父》这首歌。然后才开始上课。

起初，刚入大学时，我有两个多星期没有参加这种集体唱歌，而坐在教室里看书。有一次，校长突然走进教室问我：

“你为什么坐在这里，而不和大家一起去祈祷呢？”

我说，我是个无神论者，所以不能去祈祷。

也许，他已经听说过我是个无神论者，但他是个聪明人，没有再询问我什么，只是镇定而严肃地对我说：

“那么至少你也不能破坏大学里规定的制度，谁也不强迫你去唱祈祷歌，但你必须跟大家一块站队！”

我挺喜欢校长的这种直爽，就毫不迟疑地同意以后去站队。我这时暗自想：“假若校长是个目光短浅的人，我岂不就得永远离开学校，从而失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条件了吗！”

过了不久，校长把我叫去对我说：

“要是在学校组织几次同乡文娱晚会倒是不错的。你能不能同其他一些梯弗里斯来的同学一道着手办这件事呢？这样，从舒沙，从埃里温来的学生以及当地的厄奇米阿津来的学生也将会同你们一道演出。这种晚会将使我们大学的生活增添某种活跃的气氛。”

我表示同意，并说明这个问题还得同梯弗里斯其他同学商量。

这件事和同学们商量以后，我们得出了结论，我们认为应该同意校长的建议，因为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机会。的确，这个活动可能是很有意思的，更何况，我们还可以充分利用这样的文娱晚会，在学生中进行宣传工作。

于是我便到校长那里对他说，我的同学都同意参加

晚会，并要求给十天时间作准备。

校长同意了 this 期限，指定了演出日期。还说将要邀请全体大学生、中学高年级学生、老师和客人——一些修道士来参加这一晚会。幸好，他并没有要求我把晚会节目单和参加晚会人员名单呈请他批准。

我们积极筹备演出，决定以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精神举行这次晚会。

我那时有几期 1914 年彼得格勒出版的《启蒙》杂志，我们从中选了一首诗，准备用俄语朗诵。这首诗的篇名现已忘记了，但它的内容却非常富有战斗性革命性的。晚会上让我朗诵舒沙尼克·库尔基尼扬的一首尖锐的反教权主义的诗。奥瓦涅斯·波戈相有一付好嗓子，他打算唱一首格鲁吉亚民歌《加普林季斯·沙沃》。我们把舒沙市来的托夫马相也吸收进了我们的“艺术团”。他准备在晚会上唱一支阿塞拜疆歌曲。我们公认的幽默家阿尔塔克·斯塔姆鲍利茨扬将要朗诵一篇亚美尼亚作家、社会政治讽刺作品的大师阿科普·帕罗尼扬写的故事。

故事中嘲笑了一个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而实则是一个胆小鬼和叛徒的亚美尼亚人。这位“勇士”为了“不减少亚美尼亚民族的人口”而临阵脱逃……。此外，还准备了一些节目，我现在已记不得了。

演出的那一天，学校大礼堂里挤满了人。有十来个著名的宗教人士参加了晚会。

我们演出的所有节目使参加晚会的人都感到意外，晚会上响亮地听到四种语言的声音，这本身就象征着国际主义思想，这是这儿从来未有过的。

演出的内容和它的革命倾向性，在宗教大学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大家都专心地听着，惊叹不已。演出的质量，从我们当时的水平来说，就算相当不错了。

然而，我在晚会快结束时朗诵的舒沙尼克·库尔基尼扬写的《工人》这首诗时，使得教士们再也无法忍耐了。

诗中大约有这么几行(意译如下)：

我们在前进——
穿着褴褛的短上衣，
戴着破旧的军便帽，
瘦弱和饥饿，
使我们过早地衰老……
但我们蔑视敌人，
抑制不住胸中的怒火、复仇的决心……
我们坚信
美好的生活就要来临……
我们在前进……

不难理解，当时在教会大学里面，这样的词句简直就象炸弹爆炸一样。

修道士一个个地离开了礼堂。

晚会结束时，同学们谁也不想走。在走廊里激烈地争辩起来。有的批评我们，有的夸奖我们。整个大学走

廊里就象一窝受惊的蜜蜂一样轰鸣起来……

我们以为校长一定会为这个晚会痛斥我们一顿，然而就是这一次他也相当地克制自己。他对我们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从此他永远死心，再也不在大学里组织这样的晚会了。“文娱活动”就这样结束了。

校长想以古代文献和古亚美尼亚文学吸引我们的兴趣。有一次，他把我们请到修道院里，那里保存有一些古代的手稿。那里见到的一切使我们十分惊奇。我们没有想到我们这里还藏有这么多珍贵的古代手稿。这些手稿是以极其美妙的书法和很大的热情写在莎草纸、羊皮纸和皮革上的，上面还有很多有才能的艺术家们的插画。真是彩色缤纷、鲜艳夺目。此外还有用皮面装订的、装璜美丽的厚厚的书籍。

我们真诚地感谢校长给我们看这些东西，并作了详尽而有趣的解说。

所有这些珍品至今仍保存在马捷纳达兰——这个埃里温著名的古代手稿收藏馆里。

校长成功地使用了这个办法后又想出了新的一招。他说他想邀请学生们分成“同乡小组”到他家作客，并说“从梯弗里斯同乡开始”。

当然，我们都欣然同意了。

记得星期天吃过午饭后，我们到了校长家里。他准备了茶、各种小吃和本地酒招待我们。显然校长想同我们畅谈一番，以便把我们更多地吸引到古亚美尼亚文化

遗产这方面来。这次谈话的内容现在已记不得了，但校长讲得津津有味。开始，我们都非常感兴趣，注意地听他讲。

校长一面说，一面叫我们吃东西，喝酒、喝茶。我坐在他旁边。过了一会，有几个坐得离校长稍远一些的同学喝醉了，高兴起来，开始兴奋地又说又笑。

我继续注意听校长讲。一方面因为感兴趣，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主人应有起码的礼貌和尊敬。

校长当然看到了同学们的举动，但他未动声色。校长未注意时，我给同学们作了种种暗示，让他们尊重些，但他们还是又笑又闹，显然是酒对他们起了作用。

使我感到很难为情，因为这样就破坏了主人待客的常规。这样大约持续了一小时。校长看很多人都不听他的了，而是互相谈论些可笑的事情，他就只好转换话题。我们都很难为情地走了。校长显然十分不快。

校长再也没有邀请其他同乡小组到他家去了。

……记得在一个冬天，校长走来告诉我们说，星期天要举行祈祷仪式，由亚美尼亚大主教格奥尔格五世亲自主持。我们都必须参加这次祈祷。

当校长走出教室后，我们马克思主义小组的组员开始商量怎么办。在此以前，我们一次也没有去过教堂，和宗教界人士从无来往。而且我们还公开嘲笑过一些从舒沙来的学生，因为他们有强烈的卡拉巴赫人的乡土感情，常到从卡拉巴赫来的修道士房间里做客。

如果抵制祈祷，必然给学校开除学籍造成口实，产生种种不良后果。于是，我们决定参加这次的祈祷仪式，但我们不照惯例去吻大主教的手。

我们有礼貌地参加祈祷。祈祷快完时，轮到我们去吻坐在宝座上的大主教的手。照事先商量的那样，我们走近他，有礼貌地向他鞠了个躬，但连碰也没碰他伸出的手就走开了。

虽然在这以后，周围依然很寂静，但是在场的人们，尤其是修道士们脸上都显出了对我们的这种大胆举动十分惊奇、甚至气愤的神情。

祈祷仪式以后，学校里议论纷纷。有人叫喊要开除我们。而另外一些人比较清醒，他们责备我们，同时反对开除我们。他们说，要是一切都抖露出来，沙皇警察就会知道教会大学里有布尔什维克的基地，这将成为关闭学校的理由。他们建议对此不要大肆喧嚷。

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

也许在这里还应该讲一讲，过了许多年之后，在我的一生中第二次碰到亚美尼亚教会的大主教时，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下。

1958年，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前，我在埃里温会见了选民们。共和国的领导人安排了招待会，出席招待会的大约有二百人。

我发现在大厅的一角有一些宗教人士，便问这是些什么人。有人对我说，这是新任全亚美尼亚大主教沃兹

金一世和他的随员，说他是个有学识的聪明人，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很好，不论是在这里的还是在国外的亚美尼亚人都很尊敬他。

我斟了一杯酒，同共和国的领导人穿过整个大厅来到了他们这些人面前。

我走近大主教，向他和他的随员问好，打趣地微笑着对他们说，我觉得我在亚美尼亚教会面前是有某种罪过的，因为我辜负了它的希望和用在教育我上的努力。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我说道，“我这个亚美尼亚教会大学的学生成了‘废品’”。

周围的人全都笑起来了。大主教也愉快地微笑着说：

“您错了，我们不但不为此而伤心，而且甚至为我们大学培养出象您这样的人而感到自豪。这样的‘废品’对我们来说越多越好！”

我懂得，这是有教养的人说的一种客气话。

最后，我们举杯祝苏维埃亚美尼亚繁荣昌盛，并同大主教相互碰杯，一饮而尽。

* * *

我们学校的古希腊语教师是一个有学问的修道士；四十岁左右，瘦瘦的高个子。他很腼腆而孤僻，尽量避免与经常对他恶意开玩笑的学生接触。

我觉得他十分可怜，就对这些学生说，以后不要再嘲弄他了。要知道，他们并没有这样对待其他的对我们比

较严格、但性情又比较厉害的教师。

我终于说服了他们。不知是他们感到自愧，还是对此已经厌烦，对这个修道士的嘲弄终于停止了。

这个教师知道我根本不学古希腊语。但在他讲课时，我很安静，很严肃。在我面前总是摆着一本打开的书。大概因为这个缘故，他对我特别尊重。

……我记得，厄奇米阿津市的冬天是暖和的，晴朗的。一早我就到花园里，坐在长凳子上，当学校里正在上大课时，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这里没有任何人打扰，我可以聚精会神地读书。

有一次，当我也是这样坐在花园里时，这个修道士走到我面前问我，还记不记得在中学学过的代数。我说记得，而且记得很清楚。于是他解释说，问我这些是因为他自己给大主教的儿子（我们的大主教是神甫出身的，而神甫是有权结婚的）补习功课。他的代数已经忘记了一些，有一些困难。所以他问我能否帮他解答一些最难的代数习题。

我答应了。

自此以后他就带着代数习题到花园来过几次，我都帮助他解答了。为此他很感谢我。他知道我对任何人也没讲过我和他讲代数课的事——否则流言将会传遍全校。

……有一天,我正在花园里学习,我的好朋友阿尔塔克跑来,十分担忧地说,学校里来了一个叫纳瓦萨尔江的新教师。他很有学问,读了很多社会科学方面的书,而且是个擅长讲话的人。因此他给那些十分感兴趣地听他讲课的同学们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现在,”阿尔塔克说,“在政治辩论方面,我们将很难在同学中保持自己的地位。”

我对阿尔塔克说,别着急,我不认为这个教师的到来有什么可怕。但是我心里也多少有些慌张。

第二天,我去听这位新的预言家讲课。的确,他讲得很漂亮,表现出很自信、很内行的样子。总之,他给我留下了印象。大家都注意听他讲。

在讲课中,他赞扬叶卡捷琳娜二世是“俄国的启蒙者”,他引用了叶卡捷琳娜与伏尔泰的通信集,几乎称她是“俄国的伏尔泰”。

前不久,我读了希什金写的揭露叶卡捷琳娜生活和活动的一本小册子,叶卡捷琳娜的全部政策都服从于俄国贵族的反动利益。

这本小册子揭露了叶卡捷琳娜的充满着阴谋、蛊惑、狂暴的生活。小册子的作者特别讲述到:叶卡捷琳娜如何把许多拥有数千农奴的村庄分给自己的宠臣们。我清楚地记得,她同她的宠臣奥尔洛夫伯爵之间的一切事情。她把很多土地和农奴送给了奥尔洛夫伯爵。

我请求发言。教师停止了讲课,并允许我发表意见。

我坦率地说出了我从读过的书里知道的一切。

“她算是什么启蒙家？”我问，“难道因为她给伏尔泰写过几封信就有理由这样称呼她吗？”

我的发言给同学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纳瓦萨尔江被窘住了。显然，他对于驳斥我引证的事实没有准备。他仍然引用那个叶卡捷琳娜与伏尔泰的通讯来替叶卡捷琳娜辩护。但不管怎样，他的自信心已经动摇了，再也不能改变我的发言在同学中产生的印象。

两、三堂课后，我确信纳瓦萨尔江确实是一个有才干、能说会道的人。然而他的知识是肤浅的。按他发言的性质来说，他了解社会革命党的思想体系这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引用过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的《俄国社会思想史》一书，此人后来是社会革命党的思想家之一。

我也读过这本书，但是由于当时还读了普列汉诺夫揭露民粹派思想体系的杰出著作，所以明白了，我们的新教师并不是多么危险的对手。

在一次课上，纳瓦萨尔江想炫耀一下自己通晓马克思著作。他背诵了一句似乎是马克思的，而实质是明显反马克思主义的话。我立即反驳说：

“这不象是马克思的话！”

“这是马克思的！”他反驳说。

“那么你说说”，我立即追问，“你是在马克思的哪本书里读过的？”

“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连眼都不眨地回答说。

我很了解《资本论》的第一卷。于是大胆地对他说，第一卷里没有他引用的那句话。他仍是坚持自己的说法，以为我驳不倒他。

于是我从书架上取出《资本论》第一卷，请纳瓦萨尔江指出他引用的那句话写在哪里。

他吃惊地走过来，拿起书，开始翻阅。所有的同学都紧张地注视着这场“决斗”的结局。

当然，纳瓦萨尔江始终没有找到他需要的那句话，于是就翻到《资本论》的封面，看见上面写着：“伊·伊·斯杰潘诺夫—斯克沃尔卓夫译”，他把书还给我说，他从另一种译本读马克思的著作的，那句话是从《资本论》那个罕见的版本里引证来的。

当时我决定彻底击败他，就说：

“我知道您说的那个译本，是司徒卢威主编的。就在这儿呢。”

我从书架上把属于阿拉姆所有的《资本论》拿下来，递给纳瓦萨尔江。

他的锐气完全被挫败了。不过这次，他避开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很快定了定神，并问，我从哪儿弄来这个罕见的版本，能否借给他读一读。

我把书借给了他。

过了几天，在课堂上他把书还给了我，并表示感谢，但对我们争论的问题他只字未提。大家都清楚，他碰了一鼻子灰。因此，我也没有再追问引语的事，俗语说：不

打倒下的人嘛。

以后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

他的傲气被打掉了，从此以后，他收敛多了。后来才弄清楚，纳瓦萨尔江原来是达什纳克党的积极成员，自认为是社会革命党思想的拥护者。我还遇到过他一次，那已是二月革命以后的事了。关于这点稍后再讲……

有一次两个中学六年级的学生来向我们告古亚美尼亚文学教师格扬杰茨扬的状。他也教我们大学古亚美尼亚文学。

这两个中学生说，在课间休息时，他们班的同学们正在玩耍，唱歌，跳舞。这时，从窗户旁边走过一个胖子，挽着他妻子的手，他妻子也相当胖，这就是格扬杰茨扬夫妇。

正巧，同学们在用亚美尼亚语唱阿塞拜疆小歌剧《阿尔申·马尔—阿尔兰》中的一段歌词。其中大概有这样一句话：“到这儿来，我的亲爱的，到我这儿来……”

格扬杰茨扬认为这些歌词是攻击他的妻子，于是怒气冲冲地跑进教室，斥责同学们说：“你们都是坏蛋，你们的父亲也是坏蛋！”

我问同学们：

“你们说的准确吗？有没有弄错，有没有添油加醋？”

同学们说，他们全班都可以证明，说的不是别的，说的就是这些话。

于是我们对他们说：

“回去吧！我们不会饶恕他的！”

同学们走了，我们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件事。我们决定就在格扬杰茨扬给我们上课的第一天，每个人都向他大致这样说：“我不愿听把我们父亲称做坏蛋的教师讲课，请问您是怎样对待中学六年级学生的父亲的，我们的父亲同他们的父亲是一样的。”

决定我第一个说，说完就走出教室。还有五、六个同学也将跟着我这样做。我们认为，除此之外，不需要更多的人这样做。

我记得那天早晨，格扬杰茨扬到教室把两本厚厚的书放在讲台上就坐下了。

我请求发言。当我没有来得及把准备好的话讲完，他就抓起书，飞也似地跑出了教室。

我们坐着等待着事态的发展。学监走进来说，校长叫米高扬。

校长向我问了好，让我坐下，然后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破坏讲课，侮辱老师。我回答说：

“加列金神父！我没有对老师说一句侮辱或粗暴的话。我只是对他说，我不能听他讲课，我将离开教室。因为他无理地骂学生和他们的父亲是坏蛋，而他们同我们和我们所热爱和尊敬的自己的父亲一样，都是很老实的人，都是工人和农民。不是我们侮辱了他，而是他侮辱了我们的父母。我们不能容忍这样。您应该理解我们。”

校长想息事宁人，他劝我说，可能格扬杰茨扬当时正

在火头上等等。

对此我回答说，无论他处于什么情况，都丝毫不能原谅，并且不光是我一个，我们班大多数同学在这件事发生以后都不愿意上他的课。

“什么?! 你们想让我们解聘他吗?”校长问道，“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如果这不可能，”我回答他说，“那么那怕是让他向同学们道歉并收回他的话也行。”

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后来，格扬杰茨扬向中学生道了歉。我们也重新开始上他的课。

1916年末阿绍特·约涅相通知我们，最近将召开各党的秘密联席会议。会上将讨论土地问题和在埃里温省解决土地问题的前景。阿绍特建议我们整个小组参加这个会议，我们欣然同意了。

我记得，一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个昏暗的半地下室里。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三十人左右。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布尔什维克。

一个我不认识的人在报告中说当时呻吟在地主压榨下的亚美尼亚农民处于何等困苦的境地。那时，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农民居住的村庄里，绝大多数地主是阿塞拜疆人，这是历史上形成的。

报告人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来谈论土地问题

的解决途径。他建议亚美尼亚农民单独组织起来，以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他把这和前不久国家杜马发布的决议联系起来，杜马任命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埃里温省的农民状况。这个委员会的领导者是杜马成员、立宪民主党人阿杰莫夫，他是亚美尼亚人。报告人建议全力支持这个杜马委员会的工作，同时天真地幻想立宪民主党人领导的这个委员会愿意并且能够为农民解决土地问题。

显然，这一切都是乌托邦，远远脱离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的真正任务。当表决“赞成”还是“反对”时，多数人表示“赞成”。

我要求发言，强烈反对报告人的立场，指出他用错误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态度去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最重要问题。我讥笑他把解决这个问题的希望寄托在阿杰莫夫的杜马委员会身上了。

我说土地问题不仅对亚美尼亚农民，而且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农民都有意义……。须知那时他们也同样遭受地主的残酷压迫。

我建议不要在亚美尼亚范围内单独行动，而是联合南高加索的一切革命力量，为消灭地主的土地占有制而共同斗争，发动各民族的劳动农民起来参加这一斗争。

我认为解决土地问题的唯一正确态度是阶级的，而不是民族的，同时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农民的力量，而要与工业无产阶级结成紧密的联盟，依靠南高加索的一

切革命政党的共同努力。

有些从地方来的同志，主要是我们小组的同志支持我的意见。

当轮到报告人作结束语时，他不是就问题的本质严肃地发表反对意见，而是粗暴地攻击我，扬言我在自己的论据中运用的历史唯物主义倒不如说象……“饭馆里的唯物主义”。

立刻喧哗起来。当然，小组中的朋友们为了不使我受侮辱，非常强烈地对这样的辩论方式表示了抗议。

我记得，我们什么也没有谈成，这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各党的联席会议，就不光彩地结束了。

二月革命时期

在士兵中的工作；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第一次公开会议；巴库之行；同邵武勉和查帕里泽的相识；在巴库党委会工作；同孟什维克的分裂；在自己的家里。

帝国主义战争揭示了帝国主义的一切基本矛盾并加剧了这些矛盾。沙皇军队在许多战线上的失败，代替了从前保证的迅速取得的胜利。俄国军队在人员上损失惨重。沙皇制度对战争缺乏准备，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军队里武器弹药奇缺。这些都已影响到士兵的情绪，并通过士兵影响到全国人民。

严重的经济困难开始了。粮食不足，工人、农民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变得更加困难。日用必需品的价格骇人听闻地猛涨。已开始缺乏面包。国家面临着急剧的总崩溃。人民对战争的不满情绪到处沸腾了。与此同时，一小撮工厂主和投机商们却继续大发横财，他们靠军需供应赚取上百万的财富。战争以及战争造成的贫困使人民普遍疲惫不堪，这已越来越明显。在我国的工业中心开始了各种罢工和大规模的人民示威游行。沙皇政府到处使用步枪、机关枪进行镇压。在很多城市参加示威的群众都洒下了鲜血。

国内真正的革命形势已经成熟了。革命已经迫在眉睫。

但是，所有这些我们都是听别人说才知道的，因为沙皇的书刊检查机关一手遮天，不让广泛的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不让外省知道彼得堡工人多次罢工的事实，妇女也纷纷起来造反，工人和士兵同警察冲突，——这些在1917年2月实际上已经具有了国内战争的性质。

正因为如此，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通电，甚至使我们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之外。

我们真感到无限的高兴！

厄奇米阿津没有任何工业企业，因此也就没有工人阶级。在这里只驻扎了一个后备营，这个营主要是由超龄的士兵组成的，他们的家庭负担很重，一直盼望早日结

束战争。

我们到这个营去，并在这里召开了士兵会议。我给士兵们讲述了专制制度垮台的意义和革命的任务，号召他们起来结束战争。我说人民现在应该自己解决革命的一切问题，其中也包括战争与和平的问题。

士兵们一致支持我们，特别使他们感到鼓舞的是结束战争的要求。通过了一个简短的决议，并成立了全营士兵委员会。

士兵们得出这么一种印象，既然他们决议反对战争，就意味着战争应该立即结束。他们由于高兴，喝了个酩酊大醉。

应该指出，还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初期，沙皇政府就颁布了所谓禁酒法令，在全俄罗斯禁止出售伏特加酒和其它酒类。这项法令只有在高加索没有实行，因为特别是对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来说，饮酒从来就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沙皇没有敢同这些人民进行公开的冲突。因此酒在这里是自由买卖的。

在喝得醉醺醺的一伙士兵中不知是谁放火烧了市场上的小商店，他们开始抢劫。士兵们在街上大声唱歌。我还记得，我们尽力给他们讲道理说，不能干这种事，要他们往后不要再干类似的暴行和抢劫。我们给他们说明为什么应该同当地老百姓保持良好关系的道理，因为大多数老百姓同他们自己一样，也都是劳动人民。

士兵们都很明白这些道理，士兵委员会也保证整顿

纪律。我们相信以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在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士兵之后，我们小组的同志们意外地获悉，以我们的教师纳瓦萨尔江为首的厄奇米阿津的达什纳克党领导决定组织一部分大学生和当地的亚美尼亚青年在夜间趁士兵睡觉的时候，解除这个营的武装。

我们明白，这样的行动将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士兵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势必导致民族主义浪潮的重新爆发，并由此而产生种种不良后果。

我们决定破坏这个计划的实现，于是决定去找纳瓦萨尔江，向他提出最后通牒：如果达什纳克党领导人不放弃预谋的挑衅，那么我们就到这个营去将这一情况预先通知士兵委员会，并且在士兵的协助下逮捕这些达什纳克党的领导人。

我受同志们的委托去找纳瓦萨尔江。他就住在我们的宿舍楼和大学教学楼所在的那条大街上的一个不大的二层楼房子里。

“如果你们立即取消你们的计划，”我对他说道，“那么问题就可以认为已经解决了。如果你们拒绝这样做，甚至不让我离开这里，那么横竖一样，我的同志们最迟不过一小时就会去找士兵委员会，发动这一营人把你们的追随者全部逮捕起来。”

在房间里和纳瓦萨尔江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当时我是只身一人，而且手无寸铁。

听我说完以后，纳瓦萨尔江先是脸色苍白，接着大发雷霆，粗野地说我们根本没有民族自尊心；说我们允许士兵抢劫和火烧亚美尼亚市场，然后任其逍遥法外；说我们和俄罗斯士兵一起反对亚美尼亚人等等。

我回答说，他大错特错了。火烧市场事件是可以理解的自发现象。我们在这个营里整顿了纪律，而且我们引以自豪的是，我们使得士兵和当地老百姓之间已经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经过长时间的争吵之后，纳瓦萨尔江同意取消他们预定采取的措施。

第二天，我到士兵委员会去了。我只字未提预谋的挑衅事件，却又一次详细地给他们谈了谈为着在士兵中间加强革命纪律和同当地居民建立起良好关系应该做哪些事。

突然阿绍特·约涅相和我出乎意外地收到了征召入伍的通知书。我俩都感到很惊讶，因为按规定我们俩在大学学习，免服军役。因此，我们怀疑是当地达什纳克党的领导为了摆脱我们这些最危险的布尔什维克要求军队长官征召我们服兵役的。

为了揭破这一阴谋，我们到亚历山大波尔（今称列宁纳坎）去找军队长官。在那里，约涅相和我提出了抗议，反对把我们征召入伍，理由是即使在专制制度下我们都是免役的。那时执行的这一法律谁也没说废除了。

“为什么在革命后的现在，军事当局竟然违反这些法

律,对我们如此专横呢?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我们是布尔什维克党党员。现在,革命是给一切党派以自由的。”

我们声明说,这件事情决不能就此罢休。

显而易见,这一强硬的声明对军事长官起了作用。他同意撤销征召我们入伍的命令。事情的结局我们很满意,我们高兴地回到了厄奇米阿津。

* * *

大学正在准备春季考试。我决定离开此地再也不回到大学来了。但是我不打算和大学正式断绝关系,因为我不想丢掉免服兵役的权利。我对校长说:“我秋天将参加考试。因为我有事,不得不到梯弗里斯去。”不知是校长因为能暂时摆脱掉一个“捣乱分子”而感到满意,还是出于其他的考虑,他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急忙到梯弗里斯去,那里正在燃烧着革命的火焰。我在那里可以更积极地从事党的工作。除此之外,还有一件事也迫使我要尽快到那里去:1917年3月上旬在梯弗里斯将要举行南高加索马克思主义小组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是仿照1916年12月在库泰依斯召开的第一次这样会议的先例召开的)。

我途经埃里温来到梯弗里斯以后,立刻去找沙维尔江,以便从他那里得知党内生活的一切新情况。他告诉我,明天在祖巴洛夫人民宫大厅将要举行布尔什维克的第一次公开会议。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

有两个同志坐在人民宫的入口，登记所有到会的人，向他们收党费（我现在记得是每人收五十戈比）并给他们收据。

大约有二百五十人出席了这次会议。有三个人被选为会议主席团：阿廖沙·查帕里泽、米沙·奥库贾瓦、阿马亚克·纳扎列强。

阿廖沙·查帕里泽那时在梯弗里斯。他是从特拉别宗德前线回来路过这里。他是我党著名的活动家，主要在巴库工作。这一次他也是到巴库去，在这里停留是为了参加这次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的会议。

会议由米沙·奥库贾瓦主持。主要议题是关于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联合的问题。我记得为了论证联合的必要性，有人提出沙皇专制制度被推翻以后出现了新的形势这一事实：二月革命后，人民取得了广泛的民主自由和政治权利，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一系列策略上的分歧已被生活本身所消除。赞成联合的人断然宣称：“在已形成的条件下，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联合成一个政党，必将提高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据我记得，费多尔·卡兰塔泽强烈地反对联合。他认为：这种联合会使布尔什维克不可避免地失去自己在政治路线上的独立性，并且好象在组织上和孟什维克溶合为一个党了。但是赞成联合的人表示反对。他们说：联合以后，我们将保持布尔什维克的派别，并将出版自己的报纸。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后，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联合的决议。

但后来列宁从瑞士回来以后，我们明白，这个决议在原则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特别是在梯弗里斯的条件下，在联合起来的党组织中，党员人数的对比显然对布尔什维克是不利的。孟什维克的人数要多得多。这实际上极大地损害了党的事业，削弱了布尔什维克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这一点已为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所证实。

1917年夏天，布尔什维克终究不得不在组织上和孟什维克一刀两断。

到梯弗里斯以后不久，我们召开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青年学生马克思主义小组代表会议。每个学校有十至十五名代表，有几个学校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还有几位客人，他们都是积极分子或小组成员。会议是在市议会大楼一层召开的，会议进行了两天。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会上布尔什维克发言最积极的是兹涅拉泽、阿基尔塔瓦、阿利哈尼扬和我。

……我曾多次用亚美尼亚语就和平问题和俄国革命问题在梯弗里斯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说。记得我的一个演讲题目是《社会民主党与民族问题》。这篇演说我后来曾多次对不同的听众重复讲过，因为大家对这个题目的兴趣很大。我的演讲题目还有：《论帝国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论资本主义的“自我消灭”》、《历史唯物主义与社会

民主党的纲领》。我还作为梯弗里斯党委会的宣传员多次在工人大会上做过演讲。

当时在梯弗里斯没有大工厂，只有几个铁路小工厂，一共有几千工人。在城里还有几个不大的烟草厂、一些小印刷所、制鞋厂和缝纫厂。

在上述这些企业中，阿杰利哈诺夫皮鞋工厂也许算是最大的了：它有三百名左右工人工作。

有一次，我们终于把这个工厂几乎所有的工人召集到工厂的院子里开会。会上有两个演讲人：朱格里和我。他用格鲁吉亚语讲，我用亚美尼亚语讲（这个工厂的工人有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

朱格里的演讲非常有说服力，而且通俗易懂。这个人后来的命运是这样的：革命以后，他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当上了梯弗里斯苏维埃建立的赤卫队的领导。但是过了几个月，他就转到孟什维克那边去了。在孟什维克执政时期，他充当了镇压农民起义刽子手的角色。关于这个人我以后还会谈到。

在那个时期，我几乎每天早晨都到布尔什维克的日报《高加索工人》编辑部去。在编辑部经常可以了解到所有新闻，并能读到彼得堡的《真理报》。《高加索工人》的编辑是谢尔盖·卡夫塔拉泽。他是个很有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年龄和党龄都比我大十岁左右。

那时，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在市议会大楼里开会和办公，而孟什维克委员会在旧总督府。

每天晚上下班以后，七、八点钟，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开始在市议会大楼里开会。这些会议也允许党员积极分子参加。例如我就几乎每天晚上都出席。这些会议对于我这样一个当时还是年轻的共产党员来说，是一所很好的党校，大大地开扩了我的眼界。

通常出席这些会议的有十七、八个人。会上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般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地方性的问题、党内问题、与孟什维克的关系问题、在士兵、职员和青年中的工作问题……我记得，在出席这些会议的人中，马哈拉泽（他是会议主席）、奥库贾瓦、托罗舍维泽、纳扎里强、卡夫塔拉泽、姆拉维扬、哈诺扬、杜姆巴泽和其他一些人表现得最积极。这些人我记得比较清楚。

1917年3月底，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邵武勉从巴库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里介绍了巴库的整个形势。在信的末尾，他要求把我们这里的老布尔什维克姆拉维扬派到他们那里去，以便加强在亚美尼亚工人中的政治工作。他写道：我们这里有很多亚美尼亚工人。但是，我们这里缺少会讲亚美尼亚语的、有经验的宣传员。达什纳克党人利用这种情况影响了很多亚美尼亚工人。

读完这封信以后，姆拉维扬发了言，表示他不能去巴库。

会上没有提出让另一个人代替姆拉维扬去，也没有委托谁物色一个合适的人选。

会后，我去找了沙维尔江。

“达努什，你很了解我，”我说道，“你看我能否胜任邵武勉在信里说的那个工作？”

达努什想了片刻说：“如果你真想去巴库，那事情就成功了一半。当然，开始你在那里会相当困难。那里的情况非常复杂。但是我相信你能够熟悉它，并能胜任这个工作。”

我表示确实有这个愿望。

这时，沙维尔江便很坚决地对我说：“去吧！我相信你一切都将很顺利。我还能帮助你。邵武勉是我的好朋友。我给你写一封到他那里去的介绍信。他们会在那里给你安置一个工作，使你能挣钱维持生活，同时又能从事党的工作。”

他立刻在自己的名片上给邵武勉写了几行字，然后装进信封，封好交给我。

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中央同意我到巴库去，给我办了出差证件。第二天，我也没有到乡下去看看父母，就动身去巴库了。

* * *

巴库工人们一致用总罢工庆祝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二月革命的胜利。这次罢工席卷了巴库所有的油田和大大小小的工厂。

1917年3月底我来到了巴库。

我知道，还在革命以前，布尔什维克就在巴库工人中受到很大的信任，享有很高的威望。在我动身去巴库前

不久，梯弗里斯的同志们给我讲的一件事，在这方面是很典型的。1917年3月7日（二月革命刚刚结束）在巴库召开了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就产生了选谁当苏维埃主席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是明显的少数。虽然如此，布尔什维克斯捷潘·邵武勉还是被选为巴库苏维埃主席，而且是在他缺席的情况下当选的，他当时正在从沙皇流放地回来的路上。当然，邵武勉个人的威望起了不小的作用。他很早以前就在巴库的劳动人民中间闻名了。但是，这个事实毫无疑问地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巴库的工人中受到巨大的信任。

梯弗里斯的朋友们对我说：“即使这样，你还是要注意，巴库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非常清楚地想象到情况到底怎样。只是在以后稍晚一些时候我才弄明白。

在那些年代里，巴库地区的国际形势和内部形势确实非常复杂。这是由很多政治和社会经济原因，甚至是地理性质的原因造成的。

问题在于，巴库的石油吸引世界资本的注意，比波斯的石油早得多；革命以前，巴库的石油开采量差不多占全世界开采量的百分之十五。1917年以前，在这里主宰一切的是最大的外国股份公司——诺贝尔、洛希尔德等以及俄罗斯的、阿塞拜疆的和亚美尼亚的石油工业资本家。

由于经常遇到来自工人阶级的反抗，资本的利润把所有这些资本主义集团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石油企业家

联盟”。不过，应该说这种统一是很有条件的，因为这些石油大王之间的残酷的竞争经常使他们分裂开来，而在世界大战期间，当两个主要交战的世界资本主义联盟：德—奥—土和协约国（英、法、俄）之间出现了十分尖锐的矛盾时，他们之间的这种残酷竞争更加加剧了。

在这种条件下，群众性工人组织，首先是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灵活策略，具有极大的意义，当时布尔什维克党正在寻找新的、更为完善的领导劳动群众的形式。

沙皇制度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者经常煽动民族矛盾，给我党造成了很大的困难。这削弱了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战线，动摇了巴库无产阶级队伍的统一。

巴库局势的复杂还因为二月革命以后，立即又有数百万劳动者投入积极的政治斗争。关于他们，列宁曾写道：“这些由于沙皇制度骇人听闻的压迫和地主资本家的残酷奴役而变得政治上愚昧的劳动者，他们……现在觉醒了，并且渴望投身于革命。”以前，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常常甚至不知道还有自己独特的行动纲领的各种政党。

现在，在群众集会和会议上，他们开始倾听这些政党代表的演说。那些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党的演说家们，为了争取大多数劳动群众站到自己一边，不惜用最华丽的、最引人注目的“革命”词藻，以自己党的名义慷慨许诺各种各样的自由、民主、平等以及其他人民福利。

广大劳动群众亲眼看见而后又直接参加了以布尔什维克以及和它站在一起的古墨特派①、阿达列特派②为一方，同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木沙瓦特党③、达什纳克党④为另一方之间的斗争……

一个普通的没有经过锻炼的巴库工人，更不用说不久前才参加无产阶级队伍的备受压制的农民（而这样的农民为数不少），往往难以理解所有这些政治争论和分歧的实质。因此，他们往往随波逐流，落入最革命的词藻的圈套。比如说，社会革命党当时在巴库之所以成为人数最多的党派，就因为他们的纲领模糊不清，可是调子却最高，善于见机行事和利用庸人气质干自己的勾当。

我想稍提前讲讲，一个叫做兹沃尼茨基的社会革命党地方首领是如何在那时的工人集会上经常发表演说

① “古墨特”（亚美尼亚语意为“毅力”）派——是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组织，成立于1904年年底，属于巴库党委会。建立这个组织，是为了专门在阿塞拜疆劳动者中间进行群众性政治工作。虽然某些时期孟什维克在这个组织里起了一定作用，但这个组织基本上是站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立场上的。

② “阿达列特”（亚美尼亚语意为“正义”）派——是在巴库布尔什维克党委员会总领导下工作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由伊朗侨民中的共产党员组成。

③ “木沙瓦特”（亚美尼亚语意为“平等”）党——是1912年在巴库成立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政党。

④ “达什纳克”（亚美尼亚语意为“同盟”）党——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在南高加索出现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政党。

的。应该说，他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演说家。他的讲话一般说来总是词藻华丽，声音宏亮，但实质则是空洞无物，蛊惑人心，他力图证明，社会革命党的纲领比所有其他的政党的纲领都能更好地解决当时人人关注的土地问题。他在讲话中甚至列举统计数字说明：如果农民跟着社会革命党走，并接受他们的纲领，那么每个农民将得到……三十七俄亩的土地。他总是由此得出结论：参加社会革命党吧！每次这样的会议结束后，一般总要办理参加社会革命党的登记手续。应该说，兹沃尼茨基的“捕获量”常常是很大的。

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在会上大肆兜售自己的观点，他们十分隐晦和巧妙地利用了落后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偏见，因为当时许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劳动人民的脑袋里充满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偏见。

巴库的工人们需要分辨清楚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相互分歧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而唯一能够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的布尔什维克党当时的人数还相当少。与其他政党不同的是，布尔什维克吸收新党员非常严格：当时我们吸收入党的，基本上只是工人积极分子。后来，当我们面临严峻考验时，这种严格的态度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当时不得不暂时在极为困难的、复杂的、同其他政党比较相差悬殊的条件下进行工作。

当时巴库的政党五光十色，这一点在巴库苏维埃头几次人员的组成上也反映了出来。虽然苏维埃的第一任

主席(在 1917 年 7 月事件之前)是布尔什维克,但是,苏维埃中的大多数仍然是其他政党的代表。

也不能忘记,苏维埃初期,有选举的杜马与巴库苏维埃同时并存。杜马的大多数席位被资本家、右翼社会党的代表,以及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党所窃踞。临时政府垮台之后不久,这个杜马不仅妄图行使市政的职能,而且还想掌握政权,从而与巴库苏维埃相抗衡。形势如此复杂,以致在巴库苏维埃中没有掌握全部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在好几个月里,形象地说,就好象坐在火药桶上。

在这之前,我从没有到过巴库。我知道,这是南高加索最大的工业中心,以其丰富的石油财富、发达的工业和具有悠久革命传统的工人阶级的坚强队伍而闻名于世。

这个城市的外貌使我感到吃惊,建筑杂乱无章,一片荒芜的景象。

现在的巴库是一个巨大的工业和海港城市。人们常常把它的美丽和那不勒斯或是马赛相媲美。我不知道这种比较是否合适。但是我敢说,巴库在苏维埃政权年代成为现在这样宏伟美丽、设施完善的城市,这是我们在 1917—1918 年做梦也没想到的……

现在,比如很难想象巴库是个到处是垃圾、破烂、常年被极猛烈的北风刮来的细小沙子,在我看来甚至是极细小的沙子撒满的城市。很难想象,现在的巴库没有电车和公共汽车,没有无轨电车和小汽车,而是古老过时

的铁轨马车，乘这样的马车有时乘客自己不得不套上车帮助马把车厢拉上小山；或者是一群小商队在当时的荒地上——这些荒地现在已是一层层的防护林带和一片片的住房——懒洋洋地行进，系在骆驼脖子上的小铃，发出令人忧烦的一阵阵的铃声。很难想象巴库没有绿树成荫的公园和花园，没有钢索铁道，没有最普通的排水设备和自来水……

但是，巴库在我那遥远的青年时代里，在我最初认识它的日子里，正是那种埋在尘埃中的衰败城市。

那时，沿着这个古老城市的街道和混乱的小巷走着，我甚至不能想象，我就要在这里度过自己一生中最光辉的一段革命时期。

由车站我直接上麦尔库里耶夫大街（现在的邵武勉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当时就设在这里。在那里我向党委会秘书科泰·增查泽作了自我介绍，把证件交给他，告诉他我想和邵武勉见面，我带有从梯弗里斯给他的信。又问什么时候，在哪儿我能见到他。

“您只好等等，”增查泽回答我说，“邵武勉一般白天在苏维埃办公，只有晚上才到我们党委会这里来。”

我们谈话的房间很大，经常有一批又一批的人到这里来。我很想听听这些人说些什么，想些什么。于是，我在一个角落坐下来等候邵武勉。

过了不久，来了一个夹着公文包的中年人，他简直是冲进房间的，直接奔向增查泽。这个人个子不高，粗矮身

材，很好动。我立刻就认出了他是阿廖沙·查帕里泽。就在不久前，在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公开的会议上我第一次看到了他（关于这次会见我在前面已经谈到）。

现在我还记得他的刚毅的面孔，留着小胡子。他说话很快，讲话时很有力而又生动地打着手势。我一直有这样一个印象：阿廖沙总是匆匆忙忙，急着要到哪儿去似的……。

他同增查泽问好并对他说：

“你知道，科泰，事情很不顺利。在曼塔绍夫采油场准备举行一次吸收亚美尼亚工人加入工会的大会。但是没有能用亚美尼亚语演讲的人。巴库党委会不能找一个合适的同志吗？否则，这样重要的会议就开不成了。这次大会是我们党的一个好党员列兹金人穆赫塔季尔在那里组织的。但他文化程度不高，没有经验，又不懂亚美尼亚语，什么问题也不可能给工人们讲清楚。（稍后我才了解到，查帕里泽当时是石油工人工会主席，并主持吸收工人们加入工会的全部工作。）

增查泽想了一下，过了一会儿回答说，他们这里现在没有这样的同志。然后，他的眼光落到我身上，完全出人意料地说：

“这是刚从梯弗里斯来的同志，或许他合适？”

查帕里泽很快走到我跟前，跟我打招呼，问我是谁，从哪儿来，为什么来，然后他说：

“为什么不合适？很合适嘛！”

我表示反对，说我刚到这里，情况不熟悉，未必能胜任这一工作，何况我又从来没有在工会工作过。

但是阿廖沙坚持说：

“能胜任的。你演说时就讲讲革命的总任务，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意义，工会的作用。而其余的，纯粹的组织工作，由穆赫塔季尔负责完成。会后他将给加入工会的工人进行登记。”

我还在犹豫不决。但是，查帕里泽十分温和地，同时又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去吧，去吧！我相信你一切都将很顺利。这将是你在巴库的良好开端。大会将在查勃拉特石油工业资本家联合会所属学校的院子里举行。这个地点你到那里一问就知道。你到学校去时，找穆赫塔季尔，就说是查帕里泽叫你来的，一切要做的事他都会给你搞好。”

看到继续坚持下去也徒劳无益，我就同意了。问过怎么去查勃拉特之后，我就到火车站，坐上市郊列车到了终点站——萨邦奇。从那儿我下车步行，大约下午四五点钟我便到了查勃拉特。

真的是这样，在学校附近我见到一群工人，大约有一百人左右。

其中有个比中等个儿高一点的瘦子，老是望着大路，象是在等谁。我明白他一定就是我要找的大会“组织者”，于是我径直朝他走去。

这人果真是穆赫塔季尔。几分钟以后，他宣布开会，

并让我讲话。我基本上按阿廖沙提示的提纲大约讲了十五——二十分钟。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在讲话结束时我号召全体工人都加入工会。穆赫塔季尔立即开始登记自愿加入工会的人，收会费，并给收据……

记得，当时登记加入工会的工人相当多。看样子穆赫塔季尔对我很满意。

就这样，在查帕里泽的同意下，我开始在巴库做政治工作，并且最初以工会工作者的姿态出场。

夜晚，在作完这次工会的“初次演出”以后，我又回到了巴库党委会，在那儿正好碰到了邵武勉。

我对他讲了我来巴库的目的，并把沙维尔江的信转交给了他。

沙维尔江在名片的背面给邵武勉写了下面几句话：^①

“亲爱的斯捷潘：这张纸条的递交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是一个新入党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受过充分锻炼。我派他到你这儿来参加同达什纳克党人的斗争。他是个很能干的小伙子，请予特别关注。关于这里的情况他将和你面谈。

你的达努什”

在这以前，我从没见过邵武勉，但是从沙维尔江和其他老布尔什维克那儿却听到过很多关于他的事情。

我知道，斯捷潘是我们大家公认的布尔什维克党的

^① 许多年以后，邵武勉的小儿子谢尔盖把他母亲珍藏的这张名片寄给我作礼物时，我才知道了这张纸条里的内容。

领导人之一，他同列宁有直接的联系，并得到列宁的绝对信任。

我还知道，邵武勉早在少年时期，在梯弗里斯实科中学上学时，就走上了革命道路。

1899年在札拉尔—奥格雷（现称斯捷潘纳凡城）他创立了亚美尼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中学毕业后他考进了里加工业学院，两年后，因为参加革命的学生运动被开除。

1902年邵武勉和克努尼扬涅茨一起领导亚美尼亚第一个社会民主组织——“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这个联盟一成立就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个联盟的机关报《无产阶级报》第一期曾发表了邵武勉写的联盟的宣言。关于这个宣言，列宁在《火星报》上写道：“我们衷心祝贺‘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人联盟’的宣言，特别是祝贺它在正确提出民族问题方面所做的卓越尝试”。^①

就在那年秋天邵武勉考入柏林大学哲学系。他积极参加俄罗斯革命同乡会的工作，经常出席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结识这个党的一些著名的活动家。

1903年邵武勉梦寐以求的愿望实现了——他会见了列宁。有一段时间，在列宁的领导下，邵武勉在日内瓦组织用亚美尼亚文和格鲁吉亚文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他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建立了终身的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295页。——译者

永恒友谊。

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暴风骤雨的日子里，邵武勉是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在反动统治的年代和新的革命高潮的年代里，邵武勉坚定不移地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积极反对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召回派、调和派，为捍卫和巩固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而斗争。“我们坚信伊里奇的立场的正确性……”——他在1908年7月27日给米·茨哈卡亚的信里写道。

根据列宁的建议，1911年6月邵武勉参加了为准备召开第六次全俄（布拉格）党代表会议的俄罗斯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会议是由特地从国外回来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在巴库组织的。会议期间，邵武勉和巴库一批共产党员被捕，因而未能继续参加委员会工作，也未能出席代表会议。但是根据列宁的建议，邵武勉仍被缺席遴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高度评价邵武勉对于各种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意见，并在通信中要求邵武勉经常往国外给他写信。邵武勉正是这样做的，他给列宁提供了有关国内和党内形势的必要的情报。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特别重视邵武勉在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意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1913年12月6日写道：“亲爱的朋友！接到您11月15日的来信，使我非常高兴。您应当知道，在我目前的处境下，该是多么珍视俄国同志们的回信，特别是那些正在研究和探讨本问题的同志们的

回信。因此，您的迅速的回复，使我特别感到愉快。每当收到这样的来信，都使我感到彼此的隔绝减少了。”列宁在信的末尾说：“关于民族问题的通俗小册子是很需要的。您只管写吧。等待您的回信，紧紧地握您的手。”^①

邵武勉早就开始研究民族问题。早在1906年他就出版了一本题为《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党》的小册子。1914年邵武勉写了《论民族文化自治》一书，在书中他揭露了那些社会民主党的民族主义分子，这些人推行一条使各族工人互相隔绝的路线。列宁从波罗宁写信给邵武勉，请他阐述一下这本小册子，以便在布尔什维克的《启蒙》杂志上发表。

1914年，邵武勉由流放地回到巴库之后，担任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领导人。他领导了著名的石油工人总罢工，并详细地向列宁报告了罢工过程。第二年秋天在巴库召开了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代表会议。在邵武勉的报告和发言中，在他所写的决议中，对于战争的态度，民族政策以及党的建设问题作了列宁主义的阐述。1916年初他再次被捕，在12月他被流放到萨拉托夫，在那里他正好碰到二月革命。

在巴库工人中邵武勉享有很高的威信，凡是跟他接触过的人，都衷心地热爱他。斯捷潘的朋友和终身的伴侣——叶卡捷琳娜·谢尔盖耶芙娜·邵武勉常讲，当斯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00，503页。——译者

捷潘被关在沙皇监狱里的艰难日子里，工人们你一个铜板，我一个铜板，有时凑成两个卢布，有时凑成三个卢布，叫他们的妻子带给“斯捷潘的老婆”（他们之间就是这样称呼他们所热爱的叶卡捷琳娜·谢尔盖耶芙娜的）。

在我们第一次会晤后不久，邵武勉出席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又过了些时候，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是缺席当选的）。这次代表大会后，斯捷潘成为党中央委员会核心组成员，并很快被召到彼得格勒参加了党中央委员会的历史性会议，在会上讨论了弗·伊·列宁关于武装起义的著名信件。

我们那天初次相识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是一个比中等个儿略高，外貌端正，长得很漂亮的人，有一张令人难忘的、聪明的、当时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面孔，常常流露出善良的、甚至可以说是温柔的微笑。他那略显苍白的脸上有一对天蓝色的眼睛——这种眼睛在高加索人中是很少见的——配上黑黑的剪得整整齐齐的小胡子显得非常好看。（顺便说一下，我很尊敬和热爱邵武勉，在青年时代，我在各方面都尽力模仿他，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也留着“邵武勉式”的小胡子。）

和阿廖沙·查帕里泽好说话的，甚至有点抑制不住感情的性格不同，邵武勉是一个举止安详和稳重的人。他不爱多说话，说每句话他都要仔细地斟酌。他说出的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逻辑性很强，很有说服力。后来在

工人群众的许多大小集会上，听他演说时，我确信，他是一个热情的演说家，真正的人民喉舌。他和查帕里泽有一点很相似：他们俩人讲话都很简明易懂，同时又非常使人信服，因此谁要和他们进行论战可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最主要的是群众相信他们，并且跟他们走。

就我而言，和他们相处不仅永远是我受教育的一所好学校，而且也是一种真正的幸福。

不过还是让我回到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来吧。

邵武勉看完沙维尔江的纸条后对我说：“你来了，太好了！我们现在很需要党的优秀的宣传员，沙维尔江对你很赞扬！我们一定设法给你安排个职务，起初那怕当个电话员也好。这工作不难，不需要什么特别的知识和经验……”

于是他立即写信给自己的熟人——曼塔绍夫一个油田管理员，请求把我安置在他的办事处，当个电话员。

经增查泽的允许，我在党委办公室住了一宿，第二天清早，我就按邵武勉告诉我的地址出发了。好不容易才步行到巴拉汉，找到了管理员，把邵武勉的便条交给了他。那人看完后摇了摇头说，他很遗憾，不能满足邵武勉的要求，因为他那儿连一个空额都没有。

我毫无办法，只好返回巴库。

我没有钱住旅馆，只好还是在巴库党委会办公室的桌子上垫些报纸睡了一宿。

早晨，我到苏维埃去找邵武勉，给他讲了我空跑一趟

的情况,并问他有无可能另找个工作。

邵武勉回答说:“你再到比比-埃巴特(在巴依洛夫区)去一趟,到那里找皮鲁莫夫工程师,他在皮托耶夫石油公司工作。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是一个很好的同志。把这张便条交给他(邵武勉马上在一张便条上写了一些字),就说是我让你去的,他可能会替你找个技术性的工作。”

我好容易才到了比比-埃巴特,找到了办事处。但是皮鲁莫夫不在,别人告诉我说他在油田井架那里的某个地方。

我去找他,问来问去,最后才找到了皮鲁莫夫。他看完邵武勉的便条后,显得很为难,并不断道歉,说他帮不了我任何忙……我只好再去找邵武勉。又一次“闲逛”,这次是去白城,仍然不成。

我完全绝望了。我不好意思再去麻烦邵武勉,再说我身边的钱也都花完了,于是决定把我的情况跟增查泽谈一谈。

增查泽从党委会的经费中给我支了一笔数目很小的伙食补助金。这些钱够我用十天。这时,我开始完成党委会布置的个别任务——到各区了解情况,参加会议,和工人们谈话,发表演说。

不久,党委会的同志们大概相信我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党的工作者,给我安排了有报酬的工作。这样,我便成了巴库党委会的宣传员。

* * *

每天从清早到夜晚我都呆在萨邦奇、巴拉汉、扎勃拉特和比比-埃巴特等区的采油场。

巴拉汉、萨邦奇和扎勃拉特区工人会议的组织者通常是上了岁数的达格斯坦人，名叫卡扎·马麦德。这是个比中等个儿略高的人，脸晒得黑黑的，人很瘦，有一个尖长的鼻子和一对明亮的“南方人”的眼睛。可惜，他不识字，俄语讲得很不好；但是他无限地，简直是狂热地忠于革命，忠于工人阶级的事业。他很熟悉这个城市，带着我从一个采油场到另一个采油场，介绍我和人们认识，给我讲他们的劳动和生活条件。我和他东奔西跑全靠步行，因为那时我们没有别的交通工具。

起初，我们主要是在亚美尼亚工人中间召开会议。那时在采油场还没有工人俱乐部，一般都是午饭前后在工人食堂举行集会。参加这些集会的有五、六十个人。主讲人讲四、五十分钟，然后工人们自己发言。他们提出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

那时，我负责繁重的宣传工作。我当时必须在大部分是政治上落后、满脑子各种各样的偏见（主要是民族主义偏见）的工人中间进行宣传。我的所有发言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工人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就是要阐明为了停止战争和缔结公正的和约、把所有地主的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工人监督生产、政权归工人代表苏维埃而斗争的必要性。

我在所有这些会上发言的主要内容大致一样，因为听我演讲的人虽然几乎总不一样，但是他们的觉悟程度是相同的。因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改进我的演讲，并且从会场上听众的表情我明显地看到，我的论据、理由和事实对工人们如何越来越明白易懂了。我感到高兴的是，到会听我演讲的工人人数每次都都有所增加。

但是，跟过去一样，我的钱仍然只能勉强勉强够吃饭，更不用想住房了。因此我与增查泽和另一个党委会工作人员苏尔塔诺夫商量好，让我在巴库党委会的房子里住宿。每天夜晚，党委会工作结束时，我就在桌上铺上报纸，用一捆各种各样的文件当枕头，然后躺下睡觉。不需要被子，因为天气很热，而且我是和衣而卧。我们商定，每天早上六时左右我就应起床，把房子收拾好；因为工人积极分子早晨上班时，每人都要顺路到党委会取几份《巴库工人报》^①以便在采油场工人中间散发。

老实说，那时我真有些困难。虽然我还很年轻，精力充沛，但是我几乎从来没有睡足过觉。我回到“家里”通常总是很晚，累了一天，睡得又不很舒服，可是无论如何第二天早晨六点钟都得起床！……

然而，我回忆起这段往事来总是感到特别亲切。……

那时，我处在巴库的政治生活的中心，我懂得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应把全付精力放在什么上。

^① 《巴库工人报》——从1906年起在巴库出版的布尔什维克报纸。

1917年5月，有一次邵武勉邀请我到他家去。那时他住在城郊紧靠山坡的一幢小楼里。他的住所在二层，三间不大的房间，陈设简单，甚至于可以说十分简陋。我从山坡那边的院子走进住宅。我甚至用不着上楼梯，相反，我还下了几层台阶，就直接到了凉台上。在这里，我第一次看到斯捷潘的妻子和孩子：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邵武勉和他家的人都很热情，十分友好地接待了我。我想大概是党委会的同志们向邵武勉谈到我时，对我的工作作了不坏的评价，因为他似乎一下子就对我表示了信任 and 好感。记得，有一次他曾建议我参加《社会民主党人》周报（亚美尼亚文）的编辑工作。斯捷潘被任命为这个报纸的编辑，但是由于他在苏维埃和巴库党委会的主要工作负担过重，他不能分出应有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这一工作。所以他想让我这个通晓亚美尼亚文的人来帮助他搞报纸的编辑工作。

我同意了，但是我说，我做这个工作全靠他的帮助才行，因为那时我还没有办报的经验。于是我就开始在这个报纸工作，后来我成了这个报纸的实际上的编辑。但是与此同时，我还继续在巴库党委会从事宣传组织工作。……

那个时期，在巴库，士兵的灵魂，士兵思想的主宰者是城防司令官阿瓦克扬准尉。关于他，我想说几句话。阿瓦克扬是一个勇敢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人。的确，他有自己的特点。譬如，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个社会民主

党人，但他既不加入布尔什维克，也不加入孟什维克党，而是一个人单干。二月革命后，他成了巴库城防司令官，全付精力参加士兵集会。这成了他的爱好。

记得，在六月的日子里，每当炎热一过，自由广场上那些持续时间很久的集会就开始了。士兵们在广场上搭了一个专用的木板台子，演讲台就设在木板台子上面。阿瓦克扬也是在这个讲台上发表讲话的，有时一晚上他讲两三次。举行集会时，阿瓦克扬几乎总是在木板台子上离演讲台不远的地方，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可以折叠的三条腿的小凳上。他的外表很特殊：黑斗篷，头上戴着一顶奇特的帽子，既不象军官，又不象士兵。他是个高个儿，很瘦，我觉得他就象靡菲斯托菲尔^①一样。

阿瓦克扬知道，士兵很爱戴他。他的口才很好，讲起话来通俗易懂，说服力很强。

在群众大会上发言的什么人都有。只是没有各个政党的正式代表。尽管演说的人有时讲得没有条理，杂乱无章，但却发自肺腑，讲出了人民内心深处的思想和愿望。因此士兵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这些演讲，对许多发言的反应是热烈的。

那时，绝大多数士兵对于许多所谓“革命的护国主义”的口号还十分迷信。我恨不得立即发言阐明布尔什维克党对这个问题的立场，虽然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

^① 是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中的魔鬼。——译者

当时公开发言反对战争会引起士兵的不满，并且有可能遭受迫害。我就曾亲眼看见，当有人发言主张停止战争时，他们就在座位上叫喊起来，毫不客气地打断人家的发言。但是我终究还是鼓足了勇气：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于是，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我发言阐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立场。我周密考虑过自己的发言，决定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讲述我党政策的一般原则。如果我的讲话能够吸引住听众的注意力，那么就在发言结束时提出战争的问题。我说，泛泛地谈论土地转归农民所有已经够了，这个问题已经讲了好几个月了！农民应当立即把土地夺到自己手里，为此不必等到召开立宪会议。

我看到我的话得到了听众的赞同，于是我就接着说：“当我们的弟兄在战壕里忍受着难以置信的苦难，当他们衣不蔽体，食不饱腹，蓬首垢面地在战场上死去，而他们的家庭又遭受贫困和饥饿折磨的时候，战争却给资本家带来巨大的利润：他们穷奢极欲、花天酒地，同时想方设法把自己的儿子藏到后方去，离前线越远越好。”由于听众对我的话更加赞同，我便开始谈到我的主要思想，我说：“很清楚，战争对谁有利——只有资本家才需要它。因此应当结束战争。但是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不愿意也不能够作到这一点；这就是说，应当推翻临时政府，并把政权交给工人和农民。”

当我讲到最后几句话时，会场气氛十分紧张。接着就听到不满的喊叫声，一部分气势汹汹的士兵开始向讲台

逼近，会场立即喧闹起来。但是我的话已经讲完了，我走下讲台，没有停留，就离开了会场。后来，在这次会上跟我在一起的一个同志说我做得对，走得及时，因为士兵想要惩罚我。

我发言时，阿瓦克扬极力保持沉默。以后他很快地和士兵一起“向左转”，而在十月革命的日子里，他已经完全转到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上来了，率领巴库卫戍部队支持苏维埃政权，并成了右翼政党最仇恨的人物之一。最后阿瓦克扬象一个共产党员一样和巴库的人民委员一起壮烈牺牲。

* * *

那时我们在组织上尚未同孟什维克分裂，我们和他们属于一个统一的联合组织。然而在巴库党委会成分中，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数量上（九个委员中有七个是布尔什维克），还是在影响上，都比孟什维克强大。

尽管如此，这种“联合”对加强布尔什维克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仍然妨碍极大，而且我们党的主要机关报《巴库工人报》在阐述当前政治生活中极其重大问题的立场时，也因此受到某些限制。

我作为一个积极分子，曾有两三次参加了联合的巴库党委会会议，并亲眼看到了在会上以邵武勉和查帕里泽为一方，以埃奥洛和萨多夫斯基等孟什维克首领为另一方的两派之间的极其激烈的争论。很清楚，他们在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上的立场是根本对立的，甚至是敌

对的。

这也就导致了在表面上看来似乎是统一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内部实际上已经存在着两个党。巴库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委员每星期都单独召开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会议，讨论自己的问题，并且同城里很多区的布尔什维克保持联系，在这些区里布尔什维克逐步地夺取了所有要害部门，准备同孟什维克实行不可避免的组织上的决裂。

列宁从国外回到俄国，在四月的头几次讲话之后，我们大家便特别清楚地认识到联合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在巴库继续存在带来的危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迫切地要求尽快地同孟什维克彻底决裂。

在巴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会议上预先决定原则上同孟什维克决裂以后，我们的同志们便想在实际上实现这种决裂，以便把各区党的机构尽可能多地保留在布尔什维克手里，并争取那些仍然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动摇的工人们跟着布尔什维克走。除此以外，我们还使那些当时在战争问题上站在布尔什维克立场的所谓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继续和我们站在一起。

有种种原因，但主要是由于这些考虑，我们同孟什维克的决裂拖延下来了。

我记得，五月初米哈·齐哈卡雅和菲利普·马哈拉泽从彼得格勒来到巴库。他们曾参加过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全俄党代表会议（即四月会议）。

我们在巴库委员会委员维克托·纳涅伊什维利家中同他们见了面。参加的约有十——十二个人。我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米哈·齐哈卡雅向我们详尽地讲述了列宁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其中也包括米哈·齐哈卡雅本人）从瑞士动身是如何组织的。

他说，列宁刚一知道沙皇被推翻的消息，就急切地想回俄国。那时从瑞士出境只能经过俄国的盟国——法国和英国。而这些国家的政府只允许那些站在护国主义立场上的人，即主张同盟国一起继续进行战争的侨居国外的俄国革命者无阻挡地通过其国境回俄国。而反对战争的革命者，他们则不允许通过。

为了得到签证，进行过许多尝试，但是都毫无成效。列宁便通过瑞士的国际主义者、社会党人弗·普拉廷（后来他是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之一）同德国当局进行谈判，以便使德国当局允许以列宁为首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过境回俄国。列宁本人没有同德国人进行谈判，也没同他们见面。谈判双方约定的条件是：列宁和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所乘的车厢将用铅印封上，以使他们不和德国人发生任何接触。所有同德国当局就这些问题进行的谈判都是由普拉廷直接进行的，这样，任何人也不能诬陷列宁和他的同志们同德国人进行了什么“勾结”。齐哈卡雅讲到，主张同俄国打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想在某个车站同列宁会晤，但是列宁断然拒绝了。

齐哈卡雅向我们详细讲述了在彼得格勒，在芬兰车

站，人们欢迎列宁的情景和列宁的头几次演说，讲到当时已在报刊上公布的列宁四月提纲的意义。

菲利普·马哈拉泽传达了四月代表会议的工作，他是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梯弗里斯党组织的代表。

邵武勉继马哈拉泽之后讲了话，他告诉从彼得格勒来的同志们，巴库布尔什维克准备在最近同孟什维克决裂。但这要尽可能做到彻底孤立孟什维克，并使社会民主党的多数工人党员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

齐哈卡雅不知道，我们巴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一个联合组织里工作。当他一知道这件事以后，便怒不可遏。他气呼呼地站起来，并宣布他不能和“联合分子”在一起开会，然后示威式地走出了房间。

接着，阿廖沙·查帕里泽、维克托·纳涅伊什维利和其他几个同志也跟着他走了出去，并向他解释了好久，为什么我们这里是这种情况，并向他说明，我们已经通过了同孟什维克分裂的决议，巴库布尔什维克支持列宁的四月提纲，并完全同意布尔什维克四月代表会议的决定。

齐哈卡雅回到了房间里，谈话一直继续到深夜。

不久以后，在巴库委员会联合会议上通过了召开全巴库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党委会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计划在各区支部进行大量的准备工作，以保证会议的多数代表是布尔什维克，而在那些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则争取选举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派为代表。代表选举完毕以后，布尔什维克

领导拟定了开会的日期，即6月25日，并且会议不是在巴库，而是在巴拉汉举行。开会日期的通知书只分发给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和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派。孟什维克的代表没有得到通知书。因此，会议开幕时，孟什维克们就被“撇在一边”了。

好象在会议的第二天，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的事实以及我们不愿意再和孟什维克一起走已是众所周知时，由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和巴加图罗夫组成的孟什维克代表团来到了会场。

伊西多尔·拉米什维利，一个个子不高的白胡子瘦老头，有一付训练有素的好嗓子，外表上看来象个预言家。他大概发出了这样的呼吁：“同志们，不要离开我们，让我们一起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同一行列中吧。如果你们离开我们，你们会变得更左，更接近无政府主义者，而孟什维克将变得更右，更接近右翼政党。如果我们今天分开，我们就永远也不会走到一起了。同志们，我向你们呼吁，恢复我们队伍的统一吧！”

虽然拉米什维利的话讲得很有鼓动性，很漂亮，然而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个孟什维克的国际主义派的人支持他的讲话。孟什维克代表团就这样毫无所获地离开了会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分裂完全实现了。

齐哈卡雅随身带来了一些1916年在国外出版的内容丰富的布尔什维克刊物，其中有两三期是在瑞士用很薄的纸印的《共产党人》杂志。我还记得12月份那一期

的内容。上面刊登了党中央委员会为悼念中央委员季莫费伊（这是苏连·斯潘达里扬的化名）逝世而发的讣告。他死于图鲁汉流放地。

齐哈卡雅把他带来的全部杂志给我们巴库委员会每期各留下了一份。

弗·伊·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其内容是著名的“四月提纲”）一文当时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列宁象闪电一样照亮了我们前进的道路，他号召我们立即着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明确地规定了这次革命的基本动力，拟定了当时两个政权并存的条件下党的策略，全面地论证了“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

列宁的“四月提纲”必然要起伟大的作用。它构成了当时我党新的政治方针的理论基础，成为我党实际行动的战斗纲领。

然而，我记得列宁提出的关于把我们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的建议在巴库没有得到很多老党员的支持。因为不知怎地他们已经习惯社会民主党这个旧名称，而不愿意舍弃它。大家知道，自列宁提出这个建议以后差不多过了一年，我们党才开始称为共产党。

我则立即赞成这个建议。我不明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历史性宣言称为共产党宣言之后，我们怎么能称呼自己是“社会民主党”。当时我特别喜欢“共产党

人”这个称号，甚至把它选作自己的笔名。从那时起，我写文章用的最多的笔名就是“共产党人”或简称为“康——斯特”^①。

* * *

1917年7月末，我的身体急剧地变坏了。这是由于工作负担过重、经常吃不饱和睡眠不足造成的。所有这几个月我都是一大早就到巴库各油田区去，不时地由一个采油场步行到另一个采油场，弄得非常疲倦。每天都得在工人和党的会议上作两三次演讲。已经开始的、对我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巴库的炎热终于毁坏了我的健康。我瘦得很厉害。出现了头晕的现象。

有一次，邵武勉邀请我到他家去。他详详细细地询问我工作的情况，我的印象如何，问我的脸色为什么这么不好看。当他弄清楚我的生活条件和我不得不如此工作之后，他建议我立即回农村到父母亲那里去，养精蓄锐，恢复健康，然后再回来重新投入工作。“巴库还会热得更厉害，”他说，“您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健康彻底毁掉呢？”

然后邵武勉对我说，他打算把自己第二个儿子列瓦送到乡下亲戚那里去，以便他也有机会休息一下，使身体结实起来。“我们亲戚的村子，”邵武勉说，“离你们的村子不远，在一个区里。如果列瓦能和您一起走那太好了。”

我同意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为今

① 俄语共产党人的简写。——译者

后的工作积蓄精力。

8月初，我和列瓦已经到了梯弗里斯，在那儿换上了去埃里温的火车。到我们村有将近一百公里，而列瓦去的地方——一个不大的别墅村镇（现称斯捷潘纳万市），离梯弗里斯有一百二十公里左右。

当我们的列车进入德别特河上狭窄的洛里狭谷之后，原野的美景，狭谷两边高耸入云的悬崖峭壁……一直使我们惊叹不已。奇妙的是，在这些悬崖峭壁上不仅长着小树，而且还有大树。德别特河不大，但水流湍急。险峻的石滩上，布满一阵一阵的浪花。空气越发清新。我仿佛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里更美丽的地方了。虽然当时我还没有见到过世界，也没有想象到世上还有这样一些风景优美的地方：象黑海海滨，里察湖及通往那里的道路，亚美尼亚杰尔穆克疗养院，象高加索北部山麓的帖别尔达，科利斯基半岛上风景如画的地区，古巴岛，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美国大狭谷惊人的美景和世界上其他风景优美的地方。

我在阿拉维尔迪站下了车，而列瓦继续乘车往前走。

母亲见到我以后，像以往一样高兴得不知干什么才好。拥抱我，亲吻我，哎哟哟地说我瘦了。她马上忙碌起来，尽量想法给我弄些好吃的东西。当然，父亲也很高兴，一点不亚于母亲，但是他和往常一样，外表上不流露出来。

我的弟弟、妹妹特别高兴。当然，我很喜欢他们，但也

象父亲一样，没让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我甚至都没有吻他们——一句话，在各方面都模仿父亲，作得象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

我觉得弟弟、妹妹好象长大了许多，妹妹已经完全是个大姑娘了，她已十六岁。弟弟很快就要满十二岁了。他长高了，象我当初那样又瘦又弱。他在学校里念书。我问他学习怎么样，阿尔焦姆回答说学得很好。母亲证实了这点，并且夸奖了他一番。

那时我姐姐已经出嫁了，住在村边上她丈夫家里。我回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她那儿，她也到我们这里来了。

最初我的确是养精蓄锐。享受山区的新鲜空气，温暖的、阳光和煦的天气。我睡得很足，吃得不错，抽空读一点儿书。

当我的身体开始得到恢复，我就更加经常地同乡亲们闲谈。他们变了。过去他们对政治连想都不想。现在他们却都关心起来：在哪儿发生什么事啦？以后会怎么样啦？沙皇被推翻，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因为以前他们是那样根深蒂固地坚信沙皇的万能。他们简直问我所有的问题，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刚从梯弗里斯和巴库回来的。要是他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未必会对我关于这些事件的意见感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对这些事情发表意见还太年轻……

正因为如此，我感到他们中的许多人尽管表面上十分尊重、十分注意我所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前景，却不能掩

饰他们的怀疑思想。比如，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普通工人（如在我们那里的阿拉维尔迪炼铜厂那样），能够赶走厂主（而且还是法国人！）并且自己管理工厂，他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他们也不相信那些工人同不识字的农民在一起能够赶走王公、贵族，夺取他们的土地，并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使他们非常激动和合乎他们心意的是布尔什维克关于停止战争的要求，因为他们等待自己的儿子从前线回来已经很久了。

当然，我同我们工厂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参加了地方党组织的一些会议，讲了国内的政治形势，党内的情况，党的斗争的策略。我有机会在这个工厂的全体工人大会上两次发表演说。

我还到过附近的其他村子，其中也包括阿赫帕特村，这是最革命的村子，那里的农民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阿赫帕特村的农民那时为在全州迅速夺得地主的土地而进行着积极的斗争。

在我们区的各个村里，本来早就有一种反抗地主的气氛，并且这经常引起县、省当局的不安。我们区的大多数农民和工厂的工人都是跟我们党走的。

那时我们的主要敌人是达什纳克党人；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起的作用不大。

突出的是，与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其他地区不同，在地方自治机关的选举中，我们区的共产党员成功地把自已的代表选进了这些机构，当选的代表比达什纳克党

多四倍，从而保证了我们党在这些机构里的决定性影响。在我党组织内，当时连一个知识分子也没有，所有的积极分子都是先进的工人和农民，其中有些人是革命前就入党的，并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他们的鼓舞者和领导人是布尔什维克卡霍扬——他是阿赫帕特村人。

我作了头几次演讲之后，全村都知道我是布尔什维
克了。我母亲也知道了。

有一次她坐到我跟前，并且大概对我讲了这样一些话：

“我的孩子，你是那么聪明又有学问的人，可是周围的人都说你是布尔什维克。我听说有许多好的党派：有达什纳克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我们村里最有名望的、最受尊敬的人都站在这些党一边。有人说你参加了最坏的一个党，当了布尔什维克。你是个聪明的人，离开布尔什维克，参加别的党吧！”

她说得那样恳切，以致使我开始考虑如何更好地回答她，以改变她的看法。

我说，布尔什维克是最好的党，她为真理、为穷人而斗争，反对富人，为劳动人民的正义而斗争。

“你所听到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说法，”我对她说，“这是最坏的人散布的谎言，而他们对你所说的好党，实际上是很坏的。”

母亲听着我的话，从她眼睛的表情我知道，我的论据对她起的作用不大。

当时在我脑海中突然出现了这样一个说服母亲的想法。

我说：“妈妈，你能不信基督教，而当穆斯林吗？”

我母亲的全身立即抖动了一下，她画了个十字，激动地说：“你怎么啦，我的孩子，你在说些什么，怎么能这样呢！我宁愿死掉，也永远不会这样做的。”

于是我对她说：“我理解你，请你也理解我。布尔什维克——这就象基督教对你来说一样，是我的信仰。我不能离开他们。求你以后再也别劝我了——这没有用。以后你自己会相信，我和布尔什维克做得是对的，请你暂时相信我的话……”

这对她起了作用，虽然这并没有使她很高兴。但是，母亲相信了我说的话，不再和我争论了，并且再也没有提起这个问题。

从1923年起，她和我最初住在罗斯托夫，以后住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她很满意她的儿子在国内受到极大的尊敬。

特别是当着我的面，她一次也没有祈祷过，没有去过教堂。可能她根本不知道莫斯科有亚美尼亚教堂。我则从来没有主动和她谈起过上帝或者宗教，而她也从来没有向我问起过这些。在我们家她从来没有听到过关于宗教的谈论。我甚至以为她不再相信上帝了。

1959年当我从美国访问回来时，乘坐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在海洋上空，四个马达中有两个发生了

故障，一场灾祸眼看就要发生。这个消息不知怎么传到了我母亲那里。回家以后我问她：

“噢，你过得怎样，妈妈？”

她和平常一样回答说：

“很好。只是为你耽心，一直祈祷上帝保佑你能活着从那个国家回来！”

我吃惊地看看她说：

“妈妈，难道你还相信上帝吗？”

“怎能不相信上帝呢？”她简单地回答说。

我母亲于1960年在莫斯科去世，享年九十三岁。

我同父亲没谈论过政治问题。他没有向我提起过任何这方面的问题。而我自己也有点儿不好意思硬要和他谈这些问题，更不用说教训他。

父亲在工厂里当木匠的时候，就知道工厂里发生的许多政治事件和工人们关于这些事件的谈论。不知怎么地他得知工厂里出现了想要推翻厂主的社会主义者。

父亲当时给一个希腊包工头作工，这个希腊人对他的评价很高，说他不仅是个技术熟练的工人，而且是一位可尊敬的人。有时父亲当着我的面对母亲说，厂主邀他下班以后到自己家的凉台上“喝一杯”。看得出，父亲对这种邀请是感到得意的。至少，他总是以尊敬的口气评论自己的主人的。

我父亲在他六十年的生涯中对谈论革命是持怀疑态度的。有一次，他完全出乎意料地、带着挖苦的口气对

我说：

“你知道，在工厂里出现了什么社会民主党。有人说你也是这种人。你好好考虑考虑！要知道你们还是些孩子，竟想推翻那些可尊敬的、有势力的厂主。你们从这里是不会捞到什么的。”

我回答说，他的想法是非常错误的。

“厂主并不象你认为的那样是可尊敬的人，”我反驳他说，“他们全都是靠工人的血汗过活的。当然，现在我们社会主义者还不多，力量还不强大。但你会看到我们将取得胜利，一定会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当时尽量避免继续同父亲争论，因为我知道，这种争论除了吵架，没有任何好处。

父亲活到十月革命，临死前他明白了许多事情。他由于患肺炎得不到医治，于1918年苏维埃政权在亚美尼亚取得胜利之前就死去了，享年六十二岁。

准备武装起义

建立青年团；我被选为梯弗里斯党委会秘书；全高加索党代表大会；前夜。

1917年8月底，我的身体已经强壮起来，精力十分充沛，于是告别了家乡，来到梯弗里斯。我见到了同志们，在梯弗里斯党委会，听到了各种政治消息。这就占去了几天的时间。

那时，我的几个中学同学决定上大学。他们劝我也学他们的样子升学，并且十分肯定地说，无产阶级革命很快就要取得彻底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这些说法是颇有道理的，以致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要这样做了，尤其是由于我中学毕业成绩优异，梯弗里斯市参议会决定给我一笔相当可观的奖学金；同时，二月革命以后，凭我们的中学毕业证书可以进俄罗斯任何一所大学学习。

但是，过了几天，我就放弃了上大学的念头，决定继续在“革命大学”里接受教育。我对于自己的这一决定后来从未懊悔过。

我所在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同志们，特别是鲍里斯·兹涅拉泽和格沃尔格·阿利哈尼扬劝我立即着手在高加索建立布尔什维克青年团。

我们拟定了组织章程草案。我受委托起草做为团的纲领的宣言。

在阿弗拉巴尔俱乐部召开了青年团成立大会。大会开得非常热烈。经过全面的讨论，大会通过了发起小组提交大会的两个文件。我们选举了“斯巴达克”青年团临时委员会。

青年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组织“斯巴达克”（青年团重建后的名称）在宣言中向高加索全体劳动青年发出了号召。宣言写道：

“同志们！青年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组织‘斯巴达克’向你们发出号召，向所有珍惜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未来，关心人类摆脱奴役和压迫的解放事业的人们，向那些还没有被沙文主义狂热冲昏头脑，还没有被狭隘爱国主义玷污战斗的社会主义伟大原则的人们发出号召；——‘斯巴达克’组织向你们，向所有为未来而斗争的青年战士发出号召，号召你们建立自己当地的和全高加索的组织……号召你们随时随地积极支持国际无产阶级的……特别是高加索的革命运动；在高加索到处充满着沙文主义狂热并经常发生民族纠纷，而民族纠纷是产生形形色色机会主义的最好土壤，因此，国际主义青年组织在这里要克服更多的困难。

同志们！青年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组织‘斯巴达克’遵照本宣言的基本原则，肩负着在高加索团结和组织国际主义青年这一艰巨任务。

‘斯巴达克’组织满怀希望和明确的目标，开始了自己的活动，她号召高加索所有青年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全力支持和援助高加索国际主义青年组织。”

青年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组织“斯巴达克”的名称，袭用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当时在德国建立的革命的“斯巴达克”团的名称。应该说，我们组织的名称选用了“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这两个词，而没有用“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也不是偶然的。我们选用这个名称，是因为考虑到，这个名称便于使那些还没

有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立场，却倾向于我们的革命策略的左翼青年参加我们的青年团。

应当指出的是，大约与此同时，孟什维克同一些资产阶级政党也着手建立超党派的，即全格鲁吉亚青年民族联盟。以达什纳克党人为首的亚美尼亚民族主义分子也这样做了。

因此，1917年9月底，“斯巴达克”通过了《致高加索全体劳动人民》的呼吁书，对建立格鲁吉亚青年联盟和亚美尼亚青年联盟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揭露了这一阴谋的叛卖和反人民的性质。

呼吁书号召青年以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的大团结和同反革命资产阶级进行不调和的阶级斗争，来对抗资产阶级的民族统一和“阶级调和”。

呼吁书最后号召：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向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展开无情的斗争。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当前的表现就是要建立一个超党派的苏维埃和召开亚美尼亚全民族大会。

打倒反革命的资本家地主阶级！

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万岁！

俄国革命万岁！

青年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组织

‘斯巴达克’临时委员会”

那时，梯弗里斯党委会每天分配给我大量组织工作和宣传鼓动工作。我欣然接受了这些工作，因为当时我

还没有某种明确的职务在身。那时，我住在我的亲戚拉扎里和维尔基尼娅·图马尼扬的家里，我已经和邵武勉谈好，在最近期内就准备回巴库。

梯弗里斯的同志们劝我推迟去巴库的行期，因为根据梯弗里斯和巴库党组织的共同决议，即将在梯弗里斯召开全高加索党代表大会。同志们对我说：“你还是留在我们梯弗里斯党委会工作一段时间筹备这次党代表大会，并且参加它的工作吧！”

但是，由于南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的两位主要领导人——邵武勉和齐哈卡雅到彼得格勒去了，党代表大会由1917年9月15日改为10月1日召开。

* * *

梯弗里斯党委会的工作越来越多，而党委会中却没有一个脱产专做党的工作的领导干部。党委会的全部工作都是由党委委员和个别党员作为党交给他们的任务利用晚上业余时间去做的。每天都有各地党的基层组织的代表到党委会来，但是他们白天在党委会却见不到人。鉴于这种不正常的情况，梯弗里斯党委会于1917年9月中旬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中写道：

“党委会全体委员认为有必要设一名编制内的秘书，经常留在党委会执委会，他不仅负责处理梯弗里斯党委会的事务，而且在边区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要与各省的党组织保持联系。米高扬同志当选为秘书。”

这样，我就成了梯弗里斯党委会的秘书，我立即全力

以赴地履行我的职责，主要是处理大量实际的组织问题。

我想先说一说，高加索党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梯弗里斯党委会执委会中一部分著名的委员当选为边区党委会委员，他们都调到边区党委会工作去了。因此选出了新的梯弗里斯党委会执委会，我又当选为执委会秘书。

梯弗里斯党委会的领导工作由执委会执行。执委会通常由菲利普·马哈拉泽主持会议，尽管在形式上党委会还没有设主席的职位。

那时前来党委会办事的许多人当中，不仅有梯弗里斯本地区的，而且还有来自巴统、苏呼姆（现称苏呼米）、库泰依斯、卡尔斯、亚历山大波尔、萨雷卡马希（这里集中有大量军队），以及埃里温、叶丽莎白波尔（现称基洛瓦巴德）等地的同志们。他们带来了各地情况，以及布尔什维克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增长的最新的重要情报。我记得当时在军队中取得了特别惊人的进展：整个团，整个卫戍部队转到我们方面来。

地方代表们抱怨说，盘踞在各地方军事机构领导岗位上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军官们就更不用说了）千方百计阻挠布尔什维克在军队中开展工作，他们剥夺布尔什维克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禁止他们在军队里散发《彼得格勒真理报》和《高加索工人报》。

梯弗里斯党委会执委会每天晚上开会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情报，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我们集中全力筹备召开全高加索的党代表大会：执

委会经常讨论的是与党代表大会有关的具体问题，而地方上这时正在召开党的会议讨论当前形势以及党的任务问题，并选举出席边区党代表大会的代表。

10月1日没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一天，梯弗里斯党委会委员和前来出席党代表大会的代表联合举行了预备会议，会上弄清了共有多少代表，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会议讨论了党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还讨论了由谁作报告的问题。

由于立宪会议选举已经临近，所以，决定在党代表大会上听取并讨论沙维尔江所做的关于准备立宪会议选举的报告。

从前线回来的科尔加诺夫在这次会上发了言，他向我们介绍了前线由于没有言论和出版自由而出现的政治形势，并提出由他就军队中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准备工作问题作补充报告。他的建议被通过了。

根据我们在前一天梯弗里斯党委会会议上所做的决定，1917年10月2日召开了党代表大会。

1917年，全高加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前不久，我又一次回到家乡，又一次在阿拉韦尔迪工厂作了演讲（该工厂的布尔什维克选举我为他们的代表，出席党代表大会），又一次在阿赫帕特和马涅斯地区党的会议上和群众集会上作了演讲。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有二十六名有表决权的代

表，其中包括北高加索一些地区的代表。我是作为阿拉韦尔迪、马涅斯和阿赫帕特^①等地区党组织的代表参加大会的。

马哈拉泽宣布党代表大会开幕，他阐述了全高加索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他说代表大会应当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把分散在我们辽阔的多民族边区的后方和前方的党组织都聚集并团结在一个核心的周围。

全体与会代表以热烈的掌声一致选举当时仍处于地下状态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为大会的名誉主席。

梯弗里斯的代表卡夫塔拉泽作了关于参加全俄第六次党代表大会情况的报告，这次大会是在1917年7月至8月召开的。

资产阶级和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政党对布尔什维克进行疯狂镇压，大搞白色恐怖，极尽造谣和诬蔑之能事，在这种情况下，党代表大会不得不秘密进行。我们认为党代表大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在自己的决议中接受了列宁关于准备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这无论对于在高加索的我们，还是对于改变共产党员的思想，使其在今后的斗争策略中辨明方向，并且动员他们在各地不同的条件下去完成全党的任务，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来自各个地方代表的报告在大会工作中占有重要

^① 1903年7月在阿赫帕特村建立了亚美尼亚第一个共产主义支部，该支部曾派遣斯捷潘·邵武勉、米哈·齐哈卡雅、阿萨图尔·卡霍扬作为自己的代表出席了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地位。报告很多,但非常使人感兴趣,因为报告提供了关于各地政治形势的进展,布尔什维克正在什么条件下进行斗争,以及他们在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和遇到的困难的最新情况。

格奥尔基·斯图鲁阿代表巴库做了报告。到会代表欢欣鼓舞地听取了斯图鲁阿介绍巴库石油工人在总罢工中取得的成就。这次罢工得到了全俄国工人的热烈响应。在大会进行期间,传来了罢工胜利结束的消息。大会特地向英勇的巴库工人发出了贺电。

库泰依斯的代表达拉基斯维利说,在库泰依斯虽然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成立不过两个星期,但是已经把二百九十三个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阿尔维拉泽代表亚历山大波尔发言,他提请大会要特别注意军队中立宪会议代表的选举工作。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把群众团结在革命的无产阶级旗帜的周围,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小资产阶级幻想进行无情的斗争。”

这次大会结束后,阿尔维拉泽和邵武勉一起来到亚历山大波尔。邵武勉在亚历山大波尔做了大量的工作来巩固地方的党组织,并在士兵大会上发表演说,取得了很大成功。

姆拉维扬代表叶丽莎白波尔在发言中说,由于布尔什维克在联合的党组织中占优势,孟什维克在六月初便自行退出了组织。我们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争取到一

千二百张选票，把三个同志选进了杜马。叶丽莎白波尔卫戍部队是倾向布尔什维克的。

我做了关于阿拉韦尔迪、马涅斯和阿赫帕特的形势的报告。正如在已经发表的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我在报告中特别提到“在亚美尼亚只有这个省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组织起来了。这是当地的经济生活条件造成的。在这里，半无产阶级的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极为尖锐，极为紧张。”

科尔加诺夫向大会报告了前线部队的情况。他还讲到了军队中选举立宪会议代表的准备情况。我记得，当他讲到有些地方取消了言论和出版自由时，许多代表大为吃惊。

达努什·沙维尔江在大会上做了一个很详细的报告，与会代表对他的报告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和争论。

邵武勉到会稍迟了一点，因为他刚刚从彼得格勒回来。他作为党中央核心小组的成员，在彼得格勒参加了党中央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邵武勉积极投入了大会的工作。他就沙维尔江的报告发了言，为讨论这个报告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邵武勉说：

“立宪会议不是一般的议会，它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在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中必须反复指出，如果立宪会议解决不了革命提出的任务，即使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不爆发一场新的革命，这场革命也会在它召开之后爆发。

立宪会议并不是一个我们应该对之收起武器的机构。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对它施加压力，不但要从下面在立宪会议的外部，而且要从上面在它的内部对其施加压力。”

在邵武勉发言之前，我也和其他人一道就沙维尔江的报告发了言。我在辩论中，特别是在同巴格拉特·鲍里扬（一向很受尊敬的布尔什维克，政治流放者）的辩论中，我说，我们在采取群众性的革命行动的同时，不排除也不应排除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利用议会。我说，因此，对于立宪会议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我们不能漠不关心。这就是为什么在发动和组织群众采取革命行动的同时，我们应当参加立宪会议的选举，并力争多选一些自己的代表参加立宪会议。我十分肯定地说，鲍里扬低估了我们在立宪会议选举运动期间开展斗争的意义。他显然夸大了反动势力在农民中间的影响。

托罗舍利泽在大会上做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报告。在民族自决的形式问题上，他实际上是坚持党纲中规定的所谓地方自理的旧的条文。从一切情形看来，他是不同意1917年党的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的，该决议规定实行区域自治为党纲中民族问题上的一个新的要求。他提交大会的决议草案，非常清楚地说明了他的立场。他在决议草案中提出要求在全高加索实行区域自理（即自治）。这是一个混乱的提法，把很清楚的问题弄“颠倒了”。自理和自治之间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两者的含义是不同的，

也是不能互相代替的。托罗舍利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显然是受了菲·马哈拉泽的影响，马哈拉泽在四月会议上是反对区域自治的。

邵武勉在大会的发言中，批判了这些混乱的、过时的观点，他提出了历史证明整个来说是正确的建议。邵武勉的建议当时在报纸上曾扼要地阐述过：

“邵武勉同志指出托罗舍利泽同志的报告存在两个缺点。他说，我们必须不仅从理论方面，而且主要从实践方面来对待民族问题。报告人忽略了我们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是多年以前制定的，而现在我们正面临一场社会革命，因此不能在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内来解决民族问题。那末我们认为民族自决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呢？芬兰并没有等待俄国就民族自决问题表态，乌克兰也是如此。因此，我们不能把一切问题都拖延到立宪会议来解决。我们应当具体地提出问题。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民族主义政党已经制定了自己的纲领。

我们的纲领中曾规定：要实行区域自理，并且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和生活习惯的特点。此外，还有关于民族自决，直至建立独立的国家的条款，还规定了实现国家普遍民主化和用本族语言授课的权利。但是，在1913年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我党关于民族问题的纲领扩大了，根据列宁同志的提议，采纳了各区域自治以代替区域自理。区域自理、自治和联邦制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区域自理没有立法权，它掌管文化和经济、行政方面

的职能,拥有征税权。

自治和自理不同的是,自治拥有广泛立法权的议会。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赋予地方的自治区域以一定职权。

联邦制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单位的联盟,各有自己的立宪会议。

根据我们现在的纲领,我们应当承认区域自治。我们已经接近一场社会革命,因此,我们更不应害怕地方分权。至于南高加索,我认为有必要对其行政单位作若干调整……”

邵武勉建议在南高加索建立三个民族自治区域,并且确定了这三个民族自治区域之间的边界略图。他主张这些自治区域同俄国保持联邦性质的关系。

邵武勉在他的发言中指出,托罗舍利泽没有考虑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布尔什维克关于解决俄国民族问题的观点就已发生的那些变化。这些变化也反映在党的四月代表会议的决议中。四月会议承认加入俄国的各民族有建立独立的国家和自由分离的权利。最后,他指出,列宁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言时,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奉行沙文主义、大国主义政策(特别是在对待芬兰和乌克兰的态度上),同时提出了“让俄国成为自由共和国的联盟吧!”

遗憾的是,多数代表由于教条地坚持原来纲领中的旧观点,不理解邵武勉的建议,没有予以支持。但在他的

发言的影响下，毕竟对托罗舍利泽提出的决议草案做了修改。在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没有写上“全高加索区域自理（即区域自治）”，而写上了“高加索区域自治，成立议会……实行广泛的地方自理，在高加索内部划分新的行政、经济单位。”

大会通过的决议中有这样一段话：“代表大会宣布，它既不提倡高加索各民族脱离俄国，也不提倡高加索各民族建立联邦的国家。”这样，就否决了邵武勉的有关建议。

应当承认，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当时采取这种立场，是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一年半以后，我们在巴库纠正了这个错误。而以马哈拉泽为首的其他同志则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诞生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以前的三年期间，始终没有改变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在代表大会上，邵武勉就当前形势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和内容丰富的报告。他概述了革命经历的各个阶段以及我党在策略上的相应的改变。

他特别讲到：“7月3日至5日以后，只能说夺取政权，而不能说政权转到……我们的任务是领导革命并夺取政权。”

代表大会对这个报告非常满意，未经讨论就通过了。

代表大会在由邵武勉提出的《关于当前形势》的决议中指出：

“我们完全同意党中央的意见，认为革命的当前任务

是召开全俄工兵农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应当夺取全部国家政权，宣布自己为革命的议会，并立即着手实现革命的基本要求。

大会并没有忽略这样一点：如果不经过战斗，资产阶级和它的奴仆们，克伦斯基、策烈铁里以及过去和现在的所谓社会主义者部长们是不会让出自己的阵地的。

但是，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的革命代表不应该因为困难和牺牲而停滞不前，应该勇敢地去夺取政权，挽救国家，挽救革命……”

全高加索边区党代表大会关于解决立宪会议选举运动所需经费的决议，也许是令人感兴趣的。进行选举运动需要钱，而且需要不少钱。出版专门的书刊，印刷宣传画和传单，派遣宣传员和鼓动员到边区的各个城市和农村去都需要钱。

看来，需要稍微离开一下正题，至少简单谈一谈当时我们党的经费情况是多么的困难。

除了党费和当时我们组织的收费讲演会所得的微薄收入之外，我们再也没有别的经济来源了。

谈到我们党的经费如此匮乏的情况，我不禁想起米哈·齐哈卡雅的一件往事。齐哈卡雅从瑞士回国后来到梯弗里斯，只得安排他住在祖巴洛夫养老院，因为那里的食宿是免费的。

9月底，我们在梯弗里斯党委会上提出从党的现金中拨给齐哈卡雅少量的补助金，以便使他能够离开那个

养老院。

但是，齐哈卡雅一向谦虚朴素、在金钱上十分克己，终于使我们未能说服他接受这笔补助金。齐哈卡雅知道我们的金库拮据，因此坚决表示，他不能因为他个人增加我党在财政上的负担。因此拒绝接受补助，也不需要任何补助，因为“他对现在的物质条件已经感到很满意”。

不论我们的劝说也好，请求也好，都不能改变他的态度。梯弗里斯党组织那时的财政状况确实是非常困难的，而这一点齐哈卡雅是很了解的。这样他就一直住在养老院里，直到1919年年中篡夺了政权的孟什维克逮捕了他，并把他关进库泰依斯监狱里为止。

因此，当提出了为立宪会议选举运动筹款的问题时，边区党代表大会很自然地需要做出关于增加党的财政收入的专门决定。

当时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全体党员拿出自己一天的工资作为党的经费。此外，开展自愿捐助的专门筹款，扩大开展收费的讲演会和音乐会，并把其收入全部拨作党的经费。同时，大会还通过决议，将我们所有收入的一半作为专门基金上交党中央，用来在全国开展选举运动。

1917年10月8日，当我们边区党代表大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与会代表以万分激动的心情给列宁拍了致敬电：“当此闭幕之际，高加索社会民主党（布尔什维克）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向俄国革命的光荣领袖、第三国际的

杰出代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精力充沛的战士列宁同志致以热烈的敬礼……

代表大会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俄国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民将进行一场新的革命，以摆脱米留可夫之流和他们的走狗克伦斯基之流的枷锁，并为列宁同志摆脱地下状态创造条件，公开宣布为我党的领袖，伟大俄国革命的领袖。”

* * *

那时，特别是在建立“斯巴达克”青年团的时候，我曾不得不多次在工人和士兵大会上，以及在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的集会上发表演说。

护国主义思想在士兵群众中开始削弱。在克伦斯基宣布发动进攻，随即遭到可耻的失败以后，这个过程更加快了。临时政府宣布在前线执行死刑，这在国内，特别是在士兵中间不能不引起公愤。

9—10月间，几乎在所有的士兵集会上，在同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就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论中，布尔什维克都占了上风。

我记得，每当高呼“打倒使资本家发财、使国家贫困的帝国主义战争！”“立即停止战争，签订不割地、不赔款的公正的和约！”“打倒推行俄国资本家及其外国主子政策的克伦斯基政府！”等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口号时，会场上到处是热烈的欢呼声。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在会上几乎没有异议，总是

不费力就被一致通过。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则象挨过打的狗似的溜出会场。

有一次，在士兵大会上进行辩论时，我没有能在农民出身的士兵非常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即土地问题上，获得多数票。无论我怎样努力想使士兵相信我们布尔什维克土地国有化的纲领是正确的，但社会革命党的鼓动者还是把他们的决议塞给了大会。

社会革命党人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用他们一贯的蛊惑人心的手法进行宣传，要求“土地社会化”，把土地交给农村公社；说什么不管是什么样的国家，对农民来说都是遥远的，因此，农民应该拒绝接受布尔什维克关于把土地国有化即把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建议，而争取土地转归农村公社。应该说，他们这一套蛊惑人心的宣传给政治上不太成熟的士兵以强烈的影响，所以我在那次会上失败了。

这次失利使我感到很苦恼。我决定去找深受我们尊敬和热爱的米哈·齐哈卡雅，向他求助。我知道，齐哈卡雅是一个学识渊博、享有崇高声誉的革命家，是列宁的战友。我觉得我对土地国有化的正确性是坚信不疑的，但我却不知道、不善于找到恰当的语言和论据来说服穿着军装的农民，使他们相信我的立场是正确的。

我把这些情况都告诉了齐哈卡雅，请求他在士兵集会上就土地问题作演讲，以便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鼓动员、宣传员有机会向他这位老练的、经验丰富的党的宣传

家学习，学习他是怎样捍卫我们党的土地纲领的。

齐哈卡雅欣然同意了 my 建议。

我们把士兵召集在营房附近的俱乐部大楼里开会。

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齐哈卡雅正象一般所说的那样，情绪高昂，他善于吸引全体听众的注意力。

他讲得慷慨激昂，十分热烈，讲到协约国，讲到反对战争，甚至还讲到古希腊。他讲得津津有味，但是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没有提到土地问题。

大会在一片热烈的欢呼声中结束了。士兵们很满意。齐哈卡雅也很满意。而我却有点儿不好意思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及土地问题，其实我们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召开这次大会的。

应当说我们大家都热爱米哈。他是一个纯洁无瑕，富有革命良心的人，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深受大家的尊敬。他参加了历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除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外），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是国际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曾当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于 1950 年逝世，终年八十五岁。

我还是继续谈那些日子所发生的事件吧。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甘心情愿地去接受自己在那次大会上的失败，并且不屈不挠地去寻求摆脱这种困境的办法。

于是，我决定稍微改变一下对待士兵的策略。我决定把自己发言的重心转到要求农民委员会立即夺取土地

这上面来。因为大家都知道，社会革命党拖延解决土地问题，要等立宪会议来审理这个问题，他们反对立即夺取土地。

在第二次士兵大会上我就采用了这样的策略。我对士兵们说：“你们许多人赞成社会革命党的土地政策。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你们是支持他们的。但你们为什么不问一问他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临时政府已经有几个月了？他们说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在立宪会议上会通过土地转归农民所有的法律，他们拿这个空口保证来愚弄你们又有几个月了？为什么农民应该在地主的奴役之下进行等待呢？今天咱们先不要争论农民的土地使用制应当是怎样的，今天的主要问题不在这里。

布尔什维克正在为实现列宁提出的‘立即夺取地主土地并把土地转归农民委员会所有’的口号而斗争。我们布尔什维克反对推迟到立宪会议去解决土地问题。社会革命党人不同意我们的观点。

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土地问题上的主要分歧所在。

今天的问题就是这样摆着：是农民现在立即夺取土地？还是把这个问题推迟到遥远的未来，等到‘立宪会议’耗费不知多少时间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再就这个问题通过一个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法律？

因此，今天咱们不要争论土地国有化还是土地社会化的问题，——当土地实际上已归农民委员会所有时，我

们就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讲完这一番话后，从士兵的神色和欢呼声中可以清楚看出，他们的思想感情已经发生了应有的变化。对于社会革命党人来说，我的这一策略是突如其来的：他们显然惊慌失措，无言以对。

布尔什维克的决议以多数票获得通过。士兵们不再理睬社会革命党人了。

在战争、和平和土地问题上争取到多数士兵以后，我们就不难引导他们反对克伦斯基政府，为苏维埃政权、为工农政府而斗争了。

截至1917年9月底止，不仅梯弗里斯卫戍部队的多数士兵，而且整个高加索战线的部队和各卫戍部队的多数士兵都站到了布尔什维克方面。士官生和军官学校、前线军事机关的工作人员、个别分队以及几乎所有的军官还是支持孟什维克的。

士兵群众准备用武力在高加索建立苏维埃政权。在当地居民中间，力量对比则有所不同，对我们是很不利的。

除了大的工人中心区——巴库（在那里，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初期政权就已转归苏维埃）之外，在其他地区，无产阶级的力量还是很薄弱的。

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西部地区农民加强了夺取土地、反对地主的斗争。

巴库无产阶级具有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城市和农

村都有一些紧跟布尔什维克的少数积极分子（尤其是苏维埃政权在俄国取得胜利之后），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有利因素都调动起来，依靠俄国军队中倾向于革命的士兵这支巨大的武装力量的支持，就完全有可能也在南高加索建立没有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分子参加的苏维埃政权。这样就能够把那些还处于动摇状态的城乡群众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借以巩固边区的苏维埃政权，以便在俄国士兵即使回乡之后，边区苏维埃政权在中央苏维埃政权的支持下，也依然是坚不可摧的。

换句话说，在十月革命期间以及在十月革命之后最初一段时间里，当时形成了可以在整个南高加索地区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相当有利的条件。

“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炮后的第三天，高加索边区党委会以多数票（但邵武勉没有参加，他当时在巴库）通过了一份特别呼吁书，呼吁书中规定边区党组织的目标不是夺取政权，而是使政权“无痛苦地、和平地转归”苏维埃，虽然在边区当时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的条件。

拥有八万士兵的梯弗里斯卫戍部队以多数票选举产生的、由布尔什维克库兹涅佐夫领导的士兵代表会议拥护彼得格勒苏维埃，并要求地方政权机关承认苏维埃政府。代表会议把越来越多的部队争取到自己这方面来，对梯弗里斯军火库武器的分配实行监督，并为达到革命的目标准备进行武装的游行示威。孟什维克控制的梯弗里斯苏维埃的头目们对卫戍部队的这一革命机构立即持

反对的态度，并决定解散这个机构。由库兹涅佐夫领导的梯弗里斯苏维埃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对苏维埃的这一决定表示强烈抗议，宣布布尔什维克退出梯弗里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并警告苏维埃的领导，如果执行委员会采取任何解散卫戍部队代表会议的措施，代表会议都将坚决予以回击。

我还记得在边区党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情况（我虽然不是边区党委会委员，不过作为梯弗里斯党委会的秘书，我参加了那次会议）。

主张政权和平过渡的人以马哈拉泽为首，他们坚持要解散代表会议，并取消武装的游行示威。

齐哈卡雅动摇了。起初他赞成革命的策略，但后来，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在决议付诸表决时，他弃权了。我们这些年轻共产党员本来对齐哈卡雅抱有很大希望，但他的这一行为却使我们大失所望。

孟什维克利用布尔什维克边区党委会关于和平过渡的错误决议，利用它对士兵代表会议的意义以及俄国革命的军队对南高加索革命的前途的作用估计不足，开始大肆活动。他们企图把一些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军队从梯弗里斯排挤出去，并阻挠从前线回来的革命的部队开进梯弗里斯：他们干脆让这支部队走一条远离梯弗里斯的路线，而不让他们顺路进城。他们组织了一支民团，并和边区的地主和资本家结为联盟来加强反革命力量。

在处理由梯弗里斯卫戍部队七十六个部队的代表所

组成的、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会议与孟什维克控制的梯弗里斯苏维埃之间的冲突中，在这决定南高加索革命前途的关键时刻，边区党委会大多数委员没有能采取正确的策略路线。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边区党委会研究了边区的形势，并满足于孟什维克在口头上向布尔什维克所作的一些“让步”（改选梯弗里斯苏维埃，召开第二次军队代表大会等），便在1917年11月11日宣布“代表会议的作用……已告完成”，并“鉴于冲突已经和平解决”，决定召回出席代表会议的全体布尔什维克代表，从而预先就决定了这一革命机构的命运，而这个革命机构为争取在边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本来是可以起决定性作用的。于是，边区党委会在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进行的斗争中便失去了唯一强大的武装力量。

在这件事发生后的第二天，孟什维克在宣布梯弗里斯全城处于战时状态后，便武装进攻并占领了由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守卫的军火库。他们用夺来的武器武装自己的军队。

列宁如何对待这一系列事件，是令人很感兴趣的。1917年12月，边区党委会派克·增查泽到彼得格勒向列宁汇报南高加索的情况。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关于这一点写道：

“当我提到军火库，并说明军火库已经被孟什维克占领的时候，他（列宁）打断了我的话，反问道：‘就是说，把军火库让给孟什维克了？’我想说明原因，解释一下究竟

是怎么回事,然后再继续汇报。但他又打断了我的话,再一次问道:‘军火库到底还是交给孟什维克了?’列宁从这件事中清楚看到了边区党委会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邵武勉在这一紧急关头来到梯弗里斯,并立即积极为维护革命的策略而斗争。他运用巴库布尔什维克的经验,终于纠正了边区党委会的错误路线,他提出发动劳动人民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反对南高加索委员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权,他号召依靠梯弗里斯卫戍部队的和整个高加索的革命的俄罗斯军队。

边区党委会中出现了分歧,邵武勉不得不于11月23日打电报给列宁:

“我们已向反革命的南高加索委员会^①宣了战。卫戍部队的大部分士兵是拥护我们的。我们能够借助军队的支持迫使委员会承认人民委员的苏维埃政权。下一步怎么办,请速电告。”

未收到列宁的回电。

11月25日邵武勉又给列宁拍了一封内容大致相同的电报,还是没有收到列宁的回电。

在当时要纠正边区党委会的错误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梯弗里斯和南高加索有一支相当强大的武装力量——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俄国军队。

^① 南高加索委员会——是1917年11月社会革命党、达什纳克党和木沙瓦特党在协约国帝国主义支持下建立的反革命机关。——译者

邵武勉发电报是想依靠中央委员会和列宁迫使边区党委会放弃它的错误的方针，并确保苏维埃政权在高加索取得胜利。

但邵武勉没有想到他的电报被孟什维克截获，而没有送到列宁那里。

于是邵武勉派卡莫带着他的信去见列宁，而他自己则动身到巴库去了。

卡莫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完成了邵武勉的委托。一个月之后，他带着任命邵武勉为高加索特派委员的委任状回到梯弗里斯。

1917年11月底，邵武勉准备去巴库时，他劝我也回巴库。苏维埃政权在巴库已经取得了胜利，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来巩固苏维埃政权。

告别的时候，邵武勉一再劝我说：“回巴库去吧！”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不久便到巴库去了。

在巴库公社的日子里

苏维埃政权在巴库的胜利

政权转归巴库苏维埃；1918年3月反革命暴乱及其被镇压；巴库人民委员会的成立；争取农民的斗争。

1917年9月巴库石油工人在阿廖沙·查帕里泽和万尼亚·费奥列托夫的领导下成功地举行了巴库石油工人总罢工之后，布尔什维克在巴库无产阶级中的影响大大扩大了。这次斗争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即工人们同资本家达成了一个集体协议，协议中包括规定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1917年10月15日召开了巴库苏维埃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包括厂矿委员会、团队、舰艇、连队委员会的代表。多数与会者都已站到了布尔什维克以及支持他们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方面。

邵武勉向大会建议把这次会议宣布为巴库工兵代表临时扩大苏维埃，因为早先选出的巴库苏维埃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孟什维克的头目萨多夫斯基反对邵武勉的建议，声称这次会议与苏维埃毫无共同之处。但是，邵武勉

的建议得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人苏哈尔采夫的大力支持。他说这次会议完全有权这样做，因为以前组成的苏维埃已无法召集，而本次大会有充分的权威来表达巴库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士兵的意志。表决时邵武勉的建议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

选出参加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后，巴库苏维埃通过了邵武勉起草的一项决议，要求“夺回被人民的敌人所窃取的权力，并把它交给以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为代表的人民”。

1917年10月26日，彼得格勒革命力量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在俄罗斯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的消息传到了巴库。

布尔什维克听到这个消息都欢天喜地。第二天就召集了巴库苏维埃会议。但是在这次会上，拒绝承认苏维埃俄国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破坏了把地方政权转交给巴库苏维埃的决议。

于是巴库党委会直接向巴库工人发出号召，号召他们起来纠正上述错误，作苏维埃政权的“坚强后盾”。各厂矿及部队纷纷举行群众大会，通过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决议。

1917年10月31日巴库苏维埃会议上，经过与右派政党的尖锐斗争，终于通过了如下决议：“与资产阶级和卡列金分子相反，巴库苏维埃支持正在全俄诞生的新政府，并认为在巴库地区必须扩大苏维埃的权力，直至把全

部政权转归苏维埃。”

1917年11月2日，再次召开了苏维埃会议。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为表示抗议，号召他的追随者——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退出会议。四百六十八名到会者中有一百二十四人退出。这些退出的人不久就组织了一个所谓“社会治安委员会”，与巴库苏维埃相抗衡，并妄图把这个“委员会”装扮成似乎是唯一民主的地方政权机构。

这样，在巴库苏维埃中就只剩下了布尔什维克和当时同他们结成联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无党派人士。

根据邵武勉的建议，苏维埃选出了能够执行苏维埃政权路线的新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决定解散当时作为临时政府地方机构的“社会团体执行委员会”；还决定卫戍部队的一切武装力量均归巴库苏维埃领导，未向苏维埃请示并得到同意，不得擅自调动它们。

在这次苏维埃会议上，还通过决议，宣布“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是巴库市的最高权力机关”。

这样，在巴库，没有经过武装斗争，就宣告政权转归巴库工兵代表苏维埃了。

十月革命后，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群众中展开了广泛的宣传鼓动工作，揭露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当时把主要精力都用来巩固苏维埃的武装支持力量。在巴库党委所属下，建立了由党员组成的战斗队，在矿区则组

织了赤卫队。苏维埃还拥有里海舰队这样重要的支持力量，该舰队的大部分水兵都是拥护苏维埃政权的。现仍健在的阿尔卡季·库兹明斯基就是当时水兵领导人之一。由旧军队的各种不同部队组成的巴库卫戍部队，大部分也是站在苏维埃一边的。

由于宣布复员并且颁布了把土地交给农民的法令，大部分由俄国中部的农民组成的巴库卫戍部队的士兵开始还乡。从旧军队中留下来的支持苏维埃政权的人日渐减少，最后，就象在其他地方一样，统统散掉了。于是，提出了建立一支新的、社会主义军队的任务。

1918年2月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都开始建立红军部队。巴库党组织当时也面临同样的任务。

但是，在巴库建立武装力量的工作并不是一开始就以应有的规模展开的。只是在高加索边区军事委员会的几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梯弗里斯来到巴库之后，情况才显著好转。（在梯弗里斯他们没有充分的支持力量，因为在那里占优势的孟什维克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领导机关。）这几位同志是：科尔加诺夫、舍鲍尔达耶夫、马雷金、索尔恩采夫、加贝舍夫、科加诺夫、加宁和其他一些同意留在南高加索建立红军的同志。

大约在1918年2月底到3月初，建军工作广泛开展起来。领导这一工作的是在高加索前线士兵中享有崇高威信的老布尔什维克格里戈里·科尔加诺夫。他的副手是鲍利斯·舍鲍尔达耶夫，也是一个革命前就入党的布

尔什维克。

他们的全部工作都是在邵武勉的领导下进行的。

建立了国际营、团和辅助部队，编成了三列装甲列车。士兵主要来源于过去的巴库工人和没有服过兵役的青年。过了不久，舍鲍尔达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截至1918年5月底为止，在巴库地区已征集了近一万三千名红军战士，他们都被编为几个营，组成了四个旅，建立军部的工作已基本完成。

为了培养军队的指挥人员，在巴库建立了一个军官学校，由很有才能的军事组织者，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刚从土耳其前线回来的索尔恩采夫领导。

1918年5月之前，红军中各种民族成分都有。只在面临着德国、土耳其进犯巴库的危急关头，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才建议把亚美尼亚民族部队并入红军。

关于这些民族部队我略谈几句。这个问题的经过是这样的。

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特别是达什纳克党人，为了装扮成“社会主义者”，口头上同意各民族的工人、农民有共同的阶级利益，但同时他们又硬说什么所有的亚美尼亚人，无论属于什么阶级，为了保卫其“共同”利益，应该组成一个单独的民族委员会、民族联盟，应该有自己的单独的军队等等。

当时，在巴库确实有这样一些民族（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委员会。在这些委员会里，木沙瓦特党人和达什纳

克党人依靠巴库石油工业资本家的大量资助，同其他反动资产阶级政党一道，进行猖狂的活动。这些委员会还在巴库建立了由复员的士兵和军官组成的本民族的军队。

我们当时曾不得不费很大的力气向劳动群众说明这些反社会主义的、与无产阶级敌对的“思想”的全部危害。这种思想当时在多种民族聚居的高加索有特别的危险性。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这种政策不是使各族工人、农民加强团结，而是有意地分裂他们，削弱他们之间的阶级联系。

因此，我们坚决反对这种政策。

但是，当1918年5月巴库面临德国-土耳其入侵的严重危险时，我们被迫接受了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关于把亚美尼亚民族部队编入我军的建议，以对付土耳其的武装干涉者。这是被迫作出的妥协，它显然包含着潜在的危险。绝大多数亚美尼亚民族部队的士兵，在同土耳其作战时，打得很好，很认真。许多军官也完全忠于自己的职守。但是在军官当中，特别是高级军官中，还有达什纳克党人。他们是按照他们党的指示行事的。正是他们这帮人，在我军退却期间，扮演了十足的叛徒角色。

阿塞拜疆文的《苏维埃消息报》的出版，对加强苏维埃在阿塞拜疆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推选鲁胡拉·阿洪多夫为该报的编辑候选人是非常适宜的。他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经过一段短期的共同工作，

我和他相处甚好，成了亲密的朋友。阿洪多夫年轻，博学，政治上很开展，坚决拥护苏维埃政权，是一个很好的文字工作者。1919年6、7月间，在英国占领和木沙瓦特党当政时期，他转而加入了共产党，并在推翻木沙瓦特政府的准备过程中起了积极作用。1920年，在巴库恢复了苏维埃政权之后，他成了阿塞拜疆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以后我还要比较详细地谈到他。）

1917年到1919年，报刊上发表了我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刊登在《巴库苏维埃消息报》（俄文版和亚美尼亚文版）、《社会民主党人报》和《巴库工人报》上，后来又刊登在《警钟报》、《工人之路》、《共产党人》等报上。

这些文章差不多都被保存下来了。不久前翻阅这些文章时，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久已逝去的年代，感受到那些年代的气息，听到生活脉搏在那激烈的、复杂的、往往是惊心动魄的日子的跳动……

看来，只要列举一下其中一些文章的题目，便可以知道，哪些问题当时我们最为关注：《前线士兵联欢》、《布尔什维克能够保持国家政权吗？》、《农民民族联盟和高加索的局势》、《不割地赔款的媾和意味着什么？》、《何谓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评前次的罢工》、《集体协议》、《八小时工作制和时局》、《土地问题与南高加索地主反革命势力》、《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与民主》、《资产阶级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的形式》、《工人运动的新任务和方法》、《人民委员会的和平政策》（为捍卫布列斯特和约而作）、《孟

什维克的假仁假义》、《论孟什维克眼中的原则纯洁性》、《人民的保卫者》、《论左派达什纳克党人》、《致马克思主义的叛徒们》、《论石油工业国有化》、《贫困和我们的天职》、《住房问题与资本主义》、《论前线形势与收割》、《工人委员会的文化教育任务》……

这仅仅是那些年间所写的一部分文章。当然，从那时以来社会思想大大地向前发展了，而文章中有些东西在某些方面现在看来似乎已经过时，有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有的甚至根本“不成熟”。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是在一块处女地上前进，简直是摸索着走。当时碰到的很多东西对我们说来都是很新奇的。

然而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度过许多年代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再回过头来检查这些早期的议论，如果历史地来看，在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我们当时是正确的：生活证实了我们大多数的设想、预言和结论。

这一切我们首先应该归功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伟大学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不仅通过他们的著作、列宁的文章和演说，而且还通过日常的斗争和同旧世界势力的殊死搏斗来领会这一学说。

我已经说过，在巴库当时有民族军队，这些军队得到当地资产阶级——通过民族委员会——的慷慨资助。阿塞拜疆的民族武装力量当时组成了一个所谓“野蛮师”。

1918年3月，阿塞拜疆的地主、资产阶级依靠“野蛮师”的支持，发动了反对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暴乱。但是，经过三天巷战，这次暴乱被镇压下去了。

纳里马诺夫、阿齐兹别科夫和查帕里泽当时进行大量工作以求和平解决冲突，也大大促进了巷战的迅速结束。“野蛮师”的士兵和军官溃散了，纷纷投奔阿塞拜疆一些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地区的反革命部队。其中心是叶丽莎白波尔。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之间就曾有过默契：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将以自己的武装力量支持木沙瓦特党策划的暴乱。但是，在暴乱开始后，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宣布中立，等到红军已经胜利在望时，有些亚美尼亚民族军部队甚至站到红军方面参加了战斗。

就在巴库发生暴乱的同时，达格斯坦的伊斯兰教长戈增斯基的反动匪帮向哈齐马斯进犯，并逼近巴库。来犯敌军中有“野蛮师”的一个团，该团参加过世界大战。但当他们离巴库还有十五公里时，暴乱已被镇压，他们未能与暴乱者汇合。两千人左右的红军部队向该敌出击，将其击溃，并把他们赶到离巴库很远的地方。

随后，被戈增斯基占据的阿塞拜疆的地区和达格斯坦的城市迭尔卜特和彼得罗夫斯克（现称马哈齐卡拉）都解放了。从巴库派来与达格斯坦的同志共同作战的红军部队，是由被任命为达格斯坦州特派委员的维克托·纳

涅伊什维利率领的。

由于这一胜利，打开了北高加索和巴库之间的陆路交通，而这对于向巴库受饿的居民运送粮食是非常需要的。邵武勉把红军在达格斯坦的胜利进军的消息特地报告了列宁。

后来，在巴库以南的主要产粮区连科兰和萨利扬，都曾发生了反动叛乱。但红军部队一到，叛乱很快就被平息了。

我在三月的巷战中负了伤，住进了野战医院。邵武勉得知我很快就要出院，但仍然没有住处（我先前已说过，在此以前，我不得不在巴库党委会办公室里住宿），他就坚持要我搬到他的新居去住。这样，我在邵武勉那里实际上就成了他的一个家庭成员，住了很长一段时间。这使我有机会经常和邵武勉以及来找他的人接触。这种接触通常是在夜间。因而我知道了很多在其他条件下了解不到的党和国家的大事。这对我政治上的成长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 * *

三月暴乱被镇压之后，巴库苏维埃政权更加巩固了。妄图夺取政权的巴库市杜马威信扫地：民族委员会的影响显著削弱，它们的活动也被巴库苏维埃控制了起来。对石油资本家采取了弹压措施。这些措施之一就是巴库革命保卫委员会要石油工业资本家付五千万卢布的赔款。在当时这是一笔很大的款子，我们非常需要用这笔

款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石油工业资本家不肯交纳这笔款。于是，党委会决定逮捕巴库石油界的几个知名人士。我受党委会的委托逮捕在石油工业资本家联合会里起领导作用的三个著名的石油工业资本家：列斯涅尔、塔基阿诺索夫、古卡索夫。邵武勉的长子苏连（后来他成为苏联坦克部队的组织者和军事指挥员之一）参加了这次行动。

记得，我们要了一辆小卡车，带着两、三个赤卫队员来到列斯涅尔住的两层楼房。他这个独家住宅座落在尘土很多很脏的一个巴库工人区。周围是杂乱无章的贫苦工人的茅草房，茅草房的前后左右连一棵小树都没有。而列斯涅尔的宅邸则在绿荫如盖的花园深处，花园里种着各种美丽的观赏树木、灌木丛和花卉。所有这一切更加鲜明地反映了当时贫富的悬殊……

事情发生在傍晚。住宅的正门已经关了。我们是从后门进去的。列斯涅尔是个胖子，保养得很好，他正躺在床上。显然他早料到他会被捕，所以我们的到来并没有使他感到惊奇。我们把他放在卡车上，车里连个座位都没有。我们的小卡车在崎岖不平的、用鹅卵石铺的巴库马路上行驶，把列斯涅尔颠得够呛，这使我们很开心。

其他的巴库石油巨头大体上也是这样被我们逮捕的。这样一来见效了：当天夜里，他们就命令公司如数交纳他们应付的罚款。

巴库三月事件之后，所有资产阶级政党的报纸，以及

孟什维克的报纸都被关闭了。其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则继续出版,这些政党继续在活动。

当我们工作顺利进行的时候,这些政党没有给我们造成特别的危害,但粮食问题一紧张,他们就利用居民的不满情绪来跟我们斗。

民族主义政党使南高加索脱离苏维埃俄国之后,局势复杂化了。苏丹土耳其违反根据布列斯特和约所承担的义务,把军队开进了南高加索,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红军在土耳其军队的进攻下撤到了巴库。于是右派政党就提出了邀请英军来巴库的问题。

矛盾极度激化。象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一样,我们寸步不让,给同我们争辩的其他政党的代表以应有的还击。

巴库党组织正面临极其复杂的任务。要尽一切可能保卫巴库苏维埃政权,要在整个南高加索,至少要在阿塞拜疆普遍建立苏维埃政权。

在这方面,列宁给邵武勉的关于我们当时应该执行什么样的政策的指示具有特殊的意义。列宁写道:“亲爱的邵武勉同志!

多谢您的来信。我们对您采取的坚定而果断的政策感到非常高兴。善于把这种政策同审慎的外交策略结合起来(这无疑是由当前极端困难的情况所决定的),我们就会取得胜利。

困难重重。目前只有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冲突

和斗争才能解救我们。要善于利用这些冲突：现在就要学会运用外交策略。

致衷心的问候和最好的祝愿，并向所有的朋友问好。”^①

我在前面提到，当政权刚刚转归巴库苏维埃的时候，以孟什维克波格丹诺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就退出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表示抗议。但是他们很快就“搁浅”了，不得不重新回到苏维埃并参加其工作。

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由于成分复杂，执行委员会在社会主义改造方面没有能力采取激进步骤，也无法对反动分子进行有效的反击。

因此，巴库工兵代表苏维埃于1918年4月组成了只有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巴库人民委员会。尽管右派政党的代表竭力要钻进人民委员会，但他们未能得逞。

邵武勉被任命为人民委员会主席，查帕里泽、纳里马诺夫、科尔加诺夫、费奥列托夫、科列斯尼科夫、维齐罗夫、泽文、卡里尼扬等人被任命为人民委员。巴库省人民委员阿齐兹别科夫担负了在巴库省建立村苏维埃，换句话说在阿塞拜疆农村巩固苏维埃制度这一极为艰巨的任务。

为了把农村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我们着手组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25页。

织巴库工人同乡会。巴库的工人来自各个县，有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达格斯坦人和其他民族的人。早在1918年1月就成立了国际工人同乡会联合会临时委员会。我被委派参加了这个委员会的一些组织会议，并在国际工人同乡会的会议上发了言。

这个组织的主要任务就是和自己的同乡建立经常的联系，并积极影响他们，以便动员他们参加反对地主、夺取土地、组织农民苏维埃的斗争。

德国-土耳其军队进犯巴库的威胁，十分尖锐地提出了把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别克^①、可汗、木沙瓦特党人和反动宗教界影响下的阿塞拜疆基本农民群众争取到苏维埃政权方面来的问题。尽管这里的农民政治上普遍落后，但他们和地主之间的经济矛盾十分尖锐，所以夺取政权、消灭地主压迫的阶级斗争在日益深入发展。哈萨克县和卡拉巴赫的阶级搏斗尤为激烈。

列宁颁布的关于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法令也唤醒了阿塞拜疆的农民群众。

1918年4月，巴库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把所有地主的土地归还给农民的法令，同时订出措施把这项法令用阿塞拜疆文散发到各县、各村。巴库苏维埃还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农民中进行工作。

^① 别克——是中亚和南高加索突厥族的封建土地所有者。
——译者

当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古墨特”在阿塞拜疆农民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古墨特”的组织者和著名的活动家有纳里马诺夫、阿齐兹别科夫、埃芬吉耶夫以及苏尔塔诺夫、布尼阿特-扎杰、伊斯拉菲尔别科夫等人。它的总负责人是纳里曼·纳里马诺夫。但是因为他患病，我们不得不早在1918年6月就把他送到俄罗斯去医治。

1918年5月底，在阿齐兹别科夫的积极参加下，召开了巴库县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是在纳里马诺夫主持下进行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查帕里泽、邵武勉、纳里马诺夫和阿齐兹别科夫发表了讲话。随后，召开了巴库苏维埃和这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代表大会代表加入巴库苏维埃，使巴库苏维埃成为工农代表苏维埃，并且还决定在全省各县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然后召开全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这方面的工作开展得不错。阿齐兹别科夫领导的谢马哈县以及不久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库宾县、萨利扬县、连科兰县工作进行得特别顺利。但是由于战局紧张，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未能召开。

邵武勉从梯弗里斯返回巴库，一路上他看到了前此我们所未闻的广大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对地主起义的事实。后来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谈到了它们。农民夺取了土地，烧毁了地主的庄园。斗争的形式往往是相当残酷的，这反映了农民对地主压迫者世代结下的深仇大恨。但在叶丽莎白波尔省，缺乏布尔什维克的干部来组

织和领导农民运动。因而地主借助于开到叶丽莎白波尔的土耳其正规部队，把农民暴动镇压了下去。

回忆起这段时间，我想谈一谈我们的非常热情的革命者麦沙吉·阿齐兹别科夫。他是一个经验丰富、很有素养的党的活动家。他外貌有好多地方象阿廖沙·查帕里泽，甚至他的性格也象阿廖沙那样，是个热心肠的、急躁的人。麦沙吉是个热情的革命者，他的热情，甚至带有革命狂热（要从好的意义理解“狂热”这个词）的色彩。他一直在人民中间，一个村一个村地进行鼓动和组织农民的工作。麦沙吉随时都有被木沙瓦特党人和地主杀害的危险，但这并不能阻止他或使他畏缩不前。甚至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他仍然是乐观的，并且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必将取得胜利。麦沙吉很自然地得到了群众的爱戴和尊敬。邵武勉、查帕里泽和其他同志……同麦沙吉之间的那种极端诚挚、亲密无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那种充分谅解和信任，给了我们特别深刻的印象。

记得巴库党组织对那些最迫切的全局性的和地方性的问题，经常展开很热烈的讨论。会上大家就所讨论的问题经常是针锋相对地、坦率地发表不同意见。常常出现尖锐的分歧和激烈的争论……但是我不知道有谁对已通过的决议表示异议的事。甚至是在讨论时持反对意见的人，都努力特别认真地执行决议，力求使自己的立场不致于间接地影响贯彻决议的进程。党组织内部充满着遵

守布尔什维克纪律的精神。

有这样一个很典型的事例：1918年2月，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要求，在巴库苏维埃的会议上要讨论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他们进行疯狂的煽动反对这个和约。会议的前夕巴库党委会曾讨论过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支持列宁路线赞成签订和约的邵武勉，这时正在梯弗里斯。除了邵武勉，党组织里最有威望的是查帕里泽。当时他是巴库苏维埃主席，是反对签订和约的。其余的人当中积极发言表示拥护签订和约的有维克托·纳涅伊什维利和我。最后以多数票通过赞成党的和平政策的决议。查帕里泽处于少数。因此他说，他对在巴库苏维埃的会议上发言捍卫布列斯特和约不仅感到困难，而且也不方便。所以他请求让支持布列斯特和约的其他同志去发言。但是我们大家一致反对这样做，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查帕里泽不出来发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一定会猜想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党内意见不一致，巴库苏维埃主席不支持布列斯特和约，这样我们就可能彻底失败。

我们委托查帕里泽在巴库苏维埃的会议上发言，捍卫苏维埃政府关于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政策。

只有出席这次苏维埃会议才能亲眼看到和亲耳听到，查帕里泽在会上是以多么有力的论据出色地捍卫了列宁的和平政策！不能不看到，查帕里泽在考虑自己的发言时，已确信列宁的立场具有不可违抗的逻辑性，从而在

很多地方改变了他自己原来的观点。查帕里泽的发言给苏维埃全体代表以很大的影响。很多人,甚至动摇的人,都支持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决议,该决议当时以大多数票获得通过。

除了就列宁的和平政策进行了一场辩论之外,当时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也辩论得非常激烈,即: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之外,是否让右翼社会主义政党(巴库苏维埃有他们的代表)的党员参加巴库人民委员会?巴库党委会中多数人是反对这样做的。

在巴库党委会做出决议之后,我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我们剥夺了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巴库人民委员会中的代表权》。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只有那些真诚地始终不渝地捍卫苏维埃政权”,并且不只是口头上承认苏维埃政权,而且“能够贯彻苏维埃政策”的政党的代表才能参加人民委员会。

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妄图在人民委员会取得代表权的达什纳克党人和右翼社会革命党人不可能是苏维埃政权的始终不渝的坚强的捍卫者,因为直到目前,他们还在“疯狂地、不择手段地反对苏维埃政权”。下面的事实就是证明:“十月革命后,由于宣告成立巴库苏维埃政权,他们退出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他们在巴库市杜马中对苏维埃采取两面政策;由于解散立宪会议,他们疯狂反对苏维埃政权和工农政府……;他们不顾他们以前所作的声明,……参加了南高加索委员会和议会。南高加索委员

会和议会推行使南高加索脱离苏维埃俄国的政策，向苏维埃俄国的阶级敌人(卡列金将军等)提供种种援助，使军队民族化；他们不但不感激俄罗斯军队把他们从多年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反而解除从前线归来的俄罗斯军队的武装，对他们进行血腥的屠杀，并且组织别克反革命势力来反对巴库苏维埃”。

这篇文章给右派政党，即公开的资产阶级政党，要在巴库人民委员会中窃取代表资格的企图以尖锐的，但完全公正的抨击。同时，文章完全没有透露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存在分歧，虽然几个著名的很受大家尊敬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是反对党组织的路线的。

巴库党领导机关中进行的争论并未导致对党的纪律和同志式的气氛的破坏。这些争论，即使是十分激烈的争论，都不仅丝毫没有影响我们之间的工作关系、政治关系，而且甚至丝毫没有影响私人关系。所以无论讨论什么有争议的问题，都未因此而在党内产生任何集团或派别。当然，有时这些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就解决，而是经过党内长时间的讨论才解决的；但这些问题从不在报上披露。共产党员把执行多数人通过的决议看做是自己的义务；这一点无论是对赞成决议的，还是反对决议的人，都是同样适用的。

记得有一次在解决石油工业问题时，查帕里泽表示怀疑。当时邵武勉建议他在开采区中心萨邦奇召开各开采区共产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并在会上把赞成和反对国

有化的两种观点加以说明，了解一下石油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后来事情就是这样办的。

我和当时也是青年共产党员的果戈别里泽决定一起去参加这次会议。

会上的发言都是心平气和，实事求是，论据充分，原则性很强的。总之，使人感到大家到这里来是和共产党员们商量问题的，没有人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会议。

几乎所有后来发言的共产党员都赞成国有化，并列举了一些关于国有化的自己的补充论据。会议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实际上也不需要什么决议了。

在巴库党代表会议上，查帕里泽已和大家一起投票赞成石油工业国有化了。他的一切怀疑和犹豫在萨邦奇会议上看来都消除了。

我举这一事实作为补充说明，以便再一次强调邵武勉和查帕里泽的出色的、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列宁式的工作作风。整个巴库党组织正是用这种精神培养起来的。

巴库共产党员团结一致，忠于列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党的纯洁无瑕的诚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教养，列宁式的坚定的思想性，而这些就是邵武勉、查帕里泽、阿齐兹别科夫、纳里马诺夫、费奥列托夫等巴库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全部生活和工作作风的特点。巴库其他许多党的工作者，还有普通党员都以他们为学习的榜样。

对于我个人，一个当时还是青年的共产党员（当时我

还不满二十三岁)说来,这是一所受布尔什维克教育的非常宝贵的学校。

公社的初期活动

银行和石油工业的国有化;比切拉霍夫的部队;
外国开始武装干涉南高加索;我前往前线。

三月事件之后约三个星期,巴库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提出了关于银行国有化的问题。我受苏维埃人民委员会的委托,负责执行将俄罗斯对外贸易银行收归国有的任务。参加这次行动的小分队的成员有邵武勉的次子列瓦,当时他是十四岁的少年。(现在是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第一副主编。)

说实在的,在这之前我虽然读过德国著名经济学家希法亭写的《金融资本》一书,但我对于金融和银行的了解还是十分笼统的。我自己没有到银行去过,因为没有这种需要。不过银行的专门保险柜里放着大量钱财,这一点我当然是清楚的。

回想起,在指定的时间,我和一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带着手枪,准时来到了银行。我们把住了所有的出入口,走上二楼。我们一看有很多人坐在一个大房间里,正在卖力地写着什么,啪啦啪啦地打算盘。我们一进去就命令他们:“站起来,举起手!”叫来了经理。我问他:“你们的保险柜在哪儿?”他把我带到保险柜跟前。我让他把保

险柜打开。他回答说：“我打不开。保险柜有两把钥匙，一把在我这儿，另一把在行长那儿。只有我们俩人一起才能打开保险柜。”开头我认为，这个经理简直是不服从新政权的代表，我发了火。但后来我相信了他的话。我看了看周围，似乎没有什么异样，于是，我就让银行办事员们坐下继续办公。我留下一个人民委员和几个队员，自己就走了。银行的保险柜都上了封条，后来才打开。经过清点，苏维埃政权接收了银行的全部钱财。

巴库其余的银行也是这样被收归国有的，整个巴库城约有十家银行。

当然，不能说银行的国有化是风平浪静的。曾遇到顽强的抵抗、愤怒的抗议，巴库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还收到过恐吓电报……但是所有这些阻挠最终都被克服了。

巴库石油工业国有化是怎样实现的呢？应当说，从1918年2月以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巴库党的代表会议和巴库党委会会议上多次讨论的议题。这个问题的倡议人，通常是邵武勉。关于这个问题在共产党员中曾进行过十分激烈的辩论。一些领导同志担心国有化会降低石油产量，而苏维埃俄国急需石油。他们认为，工程技术人员和石油工业管理人员会追随他们的厂主，反对国有化并实行怠工，而我们当时又几乎没有自己的工程技术干部。

巴库石油工业国有化的问题对全国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的命运，事实上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当时从巴库运出多少石油。邵武勉曾多次同列宁商量过这个问题。列宁支持邵武勉关于立即实行国有化的决定。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相应的决议。但是石油公司的代表们却坐在莫斯科进行相应的“工作”，其中包括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专家也进行了“工作”。于是这些专家便威胁说，如果实行国有化，石油工业必然垮台。企业主们利用石油国有化被拖延的时机，千方百计地暗中破坏石油的供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采取实际措施，也没有就这个问题给巴库任何指示。不仅如此，还收到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关于暂缓国有化的电报，而石油管理总局发来的电报实际上取消了国有化。

一向冷静、沉着稳重的邵武勉，这次也忍无可忍了。他不得不给列宁发了如下的电报：“……这样的政策是我们所不理解的，并且是极端有害的。我已经提出过抗议，现在我再重复一遍——我坚决抗议。已做之事，而且做得很好，是不能再退回去的。这些电报只能引起混乱。我请求您亲自进行干预，以免给工业带来严重后果。”

1918年5月，虽然尚未接到莫斯科关于国有化的法令，巴库党代表会议还是决定立即对石油工业实行国有化。

党代表会议之后，巴库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的决议。成立了巴库国民经济委员会，整个石油工业也划归该委员会领导。与此同时，人民

委员会还把主要是往阿斯特拉罕运送石油的里海商船队收归国有。

万尼亚·费奥列托夫被任命为巴库国民经济委员会的领导人。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多年来一直是石油工业工会的领导人之一。顺便说说，费奥列托夫最初也是反对石油工业国有化的。但是，国有化问题一旦最后决定下来，他就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项工作。这就更加博得了我们对他的尊敬和爱戴。

对石油工业国有化会导致石油开采量和输出量下降的种种担心，都被证明是没有道理的。相反，石油开采量并没有下降，而石油输出量——这在当时是特别重要的——却大大增加了。

* * *

1918年春天，我们得知在伊朗有一支由拉扎尔·比切拉霍夫上校率领的、北高加索哥萨克组成的组织良好的军队，他们作为俄国远征军的一支部队参加了打土耳其人的战斗。这支部队是从英国人那里领取军饷的，因为整个俄国远征军的费用先由英国人支付，过后再同俄国政府结算。

比切拉霍夫通过各方人士，多次请求让他的一千五百余人全副武装的部队有秩序地从伊朗撤至巴库。他说，虽然他不懂得苏维埃，也不想干涉我们的国内政策，但是他准备同土耳其-德国军队作战，并且拥护中央苏维埃政权，因为除了苏维埃政府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力量能

够保卫俄国了。

1918年5—6月间,就这支部队的问题进行了谈判。比切拉霍夫是不是英国的间谍,让这样一支庞大的、有组织的队伍进入巴库是否会引起危险的后果,有不少根据使人这样担心。

邵武勉就这个问题多次写信给列宁,表示他的怀疑,并把现有的有关情报报告给他。另一方面,邵武勉又表示希望得到这样一支有力的武装的支持。加之,我们不断得到消息说,比切拉霍夫部队的军心越来越倾向于苏维埃俄国。经过长时间的犹豫、考虑和谈判,终于肯定了这样的意见,即接受比切拉霍夫还是比较正确的。比切拉霍夫储备有当时巴库迫切需要的大量武器和军用物资,这种情况促使我们作出这个决定。

邵武勉就接受比切拉霍夫的问题征得列宁的同意之后,于1918年6月在巴库苏维埃的一次会议上作了汇报。

邵武勉当时还宣读了比切拉霍夫发来的最后一封电报:“由人民委员科尔加诺夫提出的你们的所有条件我之所以接受,并不是因为我想得到什么重要的职位,而是因为我认为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拯救俄国,苏维埃政权是正确的。我不相信立宪会议或全俄缙绅会议能够拯救俄国,因为没有一个是强大的苏维埃政权,就没有人能把立宪会议或全俄缙绅会议的决议付诸实施。一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行爲,我都认为是罪恶的背叛;对苏维埃政权怠工,我认为是犯罪。我既不追求权力,也不追求显要的职

位。我不懂政治，也不懂社会主义，我没有建设新生活的训练。我是个哥萨克，还会打打仗，懂得点军事，仅此而已。”

邵武勉宣布说，巴库人民委员会和比切拉霍夫的全权代表阿利哈维达成了如下协议：“比切拉霍夫承认全俄的和巴库的苏维埃政权。他被任命为高加索一支红军部队的指挥员，受陆海军人民委员科尔加诺夫的统辖。在作战方面，他可以独立地处理问题，但他的一切命令要经人民委员签署。暂时停止或停止作战，由巴库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决定。部队的战斗任务由司令部批准，由指挥员独立地去执行。比切拉霍夫部队的给养，以及今后可能由比切拉霍夫在北高加索组织起来的一切部队和编入红军的一切部队的给养，均由巴库苏维埃人民委员会负担。”

7月初，比切拉霍夫带着部队来到巴库地区。为了慎重起见，决定不在巴库，而在阿利亚特车站接受他的部队。这样，必要时就有可能立即把他的部队调往前线。比切拉霍夫指挥前线右翼的部队。

在同土耳其人的作战中，比切拉霍夫指挥的部队最初表现得还不错。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红军向巴库撤退，以及右派政党邀请英国人来巴库的宣传得势——使比切拉霍夫的行动发生了变化。他预先不打任何招呼，就把部队往达格斯坦方向撤，造成前线空虚。比切拉霍夫的叛卖行径决定了巴库保卫战的败局。

* * *

1918年夏天，巴库公社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威胁。德国-土耳其的军事司令部为了占领巴库这个油仓，开始向南高加索进军。

必须提及的是，当时在南高加索，只有巴库、巴库城郊以及巴库省的几个县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南高加索的其他地方，都是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阿塞拜疆木沙瓦特党人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人操纵的反革命南高加索委员会的政权统治着。

南高加索委员会对南高加索日益增长的革命高潮怕得要死，于是采取了极端措施，对工人、农民推行残酷的恐怖政策。但是，在幕后操纵这个委员会的各政党很快发觉，委员会的叛卖政策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慨，于是决定采取新的狡猾的手法再一次欺骗劳动人民。1918年2月，他们召集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南高加索议会，但这个议会仍旧是由孟什维克、木沙瓦特党人、达什纳克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组成的。议会成立了以孟什维克齐赫泽为首的他们自己的政府，并宣布南高加索共和国独立，从而把南高加索脱离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的事实在法律上固定下来（虽然事实上南高加索委员会，就是过去也从未承认过苏维埃俄国的中央政权，他们一直在等待布尔什维克垮台，让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政府掌权）。

不久，南高加索议会就公开与德国、土耳其进行谈判和勾结。以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头目饶尔丹尼亚为首的

格鲁吉亚共和国随即宣告成立。德国正式承认了格鲁吉亚共和国，从而违反了根据布列斯特和约所承担的义务。格鲁吉亚政府答应德国军队开进格鲁吉亚领土，并过境向巴库进发。不久，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地主、资本家也相继这样干了，宣布成立自己的国家。

南高加索的布尔什维克开展了广泛的反对议会的运动，以揭露议会的组织者和鼓动者的真实企图。应当指出，这个时期南高加索的共产党组织一般说来都有很大的发展，并在组织上得到了巩固。这大大地促进了人民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

应当指出，除了阿塞拜疆和达格斯坦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泛土耳其主义的反动组织极力要并入土耳其之外，不仅社会主义政党，就是南高加索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在以前也都没有在他们的纲领中要求脱离俄国。格鲁吉亚联邦运动党和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要求参加俄国，但要实行联邦制。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在十月革命前曾共同主张共和制的俄国统一，主张地方自治。关于这一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中已有规定。

我先已说过，早在 1917 年 10 月初，在布尔什维克高加索边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还讨论了民族问题。报告人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坚持了原来的地方自治的立场，关于党的民族政策没有提出任何新东西。

邵武勉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即根据南高加索地区

居民的民族成分把南高加索划分为三个区域民族自治州。遗憾的是，代表大会不理解新的政治形势提出了新的要求，当时没有采纳邵武勉的建议。我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那些不理解和不赞成邵武勉的建议的人中的一个（虽然我自以为是懂得我们党的民族政策的）。这是我的一个政治错误。

只是到了1919年，巴库的共产党员们才认识到这个错误，提出了正确的斗争口号：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同苏维埃俄国紧密联系着的苏维埃阿塞拜疆而斗争。

而我们又得花费很长时间来说服梯弗里斯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同志采取同样的立场。当时我们同他们取得了妥协：他们不反对我们提出的苏维埃阿塞拜疆的口号，而我们则暂时不提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1920年4月，当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取得胜利之后，梯弗里斯的同志们过去所持的立场就完全不能成立了。

* * *

苏丹土耳其统治集团千方百计要把阿塞拜疆并入自己的版图。土耳其军队很快向巴库开来；阿塞拜疆的地主千方百计帮助他们。这些地主的政府设在叶丽莎白波尔，并控制着阿塞拜疆尚未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一些地区。

事实上，德国-土耳其帝国主义者勾结南高加索内部的反革命势力，开始了对南高加索的武装干涉。当时，中央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的处境也极其困难。俄罗斯给了

我们帮助，但是这些帮助不用说是满足不了我们在那紧急关头的需要的。

于是，为了取得军事和物质援助，邵武勉派老布尔什维克、肃反委员会主席萨阿克·捷尔-加勃里埃良^①去见列宁。列宁接见了她，答应给予帮助；此外，给了他一项任务，即让他想方设法尽快地把巴库的石油运往俄罗斯，还发给他一份亲自签署的许可证。同时，列宁在1918年5月24日给托洛茨基写了这样一张条子：“来人捷尔-加勃里埃良同志将率领一支部队并携带现款等前往。请予以优先接见，并借部队开往巴库之便，采取紧急措施给巴库的同志们以军事援助。”^②

这几行字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列宁对保卫巴库多么重视。

列宁的指示得到了执行。捷尔-加勃里埃良优先得到了所需要的一切。但要运送由他带领的部队却难了。6月5日，捷尔-加勃里埃良出席人民委员会的会议时，给列宁写了一张字条：“最敬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恳求您命令装甲中心，明天务必运送巴库的部队，否则我将无法使部队立即出发。”

列宁就在那一张字条上写道：

“为什么不早些找我呢？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什么

^① 后来捷尔-加勃里埃良担任了亚美尼亚人民委员会主席，工作很有成绩。

^② 《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83页。

是装甲中心？它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捷尔-加勃里埃良回答说：“装甲中心是调动全部装甲汽车的机构。它没有电话。地址是：兹纳门卡大街5号，多尔戈鲁阔夫别墅。我的电话是：5.29.00，436号房间。”

由于列宁的有力干预，捷尔-加勃里埃良终于带着部队和现款出发了。然而，这项援助为时已晚^①。

决战日益临近。在哪里迎战敌人呢？是守在巴库城下，在那里同敌人交战，还是不等敌人靠近就主动进攻，进逼叶丽莎白波尔，并就地歼灭敌人呢？第二个方案最好，结果通过了这个方案。

1918年6月初通过了红军发动进攻的决定，我被批准上前线。我被任命为著名的达什纳克党人阿马扎斯普指挥的第三旅的政治委员。到任的地点是战线的右翼，在巴库—叶丽莎白波尔铁路干线以北，往谢马哈和格奥克柴县去的方向。

我的处境是不轻松的。我没有作战经验，要在我军进攻的过程中去了解指挥员和士兵。需要取得部下对自己的信任，在他们中间组织政治教育工作。除此之外，我既要参与通过关于作战行动的决议，又要直接执行这些决议。

头一个月，我们向前推进得相当远。尽管有很多困

^① 捷尔-加勃里埃良和列宁的来往字条1970年年中第一次发表在《列宁文集》俄文版第37卷第86—87页。

难,我们的事情进行得还不错。比如,木沙瓦特党人撤退时,千方百计想带走当地的阿塞拜疆居民。而当时收割的季节临近了。我们动员当地的居民收割庄稼,但人手仍然不够。而军队又不能耽搁着不走。记得,当时我给查帕里泽和邵武勉发了电报。下面我摘引一下保存下来的这个电报的电文:

“巴库。发自阔尔达米尔。革命军事委员会普·查帕里泽。抄转邵武勉。

……我部所占谢马哈县、格奥克柴县河谷一带的庄稼已经成熟,但无人收割。为了抢收空前丰产的粮食,我已书面指示格奥克柴、谢马哈两县人民委员立即在上述地区组织抢收庄稼。本着这个目的,建议立即宣布开展义务劳动,并组织抢收的劳力……请您支援必要的劳动工具……我们一方面抢收庄稼,一方面等待您的指示。参加抢收的工人的工作由地方苏维埃和我指定的专人负责。一周以后,就会有新粮供应我们的军队。等候您的指示和帮助。

第三旅政治委员 米高扬”

(《高加索红军报》第29期,1918年6月)

我们开始进攻约两个星期之后,邵武勉来到了司令部所在地阿吉卡布尔车站。他主持了扩大的军事会议。作为一个旅的政治委员,我本应而且很想出席这次会议。但是我脱不开身,因为要去开会就得离开一两天,而事情进展很迅速,我一天也不能离开旅部。因此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对此我深感遗憾。

我们的进攻很顺利，很快就接近了格奥克柴县的中心。这时土耳其投入了新的兵力，攻击我军侧翼。为了使我们的前沿部队不致被围，我们必须撤出城市。于是就边打边退。

参加这些战斗，对我来说是一项很好的军事教育。在此以前，我和旅长、参谋长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在部队里大家逐渐了解了我，根据全部情形看来对我也逐渐信服了。不仅是我的政治工作——对士兵的演说以及同他们的谈话等——起了作用，看来使他们特别满意的是，我跟旅长阿马扎斯普不同，不是长时间呆在司令部里，而是大部分时间在战壕里，同士兵们在一起，——有时到这个营去，有时到那个营去。

撤退一开始，我就和后卫在一起，走在队伍的最后，以免战士惊慌失措。撤退中，我们穿过了一个山隘，到山隘的另一侧设防固守。山头在土耳其人手里。他们的地位比我们有利，加之我们又没有后备力量。我们旅长阿马扎斯普和支队指挥（不久前在谢马哈方面，由我们旅和邻近的其他部队组成了一个支队，由曾在沙皇军队当过团长的卡扎罗夫担任指挥）总是反复地说，土耳其人在骑兵支援下，可能攻击和突破我军阵地的左翼，切断左翼与后方的联系，并加以歼灭。我们等待着增援部队。从俄罗斯开来的彼得罗夫支队的一部，预计一两天内即可到达谢马哈。

由几百名莫罗堪教徒——谢马哈县俄罗斯农民组成

的民团也进入了前线阵地。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我们可以使用的后备力量仍感不足。我们能够调动的只有一个骑兵连，还不是满员的。

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当我们都在司令部的帐篷里的时候，旅长却诉起苦来，说什么他肚子疼得很厉害，再也不能留在这里了。他骑上马，带着卫兵就走了。事隔几天之后，我才觉察阿马扎斯普的病是假的。

第二天早上，土耳其人加强了火力。司令部连续接到各营告急和请援的报告。有些报告说，如果没有增援部队，他们就守不住阵地了。于是就发生了有的部队可能弃阵而逃的危险，这对整个支队来说将招致不可收拾的后果。

支队指挥卡扎罗夫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有秩序地撤到谢马哈，然后再撤至马拉查，但撤退只能在夜里进行，因为白天在开阔地撤退，就等于向土耳其人提供全歼我军之机。

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卡扎罗夫突然对我说，他也感觉身体不适，要到谢马哈就医。这把我激怒了：昨天是旅长得病，而今天支队指挥又病了。应该说，支队指挥是很有作战经验的军事指挥员，非常需要他留在部队，特别是在这种紧急的关头。但他坚持说他病得很重。我拿他毫无办法。他走了。军队已无人指挥，这里职位最高的就是我这个几乎没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政治委员了。

我很清楚，在当时所处的情况下，我的主要任务就是

坚持到天黑，到夜里再有秩序地撤到谢马哈前的丘陵地带。

和各营的指挥官们接通战地电话后，我把情况告诉了他们，严格命令他们无论如何坚守阵地，等到夜里发出信号时，再有秩序地撤到指定的界线。指挥官虽然也抱怨有困难，但仍向我保证一切照办。

我到炮兵连视察。那里剩下的炮弹不多了，——大约还有十五、六发。但炮兵连的连长和炮手班的全体战士都是沉着而有战斗经验的军人，他们节省炮弹，以备决战用。

我回到司令部的帐篷里，想了解一下有没有新的情况。我从一个营长那里得知，莫罗堪教徒的民团要散伙回家。战线出现了缺口，而我们当时又没有力量补上这个缺口。我立刻赶到莫罗堪教徒所在的阵地。他们的阵地紧挨着我们旅。我已说过，莫罗堪的志愿民团是由这个地区的俄罗斯移民组成的。他们的村子挨着前沿阵地。在这以前，他们表现得很坚决，从未动摇过。

我到了莫罗堪教徒的驻地，以便弄清楚使他们不安和不满的原因。他们对我说：

“我们已经撤到我们现在驻扎的这个地方，撤到我们自己家乡来了。若是再往后撤，我们的家乡就落到土耳其人手里了。”

他们不相信我们能够守住现在的阵地，所以打算散伙回家。我极力劝说他们，而他们依然坚持己见：

“我们农民自愿来帮助你们，可现在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家不管。”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我终于说服他们坚守阵地，直到我们旅来接防。如果我们不得不撤退的话，他们也不要给战线造成缺口，而要有秩序地撤退，然后再各自回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

回到司令部后，正好碰见塔捷沃斯·阿米罗夫游击队的骑兵连连长萨法罗夫。以前，我和他见过几次面，他给我的印象很好。他意志坚强，坦率，积极拥护苏维埃政权。他和他的首长阿米罗夫对待邵武勉特别好。（阿米罗夫是后来牺牲的26个巴库委员中的一个，关于他和他独特的矛盾的性格我下面再详细谈。）

这时我们得到情报说，土耳其军队在我们的左翼进行可疑的调动。萨法罗夫的骑兵连作为后备力量驻扎在山谷里。我们当即同他商定：为了给敌人造成错觉，他把他的骑兵连带出山谷，假装我们的骑兵在进行调动。萨法罗夫干的很成功：他带领骑兵连沿着山坡移动，好象要去包抄土耳其人的阵地。这一切都发生在下午。我深信我们的阵地能够坚持到天黑。然而情况是十分不稳定的。当各营营长给司令部打电话，得知旅长和支队指挥都不在之后，局势更为紧张。当然，这很容易使他们惶恐不安。

我来到据守中心阵地的那个营。这个营有两排战壕。同战士们交谈了一下之后，我没有发现他们有什么特别

的不安。营长虽然表面上很镇静，可是情绪有些低沉，没有一点主动精神。

我们当时在第二排战壕里；第一排正在进行战斗，离我们有三百米左右。到第一排战壕去得穿过一个山谷。有一段路被敌人的火力封锁了，而山谷本身相对地说则比较安全。我问营长今天到前沿去过没有。

“没有，今天没有去。”他回答说。“昨天夜里去过一趟。”

我向他提议说：

“现在咱们一块去吧，跟战士们谈谈，了解一下情况。”

他回答说：

“现在到那里去很危险，土耳其人一直不停地扫射。”

我发火了：

“是的，不过在前线总是危险的，您怎么这么胆小？一块去，又不是您一个人！”

“不去，天黑以前我不去。不想白冒险。”

我觉得他与其说是谨慎，不如说是胆怯。他的胆怯不仅激怒了我，而且使我对他产生了一种厌恶之感。但我克制了自己，只是厉声说：既然这样，我就一个人去。说完就到山谷去了。

刚走了几十步，子弹就从四面八方嗖嗖地飞了过来。我倒在地上，象被打死了似的。又响起了一阵枪声。我本能地把附近的石头悄悄挪到跟前来，把头藏在石头后

面，不然的话就有可能被流弹打死。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趁着暂时的平静，跳起来，飞快地向前跑去。枪声又响了。我又一次卧倒。这时我想，我到山谷里来不管怎么说是一件蠢事，太冒失了：我会被轻易地打死或打伤的。何况旅长和支队指挥又都不在。这会儿我更生营长的气了，但已不是因为他不愿和我一起来，而是因为他没有能劝住我。

土耳其人大概认为我已被打死，停止了射击。离安全地带不到二十步了。我又猛力向前一冲，冲进了山谷。我感到有说不出的轻松。我从容地顺着山坡向前沿的战壕爬去。那里的士兵转过身来，他们都很惊讶我怎么会来到这里。

看来，士兵们情绪很好，弹药和粮食都不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怨言。他们纷纷向我打听前线总的形势。

“你们自己已经知道，形势是不怎么好的。”我回答说。然后我表扬了他们，要他们继续坚守下去，没有命令一步也不能后退。我把整个战壕巡视了一遍，和两个连长谈了话。我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很明显，我们要在夜里开始撤退，他们连最后撤，掩护我军退却。

我很喜欢这两个连长，他们是可以信赖的。从全部情形看，我到这里来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是，他们由于我冒这么大的风险，而且还选错了路，对我作了同志式的责备。原来，应该在稍远一些的地方穿过山谷。敌人的火力在那里只能达到很小一段距离。一个红军战

士熟悉这一条比较安全的路，由他送我走。分手时，连长说，当我到达危险地带时，他们将开枪猛烈射击，引开土耳其人的注意力。后来他们果真是这样做的。

一句话，我平安地回来了。我在司令部得知，在我离开司令部这段时间里一切平安无事。部队仍然坚守阵地。

随着夜幕的降临，我们的部队开始撤退，有秩序地向谢马哈城撤退。土耳其人未发现我们退却，没有追击我们。我们的部队在谢马哈城前的丘陵地带驻扎了下来。

在谢马哈我碰见了我们支队的指挥。看他的样子，怎么也不能说是得了重病的。我问他，我们下一步到底怎么办？卡扎罗夫说，要用一两天的时间把部队整顿一下；他还说不能在谢马哈城下和土耳其人交战。要撤到马拉查村一带——这是一条从谢马哈到巴库方面去的通道。我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回答说：

“部队已经很疲乏了，而土耳其人又得到了新的增援。如果在这里同敌人交火，我们可能被打败，并遭到重大伤亡，这对巴库的防御更加不利。何况作战的地形对我们也不十分有利。如果我们有秩序地撤到马拉查村，那末我们就可以在那里设防固守，尤其是在马拉查我们的给养会得到保证，而土耳其人跟他们的辎重车队失去了联系，处境就比较困难。”“何况，”他说，“在我们的左翼，红军的队伍正在撤退呢。”

我无法反驳他的意见，因为我对自己的意见是否正

确也没有十分的把握。何况，卡扎罗夫参加过世界大战，确实是一个有经验的军人。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早已背着我和阿马扎斯普把一切都密谋好了。但是，在当时我没有根据怀疑他们有叛卖行为。

第二天清晨，我检查了伤员转移的情况。所有的伤员都送走了。我们的弹药已经没有什么了，也都装上马车运走了。

这天中午，一个连长突然跑来报告说，他的士兵擅自离开了阵地，正从邻近那条街往巴库那边走。我和他跑到那条街，果真看到一群士兵正往巴库方向走去。我拔出手枪，喝道：

“站住，我要开枪了！”

我对于自己这个举动能否奏效，是没有把握的。我明白：“他们人很多，又带着武器，而我们只有我和他们的连长两个人，况且我还用枪吓唬他们，他们毫不费力就可以打死我们的！”但是，我又大喝了一声。士兵们站住了。我命令他们立即返回阵地，他们服从命令回去了。但是，大约过了十五分钟，我又得到报告说，那些士兵又从另一条街跑了。

刚巧这时，彼得罗夫的部队来到了谢马哈。于是我有了一支由我指挥的可靠的水兵，而且他们开着卡车，配有机枪。我和他们一起向逃跑的红军士兵追去。赶上以后，就用机枪对着他们。终于把他们拦住了，随后让他们返回了原地。

天黑时，我们命令步兵顺着通往谢马哈的要道先行，留下骑兵作后卫。指挥人员骑着马和步兵一起行进。走了不到五至十公里，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足足下了一整夜。所有的人都淋得象落汤鸡似的，膝盖以下全是泥。

拂晓以前，我们一直带着军需品走在泥泞的黑土地带。马十分艰难地在污泥中挪动。战士们完全精疲力尽了。

我们骑着马，一步一步地走，为的是不离开步兵。支队指挥和我并排走。我不想和他讲话。我们一直沉默不语，各想各的事。我担心前线其他一些地方的情况。我还想到达马拉查以后，将从巴库得到什么指示呢？这时，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地考虑支队指挥和“害病的”旅长那种奇怪的立场。我脑子里闪过这样的念头：他们之间是否有什么勾结，他们俩人“病”得实在太凑巧了，他们的议论为什么这样相似。

表面看去，无论是旅长还是支队指挥都很有礼貌。但……我心里不由得产生了许多怀疑。我知道，我一个人对付不了他们两个：力量、见识都不足。我决定到马拉查后就请求舍鲍尔达耶夫或者其他同志从巴库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分析情况，正确地组织防御。

我浑身都湿透了，疲惫不堪，这天夜里生平第一次骑在马上睡着了……睡着，睡着，我突然感到在往下跌，又立刻醒了过来。这样反复了多次。在这以前，我怎么也想象不到，骑着马可以睡觉。原来，人的身体对此也是能

够适应的。

到马拉查后，我们把全体指挥官找了来，命令他们把队伍编成战斗队形，进入阵地，设岗警戒，并派骑兵到谢马哈方向进行侦察。

彼得罗夫部队的一位老指挥官对我说，夜间撤退的时候，我战线唯一的一辆装甲车陷在泥里了。为了把装甲车拖出来，我们派去了一队骑兵。

这时，侦察骑兵来报告说，土耳其人进入了谢马哈，但是没有继续向前推进。很清楚，我们脱离敌人已经很远了。看来，土耳其人正在整顿自己的队伍。

我们向巴库报告了情况，要求采取措施保证部队的供应，并派舍鲍尔达耶夫来帮助我们制定作战计划。

在马拉查，我没有和支队指挥住在一起，而是单独住在一个农民的茅屋里。因为巴库答应派舍鲍尔达耶夫来，我就安心地睡下了。

第二天我一起床就发现，整个部队已经整好队。支队指挥和突然出现的我们旅的旅长骑着马站在队伍的前面。原来，已经下令要部队向巴库方向进发，开到离苏姆加伊特车站只有几公里的沃多卡奇卡地区去。

使我吃惊的是，我是政治委员，怎么撇开我做出这样的决定呢？做出这个决定的根据是什么呢？土耳其人还没有照面，为什么就匆匆忙忙地撤退呢？我向阿马扎斯普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回答说：

“我是部队的指挥官，我对自己的行动负责。”说完就

催马走了。

我被眼前发生的事惊呆了。

过了不一会儿，我碰见了骑兵连的连长萨法罗夫，我要他和他的骑兵连留下来听我指挥。他欣然同意了。我和他一起到电报局，以便把所发生的情况立即报告给巴库。

在路上，我问萨法罗夫的看法，这样的退却能够证明是正确的吗？还没有见到敌人，粮食尚未运到，队伍没有粮食没有水就开走了，而从马拉查到沃多卡奇卡一路上是没有水的。萨法罗夫也认为部队这样匆忙地撤退毫无道理。这时，我又想起了支队指挥和旅长连日来的所做所为和他们的一些议论，并加以对照。原来这是一连串的预谋的行动。“叛卖行为！”得出这个结论之后，我立即给在巴库的邵武勉拍电报说：“尽管我做了许多努力，辎重部队还是按阿马扎斯普的命令撤退了，步兵也陆续跟着撤退了。肇事者应交法庭审判。”

拍出电报后，我让萨法罗夫派骑兵侦察队到谢马哈方向去了解土耳其先头部队所在地的最新情报。我们自己留在马拉查。

下午侦察队回来报告说，土耳其人还在谢马哈，他们的部队没有向我方推进的任何迹象。得到这个情报之后，我和萨法罗夫的骑兵连放心地向沃多卡奇卡撤去。

我是在彼得罗夫部队（该部队已进驻沃多卡奇卡地区）的驻地过的夜。我没有去见卡扎罗夫，也没有去见阿马扎斯普，就到各营的驻地去了，以便和正在休息的士兵

谈一谈，了解一下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士兵们抱怨说连续多日的战斗搞得他们非常疲劳，这次撤退因为缺粮缺水造成了很大的困难。我问他们是否准备进入阵地，他们回答说，如果给他们那怕三天时间休息休息，洗一洗，好好睡一觉，他们就准备进入阵地。不过眼前他们要求暂时把他们送到后方去，调一批新的部队来替换他们。

这样做当然是很好的，但我们不知道巴库方面能不能做到。不过我们知道，土耳其人还得过几天才能跟我们的部队接触。这段时间是可以用来休整的。

于是就对各营营长下达了进行休整的命令。他们只要求保证供应他们必要的粮食。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那天早晨，意外地从巴库给我拨来了一辆小汽车。汽车来的正凑巧。我立即乘车到苏姆加伊特火车站，在车站可以通过电报和前线指挥机关进行联系。在得到粮食一定送到我部的保证之后，我返回了旅的驻地。

汽车向旅部所在地水塔开去，在离水塔还有一百到一百五十米的地方，我见路旁有数百名红军战士正坐在地上休息。我的汽车是敞篷的，我坐在后排座上。突然，见一名红军战士懒洋洋地从地上站起身来，拄着步枪，要求司机停车。他为什么不向我——政治委员，而向司机提出这个要求呢？司机没有理他，继续向前开去。于是我命令司机停车。走下车来，我严厉地向这个红军士兵问道：

“怎么啦，有什么事？”

又有几个士兵走上前来。拦车的那个士兵不好意思地、焦急地问道：

“政治委员同志，您真的把我们的长官阿马扎斯普告到军事法庭了吗？”

他的问题使我大吃一惊。我拍给邵武勉的电报他们怎么知道了呢？我立即意识到：“看来，这是阿马扎斯普预谋好来反对我的，因为除了他之外，士兵们是不可能知道这个电报的。”我没有立即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道：

“你们从马拉查撤退的时候，看见土耳其人了吗？”

“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看见。”

“那你们为什么要匆匆忙忙地撤退呢？当时你们既没有粮食，又没有水，不是吗？”

“是的，都没有。”

我接着说，“那么为什么不等粮食和水运到，就把你们调到新的阵地上来呢？即使战局需要撤退，也应该等粮食运到再撤退。土耳其人还离得很远，并没有马上和他们遭遇的危险。这些问题都应该搞清楚。所以我请求军事法庭来审理，这究竟是谁的过失。”

这时已有几十个红军战士围了过来。开始了士兵与政治委员之间的那种常有的心平气和的交谈。

谈话间，我发现阿马扎斯普和他的几个亲信站在离我们大约一百到一百五十米的地方，盯着我们这边看。他见私自审判我的企图并未得逞。显然是在阿马扎斯普的指使下，他的两个警卫骑兵跑了过来，推开围着我的红

军战士，其中一个人扬起鞭子照着我的头和脖子抽了一下。我本能地一下握住了手枪。他也拔出了毛瑟枪。但是士兵们过来把我们拉开了，因而避免了眼看就要发生的一场流血事件。我话也不说坐上汽车就走了。我一路都在想：我给邵武勉的电报，阿马扎斯普怎么知道的呢？但当时还是没能找到答案。

到了苏姆加伊特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设法弄到一份《巴库工人报》，好知道知道新闻。突然，我看见在7月22日那一期的报上，全文刊登了我给邵武勉的电报。“这是怎么搞的？”我愤愤地思索着。“阿马扎斯普没有被捕，也没有送交军事法庭审判，而电文却在报纸上公布了？这是谁，又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对谁有利呢？”

后来，在巴库我才弄清楚，我的电文之所以在报纸上发表，是由于邵武勉的秘书奥尔加·沙图诺夫斯卡娅缺乏经验。她是想把达什纳克党人在前线叛卖的事实公之于众，以消除他们在巴库亚美尼亚族工人中的影响。

我当即暗暗决定马上到巴库去，无论如何要设法逮捕阿马扎斯普，然后再返回前线。

武装斗争在继续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达什纳克党人主张邀请英国人；邵武勉痛斥叛卖行径；革命的巴库在战斗。

我在7月25日的报上看到了一条消息，使我更加不安。原来前一天在巴库各区都举行了群众集会，讨论了邀请英国军队来巴库的问题。布尔什维克反对这样做，而英国军事司令部的直接代理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达什纳克党人则公开主张邀请英国人。

巴库社会革命党人在当时和英国人有密切联系。关于这一点，当时在巴库统率英国占领军的邓斯特尔维尔将军后来在他写的回忆录中讲的很清楚。“和巴库的联系，”这位将军写道，“我是通过几乎每天都有的信使进行的……我们的社会革命党的朋友们……很快就能……推翻布尔什维克，在巴库建立新的政权并邀请英国人前来帮助。”

“我不止一次地，”邓斯特尔维尔接着承认，“和社会革命党领导人进行了谈判，他们的纲领是更符合我们的目的的……他们希望得到我们的援助，特别是财政援助。我和社会革命党保持着友好关系。他们也明白，如果他们夺取了政权，他们可以在很多方面依靠我们。”

巴库的工人在社会革命党人、达什纳克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欺骗和蒙蔽下，受尽了饥饿的折磨，并且十分害怕土耳其人的入侵，在这种情况下显然对英国人侵略的危险性认识不足，误以为英国没有德国和土耳其那样凶恶，因此在群众大会上赞成邀请英国军队。

实质上，这是部分工人公开不信任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表现。使我震惊的是，英国军队已经占领了摩尔曼斯

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对苏维埃政权的全面的武装干涉已经开始。很明显，邀请英国军队来巴库，实际上就是敞开大门让英国人来占领城市。在这样严重的战争时刻，居然就这样重大的问题在群众大会上，组织如此危险的辩论！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

当然，在报纸上我也看到另外的关于工人和红军集会的报道。在这些集会上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反对邀请英国人和动员工人上前线的决议。这是巴库无产阶级中有觉悟的先进分子的声音。

正在发生的一切使我非常不安，于是立即动身前往巴库。

7月25日我到了巴库。那天巴库苏维埃正在开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区苏维埃、舰艇委员会的委员和红军的代表。

* * *

苏维埃会议已接近尾声。休息后，邵武勉发了言。他作了关于政治和军事形势的报告，并严厉谴责了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邀请英国人来巴库的呼吁。他作为高加索特派委员，代表中央苏维埃政权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张苏维埃俄国奉行独立的政策，既不依附于德国，也不依附于英国。邵武勉坚决要求撤销邀请英国军队的议题。他列举了苏维埃俄国对我们的援助的材料，举出了所援助的武器的数目字：这些武器有的已经运到，有的正在从

阿斯特拉罕运来巴库的途中。邵武勉建议：在等待俄国新的援助的同时，应当动员并加强陆军和海军，建立坚不可摧的巴库防线。

随后，右派政党的代表相继发言反对邵武勉的这一建议，并对巴库人民委员会和红军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而阿齐兹别科夫、查帕里泽、泽文和其他的布尔什维克发言则激烈反对右派。

尽管共产党人做了种种努力，右派提出的邀请英国军队来巴库、成立在苏维埃中有代表的一切政党的新的联合政府的决议，还是在尖锐的斗争中以微弱的多数被通过了（二百五十八票赞成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的提案，二百三十六票赞成邵武勉提出的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达什纳克党人的提案）。

一批里海舰队的海员倒向右派政党一边（部分是受蒙蔽，部分为英国的间谍所收买），起了致命的作用。邵武勉在发言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还指出，这些海员将为这一致命的错误后悔不已，但那时已经晚了。

表决后邵武勉声明，他作为中央苏维埃政权的代表，抗议这种叛卖行径。

会议宣布休会。巴库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利用休会时间召开了会议。

苏维埃会议复会后，我已经来到了会场。邵武勉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了声明，邀请英国人是对革命的

俄罗斯卑鄙的忘恩负义和可耻的叛卖行为。他斥责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他宣布布尔什维克对这种罪恶的政策不负任何责任，并拒绝担任人民委员的职务。

这一切太突然了，使我大为震惊，因为我根本不知道所有事件的来龙去脉。稍后，当最初的印象已经磨灭，能够比较冷静地、细心地分析那些天的全部复杂情况时，我写道：“很大一部分巴库工人确实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所许下的借助英国人抗击围困巴库的土耳其人的诺言给弄糊涂了。工人动摇了。没有粮食，因为哥萨克匪帮切断了巴库和北高加索的联系。工人家家户户都没有吃的，可供饮用的水源已被切断。集结在巴库城下的反革命军队越来越多。隆隆的炮声淹没了工厂的微弱的汽笛声。可能遭到反革命迫害的恐惧磨灭了工人的锐气。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坏蛋们利用他们的合法地位，肆无忌惮地毒害着工人的思想，胡说什么只要他们愿意，就会有无数的‘文明的’英国军队来支援他们的‘盟友和兄弟’反对土耳其，拯救巴库。就这样在各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在工人代表苏维埃的会议上，邀请英国人的叛卖社会主义的提案取得了多数。”

苏维埃散会后，巴库党委会连夜召开了紧急扩大会议。

我们当中许多同志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团做出的关于辞去人民委员职务的决定。会议通过了不交出政权的建

议，何况苏维埃实际上并未选出新的政权。所有过去的政权机关——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应当照旧工作。紧急会议决定在巴库工人中进行动员，以补充红军队伍；宣布城市进入紧急状态；对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人给予制裁。鉴于局势极为复杂，决定召开全巴库党代表会议。党代表会议于1918年7月27日召开，会上批准了巴库党委会会议上所通过的各项决定。

第二天在查帕里泽的主持下召开了巴库苏维埃非常会议。

7月28日，巴库人民委员会颁布了进一步动员参加红军的命令。同日，巴库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宣布委员会决定：“巴库全体居民们！执行委员会全体成员一如既往，继续捍卫工农苏维埃政权，任何反对苏维埃的企图都将遭到苏维埃的无情镇压……执行委员会号召所有部队、水兵、工人和一切真诚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挺身而出，保卫苏维埃政权，象一个铁环那样紧紧地团结在苏维埃的周围，对在危急时刻胆敢蠢动的苏维埃的敌人予以应有的打击，英勇地迎击那些蛮横无理的来犯之敌。”

当天早上，在自由广场举行了群众大会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口号是：“新动员万岁！”“逃避动员的胆小鬼可耻！”“处死叛徒、卖国贼！”“大家拿起武器，参加工农社会主义军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巴库只属于苏维埃共和国！”“打倒德一土和英帝国

主义分子!”“英国人占领了整个波斯,还要侵占南高加索东部。打倒侵略者!”“德国—土耳其人占领了整个南高加索,还要占领巴库。打倒暴徒和侵略者!”“打倒企图把巴库出卖给英国人的叛徒!”“鼓动拥护英国人就是在我们兄弟般的家庭中制造不和,就是削弱前线。打倒这种鼓动!”

查帕里泽代表巴库苏维埃向参加大会和游行的群众致意,他宣布巴库无产阶级已经拿起武器准备保卫苏维埃政权。科尔加诺夫、泽文、彼得罗夫、维齐罗夫、红军战士和水兵的代表也都发表了激昂慷慨的讲话。维齐罗夫在讲话中说:“从千年沉睡中觉醒了的穆斯林农民,与俄国的社会主义同呼吸、共命运。穆斯林农民几十、几十地报名参加红军,他们现在和将来永远为保卫伟大的俄罗斯而战。”

当晚,在挤得水泄不通的歌剧场里举行了巴库卫戍部队战士和指挥员会议。邵武勉在这次会上发言时指出:“革命阵线正受着内外两面的夹攻。”他在回答巴库人应当指靠谁的援助这个问题时说:“……只能指靠俄罗斯!我们只能从中央的革命同志那里得到支持。从革命的观点来看,无产阶级不能乞求任何一个压迫者,不能因为某个压迫者手里的鞭子比另一个打得轻一些,就去吻他的手。这是奴才的逻辑,奴才提问题的方法,奴才的心理。”邵武勉号召巴库的无产阶级“不仅为自己的城市,为自己的家园,而且要为整个俄国”而斗争。“这一历史使

命，”邵武勉说，“应该使巴库的工人同志感到自豪，并感召他们把光荣的斗争进行到底——要么战胜敌人，要么光荣牺牲。”

在会上发言的支队指挥员彼得罗夫也号召战士们继续英勇地保卫无产阶级的巴库。他代表红军战士对邵武勉为巩固巴库苏维埃政权不倦地进行工作表示感谢。

* * *

邵武勉向列宁报告了形势和就地采取的措施，请求列宁在最短期间派来增援部队。

应该指出，列宁直接从莫斯科或通过察里津的斯大林和邵武勉保持经常的联系。列宁于1918年8月给阿斯特拉罕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主席的电报中说：“……你们知道，我是完全信任邵武勉的。”^①

7月29日收到了列宁对邵武勉请求尽快派出军队的复电：“关于派遣军队一事，我们将采取措施，但不能保证一定做到。”^②

这种不够肯定的答复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解释的。因为1918年对苏维埃俄国来说是极其艰难困苦的一年。德国人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英国军队从摩尔曼斯克和阿尔汉格尔斯克向俄国中部推进。日本和美国军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③登陆。捷克斯洛伐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45页。

② 同上书，第342页。

③ 即海参崴。——译者

克远征军团^①举行暴乱，在白匪军的支持下占领了乌拉尔和伏尔加河中游许多重要的城市。北高加索的哥萨克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克拉斯诺夫匪帮向察里津进军。奥伦堡反动哥萨克急欲窜扰阿斯特拉罕。在全国的中心——莫斯科，随后在雅罗斯拉夫、阿斯特拉罕相继爆发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叛乱。英国开始向土尔克斯坦进攻，到处都需要武装力量。红军在这时还不过刚刚建立起来。把军队从一个战线调到另一个战线是很困难的，到处都感到军队不够。

苏维埃政权同反革命暴乱、十四国外国武装干涉进行了殊死的搏斗。

在这些日子里，我们所有的优秀宣传员都到群众中去了，组织工人和士兵开大会支持苏维埃政权，声讨卖国贼。“古墨特”组织在巴库各区召开了阿塞拜疆劳动群众大会。会上党的活动家发表演说，号召保卫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的巴库，抗击土耳其—木沙瓦特匪帮的侵犯。

与会者表示了与巴库的整个无产阶级一起捍卫革命事业的坚强的决心。

但是我们的敌人也没有闲着。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达什纳克党人的头目们伙同里海舰队中央委员

^① 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原由军事俘虏组成，苏维埃政府允许其经过西伯利亚和远东开回本国，但在中途却被社会革命党人和英法两国利用来举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译者

会^①的头目以及比切拉霍夫（他是英国军事司令部意图的传声筒）的代表——这些阴谋分子举行了秘密的集会。

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巩固前线。

我作为巴库党委会成员参加了那些天党、政、军的全部工作。但我仍然渴望尽快地返回前线。与同志们共患难的同时，我（何必隐瞒呢！）怎么也忘不了我个人受到的委屈、屈辱以及阿马扎斯普的叛卖行为。

我曾坚决要求邵武勉立刻逮捕阿马扎斯普并任命一个营长接替他。

“若能这样做，”我对邵武勉说，“我马上就回到前线去，我坚信我们能把这个一般说来有作战经验的旅完全整顿好，并在前线我们防守的地段组织好对巴库的防御。”

邵武勉理解和体会我的心情，但同时又非常耐心地劝我不要着急。

“你知道”，他说，“阿马扎斯普正在旅里。他知道你要求把他送交法庭，一定已经采取了保护自己的对策。他背后有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支持他，而我们没有力量立即实现你的要求。如果我们派武装部队到那儿去，不

^① 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 1917 年 11 月在巴库成立。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领导下该委员会变成反革命中心。1918 年 8 月 1 日“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分子伙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分子把巴库委员会改组为反革命政府——“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译者

可避免地会发生武装冲突，这样只能加剧前线这一地段的紧张局势。”

在这种情况下，再回旅里去已是不可能的了。

* * *

当通过不交出巴库苏维埃政权，留下来战斗到最后的决议之后，我们决定把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的家属撤到阿斯特拉罕。也和以前一样，我一直住在邵武勉家。叶卡捷琳娜·谢尔盖叶芙娜迟迟不肯动身，因为她不愿把邵武勉和两个尚未成年的儿子——苏连和列瓦（已参加了布尔什维克战斗队）留下。邵武勉日夜忙于工作，出席各种会议，很少回家看看。我劝叶卡捷琳娜·谢尔盖叶芙娜尽快离开，因为她在巴库，又带着年幼的孩子，会使斯捷潘放心不下。查帕里泽的妻子瓦尔瓦拉·米海伊洛芙娜也不想离开，她有两个怀抱着的小女孩——叶莲娜和柳齐娅。我不得不也劝她离开。最后总算勉强说服了她们收拾必需的东西。

7月29日晚，邵武勉打电话给我。

“前线的消息叫人非常不安”，他说，“土耳其人突破了防线，我们的部队退到了巴拉扎雷，离巴库只有一站路了。局势十分混乱。你亲自去看一看那里的情况，尽可能采取一些措施，并报告我们。”

我给车站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替我准备一辆机车到前线去。

到了车站，已经有一辆机车停在那里了。我突然看

见奥尔加·沙图诺夫斯卡娅手持步枪站在机车旁。我问她：

“你从哪儿来？在这儿干什么？”

原来是邵武勉派她来护送我的。我坚持不让她同去。我认为，她没有必要跟我一起去，她做好邵武勉的秘书工作更为有利。

但是她坚持要去，我拿她没有办法。沙图诺夫斯卡娅还是和我一起去了。

一到巴拉扎雷，我首先打听到前沿指挥部的所在地。指挥部设在一节办公用的软席卧车里，于是我向软席卧车走去。参谋长阿维季索夫接待了我。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指挥员，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是个团长，年龄比我大得多。但他并不太招人喜欢。我和他客气了几句之后说：

“请您谈一谈前线目前的状况。我军的阵地在哪里，土耳其人的阵地在哪里？”

我见他的桌子上放着一张标着阵地位置的战线地图。阿维季索夫有些紧张地回答说，情况很糟，他甚至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阿维季索夫显然是发慌了。于是我对他说：

“您的地位使您有责任了解前线的情况。况且我看见地图上标着我军和敌军的位置。这大概是最新的情况了。请不要紧张，慢慢说吧！”

阿维季索夫依旧很紧张地回答我说，地图上的标记根本什么也不说明，因为前线一片混乱。部队未经指挥

部的准许就撤下来了。我询问他具体地安排了哪些部队守卫通往巴库的要道。他说了几个营的番号，还说有两节装甲列车和彼得罗夫支队。于是我问他：

“比切拉霍夫和他的支队在什么地方？”

“今天，”他回答说，“比切拉霍夫宣布拒绝作为红军的部队同土耳其打仗，撤出了他自己的部队，使我们防线右翼空虚了。”

这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建议阿维季索夫赶快和前线部队恢复联系，并解决把一部分部队调到比切拉霍夫放弃的地段上去的问题。他嘟嘟囔囔地说：“无能为力。”我明白跟他再谈下去是没有用的，于是就去找司令部政治委员加宁所在的那个车厢。在加宁那里我还遇到了旅政治委员加贝舍夫。我向他们讲了我同阿维季索夫的谈话，然后向他们询问前线的真实情况。他们证实前线的情况确实很严重，特别是由于比切拉霍夫的部队撤走，情况就更严重了。我问哪些部队可以开到被比切拉霍夫的哥萨克放弃的阵地上去，他们回答说，比较可靠的办法是，把驻在这里的彼得罗夫支队派去，并用巴库派来的增援部队补充兵员。

在巴拉扎雷那里，毫无军纪。正象同志们所说的，红军战士成批地离开阵地，在车站游荡，从而使秩序更加紊乱。我们决定从彼得罗夫支队抽出一些水兵来整顿车站的秩序。我们把彼得罗夫支队驻在巴拉扎雷的分队长找来，命令他们进入比切拉霍夫放弃的阵地。他们执行了

这个命令。

后来我们又和舍鲍尔达耶夫通了电话，请他火速从巴库给彼得罗夫支队派出补充人员。此外，我们还请求从重新应征入伍的、正在接受军训的工人中派来两、三个连。舍鲍尔达耶夫答应尽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他把任命彼得罗夫接替比切拉霍夫担任前线这一地段的指挥官作为消息告诉了我们。他还说，比切拉霍夫解释自己离开的理由是，他不同意执行反对英国人的政策，因此辞去了这一地段司令官的职务，并且根据他的部队中哥萨克士兵的要求，同他们一起开往北高加索去了。

我们睡了几小时，便起来朝车站走去。我们高兴地听到并亲眼看到一小队革命的水兵把车站的秩序搞得井井有条。随后又得知，彼得罗夫支队已进入指定的阵地。

我到司令部阿维季索夫那里去了一趟，想从他那里得到些消息，哪怕是一点点也好。我又一次见他处于惊慌失措的状态。他认为我们已无力反抗，说什么土耳其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击溃，而答应给我们的来自巴库的援助还没有到，也未必能到。但我毕竟从他那里了解到，有一支准备开往前线的亚美尼亚民族军正滞留在巴库。我向车站走去，想通过电话跟邵武勉取得联系。但邵武勉正在苏维埃开会。我又顺路去看加宁和加贝舍夫。我们一起为巩固前线采取了一些措施。

这时我们得到报告说，彼得罗夫支队在自己的新的

地段上坚决抗击土耳其人的进攻，虽然伤亡很大，但拼死战斗，终于守住了阵地。因此我们的部队更加需要立刻补充兵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援兵的到来。

我又第三次到阿维季索夫那里去。他还是那付样子。他甚至对彼得罗夫支队打退土耳其人的进攻无动于衷。我对他说，我和邵武勉怎么也联系不上。正在和阿维季索夫谈话时，有个人从车站来到司令部。他说，现在恰好可以和邵武勉接通电话。阿维季索夫表示要和我一起去。起初我心里想：“他为什么要跟我一起去呢？”后来觉得：“他在场对邵武勉了解某些情况或许有用。”于是我们就一起去了。

在放电话机的房间里，除了我和阿维季索夫，没有别人。我立即问邵武勉情况如何，我们应该怎么办。邵武勉回答说，政治情况比军事情况还要复杂。右派政党、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和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的代表在不停地开会，进行频繁的磋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成功地把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人拉到了自己一边。他们已经商定要派军舰到波斯的恩泽里港去接英军。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不仅拒绝把一些组织良好的部队派到前线去同土耳其人作战，反而要求与土耳其人进行和平谈判，并且就此和充当调停人的瑞典领事馆进行了联系。有迹象表明，民族委员会准备单独派出代表与土耳其人谈判。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样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下进行的，即战线横竖已守不住了，而和平谈判可以拯救亚美尼亚

居民，可以使他们在土耳其人一旦占领巴库时免遭屠杀。与此同时，民族委员会同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勾结起来，大耍两面手法：一方面拥护德国、土耳其的路线，另一方面又拥护英国的路线。不言而喻，我们既不能同意孟什维克，也不能同意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他们实质上是在瓦解后方，从而削弱前线。我们要继续战斗。接着，邵武勉讲了一件事使我大吃一惊，原来阿维季索夫昨天夜里就通知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说，再过三、四个小时土耳其人就要占领巴库，因此他建议升起白旗投降。于是民族委员会要求人民委员会命令前线升起白旗。我听了非常气愤，便在电话里喊道：

“什么白旗?! 我们这里不打算升，也决不会升!”

“人民委员会也反对升白旗。”邵武勉说。

我们通完话，阿维季索夫非常激动地对我说：

“不，政治委员先生，必须升白旗! 我们要强迫您这个政治委员亲自升白旗。”

我愤怒极了，掏出手枪，斩钉截铁地说：“上校先生! 您出的升白旗的主意行不通! 您不要忘记，您是在同谁打交道。您应该明白，这只手枪的子弹足够应付您!”

阿维季索夫的脸刷地吓白了，他怕我当场把他打死。但我只不过是警告他。他明白了这点，就不声不响地走了出去。

我来到加宁和加贝舍夫那里，以便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他们。我们拟了一封拍给巴库的电报，我们三人当

场一起签了字。电报说，阿维季索夫威胁说要强迫我们这些政治委员升白旗，向土耳其人投降。即使以枪毙相威胁也不可能迫使我们迈出这可耻的一步。

随后我们开始议论：保卫巴库政权的战斗，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呢？我们的同志能够保持住政权，还是政权将被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篡夺呢？巴库还会给我们什么命令呢？我们对保住巴库苏维埃政权仍抱有一线希望。

前线报告说，土耳其人开始向前推进，并占领了离巴拉扎雷不远的的一个不大的高地。后来我们听说，科尔加诺夫和舍鲍尔达耶夫先后到前线来了。这个消息使我们多少有些鼓舞。但等了很久，他们并没有来。

天渐渐黑下来了。土耳其人把大炮运到他们占领的高地上，开始向巴拉扎雷打炮。很清楚，我们的司令部再也不能留在巴拉扎雷了。于是我们把刚到的高加索部队军事联络官阿尔维拉泽叫了来。在巴库因工作关系我很了解他。经过商量，我们决定把军事人员轮流派往巴库。

……当我们的火车停在巴库车站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左右了。我随手拿了一支卡宾枪走上站台。车站上很安静，没有一点儿慌乱的迹象，仿佛一切都很正常。在站台上我遇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装甲列车政治委员阿绍特·捷尔—萨阿克扬。他以前是莫斯科的大学生，我很早就认识他，是一个出色的革命家。他立刻直截了当地对我说：

“你知道吗？巴库发生了政变！”

我吃了一惊。

“什么政变？你从哪儿知道的？”我问他。

“大家都在谈论这件事。”

“我不信，”我回答说，“我马上到革命委员会去。”

“小心点，会把你抓起来的！”

但我还是去了。

革命委员会设在自由广场的阿斯多里亚饭店里。我走在街上，没有感到发生任何事变。革命委员会一带仍然和过去一样，还是那些哨兵站在正门口。我故意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走进革命委员会大楼，上了二层，但我没有进首长的办公室，而是来到走廊尽头通常是普通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我打开了一个房间的门，看见从中央来到巴库的特派委员、海军舰队委员会委员波卢欣坐在那里。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水兵，约三十五岁，大家都很尊敬他。和他坐在一起的是巴库军官学校校长索尔恩采夫。他们很镇静地交谈着。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我问他们。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怎么能这样呢？”

“因为我们也是刚刚来到革命委员会，听说咱们的同志已撤到阿斯特拉罕去了。”

“难道这是真的？”

“很遗憾，”他们回答说，“是事实。”

“怎么会这样呢？”我气愤地说，“通过了撤退的决议，也不设法给我们在巴拉扎雷的人打个招呼。”

“他们可能已想办法通知你们，不过显然没有能够和你们联系上。”同志们反驳说。他们也没有得到通知——这一切发生的太突然、太紧急了。

稍后，他们告诉我说，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已经篡夺了政权。他们在1918年8月1日以当时实际上已不存在的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成立了所谓“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临时主席团专政委员会”。里海舰队已派出舰艇到恩泽里接英军去了。一句话，反革命得势了。

“谁是反革命政府的首脑，你们知道吗？”我问他们。

据他们了解，孟什维克的萨多夫斯基被任命为政府首脑，比切拉霍夫是军队总指挥。

“你们怎么还坐在这里，不慌不忙地谈话呢？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们只有一条路，”他们回答说，“无论如何要到苏维埃俄国去，那里还用得着我们。”

“走哪条路呢？”

“还没有决定，我们正在这里考虑。南北高加索的路都不通了。里海东岸是英国刺刀支持下的反革命政府。到阿斯特拉罕去的船还不通，巴库和恩泽里之间的轮船倒是还畅通无阻。我们打算到恩泽里，然后取道波斯和阿富汗到已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塔什干去。你呢，你打算

怎么办？”

“我要留在巴库，转入地下作党的工作，不过我现在还不知道到哪儿藏身。我打算到党的战斗队的营房去看看。那里或许会有人留下，能帮我找个工人的家躲一躲。”

我急着要走，我劝他们也在熟人那里找个安身的地方。很抱歉，我不能给他们留下地址，因为连我自己也不知道到那里去藏身。我说我一定设法把所有这些事情通知对所发生的事件仍毫无所知的加宁和加贝舍夫。

我本来是不抽烟的，但这次我却向他们要了一支烟，以便抽着烟很“神气”地从哨兵身边走过。分手时，我们约定在他们动身之前，设法通过当地居民互相取得联系。

说罢我穿过走廊，下了楼，从容地通过了岗哨，最后来到大街上。我为自己能从这座大楼里脱身而感到很满意。我顺着电话大街来到被我们征用作党的战斗队营房的多层大楼。我走上二楼，看见有人睡在大厅的镶木地板上。快到午夜了。在熟睡的人中我认出一个小学就和我要好的同学阿尔塔克·斯塔姆鲍利茨扬。他现在是小支队的政治委员。我觉得很可恨：在这样的時候，共产党员还在睡大觉，包括阿尔塔克在内。我懊丧地踢了他一脚，他跳了起来，莫名其妙地盯着我。

“邵武勉、查帕里泽、阿齐兹别科夫在哪儿？”我问他。

“不知道。”

于是他对我说，他和他的中队是留下来保护国家银

行的，后来又得到了新的指示，他们不久前从银行撤回。现在他和他的小队在这里休息，等待命令。我们立刻把战斗队员都叫了起来，命令他们解散回家，不要让反革命看见，听候命令。

我问阿尔塔克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可以暂住的地址，又问他自己打算在那里落脚。他提到他的战斗队一个同志的地址，说他很了解这个同志，准备在他那里安身。他建议我暂时住在塔捷沃斯·阿米罗夫家里，当然，如果我认为他可靠的话。我回答说，阿米罗夫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为人正派，而且同邵武勉的关系也很好。当他同他的骑兵队在前线时，我们多次见面，很熟悉了。我想他是不会拒绝收留我的。

阿尔塔克把阿米罗夫的地址给了我。

已经是半夜了。我走到一座房子跟前，敲了敲门。塔捷沃斯·阿米罗夫亲自开了门。看得出他是刚刚从床上爬起来。我说，我们的人走了，我留下了，能不能留我在他家过夜。

塔捷沃斯很客气地回答说：“可以！”

我在他家住了一夜。当我醒来时，阿米罗夫已经起来了。原来，他已经到城里去过，还给我带来了一个消息：同志们和同行的彼得罗夫支队乘坐的所有轮船全部折回巴库了。现在它们都停在彼得罗夫码头。

我立刻向码头走去。

巴库公社的失败

我们能够保持住苏维埃政权吗？巴库委员被捕和我们为释放他们而斗争；我们在苏维埃中痛击孟什维克；土耳其人入侵巴库。

到码头后，我才知道，彼得罗夫部队坐的船甚至还没开出海湾，就被截住了，并被迫折回码头。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乘汽艇出海，驶到邵武勉所乘的船前，要求交出并逮捕邵武勉、查帕里泽和舍鲍尔达耶夫。查帕里泽不在这条船上，舍鲍尔达耶夫因混在船员当中，藏在底舱，未被发现。邵武勉被逮捕并被送到“阿斯特拉巴特号”军舰上。船靠岸后，留在船上的同志，把发生的事件告诉了彼得罗夫和阿米罗夫。他们马上前往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向它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邵武勉，并警告说，否则将要诉诸武力。邵武勉当即被释放。

为了了解全部事件的经过，我来到邵武勉所在的“柯列斯尼科夫号”轮船上。邵武勉对我说，7月31日傍晚，城里形势骤变。阿维季索夫报告说，三、四个小时后，土耳其人将开进巴库。鉴于这种形势，阿维季索夫和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坚决主张升白旗。邵武勉说，老实讲，我们都认为民族军未经我们同意，已经升起白旗，或者马上就要升起白旗了。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在英国人的指使下，依仗着“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领

导的叛卖立场，事实上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反革命政府。彼得罗夫部队的参谋长告诉我们说，部队在战斗中人员伤亡很大，由于敌人的攻击，部队已向城市撤退。他说：“前线败局已定。”

邵武勉继续说，我们认为在土耳其军队入侵巴库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内战事实上已不可能。因此人民委员会决定辞职，并用船把军队和苏维埃俄国的国家财产撤到阿斯特拉罕。后来才弄清楚，由于英国人施加压力，“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向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发出警告，而亚美尼亚民族委员会指望得到英国人的援助，所以未升白旗，甚至同意把未曾参加过战斗的部队派往前线。

8月1日土耳其人继续猛攻巴库，企图占领该城。他们终于突破了沃尔契门，进入比比—埃巴特地区。“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军队纷纷逃跑。

在同其他领导人商量过后，邵武勉向彼得罗夫建议，把大炮卸到陆上，并从码头向土耳其人占领的比比—埃巴特地区开火；此外，还把一批红军战士和海员派往离码头几公里的这一前线地区。

当猛烈炮击土耳其人的阵地的时候，城里居民都转忧为喜。呼啸的炮弹在巴库居民的头上飞过，落在土耳其军队的防地。出其不意的炮击使土耳其人惊慌失措。他们损失极大，于是撤退了。

巴库地区的工人和红军战士得知，巴库委员们和彼得罗夫的部队在彼得罗夫广场后，有的带着武器，有的赤

手空拳，成群结队地或单独地前来报名参加彼得罗夫的部队。彼得罗夫的部队一下子从四百人猛增到两千人。

为了讨论目前的局势并决定今后怎么办，我记不太准是8月2日还是8月3日，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经过长时间争论，会议决定：武装部队不撤往阿斯特拉罕，相反，趁巴库居民人心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的时机，重新夺取政权。事实上这是办得到的。敌人在城里的军队比我们少，他们要把军队从前方调回来，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我们指望把巴库城内自己的全部力量聚集起来，并得到阿斯特拉罕派来的部队的支援后，守住我们的城市。

由于我们出版的党的机关报《巴库工人报》^①被查封，党的代表会议结束后，便立即在一个印刷厂印出了由邵武勉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巴库委员会签署的告巴库工人书。告工人书详细叙述了最近两三天内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揭露了反革命散布的有关我们的谣言和诽谤，揭穿了达什纳克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背叛行为，并说明了我们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决定撤退军事力量的。告工人书说，在这些危急的日子里，彼得罗夫的部队得到了巴库无产阶级的支持，它英勇战斗，抗击了土耳其人的进攻，保卫了巴库。

^① 继斯捷潘·邵武勉之后，阿尔森·阿米良担任了《巴库工人报》的主编。他是一个坚强的、原则性很强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几乎每天都刊登他写的短小精悍、尖锐泼辣、内容丰富的社论。阿米良也是牺牲的二十六个巴库委员中的一个。

告工人书最后表示深信，俄罗斯的军队很快就会来到，巴库即将得救。“……不靠胆小如鼠的阿维季索夫和阿乌扎斯普的白旗，也不靠英国人及其仆从神话般的援助，而是靠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工农俄罗斯的军队——苏维埃的军队。

只有俄国派来的苏维埃的军队，才是英勇奋起保卫自己城市的巴库无产阶级的真挚的朋友和保卫者。只有苏维埃的军队同巴库无产阶级并肩战斗，才能保卫巴库，使巴库免遭德国—土耳其和英帝国主义者的蹂躏。中央政权派来的军事委员彼得罗夫同志的部队正在进行这样的战斗。

工人同志们！在彼得罗夫同志部队的旗帜下前进，在派彼得罗夫部队来的、我们亲爱的工农俄罗斯的旗帜下前进！

战斗的巴库无产阶级万岁！

伟大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

和俄国不可分割的、不依赖帝国主义的革命城市巴库万岁！”

* * *

在彼得罗夫广场，在我们的部队驻扎的楼房周围和附近几条街道，都布置了岗哨。专门派了党的组织者分赴市内各区动员共产党员和我们的拥护者参加彼得罗夫的部队。部队的训练在顺利地地进行。

8月4日从我们的码头可以看到，载有应“里海舰

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领导人的邀请来巴库的英国军队的军舰开始在巴库港口的其他码头靠岸。这些叛徒为英国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英国士兵登陆后，列队走过巴库的主要街道。这一天英国人总共来了约二百人。但为了给居民们“留下印象”，英国人的部队在同一条街上来回走了两趟。以后连着几天，英国军队不断开进巴库，但是人数仍然很少：来到巴库的英国士兵总共有一千人左右，而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所许诺和吹嘘的一万六千人。英国人并没有把自己所有的部队都派到前线去，而是把很大一部分留在城里。看来，他们有两个目的：第一，控制政府，让自己的部队执行不折不扣的占领军的职能；第二，避免前线的过多伤亡。

在彼得罗夫的炮兵部队成功地击退了土耳其人的突破以后，人心振奋，斗志昂扬。我走在街上，亲眼看见一批一批的工人，有的高兴地进行军事训练，有的整队高唱战歌奔赴前线。当时在船上和彼得罗夫广场上的武装红军战士大约有三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巴库共产党员。

但整个局势仍极不明朗。正因为如此，弗·伊·列宁非常担心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的命运，于8月9日向阿斯特拉罕苏维埃主席发电询问巴库的真实情况。列宁问什么人掌握巴库的政权，邵武勉现在在哪里。因为他远在莫斯科，“由于不了解情况，……不可能及时地帮助”。^①因此列宁指示，要根据当前的形势就地决定自己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45页。——译者

的行动。

1918年8月10日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会议（这是在巴库苏维埃政权失败以后）。在这次会议上，邵武勉在报告中详述了苏维埃俄国的国外形势和战场上的情况。根据现有情报，局势在恶化，特别是在北高加索，由邓尼金和克拉斯诺夫率领的哥萨克反革命匪帮取得了许多胜利并占领了克拉斯诺达尔。克拉斯诺夫的军队切断了北高加索之后，正向察里津推进。

当时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在北高加索领导了抗击反革命势力进攻的斗争。

邵武勉报告说，根据现有情报，土耳其人8月初未能占领巴库之后，便从美索不达米亚前线调来增援部队，企图给巴库以决定性的打击。他说，中央俄罗斯是否已派出苏维埃军队来支援，我们目前还没有消息。因为伏尔加河一带局势非常严重，我们很难指望这种援军。邵武勉接着说，我们尚有力量夺取政权，但我们未必能够在既与土耳其人又与英国武装力量两方面同时进行的斗争中掌握并保持住政权。邵武勉建议说，因此把我们的军队从巴库经阿斯特拉罕撤到俄罗斯较为妥当。这样保存了军队，既可以参加伏尔加河一带的战斗，又可以进行整训，以便半年一年之后返回巴库重建苏维埃政权。邵武勉的这个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有小部分同志反对这个建议。他们坚持要执行上届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即推翻“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

专政委员会”，夺取政权，在巴库无产阶级的支持下，用自己的力量赶走武装干涉者。这些同志说，应当看到，当地居民已经对英国人援助的效果大失所望，他们已经认清了右派政党活动的叛卖性质，而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日益增长。

在会上，赞成把军队撤退到阿斯特拉罕建议的有二十二票，反对的有八票（其中有我一票）。

早在代表会议之前，我就有一个想法，要重新出版当时被“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当局查封的《巴库工人报》。党的代表会议召开的前夕，我把这个想法对邵武勉说了。他回答说：

“这个想法很好，可是咱们没有印刷厂啊。”

“咱们现在确实没有印刷厂，”我回答说，“不过离我们部队驻地不远有一个满不错的‘合作协会’印刷厂。为什么不把它夺过来，何况孟什维克未必敢用武力来反抗我们。”

邵武勉在和巴库党委会其他委员商量后，同意了我的意见。他说，第一期报纸的稿件，由他亲自和查帕里泽一起准备，同时委派我去夺取印刷厂并组织印刷厂的工作。

我挑选了几个红军战士参加这次行动，其中有邵武勉的两个儿子、穆谢依卜·达达舍夫，两个排字工人和“现成的”校对员——奥尔加·沙图诺夫斯卡娅。

天黑后，我们乘装甲车到了印刷厂。我们包围了房

子，布置了岗哨。就这样我们不声不响地占领了印刷厂并开始了工作。

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排完了第一版，校对了清样，并开始印报纸。

因为这次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我们都很兴奋。

没过多久街上来人向我们报告说，孟什维克的巡逻队正走近我们的岗哨，不过现在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但还没有印出一百份报纸，灯就熄了。印刷机停了。我们马上陷入一片漆黑之中。

我们点上了从这幢房子的住户那里借来的蜡烛、煤油灯和灯笼，用手摇着印刷机继续印报纸。

到深夜，又印了几百份报纸，我们带着全部印好的报纸，还有一箱铅字和手摇印刷机（说不定以后印传单还用得着呢！），离开了印刷厂。第二天早上，在红军战士、工人、共青团员的协助下，我们在全巴库广泛散发了我们自己的报纸。报上刊登了邵武勉写的两篇文章，其中反映了最近一次党代表会议决议的精神。

党代表会议结束后，立即召开了巴库党委会会议。会上讨论了由于党的积极分子和我们部队的撤离，巴库党的工作如何进行，以及巴库党委成员中谁留下来领导地下工作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不让邵武勉、阿齐兹别科夫、查帕里泽、费奥列托夫和科尔加诺夫留下，因为他们很容易被认出来。决定不讨论把他们留下来的问题，而只讨论其他同志谁留下来的问题。会议委托邵武勉和查

帕里泽考虑并决定谁留下来的问题。

第二天早上，我来找邵武勉，对他说我想作为巴库党委会委员留在巴库做地下工作。他回答说：

“这当然很好，但这对你有加倍的危险。你知道，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阿马扎斯普特别恨你，他已经要他手下的暴徒干掉你。因此你的行动要特别特别的小心。”

我说这点我很清楚，骑兵连的连长萨法罗夫已经提醒过我了。

“另外，鬼并不象人们所描绘的那样可怕。”我对邵武勉说。不过我当然还是答应他，一定要小心从事。

“无论如何你还是不能在巴库久留，”邵武勉继续说，“因此，我们一到阿斯特拉罕，就马上派人来换你。”

然后他提出确定和阿斯特拉罕联系的密码，并建议我使用最简单的密码进行通讯联系。在船上，邵武勉手头有一本莫斯科出版的小册子《国际形势和我们的任务》。邵武勉翻开小册子的一页，对我说：“从这页正数第十行起便是密码的开头。”从这一行的第一个字母开始，顺次出现的每一个字母——从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到最后最后一个字母——（重复的不算）都用数字作标记。根据这些数字就可以把电文译成密码。（不过，后来我们并没有机会使用这份密码。）

我们的同志在码头又停了一天。我们留下来工作的人，约定了一个秘密的住宅，并约定用从“合作协会”印刷

厂拿来的铅字和手摇印刷机建立一个地下印刷厂。

我们决定当天就把铅字和手摇印刷机搬到秘密住宅并在那里建立印刷厂。遗憾的是，我们把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交给了一些毫无经验的人去做。一个阿塞拜疆的大学生建议我们用他的住房充作印刷所。我们委派“小格沃尔克”（在地下工作时大家都这样称呼我们其中的一个同志——布尔什维克阿维季相）跟这个大学生去，把铅字搬到他的房间。这个大学生住在城里的穆斯林区。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是一旦土耳其人占领城市时，住在这个区很有好处。可是格沃尔克太缺乏经验了，搬铅字时，他没有遵守地下工作的规定，把装着铅字的沉重箱子用被子包起来并让安巴拉（波斯搬运工人，背上背着专门供放重东西用的架子）背上。“小格沃尔克”和波斯搬运工人并排走。裹在被子里的东西体积并不大，但是却非常重。这引起了怀疑。在一条街上，敌人的巡逻兵叫住了安巴拉，问他背的是什么东西这么沉，把背都压弯了。接着敌人的巡逻兵强令安巴拉把东西放下来检查。“小格沃尔克”见势不妙，就溜了。于是铅字便落到了警察局手里。

我们的老同志们动身到阿斯特拉罕之前，我们就召开了留在巴库的地下工作者的第一次组织会议。预先商定了留下的人员和分工；商定了互相联系的地点，规定了秘密接头的住所等等。

由于建立地下印刷厂的计划失败了，我们就开始考虑，无论如何要想办法继续印发传单。阿尔塔克答应为

新印刷厂找房子，我负责找铅字，因为我当过编辑，对于印刷业务多少还知道一些。

* * *

巴库党委会通过了关于从巴库撤退苏维埃部队的决议后，为了使得“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代表能够同意部队开到阿斯特拉罕而不加阻挠，曾委托了特派代表和他们的代表进行谈判。孟什维克对于能够摆脱开布尔什维克这支强大的力量而喜出望外，马上就同意了，但是他们要求我们留下全部武器和弹药。邵武勉坚决拒绝了他们这一要求。他委托我们的代表发表声明说，武器是属于苏维埃俄罗斯的；这些武器是为其他战线上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所必需的，因此不能留下。经过长时间的争论，“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代表才勉强同意苏维埃部队带着武器撤走。同时中央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里海舰队委员波卢欣与“阿尔达汉号”船员商定，他们将负责警卫，并保证整个撤退的安全。

1918年8月14日下午满载着我们部队和装备的十七艘轮船相继开出巴库码头。人民委员及其他许多负责干部乘坐的“科列斯尼科夫号”首先离港。我们站在码头上向朋友们挥手送别，当时我们还以为他们此去会一帆风顺。我们没有等最后一批船起航就离开了码头，因为“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部队随时都可能在广场上出现并逮捕我们。

当时我们怀着沉重的感情离开了码头。我们同我们

非常亲密的人，有经验的、比我们成熟的共产党员领导同志告别。但同时我们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心情——一种强烈的、党员的责任感。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代替他们留下来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的。我不想隐瞒，这种意识使我们内心充满了革命的自豪感。

第三天，我们获悉，在日洛伊岛附近所有的船都被“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舰队包围并强迫折回了军港，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军队被解除了武装，乘原船去阿斯特拉罕。以邵武勉为首的巴库委员和其他领导同志共三十五人被捕下狱。

“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报道这件事时，恶毒诽谤我们的委员，指责他们从前线逃跑并企图带走贵重物品。他们千方百计地在人民中破坏巴库委员的名誉，为自己背信弃义的行为辩解。

我们马上开会，确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营救处境非常危险的同志，并通过了这样的决议：作为紧急措施，立即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达什纳克党人的代表商定向“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联合提出最后通牒。

最后通牒要求立即释放全体被捕的同志，并为他们去阿斯特拉罕提供条件，因为对他们的拘留是非法的，是毫无道理的，同时也是违反当局所承担的对他们的撤退不加阻挠的义务的。布尔什维克巴库党委会及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达什纳克党警告“专政委员会”成员，如果

我们的同志伤了一根毫毛，就将对“专政委员会”所有成员采取个人恐怖行动。

应该指出，为了在同“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斗争中更好地配合行动和联合表态，当时三个党（布尔什维克、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左派达什纳克党）成立了一个左派社会党常务委员会。

在当时的斗争条件下，做出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应该注意的是，左派达什纳克党是一个人数不多的工人小组，这些工人已经脱离了达什纳克党，并支持苏维埃政权。左派达什纳克党的领导人阿维斯·努里贾尼扬不久（英国人第二次占领巴库期间）就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他参加了推翻达什纳克政府的战斗，成为亚美尼亚苏维埃政府的成员。

我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达什纳克党人的代表带着我们共同签署的呼吁书来到“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要求会见萨多夫斯基主席。以前我们就认识萨多夫斯基。我把我们的呼吁书交给他。当他看完了呼吁书时，我稍等了一会儿便对他说：

“对于发出这份呼吁书的政党您是很了解的。您不要怀疑我们是有能力实现呼吁书中提到的警告的。如果在走出这座大厦之前，你们当场把我们逮捕了，那也无济于事。我们每一个党都已经成立了恐怖小组，一旦必要，他们就会协同行动。”

这些警告对萨多夫斯基是有效果的。他开始辩

解,并要我们相信被捕人的生命没有危险,谁也不想迫害他们。他还说,要进行调查,然后做出处理决定。我们没有和他争辩,留下声明就走了。我们都很清楚,叛徒是不堪信任的,他们的话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最后通牒只能暂时推迟对巴库委员的迫害,危险依然存在。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我们应当开展广泛的政治斗争。

我们的斗争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没过几天,尤其是获悉我们的同志被捕之后,各区有很多党员,聚集到我们的周围。

这时,著名的巴库党的活动家——格奥尔基·斯图鲁阿来到巴库。最近几个月来,他作为巴库人民委员会的特派员呆在北高加索采购粮食,并把粮食运到巴库。由于巴库和北高加索之间的铁路交通中断,他便在基兹利亚尔区的一个码头把粮食装上船发走了。斯图鲁阿听说巴库出事,但不确切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他到达巴库港后,当即被捕。他性格倔强、坚韧不拔、意志刚毅、毫不妥协,是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还在沙皇时代他就经受了很好的地下工作的锻炼。早在1900年初他就在莫斯科党的地下印刷厂工作过。

被捕后,他为自己辩护并证明了逮捕他是非法的,因为最近他除了给饥饿中的巴库居民运送粮食之外,没有干任何其他事。这个有经验的党员地下工作者,同时又是布尔什维克巴库党委会委员的到来使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成立了布尔什维克巴库党委会新的领导班子。

考虑到目前形势，我们决定全力以赴地开展公开的斗争：经常在集会和各种会议上，在工人组织中以及其他场合发表演说，同时保持并巩固市中心和各区严守秘密的党组织。巴库党委会会有几个委员分工专门搞秘密的组织工作，不在公开集会上露面，他们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自己。这件工作委派给萨尔基斯和普列沙科夫。米尔·巴希尔·卡苏莫夫和他们一起在阿塞拜疆工人中进行工作。他是一个积极的工人共产党员，领导“什米德特中尉”工厂的党组织；后来是阿塞拜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积极参加工作的还有巴库青年联盟创始人之一、青年印刷工人贾法尔·巴巴耶夫和阿加耶夫三兄弟。他们兄弟三人出生在波斯，都是积极的共产党员，担任阿塞拜疆工人中的党组织的领导工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鲁胡拉·阿洪多夫和我们有联系，他领导阿塞拜疆工人中间的工作。工会工作我们委派给水运工会主席古巴诺夫和当时还很年轻的列旺·米尔佐扬。马尔季科扬、沙图诺夫斯卡娅、阿加米罗夫、斯塔姆鲍利茨扬和克拉马连科当时也为巴库党委会做了大量工作。

出版报纸我们是没有指望了。于是提出了建立地下印刷所印刷传单的问题。阿尔塔克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找到了一所房子，至今还健在的老布尔什维克马罗·图马尼扬当时就住在这所房子里。阿尔塔克和马鲁夏·克拉马连科也搬到那里去住了，他们负责“管理”印刷所。在原来出版《消息报》的那个印刷厂找到了一个党

员排字工人。铅字还是由我去搞。我来到《消息报》印刷厂经理那里(这以前我们很熟悉),对他说:如果发现铅字丢失,请不要声张,不会是被偷走的。我说,我完全相信他,相信他如果看见工人拿铅字,也不会刁难。他心照不宣地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同意地点了点头。

我们找到的那个党员排字工人和他的同志们,接连几天把铅字藏在衣袋里带给我们。通过他们,我们又搞到一台小手摇印刷机。于是我们就有可能印传单了。第一张传单是布尔什维克巴库党委会告巴库工人书,它号召巴库工人在集会上要求立即释放非法被捕的巴库无产阶级的领袖。当时我们利用一切工人集会、工厂委员会和其他工人组织来揭露“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贩卖政策,并要求立即释放巴库委员。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这些叛徒政党觉察到,逮捕巴库委员在人民中引起了不满,于是,在1918年8月份召开了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理事会的特别会议,妄图以此来巩固他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地位。

不出所料,出席这次会议的工人寥寥无几。因为优秀工人(首先是共产党员)当时都在红军中(后来他们被“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解除了武装,送到阿斯特拉罕),同时还因为会议的组织者极力把那些根本不能代表巴库工人利益的多半是拥护他们的人拉到会场上来。

布尔什维克委派我在这次会议一开始就发表紧急声明。这篇声明的摘要曾刊登在1918年8月26日孟什维克

的《星火报》上。

《星火报》报道说：“米高扬同志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声明。

他抗议这次会议没有及时通知各地区。正式通知在开会的前一天才公布。

米高扬同志声明，布尔什维克党团认为这里一定有鬼。”

记得，好不容易我才在这次会议上争得第二次发言，以便批驳“专政委员会”的头子孟什维克萨多夫斯基的报告。

应该说，萨多夫斯基是一个蛊惑能手，擅长诡辩。他忽而蛊惑人心地说，在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召开之前（这个新的工人代表苏维埃将决定巴库政权的性质），现在的“专政委员会”是临时政权；他忽而又号召用在“普选”基础上产生的真正代表人民的政权来代替“布尔什维克的统治。”为了掩盖“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领导人同英国军队的罪恶勾结，他“一再论证”这些军队完全服从当地的俄罗斯司令部的指挥，他们在巴库没有任何特殊的政治目的，绝不干涉巴库的内政。他假惺惺地声称，孟什维克要“为俄罗斯保卫巴库，因为俄罗斯没有巴库的燃料不行，而巴库没有俄罗斯更不行”。同时，他又散布关于红军和巴库委员撤退的流言蜚语，为逮捕邵武勉和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叛卖行为辩护。

我在第二次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证明“里海舰队中

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完全依附于英军司令部，说明“专政委员会”不过是占领者手中的傀儡而已。我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的背叛行为给巴库带来了多么大的危害，揭露了“专政委员会”对布尔什维克采取白色恐怖手段。我说，我们失去了领导人，他们被关进监狱，我们的报纸被查封，我们被禁止在会上、在军队中、在工人中发言，而这一切都是在虚伪的“民主”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的。我在结束发言时，要求立即释放巴库无产阶级的领袖。

读者看一看 1918 年 8 月 24 日《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公报》的编辑如何报道我的那篇发言，想来是很有趣的。现在我就把这篇“报道”逐字逐句地抄录如下：

“米高扬（布尔什维克党团代表）：刚才对我党进行了许多挑衅性攻击，在只有二十分钟的发言里，我不可能一一回答。

我们和彼得罗夫的部队始终坚守阵地，而他们，达什纳克党人，则要献城。（喧哗声）为什么我们辞去了职务？因为达什纳克党人在敌人进攻的紧急关头拒不抵抗。战场上无人作战，而在城里却有大量军队。我们到处都看到右翼政党的怠工行为。7 月 25 日，在苏维埃作出邀请英国人的决定后，我们不赞成这种行动，便提出辞职，以便让那些企图掌握政权的政党去这样做吧！

萨多夫斯基厚颜无耻地说，彼得罗夫的部队只有二百人。不是二百人，而是一千三百人，其中有六百人在战

场上牺牲了。直到7月31日以前只有他们在左翼阵地和巴拉札雷坚守着。(哗然)

我本来可以举出很多事实说明使我们吃败仗的真正原因，不过我现在要回答对我们的其他攻击。你们大概记得这样一个谣言：来了一个德军司令部代表，带着列宁给邵武勉的信。为此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进行调查。结果查明，这纯属造谣。

有人说，布尔什维克抢了钱跑掉了。十天前，正是这个所谓‘专政委员会’的地方当局建议人民委员会离开这里的。如果他们明明知道布尔什维克抢了钱，又允许他们离开，那么他们自己就是罪犯。(左边响起掌声)大家都知道，给邵武勉、科尔加诺夫、查帕里泽加上这个罪名是不行的。

《公报》写道：所有被拘留者将交法院审判，并送进监狱。

他们要堵住我们的口，禁止我们在军队中进行宣传，不许我们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掌握政权的时候，所有党派，除了孟什维克之外，都有自己的机关报，就连孟什维克也能够在会上自由地阐述自己的意见。

早在去年7月，你们就企图挑动群众反对我们，而去年7月时无产阶级也怀着反对我们的情绪，可是后来，他们站在拥护我们一边。现在他们也将站在拥护我们的一边。

当有人高喊必需建立一个拥有统一的中央政权的、

统一的俄罗斯的时候，他们却忘记了正是他们自己用邀请英国人的决定破坏了这一原则。在各苏维埃都派有代表参加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曾做出了不经过中央政权不能邀请协约国的决定。

当英国人武装捷克斯洛伐克人，武装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俘的时候，我们，邵武勉同志和彼得罗夫同志作为中央政权的代表，不能够和英国人并肩战斗。（笑声）

当英国帝国主义的爪牙开始压迫俄国，侵占俄国的城市，折磨每一个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喧哗声），当德国帝国主义在西方把魔爪伸向俄国的时候……（喧哗声，听不见演讲人的话。）

你们的救星比切拉霍夫跑到北高加索去了，他正在要求你们援助。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权的代表彼得罗夫和邵武勉应当离开巴库。彼得罗夫的部队并不是逃跑。这种话只有恬不知耻的谎言家才说得出口。彼得罗夫部队出发前准备了两天，这是有目共睹的。

还有人说，英国人不会干涉内政。如此说来，英国人将为我们长了一双美丽的眼睛而流自己的血哩！不，他们已经把魔爪伸向我们的粮食，还说什么粮食供应不好战线就不可能巩固。而所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都说粮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这就是说英国人已经干涉了政治。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例子向我们充分说明……（喧哗声）

据说，这里将要在普选权的基础上建立政权。这是以此否定工人政权。原来的政权纵然再片面，它毕竟是工人政权，而普选权意味着那些大老板、投机商……也将参加政权……（全场喧哗。演讲人走下讲台。）”

努里贾尼扬代表左派达什纳克党人在会上发言支持我们的路线。接着勃柳明同志代表布尔什维克发言，他揭露了萨多夫斯基的许多骗人论点和右派达什纳克党人的两面派立场。

为了把我们发言的印象化为乌有，萨多夫斯基又一次做了冗长的诬蔑性的发言，随后孟什维克巴加图罗夫发言。他们得到了在这次会议上占多数的自己的走狗和应声虫的支持。

会议停止辩论后，宣读了由社会革命党人起草的转弯抹角、蛊惑人心的决议。但决议又直接表示信任和支持“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孟什维克走得更远：他们建议在决议中写上，巴库委员是人民的叛徒和敌人。决议以一百一十七票赞成、二十票反对被通过。

于是贝克尔同志当即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发表声明。现在我把这篇声明按照在那一期《公报》上刊登时的样子转引如下：“我们认为会议的召开是不正常的，因此是没有全权的。（喧哗声）工人没有出席大会。（全场大哗，演讲人尽力提高嗓门压倒会场的叫喊声）因此我们不提出任何决议案！”

这次会议后，我们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左派达什纳

克党人商定，以我们三个左派政党的名义准备了一份书面的呼吁书，要求立即释放巴库委员并成立由巴库所有社会党代表组成的各党联合调查委员会，审理对巴库委员提出的指控。我们把呼吁书交给了萨多夫斯基。看来他是不想让我们知道他的意图，他当时没有和我们争辩，只是说将把我们的呼吁书报告给“专政委员会”，如何决定以后通知我们。

第二天，我们从报上得知，“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政府拒绝了我们的要求，并把被捕的委员移交给以“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工作人员瓦辛和达林为首的他们自己的非常委员会处理。

我们最关心的首要问题就是尽快和被捕同志们取得联系，了解他们的情况，给他们送食物。我们开始凑钱购买食品。这件事我们委托给青年工作积极分子阿加米罗夫以及邵武勉的秘书兼打字员斯捷潘诺娃去做。斯捷潘诺娃至今还健在，住在莫斯科。被捕的人推选科尔加诺夫为组长，斯捷潘诺娃与他保持联系。

不久，查帕里泽的妻子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她和邵武勉一家一起撤退到阿斯特拉罕，然后她把自己两个小女儿托给邵武勉的妻子照看，而自己却乘船返回巴库。

斯捷潘诺娃还保存着科尔加诺夫从巴依洛夫监狱发给她的一封信。科尔加诺夫在这封信中详细谈了怎样才能更好地组织向狱中送食物以支援被捕同志的意见。他

建议斯捷潘诺娃和我谈一谈，并把他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想法转告给我。有趣的是，科尔加诺夫在这封信里要求把所有送到监狱里的东西都用最近的报纸包上，并在这些“小口袋”的里面写上监狱外面的情况。他提醒说：“但是，特别重要的信件，只能通过专人送递。”

我们组织了不少次亲属和被捕同志的会面。这中间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和她的丈夫见了面。经过强烈的要求才准许我和邵武勉见一面。他站在铁栏杆里边，我站在外面（还在沙皇时期邵武勉就在这个监狱里与同志们和他的家属多次这样会面）。他看来很疲倦，脸色苍白。他聚精会神地听我讲我们所做的事情。我甚至觉得，在他的眼中似乎显出惊奇的神色：监狱外面的这些青年人，虽然还没有什么经验，但他们却做了很多工作，并且干得很好。他对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记得，我对孟什维克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曾经自称是我们的同志，甚至和我们同属于一个政党，但现在他们却对这些清白无辜的革命者这样无耻地进行诽谤。我说，不仅工人，就连普通的居民对此也都很气愤。

当时，邵武勉对我说：

“你不要激动。谣言是不能持久的，它将被生活本身所揭穿。真理在我们这边，真理一定胜利。”

我要求邵武勉就今后我们应当采取什么策略给予指示。

“巴库党委会采取的措施是正确的，”斯捷潘对我说，

“应当贯彻执行。”

巴库委员被捕后不久，我们以年幼为理由把邵武勉的儿子列瓦（那时他才十四岁）营救出狱。稍后，我们又把他的大儿子，当时只有十七岁的苏连保释出来。

从苏连那里，我们了解到船在离巴库不远的日洛伊岛附近被截住的详细情况。当时，他们正在等候其他船只。（等最后两只船的时间特别长：这两只船迁到了风暴。风暴对于下层甲板上满载着红军战士和武器的油船来说是非常危险的。）

里海舰队的船包围了他们，把炮口对准了他们，并发出了最后通牒，要他们返回巴库。邵武勉和其他同志拒绝了这一非法的要求。于是敌人向他们开火了，造成了人员的伤亡。

这时，许多同志要求邵武勉、查帕里泽和阿齐兹别科夫离开其他委员在日洛伊岛上岸，然后在那里乘汽艇或鱼船到阿斯特拉罕。但他们三人都坚决拒绝离开同志们。

“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军舰很快驶了过来，在它的押送下，我们的船被迫折回巴库，并被解除了武装。巴库委员以及其他的苏维埃领导人和党的工作人员一起被捕入狱。

* * *

巴库的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先进的工人在各种集会上纷纷要求释放被捕的委员。但是，依仗着英国人刺刀

的右派,却不准备释放被捕者,而且准备迫害他们。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了给当时存在于巴库的政权找到社会民主的根据,同时把布尔什维克从巴库苏维埃中全部排挤出去,企图搞一次选举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新班子,并定于1918年8月28日进行选举。

我们方面决定参加这次选举,并把这次竞选活动变为争取释放我们的被捕同志的广泛的工人运动。但是我们没有可能进行充分的准备。

孟什维克搞的选举运动,严重地侵犯了我党起码的民主权利。不准布尔什维克出版任何合法的刊物,不让我们参加军人的会议。我们无论如何也要赢得几天的时间使我们能影响一些大企业,为此我们以三个左派社会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向中央选举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声明,要求推迟选举一周,我们提出的理由是选举运动的规程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选举定于8月28日举行。但直到选举的前一天,也就是我们递交声明的那一天,报纸上还没有公布代表候选人名单。我们声明说,如果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将视为玩弄新的花招。

他们一面拒绝我们的要求,一面又继续玩弄民主,在选举进行了两天之后,才在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上发表了我们的声明。

我们终于在秘密印刷厂里印刷了竞选传单,号召投布尔什维克代表的票。在巴库各区,我们提出被捕的巴

库委员和工人中的积极分子为苏维埃代表候选人。尽管障碍重重，巴库的工人还是把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选进了苏维埃，其中有九名是被捕的巴库委员：邵武勉、查帕里泽、泽文、费奥列托夫、阿齐兹别科夫、巴辛、科尔加诺夫、马雷金和波格丹诺夫。斯图鲁阿、我以及其他几个共产党员也当选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达什纳克党人中，当选的有七名代表，其中有人民委员维齐罗夫。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完全孤立布尔什维克的企图破产了。先进的巴库工人也支持我们提出的立即释放被捕同志的要求。

就在这个时候，土耳其军队对巴库发动了新的进攻。进攻被打退了。土耳其人和英国军队双方伤亡都很大。但是不久，土耳其人终于占领了一个高地。他们在高地上架起了大炮，开始不断地炮轰巴库。

新的苏维埃第一次会议在执行委员会大楼召开。代表已经到齐，会议本应开始，这时炮弹打到执行委员会大楼。孟什维克建议会议转移到海滨大街的一家饭店举行。饭店设在一座多层楼房的一楼。楼房正面临海，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安全。孟什维克的建议被采纳了。饭店大厅里摆好了椅子和主席台。我们布尔什维克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左派达什纳克党人集中地坐在大厅的左侧。

选举结果揭晓后，我们向“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

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书面要求，要求释放当选为巴库苏维埃代表从而得到工人阶级信任的被捕的巴库委员。

在巴库苏维埃9月5日的会议上，格奥尔基·斯图鲁阿受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委托发了言。他坚决要求释放当选为苏维埃代表的被捕同志出狱，使他们能够参加苏维埃的工作，从而履行工人阶级代表的职权。

三天后，《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公报》上发表一条消息说：“在苏维埃的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斯图鲁阿，以及随后发言的米高扬、贝克尔、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国际主义者捷尔-萨阿克扬等人都提出了立即释放现在监狱受迫害的原人民委员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参加苏维埃的问题。”

左派党团某些代表关于这个问题的发言是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几个首领反对释放被捕的委员而引起的。主要发言人萨多夫斯基宣布，共产党人向“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提出的关于释放委员的要求，已经审查备案。这实际上等于拒绝。萨多夫斯基和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的其他发言人极力证明，不能释放被捕的委员，因为他们被控有罪，最后的结论要由法院来做。

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坚决要求：“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侦察机关——它是老沙皇的御用仆从——必须撤回控告巴库委员的材料，并转交给由参加苏维埃的所有政党的代表组成的各党专门委员

会审理。同时，我们援引了被捕的巴库委员的信，他们在信中义正辞严地宣布，拒绝向“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司法当局提供任何供词，并且要求让他们获释后能够亲自向巴库苏维埃报告他们的全部活动。

争吵持续了很久。最后，右派政党中断了辩论。因为再争论下去就会暴露他们加给巴库委员的罪名纯属捏造。

会议主席提出就共产党党团提出的苏维埃不待侦查和审判立即释放全体被捕代表的动议进行表决。表决结果是二十七票赞成，一百二十二票反对，十九票弃权。

然后，就我们的第二个建议，即关于成立由参加苏维埃所有政党代表组成的专门审讯委员会的建议进行表决。赞成的四十二票，弃权的三票，其余的反对。

于是，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两个建议都被否决了。这激起了我们的强烈愤慨。我们的代表不理睬会议主席一再摇铃和喊叫，跳起来高声抗议。

右派政党的席位上也大吵大嚷起来。两个敌对阵营之间展开了一场真正的搏斗。

会议主席勉强恢复了秩序，并利用会上自己一派的多数表决通过了右派社会革命党党团的下列提案：“会议听取共产党党团的声明和‘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临时专政委员会’及执行委员会的解释后，转入例行日程。”

布尔什维克的死敌、孟什维克的首领埃奥洛发了言。

他建议以苏维埃的名义通过告人民和军队书。

我于是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团建议在研究告人民和军队书之前，先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即政权的问题。

“在巴库，”我说，“有一个未经过任何人选举而自行产生的‘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掌握着政权。现在已经选出了新的苏维埃，应当解散这一非法的机构，并把一切权力集中到苏维埃（出自策略的考虑，这一建议在当时是适宜的）。然后，才能够讨论告人民书及其内容的问题。”

苏维埃完全无视我们的这一建议，甚至根本不予讨论。

埃奥洛宣读了几点以孟什维克的政策为基调写成的告人民和军队书的提纲”。

关于这个“提纲”我声明如下：

“共产党党团不参加讨论提交大会的这个文告，并且指出，以苏维埃的名义和旗号掩盖资产阶级政权的活动并利用苏维埃反对共产党员的一切企图，我党都将愤然拒绝，并绝不参加任何表决。”

“告人民和军队书在我们未参加投票情况下被通过。然后，会议主席又回到我所提出的巴库政权问题。他说：

“自苏维埃召集开会时起，‘专政委员会’法律上的权力即行停止。提出请它继续行使，则取决于我们。”

斯图鲁阿对这一建议提出了抗议。他说：苏维埃不能把自己的职权转交给任何人。苏维埃应自己行使全部

权力，并取消临时的“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维伦茨建议：在苏维埃选出新的权力机构之前，继续由“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行使政府的全部权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利用苏维埃会议的多数，强行通过了这一建议。

苏维埃会议决定，在下一次会议上听取各个政党的宣言并讨论政权的组成问题。

* * *

9月7日“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非常委员会发表公告，指控查帕里泽、彼得罗夫和其他几个委员犯了“刑事罪”。这个指控如此荒唐透顶，因此第二天，当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代表谈判时，我们提出了抗议，迫使非常委员会不得不发表一封信说他们的公告“措词不当”。

在9月10日至9月11日举行的第二、第三次苏维埃会议上，苏维埃内部两个营垒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了。当右派政党宣读他们的宣言、吹嘘自己的政策并恶毒攻击共产党人时，左派代表席上不断发出强烈的抗议声。

应当指出的是，共产党党团的宣言事先就已经起草好了，它经过巴库党委会和苏维埃内布尔什维克党团的讨论，并且秘密送到监狱里得到邵武勉和其他同志的赞同。

轮到我发言时，我受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委托宣读宣

言。这个宣言稿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因此我在这里只能凭记忆所及加以引述。

宣言开头对国际形势、世界大战、对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以及发动残酷内战的国内其他反革命势力所扮演的叛卖角色作了简单的评述。

宣言揭露了国内的反革命势力与协约国的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是怎样串通一气的。揭露了巴库右派政党的背叛行为。他们口头上说什么他们拥护俄国，他们把英国人请进来，目的是要为俄国保卫巴库，但实际上他们却拒不承认俄国的中央政府，他们这样做，就是企图把巴库从俄国分裂出去。宣言明确指出：英国人来巴库并不是为了俄国而保卫巴库，也不是为了反对土耳其人，而是为了侵占巴库。宣言接着指出：不仅在这里，而且在整个南高加索、中亚细亚和俄国，英国人都是这样干的。英国人的目的就是扼杀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肢解俄国，侵占她的富饶的边疆地区，把这些地区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协约国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追求同样的目的。

在这场革命的俄国与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的殊死搏斗中，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的”政党以及他们在巴库建立的政权正在扮演外国干涉者的傀儡的角色，他们是站在反革命营垒一边的。

宣言揭露了达什纳克党人所扮演的叛徒角色以及里海舰队的叛变行为。这个舰队的部分人员受了英国人的

欺骗，部分人员被英国人收买了。

宣言指出，结果巴库与俄罗斯的联系被割断了。英国人成了巴库的真正主宰者，“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是英国人的仆从，而巴库无产阶级的领袖却被投入监狱。我们愤怒驳斥对被捕的巴库委员提出的指控，指出这些指控是毫无根据的诬蔑，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

宣言最后说：尽管苏维埃俄国正在经历着重重困难，但国内战争必将以苏维埃政权的完全胜利而告终，世界革命必将在资本主义的废墟上取得胜利。

宣读宣言时，会场上的气氛极为紧张。主席多次摇铃打断我的发言。那些疯狂已极的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从座位上声嘶力竭的狂呼乱叫干扰我发言。尽管如此，我还是继续宣读宣言，而且嗓门越来越高，以压倒大厅里的叫喊声。

担任会议主席的是第一届国家杜马议员、老孟什维克米哈伊里琴科。当时他在巴库的政治舞台上并不是一个重要的角色。他之所以被推出来当主席，不过是为了给孟什维克控制的苏维埃支撑“门面”。米哈伊里琴科虽然不断摇铃打断我的发言，但他已无法控制会场了。于是坐在他身旁的奥辛采夫把铃从他手里抢了过去。

当我读到里海舰队的部分人员被英国人欺骗，部分人员被其收买时，疯狂已极的敌人从座位上站起来，一边喊叫一边恫吓地向我拥过来。奥辛采夫拚命摇铃，差点

儿碰着我的鼻子。此时我怒不可遏，伸手去拔经常插在腰带里的左轮手枪，幸亏那里没有枪。那天我偶然把枪忘在家里了。有几个人见我想拔枪，就拿手枪对准我。这时我把手伸进裤袋里。他们以为我是掏手枪，就向我猛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当他们把我的手拉出来一看，原来是……一块手绢。

这时，所有的左派代表举着椅子，涌向主席台保护我。顿时，会场一场混战，乱成一团。

奥辛采夫终于使会场恢复了点秩序。我们的敌人要求剥夺我的发言权，不让我读完宣言。但是会议主席显然是为了证明他的“民主”，劝他们让我念完宣言。

在四面八方一片叫嚷声中，我念完了宣言。大厅里响起了喊声，要求剥夺我的代表资格，并以所谓侮辱水兵的罪名把我送交法庭……水兵代表声称，他们要向法庭控告布尔什维克全党对他们的诬蔑……

我发言之后，社会革命党人代表提出了一项提案，驳斥“共产党人企图对我英勇舰队横加侮辱”，并建议“以苏维埃的名义对大公无私地、奋不顾身地保卫巴库城的舰队表示感谢”。这个提案在一片狂呼乱叫声中被宣布以多数票被通过。

会场上从新爆发了叫喊和吵闹声：左派代表大声痛斥叛徒，右派代表在席上乱喊乱叫。已不可能维持秩序，会议宣布中断。

第二天(9月11日)早晨看了《专政委员会公报》的

报道,把我们气坏了。报道说,由于军事审讯委员会的工作已经结束,被捕的巴库委员将送交军事法庭,为此专门批准了战地军事法庭临时条例。根据种种迹象可以看出,他们正在策划对巴库委员进行迫害。

于是我们决定把全部工作转到争取立即释放我们的同志上面来。在各区广泛开展了反对战地军事法庭的运动。我们决定充分利用在当天就要召开的苏维埃第三次会议来讨论被捕的委员的处境问题。

会议开幕时,我受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委托要求发言,就“专政委员会”把巴库无产阶级的领袖送交战地军事法庭审判这一起新的非法行动发表紧急声明。

不顾会议主席的警告,我以非常尖锐、激烈的措词揭露了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要求苏维埃撤销把巴库委员送交法庭审判的卑鄙决定,并要求立即释放他们。我声明说:苏维埃中居统治地位的党的领袖们要用自己的脑袋对巴库委员的命运和生命安全负责。

代表孟什维克发言的埃奥洛再次对巴库委员和我们党进行诬蔑。

这时,格奥尔基·斯图鲁阿发言。他的发言十分尖锐。他令人信服地揭露了右派政党的叛卖政策,并谴责他们正在成为迫害革命者的刽子手,同时他声明说,在工人阶级和历史面前他们是罪责难逃的。

这时,全场哗然。萨多夫斯基以及后来贝克尔的发

言都淹没在一片嘈杂声中。主席不让我们其他同志发言。他们只好抢着发言。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会议已不可能继续开下去了。孟什维克知道会议已经开不下去了，于是就交头接耳。会议主席随即宣布闭会。

为了说明孟什维克的报纸当时是怎样别有用心地报道巴库苏维埃最后两次会议的经过情形，现在我从他们的《星火报》上摘出几段话引述如下：

“……当共产党人念长篇宣言时，大厅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如同海绵浸满了水一样，宣言通篇充满了漫骂、狭隘的偏见和诽谤……

……共产党人发表了冗长的宣言，这是一份用《巴库工人报》通常‘风格’写的那种屡见不鲜的共产党人的哀悼。宣言通篇都是漫骂、诽谤性的攻击和谎言，全场愤怒的喊声，使得米高扬再也读不下去他们党的宣言了。激起特别气愤的是，共产党人诽谤里海舰队大多数人被英国人的金钱收买了。

苏维埃的成员忍无可忍。绝大多数人要求剥夺米高扬的发言权，不让他继续把宣言念下去。

会场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让米高扬念完宣言。

……如果从这篇所谓的‘宣言’中删去对一切非布尔什维克的漫骂，删去对海陆军的一些部队的诬蔑和诽谤，‘宣言’向劳动群众讲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讲！

但是你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十分重要的和伟大的，而主要的是‘非常新颖的’真理：

(1) 世界大战已经发生；

(2)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也接踵而来；

(3) 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政权就象圣经上所说的是在犹太人前面把他们从埃及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火柱一样，是走在前面照耀和指引世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唯一火炬；

(4) 凡此种种，促使共产党力求打一场连绵不断的国内战争，消灭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共产主义制度……

……共产党人的既定方针是破坏会议，他们无休止地提出种种要求，并发表许多声明，其语言十分下流，以致苏维埃全场不断发出喊声，要求剥夺共产党人的发言权。米哈伊里琴科同志为了维持会场秩序，搞得精疲力尽。最后，他只好让奥辛采夫同志当主席。奥辛采夫凭借他那大家公认的主持会议的才能，才使会场安静下来，并恢复了秩序。

由于会场的气氛十分紧张，使得会议已无法继续进行下去了。”

……9月14日清晨，我正在马尔季科扬^①家的阳台上睡觉，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查帕里泽跑来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从巴库逃跑，土耳其人很快就要进城了，应该赶快去营救被捕的巴库人民委员。

^① 谢尔戈·马尔季科扬——布尔什维克，斯·邵武勉的好友，后来是亚美尼亚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昨天夜里我们刚刚开过会，制定了营救同志们出狱的计划。但是，由于土耳其人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能够支配的时间屈指可数了。

我作为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成员，受委托去找“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当局，要求释放我们的同志出狱。如果他们拒绝释放，就要求他们把我们的同志撤走，以免落到土耳其人手里被摧残。此外，我们组织了一支六、七个人的战斗小分队，由邵武勉的大儿子担任队长。小分队装备有左轮手枪和手榴弹。我们约好，如果我营救同志们未成，土耳其人在城里一出现，小分队便袭击监狱，救出被捕的同志，而不用等待新的指示。因此，命令这支小分队始终留在巴依洛夫监狱区。我们还和苏维埃的“谢万号”轮船指挥人员约定，由他们把营救出狱的同志送到阿斯特拉罕。

“谢万号”是前几天载着几个代表从阿斯特拉罕开来的，表面上是来商谈阿斯特拉罕和巴库之间的商品交换问题。通过当地水兵中的共产党员我们得知，“谢万号”船来巴库的真正目的是要了解巴库城里的总的形势和被捕的巴库领导人的情况。因此，我们很容易便商量好了。

我们约定，傍晚“谢万号”停泊在离监狱不远的巴依洛夫区的码头上。

我来到“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交涉了几个小时要求接见，但高级长官中无一人，他们全已仓惶逃走。我这才知道，昨天夜里英国的残余部队已仓促乘船逃离巴库。

“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成员维伦茨终于在晚上露面了。我痛骂了他一顿。我说，如果把我们的同志留给土耳其人去折磨，那他们就是胆小鬼和混蛋。这件卑鄙的勾当实际上就是他们一手干的。我说，你们干的这桩卑鄙的行为是不会就此轻易了结的。

我对他说：“你维伦茨必须用脑袋对此负责。”

维伦茨声称，他不能从狱中释放人，他没有这个权力，不过他也不想把被捕的人员留给土耳其人。我问他，既然他没有权力释放他们，为什么不能把他们撤退？维伦茨回答说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至于谁有办法能撤退被捕的人，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我说我能做到，因为我是巴库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的成员。

维伦茨出乎意外地同意了我的这个意见，并说他将给反间谍机构副主任达林一个相应指示。我请求他就此事写一书面命令。他当即写了命令。我带着他的书面命令去找达林。幸亏正赶上他在。

“这是给您的指示，”我对达林说，“请您保证负责撤走被捕的巴库布尔什维克。”

“我不能做到这点，”达林对我说，“我没有船，也派不出人：没有护送他们的警卫。”

我回答他说，我们有一条备用的船，可以用来撤退被捕人员。他向我打听，从哪儿搞到的这条船？停泊在哪儿？我当然回避回答，只是说有关撤退的一切工作都已安排就绪。于是他又一次声明说他没有押送队，他不能

放走被捕人员，如果放走，实际上是让他们自由。我对他说：

“我是在你们的政权下当选的巴库代表苏维埃的成员，被授权护送和撤出被捕人员。这一切我亲自到监狱去处理就绪。”

但他继续坚持说要有押送的士兵，否则不能执行撤走的命令。还在这之前，我见非常委员会大楼里有几个工人出身的老兵。我走到他们跟前，开始劝说他们。我说我们的同志现在正关在监狱里，可能遭到土耳其人的折磨，并说出了他们的姓名。我恳求他们作为警卫跟我到监狱去。起初他们不肯，推说土耳其人已突入城中，他们自己也急于回家。但最后我还是把他们说通了。

“你们只到监狱，”我对他们说，“到了那里以后你们就可以随便走了。”

达林又固执了很久，最后还是签署了一道命令。命令中写道：委派巴库苏维埃成员阿·米高扬，随同派给他的警卫，从巴库撤走被捕的巴库委员。

我同派给我的“警卫”一起从市中心步行出发向巴依洛夫监狱大楼走去。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打算先找到按事先约定布置在监狱一带的我们的分队，但没有找到他们。我很吃惊。我想：“看来是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我才知道，小分队在我来到之前，被社会革命党人的一些水兵扣留了。）

监狱长站在监狱门口。他神色慌张，不知所措。我走

到他跟前作了自我介绍,向他出示了证件,并请他把被捕的人交给我。他对此很高兴。我简直是跑步走进监狱走廊的,看到我们所有的同志都站在囚室的门口,好象在等待着什么似的。他们已听到枪炮声。这时我大声地说,他们马上就要获释出狱,并乘坐从阿斯特拉罕来的“谢万号”船离开巴库。

但小分队依然到处都不见。在预先约定的地方也没有轮船。路上碰到的人对我说,“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队伍强占了“谢万号”船,并且把它赶到什么地方去了。

现在只有一条出路:到城里去,找个可以隐藏的地方。

这时土耳其人已用步枪和机枪向“巴依洛夫”监狱扫射。子弹呼啸着从我们头上飞过。我们隐蔽在墙后面向前行进。当走近海滨区时,看见人们正匆匆忙忙地拥上停泊在码头的轮船。

在这里,我们碰见了骑着马的塔捷沃斯·阿米罗夫。他见到我们非常高兴,马上对邵武勉说:

“你们可以坐‘土库曼号’船从巴库撤退。”

我们急忙奔赴码头,上阿米罗夫指给我们的“土库曼号”轮船。“土库曼号”船上已经挤满了难民和全付武装的士兵。

根据阿米罗夫的指示,船的上层甲板和船员休息室分配给巴库委员和他们的同行人员。阿米罗夫自己也在

这里。船马上就要起航了……

“巴库公社”失败后，巴库党的地下活动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了。土耳其人进入了巴库。

* * *

关于我们在“土库曼号”船上的情况以及二十六名巴库委员的悲惨牺牲，我稍后再讲。现在我想把我们离开后留在巴库的一位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奥尔加·沙图诺夫斯卡娅同志后来对我讲述的话转引在这里：

1918年9月15日土耳其人闯入巴库，在这里一直呆到11月（直到他们根据《凡尔赛条约》离开巴库时为止）。以后英国人又重新取他们而代之了。

土耳其干涉者在巴库到处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他们屠杀了许多无辜的居民——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和阿塞拜疆人。

这是一些多么骇人听闻的日子啊！留在巴库的人都到地下室、烟囱和其它一切可以藏身的地方躲避起来。

我和两个布尔什维克苏连·阿加米罗夫和亚历山大·巴拉诺夫躲在谢尔戈·马尔季科扬的家里。后来列万·果戈别里泽和科斯佳·鲁缅采夫也和我们住到一起。那时在巴库从事地下工作的还有阿加耶夫兄弟（巴赫拉姆、马格尔拉姆和伊姆兰），列旺·米尔佐扬、尤利亚·捷沃相和万尼亚·捷沃相^①、阿马利亚·托尼扬茨和其他许多同志。

不久我们得知巴库和格鲁吉亚之间的铁路已恢复通车。列

^① 伊万·费多罗维奇·捷沃相（1902—1958）是杰出的苏联国务活动家和党的活动家。重工业部门的一位组织者和领导者，苏联政府副主席。

万说，我们应当乘第一趟车去梯弗里斯，因为继续留在巴库很危险。

但如何去法？车站有警备队。果戈别里泽决定为自己搞一套格鲁吉亚军官服和军官证明，而让科斯佳·鲁缅采夫“打扮成”自己的勤务兵。这个行动成功了：果戈别里泽和鲁缅采夫顺利地坐第一趟火车走了。

阿加米罗夫、巴拉诺夫和我也同样搞到了车票和假的学生证件。我们带着车票和证件来到车站，准备坐火车走。但是在车站我们被“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两个旧职员认出来了。这两个人在巴库被土耳其人侵占后成了叛徒，为土耳其暗探局效劳。我们立刻被宪兵团团团围住。还有两个年轻人也被宪兵偶然地逼过来了。他们也被那两个奸细指为贝克尔和鲁缅采夫。年轻人表示抗议，结果横遭毒打。后来我们都被带到了土耳其的暗探局。

暗探局设在以前的省长的住宅里，局长是别哈埃德金-巴伊，外号叫“红头发的土耳其人”。同我们一起被偶然拘捕的两个年轻人后来被释放了，因为他们的亲属来证明了他们的身分后把他们领走了。

我们仍被关在暗探局里。苏连和舒拉被毒打。他们也用拳头打我的头。“红头发的土耳其人”知道我是邵武勉的私人秘书，极力想从我这里知道邵武勉的下落。然后他们又开始用皮鞭狠抽我的同志们。但是我们仍一口咬定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彼此也不认识。“邵武勉在哪儿？”他们千方百计让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我说他们都已乘船走了。他们不相信我的话，高声大叫着说我撒谎，还说他们手中掌握有确切的情报证实邵武勉在巴库。

我们被关押了几个星期，后来他们宣布说，土耳其军队的总司令努里一帕沙签署并批准了关于判处我们绞刑的判决书：我们

将在明天早上六点钟在“帕拉佩特”广场被处绞刑。

过了几个小时，看守的卫兵走进我的囚室，命令我出去。我也不清楚要到哪儿去。他们带我经过以前的省长的花园，顺着尼古拉大街往前走，然后又顺着省会大街走。法院的大楼就在这条街上。我想大概是把我带到法院去。法院大楼对面是石油企业主洛希尔德的住宅。不知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了。他们把我领进一个大办公室。在这里，使我相当吃惊的是我看到了贝布特·杰万希尔。他是斯捷潘·邵武勉童年时代的朋友。他们在一起长大，一同到德国留过学。斯捷潘在哲学系毕业，成了职业革命家。而杰万希尔成了工厂主兼工程师、资本家。应该说老实话，在他成了资本家之后，怀念与斯捷潘的旧谊，在革命前曾不只一次营救邵武勉出狱，资助他金钱，帮他藏秘密文件等等。

我第一次见到杰万希尔的情形是这样的。在1918年木沙瓦特党人三月暴动期间，我们的部队射击杰万希尔住的那幢房子，因为敌人从这所房子的屋顶上用机关枪向我们扫射。杰万希尔设法告诉了斯捷潘·邵武勉，并向他求救。邵武勉派了苏连·阿加米罗夫和自己的儿子苏连把杰万希尔夫妇带到他家去。他们被平安地送到邵武勉的住所。当时我也在那里。他们夫妇俩人在邵武勉家住了约两个星期。

这样，杰万希尔就认识了我，以及当时把他从那所被扫射的房子里救出来的苏连·阿加米罗夫。

当土耳其人成立阿塞拜疆政府时，杰万希尔被委任为内政部长。做为一个内政部长，他被告知明天早上我、苏连·阿加米罗夫和舒拉·巴拉诺夫将在“帕拉佩特”广场被处绞刑。

看到杰万希尔在我面前，我万分惊讶。屋内只留下我们两个人。杰万希尔对我说：“奥丽娅，你走过来点。我是内政部长。有

人向我报告说斯捷潘在城里，而你们不想交出他的地址。我特意把你找来，要你把他的地址告诉我。我是斯捷潘的老朋友，他救过我的命，现在我要救他。如果他们找到了斯捷潘，当场就会把他杀死。你把他的地址告诉我吧！”

我回答说，这纯属误会，邵武勉并不在巴库。

但杰万希尔不信。他继续苦苦地乞求我，让我把邵武勉的地址告诉他，并发誓说他一定要救邵武勉。我作了证明，也对他发誓说我讲的全是真话。于是他狂怒地喊道：“你们这些可恶的狂人，你们要断送邵武勉的性命！”他怒气冲冲地叫来了卫兵，命令说：“把她带回去！”我甚至没法向他提起根据努里—帕沙的判决明天我们将被处以绞刑。我被带回了监狱。

傍晚，看守长走进我的囚室（他是个战俘，土耳其人，会讲一点儿俄语），看了看我，同情地说：“可怜的姑娘，明天早上……你知道么？”并对我用手在脖子上套绞索。我回答说，我知道。他扔给我一串葡萄就走了。

过了一个小时他又来了，说：“哎！可怜的孩子，明天你要……（又一次做绕脖子的手势）。来，喝杯酒，喝吧！”

他又第三次来到我这儿，并带来了一个枕头。他对我说：“最后一夜了，枕着枕头睡吧！”

这时我鼓足了勇气，对他说：“我的兄弟就在下面，我想同他们告别一下，请带我到他们那儿去一趟。”他拒绝了，显然是很害怕。这时我把他送来的枕头、葡萄都向他扔去，大声喊着：“你滚开！我想见自己的兄弟！”

他“软”了下来，说：“你等等，到晚上长官走了，我就领你去。”

晚上，他果真领我去了。经过大院来到了一个很深的地下室，在这儿我找到了苏连和舒拉。他们立即扑过来拥抱我。原来

他们也知道明天将把我们都绞死。

看守怕我和朋友在一起的时间太长，又把我拉回去了。我们只来得及约好，明天，当我们被带赴刑场时，我们将唱《国际歌》。

我坐在囚室里，等待黎明的曙光穿过牢门的玻璃格子：这是最后一天了。

突然我听到一阵嘈杂声，宪兵军刀的敲击声和我囚室附近的脚步声。是来带我的么？可还有一夜啊！“红头发的土耳其人”带着一个翻译和卫兵走进了囚室。别哈埃德金一巴伊用法语对我说（他知道我会讲点儿法语）：“遵照杰万希尔部长的命令，您被释放了。死刑改判为把你驱逐出阿塞拜疆。”

开始我不相信。我想：“是不是他们不让我僵持，让我乖乖地不经任何抵抗就去受刑？”我说：“你们何必骗人？带我去就刑吧，我已准备好了。”但他又用法语重复着说：“您自由了。”翻译把这句话用俄语又说了一遍。

我这才有所领悟。这就是说，杰万希尔到底还是过问了这件事！可是一瞬间一种可怕的念头又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万一仅仅是我一个人呢？”我问他：“那我的朋友们怎么办？”暗探局长顿时哈哈大笑着说：“现在他们怎么又成了你的朋友了呢？！前不久你们不是还都一口咬定说，你们是互不相识的么？”他终于止住了笑声对我说，他们也将立即被释放。

我被领到了一个办公室，让我签字，保证三天后到警察局报到并离开阿塞拜疆。

我被推出了门外。这时我突然看到我的父亲站在面前。原来有人告诉他我在车站被宪兵抓走了，他一直在各处奔走为我求情。昨天有人告诉他，明天将把我押到广场处以绞刑，于是他就

赶紧来到了暗探局，在暗探局门口站了整整一夜，等着把我押出来。

父亲看着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父亲怎么会在这儿呢？他再也支持不住了，他两腿发软，跪在地上，抓住我的双手大声痛哭起来……

过了10—15分钟，苏连·阿加米罗夫从大门里走出来了，又过了一会儿舒拉·巴拉诺夫也出来了，他们也签了字，保证三天后去警察局报到离境。

父亲恳求了两天两夜，让我抛弃一切去学习。他说：“布尔什维克丢下你们，自己跑了，别管他们了！够了……”他不停地苦苦地哀求我，一分钟也不让我安静。第三天夜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们俩人大吵了一通。当夜一点，我就离开了家。

我在城里走着，周围一片漆黑。有些地方可以听见枪声和喊声。我决定到我认识的女裁缝齐娜那儿去。她把我留下了。

第二天我又去看苏连和舒拉。我们决定不去警察局报到。因为他们可能把我们弄到国外或彼得罗夫斯克去。而在彼得罗夫斯克有白党分子和比切拉霍夫及其匪徒。在那里布尔什维克同样被绞死。我们决定自己到格鲁吉亚去。

我在阿马利亚·托尼扬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不久我们顺利地到了梯弗里斯城。这里我们有秘密接头地点；我们在梯弗里斯找到了果戈别里泽和鲁缅采夫。

我们离开是为了胜利归来

我们决定去阿斯特拉罕；轮船委员会的叛卖行为；我们在克拉斯诺沃斯克被捕；在看守所。

开船前，我们在船上呆了两个多小时。苏连·邵武勉和他的小分队的其他队员得知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人在这艘船上后，很快也赶来了。

和我们同船的还有列夫·邵武勉。出狱（由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委员会的担保）后，这些天他一直住在塔捷沃斯·阿米罗夫的家里。查帕里泽派他到谢尔戈·马尔季科扬的住所去，查帕里泽的妻子和其他一些同志的妻子当时也都在那里。列夫很快就把他们全都带到我们这艘船上来了。

我们大家坐在船员休息室，查帕里泽的妻子当着我们全体的面建议自己的丈夫下船，留在巴库，隐蔽起来不让土耳其人看见。她说，她认识一个人能够把他藏在自己家里。她的建议使我们很多人感到惊奇，因为，要把象查帕里泽这样一个知名人物在巴库安全地隐蔽起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况且事先又没有做任何准备。能够把查帕里泽藏在自己家里这个人是什么人，他的住所是否可靠，这些谁也不知道。同志们纷纷发表意见说，这样比留在船上更危险。查帕里泽表示，他要留在船上和同志们在一起。

当“土库曼号”轮船终于离开码头并驶出巴库海湾时，我走到斯捷潘·邵武勉跟前对他说：各船船长都接到了开往彼得罗夫斯克的命令，“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政府已撤往彼得罗夫斯克，比切拉霍夫也在那里活动。为了避开危险，我建议邵武勉说服“土库曼号”船长在夜幕

的掩护下逐渐脱离船队，直驶阿斯特拉罕。在这种情况下，军舰未必能追击我们。

邵武勉提出这个问题让大家讨论。大家都表示赞成我的建议。然后，邵武勉和船长进行单独谈话。船长原来是个好说话的人：他本人是拉脱维亚人，家在里加，所以他也急于去阿斯特拉罕，希望取道阿斯特拉罕回家。因此，他也向邵武勉表示同意把“土库曼号”轮船开往阿斯特拉罕。他只要求邵武勉保证他本人能够从阿斯特拉罕撤退到拉脱维亚去。邵武勉作为中央政权的代表，对此向船长作了充分的保证。

我们都充满着喜悦的心情。大家当然都期望尽快地到达阿斯特拉罕，到达苏维埃俄国。这种期望当时眼看就要实现了……

天气很好，海面风平浪静。我们走上甲板，看到我们的船离船队的其他船上的灯光越来越远。我们很快就驶入了宽阔的大海，其他船上的灯光一点儿也看不见了。

但是，我们兴高采烈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船长突然到休息室来找邵武勉，他用手指着地图，让他看“土库曼号”轮船在什么地方，而驶向彼得罗夫斯克的船队又在什么地方。在地图上看得很清楚，我们已脱离了船队，正直驶阿斯特拉罕。但是，我们船的轮船委员会的委员都是社会革命党人，当轮船委员会知道我们改变了航线并正开往阿斯特拉罕之后，便召集会议并通过了决定，轮船不去阿斯特拉罕而转向克拉斯诺沃斯克。

船长说：“水兵们说，阿斯特拉罕在闹饥荒，据他们了解，克拉斯诺沃斯克粮食充足。所以，他们拒绝到阿斯特拉罕去。”

这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邵武勉当即让中央海军事务代表波卢欣同船长一起去试图说服轮船委员会撤销他们通过的决定，而继续开往阿斯特拉罕。过了一会儿，波卢欣回来了，他情绪沮丧。他说：他的劝告毫无结果；水兵们都顽固坚持己见，谁也不服从。原来，他们的主要头目，船上的机械师，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

我们了解到船上的难民和许多士兵都不愿去阿斯特拉罕，并且支持轮船委员会的决定。这样，反对我们的不仅有船员，而且还有全付武装的士兵和难民，实际上是全船（除上层甲板之外）的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土库曼号”轮船上的达什纳克指挥官和在船上的邓斯特尔维尔将军部队中的两个英国军官串通一气，疯狂地煽动难民和士兵反对我们。

不难想象，我们大家的心情是何等沉重。我们绞尽脑汁地想：采取什么对策？在这以前我没有参加关于形势的讨论，因为我认为有更有经验的同志，没有我也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但当他们开始讨论用什么办法避免开往克拉斯诺沃斯克的时候，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说：我们到了被英国人占领的克拉斯诺沃斯克，就会大难临头，因此我们应当用武力迫使船员服从我们，继续驶向阿斯

特拉罕。

“但是，到哪里去弄这样的武力呢？”大家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找支队长阿米罗夫”，我回答说，“船上找到二十来个忠实于他的武装人员，他可以悄悄地把他们一个一个叫到上层甲板上来，借他们之助解除那些不愿到阿斯特拉罕去的士兵的武装，并把他们的武器交给我们。我们有了武器就能使船员顺从，并警告他们，如有人顽抗，将被扔到海里去。”

阿廖沙·查帕里泽在我们当中最不沉着，他对我大叫起来：

“你怎么了，难道是野兽吗？怎么能往海里扔呢？……”

应当说，我非常热爱他，不仅如此，甚至非常崇拜他，但他的话当时使我十分难过。我对他的问题没做任何回答，只是沉默不语。我当然明白，要解除士兵的武装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可能发生冲突，而我们又没有把握一定能成功。但是毕竟有一定的取胜的机会，有可能用武力粉碎对我们抱有敌对情绪的某些水兵的反抗。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其他同志也都默不作声。出现了令人难受的沉寂。于是我想：“我何必着急呢？他们都比我有经验，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感到有点浑身无力，沮丧和疲惫，在船员室里的桌子下躺下来，很快就睡着了。

我睡了很长时间，醒的很晚，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船员室里空无一人。我走上甲板。海面风平浪静，太阳暖洋洋地照着，但天气并不热。我们的同志有的三三两两地坐在甲板上谈话，有的在甲板上悠闲地蹒跚着。

所有这种表面上的平静——无论是大自然的还是人们的——同我个人（我想还有我的许多同志）一直不能摆脱的为我们的共同命运而担忧的内心的不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记得，彼得罗夫在高出于主甲板的平台上仰面躺着。他把手枕在头下，若有所思地望着蔚蓝色的万里无云的晴空。他这样躺了很长时间。我想着关于这个勇敢的革命的指挥员的事迹。彼得罗夫是一个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但是他并没有追随自己党的头目走上叛卖苏维埃政权的道路，而是自愿地在红军中服役。在巴库我没有亲自和他接触过。我在近处仔细地端详他，是在彼得罗夫广场上。那天，他的炮兵摧毁了土耳其人的阵地，阻止了土耳其人攻入巴库城。彼得罗夫是个沉着冷静、坚定勇敢的指挥员，他的部下都很尊敬他。有人对我说，他的行动中有时有自发的因素，但总的来说，他遵守纪律并忠于巴库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和高加索特派委员邵武勉。

当时我看着彼得罗夫心里想：“昨天讨论如何去阿斯特拉罕的问题时，为什么他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坐在那儿一言不发呢？”看他若有所思地仰面躺着，我很想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有什么主意。他是在怀念自己遥远的故乡，还是在回忆那些他曾多次参加过的光辉的战斗事迹呢？

也许他想起了在战斗中牺牲的同志们或者正在猜测巴库的同志们的这部长篇史诗将如何结局?……

为什么象科尔加诺夫和其他一些经验丰富的军事领导人昨天不支持我强行迫使轮船开往阿斯特拉罕的建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我认为在和同志们的交谈中再谈论这个问题是不妥当的。

我一直还在为同志们的命运担心，尽管他们那种镇静而又坚定的举止使我的担心多少消除了一些。长时间的睡眠也使我的神经平静下来。况且我毕竟还年轻，又是生平第一次航行在一望无际的海洋上，所以我简直是在欣赏这美妙的海洋景色了，蔚蓝色的天空，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里海的万顷碧波……

看着周围同志们的泰然自若的表情，我心里想：他们看来这么泰然自若和表面上这么镇静，仅仅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勇敢和大无畏精神吗？在他们的思想中莫非还存有一线希望，以为英军司令部代表着可以说是文明的欧洲国家，会按照国际法行事，因此他们的结局不会是悲惨的？看来，他们都还没有想到一场不可避免的大难已经临头，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9月16日傍晚，天黑以前，我们靠近了克拉斯诺沃斯基的停泊处。在停泊处我们被载有某些武装人员的港口小汽艇“布加什号”截住了，他们命令我们船长在停泊处抛锚，好象是为了进行检疫，以免“带来”传染病。他们

只允许两个英国军官（他们出现在船上的具体情况不清楚）和一个戴乔治十字勋章的亚美尼亚人下船。这个亚美尼亚人说，他“有重要情况要报告地方当局”。

所有这些，是对我们的第一次警报信号。在正常情况下，船本来应当平稳地开进码头卸下货物和旅客。这里看来在搞什么名堂。我们的同志们还象昨夜一样在睡觉：有的在船员室的桌旁坐着睡，有的在角落里的地板上睡。

清晨，我们起来的时候，阳光灿烂。“布加什号”小汽艇又来到我们这个轮船跟前。根据它的命令，“土库曼号”缓慢地驶向离克拉斯诺沃斯克几公里的乌尔夫码头。在码头，我们看到了异常的场面。码头两侧列队站着一排排头戴土库曼毛皮高帽，手持步枪的士兵。他们前边站着三、四个军官、警察队伍和当地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小分队。旁边是英国的炮兵连；码头上有几个英国军官来回巡视，其中有昨天从“土库曼号”船下来的那两个军官。不过他们没有公开进行任何干预。除此之外，在码头上还有以康达科夫为首的政府机关的官员和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戴乔治十字勋章的亚美尼亚人。很清楚，我们即将被捕。

我们都聚集在船员休息室里。邵武勉说，看来是要逮捕我们，所以应当赶紧到船下层去，混在难民旅客中间，想法混过检查站，进城隐蔽起来不让当局发现，然后设法到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的阿斯特拉罕或塔什干去。对此没有人提出其他建议，事到如今已不可能再有

其他的建议了。

我当时告诉大家说(在这以前,我只对邵武勉讲过),党的经费中有一笔钱在我这里。邵武勉建议平均分给大家。记得每个人分到约五百卢布,大致相当于当时一个中等职员一个月的薪水。

我们同志没有带什么衣物,只有大衣和一些零碎东西,就是这些东西也不是人人都有。但苏连·奥弗谢甫扬是个例外,近几个月来他担任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办的《消息报》的编辑。他有一个很重的箱子。当我们在巴库冒着土耳其人的子弹从监狱里出来,跑过危险区时,他就把这个箱子扛在肩上。由于情况危急,我对苏连说:

“把箱子扔了吧!”

记得因为我对他的箱子的“轻慢”态度,当时他甚至还有些生我的气。箱子里装有他的手稿及发表过的文章。他说拿着箱子并不怎么困难,他不会扔掉这只箱子的,因为箱子里的东西对他来说是很珍贵的。他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苏连·奥弗谢甫扬是一个积极的列宁主义的党的工作者。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为《真理报》和《启蒙报》撰稿。

下层甲板上挤满了人,正如俗语所说,连插针的地方都没有。我们混在群众中,非常拥挤。在我周围看不到一个我们的同志。

离码头越近,形势对我们就越清楚。

当“土库曼号”靠上码头,放下船梯时,便开始放出旅

客。表面看来是进行通常的检查。人们缓慢地一个一个地走过去。轮到我了。因为我身上什么都没有，所以他检查得很快。我当时穿着一件呢子的军便服，紧束腰带，穿着一条马裤和一双长筒靴子。头上戴着一顶没有帽徽的制服帽。手里什么都没有拿。只是腰里在衣服的皱摺中间有一把手枪。我那时很瘦，我希望搜查时不会发现我的手枪。果然没有发现。第一次检查时，我举起双手，一个军人很快地把我身上摸了一遍，什么也没发现，就放我走了。

我在码头上刚走过二、三十步，又看见第二个检查站。他们又把我草草地搜了一遍，也没有发现什么，就放我往前走。一般都没有向我们要身分证。因为船上的乘客都是从土耳其人那里逃出来的难民，当然很多人都没有身分证，所以检查时，身分证连提都没提。又走了十多步，我看见还有第三个检查站。我想既然前两次都顺利地通过了“检查”，那末这一次也能对付过去，想到这里也就不那么紧张了。

虽然未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但我还是很谨慎地（以免引人注意）看了看四周。当我来到第三个检查站的时候，忽然一个人抓住了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个身穿雪白制服，头戴海军帽的港口官员。他用头向我示意并说：

“跟我来。”

我们一声不响地走着。他把我带到码头边上，那里

停泊着一艘“维亚特卡号”港内用小火轮。

在“维亚特卡号”的甲板上，我出乎意料地看见邵武勉和查帕里泽坐在桌子旁低声交谈。在另一张小桌子旁坐着费奥列托夫和他的妻子，查帕里泽的妻子也在那里。我看见阿齐兹别科夫拿着茶壶到船的底舱。不大功夫他又拿着茶壶和茶杯回到甲板上来。他精神抖擞地说：

“朋友们，我给大家准备了好茶，喝茶吧！”

从他的一举一动中可以看出，他是想鼓励鼓励同志们的情绪，使大家心情好些。

大家看见我后，都转过身来。但他们看到我并不感到惊奇。原来在这条船上已经有许多我们的同志了。其他同志也陆续被带来了。大家讲起各自被扣下来的情况。原来在难民中混有奸细（首先是那个带着乔治十字勋章的人）。他们认得出我们很多同志，于是警察就把他们扣下了，并带到了“维亚特卡号”船上。

被捕的人很快达到三十五个。大家都安静地坐着互相交谈，不知是凶是吉。

长官带来了全副武装的人。于是搜查开始了。每一个人都单独搜查，查得非常仔细。他们强迫我们脱下外衣，从头搜到脚。很清楚，他们是在搜钱。我们同志的一些零碎东西都翻来复去搜得很仔细，查看衣服里是否缝有文件和贵重的东西。

他们对邵武勉、查帕里泽、阿齐兹别科夫、彼得罗夫、科尔加诺夫、维齐罗夫和费奥列托夫搜查得特别仔细。

他们身上只有我分给他们的那些钱。只是在彼得罗夫那里发现另外一笔为数不多的钱。

快轮到我了。我一直在想，藏在衣服里的自动手枪怎么办。在监狱里手枪还是用得着的。我不想把它扔掉。在搜查时，我决定把手枪藏起来。我要求下去上厕所，想在厕所里找个地方把枪藏起来。但是厕所所有哨兵，我只得又回来。我很懊丧我不得不和我的手枪分手了。我忽然决定给警察一点颜色看。

“你的东西呢？”

我把手伸到腰里，突然猛地一下拔出自动手枪。

警察大概以为我要开枪，都吓得往后一跳，有一个警察喊了一声：

“你要干什么?!”他抓住了我的手。

“你说干什么?”我“气愤”地回答说，“我把我唯一的一件东西交给你们，别的没有了。”

警察暴露了他们自己都是可怜的胆小鬼，我内心很满意。从看到这一场面的同志们的笑脸上，可以看出他们也很满意。

搜查时没有什么无礼行为，也没有进行审问。检查的人显然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没有搜到他们所梦想搜到的贵重东西。和我们同行的妇女也被搜查了。不过是由警察局派来的妇女在底舱而不是在甲板上进行的。

最后，我们乘坐的这艘轮船离开了码头抛了锚。原来克拉斯诺沃斯克当局害怕押送被捕的委员去监狱时，

在居民中引起的反应,所以下令天黑前把我们拘留在“维亚特卡号”船上,到夜间再弄进监狱。

搜查结束后,对我们宣布说,我们已经被捕,听候克拉斯诺沃斯克罢工委员会(该市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反革命政府的名称)处理。邵武勉对这种暴力行为提出了抗议,他说,我们没有犯任何罪,此外,当地政府和我們毫无关系,更没有权逮捕我们,因为我们还未进入里海以东地区境内。

逮捕我们的负责官员康达科夫说,他不想和我们辩论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在执行他的政府的命令。

当康达科夫走开时,我们开始商量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什么对策。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已陷入了里海以东地区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英军司令部的魔爪,处境比在“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的管辖下更危险。我们当时认为参加“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巴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听命于英军司令部,但还是害怕在巴库工人阶级面前承担责任,可能不敢对我们下毒手。在彼得罗夫斯克有比切拉霍夫和他的部队,不过我们觉得苏维埃政权对他的态度还不致于使他对我们进行迫害。

我说我的意见是,我应该利用我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巴库苏维埃的代表这个身分和我持有撤退被捕委员的正式许可证这个条件,向彼得罗夫斯克“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发电报,让他们要求把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斯克送到彼得罗夫斯克。

邵武勉表示同意,但他说,这还不够,被“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逮捕的苏维埃政权的全体正式代表也应当直接给“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拍发无线电报。大家一致同意邵武勉的意见。邵武勉叫来了地方当局的代表,要求他接受并转发我们拍给彼得罗夫斯克的无线电报。我们的要求他们同意了。于是由邵武勉和查帕里泽共同拟写了一份电文。这份电文现在还保存着。

“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

14日夜,根据‘专政委员会’的决定和非常委员会主席达林同志的指示,我们从巴依洛夫监狱获释。前来带领我们的警卫队说我们被允许乘‘谢万号’轮船。为解决释放我们的问题而来的阿斯特拉罕苏维埃和舰队代表团也在这艘船上。由于‘谢万号’没有驶到接我们上船的那个军港,于是警卫队把我们带到城里非常委员会。但非常委员会已空无一人。于是警卫队把我们送到最近的卡姆沃码头上‘土库曼号’轮船。警卫队有十个人,由于非常委员会已经撤退,又无其他船只,他们要求支队长也同意他们上‘土库曼号’轮船,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容许。‘土库曼号’和其他许多船一道,根据军舰的指示,在纳尔根和日洛伊岛做了短时间的停泊后,于15日驶向彼得罗夫斯克。16日晨我们得知,船正在驶向克拉斯诺沃斯克。因为刮北风,轮船北上十分困难。船上的水和燃料已经不多了。可是乘客有八百人之多,而大都是妇女和孩子,都未携带食物。鉴于这种情况,轮船负责人和支队长决定逆风驶向克拉斯诺沃斯克,尽快让难民上岸,在克拉斯诺沃

斯克加足燃料和水，然后返回彼得罗夫斯克。

早上水兵告知我们说，克拉斯诺沃斯克不接待难民，而另一方面，天气好转。有人提出最好把难民送到阿斯特拉罕，但是担心阿斯特拉罕的布尔什维克不接待难民，会把轮船扣住等等。对我们说来当然最好是去阿斯特拉罕，以避免在克拉斯诺沃斯克一下船就可能遇到的麻烦，因为在克拉斯诺沃斯克正在极力反对布尔什维克。所以我们保证，到阿斯特拉罕后，我们一定接待难民，并让‘土库曼号’船返回彼得罗夫斯克。随后轮船驶向阿斯特拉罕。但由于轮船委员会反对，不愿去阿斯特拉罕，轮船又驶向克拉斯诺沃斯克，并于16日晚到达克拉斯诺沃斯克。由于一些乘客的挑拨性的告发，地方当局怀疑我们是在混乱中逃出监狱，没有得到‘专政委员会’同意擅自离开巴库的。于是把我们逮捕了。同时和我们一起被捕的还有十个人，其中包括支队长阿米罗夫本人。

我们要求‘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证实，我们是根据你们的指示获释并离开巴库的。如果你们不能下令把我们送到阿斯特拉罕，请让他们把我们送往彼得罗夫斯克。我们的情况你们是了解的。你们在彼得罗夫斯克可以通过旅客和‘土库曼号’的船员（他们正动身去彼得罗夫斯克）了解我们到克拉斯诺沃斯克的经过情况。请你们尽快指示。

受大家的委托：

查帕里泽、费奥列托夫、邵武勉、
科尔加诺夫、彼得罗夫、雅·泽文”

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我们的电报有些地方与事实有出入。按照这个电报的精神我也拟了一封电报。

地方当局收下了我们的电报拿去转发，但是否当真转发了，我们没有把握。时间过去了，但没有回音。这时我们才想到我们受骗了，电报根本未发出去。只是几年以后，在档案馆里发现了邵武勉和其他同志的电报，我的那份电报至今还没有找到。

晚上我们的轮船驶向市里的码头。通知我们说，由于监狱容纳不下所有被捕的人，有的人要去市里的看守所。克拉斯诺沃斯克警察局长阿拉尼亚宣读了去看守所的被捕人名单，其余的人都去监狱。到看守所去的人名单中有邵武勉，还有十一个男的和五个同他们一起被捕的妇女。这个名单中没有我。

我明白了，要把我关进监狱。我走到邵武勉面前说，我想和他在一起。因为不排除组织越狱的可能性，那时可能用得着我。邵武勉说：

“好吧，你去试试看行不行！”

我到阿拉尼亚那里对他说，我请求他把我关到看守所去，不要把我关到监狱去。他仔细地看了看我，什么也没有问就说：“好吧。”我高兴极了。

* * *

克拉斯诺沃斯克是座小城市，看守所离码头不远。我们很快就被步行押到看守所。男女分别关在两个囚室。

看守所是座平房，记得走廊两侧各有三间，共六间囚室。看守所所长住在院子里一所小房里。我们住的囚室

比较小，靠墙是一排统铺。柏油地面。除了角落里有个囚室马桶外，囚室里什么都没有，——既没有褥子、枕头，也没有被子和任何家俱。年纪大的同志都睡在统铺上，六个年轻一些的就干脆睡在地上。

令人难以忍受的三天过去了。克拉斯诺沃斯克天气十分闷热。囚室里很拥挤。也不放我们出来散步，吃的很坏。不过对这些我们都不在乎。可以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在想我们吉凶未卜的命运。查帕里泽、阿齐兹别科夫、费奥列托夫、阿米罗夫表面上都很自然，甚至很快乐。他们坐在铺上，开始热闹地打牌。牌是阿米罗夫的。

共产党员，《巴库工人报》的编辑，阿尔森·阿米良的情绪很坏。他弟弟塔捷沃斯和我们同在一个囚室。过了一两个星期又把他的两个弟弟带到我们囚室。他们两个都不是党员。大的叫亚历山大，有肺结核病，咳嗽的很厉害。小的叫阿尔麦纳克。在囚室里我们是初次见面。我从他的谈话中了解到，他是个台球迷，他把时间都消磨在巴库的台球房了。他靠塔捷沃斯的资助维持生活。当时我对打台球一窍不通，也很奇怪他怎么对台球有这么大的兴趣。这里顺便说一句，阿米良的这两个兄弟在政治上并没有起什么作用。

阿尔森·阿米良在囚室里来回走着，每走五、六步就转过身来，他神色忧郁，好象在全神贯注地想什么。我当时的印象是，阿尔森情绪非常消极，他可能是我们当中已经认识到处境无望、确信结局不妙的唯一的一个人。他

跟谁都不讲话，谁也不去打扰他的沉思。他对其他同志的谈话也毫无反应，他甚至对阿瓦克扬准尉所讲的那些俏皮的、几乎是神话般的他“自己生活中”的故事也无动于衷。前面我曾提起过阿瓦克扬的一些怪脾气。就是在囚室里他也离不开他那个三腿可折叠的小凳。有时有的同志坐在铺上，有的同志坐在地上，而他却把小凳支在铺上，并煞有介事地坐在上面。他还保存了一个带托的玻璃杯子。我很奇怪，这些东西在搜查时怎么没有被收去。原来是他哀求了半天，才让他留下的。不过在第一次即在巴库被捕时，他的装在笼子里的金丝雀……被没收了。他对此感到很是惋惜。每当他想起他那只心爱的金丝雀的时候，就象遭到了巨大的损失那样，非常惋惜和伤心……

阿瓦克扬把自己的小凳子支在邵武勉的旁边，邵武勉通常是背靠着墙坐在铺板上。阿瓦克扬总是给他讲故事，一讲起来似乎没完没了。阿瓦克扬是个健谈的人，喜欢讲故事，看来，他自己也从中得到满足。我们总是兴致勃勃地听他讲。有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我还经常回想起并讲给同志们听。一次，阿瓦克扬幽默地讲到，他当了多年的莫斯科大学的“老大学生”。他是社会民主党党员，参加了学生运动，是个积极的，甚至有些狂热的青年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一次他出席了全俄皮罗果夫医生代表大会。他们几个学生坐在代表大会会议厅的最后边。会议期间有一天，当大会听取

了几个代表的报告和发言后，阿瓦克扬从座位上站起来，用他那宏亮如雷的声音向大厅威严地喊道：

“先生们，我要求发言！”

整个大厅都听到了他的喊声，但主席团未予理睬。阿瓦克扬更大声地重复了一遍：

“先生们，我要求发言！”

主席为了避免发生不愉快的事，打算让原定的下一个人发言。但是阿瓦克扬第三次更大声、更坚决地要求发言。他穿过会议大厅登上了讲台，面向会场，讲了大致如下的话：

“尊敬的先生们！在这里关于保护人民健康的问题已经讲了很多；讲到农村和许多城市的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极端艰苦，贫困、落后；讲到医院、医生、药品少得多么可怜；讲到有多少农村和市镇根本没有任何医疗条件。在这里发言的诸位可尊敬的演说家提出了许多建议，希望摆脱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处境，并把我国人民保健事业提高到现代水平。我认为所有这些发言和建议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要忠于自己的人民和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的话，就应该说，所有这些建议只不过是毫无价值的治标而不治本的药方。为了医治我们人民的严重疾病，应该做一件最主要的事情。这件最主要的事就是推翻专制制度，专制制度是我们生活中所有灾难的根源。打倒专制制度！”

所有的人都很紧张地、十分注意地听阿瓦克扬的讲

演。当他讲到最后一句话时，大厅里出现了不可想象的场面：有人喊叫，有人挥舞着手。阿瓦克扬明白这一切可能产生什么后果，于是他很快走下讲台，趁一片混乱之机溜到后台，并从后门跑出大楼，这才免于被捕。这一切他给我们讲得如此激动人心，显露了他那特有的故事家的才干。

邵武勉很少讲话，他只是回答一些问题。但他自己从不提起任何重要的问题。

囚室里大多数人都不是第一次坐牢，已经习惯了这种环境。他们泰然自得的神态，使我觉得，大家都有某种潜意识的乐观情绪。

在我们到看守所的当天傍晚，囚室屋门打开了，一个年近五十，半身穿着军装，长得很结实的男子走进囚室，和他一起进来的还有两三个人。后来我们知道这是克拉斯诺沃斯克反革命政府的头子库恩和他的随员。

他们问我们之中谁是邵武勉，谁是查帕里泽，谁是阿齐兹别科夫……，他们仔仔细细地打量着每一个人。他们没有提出什么特殊的问题。查帕里泽询问逮捕我们的原因，并要求说明对我们提出了什么罪状。他们回答说，不知道。他们说，他们已把逮捕我们一事报告了里海以东地区政府，并正等待答复处理我们的意见。

第二天晚上，克拉斯诺沃斯克警察局局长阿拉尼亚随同一些高级官员来到囚室，他把我们的领导同志指给这些高级官员看。然后阿拉尼亚告诉我们说，被关在监

狱里的同志们提出了一个书面要求（由科尔加诺夫和其他同志签名），要求给所有被捕人员发褥子、枕头，供应正常的食物和一切法定应发的物品。（第二天，我们就从阿拉尼亚那里得知，在我们同志的这个书面要求上库恩加了“监狱不是享福的地方！”的批语。）

当时阿拉尼亚以轻蔑、阴险、嘲弄的语气对我们说：“至于枕头，我们会给你们的。”

他这些话显然带着不祥的弦外之音。查帕里泽问是否收到了“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给我们的复电，阿拉尼亚干脆回答说：“没有。”

9月20日凌晨一点，我们被叫醒，阿拉尼亚又一次带着一批高级官员来了，有些人明显地带着醉意。后来，我们从看守那里知道，他们之中有阿什哈巴德的里海以东地区社会革命党政府主席丰季科夫、库恩及他们政府的几个委员。

我们的这些深夜来访者走进牢房，站在半开着的门旁。我们原地未动。阿拉尼亚宣布：根据里海以东地区政府的决定，一部分被捕的人今天就转往阿什哈巴德省中央监狱，并将在那里接受审判，其余的人将被释放。他开始宣读转到阿什哈巴德监狱去的人的名单。我们都站了起来。

名单念完了，没有我的名字，于是我明白了，我是应该被释放的人中的一个。我走到邵武勉跟前，对他说，我要求让我和他们一起去，我仍想着组织逃跑。邵武勉

看了看我说：“去试试看。”

我向阿拉尼亚说，我希望能和转到阿什哈巴德去的同志们在一起。他回答说，他无权对此名单作任何更改。

邵武勉把我拉到一旁，对我说：

“你的要求被拒绝了，这没关系。你们被释放后，你同苏里克^①和列瓦（邵武勉的两个儿子）设法去阿斯特拉罕，然后再到莫斯科去见列宁，把我们在这里所经历的情况全部报告给他。你们以我的名义建议逮捕几个有名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如果还没有人被逮捕的话）作人质，并向里海以东地区政府提出拿我们来交换。”

我答应说，当然一定照办。于是邵武勉走到苏里克和列瓦跟前，把双手放在他们的肩上，对他们说：

“你们要和阿纳斯塔斯一起设法去阿斯特拉罕，然后再到莫斯科找列宁。”

邵武勉让他们向母亲问候，要他们好好照顾母亲。同时让他们向马尼亚和谢廖扎（他的另两个孩子）问好。

“告诉妈妈，”他说，“让她不要着急，我们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列宁一定会用被捕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我们换出来。我们很快就会团聚。”

我们大家兄弟般地亲切告别。应该说，不管怎样，我们大家的情绪还是很饱满的。我们天真地以为，既然答

① “苏里克”是“苏连”的爱称。——译者

应释放一部分人，而将另一部分人提交审判，那末事情还不至于那么糟，因为这些将受审的同志并没有犯任何罪。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悲剧的危险已迫在眉睫。那时我们毫不怀疑我们将被释放，我们甚至连想也没想到，我们的同志第二天就将不在人间了。只是当邵武勉和我告别的时候，我感到在他的眼神中隐藏着某种不安……

* * *

里海以东地区政府和英军司令部的代表们根据什么从三十五个被捕同志中确定了一个二十六人的名单呢？这个问题从1925年6月苏连·邵武勉在为审讯丰季科夫案件作证时提出的书面证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1918年8月中旬，我们在巴库被英国、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政府逮捕。在被捕的人中除了后来牺牲的二十五个同志之外还有：穆德雷、麦斯希、我——苏连·邵武勉、萨姆松·坎杰拉基、克列夫佐夫——总共三十人。

在狱中，巴维尔·泽文^①（二十六人之中的）是组长，他手上有一张全部被捕人的名单，他按照这个名单分发狱外同志给我们送来的食物。

土耳其人占领巴库和我们从监狱里“被释放”的前几天，坎杰拉基同志因患痢疾，被送进监狱医院，所以他的名字被从领取食物的名单中勾掉了。

我在从巴库撤退的前两天被交保获释，因此我的名字也从名单中被勾掉了。

^① 这里错了：监狱中的组长不是泽文，而是科尔加诺夫。——米高扬

麦斯希、穆德雷和克列夫佐夫，没有在我们乘的开往克拉斯诺沃斯科的船上，他们同难民坐另外一只船到了彼得罗夫斯克（到了比切拉霍夫匪徒那里），并从彼得罗夫斯克到苏维埃俄罗斯去了。

我们在克拉斯诺沃斯科被捕时，敌人在搜查组长泽文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上面所说的那个名单。后来就按这个名单在全体难民（六百人）中把人全部逮捕。

除了这个名单中的人之外，还有几个同志也被捕，他们是：(1)阿纳斯塔斯·米高扬，(2)萨姆松·坎杰拉基，(3)瓦尔瓦拉·查帕里泽，(4)我，(5)我的弟弟——列昂，(6)奥尔加·费奥列托娃，(7)塔捷沃斯·阿米罗夫，(8)马里娅·阿米罗娃，(9)萨捷尼克·马尔季科扬，和(10)马罗·图马尼扬。克拉斯诺沃斯科当局并不知道上述这些人，他们只是根据混在难民中的奸细的指点逮捕的。他们只认识塔捷沃斯·阿米罗夫，因为他是著名的苏维埃游击队员，所以后来把他加到‘二十五个’中去了。这就是‘二十六’这个数目字的由来。

由于这个情况，象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和萨姆松·坎杰拉基这样一些有名的布尔什维克能够幸存，而在这二十六个人当中却有当时并不太出名的工作人员（尼科莱什维利、麦塔克萨、小鲍格达诺夫），甚至还有由于误会在巴库偶然被捕的一些同志（米什涅）。这些在巴库偶然被捕的同志的名字，也列入了组长的名单，而这个名单后来却成了政治犯名单。

假如坎杰拉基同志不是害痢疾，我不是在撤退前夕被交保释放，那末我们也会被列入这个名单的。

克拉斯诺沃斯科的社会革命党人认为，列入名单中的人既然已在巴库被捕，那末这些人就是他们必须抓起来的，并且一定要

予以消灭的。

假使没有发现泽文同志身上的那个名单，那末就可能出现如下的情况：（1）枪毙的会是被捕的三十五个人，（2）或者枪毙那些他们知道姓名的高级干部……”

高加索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埃马努伊尔·基戈扬的情况与坎杰拉基一样，他现在还健在。他和所有的同志一起在巴库被捕，也是因病住院，所以在从科尔加诺夫身上搜到的名单中没有他。

对此，我还想作一点补充：所有巴库的同志都是在他们想要撤出巴库而乘船去苏维埃阿斯特拉罕的途中被捕的。（应当指出，当时当局千方百计地欺骗巴库劳动人民，散布谣言胡说什么，之所以逮捕巴库委员是因为他们企图从与土耳其人作战的前线叛变逃跑。）

至于我，本来就未离开巴库到别处去，而是作为巴库党委委员留下来做党的地下工作——在反革命政权统治时期和土耳其人胜利后都是如此。

我在狱外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

正因为当时我在巴库未被捕，所以我的名字也未被列入狱中组长的那张名单中。后来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就是根据这个名单逮捕巴库委员的。（委员的妻子——瓦尔瓦拉·查帕里泽和奥尔加·费奥列托娃这两个布尔什维克也未在巴库被捕，因此她们的名字也未列入这个名单之中。）

由于上述情况，坎杰拉基、基戈扬和我三个巴库公社

的负责干部以及瓦尔瓦拉·查帕里泽、奥尔加·费奥列托娃才避免了二十六个巴库委员那样的悲惨命运。

他们是二十六个人

对巴库委员的残酷镇压；追悼牺牲的同志；谁是罪魁祸首？小马列松的申诉；几点感想。

送别了同志，那天夜里我们睡得很平静。醒来精神振奋，充满希望，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被释放。我们知道，城里还有几个跟我们乘同一条船来到这里的同志，但他们逃脱了敌人的拘捕。其中有老共产党员谢尔哥·马尔季科扬。他妻子和我们一起被捕了，而他自己不知怎么地却成功地通过了所有的检查站。我们一边等待释放时刻的到来，一边在想：一旦获得自由，我们就马上和当地的同志取得联系，并且搞到任何一种能把我们送到阿斯特拉罕去的交通工具……

中午，看守终于露面了，我们问他：究竟什么时候能放我们出去？他说，关于这个没有接到任何命令。这使我们很疑虑。我们仍然被蒙在鼓里，以为关于释放我们的公文还没有办好。我们想：“他们何必欺骗我们呢？他们本来可以闭口不提释放的事。”

两、三天后在囚室里看到了几张9月20日的阿什哈巴德报纸。报上登载消息说在克拉斯诺沃斯克逮捕了以“高加索的列宁”——斯捷潘·邵武勉为首的巴库的布

尔什维克，逮捕时搜出大量金钱和武器。这种卑鄙的诽谤使我们非常吃惊和愤怒。他们这种无耻谰言恰恰是在对所有被捕者进行了仔细搜查，并且根本没有搜出任何上述物品之后散布的。

报纸还威胁说，里海以东地区政府要惩办巴库委员，将要“对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犯下的罪行”进行报复，甚至不惜把他们五马分尸。看了这些报纸使我们不能不对同志们的命运极为担忧。

大约一周后，一个新关进我们囚室的被捕者对我们说，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广泛谣传说被捕的巴库委员已送出克拉斯诺沃斯克，转交给英军司令部，而英军司令部已把他们经波斯送到印度去了。我们煞费苦心地思索着，怎样更好些：是送到阿什哈巴德受审（结果可能判处他们死刑）好，还是送到印度去好呢？有时我们甚至觉得把他们送到印度去要好些，因为这样可以赢得时间，把他们换回。

又过了一个月左右，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到我们囚室。一个铁路列车员告诉克拉斯诺沃斯克的同志说，他曾和巴库委员坐同一列火车，亲眼看见9月20日拂晓，在阿赫恰-库伊马和佩列瓦尔两个车站之间，离克拉斯诺沃斯克二百零七俄里的地方，委员们从车厢被带到沙土地上，一部分人被枪杀，另一部分人被砍死。

我们一直极力对列瓦·邵武勉隐瞒这一可怕的消息，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瞒过了他，直到后来他偶然从一个被捕的人那里知道了为止。附带说一句，尽管列瓦年龄不

大，但他象我们大家一样坚强，经住了这一打击。

里海以东地区政府的头子丰季科夫在这以前就已经有摧残里海以东地区许多著名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的经验。他出身是萨拉托夫省农民，当过土尔克斯坦铁路上的火车司机，从1905年起是社会革命党党员。

丰季科夫利用落后工人，并依靠孟什维克的支持，在1918年6—7月间先后在基孜耳-阿尔瓦特、阿什哈巴德、卡扎德日克和克拉斯诺沃斯克等地组织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暴乱。在上述各地建立了所谓“工人罢工委员会”，这些“工人罢工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罢工委员会挨户搜捕布尔什维克。

鉴于这一情况，土尔克斯坦共和国苏维埃政府派遣劳动人民委员、著名的革命家、布尔什维克、工人波尔托拉茨基从塔什干到里海以东地区了解情况，整顿秩序。

波尔托拉茨基来到梅尔夫(马雷)城。当时这里还是苏维埃政权。丰季科夫以欺骗手段邀请波尔托拉茨基去阿什哈巴德会谈。中途波尔托拉茨基就被丰季科夫指使的一伙社会革命党暴徒逮捕，未经任何审讯和审判就枪杀了。

几天之后，还是这个丰季科夫策划杀害了——同样未经审讯和审判——九个被捕的阿什哈巴德委员：莫利鲍什克、罗扎诺夫、巴特米诺夫、日特尼科夫、捷尔利耶、彼得罗索夫、科洛斯托夫、斯麦梁斯基和赫列诺夫。他们于7月23日凌晨被用专车送到安纳乌和格乌亚列两站

之间的地方，并在丰季科夫的亲自指挥下被枪杀了。

在 1918 年 9 月 20 日这个悲惨的日子，根据社会革命党走狗与英军司令部合伙制定的罪恶计划和英军司令部的命令，由刽子手丰季科夫、谢迪赫和他们手下的人亲手杀害的革命烈士有：

斯捷潘·邵武勉——高加索特派委员、巴库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主席、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外交人民委员、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立宪会议委员；

普罗科菲·查帕里泽（党内代号阿廖沙）——巴库工兵农和水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巴库内务人民委员兼粮食人民委员、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麦沙吉·阿齐兹别科夫——巴库省人民委员、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内务部副人民委员、共产党员；

伊万·费奥列托夫——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

米尔-加桑·维齐罗夫——农业人民委员、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格里戈里·科尔加诺夫——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巴库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海军事务委员、共产党员；

雅科夫·泽文——劳动人民委员、共产党员；

格里戈里·彼得罗夫——中央军事政权驻巴库代表、支队指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弗拉基米尔·波卢欣——中央特派海军事务人民委

员、共产党员；

阿尔森·阿米良——《巴库工人报》编辑、共产党员；

苏连·奥弗谢甫扬——《巴库苏维埃消息报》编辑、
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产党员；

伊万·马雷金——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副
主席、共产党员；

巴格达萨尔·阿瓦克扬——巴库市卫戍司令、共产
党员；

麦耶尔·巴辛——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
员、共产党员；

马尔克·科加诺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共产
党员；

费多尔·索尔恩采夫——军事干部、共产党员；

阿拉姆·科斯坦江——粮食副人民委员、巴拉汉地
区粮食人民委员、共产党员；

索洛蒙·波格丹诺夫——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
家监察人民委员、共产党员；

阿纳托利·波格丹诺夫——苏维埃职员、共产党员；

阿尔麦纳克·鲍梁——苏维埃工作人员、新闻工作
者、共产党员；

埃伊任·别尔格——水兵、高加索军队联络委员、共
产党员；

伊万·加贝舍夫——旅政委、共产党员；

塔捷沃斯·阿米罗夫——红军高加索第一军团骑兵

支队指挥员；

伊拉克利·麦塔克萨和伊万·尼科莱什维利——共产党员、党委任的邵武勉和查帕里泽的警卫员；

伊塞·米什涅——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员、非党群众。

这些巴库委员来自人民，他们年青有为，身强力壮，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有着广阔的前程。他们每个人都有一部自己光辉的革命历史，在与沙皇专制制度进行长期的英勇斗争中，他们与工人阶级有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一些革命事件的直接组织者和参加者，是来自八个不同民族的代表，在俄国的各个不同的地方开始走上了自己的革命道路。是命运把他们引到阿塞拜疆，带到古老的巴库城墙内。就是在这儿他们亲手建立并用自己的鲜血捍卫了巴库公社——苏维埃政权在南高加索的堡垒。

他们是在战斗岗位上英勇死去的。但对于革命来说他们并没有死。他们的名字和事业成了巴库工人和高加索所有劳动人民的一面旗帜，鼓舞他们进一步团结革命力量，反对南高加索资产阶级反革命民族主义政府，夺取苏维埃政权在高加索的最后胜利。

邵武勉在告别巴库时，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声明：“我们要走了，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回来。”

邵武勉的这些话确是具有先见之明的。一年零九个月后，1920年4月27日夜，在阿塞拜疆宣告成立苏维埃

政权——建立了苏维埃阿塞拜疆。1920年11月29日，苏维埃政权在亚美尼亚取得了胜利。1921年2月底革命的红旗开始在梯弗里斯上空迎风飘扬。全高加索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 * *

巴库委员们壮烈牺牲已经五十多年了。但时间没有，也不可能把这些无畏的革命战士的光辉形象从人民的记忆中抹掉，人民将永远感激他们。他们的事业不可能被人遗忘。他们的一生是英勇斗争的一生，是充满革命豪情的斗争的一生；他们为了共产主义伟大理想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并在胜利在望之际英勇就义。

我不能不又一次回忆起斯捷潘·邵武勉，有多少没有实现的人类理想，同他一起与世长辞了！牺牲时他只有四十岁，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卓越的政治家说来，这正是积极有为的生命的开始。而斯捷潘在这方面具有多种多样的才能：他是一个有极其渊博知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优秀的组织者，出色的演说家，他是一个思想坚定、果断、勇敢、在政治上坚持原则而在阶级斗争的战略战术方面又非常灵活的人。大家知道，伟大的列宁是不轻易夸奖人的，而列宁在1918年写给邵武勉的信中说了下面一段话并不是偶然的：“我们对您采取的坚定而果断的政策感到非常高兴……”^① 否则当时一些报纸也不

^① 《列宁全集》第35卷第325页。——译者

会把邵武勉称作“高加索的列宁”。这也是颇有道理的。

邵武勉幸运地一身兼有职业革命家的崇高品质和某种使人特别感到和蔼可亲的性格。他使每一个诚实的人都能团结在他的周围。跟他在一起感到平易近人。在他领导下工作的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早在1919年，在巴库党委会为纪念牺牲的委员出版的一张报纸上，我曾经写过这样一段关于邵武勉的话：

“……邵武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上的大革命家和杰出人物。他有极为丰富的思想和智慧，善于洞察事物的本质，善于了解和判断社会生活每一动向的原因，能对错综复杂的政治问题轻易而迅速地辨明方向，看清一切现象的阶级背景，并根据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确定正确的行动方针。邵武勉具有他人少见的冷静的信心——无论在胜利之时，还是在失败的情况下都是如此。这种信心产生于火热的情感和坚定不移的理想……

……不管《专政委员会公报》和《前进报》等散布了多少关于他的无耻谰言和诽谤，不管萨多夫斯基之流的无赖们怎样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无耻地公开叫嚷要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残酷迫害，处以死刑，邵武勉始终能控制自己对他们的满腔怒火而不贸然发作。这些厚颜无耻的家伙，不过是被人类滚滚洪流冲到巴库生活之岸的污泥和垃圾，他们只是一时得逞处于当权的地位。在巴依洛夫监狱我和邵武勉会面时，他对我说：‘你不要因为愤怒过于冲动，你要控制自己。不要忘记，这一切都是暂时的，靠无耻的谎言和诽谤欺骗群众，只能蒙混一、两天。但决不会长久。很快就会真相大白，到那时候，他们靠无耻谎言所取得的胜利，将以这

些无赖和造谣者的投机完全失败和彻底破产而告终……”

另一个巴库委员——麦沙吉·阿齐兹别科夫也是对共产主义理想无比坚定和无限忠诚的榜样。

他出身于富裕家庭，在沙皇统治下的彼得堡受完高等教育后，他毅然同自己所出生的环境断绝了一切关系，并把自己的一生和劳动人民永远联系在一起。从1890年起，他就参加了革命运动，通过多次被捕和坐牢的考验，坚定了对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的伟大信念。他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委托在巴库建立了穆斯林工人战斗组织（“胜利的旗帜”）。

“穆斯林无产阶级民主派，”我在1919年前面提到的那张报纸上写道，“非常了解他们自己的领袖、革命家阿齐兹别科夫的革命活动，并特别坚决地派他参加工人代表苏维埃，他是工人议会和社会主义政府中最积极的活动分子。他不仅是城市无产阶级领袖及其利益的捍卫者。他不顾反革命的‘木沙瓦特’党的威胁，不顾任何危险，积极到农村和小城镇去进行有利于苏维埃有力的社会主义宣传，从而把那些长期以来处于别克和可汗恐怖统治之下的农村穆斯林无产阶级，同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联系起来。

阿廖沙·查帕里泽将永远是巴库共产党员壮丽的星座中的一颗明星。

他全身燃烧着火一般的高尚热情。在创造性的革命工作中，他名副其实地是一个热血沸腾的人。他处处表现出是个真正的领袖和坚强的共产党员。他给工会组织、工人政府的机关带来了有条不紊的秩序，生动活泼的工作作风和忠于职守的工作态度。他用自己孜孜不倦和旺盛的革命精力感染其他工作人员……他

是出色的组织者和实际活动家，对南高加索的情况和高加索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了如指掌，他要粉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的政权，并扩展社会主义俄国的工农政权的信念是不可动摇的……

高加索的无产者谁个不知道我们的阿廖沙？

老工人异常热情地告诉我们，阿廖沙怎样在他们中间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工作，怎样组织工会，怎样使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原理通俗化。

青年工人们（阿廖沙后期活动时经常和他们在一起）都十分清楚，他如何身兼三个重要职务：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内务委员和粮食委员……”

我以极大的爱慕和亲切的感情回忆万尼亚·费奥列托夫。他是一个俄国贫苦农民的儿子，从青年时代起就把自己的一生和巴库无产阶级的命运联结在一起。他参加了著名的巴库 1903 年的罢工运动，在沙皇时代多次坐牢和被流放。他和查帕里泽一起，是石油工人工会的灵魂和真正的组织者。

大家都热爱充满青春活力的万涅奇卡^①。巴库社会生活中的每一重大事件他无不参加。他无处不在……

“……尽管长期的漂泊生活严重地损害了万尼亚·费奥列托夫的健康，但他仍坚持工作，表现出了惊人的不知疲倦的干劲。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工作，几乎没有察觉到敌人准备陷害他和他的战友而布下的那卑鄙、阴险的圈套……”

格里戈里·科尔加诺夫早在少年时代，在沙皇制度

① “万涅奇卡”是“万尼亚”的爱称。——译者

下，就参加了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在旧军队里他得到了高加索前线革命士兵的拥护，革命后他领导了高加索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来，又成了巴库公社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和高加索红军司令员。

他是个坚定的有原则性的革命者、杰出的统帅，有非常令人喜爱的性格，是保卫苏维埃巴库的灵魂。

格里戈里·彼得罗夫，他舍身忘我，勇敢无畏，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带领自己的部队，从遥远的北方给由于力量悬殊而十分疲惫的巴库无产阶级，带来了苏维埃俄罗斯的支援和帮助，他与我们共同守卫苏维埃的阵地，与我们并肩战斗……他那勇敢战斗的精神，巴库工人至今记忆犹新……

阿尔森·阿米良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在委员会的各种会议上和苏维埃里他从不出头露面，但他那活跃、敏锐的思想却能洞察党的生活的一切细微末节……他是个具有高度原则性的人。在巴库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他的坚定和远见常常使我们许多人感到惊奇，因为他在处理日常生活问题时仿佛是个天真的孩子……

苏连·奥弗谢甫扬从中学时代起就十分熟悉政治，他精力充沛，有时是组织者，有时是宣传家……不论是在巴库和里海以东地区的监狱里，还是在刑场上，他总是随身带着一卷手稿和几份《消息报》……

我当时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

“巴库委员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我们也可能象他们一样中途牺牲，和我们这些同志躺在一起，但我们也和他们一样，深信后继有人。新的战士将接我们的班，把革命进行到胜利的结局。我们也要象他们那样，在牺牲前的最后一刻高呼口号，只是在

步枪齐射和子弹呼啸声中喊出来的：

我们为共产主义革命献出生命！

共产主义万岁！……”

二十六个巴库委员每个人的一生都为我国革命、我们国家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为我们伟大的多民族的劳动人民兄弟般的团结的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邵武勉、阿齐兹别科夫、查帕里泽、费奥列托夫、科尔加诺夫、彼得罗夫、波卢欣、维齐罗夫、泽文、阿米良、别尔格和其他巴库委员，他们来自八个不同民族，是十月革命把他们团结在统一的国际主义的兄弟情谊之中。他们的一生应该成为正在成长的新的一代共产主义建设者的光辉榜样，继承他们的光荣的革命事业和革命传统，使自己也具备这些优秀革命家如此出色地体现出来的高尚品德——是我们苏维埃青年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1920年8月底，巴库派出了由苏连·邵武勉、巴库老革命家甘久林和其他一些同志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从巴库去里海以东地区运回牺牲的同志的遗骨，并在巴库举行隆重的葬礼。

葬礼于9月8日举行。葬礼前一天发表了巴库苏维埃和阿塞拜疆共产党巴库委员会的公告，公告宣布9月8日为全体巴库工人的志哀日。

《阿塞拜疆贫农报》在葬礼的前一天写道：

“明天是志哀日。明天巴库无产阶级将要安葬被英国刽子手和白匪残酷杀害的二十六位同志的遗骨。这二十六位英勇的共

产主义战士是因叛徒出卖被帝国主义走狗逮捕，偷偷运走，非法杀害的。

这对于无产阶级是多么大的打击呀！……多少革命的精力、热情和才智同他们一起殒没了！

在巴库没有一个工人会忘记邵武勉、查帕里泽、费奥列托夫、阿齐兹别科夫等同志的形象。

他们和我们永别了，但他们那光辉的神态依然在我们上空无形飘荡。他们将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凡是在国内战争的暴风骤雨中诞生的第三国际的胜利旗帜飘扬的地方，他们都将和我们在一起。

而明天，在明天这个哀悼和悲伤的日子里，在安葬我们被杀害的兄弟的日子里，我们默默地站在他们的新墓之前鞠躬致哀。”

9月8日，在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在简短地追述了被帝国主义惨杀的二十六个巴库委员的功绩之后，全体代表起立致哀，乐队奏葬礼进行曲。

9月8日，巴库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街道上到处都是劳动群众的送葬队伍。他们拿着送殡旗子，举着牺牲的巴库委员的遗像。

死难烈士的家属参加了葬礼。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参加了追悼会。

轮船载着二十六位死难烈士遗骨的灵柩，缓慢地驶向码头。

阿塞拜疆的党和国务活动家、死难烈士的战友、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先进工人依次扶灵。

送葬队伍在哀乐和革命进行曲声中，穿过巴库的主要街道，走向烈士葬地——自由广场。

追悼大会开始，当地和共产国际的代表相继致词。

纳里曼·纳里马诺夫代表阿塞拜疆苏维埃政府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悼词：

“现在我们即将在阿塞拜疆的土地上埋葬我们最优秀的亲爱的同志们。他们在自己的革命岗位上英勇战斗到最后一分钟。这些坚强的忠诚的英雄们正是被那个一向口称人道主义的英国杀害的。这二十六个棺木就是这种人道主义的结果。今天历史有意把这种人道主义展示在东方面前。让东方的人民认识一下这种人道主义吧！但是你们知道报仇的时刻就要到了。昨天东方已宣誓联合起来打倒这些世界强盗。古老的东方很快就将苏醒，将轻而易举地推翻压在自己头上的大山。安息吧，亲爱的同志们！你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将在全世界发出灿烂的光辉！”

听着或读着纳里马诺夫这篇激动人心的悼词，我们当中许多人不禁回忆起，纳里马诺夫本人和巴库无产阶级的长期革命斗争，和巴库无产阶级的优秀儿女（他们的遗骨今天如此隆重地安葬在巴库自由广场）有着多么紧密的联系！

担任布尔什维克组织“古墨特”领导后，纳里曼·纳里马诺夫经常得到邵武勉和查帕里泽的坚定支持并与他们建立了极其亲密的友谊。在巴库无产阶级队伍里的共同斗争使他们亲如兄弟。早在二月革命前，在沙皇时代，邵武勉和纳里马诺夫被流放在阿斯特拉罕时，他们之间

就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和相互帮助的情感。当邵武勉及其全家有困难时，纳里马诺夫不止一次地帮助过他们。

1918年，木沙瓦特党人在巴库发动三月暴乱的第一天，邵武勉得知纳里马诺夫全家居住的房子处于射击区，他立即派他的大儿子苏连带领一批赤卫队员前去把纳里马诺夫一家顺利地转移到处于安全地带的邵武勉的住所。纳里马诺夫一家和阿齐兹别科夫全家在邵武勉家度过了令人不安的几天。

1918年夏，纳里马诺夫病倒了。邵武勉真是兄弟般地关心他，并设法把他送到俄罗斯去治疗。这不仅使纳里马诺夫恢复了健康，同时也使他幸免巴库委员们的悲惨命运。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后，纳里马诺夫是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1925年他在莫斯科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遗体埋葬在红场。

邵武勉实际上还救过两个巴库人民委员的生命。他把教育人民委员那捷日达·尼古拉叶芙娜·科列斯尼科娃派到阿斯特拉罕去工作，在那里她被选为阿斯特拉罕省委主席。在阿斯特拉罕最艰苦的时候她曾和谢·米·基洛夫一起在那里工作。

1919年那捷日达·尼古拉叶芙娜在社会教育司担任那·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副手。她经常去克里姆林宫列宁的住处，参加他们的谈话。

1920年春，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刚刚取得胜利，科

列斯尼科娃立即重返巴库，回到人民教育委员会原来的工作岗位。1923年至1929年她先后在莫斯科和亚罗斯拉夫尔担任党的省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的领导工作。

1929年起她被调回莫斯科，任克鲁普斯卡娅共产主义教育科学院院长。

因从事社会政治活动五十年，1954年那·尼·科列斯尼科娃荣获列宁勋章。一年之后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五十周年时（那捷日达·尼克拉叶芙娜是1905年12月武装起义的参加者），再次获得这一崇高奖赏。她的丈夫劳动人民委员雅科夫·泽文（党内代号巴维尔）是牺牲的二十六个巴库委员之一。

巴库公社司法人民委员阿尔塔舍斯·卡里尼扬也是根据邵武勉的指示离开巴库的。卡里尼扬在莫斯科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迁到亚美尼亚，现在他仍然在那里生活和工作，是亚美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正式委员。

在巴库埋葬了二十六个巴库委员并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广场上，建立了一座雄伟的纪念碑——一组表现他们英勇就义的雕像。这组雕像是苏联著名的雕刻家谢·季·密尔库罗夫创作的……

巴库委员们的孩子都无愧于他们父亲的不朽英名。

关于斯捷潘·邵武勉的孩子们的情况我前面已经讲过了。

我还认识阿廖沙·查帕里泽的女儿——叶莲娜和柳

齐娅。她们住在莫斯科，都是党员。叶莲娜·普罗科菲叶芙娜·查帕里泽是动力工程师，参加了马格尼特卡的建设，多年担任黑色冶金人民委员伊·费·捷沃相的副手。

麦沙吉·阿齐兹别科夫的儿子，共产党员阿齐兹和阿斯兰在阿塞拜疆任重要职务。

雅科夫·泽文的儿子弗拉基米尔在莫斯科做党内工作。

* * *

不到一个月，英国人和社会革命党人散布的巴库委员被送到印度去的谣言都烟消云散了。巴库委员显然惨遭杀害了。人们急于要弄清楚这个问题：谁是这一事件的罪魁祸首？谁应对这一暴行承担事实上和法律上的责任？

在巴库逮捕这些委员，就地把他们交给战地军事法庭为此成立的特别军事法庭进行审判，以及批准可以判处死刑的条例，这些都是那个专门为了迫害巴库委员的“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一手策划的。正象我前面讲的，这个“专政委员会”是由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三个政党的头目组成的。而他们的行动是在以邓斯特维尔将军和麦克-唐奈领事为首的英国占领军司令部直接指示下进行的。

战地军事法庭企图在“合法性”及战地的军事法庭的全部法律程序掩护下消灭巴库委员的计划并没有完成。

他们没有想到土耳其人突然冲破了防线，“专政委员会”人员和英军司令部不得不仓皇逃离巴库。后来才知道，地方反革命政权领导人库恩在克拉斯诺沃斯克逮捕巴库委员之后，给彼得罗夫斯克“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和由专政委员会指挥的比切拉霍夫部队拍去一封电报。库恩要求他们同意把被捕者送交战地军事法庭，随即收到比切拉霍夫的复电。电文说他比切拉霍夫本人和“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对此表示同意。但三天后，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丰季科夫为首的里海以东地区政府，在英军司令官的命令下，未经审判和审讯就偷偷地残杀了二十六个巴库委员。有关枪杀巴库委员的事实真相没有公开宣布。

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情况呢？要知道社会革命党人为了替自己“辩解”，需要至少装出一副合法的样子。另外，他们为了玩弄“民主政治”，也一定得设法用文件证明他们杀害布尔什维克委员是“合乎法律手续的”，哪怕这种文件是粗糙地伪造出来的。他们本来打算在巴库审讯斯捷潘·邵武勉（以便在审讯时“制造”记录）。1918年9月2日邵武勉从巴依洛夫监狱给他妻子的信中说：“昨天一个尼古拉二世的老预审员来审问我们，我们把他赶了出去，并且声明我们不承认任何审讯和审判。”因此，审讯邵武勉和其他委员的企图未能得逞。

而克拉斯诺沃斯克当局却不顾同比切拉霍夫达成的协议，甚至根本不打算审问委员们和任何一个被捕的人。

他们只记下了我们说的姓名，并决定枪杀监狱小组长的那张名单中所有的人以及他们认识的支队长阿米罗夫。

我们感到困惑不解。地方当局有个叫雅科夫列夫的律师，是个公证人。当他来到我们囚室时，我们质问他，为什么不对我们进行审讯，不提出任何控诉？这个“律师”厚颜无耻地回答说：

“我忠诚地为沙皇服务了三十年，后来却受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气，现在该你们受受了。”

警察局长阿拉利亚用支吾搪塞的话敷衍我们。根据这一切，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地方反革命势力是在它的英国主子的压力下行事的，而英国人根本不想对我们进行任何审讯。因此，没有审讯巴库委员的记录，匆匆忙忙对他们下毒手，然后精心地掩盖这次杀害事件，最后，杀害之后对我们留在狱中的任何人又不进行审讯——所有这一切，都是一根链条上的环节。英军司令部不愿留下足以证明它参与这一罪行的任何痕迹和文件。丰季科夫1926年在法庭上供认，蒂格-琼斯急于迫害巴库委员，千方百计给社会革命党人“打气”，答应帮他们消灭罪痕。他代表英军司令部保证交给他们一份关于已把委员送至印度的正式证明。但是，这个保证不出所料又是一个骗局。

1919年3月，我们刚刚出狱，瓦吉姆·恰伊金就来到了巴库。他是个有名的律师，是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并由社会革命党提名，代表土尔克斯坦参加立宪会议。他多次设法同我见面，最终我们在一所秘密住宅

见了面。

恰伊金说，他在里海以东地区呆了一个多月，想努力搞清楚杀害巴库委员的真实情况。他不仅是以职业律师，而且是以社会革命党成员的身分进行此事。他想亲自证实，参加政府的社会革命党员中是否有人参与这一屠杀。他想第一个揭露他们，谴责他们，并以此洗掉整个社会革命党所蒙受的耻辱。他信任这个党，尽管它的许多行动他并不赞成。

恰伊金坚定地认为，要不是英军司令部给里海以东地区社会革命党政府撑腰的话，这个政府是不敢犯下这一罪行的。

谈话结束时，恰伊金对我表示，他将在国际上掀起一个运动，揭露并要求审判这一暴行的所有真正罪犯——不管他们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他认为这是他应尽的道义上的职责。

应当说，他并不是说空话。恰伊金很快就开始在巴库和梯弗里斯积极进行这方面的活动，我们也给他以全力支持。1919年4月3日，即我们谈话后不久，恰伊金给伦敦下议院主席发了一封信，现在引述信中一段话来看一看不是没有意思的。

“一个月以前，我作为全俄立宪会议土尔克斯坦委员和土尔克斯坦立宪会议筹备委员会秘书访问了里海以东地区，发现去年9月英国驻阿什哈巴德使团团团长雷金纳德·蒂格-琼斯大尉和里海以东地区侦察局长谢缅·德鲁日金（他后来接受英国使团的派

遣作为其代表参加里海以东执政内阁)参与策划了一起十分严重的刑事犯罪案。在得到有关蒂格-琼斯、德鲁日金等人在土尔克斯坦地区杀害二十六个被俘的巴库委员这一卑鄙罪行的证据之后,我认为我应尽的公民义务,是在当地报刊上公开控诉罪犯,并同时向英国驻土尔克斯坦和波斯的最高外交和军事代表马列松将军提出声明,要求必须就此案开始初步审讯。但马列松将军不但没有进行公正的审判,反而决定将主犯之一谢缅·德鲁日金从阿什哈巴德匆忙调往英国,并发给他一张由里海以东地区到君士坦丁堡去的英国驻土尔克斯坦使团的护照。鉴于蒂格-琼斯大尉犯罪时的直接上司马列松将军的这种作法,我向现时在南高加索的英军司令部的最高代表汤姆森将军提出新的声明,要求就此案火速成立由英国、土尔克斯坦和巴库代表参加的调查委员会,我将向该委员会公布我所掌握的蒂格-琼斯和德鲁日金的罪证。汤姆森将军坚决拒绝成立上述委员会,他竟违反现行法律,在格鲁吉亚的领土上,在英国使团的住地内部,企图亲自对谢缅·德鲁日金进行所谓审讯^①,并不顾南高加索社会组织的控诉和抗议,依然允许他在英国武装人员的保护下毫无阻拦地离境。作为土尔克斯坦居民的代表和一个以在本区申张正义和公理为己任的机关秘书,我认为自己应尽的社会义务是,将上述事实告知下议院并请求采取特殊措施,调查阴谋杀害二十六名手无寸铁的被俘人员的骇人听闻的暴行。”

当然无论是英国国会,还是英国司法机关,特别是英

^① 恰伊金在这里指的是汤姆森将军为了得到他所需要的替英军司令部恢复名誉的证词而对德鲁日金进行的亲自“审讯”。——阿·米高扬

军司令部都不想对此案进行调查。

我们于 1925 年开始审讯杀害二十六名巴库委员的案件。1926 年春，苏联最高法院巡回法庭在巴库审理了丰季科夫案件。法庭成员有：庭长卡麦隆（莫斯科），审判成员有：米尔·巴希尔·卡苏莫夫，阿纳什金·伊·伊以及著名的巴库工人和由于一起工作而对巴库委员十分了解的布尔什维克的积极分子。老布尔什维克谢尔盖·卡夫塔拉泽任国家公诉人。

许多参与杀害巴库委员的人早在苏维埃政权在里海以东地区和南高加索取得胜利之前，就跑到国外逃避罪责。但主要罪犯之一——杀害巴库委员的鼓动者和直接执行者费多尔·丰季科夫于 1925 年被捕获归案。

最高苏维埃法院查明：丰季科夫怀着反革命的目的，于 1918 年在原里海以东地区的一系列城市中组织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暴乱，他依靠所谓“前线战士同盟”和社会革命党在里海以东地区的军事干部，推翻了当地苏维埃政权并伙同社会革命党其他成员夺取了政权；同年，他又与英军司令部进行罪恶的勾结，企图依靠英帝国主义的军队占领里海以东地区，并对苏维埃土尔克斯坦的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推翻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夺取盛产棉花的地区；1918 年 7 月 24 日，他组织了对九个阿什哈巴德委员的杀害，并伙同社会革命党其他成员和英军司令部代表马列松将军以及里海以东英国远征军参谋长雷金纳德·蒂格-琼斯策划和执行了对斯捷潘·邵武勉及

其他二十五个巴库委员的野蛮屠杀。

根据叛徒丰季科夫所犯罪行，苏联最高法院对他判处极刑，把他枪决了。

* * *

我想，在回忆过去很久的日子时，也应该讲几件最近发生的事。

1966年8月，我收到英国马列松将军儿子的一封信。

这个退伍的皇家海军中校小马列松在写给我的信中说：

“……您不止一次地把策划大屠杀一事，归罪于英军南方司令官。这个人是我的父亲爵士威尔弗雷德·马列松少将（死于1946年）。我保证，根据他对我讲的所有谈话只能证明他在这件事上是完全无罪的。据他所知，这一切都是白匪们自己策划和干出来的。我之所以给您写信，是为使您不要在生前一直认为是我父亲策划了对您的同志们的杀害。……”

小马列松未拿出任何客观材料证明他父亲是无罪的。这个问题他并未搞清楚。他的信只是根据他父亲的话写的，他父亲自然是千方百计力图在儿子和社会舆论面前洗刷自己的罪责。

小马列松并未就此平息。《苏联》杂志发表了邵武勉的儿子关于二十六个巴库委员牺牲的谈话不久，小马列松又给《苏联》杂志编辑部写了内容大致相同的信。

在1967年《苏联》杂志第三期上刊登了列夫·邵武

勉给小马列松先生的回信，信中说道：

“……南高加索和里海以东地区的英国人（而且不止是这个地区）千方百计地支持一切反苏势力。不仅如此，巴库、阿什哈巴德、克拉斯诺沃斯科的反革命分子都是直接听从英国军官的摆布的。马列松将军曾颇为自负地写道，当时他和他的军官们‘在约八个月的时期内实际上控制了面积相当于半个欧洲的里海以东的领土’。他得到官方批准‘支持里海以东临时政府反对布尔什维克’。这些话是马列松将军在1933年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的（《双周评论》）。1922年在中亚协会的一个杂志上他曾公开说：‘……我不怕承担任何责任，我根据得到的情报确信，我们的优秀部队将毫不费力地收拾这伙布尔什维克匪帮……’”

接着列夫·邵武勉引用了一份值得注意的文件——前里海以东地区临时执行委员会主席丰季科夫的证词：

“……英国驻阿什哈巴德使团代表，即使团团长蒂格-琼斯枪决巴库委员之前亲口对我说，必须枪决他们。枪杀之后，他对此次枪毙已按英国使团的方式执行表示满意。

阿什哈巴德城，1919年3月2日，
4时35分”

年、日、时是丰季科夫这一书面材料中十分重要的细节：这份材料是他在英国军队还控制阿什哈巴德时亲笔写的……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作为英国里海以东地区远征军参谋长的蒂格-琼斯，关于巴库委员的命运的话，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直接上司——马列松将军的意见。

英国军官埃利斯在他写的《里海以东地区发生的事件》(1967年伦敦出版)一书中企图为马列松的使团恢复名誉。作者本人不仅是该使团的一名军官,而且当时也在阿什哈巴德。他要给使团恢复名誉的企图落空了。相反,他所列举的事实,尽管有许多隐瞒和“修正”,但却从反面作了证明。

埃利斯说,9月18日清晨马列松统治下的阿什哈巴德政府的代表多霍夫要求立即会见将军,并“十分激动地”报告刚刚收到的阿什哈巴德的来电。社会革命党人政府通知已经逮捕了以邵武勉为首的委员,并征询马列松如何处理被捕者。“马列松将军回答说,”书中写道,“他认为无论如何也不准这些委员乘火车来阿什哈巴德。”将军让执政内阁“制定措施防止此种情况的发生”。

作了这种毫不含糊的回答以后,埃利斯又在书中引证了仿佛是马列松的一个非常不坚决的建议,建议是否可以把委员们作为人质转交给他。这居然也成了恢复名誉的依据!

根据埃利斯提供的证据,蒂格-琼斯大尉也知道这次谈话和我们在克拉斯诺沃斯克被捕后发生的全部情况。他很快——即枪杀前两天——就收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的电报。这两天他与丰季科夫、齐明和在阿什哈巴德的其他头目频繁接触。丰季科夫的政府与英国人这些接触的实质是什么,不用埃利斯说,我们也是十分清楚的。执政内阁一切活动都是由英国人直接领导的。

《里海以东地区发生的事件》一书最后说，9月18日晨，马列松立即把逮捕巴库委员以及他所采取的措施向他的上级西姆拉——印度总督司令部作了报告。

这一切使我们有根据认为，当时印度的英国当局的档案文件有可能提供补充材料说明事实真相。有趣的是，在现今印度国家档案馆的档案目录上列有有关档案的卷宗（1947年8月15日总督府的档案已移交给印度国家档案馆）。我儿子到德里进行学术考察时，偶然地碰上了这件事，他想看看这些文件，却发现档案馆中并无这些卷宗。它们不是被撤销，就是被销毁了。如果马列松使团确实象有些人至今所断言的那样，是清白无辜的，那么英国当局何必要在印度独立的前夕，把有关使团活动的档案撤销或销毁呢？

不管英帝国主义者耍什么花招都无济于事。他们永远也不能洗刷掉杀害二十六个巴库委员的耻辱！

* * *

回忆录的读者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巴库委员们的决定和行动，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假如委员们作出了另外的决定并采取另外的行动，情况会是怎样的呢？这一切对事件的进程和结局以及整个巴库公社的命运会有什么影响呢？

读者一方面期望我来回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也会根据自己对事件的认识作出自己的评价。这些评价是以今天的情况和观点并且考虑到巴库公社失败以后所发生

的一切而作出的。

因此，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是尽量按自己的记忆描述那些事件的，尽量按当时这些事件直接发生的日子自己所持的看法来评价它。历史是那样发生的，我当时是那样看的，而今天就是那样回忆的。

写完对巴库公社那些日子的回忆，我想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某种可能使巴库委员们避免那样的悲剧呢？

考虑到具体情况，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或许有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委员们同彼得罗夫支队一起从巴库撤往阿斯特拉罕的时候。如果当时他们不在日洛伊岛等候载有武装红军战士的两艘轮船，或者只把军事指挥员——支队长彼得罗夫留在岛上，顶多再把军事人民委员科尔加诺夫也留下，而委员们和其他政治工作人员则不作任何停留地直接驶向阿斯特拉罕，那是有可能避免悲剧的发生的。因为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军舰过了一昼夜才包围他们，而在此期间他们本可以走出很远的。当时正赶上狂风暴雨的天气，这一点对他们也会有所帮助的。但是，由于政治领导人对其余同志的责任感和同志式的团结感情，他们没有这样做。

第二次可能性是在“土库曼”号轮船成功地摆脱了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的船队驶向阿斯特拉罕方向的时候。巴库委员本可以尝试用武力迫使全体船员去阿斯特拉罕。

关于保持巴库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

现在我想,当时,在1918年,我们完全有可能继续坚持两、三个月,不让英国人进入巴库并用自己的力量胜利地防御土耳其军队,等待阿斯特拉罕援助的到来。(后来从文件上得知,在我们交出政权后不久,根据列宁的指示,有一团红军到达阿斯特拉罕准备前往巴库。)那时,阿斯特拉罕还继续向巴库提供援助(诚然,其规模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并通过基兹利亚尔地区的申德里科夫码头供应粮食。而且当时在北高加索一些地区,其中包括北高加索的东部地区还存在苏维埃政权。因此,尽管里海的航道被封锁,我们也还可以通过北高加索和阿斯特拉罕取得联系。

但是,不久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反革命白匪势力在北高加索占了苏维埃政权和红军的上风。1918年底到1919年初,第十一军在与进犯北高加索的反革命匪帮的战斗中遭受重大损失并撤出了皮亚季戈尔斯克地区。在继续撤往阿斯特拉罕的途中,第十一军又遭受了新的重大损失。以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另一批红军一直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然后撤到高加索山区并建立了一支由山区人民组成的游击队,随即向南高加索转移。

这样一来,1918年底巴库实际上失去了北高加索的一切援助。随着冬季的到来,伏尔加河口和里海北部停止通航。结果从俄罗斯输送弹药和任何其它的援助都停止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巴库将完全被封锁,在巴库

的苏维埃政权将遭到失败，而且会付出更大的牺牲。

诚然，不久土耳其和德国都相继战败，并与协约国签订停战协定，土耳其军队在1918年11月初离开了巴库。但是英国占领军简直是接踵而回到那里。英军第一次来巴库只有一千人左右，而这次则拥有相当雄厚的兵力，他们在南高加索各城市都布置了驻防部队。

协约国战败德国以后，即便巴库苏维埃政权坚持到年底，也不可避免地要和超过它许多倍的英国军队发生冲突，在被封锁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未必能够坚持住。英国人这时已从土耳其战场上腾出手来，拥有更多的兵力，而我们到1919年春季以前还不能同苏维埃俄罗斯取得联系，得不到它的必要的支援。

1918年秋和1919年冬整个苏维埃俄罗斯，特别是我国南方，军事政治局势十分严重。在这期间，巴库与苏维埃俄罗斯之间的一切海陆联系完全中断。

因此，现在根据巴库苏维埃政权失败后出现的情况来议论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巴库无产阶级革命的暂时失败，是巴库成为两个交战的世界帝国主义营垒发生冲突的舞台的必然结果。这两个帝国主义营垒都竭力企图攫取巴库的石油和控制称霸近东的这一战略要地。

当时苏维埃俄罗斯在南方不如敌人强大，所以在这一地区遭受了失败。

列宁具有一种非凡的才能：尽管掌握少量的事实和材料，却能据此作出正确的政治上的概括并给以正确的

评价。这一点也反映在列宁当时对巴库所发生的事件的评价上。

1918年7月29日，正好是巴库苏维埃政权失败的那几天，列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莫斯科苏维埃、莫斯科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演说。那时巴库与莫斯科的联系已中断，我们不知道列宁的这个讲话。

列宁谈到了苏维埃俄罗斯的十分困难的军事、经济形势及其所面临的危险处境。他剖析了他所掌握的全部事实，特别详细地分析了英法帝国主义同苏维埃俄罗斯斗争的策略和方法。

列宁说，从得到的情报中可以看出，盘踞在印度和阿富汗的英国人企图进攻苏维埃俄国；在英国人的公开参与下，反革命暴动席卷了中亚细亚一部分城市。列宁说：“现在，当我们弄清了这些环节的时候，我们共和国的目前军事形势和总的战略情况也就十分明确了。我们看到，北方的摩尔曼，东方的捷克斯洛伐克战线，东南方的土尔克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成的一切环节几乎连成一片了。”^①

他宣读了他刚刚收到的一份很详细的关于巴库万分危急的军事形势的报告；报告说就邀请英国人来打土耳其人的问题进行表决时，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苏维埃中处于少数。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6—7页。——译者

列宁称赞巴库布尔什维克拒绝与英国干涉者合作反对土耳其人。列宁说：“坚决拒绝同英法帝国主义者缔结任何协定，这是巴库同志能够采取的唯一正确的措施，因为邀请他们而不把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哪怕是在被分割的领土上）变成帝国主义战争的奴隶，是办不到的。”^①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很重视这样一个事实：在苏维埃政权处于危急的时刻，巴库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列宁谈到这些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时说：“他们没有跟随莫斯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可耻的冒险和叛卖活动，仍然同苏维埃政权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只可惜他们人数很少。”^②

列宁继续说：“我们知道，在高加索，我们的共产党员同志们的处境特别困难，因为公然同德帝国主义勾结（当然是在保卫格鲁吉亚独立的借口下）的孟什维克完全出卖了他们。”^③

列宁谈到国际形势时说：“……英法帝国主义、世界帝国主义获得了新的胜利。如果德帝国主义在俄国西部继续是一个帝国主义军事侵略力量，那么英法帝国主义就有可能在俄国的东北和南方加强起来，……英法帝国主义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它包围了我们，用了一切力量来摧毁苏维埃俄国。我们清楚地知道，英法帝国主义的这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6页。——译者

② 同上书，第3页。——译者

③ 同上书，第6页。——译者

个成就同阶级斗争是有密切关系的。……因此，目前苏维埃共和国的国际形势的尖锐化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分不开，这是毫不奇怪的。”^①

列宁说：当布尔什维克看到在前线某一地区进攻的干涉者拥有明显的强大的优势的时候，他们与孟什维克和其他妥协主义政党不同，他们没有与帝国主义结成任何同盟，没有邀请帝国主义充当“救世主”，而是为了重新配置和加强自己的力量进行暂时的退却。

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列宁的这些话。但邵武勉关于把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从巴库撤出的决定好象是响应列宁的这一思想的。

综上所述，自然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巴库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处于两个帝国主义交战阵营（它们都对南高加索进行了武装干涉）矛盾、冲突交接点的高加索，力量对比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

在评述事件的全过程时，我得出这样的看法：在巴库党代表会议上以多数通过的邵武勉关于在1918年8月中旬撤退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建议是适宜的，后来的事件也证明了它的正确性。

当然，我不能奢望对那段时期所发生的事件作出详尽无遗的评价。这是历史学家的事了。

^① 《列宁全集》第28卷第8—9页。——译者

在里海以东地区的监狱里

在克拉斯诺沃斯克

我们得知巴库委员牺牲的详情；形形色色的“客人”；我们被转移到基孜耳—阿尔瓦特；阿尔塔克和马鲁夏·克拉马连科的故事。

我前面已经讲到，1918年9月19日深夜，巴库委员被带出看守所和克拉斯诺沃斯克监狱，他们在黎明时分被残酷地杀害了。

我们的囚室里只剩下四个人了：邵武勉的两个儿子——苏连和列瓦、萨姆松·坎杰拉基和我。在看守所的女囚室里，仍然关着瓦尔瓦拉·查帕里泽、马利亚·阿米罗娃、奥尔加·班尼科娃（费奥列托夫的妻子）和萨捷尼克·马尔季科扬。

在这以前我们一直躺在囚室的地板上，因为统铺上挤不下。现在统铺空下来了，我们四个人睡在这里也够宽敞的。能够搭拉着腿坐着，甚至能靠靠墙。

不久，我们囚室又送进来两个被捕的同志——阿米罗夫^①兄弟俩——亚历山大和阿尔麦纳克。虽然增加了

^① 疑为“阿米良”之误，见本书第297页。——译者

两个人，统铺并不因此而显得拥挤。

答应说要放我们出狱，可是我们却白白地等了好几天而不见动静。每当监狱看守和当地警察局局长阿拉尼亚到我们囚室来的时候，我们就坚决地质问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放我们出去。而他们却总是一个腔调说他们“还在听候命令”，或者说他们“还没有接到命令”，或者说什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我们很快就确信，释放我们的诺言只不过又是一个骗局罢了，从此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巴库委员被带走后，不仅在看守所里，而且在监狱里也还有巴库的布尔什维克，这一点由于我们当时被关在自己的囚室里，所以并不知道。他们之所以没有和巴库委员一起被带走，仅仅是由于在组长（科尔加诺夫）那里搜到的“25人”的名单中没有他们的名字。在这些同志之中有著名的军事活动家、高加索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基戈扬，还有两、三个同志，他们的名字现在我已记不得了。不久，他们都从狱中被释放了。

我很希望列瓦·邵武勉能够得到释放。我曾多次向监狱看守提出这样的要求和交涉，而得到的回答是，他无能为力，不过他还是答应向警察局长阿拉尼亚转达我的要求。

每当我进行这样的谈判时，列瓦总是沉默不语，但可以明显看出列瓦对我的这个要求是极为不满的：也许是因为他不愿意丢下自己的同志们，也许是因为他那样的

年龄所特有的自然的愿望——和我们分担监狱生活中的一切苦难。他是个勇敢的孩子。他总是顽强地使自己显得象个大人的样子。在监狱里他随身带着一件达格斯坦长袍和一顶长耳风帽。有时他穿上这件长袍，确实象个大人的样子，从外表看很象个成熟的青年人。我不让他穿这件长袍和戴这顶长耳风帽，特别是当我们等待“长官”前来视察的时候。列瓦清楚地知道，我为什么不让他穿长袍和戴长耳风帽。他有时听我的话，但有时并不听。有一次，他仿佛是故意地穿着这件衣服坐在铺上，这时警察局长阿拉尼亚突然来到囚室。于是我对他说：“阿拉尼亚先生，你们不释放我们大人，那也就算了！你还是把这个小孩子放了吧。把他关在监狱里是完全违法的。”阿拉尼亚转向列瓦，看了他一眼说：“怎么，你发疯了？他算什么小孩子？看他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高加索山区里的土匪。”我的反驳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而列瓦对于事情就此了结，看来倒很满意。我，还有苏连和萨姆松都责备他这种孩子气的行为。但是列瓦仍然以一种骄傲的神态继续穿着他那件心爱的长袍，几乎在整个狱中生活的那段时间他都是如此。我们也不再干涉他了。

记得列瓦生活中还经历过这样一件事，这是我们在狱中多次谈话中有一次他对我讲的。

有一次，他决定托父亲给列宁带去一枚卡尔·马克思的像章。事情是这样的：在二月革命以后不久，巴库有一个会做买卖的生意人，他制做并出售革命徽章。其中有

一种是用金属做的带有别针的正方形小像章，像章镶着鲜红色的边，中间是马克思像。当斯捷潘·邵武勉动身到彼得格勒去出席苏维埃第一届代表大会的时候，列瓦交给他一枚像章，请他一定亲自把像章交给列宁。列瓦自豪地对我说：他父亲告诉他，列宁把他送的像章佩戴在胸前。

很多年以后，当我读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列宁回忆录的时候，我就想起了列瓦讲的这件事。回忆录在叙述1917年6月发生的事件时，有这样一段话：

“当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疲倦地回家来时，我不愿意再提出任何问题去烦扰他。但是，在散步的时候，不论是我或是伊里奇，都喜欢按照老习惯随便谈谈。我们有时也在彼得格勒区比较偏僻的街道上散散步，虽然不是经常地。有一次，我记得我们跟邵武勉同志和叶努基泽同志一起散步。邵武勉把一些红色的徽章交给伊里奇，这是他的几个儿子托他交给列宁的。伊里奇微笑着接受了。”^①

在叶卡捷琳娜·谢尔盖耶芙娜·邵武勉的来往信件中还保存着列瓦写给他当时正在彼得格勒的父亲的书信。

他写道：“亲爱的爸爸！你的身体怎样？你是几号到达彼得堡的？卡尔·马克思像章你交给列宁同志没有？转达我的问候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就请交给他吧！如果你看到有什么小册子和歌曲集，给我带一些回来。”

当时列瓦不会想到，正好一年以后，即1918年6月，

^① 《列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出版，第317页。

他会带着邵武勉给列宁的信到莫斯科去。他带着邵武勉、查帕里泽、科尔加诺夫和舍鲍尔达耶夫签署的委托书，历经艰险取道阿斯特拉罕和卡梅申到达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他受到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总务处处长邦契-布鲁也维奇亲切热情的接待。邦契-布鲁也维奇要带列瓦去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瓦说什么也不肯去，他不好意思去见列宁，主要是因为他脚下的那双靴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靴底都掉了，是用绳子系在鞋帮上的。只是到第二天，列瓦好歹把皮靴修理了一下，才去见列宁的。

* * *

……我们在囚室里继续过着那种枯燥无聊的单调生活。巴库委员悲惨牺牲的消息使我们心情沉痛。对于个人的命运我们已经置之度外：我们几乎连想都不去想它。我们一心一意想着革命的前途，革命正在击退得到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而又重新抬头的反革命势力的进攻。我们毫不怀疑，苏维埃政权在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中必将获得胜利，但我们为自己不能亲自参加夺取这一胜利而感到难过。

我们之间都尽量不谈起朋友们牺牲的事，这不仅是由于不想再去触痛邵武勉儿子的创伤，同时也因为我们自己谈到这个问题心里也十分沉痛。我们每个人都以沉默去经受面临的一切。记得，在夜里我们常被恶梦惊醒。四年以后，当我在罗斯托夫工作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对我当时的狱中心情有一定程度的反映。该

文刊登在1922年9月20日的《巴库工人报》上，题目是《流血四周年祭》。这里引述其中的一段：

“这里所说的是整整四年以前发生在克拉斯诺沃斯克看守所的又小又脏的囚室里的事。

我们关进这间小小的囚室里已经三天了。在我们的囚室里有邵武勉、查帕里泽、费奥列托夫和其他同志，总共十六个人。

9月19日夜间，有的人躺在统铺上，有的人躺在地板上。有的人睡着了，有的人在打瞌睡。狡猾而又皎洁的月亮照射着囚室的窗户。

深夜两点，传来了嘈杂声和铁器的碰击声。囚室的门被打开了，一群‘社会主义的刽子手’闯了进来。开始点名。把所有的人分成三个组，头两组被带出囚室……

我们问他们‘带到哪里去’，他们回答说：‘这里地方小，我们把你们转送到阿什哈巴德省监狱去。’

和那些最好的朋友和同志们分别的痛苦时刻来到了，他们都是献身于工人阶级事业的战士，是巴库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

此后就是痛苦的然而又是杳无音信的日子……

他们在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哪里去了？我们不得而知。有的说他们在阿什哈巴德，有的说是在波斯。我们不知道我们亲爱的朋友现在在哪里，巴库无产阶级不知道他们的领袖现在在哪里。苏维埃政权不知道她的优秀战士现在在哪里。

我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怀疑，心情特别痛苦。一想到斯捷潘、阿廖沙、麦沙吉、万尼契卡①……已不在人间了，心里就万分

① 万尼契卡——是万尼亚的爱称，即指费奥列托夫。——译者

沉痛……

突然，一个监狱外面的人出乎意外地把这个可怕的实情告诉了我们，他向我们讲述了社会革命党人这些刽子手所干的前所未闻的残暴行为的情景。这个和我们素不相识的人是克拉斯诺沃斯基的铁路工人，好象是个列车员。

那天夜里，他正在车站。他看见一些形迹可疑的人，都带有武器，改换了装束，头上缠着白头巾。车厢里放着铁锹。

他感觉到他们正在策划一件凶杀案，于是便决定做这场即将进行的血腥屠杀的见证人。他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在两节车厢中间爬了上去，并躲在缓冲器上。他亲眼看到火车在偏僻的荒野中停了下来，俘虏被分批带出车厢，并在离路基不远的地方被残酷地杀害了。

在哒哒的机枪声中，他听到白色恐怖的牺牲者在就义前高呼：‘我们为共产主义而死。共产主义万岁！’

……天亮了，杀人凶手们慌慌忙忙地走了，连尸体也没顾得上全部掩埋。

巴库无产阶级的领袖用自己的鲜血染红了遥远的里海以东地区的荒野上的沙土。他们把自己的整个一生都贡献给了共产主义事业，他们的英勇牺牲擦亮了被蒙蔽的巴库工人的眼睛，并把他们引上了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正确道路。

巴库无产阶级领袖的英勇牺牲结束了巴库工人运动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结束了资本家的奴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叛卖活动和冒险主义的罪恶历史。

让巴库工人回忆一下巴库苏维埃最后一次会议(1918年7月25日)的情形吧！当时苏维埃的大多数代表在社会主义叛徒的领导下，站在英国人一边，反对俄罗斯无产阶级。自鸣得意的社会

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拿出一副厚颜无耻的奴才相建议布尔什维克也跟着他们走，去为帝国主义效劳，否则就以死亡相威胁。因愤恨和蔑视而气得脸色发白的邵武勉同志，当时就卓有远见地宣称：‘一时得胜的叛徒们企图把我们拉到叛卖的道路上去，但是我们宁愿牺牲在光荣的革命岗位上，也决不以背叛和叛卖的代价拯救自己的生命’。

他们光荣地牺牲了，不愧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

* * *

囚室的门被打开了，监狱看守又把一个被捕的人抛到囚室的地板上，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尤其是在夜里。

渐渐地我们对此也就习惯了。被捕的人通常是因为酒醉后在大街上或饭馆里吵闹打架而被拘留的彪形大汉，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而落入巡夜警察毒手的其他人。一般说来，他们都是普通的居民，倒挺乐意讲述他们在夜里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他们使我们枯燥无味、与世隔绝的狱中生活多少活跃了一些。他们讲他们为什么被拘留，讲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详细向他们打听，人民关心什么，关于国内战争报纸上写了些什么，人们有什么议论，报纸上有什么有趣的新闻（我们难得看到报纸）。这些“客人”有的同我们在一起住上一两天便对我们产生了好感，出狱时答应给我们送些书报和吃的东西。应该说，他们之中大多数人是履行了自己的诺言的。

这里我想起有一天深夜我们囚室来了一个“客人”。第二天早晨他向我们自我介绍说他是律师塔尔诺夫斯基

伯爵。这个塔尔诺夫斯基的身分是否果真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当时并不太感兴趣。但他是个非常少见的令人感兴趣的交谈者，我们都很愿意听他讲的故事。他是个身材高大的中年人，长得很漂亮，留着黑黑的小胡子，胖胖的，衣着讲究——在我的记忆中这位伯爵就是这个样子。他对我们说他是从波斯的埃恩泽里（帕勒维）港到这里来的。在克拉斯诺沃斯克码头检查证件时他被逮捕了。不过他在码头上已托人转告他住在克拉斯诺沃斯克的熟人帮助他出狱。塔尔诺夫斯基满有把握地说，他很快就会被释放，在克拉斯诺沃斯克他有很多熟人，况且逮捕他又是毫无道理的。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波斯、关于英军占领、关于留在波斯的俄国人的生活、关于前线的形势以及国际生活中的一些有趣的情况。看来，他很喜欢我们这伙人，因此他乐于把他经历中很有趣的事讲给我们听。此外，他还善于非常生动地、津津有味地讲俏皮话，这些俏皮话常常引起我们哄堂大笑。所有这一切多少使我们阴暗的狱中生活变得轻松了些。

伯爵被关入监狱时几乎没带什么东西，他没有大衣。他有一个大褡裢。夜里有些冷，塔尔诺夫斯基就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把褡裢铺在统铺上，一头套在脚上，另一头套在头和肩膀上，中间盖上他那件蓝色的西服上衣。看上去虽滑稽可笑，可是暖和。

塔尔诺夫斯基看见我们实在非常需要书和报纸，他答应我们，等他一出狱，马上就给我们送书来。过了两、

三天，他被释出狱，我们果真收到了他寄来的五、六本莫泊桑的作品和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一卷集，还有一筐最好的葡萄。

有书读对我们来说是真正的幸福。葡萄也送得正是时候。

有一次，一个亚美尼亚商人被带进我们的囚室。当他知道是和布尔什维克同关在一个囚室时，他简直吓破了胆，生怕给他“扣上”一个新的严重罪名而长期坐牢。但他很快也就放心了。

他对我们的伙食这么糟糕甚为惊讶，老是唉声叹气，并且对我们如此若无其事地忍受这种情况而感到惊奇。他赌咒发誓说他出狱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们送来一顿美餐。果然，他被释放后第二天，我们就收到了一大锅做得很好的亚美尼亚式的“多尔马”（用葡萄叶做的菜卷）和味美可口的加有水果的羊肉抓饭。那一天我们可是说了我们这位“善士”的好话：这样香甜可口而又丰富的饭菜，我们已经很久没吃过了……

有一次，同我们关在一个牢房的亚美尼亚人扎拉弗扬患了重病，必须立即把他送到医院去。但怎么个送法呢？监狱长这时一反常规，竟叫我们（在卫兵监视下）用担架把他送去。我们非常高兴有机会到外边去，即使是短时间也好。我们在市内的街上走着，实际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看克拉斯诺沃斯克是个什么样子。街道狭窄，尽是些一层和两层的砖房。树木很少。正象我们所知道

的那样，克拉斯诺沃斯克没有任何淡水水源，要用专门的设备使海水淡化来取得淡水，而有一部分淡水是用小油船从巴库运来的。

克拉斯诺沃斯克当时是个人口大概还不到一万人的小城市。除手工业作坊外，没有工厂企业。火车站和港口有些职员和装卸工人。这就是城市的全貌。城里较多的是小店铺，而这些小店铺不仅要供应本城市的居民，而且还要供应居住在毗连地区从事畜牧业和捕鱼业的土库曼人。这里没有水浇地，也是因为缺乏淡水。城市的居民主要是俄罗斯人、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有时在城里碰见土库曼人，他们是来赶集或办别的事的。

我们在大街上走着，大家都为好不容易得到一次机会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看一看城市和人们而感到高兴……我们在武装士兵的监视下在大街上行走，这引起了少数行人的好奇。我们曾有过逃跑的念头，然而既没有时间，又没有事先订好逃跑的计划。我们固然可以四散奔逃，但反正是逃不出城去，因为克拉斯诺沃斯克一面是缺水的沙漠，另一面是大海。可以逃跑的唯一的一条路，就是通往里海以东纵深地区的铁路。但车站和铁路线警戒严密，如果我们从那里逃跑，当然马上就会被抓住。

港口同样戒备森严。港口内船只也很少，即使跑到港口去也免不了遭到失败。那时在城里我们既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秘密接头地点。我们也不可能指望监狱中

偶然来的“客人”的帮助，因为一般说来，他们都是些胆小惜命的普通居民，何况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

记不清是1918年10月底还是11月初，我们囚室又关进了一个人。他四十岁左右，个子比中等个儿高点，面容瘦削，身材匀称，一头乌黑卷曲的头发，使他那令人喜欢的知识分子的面容显得更加突出。原来他是巴库的伊勃拉季姆·阿比洛夫。在巴库我听说过他，不过从未见过面。阿比洛夫原来是受苏维埃政权的委托从阿斯特拉罕到这一带来了解巴库委员的下落的。除他之外，阿斯特拉罕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为此还派了两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到克拉斯诺沃斯克：马鲁夏·克拉马连科和阿尔塔克·斯塔姆鲍利茨扬。阿斯特拉罕的同志给他们带了些必要的经费，让他们乘一条不大的“阿维季克号”船走。这条船伪装成好象是从阿斯特拉罕运走巴库的难民去克拉斯诺沃斯克，因为阿斯特拉罕当时正在闹饥荒。阿比洛夫、阿尔塔克和马鲁夏冒充去里海以东地区逃难的难民也搭上了这条船。在阿斯特拉罕他们彼此很熟悉，但在路上他们却装作互不相识的样子。

一切都很顺利。但到了克拉斯诺沃斯克，阿比洛夫经过搜查之后，却突然被捕了，并被关进我们这个囚室，于是他便和同志们失去了联系。

阿比洛夫是个很有学问的人，和他谈话总是很愉快的。他给我们讲了有关苏维埃俄国总的形势，特别是有关阿斯特拉罕形势的许多有趣而又重要的情况。从他那

里我们得知邵武勉的妻子和他的两个年幼的孩子没有去莫斯科(不出我们所料),而是留在阿斯特拉罕,希望巴库委员很快得救:她还不知道他们已悲惨地牺牲了。

从同阿比洛夫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小手工业者的儿子。他在手工作坊当过几年工人。1905年他参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其后几年中,他积极参加巴库党的工作。1913年被捕并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阿比洛夫不仅由于在巴库工作的关系很熟悉邵武勉和纳里马诺夫,而且当他们在阿斯特拉罕过流放生活时,他也常同他们见面。

应该说,阿比诺夫虽然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但他拥护苏维埃政权,并受到苏维埃政权的极大信任。

这里我想先不谈这件事,而先讲讲后来发生的事情。在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斯克转移之后不久,阿比洛夫便被释放并动身到巴库去。1919年3月初我们来到巴库,见到阿比洛夫时,他已是阿塞拜疆议会议员了。他参加了社会主义者议会党团。在议会里他反对木沙瓦特政府。1920年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他最终参加了布尔什维克。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结束后,阿比洛夫担任这次代表大会成立的“宣传和行动委员会”书记;后来,1921年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驻土耳其第一任全权代表,他在这个重要岗位上表现出了一个苏维埃外交家的卓越才干。苏联驻土耳其大使阿拉洛夫在他所写的回

忆录中热情地介绍了阿比洛夫在出任驻土耳其代表期间的活动。纳里曼·纳里马诺夫和亚历山大·米亚斯尼基扬在为纪念阿比洛夫而写的文章中对他的活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1923年阿比洛夫因患重病在土耳其逝世……

我们的狱中生活依旧是单调的、与世隔绝的。跟我们打交道的只有我们的监狱长阿尔图宁和他的主要助手——看守。

阿尔图宁身体肥胖，红光满面，留着浓密的长胡须，他的整个外貌很象一个俄罗斯的外省商人。他的妻子给我们的印象既不凶恶，而且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至于阿尔图宁本人就象我们一般人所说的是个奉公守法、循规蹈矩的公务员。他没给我们制造特别的麻烦，不过他也很少同意通融。我们不能到院子里去，不允许我们同邻室的犯人来往。

只有列瓦·邵武勉一个人能够到院子里去，这还是因为他要负责烧开一大壶水，供全狱的人喝茶。这对列瓦来说是一件大快事，因为在院子里他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虽然是短时间的；同时他觉得他在为我们做一些有益而又愉快的事。

阿比洛夫被关进我们囚室的第二天，列瓦告诉我们说，他经过走廊时，通过一个囚室门上的监视孔看见了一个新的被捕者一闪而过。这个人列瓦认识，是马鲁夏·克拉马连科，但是为了保密，他装着没有认出她的样子。

在这以后，当我们从克拉马连科的囚室旁边走过时

(每次带我们上厕所都要经过这里)，即使我们有机会朝她囚室门上的监视孔看一眼，我们也极力“不认得”马鲁夏。我们的伪装一直到最后都非常成功。否则就可能把马鲁夏跟我们“联在一起”，而暴露了她也是布尔什维克。

这样我们知道了从阿斯特拉罕派到克拉斯诺沃斯克来的三位同志中有两个同我们一起已被关在看守所，幸好他们还没有暴露。这也就是说，第三个同志阿尔塔克·斯塔姆鲍利茨扬终于躲过了种种搜查和盘问，巧妙地骗过了克拉斯诺沃斯克警察当局。

我从小就和阿尔塔克很熟。我前面讲过，在第比利斯亚美尼亚中学时，我们是同班同学。阿尔塔克是个职业革命家。革命前我俩同属于一个地下马克思主义小组。在1918年3月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我们一同参加了隶属于巴库党委会的布尔什维克战斗队，并参加了巷战。我们之间的友谊和互相信任经历过多次考验，每经过一次考验，我们的关系不仅没有疏远，而且更加密切了。阿尔塔克一贯的特点是他无限忠于布尔什维克党和他革命斗争中的战友。我们都非常爱戴他。

阿尔塔克勇敢得近乎鲁莽，但又非常机警，他总是能够摆脱看来是毫无出路的困境。这些素质同他那其貌不扬的外表极不相称：他又小又瘦，表情象个孩子，不过这种表情他可以借助于非常灵活的面部随心所欲地加以改变。他又是个幽默大师，总有不少的笑话故事可讲。他很会说俏皮话，善于巧妙地抓住同志们性格或举止中极

小的特征或弱点，维妙维肖地加以模仿和善意地开开玩笑。但他那种独特的、充满热情的眼神，那种在任何场合都能控制自己的能力，这一切都使你感到他是一个意志坚强、勇敢刚毅的男子汉。

我们在看守所的生活条件极端恶劣，伙食粗劣而又吃不饱，彻底损坏了我们的体力。余下的钱都不够吃几天饱饭了，但我们不想把它花掉，因为也许我们还会有需要用钱的地方。经常挨饿对我的身体影响特别厉害，因为我来克拉斯诺沃斯克前就非常虚弱。我牙床痛，几乎完全不能吃又干又硬的面包。最后我要求看守所长让我找个牙科医生看看。阿尔图宁同意了。

有一天，在卫兵的监视下，他让我到市内一个私人牙科医生诊所去看看。诊所设在一座不大的房子的一层。卫兵打开了门让我进去，他自己留在门外。医生的房间很小，室内陈设简陋，医疗设备和家俱很少。一个外表好看的年轻女医生跟我打了招呼。关于我的身分已事先告诉了她，所以我没有必要做自我介绍。我也没问她的姓名。她仔细地给我做了检查并对我说：“对您来讲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多吃新鲜水果和尽可能多地呼吸新鲜空气。”她的话使我很惊奇，我想：“她这不是在嘲弄我吗？她明明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呀！”但她讲这些话时，态度很严肃，我甚至感到她怀着一种敬意的心情看着我。这从她的眼睛、令人愉快的笑容和温柔的声音中看得出来。不过她一面讲我还是一面想：“我这个坐牢的

人,怎么能够买水果和呼吸新鲜空气呢?”但由于自豪感,我没有对她讲这话,况且她又能给我什么帮助呢?我谢了谢她就走了。①

* * *

我们继续被关在监狱里。日子千篇一律地一天天过去。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的是什么。但是我们对这点却处之泰然。我们已完全习惯了我们所处的环境。突然有一天傍晚(那是在11月初),完全出乎所料地对我们宣布,

① 人生中居然有这样的巧遇!事隔四十一年之后,这位女医生(这时她住在美国)在一次偶然的场合中见到了我。1958年我访问美国时,到芝加哥的那一天正赶上H·纳杰日娜率领的苏联著名的“小白桦树”歌舞团在该城大音乐厅演出。

承蒙这一次苏联艺术家在美国演出的著名的组织者尤罗克先生的盛情,给我送来了几张包厢票。演出结束后,我走到后台,向我们那些作了出色表演的姑娘们表示问候和祝贺。

后来我收到一封威斯康辛州一家报纸的主编弗雷德·K·斯坦克这样一封信:“尊敬的米高扬先生!随信附上一篇文章,我相信,您一定对它很感兴趣。”

报纸上登了尤季特·舒伊斯卡娅对记者来访的谈话,她就是1918年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城给我看过病的那位牙科医生。她也去看了“小白桦树”的演出。她一眼就认出了我原来就是她很多年以前为之治过病的那个病人。

这篇谈话颇为详细真实地叙述了我们那天见面时的情形。虽然谈话的语气总的说来是善意的,但是舒伊斯卡娅还是慌忙声明她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没有关系。在结束这次谈话时,她说:“请不要造成这样的印象,好象我是俄国统治者的朋友。”

两小时后把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斯克转到基孜耳-阿尔瓦特城。我们感到很吃惊，极力想弄明白为什么如此异乎寻常地仓促行事。他们把我们从一个城市的看守所转移到另一个城市的看守所，是什么意思呢？只有一个细节使我们明白一点：并不是把我们所有的人都转走——不是同我们一起被捕的阿比洛夫留下了。我们马上想到，巴库委员差不多也是这样，在同样的借口下被从狱中带走，而在半路上却被他们枪杀了。我们毫不犹豫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命运已定，今天夜里敌人象杀害我们的同志那样，把我们带到远离阿什哈巴德的某个地方，在偏僻无人的地方把我们杀掉。

虽然在当时这对我们来说是突如其来，不过对于这种结局我们思想上早已有所准备，所以尽管觉得奇怪，但并不感到什么特别不安。

我们毫不怀疑，我们是被带去枪毙。

我想起一个细节：我们还剩下一百二十个卢布。我征得大家的同意，留下四十个卢布（一张四十卢布的纸币），以备万一。这笔钱在最后时刻可能还用得着，譬如说，如果口渴，就把钱送给一个士兵，要他给我们弄点水喝。剩下的钱我都给了阿比洛夫。我对他说，这些钱现在我们已经用不着了，你以后可能还用得着。我们还把茶壶留给了他，因为我们现在也用不着茶壶了。我们同阿比洛夫亲切地告了别，被押送着走出囚室。经过走廊时，发现马鲁夏·克拉马连科正从囚室的了望孔看着我

们，是吵吵嚷嚷的声音引起了她的注意。我们同马鲁夏·克拉马连科目光相遇，默默地、在押送人员毫无觉察的情况下互相告别……

这时女囚室的门打开了，四个和我们一起被捕的女同志走到走廊上。同她们一起走出囚室的第五人是马罗·图马尼扬。她比我们稍晚点被捕。几个月来，这是我们第一次同她们见面。我们大家都在警卫押送下被带到院子里。天已经黑了。我们步行穿过城市的大街，被带到火车站。我们昂首阔步，毫无惧色。只有生病的大阿米罗夫显得有点紧张，但他也极力控制自己不流露出来。

在车站，我们被押进一节保温车厢。这节车厢是按照运送邮件的需要装配的。车厢有三分之一已被隔开，显然是供邮政人员使用的。所有的男人和妇女一起被安置在车厢装货部分的一半，而另一半是押送人员占用。中间有个间壁把我们隔开，间壁上有一个装着窗栅的小窗口，几个卫兵一直目不转睛地从窗孔盯着我们。

我们坐的那节车厢很小，凳子或铺板都没有。所以我们只能坐着和躺在地板上，妇女在一边，男人在另一边。天气很冷。凛冽刺骨的寒风透过车厢薄板上的裂缝不断吹进来。我身上只穿着一件军便服和一条裤子（现在记得好象是马裤），脚上穿着一双靴子，头上戴着一顶军帽，所以我感觉特别冷。其他同志还有件大衣。苏连·邵武勉和我一样，穿的也是军服，不过幸好他还有一

件军大衣。就是在这里列瓦也没丢掉他那件长袍，这次可是真正用上它了。我冻得直哆嗦，于是就躺在列瓦和苏连中间，这样多少也暖和些。

当时只有一点使我不安：如果是日出前把我们带出去枪毙，刽子手们是否会认为我是吓得发抖，而不是因为冷得发抖？太阳可以使我暖和些。在思想上对于死本身倒是无所谓了。（人处在这种时刻会出现这样的思路，显然是生活中的一个心理之谜！）我希望他们等太阳升起稍微暖和一些的时候，再对我们下毒手。那时我和其他同志都暖和些了，这将使我们能够大义凛然，从容就义。

……我们愈来愈深信是把我们押去枪毙。我们认为下面的事实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没有让我们坐通常的囚车而不知为什么让我们坐邮车，而最主要的是把我们同妇女放在一起，不论是在囚室里，还是在车厢里，被捕的男人和妇女通常是不会关在一起的。何况我们这半节车厢既没有马桶，又没有厕所。

我们都因为备受羞辱而无比愤怒。大阿米罗夫肚子痛却不能上厕所，还有妇女也是如此，她们都长时间地经受折磨和痛苦，不得不在她们躺着的地方大小便。车厢里地板潮湿，气味难闻。我们很理解我们这些不幸的妇女现在的处境多么痛苦，而同时又觉得自己对此束手无策，心中感到一阵剧痛。

时间过得多么慢，多么的漫长而又难熬啊……

每个人都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我仍旧躺在列瓦和苏连中间，身上一半搭着苏连的大衣，一半搭着列瓦的长袍。我们相互挨得很紧。渐渐地身上暖和起来，也不再打哆嗦了。但是我们谁都睡不着。各种思想不断在脑海里一一闪过：“在自己有生之年里究竟都做了些什么？为革命做了些什么？刚刚开始做一点有益的事，刚刚开始聚集了些力量、经验，有了某种程度的自信心，并且在革命工作中经受了锻炼，开始得到了同志们一定的信任。可是突然之间生命却要这么荒唐地结束了！为革命再工作哪怕是两三年该有多好啊！那时，假如需要的话，就死去，但那也要在公开的战斗中，在完成了某种有益的贡献之后！”我很为邵武勉的儿子们惋惜。他们很早就参加了革命，表现得又都这样坚强。象他们那样有才干而又忠心耿耿的人却突然就要死去，我觉得这是荒谬的，是不公正的。

我还想到现在巴库发生的情况。留在那里的同志们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们之中有谁还活着？有谁脱险了？有谁牺牲了？党组织是否仍存在，还是遭到了破坏？

这些疑问使我焦急不安，但是要對这些问题做出确切的答案，是不可能的。推测不能代替答案。

我还想到我的家庭。特别使我焦虑的是，母亲或许以为我已经牺牲了，因为她已有很久没有得到我的任何消息了。她大概知道，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已经遭到枪杀，但她却无从知道我还活着。我非常可怜她。我还想起父

亲，虽然当时他已经去世；想起兄弟姐妹们，当然我也想起了堂妹阿什亨……早在1913年，即二月革命前四年，我就已经意识到，我对她的感情超过了对一个妹妹的感情。但是按照亚美尼亚的古老的风俗习惯，堂兄是不能娶堂妹为妻的。民间风俗要求出“七代”，而我们还差一代。当然，我早就是个无神论者，但民间的风俗习惯仍然是顽强的。我知道，父母和亲戚将会反对我们的婚事，并且为此还会责备我。

我越来越爱阿什亨，对她的感情我简直无法隐藏了。我打算过两三年一定向她表示自己的爱情。虽然有几次我试图这样做，但我总有点胆怯，没有这样做。她对我很好，就象妹妹对待哥哥那样。“万一她拒绝了我的求爱呢？”男子汉的自豪感没有能使我拿自己的自尊心去冒这样的风险。四年来我没有勇气向她表示自己的爱情，相反，对她总是一本正经，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1917年夏天我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于是向阿什亨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她说，她也早就爱上了我，可是她见我总是那副冷冰冰的无情的样子有些吃惊。她以为这显然是由于我不喜欢她。

这一切都发生在1917年7月事件之后。当时我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无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估计到这些困难情况，我对阿什亨说，结婚的事我们应当等等再说。因为在当前的革命斗争中我有可能牺牲，而她就会成为寡妇，甚至还可能带着个孩子。我说：“等

革命胜利后，一切都稳定了，那时咱们再结婚。”阿什亨同意了。她对于我说的这些话是很理解的，因为那次谈话前三个月她已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我们约定不对任何人讲我们的决定。当时，她在梯弗里斯亚美尼亚女子中学毕业班学习。过了一年，她毕业后就到苏胡马地区的一个村子里教书。我非常愉快地得知，这段时间内她一直秘密地做党的工作。有一次，她为了执行边区党委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去资产阶级统治的亚美尼亚，把边区党委会的指示转达给埃里温市布尔什维克党委会并给边区党委会带回有关亚美尼亚形势的情报。

……当火车载着我们前进的时候，我感到，这大概是最后一次旅行了，这时我想起了阿什亨。她是否知道巴库委员牺牲的消息？当然，关于我此刻在什么地方以及我是否还活着，这一点她是不知道的。她大概以为我已经牺牲了，正在为我而悲痛。我很难过，但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我没有和阿什亨结婚是作得对的。既然她还不是我的妻子，那末对于我的死毕竟痛苦要轻些……

火车走了许多小时终于在一个我们不知名的车站停了下来。透过车厢的缝隙，外面的谈话声我们可以听得很清楚。突然听到一声命令：“摘钩！”话音刚落又听见：“摘下了。”一切都很清楚。

但是，全然没有想到，过了几分钟我们的车厢又移动了。车厢的角落里有人轻松地叹了一口气。在一片沉默中奥尔加·费奥列托娃说了一句：“呶，咱们还活着！”我

们明白了，夜里，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时候，我们的列车又挂上了一节车厢，刚才在车站就是把这节车厢甩下去了。现在该轮到甩我们这节车厢了。又过了几站，天已经大亮。我们脑海里第一次闪过这样的想法：“或许不是把我们带去枪毙，而确实是送到另一个城市？……”

时间过得真慢。惨无人道地对待我们（尤其是对待妇女）加上自己束手无策，对于改变我们的处境毫无办法，这一切依旧使我们非常难过。火车终于在基孜耳—阿尔瓦特车站停了下来。

我们现在已经毫不怀疑，他们是要把我们从车站经过市内大街送到看守所去。天还没有黑。可是没有想到却押着我们绕开城里的大街走着。我们很快走进了一条大沟——一条干涸了的河床。他们押着我们顺着这条沟朝城外走去。这时我脑子里又闪过一个念头：是不是把我们带去枪毙？这个念头大家都已习以为常，所以谁也不再去向卫兵，究竟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过了河床，我们来到了这座城市的另一边，来到了看守所的墙下。看守所的院墙是麦秸泥砌的。大门打开了，我们眼前是一座用石头砌的平房，比克拉斯诺沃斯科的看守所稍微小一些。男人和妇女被分别关进囚室。我们问卫兵，离开车站时，为什么不走大路而让我们绕大沟走这样奇怪的路线呢？他们回答说：这样做为的是不让当地居民看见我们这些被捕的人。

幸好，囚室里还有一个炉子，并且这个炉子可以在囚

室里边生火，而不是在走廊里生。这样夜里我们总算不致于再挨冻了，而且可以随便往炉子里添木柴，炉子旁边就放着很多木柴。

我们常常坐在敞开的炉旁，以一种喜爱的眼光看着火苗，对于炉火的温暖感到非常喜悦，甚至有一种舒适的感觉。这所监狱对于我们，特别是对于我，还有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这就是吃饭时，每人发一份可口的嫩葱头。葱头在当地市场上是很便宜的。我们把葱头放在炉灰上烤，大量地吃。我吃得特别多。这对治疗我的牙床出血很有好处。因为没有糖，喝茶时发给又香又甜的葡萄干，这也不坏。反正我的身体从此有了好转。

当局把年老病重的阿米罗夫送进了医院。这无论是他还是我们都因此而感到心情轻松得多了。

我们已经几个月没有洗澡和换洗衬衣了，身上都生了虱子。经过我们再三要求，最后达到了目的：有一天由卫兵把我们（先是男同志）带到车站铁路工人的浴室洗了个澡。浴室很干净，有热水室和蒸浴室。总之，这是地道的俄罗斯式浴室。说起来，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这样的浴室洗澡。洗澡总是令人高兴的。我们洗的是蒸浴，可是我们没有……肥皂。没有肥皂这算洗的什么澡！？洗衬衣也没有肥皂。把衬衣在澡堂凉干后一看，差不多跟没洗一样脏。尽管如此，洗过澡我们精神振作得多了。大家都感到不坏。就在同一天的晚些时候，把妇女也领到这个澡堂洗了澡。

当我们走出监狱去洗澡的时候，又遇到了一件令人高兴的意外的事。在离监狱大门不远的地方，我们突然看见了阿尔塔克。为了不暴露自己，他当然装作不认识我们的样子。但是我们看得出，他对于能见到我们是很高兴的。显然，他为了等待这样一次见面的机会已经在看守所附近徘徊不止一天了。当然，我们对这次见面也很高兴，并且对阿尔塔克的态度深为感动。我们甚至还不知道，他是否已逃脱了克拉斯诺沃斯克警察局的魔爪，可是现在他居然在这里，在基孜耳—阿尔瓦特，并且正在想方设法帮助我们。

我想不按照叙述的顺序，先谈谈阿尔塔克在克拉斯诺沃斯克是怎样躲开敌人拘捕的。这是后来，当我们转移到阿什哈巴德，在州的医院犯人诊疗所见到阿尔塔克的时候，他详细地告诉我的。关于这一点他在1926年写的回忆录中曾提到过。我觉得在这里加以引述，即使是部分地引述，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前面我已经根据阿比洛夫的话提到，当他、马鲁夏·克拉马连科和阿尔塔克从阿斯特拉罕动身来里海以东地区的时候，他们三个人说好要装作互不相识。

阿尔塔克回忆说：

“因为在阿斯特拉罕得到消息说，在克拉斯诺沃斯克搜查得非常严，几乎是扒光衣服进行搜查，所以我们决定把钱交给船上的一个人带着。我们和一个叫阿多里弗·罗加奇克的船长助理约好，他将把这个钱包交给一个来找他的人，暗号是‘红灯’。

10月20日我们离开了阿斯特拉罕。看来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夜里跟我们同船的我党党员列昂·阿鲁斯图莫夫走到我跟前，瞅着一个在阿斯特拉罕曾到邵武勉家去过的亚美尼亚人，给我使了使眼色说：‘你要小心他。’

后来查明，这个亚美尼亚人是英国间谍，不知道他怎么探听到我们的计划。在船上他喝了一小杯白酒后，就情不自禁地对阿鲁斯图莫夫说了真话：‘我知道这个人（把头向着我一扬）是干什么去的。我要让他掉脑袋……’接着他向阿鲁斯图莫夫简单地讲了讲我的任务。要改变计划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决定等着瞧。对阿比洛夫和马鲁夏我仍装作不认识。

在克拉斯诺沃斯克我们首先碰到的是载着英国反间谍机关特务的汽艇。那个亚美尼亚人下船上了汽艇，那些特务见了他就象见了老朋友一样。很清楚，我们失败了。所有的旅客都受到搜查。把我们的人群中带了出来，搜查得特别仔细，连衣服里子都撕开来搜查。结果什么也没有搜到。收去了我们的证件，这才放我们走，并叫我们第二天一定到英军司令部报到。

为什么不立即逮捕我们呢？显然，他们是想知道我们秘密接头的地点……我的接头地点是谢尔盖·马尔季科扬的家。

我们仍装着互不相识。我住在港口的旅馆，马鲁夏和阿比洛夫住在车站附近。

我决定必须从船长助理罗加奇克那儿取回钱包。我见到了他，问他要那个钱包。我看出这个小伙子神情有点慌张。他说，他怕出事，过半个小时再把钱包交给我。我没有办法，只好再等半个小时。过了快一个小时他才来。他还是那样非常惊慌失措，并且更加不安地说，他不敢现在给我那个钱包，要等到明天中午十二点在码头旁边的广场上给我。

为什么他要等到明天才给我呢，——引起了我的疑心，可也没办法。我决定去找谢尔盖·马尔基克扬打听被捕的我们同志们的下落。我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我决定迷惑一下特务。我先在城里逛了一会儿，然后走进一家旅馆，又从另一个门绕了出去，上了另一条街。在街上又转了一会，我才来到约定的地点。谢尔盖见了我非常焦急地说：‘邵武勉和阿廖沙不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可能被送到印度去了，也可能已被杀害了……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你得赶快离开这里……不要去取钱啦……这可能是个圈套……’

谢尔盖那惊慌失措的样子影响了我，我的情绪也有点沮丧。离开了谢尔盖，我就开始考虑怎样才能逃出克拉斯诺沃斯克。在一条街上，那个跟反间谍机关的特务一起下船的亚美尼亚人走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说，他知道我到这里来的任务是什么，他为我保密，要我给他钱，并威胁说，否则就要把我供出去。

我打定主意拖延时间，便答应他第二天晚上在亚美尼亚教堂附近给他钱。我们就这样分手了，我回到旅馆的房间。

早晨见到马鲁夏，我对她讲了昨天发生的事，于是我们开始考虑，怎样才能离开克拉斯诺沃斯克。我们说好马鲁夏在码头上等我，我去找船。我们还算走运。我碰见了一个熟人，他是个水手，布尔什维克。通过交谈，我了解到他在‘非洲号’轮船上工作。

他答应让我们在船上躲躲。

十二点——这是约好取钱包的时间——已经快到了。我对水手说，我得去取这个钱包，并问他，我取回钱包之后，他还收留不收留我，他胆怯地拒绝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去取钱包。

我想：‘如果真是圈套，那末我就用一部分钱进行贿赂。’一

万尼古拉卢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我不愿意就这样扔掉它。因为没有钱就难于想办法帮助被捕的同志。

我别了水手来到广场。这时大约是十二点半了。广场上空无一人，连马鲁夏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朝市场走去，突然看见马鲁夏被卫兵押解着。

后来我才知道，在等我的时候，马鲁夏不愿让我冒此风险，就决定自己去取钱包。

在约定的地点她看见了阿多里弗·罗加奇克正在那里来回踱跬，她走上前去说出了暗号。他刚把钱包给了马鲁夏，几个武装人员就突然抓住了她。她急忙把钱包扔到附近的窗台上，但这也未能保住钱包。特务从她身上没搜到钱包，又返回逮捕她的地方把钱包找到了。

阿多里弗·罗加奇克大概看出我们已经暴露了，非常害怕。他以为那个钱包里有重要文件，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就把我们出卖了。

这个事件使我非常沮丧，我在大街上徘徊。侦探象影子似地紧紧跟着我。

我也不能去寻找阿比洛夫了，因为晚些时候我已得悉他被捕了。

我用巧妙的办法摆脱了侦探，来到码头，躲在木材堆下，在那里我一直躺到傍晚。晚上我决定无论如何也得离开这里。

我把大衣放在旅馆了，我舍不得丢下，便决定回去取大衣。我走近旅馆一看，门口站着武装人员。

我兜了一个大圈子，绕到旅馆的旁门，那里也有武装人员，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那个亚美尼亚特务。这时我明白了，他们正在追捕我。

我向车站走去，见有很多人手里提着箱子从车站那边走来。我猜想车站上出事了，便向人打听出了什么事。

人们说：车站来了什么布尔什维克的密探，所以没有英军司令部发的通行证不让进站上车。我沿着轨道走，偷偷地钻进了货车，通过车厢缝隙观察车站上发生的情况。

那个当英国反间谍机关特务的亚美尼亚人带着巡警，在站台上来回奔跑，仔细地察看着乘客。检查得非常严。

第一遍铃响过了。我爬出保温车，向列车走去。我决定跟司机商量商量。我走到司机面前，请求他让我上机车。我撒了一个谎，说我急着去阿什哈巴德看望生病的母亲，没有来得及带通行证。司机断然拒绝了。

于是我决定到乘务员那里去碰碰运气。我去到一个乘务员面前，把编好的关于母亲生病的话又说了一遍，并答应给他三十卢布。

当时正在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进行检查，乘务员有些害怕，他也拒绝了。

响过第二遍铃。检查人员进入了车厢。我又请求另一个乘务员，这一次我答应给他三百卢布。这显然使他吃惊，他也拒绝了。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英国士兵从站台向列车走来，这个乘务员急忙钻进车厢。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我爬进车厢。在车厢里我一眼就看见了上车顶的小梯子。我迅速地顺着梯子爬了上去，躺在车顶凸板的背阴的一面。

一队英国士兵把列车团团围住。时间过得真慢。

第三遍铃响了，可是列车还是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显然正在搜查。又过了半小时，列车终于开动了。

列车开得很快，寒风刺骨。

到第二站又进行搜查。车越往前开我越难受，手都冻僵了，我勉强支撑着。我觉得再过一会儿，冻僵的手就要不听使唤了，我非摔下去不可。

好容易挺到了第四站，我从车顶上爬下来，趁着天黑溜进车厢里。车厢里挤满了难民。我冻得直哆嗦。有个亚美尼亚难民注意地看着我。于是我告诉他：我在发疟疾，把车票弄丢了，请他代我买一张到阿什哈巴德的票。买到了票，我才松了口气。

火车快到基孜耳—阿尔瓦特了，这时我想起我过去的学生纳瓦萨尔基扬住在这儿，在梯弗里斯他投考神学院时，我给他补习过功课。他就住在我们家里。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在基孜耳—阿尔瓦特下车，住在纳瓦萨尔基扬家里。他父亲在当地开一个面包房。

我绕过机车车库，走上了大街。已经是早晨了。我看见在不大的一所房子前有人排队。那就是我要找的面包房了，因为在1918年排队主要是为了买面包。我走上前去问，谁是纳瓦萨尔基扬。

‘我就是。’一个身材不高但非常结实的人笑着回答。

‘您的儿子在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我就说，我是他儿子从前的教师。

纳瓦萨尔基扬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最后我坦率地向他讲明了来意，请求在他家躲一躲。

纳瓦萨尔基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在大街上见到阿尔塔克的第二天，在看守所里又有一件没想到的好消息：阿尔塔克竟设法托当地居民给我们和被捕的妇女送来美味可口的亚美尼亚饭菜。后来又

送过几次。饭菜里经常夹有阿尔塔克(当然是不署名的)用暗语写来的小纸条。他通过纸条把我们关心的消息告诉我们,同时他也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我们也用纸条答复他。纸条是非常巧妙的利用送空碗碟的机会转给他的。我们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这样做,还因为看守所里有一个看守是个老职员,一般来说他是个不坏的人。这个人好说话,待人温和,他或者是没有发现,或者是虽然发现了,但也装着没看见。

阿尔塔克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他在基孜耳—阿尔瓦特的生活是很困难的,挣的几个钱不仅要自己糊口,而且还要帮助我们。那时他在一个同志的父亲那儿做工,要到市场上去买葡萄和其他水果。他说,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同时对他来说又是不相称的差使,是很不好干的。

除了阿米罗夫(我已经说过被送进了医院)之外,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和基孜耳—阿尔瓦特我们谁都没有得过什么病。

列瓦·邵武勉的腿突然疼起来。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一年前,他参加赤卫队后,他的一个同学(也是赤卫队员)不小心用左轮手枪误伤了他的腿。医生治好了他的腿,以为没事了。可是在监狱里伤口复发,腿肿起来了。我们要求请医生来看看守所给他看看。但派来的不是医生,而是一个医助。他在囚室为列瓦检查了一遍,就让我在肿起来的膝盖上做按摩。他说:“这样可以消肿,消肿了就不痛了。”我不懂医学,在医学方面,我既没有经

验,又缺乏知识,然而我还是认真地用力地给列瓦的腿按摩。列瓦疼得直哼哼。我对他说:“没关系,忍住点!只要对恢复健康有好处,就忍住点!”他尽管叫疼,但还能忍得住。后来疼得更厉害了,他再也受不住了,我这才停止按摩。疼痛越来越厉害。第二天早晨我们吵闹起来,要求派个真正的医生。医生终于来了,给列瓦作了检查。我们向他讲了按摩的情况。医生看了我们一眼,责备我们说:“你们怎么搞的?你看,他的膝盖已经化脓了,你们已把脓扩散到了全腿。很可能整条腿都感染了,这样只好把腿锯掉,还可能有生命危险。病人得马上送医院。”

铁路医院派来卫生员立即把列瓦接走了。

我们都为列瓦的病而担忧。由于听了不学无术的医助的话,使列瓦的身体受到那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首先是我很难受。但是,不久我们从阿尔塔克那里知道,列瓦患的虽说是血中毒和坏疽病,不过他的病情正在好转,我们这才稍稍放了心。但基孜尔—阿尔瓦特的医生们仍然认为,必须给他做大手术,而这种手术只有在阿什哈巴德才能做。

过了一段时间,列瓦被送到州医院的犯人诊疗所。

在阿什哈巴德

又上路了;1918年;1919年里海以东地区的形势;苏连·邵武勉;在监狱的医院里;英国占领者的

暴行；我企图逃跑；重返巴库。

我们在基孜耳—阿尔瓦特住了将近三个星期。突然，一天清晨通知我们说，要把我们送到阿什哈巴德监狱。

以前，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克拉斯诺沃斯克看守所送到基孜耳—阿尔瓦特看守所，现在突然又要送到阿什哈巴德去！原来的想法和怀疑又重新出现了。我们想，这是不是借口，是不是他们用以对待巴库委员时的那个幌子。再次产生了这种想法，即：他们不是把我们拉去枪毙，就是把我们送到印度去。

与这次从基孜耳—阿尔瓦特转移有关，我又回想起一件事。我前边已经谈到的，阿尔麦纳克·阿米罗夫是个台球的酷爱者，也是个嗜酒成癖的人。有一次他对我说：“你有四十个卢布，咱们买伏特加酒喝吧。这样高兴高兴，在刑场上将会是精神抖擞的。”我没有同意并且对他说，我根本不喝伏特加，不喝酒去刑场照样能镇静自若。他反复地说服我，我坚决不同意，我说这些钱是我留着以备万一的。于是阿米罗夫就责备我，说我是守财奴、吝啬鬼等等。起初我感到委屈，后来生气了，终于没有顶住，掏出这倒霉的四十个卢布，扔到他面前，说：“真是活见鬼！给你拿去买那可恨的酒吧！”他把钱交给看守，看守买回两瓶白酒。阿米罗夫给看守留下一瓶作为酬谢，自己拿了一瓶。他倒满一杯酒，一口气就喝干了，他还让我也喝一杯酒。我坚决拒绝了。

应该说，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喝过伏特加、白酒、白兰地。甚至葡萄酒我也只不过喝过两次，每次两三小杯。第一次是我满二十岁的时候，还有一次是过了一年以后。

人们可能会感到奇怪，一个高加索人，二十岁了，竟然没有尝过酒，这怎么可能呢！然而这确实是事实。

我一再拒绝阿米罗夫的建议。但他硬是不肯罢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你喝吧！不过必须一饮而尽！”最后我终于屈服了，一口气空着肚子喝了差不多满满一杯白酒。我感到五脏六腑都发烧，但头脑还是清醒的。

我记得很清楚，把我们从监狱带到街上，沿着基孜耳—阿尔瓦特市内的街道带到火车站，上了货车车厢。在车厢一头的统铺上是男的，在另一头是妇女，武装警卫站在或坐在中间。

在车厢里我逐渐地感到非常兴奋。我醉了，控制不住自己，大骂卫兵，骂他们是刽子手、恶棍……后来同志们告诉我，我甚至还向卫兵扑去，同志们把我拦住了。后来的情况我就不记得了。同志们让我睡下，我一直睡到列车到达阿什哈巴德。当叫醒我时，我已不记得我干了些什么。我在前面讲的这些情况都是同志们后来告诉我的。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醉得不能控制自己。当卫兵把我们押上阿什哈巴德的街道时，我已经清醒了。

正如原来所说，我们被带到了阿什哈巴德州监狱。

监狱是座很大的平房，能容纳一百人，也许还可能多些。房子是□形的。我们从房子中间唯一的入口进去后被带到右边。我们住的那间囚室离监狱的厕所不远。令人噁心的恶臭不断由走廊传到我们囚室。我对于气味特别敏感，所以一来就感到难受，熏得我直噁心，随后就吐了……

这里的囚室各方面都比我们在基孜耳—阿尔瓦特和克拉斯诺沃斯克住过的囚室要差。非常窄小，潮湿，又黑。天花板上有一个很小的窗口，勉强透过一点亮光。正是寒冷的季节，囚室里却没有火，于是我们常常想起我们的“救星”——基孜耳—阿尔瓦特看守所的火炉。囚室里只能放三张铁床，而我们是四个人。我和苏连只好睡在一张床上。床很窄，当苏连平躺着的时候，我就得侧着身子；或者我平躺着的时候，苏连就得侧着身子。我们总算适应了这种情况，即使在夜里，当我们都在熟睡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谁要换一下姿势，另一个人就自动地翻过身来。我和苏连合盖他的那件军大衣。床是能折叠的，白天可以叠起来放在墙边，甚至还可以锁上。也算走运，当我们在这个监狱时没有这样做。甚至还有褥子，因此白天我们也可以在上边坐坐或者躺躺。没有枕头。两张床之间有一张小木桌。

阿什哈巴德州监狱比起以前我们蹲过的看守所来有一个优越之处，就是在这里每天定时让我们和刑事犯一起放风一次，每次一个小时。应该说，刑事犯对于我们这

些政治犯是很尊敬的：他们明白，我们不是为了私利，而是为了政治理想，用他们的话说，是“为了人民”而坐牢的。

阿什哈巴德监狱的看守都是俄罗斯人。但在几乎象要塞那样的高高的监狱岗楼上站岗的却都是英国雇佣的印度兵。当我们放风时，他们手持步枪、机关枪，站在岗楼上监视我们。这些士兵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似乎随时都会受到我们的袭击而准备开火。显然，向这些士兵灌输了许多对于布尔什维克的诽谤。我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印度雇佣兵。这些印度雇佣兵都是超龄的——年青人几乎没有。看起来，一个个肥头大耳。所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可能是因为他们留着浓黑的大络腮胡子，头上包着白头巾。

在放风的一小时内，我们三三两两地在院子里来回走着，谁也不去理睬那些对准我们的枪口。监狱里一切按部就班，制度严格。晚上八点看守锁上囚室，把钥匙交给监狱长。早晨七点以前任何人也不得打开囚室。在囚室的角落里放着一个老式的马桶。可以说，人们从来也不去使用这个马桶。我们都是些年青力壮的人，能够控制自己。早晨七点钟囚室的门打开了，放我们去厕所。其它囚室的人也同时放出去上厕所。厕所前总是排队。厕所很少打扫，真是臭气熏天。

* * *

1918—1919年冬天，在里海以东地区的监狱里，我

们热烈地讨论了传进来的一切关于狱外形势的片断不全的消息。在克拉斯诺沃斯克我们就已知道了土耳其，随后又有奥、匈和德国向协约国投降的消息；后来又知道了世界大战已于1918年11月结束。列宁代表苏维埃政府宣布取消布列斯特和约的消息使我们欢欣鼓舞：这是列宁的天才、他的善于预见事件进程的有力见证。当时列宁主张签订这个被迫接受的条约（同时也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条约）存在了不到一年。它是在1918年3月签订的，那时我们力量很小。布列斯特条约给了我们一个短暂的喘息的时间，以便集聚力量，建立红军。但德国战败了，世界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通过这一条约，列宁极好地教导我们要善于为了社会主义利益而利用敌人营垒的矛盾。

在得知有关布列斯特条约的消息以后进行讨论时，我们回忆起一年以前这个问题在布尔什维克中引起过多么激烈的争论，而那些当时反对签订这个条约的人在政治上又是多么糊涂。

土耳其人撤出巴库和英国占领军第二次进入巴库后的形势很使我们不安。但是直到1919年1月（当时我们已在阿什哈巴德），我们才从巴库来的托普里泽同志那里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详细可靠的消息。

苏维埃俄罗斯战场上的形势也是我们热烈讨论的题目。进犯察里津的克拉斯诺夫将军的部队被阻在察里津城下，随即被击退并被歼灭的消息使我们非常高兴。由

于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暴动和萨马拉成立反革命政府而引起的伏尔加和乌拉尔的一些事件，又使我们很难过。特别使我们痛心的是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反革命暴动，高尔察克匪徒占领许多城市和奥伦堡哥萨克的暴动。

* * *

社会革命党的政府在里海以东地区掌权以后，人民生活不但没象政府头目所许诺的那样得到改善，反而越来越坏。英国占领者并未慷慨解囊，给自己的“同盟者”以物质帮助。相反，他们把克拉斯诺沃斯克所有仓库中存放的棉花、皮革、皮毛和其他原料统统一扫而光，这些原料本来是准备运到苏维埃俄罗斯的。现在英国人把这一切都运到波斯的埃恩泽里港口。

马列松将军写道：“…… 1918年8月我签订了正式条约，代表我的政府保证尽可能以军队和武器帮助里海以东地区政府，直至它自卫到最后一刻为止。”马列松将军首先派了机枪部队。他写道：“部队开到梅尔夫，并使敌人遭受很大伤亡。但敌人拥有优势兵力，继续向阿什哈巴德推进。”

英国人派出了由印度雇佣兵组成的部队，其中包括印度步兵的“神勇团”——第十九旁遮普团与土尔克斯坦红军作战，但未能改变战场上的形势。印度人不愿意打仗：在印度国内已发生反英斗争了。

里海以东地区的形势很快地变得不利于反革命政府。社会革命党人最初还能够打着“立宪会议”的旗号和

“民主”的虚伪口号把相当一部分工人和职员拉拢到自己一边来，但它很快就自我暴露了。以丰季科夫和谢迪赫为首的右派社会革命党匪徒一上台，立即不经审判和审讯，就逮捕和枪杀了一些苏维埃人民委员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中的积极活动家。千百名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被逮捕，并在英国人的帮助下把其中大部分送到当时在反革命政权统治下的埃恩泽里和彼得罗夫斯克。

由于英国人担心苏维埃军队会从海上进攻，按马列松的话，社会革命党政府头目答应从克拉斯诺沃斯克运走所有火车头和机车车辆，并创造“条件”以便能在克拉斯诺沃斯克港口布雷，破坏铁路沿线的水塔和加油站，破坏桥梁，并在必要时拆掉个别地段铁轨。英国工程师立刻视察了铁路全线，以便制定防止敌人进攻时利用铁路的计划。

里海以东地区的财政经济处于混乱状态。士兵和职工的薪金经常停发。居民，尤其是土库曼农民，千方百计地躲避交税。人民中的不满情绪日益强烈。政府再次动员上前线的命令使人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脱离群众的社会革命党头目们自以为他们还有某些影响，决定在阿什哈巴德机车修理厂召开大会，指望在动员问题上得到支持。1919年1月初召开了大会（会上铁路工人中的地下共产党员都积极发言）。大部分参加会的人表示反对再次动员，拒绝支持政府。英国占领者一见事情不妙，

不等大会开完，就把军队开进修理厂，冲散了大会。如果说英国占领者以前是在幕后支持里海以东地区政府的活动的话，那么世界大战胜利以后，他们更加蛮横无礼，出来公开摆布里海以东地区人民的命运了。

我们转到阿什哈巴德监狱后不久，从与其他犯人的谈话以及地方报纸中（我们还是能够搞到这些报纸的）得知，阿什哈巴德发生了政变。

由十二个右派社会革命党和立宪会议分子组成的州政府被推翻了。丰季科夫、谢迪赫和这个政府的其他几个成员被关进了监狱。这一切都是英国远征军司令部干的。甚至丰季科夫政府现在也不合英国人的口味了；并非这个政府的所有委员都同意把里海以东地区和中亚从俄国分离出去，并成立某个在英国直接保护下的独立国家。这个企图是英、美、法、日瓜分俄罗斯总计划的一部分。

继丰季科夫政府之后又成立了一个所谓执政内阁。主持执政内阁（又叫“社会挽救委员会”）的，最先是克鲁坚将军，过了几天是直接杀害巴库委员的刽子手谢缅·德鲁日金。这是个老牌英国走狗。执政内阁由六个人组成，其中有两个土库曼反动地主。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撤销了土库曼头目推荐的一个人的候选资格，换上了奥拉兹—谢尔达尔。这个人指挥过土库曼军队和其他军队，反对土尔克斯坦布尔什维克。这个谢尔达尔看来是被英国人收买了。

以丰季科夫和谢迪赫为首的旧社会革命党政府的大

部分被捕的人没有关进我们这个监狱，而关在阿什哈巴德看守所。

在克拉斯诺沃斯克逮捕我们的那个阿拉尼亚这时又升官了：他作为英国人的代理人被任命为阿什哈巴德市警察局局长。对原里海以东地区政府领导人（丰季科夫等人）的逮捕正是委派他于1919年1月15日执行的。后来才知道，关在阿什哈巴德看守所的里海以东地区政府委员不算由地方执政内阁逮捕，而是由英军司令部逮捕的。

过了一些时候，里海以东地区军队的上校参谋长也被关入监狱。他被关进我们隔壁的囚室。这是一个最小、最黑、最潮的囚室。

有一次，执政内阁的头子德鲁日金在卫兵和几个我们不认识的人陪同下来到我们囚室。我们问他为什么还把我们关在监狱里，我们有什么罪名。苏连·邵武勉直截了当地问他：“什么时候释放我们？”德鲁日金回答说：“我们关押你们是作人质的。如塔什干布尔什维克枪毙他们逮捕的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话，那么我们就枪毙你们。”

* * *

在囚室里我们相处得非常友好。食品很缺乏：我们已经不能得到原来在看守所里所能得到的转交食品了。早饭和晚饭是一种米粥，中午是用牲口的蹄和头熬成的汤。我们叫它“蹄角汤”。有时在汤里的骨头上，我们能看到几条粗筋，但却从没有见到过肉。由此也可知，这是什么汤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送饭的那些伊朗刑事犯用脏

手从汤里捞出骨头，撕下骨头上那点肉，然后再把汤送到囚室。这是其他刑事犯告诉我们的。送给我们四个人吃的粥和汤放在一个大铁桶里。不给我们碗。早上、中午和晚上还给我们送来一壶开水和一些葡萄干。一天给我们送三次面包，但是很少：我们总是不够吃。

一次在我们囚室里发生了一件完全料想不到的荒唐事。我和苏连默默地坐在自己床上，而阿尔麦纳克和萨姆松·坎杰拉基在争论什么。开始争论是平静的，后来嗓门越来越高。阿尔麦纳克特别急躁，于是打起架来。我起来拉架，但结果我挨的拳头比打架的人还要多。我和苏连到底还是把他们拉开了。监狱的看守听到了吵闹声，叫来了监狱长。监狱长来到我们囚室问：“先生们，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我回答说，“不过是场热烈的争论，没有别的，你就不用管了。”但是监狱看守终于证实了除吵闹之外，我们还打架了。于是监狱长又走到我们这里坚决要求说：“是谁动手打架的？我们要把他送到别的囚室去。”我不知道实际上谁先动手的。但是我知道萨姆松是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而阿尔麦纳克专爱寻事吵闹，完全有可能是他先动手的。因此，我看到没有其他办法，反正得和他们俩人中的一个分手，就说，应该把阿尔麦纳克转到别的囚室去。阿尔麦纳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囚室，没有和我们告别，看来挺委屈。当事情平息下来以后，萨姆松对大家说，这次打架是因为微不足道的争吵，是由于阿尔麦

纳克的急躁而引起的。

我从前也听别的饱经世故的犯人讲过，人们如长期呆在一个囚室里，会经常争论、吵架，甚至好朋友也会因之搞坏关系。在我们整个坐牢期间内，只发生过一次上面说的事件。

我，萨姆松·坎杰拉基，列瓦·邵武勉和苏连·邵武勉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从来没有对别人提高过嗓门。

萨姆松·坎杰拉基是一个可爱的人。年纪比我们大，党龄比我长。他矮壮、结实，但并不肥胖，性格平静，没有一般高加索人的躁脾气。可是如果把他惹急了，他也能够表现出“高加索的性格”，这次和阿尔麦纳克发生的事，就是如此。他给我们讲了许多他生活中的趣事。我们象听一个比我们有经验的老同志那样以极大的好奇心听他讲。他不大爱说话，懂得幽默，自己也常常来点幽默。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出于好意开他的玩笑时，他也不见怪。而我们也从不欺负他。

一天晚上，我们各自坐在自己床上在想着什么。我想起了自己的未婚妻。我想：她在哪儿？现在在做什么？她听到我们牺牲的消息该有多么难受。

我不由自主地陷入沉思，然后看了一眼萨姆松，我现在不记得为什么，我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想开开玩笑的调皮的念头。我说：“萨姆松，当然罗！我可知道，你现在多么难受。你的妻子留在巴库，而你在这里坐牢。她没

有得到关于你的任何消息,已经快五个月了。毫无疑问,她以为你象我们其他同志一样牺牲了。在这种情况下,她不见得再等你了。”萨姆松明白我是开玩笑,他看了我一眼,温和地微微一笑并安详地说:“你说这些都是白费,阿纳斯塔斯。这与我和我的妻子毫不相干。我们和睦相处,已经十四年了。她爱我,我们有两个孩子,她会忠于我并且将继续等我回去。”我接着开玩笑说:“呸!你愿意自我安慰你就自我安慰吧!我的处境可比你好多了。我是个单身汉,完全是自由的”。

那时我怎么能想到,很快我就为自己开的这个玩笑而后悔了。发生了这样的事。

很快我们被释放,并回到巴库。我从事党的工作。过了一两天,总也看不见萨姆松。他不露面,他可从来不是这样的。我想,他显然是出了什么事,并请同志们去找他。第一天没有找到。只是在第三天,才在一个格鲁吉亚的饭店里找到了他,他已喝得酩酊大醉。他来到我的秘密住所,形状很可怕。胡子老长,没有睡醒的样子,两眼红肿,愁眉苦脸。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非常严厉地对他说:“萨姆松,我真不明白!你是怎么搞的?竟然弄成这个样子!我一直对你印象很好。可你原来是个酒鬼,不是革命者。”萨姆松却和我顶起来了:“别拿这种蠢话来说我!”“那末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你讲讲发生了什么事?”萨姆松回答说:“是这么回事。我回到家里,走上凉台。从窗户里看见我的妻子和一个我不认识

的男人坐在一起。我走进房间，我的妻子张惶失措地跳了起来。看她非常难为情和张惶失措，我便问她，这里发生了什么事？这个男人是谁？妻子哭着说，她以为我牺牲了。她说：‘我们有两个孩子，我一个人怎么能养活他们？碰见了这样一个好心人，他帮我供养他们。哪怕我能有一分钟想象你还活着，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跟任何人。大家都说，你被枪杀了。’”萨姆松继续说：“我没说一句话，甚至都没有和孩子们打招呼，就嘭的一声关上门，离开了家喝酒去了，好忘掉自己的痛苦。我这个样子已经三天了，白天黑夜都呆在我认识的格鲁吉亚人开的饭店里。我现在不能回家了，虽然非常爱自己的孩子。我的家庭生活已被毁掉了。”

我马上想起在监狱里和他的谈话，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明白，我对同志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粗心和残酷的事。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原谅自己这种轻率的行为。

我开始安慰萨姆松，但是我知道这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我对他说：“萨姆松，你知道，既然事已至此，唯一的办法是：你应该全神贯注地投身到工作中来，把其他一切都忘掉。要不你就去喝酒，堕落成一个酒鬼，最终离开党完事。”对此萨姆松说，他不能在巴库工作：这里孩子们和背叛了他的妻子就在身旁。那时我想，无论如何要帮助萨姆松，就说：“我了解你，你到连科兰去吧！”当时的情况是，连科兰的共产党员依靠阿塞拜疆和俄罗斯农民的支持，正在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为了巩固这个政权，他们非

常需要得力的领导干部。我把这一切都给萨姆松解释了。我对他说：“你到那里去吧！那儿的工作够你忙的。你是一个勇敢的人，那儿正需要勇敢。”萨姆松看了我一眼，面部表情顿时起了变化。他回答说：“好，我同意。”我说：“这就太好了，明天我们送你上船，今天就睡在我这里，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出发……”

在连科兰很快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我们当时以为这是我们在滨海地区的支柱，一俟通航开始，苏维埃舰队便可从阿斯特拉罕开来并派部队登陆。但是时间过去了，并无任何军队登陆。力量相差悬殊。连科兰的苏维埃政权，在白匪和木沙瓦特反革命包围中坚持了几个月，终于失败了。萨姆松·坎杰拉基那时已经成了连科兰共和国著名的领导人之一。他和共和国其他共产党员一起，被反革命杀害，英勇地牺牲了……

* * *

在坐牢期间，我们囚室里住过各种不同性格的人。有些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而有些人我连想也不愿意去想。

但是对我的朋友邵武勉的孩子们的亲切回忆我将终生铭记。

我和苏连·邵武勉睡在一个很窄的铁床上。我经常想，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小伙子啊！他年纪虽小，但他的所作所为却完全象个成人。当他得知自己热爱的父亲、伟大的革命家牺牲的消息时，又是多么勇敢地经受了这

一痛苦。他尽管年轻，但表现了非凡的勇敢和自我克制，没掉一滴眼泪。我想起那天夜里，当时我们发现押送我们经过的地方也正是押送巴库委员所经过的地方，我们想，大概也要把我们带去枪毙。我们并排躺在潮湿的车厢地板上。苏连和列瓦准备遭受和自己父亲一样的命运，他们依然从容不迫。他们出色地经受了狱中生活的一切艰难困苦，从不叫苦，毫无怨言。

在弟兄当中最大的苏连和同志们相处以平等相待，并博得了大家的尊重和热爱。苏连不只是外表象他的父亲，甚至在最复杂、最紧张的时刻，他都表现出坚毅、镇静和惊人的自制力。这不仅仅是他的性格特点，而是他的主要品质。

在查帕里泽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回来后不久，苏连还只是一个十五岁的中学生，就积极参与建立由巴库党委会领导的巴库第一个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青年学生联盟。

我们入狱前的几个月，苏连已经不止一次完成了他父亲交给他的党的重要任务。1918年6月苏连受父亲委托，带着极其重要的文件，经过阿斯特拉罕和察里津到莫斯科找弗·伊·列宁。在交通被破坏，每走一步都面临危险的情况下，这次旅行表现了真正的勇敢。

苏连一讲起他和弗·伊·列宁难忘的会见，总是兴高采烈，无限神往。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把斯·

格·邵武勉的亲笔信递交给他的苏连。列宁向他详细地询问了巴库的情况，并立即给军事主管部门下令，给巴库拨出若干急需的武器和弹药，以抵御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保卫巴库。

苏连叙述说，当正式的工作性的谈话结束以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问他几岁。当苏连回答说，他十六岁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并对在座的一个同志（好象是B. Д. 邦契—布鲁也维奇）说：“你看看，我们的革命已经有怎样的孩子了！很快我们将有这样的孙子！”

苏连受父亲的委托，在从莫斯科返回巴库的途中，到察里津看望了斯大林；巴库最高苏维埃人民委员会通过斯大林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保持着联系。苏连和与他同行的同志们，其中有阿尔塔克，马罗·图马尼扬，列瓦和其他一些同志带着他们领到的武器和弹药在巴库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前几天回到了巴库。

阿尔焦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非常怀念苏连。在二十年代服兵役时，阿尔焦姆曾在奥廖尔的伏龙芝步兵学校做共青团小组长。苏连是步兵学校的校长。苏连在学员和指挥员中受到极大的爱戴和尊重。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对苏连也非常热情。谢尔戈在1911年到过巴库。我们党当时处在秘密状态。谢尔戈到斯捷潘·邵武勉家去取一些党的重要文件。斯捷潘叫苏连去把这些文件拿来。苏连到屋外某处，把埋在地里的文件挖出并交给了父亲。谢尔戈在结束他的叙述时

说：“这个九岁的孩子那时就已经是秘密革命工作者了。”

苏连·邵武勉具有崇高的理想，坚定不移的原则性，襟怀坦白，同时对需要帮助的同志有求必应，满腔热忱。

他那悦耳的声音，富有幽默感的谈话，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中。他具有超群的智慧，认真求实的精神和杰出的组织能力。在他参加国内战争献身军事之后，越来越显示出这些优秀品质。1918年春天，从狱中获释后，他凭着特别的机敏，终于来到了莫斯科。

为了能从孟什维克占领的波提港潜入苏维埃的克里米亚，并取道去莫斯科，苏连一开始不得不先到土耳其，他装扮成一个“商人”的伙计和这个“商人”一起坐一条破船仿佛去伊斯坦布尔卖汽油。实际上他们是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的委托，把汽油带到克里米亚给红军的。

在海上他们乘坐的船的发动机坏了，他们在大风暴中升起了船帆，经历艰险到达了土耳其的锡诺普港。修好了马达后，横渡黑海，开向塞瓦斯托波尔。但是塞瓦斯托波尔已经被白匪占领。

于是他们转向叶夫帕托里亚，但那里也被白匪占领。他们仍然装扮成商人上了岸。苏连巧妙地把自已装扮成一个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商人，置身白匪军官之中。后来他到了白匪占领的哈尔科夫，然后到了别尔戈罗德。在这里他买了一副少尉肩章，并且扮成白匪军官的模样奔赴前方。为了显得威严，这一段时间，他没有刮脸，留起了胡子。

苏连藏在一辆堆满干草的大车上，顺利地穿过前线，并于几天后到了莫斯科。不过，整个这段历程用了很多时间，苏连是1919年5月9日从波提出发的，而他到莫斯科时已经是1919年9月16日。

苏连在1930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的《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活动》这本小册子中，非常生动而鲜明地描写了关于这次旅行的回忆。不久以前，我重读了这本书，应该说，今天读起来仍旧很有趣，特别是对于青年人来说。

在莫斯科，苏连进入陆军学院学习。毕业后，他任阿塞拜疆师的参谋长。这个师的师长是贾姆希德·纳希切万斯基，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俄国军队的老军官。苏连和他的关系极为友好、融洽，彼此都充分信任。

后来苏连成了上面所说的奥廖尔步兵学校的校长。在他的倡议下，学校不久改组为苏联第一所坦克学校。后来苏连擢升白俄罗斯军区装甲坦克部队的司令员，后来又任当时具有特别重要战略意义的列宁格勒军区装甲部队司令员。他成了红军年青的装甲坦克部队中杰出的军事长官之一。

1936年当时任旅长的苏连·邵武勉患重病逝世，年仅三十四岁。

苏连——是古老的亚美尼亚的名字，意思是统帅。这个名字对我们的苏连是再合适不过了。

* * *

到阿什哈巴德州的监狱后，我的牙痛病更加发作了，这大概是由于吃不到蔬菜和水果造成的。

萨姆松让我要求监狱当局立即送我到医院治疗。一天后，我们的要求实现了，于是，我住进了州立医院。

医院的犯人部跟监狱大不相同。犯人部就是普通的病房，比较清洁，光亮，暖和，所不同的只是窗上装有栅栏。单单换了一个新地方，就使我感到十分轻松。而最主要的是，许多月以来，我第一次在浴室用肥皂洗了一个澡，脱下了自己的脏衬衣，穿上了医院发给病人的干净的衬衣。我的制服被拿去消毒。

经过仔细检查，医院的医生毫不犹豫地断定说，我得的是败血病。

这时我得知列瓦·邵武勉也在这个医院的普通病房里住院。医院的犯人诊疗部的警卫人员都是些体面的规矩人（其中有些人是巴库难民）。他们不过分限制我，甚至允许我在他们的伴同下去探望列瓦。

我看到列瓦精神很好。医生和护士精心地照料着他，大家都喜欢他，并竭尽一切可能使他尽快痊愈。在这方面巴库的医生彼得罗相起了特别大的作用。过了四十年后，我在埃里温碰见他时，他已是矫形医学院的教授兼院长了。那时，他给列瓦作了几次手术，消除了刚要发生的坏疽病，因而也就不需要作断腿手术了。过了一段时间列瓦腿上的伤口逐渐愈合，便架着双拐走路了。

我们见面高兴极了。列瓦告诉我说，把我们从吉考

耳—阿尔瓦特送到阿什哈巴德时，他也被送到了阿什哈巴德的州医院，和我们坐的是同一辆火车，但他在另一个车厢里。从他那里我还知道了，阿尔塔克·斯塔姆鲍利茨扬也由吉考耳—阿尔瓦特来到了阿什哈巴德，他已来医院看过列瓦，并给他带来了吃的东西。

过了一两天，阿尔塔克来到了医院并要求和我见面。会面得到了准许，我们谈了很长时间。阿尔塔克给我谈了他怎样从阿斯特拉罕偷偷地来到克拉斯诺沃斯克，又从那里来到吉考耳—阿尔瓦特，当听说我们被押送到这里后，又偷偷来到阿什哈巴德。他靠偶尔挣一点钱来维持生活，和巴库没有任何联系。我从他那里知道了他在阿什哈巴德听说的或是在当地黄色小报上看到的所有新闻。特别使我感兴趣的是传到阿什哈巴德的有关巴库、高加索的局势以及苏维埃土尔克斯坦共和国和里海以东地区的情况。

第一次见面后过了几天，阿尔塔克和托普里泽一起来了，托普里泽是巴库党委会的工作人员，我很了解他。他是我党优秀的地下工作者，他善于出色地组织我们党的复杂的技术工作，安排联系方法和秘密接头地点，递送秘密书刊以及执行当时党的其他重要任务。他是受已经恢复了的巴库党委会委托到阿什哈巴德来的，目的是了解一下我们的情况。他把巴库党委会要我们越狱和设法回巴库的指示转告了我。他还告诉我，巴库工人急剧地向左转，他们大多数是同情布尔什维克的，但是当时在巴

库有经验的领导人很少。所以孟什维克的头目们仍然窃踞着工人组织的领导岗位。

托普里泽带来了巴库党委会给我们的三万卢布以支援被捕的同志和组织越狱。我同他还有阿尔塔克一起详尽地谈论了帮助狱中同志们的计划。托普里泽还给了我们大量的我非常想得到的巴库报纸和传单。他走后，我便贪婪地读了起来。

根据各种情况可以明显看出，如果说英国人第一次来巴库是所谓“被邀请来的”，他们躲在“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专政委员会”背后指挥一切，还不敢明目张胆地直接干涉内政的话，那么他们第二次来到巴库便以不折不扣的胜利者和占领者的姿态出现了。英国军队从波斯的港口——恩泽里进驻巴库的那天，即1918年11月17日，英军司令弗·姆·汤姆逊将军发布的第一号“通告”是非常说明问题的。

在这个“通告”中，汤姆逊企图千方百计地掩饰英国军队进入巴库的侵略实质。他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为俄国高加索的仁慈的“救世主”，他说占领巴库是得到了“新俄国政府”（应该说是白匪邓尼金的傀儡政府）同意的，甚至是得到了土耳其政府的……同意，虽然全世界都非常清楚，土耳其对巴库从来就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力。

我认为在这儿摘引一下汤姆逊将军的背信弃义、口是心非的“通告”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个“通告”显而易见是为了欺骗那些容易上当的人。

当时这位将军是这么写的：

“我作为盟国的代表，进驻到巴库，特向各界作如下通告：

大不列颠王国军队代表盟国占领巴库。陪我一同前来的还有法国和美国的代表，我们来到这里得到俄国新政府的完全同意。土耳其在其签订的停战协定中亦表示同意我们对巴库的占领。

在这庄严的时刻，我们不会忘记俄国人民在世界大战初期对盟国事业所作的巨大贡献。在俄国没有恢复秩序，在她没有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一道取得应有地位之前，盟军是不会回去的。

高加索尚有动乱，我的职责是使巴库地区局势稳定。目前的分裂局面完全是我们的敌人所造成的……

毋庸置疑，盟军不想占据俄国的一寸土地。他们已就这一点向俄国人民郑重保证。

同样，管理国家及其任何一部分也完全是俄国人民自己的内政，盟国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干涉。我们来此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建立秩序，除掉阻挠恢复法纪和秩序的德国和土耳其的骚乱中心。我们对所有民族和宗教将一视同仁。我们将暂时设立地方和城市的管理机构，与此同时，我将竭尽全力恢复法制和秩序。在这一工作中，可望得到有自觉性的大多数公民的支持，对此我深具信心，并建议他们负起责任，执行一个公民为维护社会秩序应尽的义务。从我这方面来说，将使我所颁布的命令尽量少为居民造成麻烦。

我希望依靠所有安分守己、自觉的巴库公民的协助，顺利而迅速地完成任务，以便我们能尽快地返回祖国，并自信我们已为俄国享受到战胜我们共同敌人的成果

而尽了力。

下列必要措施应立即实施：

1. 市民以及居住在本军队管辖范围内的一切人士必须在即将宣布的时间、地点向当局交出自己存有的步枪和手枪。

2. 凡向当局供出在清除土耳其军队之后仍然留在市区的土耳其人或德国人者受奖。

3. 在城市实施军事管制，直到地方政权有力量代替军队维护社会秩序为止。”

从这个“通告”中可以看出，汤姆逊将军甚至认为无需说明他是根据什么法律和国际法准则来到别国领土上发号施令，并设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即使是“暂时的”），来取代现有的地方当局的。因为他不会不知道，当时在巴库存在着资产阶级民族政府和城市政权。英国将军对此完全置之不顾。已习惯于屈从土耳其侵略者的汗霍伊斯基的木沙瓦特政府这时也不反对英国占领者的独断专行，而对他们极尽卑躬屈膝之能事。

汤姆逊将军在他占领下的巴库建立的那种“秩序”证明，英国当局随即发布的命令对于当地居民是多么的“不麻烦。”

汤姆逊将军的命令中宣布：三天之内拒不交出武器者要受到：“（1）体罚；（2）监禁；（3）罚款或上述各项惩处一并执行。”

汤姆逊在命令中还宣布：“十人以上之集会，不论其目的如何……未经书面许可一律禁止。此条亦包括无条

件禁止群众在街头聚集。”凡违反规定者立即予以严惩。“凡罢工者或暴动者，罢工或骚乱的挑动者”也将受到严惩。

不仅如此，这位将军还宣布：“凡有从事我认为是危及社会秩序和治安或公民安全者”也应受到同等惩处，而“更为严重的罪行将由我授权的人士审理，立即予以惩处，或授权特别法庭判处死刑……”

在这里，汤姆逊将军暴露了他那一副殖民地宪兵的真面目。在巴库呆了还不到两天，汤姆逊就背弃了他所做的关于不干涉内政的一切诺言。他在当地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号召与布尔什维克进行斗争。“我号召你们……”他写道，“反对一切形式的布尔什维主义……盟国与布尔什维主义势不两立！”

所有这些“秩序”、“威胁”和“号召”，使巴库工人有可能亲眼看见“文明的”英国实际上是什么货色，亲身体会一下专横而又无法无天的残酷殖民制度。

巴库无产阶级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并有多次政治罢工、经济罢工以及在各企业中建立工人组织的经验，就是在沙皇专制制度的艰苦年代里，也不止一次地举行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而如今，在英国人来了以后，却第一次被置于这样的处境：未经特别的许可，就是十个工人也不能聚集在一起讨论自己切身的事。

因此，英国人一宣布这些规定，巴库全体无产阶级便群起反对。尽管规定了极其残暴的镇压措施，巴库工人

继续在他们所在的企业中集会，讨论当前的形势。许多工人因为组织会议或参加主持这些会议而被英国占领军当局逮捕了。这就更是火上加油，激起巴库工人对侵略者的更大仇恨。

1918年12月，英国占领者为了恐吓居民，在巴库中心广场树起了绞架。12月中旬一大批著名的工人—工会和政治活动家被捕入狱。

工厂委员会召开工人代表会议通过决议，立即举行全面的政治性罢工，以示抗议。12月24日，石油企业、炼油厂以及其他许多企业的工人都掀起了罢工。

木沙瓦特政府也好，英国占领军司令部也好，他们都没有料到巴库工人的行动如此坚决，他们以为巴库工人在失去了自己久经考验的领袖以后将会变得消极起来，无力掀起这样的行动。

具有战斗性的罢工不断地加强和扩大，持续了四天之久。英军司令部被迫做出让步：放回已被送往恩泽里的工人运动活动分子，释放关在巴库监狱中的政治犯，并且答应不干涉工人集会等。有意思的是，被捕的大部分是当时处于工人组织领导地位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也就是那些不过三、四个月前还把英国人当做“救星”请到巴库来的那些政党的代表！被捕的布尔什维克有年轻的工会活动家列旺·米尔佐扬、年纪稍大一些的工人阿纳什金及其他几个人。

由于全面的政治罢工取得了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人

群众，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有了信心。工人实际上夺回了集会的自由和工人组织活动的权利。罢工的结果使工人代表会议在政治上赢得了极大的威信并成为巴库工人阶级的常设代表机构，对于这个机构英军司令部和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都不能不认真对待。

英国人一到巴库，还把魔爪伸向了所有的海上船只，他们宣布：“一切里海商船及全体船员暂时皆由英国司令部管辖。”他们还宣布阿塞拜疆的主要资源——石油，也由“英军司令部掌管”。并指定了不列颠石油管理机关。

这些都是托普里泽告诉我们的，其中很多事情我们从他给我们带来的报纸上也看到了。我们还从托普里泽那里获悉，巴库共产党员们在工人代表会议提出，要求从里海以东地区监狱中释放遇害巴库委员们的家属和所有监禁在那里的巴库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会议当即向英军司令部提出了这一要求。

* * *

渐渐地我和监狱的看守们混熟了，其中有一个人，显然对我怀有特殊的信任，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是个共产党员。这人是拉脱维亚人，叫奥托·利达克。原来，他参加过红军，在 frontline 的一次战斗中被白匪军俘虏了。白匪军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就把他调到这里来执行警备任务，就这样他成了监狱的看守。利达克以他那双蓝眼睛所发出的明亮的招人喜欢的诚实目光使我立刻对他有了好感。后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当我们又到了巴库的时候，

他也从里海以东地区逃了出来，到了我们这儿。他立刻找到了我。由于他有些作战经验，又是一个可靠的共产党员，我建议他去连科兰共和国，并向他讲了那里的局势非常复杂，并且很危险。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后来得知，他当选了连科兰市党委书记。连科兰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他和一小部分同志乘一条小船逃到了克拉斯诺沃斯克以南很远的里海东岸，然后又从那里穿过土库曼沙漠地带找到了红军先头部队。红军先头部队当时已占领涅比特—达格，并正向克拉斯诺沃斯克推进。（攻克克拉斯诺沃斯克之后，里海以东地区就彻底肃清了反革命势力。）后来，当我又遇到利达克时，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连科兰共和国失败的情况，以及他和他的同志们脱险的经过。

当时在狱里利达克讲的情况使我非常高兴。我向他打听在阿什哈巴德有那些共产主义组织，他和这些组织有没有联系。他说，关于这些组织的情况他毫无所知。我便请他以及阿尔塔克和托普里泽无论如何要和阿什哈巴德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我坚信在阿什哈巴德一定有党组织。

1926年阿尔塔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关于这一点是这样写的：

“米高扬决定召集阿什哈巴德党组织会议。他委托一个名叫奥托·利达克的同志主持第一次组织会议，奥托·利达克后来是1919年连科兰起义的组织者和参加者之一。我被委托负责这

个组织与米高扬之间的联系。我出席了在我们一个同志的灌肠作坊召开的第一次组织会议。这个同志后来是巴库的一名积极的俱乐部工作人员。遗憾的是，阿什哈巴德的同志们因为组织遭破坏，未能开展工作。”

我决定执行巴库党委会的指示，实现越狱计划。从监狱里逃出去是不可能的。在医院的警卫中除利达克外，还有一位亚美尼亚士兵曾在我担任过政治委员的那个部队里当过兵。他认出了我，对我很好。

一次奥托·利达克值班时，我对他说，我要到城里的图书馆查几本我需要的书。我请求他不要让看守跟去。利达克同意了：尽管我向他保证不逃跑，一定返回医院，但这对他来说当然是件很冒险的事，他相信了我。

我到了图书馆就找起书来。令我惊讶和十分高兴的是，我偶然找到了两本书：一本是“一百九十三人诉讼案”（1878年对一百九十三名民粹派革命党人的诉讼），另一本是关于暗杀亚历山大二世一案的审判（1881年3月1日）。这两本书是审理上述两个案件的正式记录：读了这些记录，尤其是读了对刺杀沙皇的凶手的审讯记录，使我久久不能平静。以前我曾听说过并读过关于热里雅波夫，基巴尔契奇，皮罗夫斯卡娅的事迹。但我并不知道，他们在法庭上表现得如此英勇果敢。即使我读的是沙皇官吏们的语言枯燥、文理不通的记录，而且为了给沙皇的“公正审判”歌功颂德，许多地方明显地歪曲了事情的真相，但这些革命者的崇高形象却依然清晰可见。他们是

真正勇敢刚毅有极大革命热情的巨人，无限忠于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为此毫不犹豫、毫不动摇，昂首阔步从容就义，大义凛然。

热里雅波夫的英雄的高尚行为使我深为惊叹和赞赏，他不仅在审讯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坚定，而且他还是主动出席受审的。事情是这样的，热里雅波夫是在刺杀沙皇前几天被捕的，他和这件事没有任何牵连。但当他知道，要对暗杀行为的直接执行者进行审判而其结果必然是处以死刑时，他就要求检查官“把他热里雅波夫归入3月1日的案件中”。同时，他说他和行刺者同心同德、完全一致，并声明，在这以前他就曾谋杀沙皇未遂。3月1日他没有和他的同志们在一起只是由于“荒唐的偶然性”。热里雅波夫写道，因此，他担心由于涉及到他的表面上的罪证不足，法院不追究他这个老革命战士在这个案件的责任。

从怎样对革命有利的角度来看，热里雅波夫的行为可能是轻率的。但他认为，他不能不这样做；否则，实际上是执行他热里雅波夫以“民粹派”名义交给的任务的青年人反而要被判刑，而他热里雅波夫这个刺杀沙皇的组织者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审判。再说，他若出庭，将能比别人更好地捍卫他的党的路线。

现在就连小学生也明白，民粹派为达到解放人民这一伟大革命目标而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方法，是搞个人恐怖。但他们的伟大胸怀，深厚的战斗友情，崇高的思想境界，为革命事业而献身的决心，以及为其所从事的伟大

目标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一切不能不引起我对他们的崇拜。

我久久不能忘记本书给我的印象。我觉得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所写的“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①这句名言，指的正是这样的革命者，不过当然是丢掉了民粹派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而用马克思主义原则武装起来的革命者。列宁的这一理想实现了：他所培养起来的俄罗斯革命者的党完成了伟大的十月革命。

想起邵武勉和其他牺牲的巴库的同志，我觉得他们就是当代的热里雅波夫。他们认识了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的发展规律，并且是以列宁的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

我想顺便指出的是，故事影片《索菲亚·皮罗夫斯卡娅》和在“当代人”戏院上演的戏剧《民粹派》，依我想，是真实地、感人很深地再现了民粹主义革命者的形象。从青年时代起，这些形象就一直铭记在我的心里。当时我还年轻，何况自己是身在囹圄之中读到他们的事迹的，就更不能忘怀了。……

有一次托普里泽到医院来看我，他告诉我说，阿尔塔克得了伤寒，躺在一个熟人的家里。这时正赶上奥托·

^① 《列宁全集》第5卷第437页。——译者

利达克在病房值班。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去探望生病的同志。利达克同意放我去。我和托普里泽进了城。虽然阿尔塔克在发高烧,但他仍为我们的到来而感到高兴,并极力宽慰我们说,他的病没有什么了不起。我和托普里泽说好,要他保证按时请医生到家里给阿尔塔克治疗。

这是我第二次离开犯人诊疗所进城。我担心查房就急忙赶回医院,我不愿使利达克受到连累。

* * *

阿尔塔克病愈之后,有一天他到医院来告诉我说,他终于找到了能使我逃跑的办法。他通过本地的一个商人找到了一个土库曼巴依^①,付给他一笔酬金,他秘密地送我越境到波斯去。在那里我改换一个姓名,沿着里海边进入巴库。

有可能逃跑使我感到鼓舞,情绪也高了起来,虽然我知道在通往自由的道路上还会有重重障碍。逃跑时和越过国境时都可能失败,也可能落到为英国人控制的波斯警察局的手里。总之,处处都有危险……

为什么我们选择了经过波斯,而不是经过克拉斯诺沃斯克的路?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到克拉斯诺沃斯克火车要走一昼夜左右,此外,在克拉斯诺沃斯克一旦需要时很难躲藏,更不要说从戒备森严的港口逃出去了。我们考虑到的情况是:当局一经发现我逃走,就会立刻通知整

^① 巴依——土耳其语,指十月革命前中亚的地主、财主。——译者

个铁路沿线和港口。而波斯边界趁地方当局还没有觉察的时候，只需几个小时就可以骑马越过。

逃跑的日期定在奥托·利达克值班的那一天，已经约定他和我一起逃跑。

即将得到自由的喜悦使我不能平静下来。但在预定逃跑的前一天晚上警卫突然来了，把我又转回监狱去了。我们始终纳闷是谁泄露了我们的逃跑计划。也许谁也没有泄露我们的计划，只是上面见我身体好转，决定让我出院，送回囚房。

自从托普里泽来到阿什哈巴德以后，由于他经常送些食品、书籍和当地的报纸，我们在牢房的生活大有改善。此外，我们常常从他那儿收到字条，并且总能想一些办法答复他。

我们从托普里泽那儿了解到，我们巴库的同志正在为营救我们而加紧斗争。我们还通过托普里泽与关在监狱里的我们的妇女同志建立了联系。

* * *

1919年2月27日有人通知我们说，我们获释了，并且准备把我们送到巴库去。我们高兴极了。

我们从监狱出来不得不等一天一夜的火车，真不知怎样打发这段时间才好！不过在这个节骨眼上阿尔塔克又帮了我们的忙。他找到了一家姓麦尔库莫夫的亚美尼亚人，这家人同意留我们过夜。麦尔库莫夫家有一幢不

大的单独的房子和一个花园，这是当时阿什哈巴德的典型住宅。这样的房子一般是官吏和商人住的。女主人十分殷勤，她尽力想使我们过得好。她首先当然是关照我们洗了洗脸，请我们吃了一顿美味的亚美尼亚菜——羊肉抓饭、“多尔马”和烤肉串。我们馋得很，所以吃得如此香甜，似乎是一生中吃得最香的一顿饭。一切都象在家里一样，舒适而温暖。吃罢饭后我们安安稳稳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顺顺当当地坐上了火车。

我们精神饱满，情绪高昂地离开了阿什哈巴德，为我们能战胜所有这些严峻的考验而感到高兴。我们男子们特别为我们的妇女感到自豪。她们在严酷的考验面前始终坚贞不屈。我们为我们牺牲了的同志有这样好的妻子而骄傲。查帕里泽和费奥列托夫的妻子以及马罗·图马尼扬特别值得称赞。

我们知道，当查帕里泽的妻子得到自己丈夫的噩耗后，思想上震动很大，所以在一段时间里她的精神有些失常。但她以极大的毅力克服了这一切。当我们坐在火车上时，瓦尔瓦拉·米海洛夫娜这时想的是，尽可能快点看见她那两个当时还在苏维埃俄罗斯的女儿叶莲娜和柳齐娅。

萨捷尼克·马尔季科扬想的是尽快见到自己的孩子塔图尔、阿扎特和埃玛。她的丈夫是邵武勉的亲密朋友，这时他正和孩子们在高加索某地。他是和我们一起到克拉斯诺沃斯科的，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得免被捕。

在火车里，我们自然和我们的妇女们谈了很多，听她们讲述了她们在狱中的情况，我们也给她们讲了我们的狱中生活。但我们也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深入的思考。不过才五个月，可是我们经受了多么折磨！我们对这五个月里所克服的那些艰难困苦的感受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当时那样强烈了，甚至已成了对往事的某种愉快的回忆。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有足够的勇气经受住了这一切，丝毫也没有丧失掉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气节和良心。我们觉得自己有决心经受任何新的考验，并且真是如饥似渴地盼望着革命工作。尤其是我非常清楚，在巴库将有大量的政治工作等待我们去做。我预料到工作的复杂性，并且知道现在我们必须自己去分析一切情况，制定斗争策略，独立做出负责的决定。有时我也产生疑问：我们能够完成这些任务吗？因为巴库和莫斯科的联系已经被切断了，现在根本不可能从党中央那里得到指示和命令。但这些疑问很快就消失了。因为老同志们留下的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以及我们个人取得的不多的然而非常重要的革命斗争经验都给了我们以信心。主要的是，巴库的无产阶级自己经历了斗争的艰苦锻炼，并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依靠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集体智慧，依靠工人群众的帮助，我们是能够取得成功的。

旅途中的每一小时都显得漫长。我们急切希望尽快全力以赴地投入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中去……

在路上没有任何人监视我们，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看

守人员。但当我们到了克拉斯诺沃斯克时，警卫队出现了。我们是被押解到克拉斯诺沃斯克码头的。

我们顺着舷梯刚刚上轮船，马上就落入了英国警卫队的魔爪。在甲板上站着几个士兵，向前斜端着卡宾枪，完全是处于通常所说的戒备状态。轮船还停在码头上，我们就在甲板上来回地踱着。忽然一个英国中士，看得出，他是领头的，对我们喊了一声，叫我们不要动。我们两手一摊做出一副惊讶的样子，努力向他解释，我们没干什么错事。于是他用英语向我们喊了一句什么，并用卡宾枪做了一个威吓的动作。我们不理他那一套，继续在甲板上来回走着，谈笑着，纳闷地摊着双手。

跟士兵争吵了好一阵子，一个英国军官带着一个翻译来到了我们面前。翻译对军官转述了我们抗议对我们的逮捕，然后又传达给我们下列一段话：“军官先生让我转告你们，要你们不要激动。你们并没有被捕，你们只不过是处在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陛下的保护之下。”说完他们就走了。

我们没有马上理解英国军官话中的虚伪含义和惊人的荒谬。过了些时候我们想起这个场面总是觉得好笑。

应该说，这段时间英国人对待我们的一些做法是非常令人不解的。在阿什哈巴德我们差不多一昼夜是自由的。在火车里对我们也没有任何限制，我们已经觉得我们的确是被放了出来，是作为自由的人到巴库去的。可是在轮船上我们又被捕了，并处在英国警卫的监视下。“这

就是说，我们没有被释放。”我们想，“是把我们押送到巴库去，投入当地的监狱。”这种前景没有使我们害怕。因为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巴库工人身上，巴库工人反正能迫使英国人释放我们。我们知道，巴库共产党员是坚决要求释放被枪杀的巴库人民委员的家属和我们全体被关押人员的，这一要求得到巴库广大工人群众的热烈同情和支持。在群众的压力下甚至孟什维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也同意了这个要求。现在他们表示赞成从狱中救出巴库人民委员的家属，为的是努力表现他们的人道主义，甚至想在一定程度上逃避对人民委员牺牲所应负的责任。

当轮船还停在码头时，我们买到一本俄英小字典，——码头上就有卖的。在轮船上我们落到英国士兵手里，有一部字典正合我们的需要。在中学的时候，我德语学得还比较不坏，但英语却完全不懂，所以用德语方式读英语单词和发音，人家听上去还是不大懂。尽管如此，看来英国中士多少理解了一些我的意思。我想，这不是靠我的言语，而是靠我的面部表情和手势。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阿米罗夫的妻子，她是德国人，精通德语，但也不懂英语。她也和我一样不得不用手势和个别的半通不通的句子来跟卫兵解释。

不管怎样，中士不但放心了，甚至还对我们明显地好了起来。他常走到我们面前，讲几句英语，说说笑笑，从种种迹象看来，他对我们讲的都是表示好感的话。

当我们的轮船驰到海上时，起了大风暴。我们随身备有吃的东西，还是在阿什哈巴德的时候买的，因此不必为吃饭发愁。我们只担心风暴，轮船颠簸得很厉害，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吃不下东西。

在一般情况下，从克拉斯诺沃斯克到巴库只要走大约一昼夜，由于风暴我们在路上用了差不多两天两夜的时间。同志们经不住这种颠簸，因为坐了几个月的牢，他们的体质衰弱了。我们的朋友们晕船晕得不得了，一个个都离开船舱跑到甲板上去了。我自己坚持了很久，没有晕船。

我和英国中士坐在船舱里，他请我吃罐头，这是他的口粮，出乎我意外，还相当丰富。

我想对这位中士作些宣传鼓动工作。我从放在我这儿的字典里找到了“国王”这个词，我对中士说：“乔治国王不好！”并用手打了一个相应的手势。中士马上火了，喊道：“不，不，不！”并不停地摆手。使我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工人，工党党员，社会主义者（这是他在这之前告诉我的）这样积极地维护国王。我怎么也不能理解这个奇怪的“皇家”社会主义者。记得，在什么时候党的书刊中曾称赞过麦克唐纳，我对中士说：“麦克唐纳，好吗？”中士赞同地点了点头说：“好，好！”我们接着“谈话”，我问他：“社会主义好吗？”他立刻答道：“好，好！”于是我冒然地问了一句：“资本主义——不好吧？”中士肯定地点了点头。

我继续进行“鼓动”，但是没有能做多久。看来，我做

得并不成功，并且我当时会的英语词汇也用光了。此外，在谈话接近结束时，我感到头沉。船颠簸得更厉害了。

为了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来到了甲板上。首先看到的是同志们被晕船搞得把吃的东西都吐了出来。也传染了我，终于晕起船来了。

晕过船的人都知道，晕船是很难受的，特别是长时间晕船。总之，我很久都忘不了。以后我有很多次在船上在飞机上遭到颠簸，但再也没有晕过。看来那次之所以支撑不住，是由于在狱中体质被搞得太虚弱了。

大海渐渐平静下来，颠簸也越来越小了。当船驶近巴库时，我们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虽然很多人的样子都是疲惫不堪的，脸色还有些发青。

船终于靠了岸。我们预料同志们会来接我们。但英国卫队不许我们下船，而码头上一个熟人也看不见。

于是我们大声叫嚷起来，希望码头上的工作人员能够听到。我们向他们喊话，要他们转告巴库的共产党员和巴库工人代表会议：英国卫队扣留了我们，快来营救我们……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突然看见一个我认识的讨厌家伙——孟什维克的头目罗赫林出现在码头。我们所知道的邵武勉家的老朋友巴库的女社会活动家奥金舍维奇，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秘书布尔什维克沃斯卡诺夫也来了。此外，还有一个不认识的人。

罗赫林来到甲板上向船上的官长出示了释放我们的

公文(这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个公文是常设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逼着英军司令官签发的)。我们获释了。

原来,由于风暴,巴库的人谁也不知道我们的船到达的准确时间。而孟什维克从码头工作人员那里知道了船只已经到达,但没有把这一消息通知布尔什维克党团。

我们分头回到我们在巴库的旧住处。奥金舍维奇把列瓦带下船来,以便把列瓦送到她丈夫的医院去。她丈夫是巴库著名的外科大夫。

和自己的好友会面有多么幸福,那就不用说了!

我们回到巴库几天以后,阿尔达克和托普里泽也来了。为了不致引起怀疑和被捕,他们在阿什哈巴德有意没同我们一起动身。

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在轮船上我和一个英国中士的关系相当好。不论什么时候,我和他相遇,他的脸上总是带着善意、和蔼的笑容。从心理上解释这一点并不困难:英军司令部在士兵中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胡诌什么布尔什维克是嗜血的猛兽和匪徒,如今他亲眼看见我们都是完全正常的人。正象在这种情况下经常看见的那样,在他思想上发生了(同时请注意,仅仅是在两昼夜的时间里!)从怀疑、敌视到相信、友好的急剧变化。

一天中午,我正沿着大街往工人俱乐部走,那里是我们的合法总部——工人代表会议代表团的所在地,突然

看见从街道的对面向我急急地走来了一个英国军人。我马上闪过了一个念头，他是不是来抓我的？当他走近时，我才认出他就是我在轮船上认识的那个中士。他满面笑容，走到我跟前，用两只粗大的手握住了我的手，友好地摇晃了好久，用英文讲了些什么，看来都是热情友好的话。

回到巴库以后不久，我们了解到了一些我们从阿什哈巴德监狱获释的背景。

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立宪会议委员恰伊金在自己的发言中曾多次断言说，不是英军司令部在工人代表会议的压力下从狱中把我们释放的，而是由于他以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巴库委员会的名义亲自过问的结果，并且他曾受该委员会的委托到阿什哈巴德向齐明部长提出要求释放我们。恰伊金在这一方面亲自采取了些办法看来是符合事实的。但恰伊金之所以要提一下右派社会革命党人以及齐明部长的什么特殊作用，不过是为了在公众的心目中替右派社会革命党人“洗刷”。但是没有英国人的直接命令齐明是不能释放我们的，因为当时无论是执政内阁还是齐明本人都是完全依附于英军司令部的。在我们获释的那一天，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代表丘拉耶夫在巴库与汤姆逊进行了会晤。巴库孟什维克的报纸2月28日报道了这次会晤。丘拉耶夫向汤姆逊将军提出英国人完全不得干涉阿塞拜疆和巴库内政的要求，汤姆逊回答说：“可

是，释放关在阿什哈巴德的妇女和小孩也是内政啊，这可
是由英军司令部执行的。您希望这一切都停止不做吗？”

恰伊金在一次谈话中还提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
况。原来我们在阿什哈巴德被释放后，克拉斯诺沃斯克
地方反动当局的头子库恩还接到了英军司令部的一个指
示——把我们扣留起来，并交给英军司令部作人质，直到
释放在北高加索被苏维埃政权逮捕的几个英国军官和大
不列颠的英国代表为止。

后来我们才知道，莫斯科为了交换我们也采取了一
些措施。有意思的是，一个著名的亚美尼亚进步作家、梯
弗里斯高加索亚美尼亚作家协会主席奥瓦涅斯·图马尼
扬也参与了交换被捕者的事务。1919年3月（这时我们
已经获释）图马尼扬通知莫斯科人民委员会说：

“亚美尼亚社会活动家得知，如果英军司令部能释放瓦尔瓦
拉·查帕里泽和邵武勉的两个儿子，苏维埃政权便同意释放扎
弗里耶夫大夫和文学家纳扎里扬。因此亚美尼亚社会活动家尽
了自己的一切努力，以便使瓦尔瓦拉·查帕里泽和邵武勉的儿子
获释。通过在各个方面进行活动的结果，他们已于最近被解回巴
库并得到释放。虽然他们是交保释放，但生活完全自由。有鉴于
此，我们希望苏维埃政权现在能释放扎弗里耶夫大夫和文学
家纳扎里扬。”

收到莫斯科的覆电后，图马尼扬在1919年4月给全
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阿瓦涅索夫打电报说：

“你3月30日的电报已收到。瓦尔瓦拉·查帕里泽和邵武

勉的儿子现已被释放，无需交保，并可不受任何限制离开此地。瓦尔瓦拉·查帕里泽本人在专门信使送往莫斯科的信中已向斯大林讲到了这一点。目前瓦尔瓦拉·查帕里泽和邵武勉的儿子都无意离开高加索。瓦尔瓦拉·查帕里泽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她一旦从斯大林那里得知她孩子的下落，就动身去俄国。因此采取交换的措施已无必要。我们请求给予扎弗里耶夫和纳扎里扬离开那里的充分自由。”

显然图马尼扬直接地或是通过什么人和瓦·米·查帕里泽有过接触。并在了解到了实际情况以后，给莫斯科发了这份电报。因此是图马尼扬第一个把我们获释的消息通知了莫斯科。

再回到我们释放的问题上，我想说，显然英国人确实有一个用我们换取他们的人的计划。英军司令部在克拉斯诺沃斯克把我们扣押了，但英军司令部了解到工人代表会议要求释放我们的坚定立场，又怕与巴库无产阶级的关系恶化，故此被迫在巴库释放了我们。巴库工人代表会议的领导坚持向英国当局要求释放我们的证件。于是这种证件被交给了他们。

在英国占领时期，我们被辗转禁于里海东岸各监狱的生活到此就结束了。

在英国占领下的巴库地下活动

争取群众的斗争

关于罢工问题的争论；工人代表会议上的一场斗争；在中央罢工委员会；悼念战士；聚集力量；巴库党代表会议。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巴库。

我一向热爱这座经常吹拂着海风、盛产“黑色的金子”和灯火长明不熄的城市……

巴库——她是我度过革命青春时代的城市。在我的青年时期那些最光辉灿烂的回忆，都是和巴库这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我那些好朋友们——他们后来成了巴库委员；正是在这里，我经受了严峻而又出色的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的锻炼；正是在这里，我度过了为建立苏维埃政权、为实现我们的伟大理想而奋斗的那些难忘的英雄岁月。……

一上岸我们立即乘敞篷汽车，在大街上行驶。

我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我又回到了巴库，获得了自由，并且很快就要回到我的亲密的朋友——巴库的共产党员和工人中间了。但当我想到邵武勉、查帕里泽、阿齐

兹别科夫、费奥列托夫以及其他牺牲了的同志没有和我们一起，也永远不可能再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心里便蒙上了一层忧郁的阴影。我不禁焦急地想：“这里的一切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尽快弄清楚在这段时间里巴库的情况究竟怎样。

一条条熟悉的街道在我们面前闪过。周围的一切同我们几个月之前离开时完全一样。只是经常看见身穿英国军服或方格短裙（苏格兰步兵服装）的士兵和军官。他们象在自己家里似地在大街上大摇大摆地游逛。英国占领军的铁蹄还在践踏着我们祖国的土地，想到这一点心里非常难过……

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情况是，虽然在里海以东地区备受折磨，经历了十分艰难的海上航行，但是又不得不立即投身于火热的革命工作中去。

在巴库，我住在一些老朋友的家里。我从他们那里以及后来来看我的同志们那里详细地了解了我们离开巴库这几个月中所发生的事件。

我了解到巴库总的形势仍然是复杂而又紧张的。以汤姆森将军为首的英国占领军司令部明目张胆地以这座城市的实际上的主宰者自居，而由霍伊斯基一伙控制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地方政府，则完全按照英国占领军司令部的旨意行事。当然，与此同时，常设的合法工人组织——巴库工人代表会议早在12月（1918年）政治罢工时起就继续进行活动。但遗憾的是，在工人代表

会议的领导机构即主席团的成员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主席团的领导人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工人丘拉耶夫，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虽然他是一个孟什维克，但颇受巴库工人的信任，——这首先是因为他有一段光荣的历史：他参加过《波将金号》装甲舰的起义。

我的朋友们说，工人们的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这是因为阿塞拜疆的资本家在当地政府和英国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把早先已经收归国有的企业和采油场又夺了回去，并在这些企业和采油场中恢复了旧制度；早在克伦斯基政府统治时期巴库工人经过艰苦斗争取得的合同条件也被完全取消了。

同时，石油工业正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开采出来的石油销售不出去。当时巴库与苏维埃俄罗斯的交通被截断了，而后者是巴库石油的主要消费者。采油场工人的工资降低了，而城市里物价不断上涨。危机也使航运业的职工蒙受沉重的打击。里海舰队运输石油用的大多数油船都闲置在码头上。城里失业大军在不断扩大。巴库工人的愤怒情绪越来越普遍。

在这样的情况下，便提出了举行罢工的问题。石油工人、商埠工人和水兵都坚决主张举行罢工。他们还清楚记得 1918 年 12 月的政治罢工所取得的成果；他们指望这次罢工也能取得胜利。甚至妥协主义的政党也赞同举行罢工；连孟什维克也不敢冒险出来反对罢工。他们虽然不相信罢工能取得胜利，但他们为了保持自己在工

人中的影响，也不愿去反对工人。

大约在我们回到巴库的一个月之前，工人代表会议通过举行总罢工的决议。成立中央罢工委员会。在那些日子里，“罢工”这个词在工人中间是非常流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于1919年3月6日到达巴库。首先碰到的任务就是组织工人举行总罢工。在那个时候，这是头等大事。

我们到达巴库的当天晚上，召开了巴库党委会。第二天（3月7日）罢工委员会召开会议，以便确定罢工的日期。

我们争论了很久，每个人都做了多次发言。我觉得，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动罢工是不适宜的，为时过早。列万·果戈别里泽固执地主张立即举行罢工，他是罢工委员会委员，我党在罢工委员会中的代表。他激烈地争辩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他在罢工委员会的会议上主张延期罢工，那简直是不可能的。用他的话来说，罢工委员会的全体委员要求立即开始罢工，工人们天天都盼望罢工，他们实在忍无可忍了。从其他同志的发言中也不难看出委员会中大多数委员的意见。他们很了解多数巴库工人的心情和要求，希望尽快开始罢工。况且他们认为自己有责任贯彻巴库工人代表会议通过的有关决议。

所以，当我这个新来的人就罢工问题提出一些疑问的时候，有些党委委员甚至有点不知如何是好。

例如，我问我的朋友们，根据当时巴库的社会、经济

等条件，罢工是否有把握取胜？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和罢工委员会中尚处于少数，在这个时候举行罢工是不是为时过早？工人都会跟着我们走吗？资本家会不会部分地满足罢工群众的要求呢？我说我们还不能不考虑到这样一种危险，即英国占领军司令部和反动的阿塞拜疆政府可能镇压罢工，甚至可能要取缔工人代表会议。如果我们能推迟两三个月再举行罢工，那末，我们不仅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会更强大，而且整个形势会发生变化：同阿斯特拉罕建立了联系，红军的舰队可能驶出伏尔加河，在里海占支配地位，这会相应地影响我们巴库事变的进程。

讨论一直进行到深夜。在讨论过程中，我更深入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同志们对我提出的疑问有了正确的理解，比较能够对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持批判的态度。

经过讨论我们都明确了这样一点，即：目前还不具备使罢工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巴库党组织当时还没有全部恢复。党的支部还没有在所有大企业中建立起来。在罢工委员会和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中，共产党员还不占多数。孟什维克控制下的巴库工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仍然非常脆弱。没有坚强的党的领导，就不能开始罢工，因为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木沙瓦特党人和达什纳克党人在罢工的过程中有可能投降，使罢工归于失败。

对这些情况做了分析之后，记得我当时提出了下面这样的建议：一方面肯定巴库工人代表会议关于举行罢

工的决议是有效的，但同时暂不仓促确定举行罢工的具体日期，利用剩下的这段时间对罢工进行最细致的、全面的准备，巩固党的组织，并在罢工委员会、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和工会的领导机构中争取多数；尽量将罢工推迟到伏尔加河开始通航以后举行，因为那时苏维埃海军将确实能援助我们。同时，我认为，到那时，罢工不仅是经济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了。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巴库党委会通过了我的建议。但却产生了一个实际问题：怎样才能使这些建议付诸实现。

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巴库工人是赞成罢工的。在工人的集会上，谁也不敢提出推迟罢工的问题。我们布尔什维克是工人阶级的最革命的政党的代表，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应当怎么办呢？

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的办法。

我们让果戈别里泽（他是罢工委员会中唯一的一个布尔什维克代表）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两面手法：他们一方面参加罢工委员会，并主张举行罢工，但另一方面却在暗中低三下四地同英军司令部进行谈判，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动摇工人对罢工胜利的信心。果戈别里泽要在会上要求停止同英军司令部的谈判，而如果这个要求遭到拒绝时，便退出会场。

果戈别里泽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于突如其来地提出这个问题感到很吃惊，

他们拒绝接受果戈别里泽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于是，果戈别里泽退出了罢工委员会会议，表示抗议。

我们的主要策略是在罢工委员会和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中孤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挥布尔什维克党在这些重要的工人组织中的领导作用，并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团结在它周围。

当时我们提出建立与各企业的工人保持直接联系的区的工人代表会议和罢工委员会（作为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分会）的主张。

这个建议得到了全体工人的一致拥护。

我想先谈的一点是，在3—4月份我们参加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大量的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在巴库的各个区都建立了工人代表会议及其主席团，建立了罢工委员会并且大大加强了这些机构和各企业之间的组织联系。同时，我们几乎在每个区里都成功地把布尔什维克以及跟他们并肩战斗的进步的党外工人推举到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和罢工委员会的领导岗位上去。

所有这些措施也就很自然地全面加强了我党对巴库工人群众的影响。

* * *

巴库工人代表会议预定3月11日开会，眼看就要开会了。我们决定充分利用会前这段时间准备即将来临的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战斗”。

参加工人代表会议的约有五百名代表，他们都是各工厂、企业和船舶委员会或直接由全体工人大会选举出来的。此外，当时在巴库积极开展活动的七个政党（布尔什维克、“古墨特”、“阿达列特”、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达什纳克党人、木沙瓦特党人）可以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工人代表会议；根据会议的规定，他们有权在会上做十分钟的发言。

讨论在即将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的行动方针时，我们决定在开会的第二天便向代表们提出一些原则性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参加会议的代表问题。这两个政党无论它的组织成分，还是它的纲领，都不是工人的政党，所以我们坚持他们的代表无权出席工人代表会议。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会议主席团的问题。我们决定提议改选当时的主席团，因为大多数主席团委员丝毫也不关心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

我们同“古墨特”的代表、阿塞拜疆议会中社会主义党团的成员卡拉耶夫进行了谈判。于是我也就认识了他。1917—1918年间，他住在梯弗里斯，并在那里参加了梯弗里斯孟什维克的“古墨特”组织（梯弗里斯当时还没有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古墨特”）。

卡拉耶夫在政治上是很成熟的。他支持我们的立场，并表示愿意同布尔什维克合作。此外，他还告诉我说，还有一个“古墨特”的成员古谢伊诺夫也同意他的

观点。

我们和“阿达列特”的领导人之一、布尔什维克巴赫拉姆·阿加耶夫也进行了同样的谈判。阿加耶夫和他所领导的组织早在1918年就曾同我们合作过。在当前的条件下，他可以成为我们可靠的战友。

我们同卡拉耶夫和阿加耶夫就一切问题商量好之后，就决定提名他们为工人代表会议新的主席团的候选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当时的主席是一个工人——丘拉耶夫。我们认为可以让丘拉耶夫在新的主席团中继续担任主席。我曾就这个问题同丘拉耶夫进行了秘密的谈话。我对他说，我们想要他继续担任代表会议主席团主席，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他要执行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中多数委员所通过的决议，而不能推行孟什维克党的政策及其委员会的指示。丘拉耶夫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他是可以信得过的。

保留丘拉耶夫工人代表会议首脑地位之所以非常重要，还因为如果我们推选某位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去担任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领导人的话，那末英国占领军司令部和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必然要对代表会议进行诽谤中伤，而这是我们必须加以防备的。丘拉耶夫的留任可以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到“放心”。通过丘拉耶夫我们同英军司令部以及地方政府进行谈判也容易得多，因为他们与丘拉耶夫已经很熟了。

此外，丘拉耶夫对于我们进一步争取工人，特别是争取那些倾向于孟什维克的工人，是很有帮助的，我们一刻也没有忘记必须争取这部分巴库无产阶级。

同时，考虑到我还要担任丘拉耶夫的副职（当时称为“同志”），我将要在主席团中确保执行布尔什维克党的路线。

在社会革命党人中，我们决定支持伊里英当选。他是“偶然地”参加社会革命党的，他更多地是属于进步的民粹主义的知识分子。总之，他是一个很正派的人。我们向他提出了和丘拉耶夫同样的条件。他欣然接受了。

记得我们在讨论这些候选人时，曾打算以后把他们全都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不久，我们就把丘拉耶夫争取过来了，他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卡拉耶夫也入了党。但伊里英没有入党。

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委员的候选人还有：年轻的共产党员列旺·米尔佐扬，他当时是巴库工会理事会理事和改选后的巴库党委会委员；党外工人群众科瓦利，他在担任巴库工会理事会主席时表现得很出色，在工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一年后，科瓦利参加了我党的队伍。）此外，我们还指定了三个同志为主席团候选人，其中有两个布尔什维克，他们是列万·果戈别里泽和伊万·阿纳什金。

这样，按照我们的方案，主席团的十名委员和候补

委员中代表布尔什维克路线的有六人，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党外群众一人，两个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个孟什维克。

这样的人选完全保证了我们在巴库工人代表会议的领导机构中拥有必要的多数。

代表会议开幕之前，到会的代表只有三百多一点。当会议主席丘拉耶夫宣布开会时，木沙瓦特党的代表站起来，声称这次会议不能认为是有全权的，因为并不是全体代表都到齐了。

会议主席和一些代表义正辞严地抗议木沙瓦特党人的这一声明。会议以绝大多数票确认本会议拥有全权，于是会议便开始了工作。

列万·果戈别里泽代表布尔什维克就会议程序问题第一个发了言。他首先要求剥夺达什纳克党人和木沙瓦特党人的代表权和发言权，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代表。同时，他补充说，那些当选为会议代表的工人和职员，虽然是这两个政党的党员，但并不影响他们履行代表的职责。这样，果戈别里泽并没有把参加达什纳克党和木沙瓦特党的代表本人排除在会议之外。

会议通过了这个建议。达什纳克党和木沙瓦特党退出了工人代表会议，表示抗议。

这样，我们就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但我们仍然面临着异常复杂的斗争。

我代表布尔什维克在会上作了长篇纲领性发言。在

发言中，我理所当然地要详细讲讲巴库委员牺牲的情形，并且不但要揭露英军司令部在这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还要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的真面目，以便造成形势，即更易于使这些政党丧失他们在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中的多数。

巴库委员是怎样惨遭杀害的，谁是这一惨案的罪魁祸首，应当说对于这些问题巴库工人至今还是不清楚的。妥协主义政党的头目们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把全部罪责都归咎于英国人。

根据会议的规定，我和其他政党的代表一样都只能做十分钟的发言。果戈别里泽十分了解与会代表的心情，他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巴库委员会提议给我半个小时的发言时间，因为我刚刚获释出狱，在狱中时我和巴库委员们在一起，当然也就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果戈别里泽的这个建议引起与会代表的极大兴趣。

大厅里齐声喊道：“让他讲！让他讲！不要限制时间！”“不限制时间”这个建议在会议绝大多数代表赞成的情况下被通过了。这个决定本身就是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第一个沉重打击。

在没有讲政治形势和巴库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任务之前，我先叙述了巴库苏维埃政权的暂时失败和二十六名巴库委员悲惨牺牲的经过。我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所扮演的叛徒角色，他们投靠英国人，从背后打击苏维埃政权；我指出他们和英军司令部是

一丘之貉，都是杀害我们同志的真正罪犯。当我指出“坐在这个大厅里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头头们双手沾满了巴库委员的鲜血”时，代表们群情激昂。他们站起来高呼：“刽子手！可耻！打倒社会革命党人，打倒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人！”我发现这时许多孟什维克吓的脸色苍白，象死人一样。他们被代表们的群情激愤吓得魂不附体。

然后，我根据当时苏维埃俄国所处的总的形势对巴库当前的情况作了分析，并谈到巴库无产阶级所面临的任务。

当时，在巴库还没有我们布尔什维克办的报纸。社会革命党人的《劳动旗帜报》只字不提我的发言中十分尖锐的政治内容（这篇发言我讲了约一个小时），仅仅摘要发表了我的那个发言。下面就是这篇摘要：

“俄国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队伍，他们正在为消灭压迫阶级、建立公正的制度而斗争；共产党倡导开展这种斗争。共产党的口号就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口号。无产阶级走的是一条阶级斗争的道路。苏维埃政权通过她一年半的实践向全世界无产阶级表明，要建立一个公正的制度，是完全可能的。苏维埃政权正在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并将继续斗争下去。俄国无产阶级的榜样促使西方也象我们苏维埃政权那样去做，德国立宪会议被解散就是一例。革命事业正在顺利发展，世界革命即将来临。如果俄国人正在摩尔曼和英国人进行战斗，那末巴库工人在这里便不能不是英国人的敌人。巴库无产阶级是世界无产阶级

的一支队伍，不能指望通过同英军司令部对话来取得胜利。只有通过罢工这个行之有效的手段才能取得胜利。罢工委员会没有负起它应尽的职责。罢工委员会不去开展积极的斗争，却低三下四地和汤姆森将军进行谈判。孟什维克在罢工委员会会议上的表现完全是一种背叛。他们在其出版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反对罢工，为罢工的失败制造舆论，损害工人的尊严，他们这样做只能使罢工归于失败。

我们应当采取什么政策呢？丘拉耶夫同志说得好，宁肯在众寡悬殊的战斗中被打败，也决不不经战斗就屈膝投降。共产党员坚决支持罢工，但认为罢工必须有组织地进行。

我们正面临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对于这场斗争，我们必须认真对待。我们认为我们队伍的战士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要使我们队伍中的战士真正是忠于工人阶级事业的。也只有这样的战士才能够和我们一起勇敢地投入战斗。

我认为，现在的罢工委员会必须改选。有些人卑躬屈膝地同汤姆森将军进行谈判，他们已经声名狼藉，不得参加罢工委员会。

代表会议主席团也必须改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实际上的和道义上的胜利。”

我发言之后，孟什维克代表罗赫林发言。他把我的发言说成是挑衅性的发言，是用分裂和瓦解工人队伍相威胁，等等。应当说，听众起初还是相当安静地听罗赫林讲话，但渐渐地人们便可以感到代表们的不满，从代表席上传来的喊叫声越来越多。有一个代表向主席喊道：“要遵守议事规则，超过时间了！”主席只得把罗赫林要求延长发言的问题提交会议表决。会议以压倒多数否决

了罗赫林的要求。表决时，罗赫林情绪激昂，脱下短上衣，满有把握地以为会同意他延长发言的时间，这下子他可要“大干一场了”。但是代表们不愿听他的发言，主席又提出让罗赫林把话讲完的第二个建议也被否决了。罗赫林满头大汗，狼狈不堪，穿上短上服，灰溜溜地离开了讲台……

会上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结果，完全出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预料。果戈别里泽代表布尔什维克就罢工问题发表了一篇声明，内容大致如下：“鉴于在中央罢工委员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据多数，而他们一方面暗地里和英军司令部秘密谈判，同时还在他们的报刊上反复宣传举行总罢工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做是在破坏罢工，要使罢工归于失败，所以布尔什维克党团被迫退出罢工委员会会议。

我们向代表会议声明，只要罢工委员会是由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就要反对由该委员会所领导的任何罢工。只要那些和英军司令部勾勾搭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仍然留在我们这个战斗的司令部里，任何罢工都是阴谋诡计。因此，布尔什维克党团要求立即改选罢工委员会，并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罢工委员会中清除出去。”

围绕果戈别里泽的声明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战。

代表会议最后以多数票通过了我们提出的关于选举工人代表会议新的主席团的建议，并委托主席团重新建

立一个中央罢工委员会，由主席团全体成员和每区各选派两名代表组成。经过表决，我们提出的会议主席团成员的名单全部通过。我也被选进新的主席团。

在闭幕会上，根据一些代表的倡议，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一致决定向当时正在莫斯科开会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发出致敬电，预祝大会圆满成功，并祝大会在劳动战胜资本的事业中获得胜利。

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巴库的同志们告诉我，早在1月中旬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上，由孟什维克倡议（在共产党员反对的情况下），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了一个向第二国际伯尔尼代表大会发出贺电的决议。而时间不过是过去了两个月左右，在同一个代表会议上绝大多数的代表却向第三国际、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致敬了！

记得这一切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时我心里想，巴库工人的政治觉悟提高得多么快啊！他们那种革命的战斗精神多么旺盛啊！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我们共产党，而这种信心又是多么坚定啊！

这时我不禁想起斯捷潘·邵武勉。还在巴库苏维埃政权遭到暂时失败的艰难的日子里，他就满怀信心地说，巴库工人很快就会通过自己切身的体验，认识到这些右派妥协主义的政党正在把他们拖向万丈深渊。

事实证明，邵武勉的话是正确的。

下面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巴库工人政治上正在迅速

觉醒。早在1918年12月，“电力”工厂的一个工人就在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上发言时说：“……把英国人请来维持秩序，可他们却是来压迫我们的。我们轻信了英国人的民主，以为英国人的到来将是俄国真正民主昌盛的日子，我们错了……同志们，我提议明天把这一切都停止，我们立即派船到阿斯特拉罕去接布尔什维克。”

与会代表对这位工人的发言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电力”工厂的这位工人非常正确地表达了工人代表对英国占领军的共同态度。有一个普通工人，他从前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而赞成邀请英国人的，可是今天在一系列现实的政治事件的教育下，完全改变了他原来的观点。要知道，1918年12月召开的工人代表会议是在孟什维克头目们的主持下进行的；而当时代表布尔什维克在那次会上发言的只有工人阿纳什金，他是我们巴库党委会委员。

“电力”工厂的工人代表的发言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头目们来说，有如晴天霹雳。他们在《罢工委员会消息报》上谈到这个问题时，不得不作如下的报道：

“在最后一次工人代表会议上，有一个发言者提到必须派船去接布尔什维克，而他的发言却赢得了掌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几个月前会遭到嘘声和口哨声的发言，现在却受到了鼓掌欢迎？其实原因也很简单。我们的外国‘家庭教师’^①的所做所为

^① 沙皇俄国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常聘请外国人为家庭教师。这里是指英国占领军。——译者

无一不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他们的评论都是正确的。尽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其他所有论点从实质上来说都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但是，他们对于我们‘盟友’的作用和任务的论断却是正确的，因而博得了某些工人的同情。这些高贵的外国人说是前来制止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干的却是另外一回事……最好让他们这些为布尔什维主义宣传的优秀鼓动家们直截了当地说一说他们在干哪一家的事：是民主的事业，无政府主义的事业，还是世界反动派的事业？……这一点我们心里是有数的，但愿对别人来说也不是什么秘密。”

这些有意无意的自供，反映了大多数巴库工人（其中包括那些仍在盲目追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工人）正处在彻底觉醒的过程之中。现实生活本身每时每刻都在加速这一过程。

就拿英国占领时期阿塞拜疆反动的霍伊斯基政府所干的叛卖活动来说吧。在英国占领者第二次进入巴库的当天，霍伊斯基政府公布了这样一个“布告”：

“告巴库市居民：

阿塞拜疆政府和盟军驻恩泽里的代表汤姆森将军经过谈判达成协议。根据这个协议，以汤姆森将军为首的盟军部队将于今天（11月17日）早晨进驻阿塞拜疆首都。

盟军的进驻不是有损于阿塞拜疆的独立及其领土主权的敌对行动。

一切国家机关和公共团体将照常履行它们的职权。

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持城市秩序。政府号召全体

公民安分守己，并且要对盟军以友好相待。

部长会议主席

Ф. X. 霍伊斯基

内务部长

Б. 杰万希尔”。

当然，这些政府领袖的心里很明白，英国“救星们”是根据什么条件来到这里的。他们把自己的代表派到恩泽里去见英国人，是绝非偶然的：在那里他们事先把一切事情都商量好了。英国人把所有的航运和铁路运输、石油工业和国家银行都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阿塞拜疆政府任何参预的情况下干的。巴库居民的一切生活秩序都是按照汤姆森将军的命令决定的。

在英国人的全部文件中，只字不提阿塞拜疆和阿塞拜疆政府。而阿塞拜疆政府对此也不敢提出异议和抗议。

道德上堕落到如此地步，真是令人难以想象！阿塞拜疆政府的虚伪和欺骗、入侵者的反人民的制度，这一切逐渐地擦亮了巴库工人阶级的眼睛，激起了他们的无比愤怒，终于在1918年12月爆发了政治总罢工。

这一切对于巴库工人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阶级斗争的锻炼。

在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会议开会之前，召开了巴库党委会会议。会上预先研究了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分工问题。这个分工后来得到主席团的批准。

有些企业不断送来工人们要求立即举行罢工的消

息，我们便讨论了应当采取的策略。我们决定采取一切措施，制止这一自发的运动。同时，我们已清楚知道，由于我们在组织上准备不足，所以越来越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群众自发的斗争要求，必须采取紧急措施，首先要迅速建立并巩固各区的党组织。我们决定让萨尔基斯·马麦迪亚罗夫、奇卡列夫、丘赫切涅夫、卡苏莫夫、普列沙科夫和雅库鲍夫集中全力进行党的秘密组织工作。指定了各区党组织的负责人，并确定了党的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相结合的各种形式。我们所依据的原则是，党的组织工作和我们的一切联系都应严格保密；以合法的身分出现的党的工作人员一旦出事，党的秘密组织仍能继续活动而不致受到破坏。当时党的组织工作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把那些由于种种原因仍没有积极参加党的工作的党员都召集起来。根据我们的估计，当时在巴库这样的党员不下二三百人。

第二个任务是，大胆吸收工人群众以及过去虽然参加过社会革命党、但在反对英国占领中表现坚决并积极参加罢工的人入党。

党委会专门讨论了如何在阿塞拜疆工人中间开展工作的问題。关于这个问题决定召开由卡拉耶夫、古谢伊诺夫和阿加耶夫参加的专门会议进行研究。

党委会还讨论了关于共产党员要积极参加各区工人代表会议和罢工委员会领导机关候选人提名的一些具体建议。

工人代表会议后的第二天，我们参加了新的主席团的第一次会议。

丘拉耶夫当选为主席团主席；我和社会革命党人伊里英当选为副主席。我们当即商定，未经主席团委员的讨论，主席团主席不得独自做出任何决定。我们还商定，如果主席团委员被捕，主席团三个候补委员便自动递补；如果主席团主席或副主席被捕，则由果戈别里泽和阿纳什金分别代理职务。

* * *

应当指出的是，石油工业资本家、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和英国占领军司令部对待工人的行为越来越具有挑衅性。石油工业资本家不但拒不接受工人关于改善劳动条件的合理要求，而且还停发工人的工资。

形势十分紧张。

3月15日，中央罢工委员会和各区罢工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各区的代表说当前工厂企业的情况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工人群众个个义愤填膺。

例如，诺贝尔石油加工工业（在黑城）的代表宣称：他们已经开始了罢工，不给工人发工资，就不复工。有些人发言指责诺贝尔的工人单独行动，不过他们同时提议说，如果工业资本家坚持不发工资，那末，便在最近两三天举行经济总罢工。

伊里英表现得比谁都“左”。对于诺贝尔工人的单独行动他是不同意的，但他同时却建议在即将举行的罢工

中除了提出经济要求之外，还要提出政治要求。

果戈别里泽和米尔佐扬代表布尔什维克发言。他们反对把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混在一起。他们赞同这样的意见，即两、三天之内如果不给工人发工资，就宣布举行经济总罢工。

社会主义者、阿塞拜疆议会议员阿比洛夫和别皮诺夫也被邀出席罢工委员会会议并在会上发了言。他们坚决反对政治罢工，而支持经济罢工。他们令人信服地指出，拖延发放工资是和英军司令部的一系列行动有密切联系的。别皮诺夫指出，特别是英国人为了支付他们自己的开销，竟然从银行提取一亿卢布，结果造成银行现金短缺。

别皮诺夫和阿比洛夫对经济罢工的正确态度，在当时来说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使得那些当时受木沙瓦特党人影响仍处于动摇状态的一部分阿塞拜疆工人的态度坚定起来，并促使他们和巴库的其他工人们团结起来。

从保存在档案馆里的我的一次发言摘记中，可以了解中央罢工委员会会议上争论的一些情况。

“米高扬指出，拖延发支付券和薪金，完全是英军司令部搞的鬼。它眼见巴库无产阶级正在准备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便从3月7日至17日故意不给工人发工资，其目的就是要破坏政治罢工，用百万富翁利雅布申斯基的话来说，就是企图用‘饥饿的瘦手’来扼杀巴库的革命运动。这一切阿塞拜疆政府和石油工业资本家都是知道的，并且是得到了他们的全力支持的。面对着

反革命联合势力的这些阴谋诡计，我们绝不能向他们的挑衅屈服和按照他们的意志行事。但是，不管怎么说，诺贝尔工人的自发的经济罢工已是既成事实。尽管我们谴责了诺贝尔工人的这种单独行动，但有一点却是不能否认的，即诺贝尔的工人们有旺盛的革命精力以及内部的‘诺贝尔式的’组织性，虽然他们和巴库的其他无产阶级没有密切联系。他们等待工会理事会的答复，整整等了四天，却没有得到答复。我们提请全体同志严肃而冷静地对待这个重要问题，而不要去考虑这些人或那些人的名誉和自尊心。我坚决反对伊里英提出的关于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同时举行的建议。目前，工人正在挨饿，只能举行经济罢工。

但是，如果可能的话，还是应当避免举行这次罢工。因为当前需要进行争取签订集体合同的斗争。应当用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立即发放工资。必须立即召开代表会议；如果他们仍然不肯发放工资，这时再宣布经济总罢工……”

布尔什维克提出的相应建议在罢工委员会上被通过了。

所有这些措施随即收到了应有的效果。阿塞拜疆政府当即通知工人代表会议，说他们为此已经采取了紧急措施。工资确实很快就发了下来。

三天之后，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召开了紧急会议。

会上宣读了阿塞拜疆政府的来信说，工人的大部分工资已经拨下来了，而其余一部分工资也将于近期全部拨下来。于是，主席团通过决议不再宣布进行总罢工。但是各地方已经开始举行的罢工，直到工人领到全部工资之前仍然不要停止。这样便很快消除了冲突。

在主席团的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工会和石油工业资本家之间签订集体合同的问题。科瓦利就这个问题做了报告，他说工会和石油工业资本家的谈判出现了重大分歧。新合同中提出的四十九项要求，石油工业资本家只接受其中的七项。主席团决定在最后签署集体合同草案之前，把该草案交给巴库各企业的工人进行广泛的讨论。

在会议期间，我还提出了用俄语和突厥语（阿塞拜疆语）出版《工人代表会议消息报》的建议。会议通过了我的建议。

这些问题当天便提交工人代表会议紧急会议批准。代表会议对会议主席团和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全部活动表示完全同意，并批准了我们所通过的全部决议。

* * *

两天以后，即3月20日，二十六位巴库委员惨遭杀害整整六个月了。为此，巴库党委会向工人代表会议提出关于宣布3月20日为追悼日，举行一天罢工，并召开群众大会和集会悼念遇难同志的建议，要求会议讨论。代表会议一致通过了这项建议。

当天，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通过了告全体巴库工人书。告工人书最后号召说：

“工人同志们，今天我们要汇合成一个声音，向卑鄙的刽子手、可耻的叛徒以及无产阶级的一切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宣布，我们的领袖——伟大的战士是被刽子手罪恶地杀害的。他们虽然牺牲了，但是他们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他们所从事的神圣

事业永垂不朽。这一事业蓬勃发展,更加波澜壮阔。这是我们对死难烈士的最好纪念。我们将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为死难烈士和我们的共同理想而加倍努力奋斗。

让我们把今天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抗议,作为献给死难烈士的花圈,放在新建的墓地上吧!

同志们!我们的领袖和同志们在布满荆棘的斗争道路上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庄严宣誓:我们将和他们一样忘我地、无限忠诚地继续进行斗争!

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中央罢工委员会宣布举行为期一天的罢工。照事先规定的那样,3月20日那天,除自来水厂、医院、药房、电报局、一部分面包房以及市发电站只在晚上供电之外,巴库的所有企业一律停止工作。

巴库党委会编辑并大量出版了纪念巴库委员的报纸专刊。

我在为这份报纸所写的一篇长文中,详细地叙述了巴库委员遇难的经过,揭露了巴库的右派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达什纳克党的头目们在这一暴行中所扮演的罪恶的叛卖角色。

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整整半年前,在里海以东地区荒无人烟的草原上,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暴行。一小撮反革命匪徒在南俄反革命匪帮头子们的默许下,未经审判和审讯,惨无人道地枪杀了领导巴库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数十年的高加索共产党的伟大领袖。这些怯懦的凶手和可耻的叛徒在杀害手无寸铁的英雄时,对他们进行了难以想象的拷打和卑鄙的侮辱。那沉寂的

草原和惨淡的月光，是这一卑劣而悲惨事件的冷漠的见证人。正是在月光照射下的草原上，那些怀抱崇高理想的革命者被野蛮地杀害了。

今天，当我们悼念那些壮烈牺牲的同志们的时候，巴库的无产阶级应该把一切其他工作和其他想法都放在一边，隆重地纪念自己领袖的英勇就义。今天，全体巴库无产阶级要对厚颜无耻的帝国主义者及其应声虫们表现出极大的仇恨和蔑视。巴库无产阶级应该满怀豪情地、勇敢地高声宣布，他们的伟大领袖的言论和行动，不是‘旷野的呼声’无人响应，而是已在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中深入人心，指引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并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着他们。

世界帝国主义强盗们野蛮地枪杀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大家庭中的伟大成员，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工人群众便无人领导了。但是，他们打错了算盘。因为要使无产阶级大家庭丧失领导，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伟大公社里的每一个成员生来就是领袖和坚强的战士。我们的领导人与我们永别了，但是我们将替代他们。他们战斗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们将继续斗争，直到彻底推翻我们的怯懦的敌人的政权。他们牺牲了，但他们永远活在我们中间！”

这份报纸成了揭露英国占领者及其帮凶——右派社会主义政党的凶残嘴脸的控诉书。

巴库无产阶级广大群众实际上从这一期报纸中才了解到巴库委员牺牲的详细情况。因为一周前我在工人代表会议上所做的那个发言，在发表的时候有关巴库委员牺牲的那部分被删去了。所以我那个发言只有参加会议

的代表和从代表口中听到这件事的少数工人知道。

工人们一致拥护我党发出的3月20日罢工一天的号召。那一天几乎所有的企业都停止了工作。

巴库全城沸腾了。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的群众大会。布尔什维克、工人代表会议的代表、进步工人纷纷在大会上发言。

在大街上，在剧院里，在食堂，——总之，在一切工人能够聚会的地方，工人们都显示了他们的团结一致，显示了他们对工人代表会议的领导机构的信任，归根到底就是对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的信任。

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英国占领军司令部和阿塞拜疆政府都未敢阻挠罢工和集会的进行。

那天，我在黑城诺贝尔食堂举行的群众集会上讲了话。这个食堂可容纳一千人左右。我讲完话之后，工人们纷纷发言。当讲到巴库委员牺牲的情形时，许多工人都哭了。使我深深感到工人们对于巴库委员的牺牲是万分悲痛的。我还记得一个老工人的发言，他说：“对于我们领袖的牺牲，应该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去保卫他们。”他回忆起苏维埃政权失败前夕，1918年7月25日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也就是在这个食堂里，也就是在这些工人群众面前，阿廖沙·查帕里泽作了最后一次发言。这位老人回忆起当时不让查帕里泽发言的情形。“我们失掉一切希望，当时我们不相信苏维埃政权能够保卫住巴库。我们上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当，同意

邀请英国人，反对我们的领袖。对于他们的牺牲，我们的确是有罪的。我们确实是糊里糊涂地犯了罪，而当我们已经觉醒，并且明白了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的领导人已经不在人间了。他们的牺牲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为我们开辟了斗争的道路。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团结在他们牺牲时高举的旗帜周围，并用这个实际行动来补偿我们的过错。”老工人的发言给大家留下了强烈的印象。

大会结束后，我来到马伊洛夫斯基剧院。我又在那里的群众大会上讲了话。我是好不容易才进了剧院的。许多工人挤不进剧院，就站在大街上；人们不顾事先宣布的安排，自发地从城里其他地区涌到这里来。附近的几条街都挤得水泄不通。

此时大会进入高潮。到会的工人群情激昂，以致使我在开始时觉得，我们简直有点掌握不住大会的领导权了。有一个水运工人发言时说，英军司令部已把直接杀害邵武勉、查帕里泽和其他委员的凶手——德鲁日金和阿拉尼亚弄到巴库，要取道巴统送到英国去，他们现在正在码头上。这时群情更加激愤，成千上万的人发出吼声。人们高喊要到英军司令部大楼去，要求交出凶手；如果不交出凶手，就捣毁大楼。

我们知道，这种轻率的自发的冲动，其结果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流血，会使我们自己的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因为一万五千名英国警备队要枪杀手无寸铁的示威的工人群众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我们决定制止这种危险的

行动。我们坚定地指出，这样做只会对我们的敌人有利。工人将白白地流血牺牲，而又达不到我们的目的。我们指出，死难烈士——我们今天正在这里开会悼念他们——是一向反对工人阶级进行这种没有组织的斗争的。我们建议由参加大会的群众推出代表组成代表团，到英军司令部去，要求他们交出凶手依法审判。此外，我们还提议在巴库的各主要大街有秩序地进行群众示威游行，显示我们的强大力量，表明我们对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极端仇恨。

尽管很多人还要向英军司令部“进军”，但大会还是通过了我们的建议。有一个水运工人提议说，如果英国人企图把德鲁日金和阿拉尼亚送到波斯去，那末水运工人就要拒绝送他们去。他的建议得到了与会群众的赞同。铁路工人也表示了同样的态度。

到英军司令部去的代表团已经选派出去了。参加大会的群众和聚集在大街上的成千上万的工人一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们高唱革命歌曲，穿过巴库的大街，来到工人代表会议及其主席团的所在地——工人俱乐部。我记得有这样一件突出的事。当我们脱下帽子，唱着《你们牺牲了生命》的歌曲在大街上行进时，在路旁闲看的人群不禁也脱下帽来。一个白匪军官站在人行道上，看着游行队伍走过，没有脱帽，立即有人厉声喝道：“脱帽！”那个军官不得不摘下帽子。

游行队伍很有秩序地通过了巴库城的各条主要大

街，最后又回到刚才那里开过大会的工人俱乐部。

铁路员工履行了他们的诺言。他们仔细地检查了全部车辆，为的是不让德鲁日金这个枪杀巴库委员的主要凶手和在克拉斯诺沃斯克逮捕巴库委员的阿拉尼亚跑掉。

英军司令部拒绝交出凶手。英国人怕在火车上人们会把德鲁日金和阿拉尼亚撕碎。他们还是想了一个办法，骗过了我们。正如后来我们才知道的，他们用装甲车取道谢马哈把凶手送到阿哲-卡布尔车站。他们让德鲁日金和阿拉尼亚偷偷摸摸地坐上火车到巴统去了。

追悼巴库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日子，成为大规模显示共产主义思想在巴库取得胜利的日子。我们亲眼看到的一切，使我们确信我们那些终生难忘的朋友们的业绩和形象仍然活在巴库工人的心中。他们的一生以及他们的伟大的革命业绩不断鼓舞工人继续为夺取共产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他们仍然和我们在一起，他们仍然活在我们中间，并且领导巴库无产阶级前进。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不能不为此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巴库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这一点我们的敌人也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我们并没有陶醉于初步的成就，因为工人运动达到的水平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应当领导这个运动。

* * *

那天晚上，我们聚集在巴库党委会，大家心情都非常

激动。我们互相交谈感想，对于当前的形势做了评价，对于今后的情况做了预测。我们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必须更积极地开展工作，在各区建立坚强的党组织。还必须在工会中也取得领导地位，把各区的工人俱乐部统统置于党组织的领导之下，使俱乐部成为对工人进行群众性政治工作的基地，并利用它们作为各区和工厂企业党组织进行联系和秘密接头的地点。要尽一切办法同阿斯特拉罕，并通过阿斯特拉罕同莫斯科、党中央取得经常联系。

在此之前，无论从边区那里或苏维埃俄国的领导机关那里，我们都没有收到过任何指示。我们不得不象通常所说的那样，“闭门造车”，在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事件中，要由我们自己确定斗争策略，独自作出决定。

事态的发展不断把我们推到新的更加激烈的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去。

在四月召开的一次巴库党委会上，我意外地得知同志们早已建立了一个隶属于巴库党委会的战斗小组。

这一方面使我很高兴，但另一方面，参加这个小组的基戈扬、科瓦列夫和阿利哈尼扬同志在党委会上的发言使我大吃一惊。他们说，他们的小组组织得很好，他们已经准备好一大批武器，只等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夺取巴库政权的时间了。更使我吃惊的是，党委会的许多委员都支持发动起义的建议，甚至于使我感到有些人马上就要投票赞成这项建议了。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党委会委员委托我和战斗小组一起把情况调查清楚，并在下一次的党委会上提出自己的意见。

战斗小组的成员中，我最了解阿利哈尼扬。他是我小学时的同学，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比我小两、三岁。他对革命忠心耿耿，受到我们的极大信任。当然我也知道格沃尔格·阿利哈尼扬在少年时代曾倾向于无政府主义，但那只是“青年人的热情奔放”，当然在他的性格中确实也有些蛮干的成分。基戈扬是高加索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曾经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和巴库委员们同时被捕。在我们回到巴库之前不久，他就从克拉斯诺沃斯克监狱被释放出来。当我们到达巴库时，他已经在那里的地下党组织中做了两个月左右的工作了。他比我大几岁，在旧军队里服过役；他被认为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地下工作者。战斗小组的第三个成员 П. 科瓦列夫的年龄最大，来自彼得罗夫斯克，曾经在彼得罗夫斯克党委会工作过。从前他是属于最高纲领主义派的，就是现在他还有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左倾观点。

当我同他们三个人共同对情况作了全面分析之后，使我甚为惊异。在武器和干部力量如此有限的情况下，他们怎么能认真地谈论起发动起义的事来了呢！我批评他们对武装起义采取一种不严肃的冒险主义的态度。他们辩解说，他们依靠的基本力量是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水兵。但这个论据也是不值一驳的，因为大部分水兵当时

已经被捕，很多水兵被解除了武装，还有一些水兵不知隐蔽在什么地方。目前进行秘密活动而在海军中又没有暴露的水兵，为数并不多。我们这三个同志还不认输，不过看来心里都已认识到他们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在巴库党委会会议上，当着这三个同志的面，我没有详细地谈这个问题，只是说战斗小组发动武装起义的实力还不足；会上我还就武装起义问题的政治方面谈了自己的意见。

我说，即使我们有足够的武器和战斗小组，在目前条件下发动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也是冒险，其结果只能是使我们自己的组织被彻底摧毁。工人代表会议里有不少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工会的领导权大都仍掌握在他们手里。各区党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工人群众斗志昂扬，这是事实，但是他们还缺乏应有的组织性。我们同党中央和梯弗里斯边区党委会都没有取得联系。北高加索和里海以东地区在反革命势力的手中，只有阿斯特拉罕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但我们同阿斯特拉罕又没有任何联系。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对付不了驻扎在巴库的一万五千名英国占领军的警备部队和数千名阿塞拜疆士兵。而苏维埃俄国什么时候才能来援助我们，我们谁也不知道。上面就是我那次发言的要点。

所以，在结束我的发言时，我建议战斗小组继续聚集力量和收集武器，而关于武装起义的问题等到适当的时候再加以研究。

党委会的委员们不但同意了我的意见，甚至对我这样地提出问题也感到很满意。根据种种情况来看，战斗小组的三个人都是非常坚强的同志，但是他们有些冒进。在此之前，他们一直在向党委会委员施加压力。我同他们开门见山地谈过话之后，党委委员才得以摆脱他们的压力。

每当回忆起这些日子，我就越发对斯捷潘·邵武勉说过的很多见解如此有预见感到赞叹。这里仅举他对里海舰队水兵所作的一次劝告为例。

应当说，里海舰队的历史总是使人们颇感兴趣的。

1917年10月，里海舰队站到布尔什维克一边，这对于把政权转归巴库工人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革命斗争是起了不小作用的。但随后不久，该舰队的人员变动很大。许多进步的很积极的水兵离开了舰队，致使后来在反对土耳其-木沙瓦特联军保卫巴库战斗的紧急关头，水兵们上了社会革命党人的当，其中一部分水兵被英国人通过社会革命党人加以收买，投票赞成邀请英国人来巴库。

斯捷潘·邵武勉曾经对里海舰队水兵尖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当时对水兵们说，你们很快就会看到自己犯了错误。最近几个月来在巴库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擦亮了这些受骗的水兵们的眼睛。他们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卑劣性质，非常后悔。其中绝大多数又重新站到苏维埃俄罗斯方面来。不管怎么说，英国占领军第二次进入巴库之

后,里海舰队的水兵已同巴库工人并肩战斗,共同反对占领军。同志们曾对我说,1918年12月,巴库工人政治总罢工胜利结束的那一天,里海舰队所有战舰大炮齐鸣,祝贺这一胜利。

对于英国占领军司令部来说,里海舰队是一块啃不动的骨头。里海舰队是海上的主宰者,而且是当时公开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英国人当时还来不及把他们的舰队调来。于是围绕里海舰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有的孟什维克在工人代表会议上发言,要求解除里海舰队的武装,把它改编成普通的商船队。有些孟什维克(例如罗赫林)建议把舰队完全交给阿塞拜疆政府指挥。英国人则想把舰队交给邓尼金分子。而共产党员则力争把舰队开到阿斯特拉罕去,归苏维埃政权指挥。

1919年2月,英军司令部向里海舰队发出解除武装的最后通牒。这是一个信号,促使舰队根据巴库党委会的决定,立即起锚离开巴库港开赴阿斯特拉罕。果戈别里泽同志作为巴库党委会的代表和舰队一起去阿斯特拉罕。

但是,伏尔加河三角洲的冰还没有溶化,无法到达阿斯特拉罕。舰队又折回巴库。舰队一到巴库,就被解除了武装,大批水兵被遣散,“不可靠的”、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和军官被逮捕。巴库的共产党员们通过工人代表会议想尽一切办法帮助舰队的水兵,阻止对他们进行遣散和迫害。但是这些努力大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我们的一些水兵同志费尽很大的努力才算从英国人的魔掌中逃出来。不久,我们通过一项决议:通过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向英国人发出要他们释放水兵的最后通牒。英国人拒不接受,但最后还是被迫做了让步。约有七十名水兵被释出狱。这一胜利鼓舞了我们的斗志,并且更加巩固了我们的阵地。

另一方面,邓尼金反革命势力也越发猖狂起来。白匪军开始巩固他们在达格斯坦和里海的阵地。一切迹象表明,这个计划是英国人提出的,他们指望无论如何也要在里海拥有一个可靠的支柱。

英国人把“埃马努伊尔·诺贝尔号”、“史密特号”这样一些商船和油槽船都装上远射炮,并换上他们自己的船员。同时,英国占领者开始建立由他们统一指挥的邓尼金舰队。为此,他们把一些已经武装起来的商船交给邓尼金,让这些船在里海北部执行警戒和巡逻任务。他们还准备把整个里海区舰队和当时留在巴库的全部军事装备都交给邓尼金。

看到这种情况,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发表了一篇类似外交性的声明:鉴于军舰和军事装备都是俄国的国家财产,而这个国家目前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我们认为决不允许把这些财产转交给任何人。我们要求在俄国全境完全恢复秩序之前扣留所有舰只和军事装备。

虽然在那种条件下采取这样的外交行动,是否能取得成功是没有把握的,但是我们终于在里海舰队大多数

水兵的支持下，扣住了这些军舰。诚然有部分军事装备已落入邓尼金匪帮的手中。

当时能否把军舰扣留很久，我们把握不大。于是我们决定让我们自己的同志——那些在军舰上当过水兵的人把军舰上的一些贵重的机器部件卸下来，藏在可靠的地方。这一行动进行得很顺利。这个行动非常重要；内行的同志断定，这些部件只有到彼得格勒才能搞到。这样一来，对于反革命势力来说，这些军舰就等于报废了。

回忆这段时期，我不能不讲一讲我们当时怎样营救一大批革命工人出英国占领军监狱的情形。

处于地下状态的里海以东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得知我们回到巴库不久，共产党人便掌握了工人代表会议的领导权，于是便派代表前来巴库。

在工人代表会议召开的一次会上，我们请他们发言。他们向代表会议致敬，对巴库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表示钦佩，并且声明里海以东地区的工人完全支持这一斗争。同时，他们请求代表会议运用自己的影响，要求英国占领当局释放关在里海以东地区监狱中的革命工人。

工人代表会议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支持这一要求。我以代表会议的名义致答词。在全场一致赞同下，我宣布工人代表会议将采取一切措施营救里海以东地区的同志们。

我们随即致函英军司令部，要求释放关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基考耳-阿尔瓦特、阿什哈巴德和恩泽里监狱里

的所有政治犯，并把他们交给工人代表会议。（如果这些同志获释后仍然留在那里无论如何也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因为他们很可能再度成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

作为这一要求的坚强后盾，我们警告英军司令部说要发动政治总罢工。

进行了大约两周的顽强的谈判，最后英军司令部终于被迫让步，释放了所有政治犯，并把他们交给了工人代表会议。

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了！

* * *

1919年3月，我们召开了巴库党代会，这是二十六位巴库委员牺牲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

记得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巴库各区的三十名代表。会上我们听取了关于政治形势和各区党组织情况的简单介绍。

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几乎巴库的每一个工业区都形成了坚强的党员核心。领导这些核心的有阿纳什金、果戈别里泽、达弗拉托夫、卡苏莫夫、马尤麦佳罗夫、米尔佐扬、普列亚沙科夫、罗焦诺夫、萨尔基斯、奇卡列夫、雅库鲍夫等同志。在巴依洛夫、比比-埃巴特、巴拉汉、苏拉汉、扎勃拉特，在黑城和白城，在巴库的车站区、市区和港口区，在一系列采油场和企业中都有党的支部在活动。这次党代会后，这些支部分别并入各区党委会领导下的各区党的组织。

但是，党的工作仍不能适应工人运动普遍高涨的形势。许多企业只有一两个党员。不少企业，特别是小企业，连一个党员也没有。那些在巴库经历过一系列事件而仍然生存下来的共产党员虽说都是党的积极分子，但是要他们去完成生活提出的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还是准备不足的。例如这些同志还不象那些大多数没有被捕、判刑和驱逐出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那样为工人们所熟悉。

会上发言的同志列举大量事实，说明被选进工厂委员会和工人代表会议的党外工人群众和过去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表现很好。工会的工作也有了改进。会上我们还决定了这样一条策略路线：支持表现积极的党外工人群众，在思想上给他们以更多的影响，信任他们，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培养他们入党。

会议通过决议：在最近一周之内要分别召开区的党代会，选举区委会，并立即着手在各企业中恢复党的支部；决定吸收在最近几个月的严酷事变当中表现好的党外群众入党。（和普通的候补期比起来，这是考验一个新党员的最好形式。）

代表会议很重视在穆斯林工人中间进行工作的问题，而这方面的工作是需要大力改进的。

在阿塞拜疆工人中进行工作的是“古墨特”组织。当时这个组织的成员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动。

在这里或许需要提一提 A.B. 尤西弗扎杰，他曾代表

原“古墨特”(隶属于我们巴库党委会)出席了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那次代表大会上,他在结束自己的发言时说:“……我希望党对我们困难而又重要的工作给予多方面的支援。”

随后,大会执行主席维·巴·诺金宣布:“同志们,我谨以代表大会的名义向参加我党的穆斯林同志们和初次参加我们代表大会的代表表示欢迎。1905—1906年间我曾经在巴库做过一段工作,所以我很了解‘古墨特’的同志们进行了多么艰巨的工作,为党做了多么大的贡献……”

我建议大家请求中央委员会给‘古墨特’以物质支援和其他一切支援。”

代表大会一致通过了诺金的建议。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巴库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之后,共产党组织“古墨特”的领导人和一些著名活动家到苏维埃俄国去了。留在巴库的参加“古墨特”的布尔什维克处于地下状态。俄国共产党(布)巴库党组织一开展活动,他们便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这时,参加“古墨特”的孟什维克领导人从梯弗里斯来到巴库。他们大都是原南高加索议会以及后来的木沙瓦特党人控制的议会中社会党党团的成员。他们到巴库后便开始了活动,同在梯弗里斯一样,用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古墨特”的名义。

1919年春季在巴库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之后,布尔什

维克对“古墨特”领导人的影响有了显著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便和“古墨特”成员中的右派分子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在我们面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怎样通过“阿达列特”（联合在波斯出生的阿塞拜疆人的组织），特别是“古墨特”来加强对阿塞拜疆人的政治工作？因此决定同参加“古墨特”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和“阿达列特”的领导人进行协商。

在“阿达列特”的领导人中，我还清楚地记得三个有才干的工人——阿加耶夫兄弟。这三位兄弟虽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是却具有领导的才干。他们都有丰富的政治经验，无限忠于共产主义事业，忘我地，甚至可以说是狂热地信仰党的思想。他们积极参加所有的会议并和共产党员一起战斗。

党代会上，没有就我们布尔什维克组织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专门做报告，尽管代表们在发言中关于这个问题谈了很多意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分歧的，因为早在工人代表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就基本上确定了我们行动的路线。

在那个时期，迫切需要解决同设在梯弗里斯的高加索边区党委会建立经常联系的问题。早在1918年秋天，因为孟什维克政府迫害格鲁吉亚的布尔什维克，所以边区党委会大多数委员以及党委会便迁到已经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弗拉基高加索（今称奥尔忠尼启泽）去了。边区党

委会还有几个委员留在梯弗里斯，他们起着南高加索领导中心的作用。北高加索被邓尼金分子侵占以后，边区党委会的领导干部就秘密地从弗拉基高加索和巴库转移到梯弗里斯，并逐步整顿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地区的工作。但是他们的力量未能达到巴库。

因此，代表会议委托巴库党委会派代表到梯弗里斯去，同边区党委会讨论当前的所有问题，其中包括讨论最近将在巴库，而不是在梯弗里斯召开一次全高加索党代表大会的问题。所以要在巴库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这是因为当时巴库的政治生活蓬蓬勃勃，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暂时比较平静。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又不能同时离开巴库，这也是在巴库召开党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理由。巴库代表会议选出了出席全高加索党代表大会的代表——果戈别里泽、阿维斯、阿纳什金、奥尔加·科尔涅耶娃、利达克、萨尔基斯和我。（但是后来因为会议的筹备工作做得不好，边区党委会取消了这次大会。）

代表会议同意巴库党委会所执行的政策，选举产生了新的俄国共产党（布）委员会。三月份以前的巴库党委会并不象通常那样是由党代会选举的，而是通过遴选的办法产生的。有时客观条件十分艰难，不可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党的代表会议，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内是常有的。会议委托再度当选的党委会在各区大力开展对阿塞拜疆工人的工作，吸收在阿塞拜疆人中有影响的工人积

极分子参加工厂、企业委员会和各区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并把主要精力用于“古墨特”组织的工作。

第二天，我们便会见了“古墨特”的代表——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委员阿利·盖达尔·卡拉耶夫和米尔扎·达乌德·古谢伊诺夫。“阿达列特”领导人——巴赫拉姆·阿加耶夫也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见。我方参加会见的有：果戈别里泽、萨尔基斯、阿纳什金和我。我们说明了我们对于巴库总的形势的看法，我们说，我们认为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对阿塞拜疆工人和“古墨特”的工作方面。他们也认为，目前阿塞拜疆工人中只有一小部分参加革命斗争，有一些工人仍然受木沙瓦特党人的影响。他们也同意这样的意见，即“古墨特”在这些工人中间的工作是做得很差的。我们请同志们注意：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古墨特”的人员在许多地区反对我们的路线了。阿加耶夫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他介绍了“阿达列特”今后的计划，并向我们保证，波斯工人将支持我们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将与俄罗斯和亚美尼亚的工人一致行动。阿加耶夫提出让“阿达列特”的成员参加共产党支部会议，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何况在许多地方实际上已经这样做了。我们答应他们就这个问题向各区党组织发出指示。

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卡拉耶夫和古谢伊诺夫都能够正确地理解我们。但是，他们也谈到了他们遇到的实际困难。他们完全能够推心置腹地跟我们谈，而我们对他们也可以象对待真正的布尔什维克那样去信任。卡拉

耶夫和古谢伊诺夫还提到米尔法塔加·穆谢维和阿舒姆·阿利耶夫，说他们两个人也是完全可以信得过的。（许多“古墨特”领导人持有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

于是我们提出已经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古墨特”成员应当立即脱离孟什维克，因为目前工人运动正处于高潮，大多数工人群众向左转，这时如果仍然保持联合的“古墨特”，那只能对“古墨特”中的孟什维克有利，而不利于共产党人。

卡拉耶夫性格软弱，没有立即同意分裂，——这样的分裂对他来说，将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急剧的变化；虽然如此，他还是答应要了解一下他在“古墨特”领导中的同事们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并弄清“古墨特”代表会议的筹备情况，以确保拥护布尔什维克的人能在会上取得优势。古谢伊诺夫赞成卡拉耶夫的观点。

我们同意了他的意见，因为要让群众根据他们亲身的经验去认清“古墨特”中的孟什维克（他们善于利用穆斯林劳动群众中落后分子的民族情绪搞鬼）的妥协和叛卖的本质，也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我们一致同意参加“古墨特”的布尔什维克要继续留在议会里，并利用议会的讲坛来揭露政府所推行的反人民的政策。

1919年4月25日在工人俱乐部召开了“古墨特”代表会议。会上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展开了一场尖锐的斗争。结果，“古墨特”的十一个领导人中有七个人

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是：卡拉耶夫、古谢伊诺夫、穆谢维、阿利耶夫、阿加扎杰和另外两个人。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俄国共产党（布）巴库党组织正式提出“古墨特”的分裂和建立共产党的“古墨特”组织问题。不久这也就实现了。

我们会见“古墨特”和“阿达列特”的代表一两天之后，果戈别里泽、阿纳什金和我便动身到梯弗里斯去参加边区党委会的会议，并贯彻巴库党委会所通过的决议。

当我们建议召开全高加索边区党代表大会，甚至在选举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的时候，我们深信，边区党委会是不会反对我们提出的在巴库召开这次大会的建议的。因为早在1918年12月，设在弗拉基高加索的原边区党委会就曾要北高加索的党组织于1919年1月派代表参加在弗拉基高加索召开的边区党代表大会。当时，在巴库以及在全阿塞拜疆都还没有恢复党的组织。我已经说过，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的党组织遭到了破坏，有的共产党员被捕入狱，有的隐蔽了起来，许多共产党员到北高加索参加保卫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战争去了。因此，许多党组织迫于当时的形势没有能够派代表参加边区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最后还是于1919年1月在弗拉基高加索召开了。但是，考虑到情况非常复杂，代表大会宣布本大会拥有全权。边区党委会也就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

现在，局势发生了变化，召开全权的党的代表大会不

仅是切实可行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许多与革命的工人运动进一步发展有关的原则性问题有待解决。团结并聚集所有党组织的力量的问题，以及在考虑到苏维埃俄国所处的总的形势的情况下制定统一的策略的问题，都非常尖锐地提上了日程。我们需要同边区党委会取得经常的密切联系，而没有建立这种联系的原因，就在于边区党委会里连一个巴库的代表也没有。

为实现南高加索工人的联合而斗争

与友人相逢；在亲人中间；巴库工会代表大会；
关于苏维埃问题；乘小船到苏维埃阿斯特拉罕去！

在秘密接头处，我们同边区党委会的同志们取得了联系，并商定要进行一次详谈。幸好边区党委会的全体委员当时几乎都在梯弗里斯。有的委员在库泰依斯，但他们也赶来同我们相会。

边区党委会的会议是完全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定召开的。我们大家好久没有见面了，所以一见面都感到十分高兴，格外亲切。我们亲如兄弟般地互相拥抱，共同回忆过去的老朋友。梯弗里斯的同志们怀着极大的兴趣期望我们详细地向他们介绍巴库的情况。关于我们的情况他们听到很多传说，这些传说基本上都是好的，但他们差不多没有掌握确实的情况。

我们讲的情况引起边区党委会的同志们很大的兴

趣。他们为巴库党组织的迅速恢复及其在工人运动中领导作用的增强而感到高兴。

我们也请边区党委会的委员们向我们介绍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情况，边区党委会的工作情况，党在这里的力量；请他们说明为什么边区党委会没有积极主动地同巴库建立联系；在巴库非常缺乏领导干部的情况下，为什么不派干部来支援我们。

从梯弗里斯的同志们所谈的情况中，从奥拉赫拉什维利所谈的库泰依斯的情况以及姆拉维扬所谈的亚美尼亚的情况中，可以看出这样一种情景：许多共产党员被关进监狱；有些党员因为害怕遭到镇压实际上已经停止活动；但一部分积极的共产党员仍在秘密地进行工作；同时，党的地下组织还是存在的。不过边区党委会只是不久前才同地方的党组织恢复经常联系。

随后，根据我们的建议，讨论了在巴库召开全高加索党代会和全高加索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在形式上梯弗里斯设有高加索边区工会理事会这个机构，但该理事会在阿塞拜疆做了哪些工作，人们并无所知。老实说，我们并不为此而感到苦恼，因为理事会的理事都是孟什维克，谁都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当选的，所以理事会当然不可能成为边区工会运动的领导中心。我们对同志们说，我们可以代表巴库保证在即将召开的边区工会代表大会上使共产党员和他们的拥护者占相当高的百分比。我们当然也考虑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工会情况非常复

杂，但如果这两个共和国的工会代表中共党员和他们的拥护者能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那末就完全有可能确保共产党员不仅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而且在大会选出的边区工会理事会中发挥领导作用。

经过讨论，边区党委会通过了关于必须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鉴于当时巴库的工人运动和工会运动开展得很广泛，很有成绩，决定工会代表大会也在巴库举行。因此，边区党委会要我们巴库共产党员担负大会的全部筹备工作。

这样，边区党委会便切实地解决了当时使我们焦急不安的许多问题。

当回忆起讨论这些问题的情景时，我想指出的是，我们的讨论具有高度的党的思想水平，实事求是的，充满同志的气氛。尤其使我们感到高兴的是，边区党委会委员以党员所应有的态度接受了对他们的批评。他们坦率地向我们说明了边区党委会在工作中存在缺点的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经过这次讨论使我们对整个高加索的情况有了更充分的了解。对于我们整个运动的前景也看得比较清楚了。经过这次会面，我们彼此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同志关系。

……我漫步在梯弗里斯的大街上。看着两旁的房屋，仔细地看商店的橱窗，并注意观察过往行人的表情。

使我感到很惊奇的是，从我上次离开这里以来，周围

的一切似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连一幢新房子也没有，也不见有房子正在施工；商店还是以前那个老样子，只是商品比以前少了；居民还是和先前一样忙忙碌碌。

只有一点和过去的梯弗里斯不同。这里和巴库一样，英国士兵和军官有的一伙一伙地，有的独自一个人在街上闲逛。英国士兵常常从街上拐进住家的院子里，并把一些旧东西或他们那份相当丰富的口粮中剩余下来的罐头、巧克力糖、炼乳等吃的东西卖给居民。

英国士兵穿着当地看不惯的苏格兰裙子在街上一出现，往往成为周围的人，尤其是顽皮儿童们取笑的对象。不过英国人还是相当和气的，甚至是温厚的，居民们也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不论是“在院子里”成交的买卖，还是那苏格兰式的装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这里每天生活中常见的现象。

我们在城里行动是自由的。我们是公开来到这里的，每人都带着自己本人的身份证，我们并不担心，因为我们并不是长期地在这里居住、工作，所以不会有人对我们特别挑剔。（当然到秘密接头处和秘密住所去就不同了，这时我们是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的。）

我这次来梯弗里斯见到了许多熟人。使我感到特别高兴的是，我见到了早在1917年就曾和我在这里共同工作的梯弗里斯的同志们。

当时边区党委会的最主要的（如果可以这样来表示的话）负责人是菲利普·马哈拉泽。很早以前我就非常

敬重他。菲利普是一个知识渊博的老马克思主义者和文学家。我知道他早在我党成立之前很久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菲利普身上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中等身材，面容俊秀，有一双蓝蓝的眼睛和长长的胡须，给人以一种古代画家在圣经中所描绘的先知者的形象。他在同人交谈的时候说话并不多，可是做起报告来往往往是滔滔不绝。他待人很有礼貌。

达努什·沙维尔江那时也在边区党委会工作，我经常见到他。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经验丰富的秘密工作者，受到党组织的特别信任。不过他经常以合法身份出现，在梯弗里斯当律师。多年来，达努什一直是处于地下状态的边区党中央的会计兼最重要的机密档案的保管人。党组织尽一切办法保护他不被警察局的密探发现；因此，一切公开的容易被警察发觉的党的工作都不交给他做。而他自己也十分谨慎。达努什很受大家的爱戴和尊敬。

我十分愉快地见到了姆拉维扬同志。他当时担负领导亚美尼亚党组织的主要责任。早在与马哈拉泽相遇之前，我就认识姆拉维扬。1915年秋，我二十岁，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党，那时姆拉维扬就已经是一位老党员、一位职业革命家了。在我从事党的工作的初期，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当时他在布尔什维克派主办的合法报纸《派卡尔报》工作，我曾多次在编辑部见到过他。苏维埃政权在亚美尼亚取得胜利后，他担任亚美尼亚共和国人民教育

委员，是亚美尼亚共产党著名的活动家之一。

我还记得曾多次与拉多·杜姆巴泽同志会晤。他也是一位老党员、老地下工作者。他在梯弗里斯各主要铁路工厂当过工人。他政治上很有素养，精力充沛，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善于并且能够勇敢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因此更加受到人们的尊重。尽管孟什维克的头头们基本上控制了这些铁路工厂，把这些拥有大量工人的工厂变成他们的基地，但杜姆巴泽和几个共产党员在工人中间仍然有很大影响和很高威信，并且不止一次地给孟什维克造成很大麻烦。

我们同阿马亚克·纳扎列强的会晤是很亲切的。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党的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文学家。我和他初次见面是1917年3月，在布尔什维克于祖巴洛夫人民宫举行的第一次公开的会议上。当时他是被选进会议主席团的三人之一。后来他成为南高加索党组织的一位杰出的活动家，随后他在莫斯科党的重要岗位上工作。

我还高兴地见到了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我们初次相识是在1917年10月，在高加索边区党代表大会的一次会议上。当时他是代表弗拉基高加索的党组织出席大会的。我们这次相见的时候，他正以合法的身分住在库泰依斯，在孟什维克政府的军队里当军医。他是学医的，在沙皇军队里就曾从事医务工作，同时在士兵中进行大量的政治工作。

布尔什维克马拉基亚·托罗舍利泽也是边区党委会委员。我在1917年就很了解他。他是一个很有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高加索边区党的代表大会上，他就民族问题做了报告。托罗舍利泽性情稳重，从来不急躁，具有坚定的信念。在和别人争论时，不把关系弄僵，但也从不放弃自己的立场。总之，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严肃的党的活动家。当时他是格鲁吉亚消费合作社中央管理局（采卡弗希里）委员。管理局的委员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布尔什维克，其余都是孟什维克。他们当然知道托罗舍利泽是我们边区党委会委员，但他们却没有逮捕他，也没有撤他的职。他曾多次完成边区党委会交给他的同地方党组织进行联系的个别任务。

我想起托罗舍利泽的一件很有趣的事。他的妻子是一个孟什维克，而且是一个积极的政治活动家，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他们生活在一起。我来到梯弗里斯得知这个情况后，感到非常惊奇。我不禁捧腹大笑，并且问道：“难道他们彼此从来不谈政治吗？如果谈政治的话，那末他们怎么能够互相保守党的秘密呢？”同志们告诉我，边区党委会有些委员因为这个缘故甚至认为托罗舍利泽这个人不可靠。处于地下状态的布尔什维克党边区党委会委员和孟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很积极的中央委员作为夫妻在一个屋顶下生活，这种情况确实是非常奇怪的，如果不是反常的话。

但，不论是以前，还是在这次见面的时候，托罗舍利

泽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我是不能同意对他的这种怀疑的，因为我是信任他的。

对托罗舍利泽在政治上是否诚实表示怀疑的同志通常议论说：“为什么其他共产党员都被逮捕了，而他却没有被逮捕呢？”他们举出这样一件事做例子：在梯弗里斯对共产党员进行大逮捕的时候，托罗舍利泽却躲过了这次逮捕，他在大逮捕前两天因为消费合作社的公务出差，离开了梯弗里斯。当时人们就议论说：“想必是他老婆及时地把消息透露给他，所以他避开了。”

不过这只是由于托罗舍利泽家庭的特殊情况而引起的猜测。

苏维埃政权在格鲁吉亚取得彻底胜利后，托罗舍利泽继续为党工作，成绩卓著。

1925年我同约·维·斯大林一起在格鲁吉亚度过了几天。当时，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是格鲁吉亚边区党委书记。斯大林把他革命前的老朋友托罗舍利泽请来陪同我们。我们在一起相处了几天，我们先是去库泰依斯，又从库泰依斯到拉钦县；经过几天的相处，使我更清楚地认识到，托罗舍利泽是完全应该受到信任的人。

在我现在所着重讲到的那个时期，著名的边区党委委员、杰出的党的活动家、老战士米哈·齐哈卡雅和老布尔什维克姆季万尼已被孟什维克逮捕并被关在库泰依斯的监狱里。

格鲁吉亚建立苏维埃政权后(1921年2月)，姆季万

尼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后来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主席。

我同姆季万尼初次相见是在1920年，当时第十一军应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的请求开进阿塞拜疆。他是和部队一起来的，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工作人员。我记得他身穿军装，头戴布琼尼式的钢盔，背着一支盒子枪。当时他的这些“盔甲”是不离身的。应当说，他穿上这套“盔甲”非常好看，他自己也以此自豪。当时我和他很接近。他精力充沛，直爽而又机警，我非常喜欢他。

我和别索·洛米纳泽初次相见是在边区党委会的一次会上，当时他是代表梯弗里斯党委会参加会议的。他比我年轻，1917年他还没有在政治舞台上露面。

我们在会上介绍说，巴库的政治生活热火朝天，共产党员的影响正迅速增长，这给他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会后，他走到我面前，于是我们便在梯弗里斯的大街上作了长时间的漫步。他详细地向我询问巴库的情况。有时我甚至觉得对于我所说的话，他并不完全相信。他总是感叹不已地说：“难道这是真的吗？果真是这样吗？您们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真了不起！您看看我们梯弗里斯的情况吧，这里没有工人运动，没有罢工，也没有示威游行，只有一些秘密小组，简直象一潭死水。有时候针对各种不同的事件印发一些传单，声援狱中的同志们。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工作！”

当然，洛米纳泽对于当时梯弗里斯所发生的全部变化有些认识不足，不过与巴库比较起来，差距确实是很大

的。另一方面，巴库的整个政治气氛使他非常向往。他问我：“如果我向边区党委会提出申请，你们能带我到巴库去工作吗？”我回答他说：“当然可以，而且非常高兴！您也亲自听到，我们已经请求边区党委会派一些经验丰富的、有马克思主义素养的党的干部到我们巴库来。您去提出申请，如果边区党委会同意您去，我们将很欢迎您到我们那里去。”

我和格奥尔基·斯图鲁阿的会见是很亲切的。我们有很多共同的经历。过去，在巴库公社和巴库地下工作时期，我们曾在一起工作过；一起坐过牢；我们曾一起经受过能够暴露一个人全部品质的多次考验。我们彼此亲如兄弟，互相信任。记得我甚至曾埋怨他在巴库大动荡之后，没有回到我们这里来，却留在格鲁吉亚工作了。他非常了解巴库的情况，巴库工人也很了解他，热爱他。格奥尔基当时曾答应我一定回巴库来。

* * *

在梯弗里斯，我除了会见党的领导人之外，当时我还见到了许多过去的同班同学。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大都已经参加了党。同老同学们的会见使我感到非常高兴。和同学们的交往不仅是友好而愉快的，而且同他们的交谈对于我迅速准确地了解这里的情况也有很大帮助。

我姑母维尔基尼娅·图马尼扬和她的丈夫、孩子们见我活着回来，而且身体又很健康，不用说都高兴得不得了！他们对我非常关心，尽管我当时工作繁重，但他们尽

一切办法使我在梯弗里斯的三天，在一定意义上过得象度假一样愉快。

我很想到萨纳英去看望母亲和兄弟姐妹们。但我不得不放弃此行。因为到萨纳英去一趟差不多要用两天的时间，而巴库的工作不容许我再在这里耽搁了。

我也未能去看看阿什亨。她不在梯弗里斯。当时她在离苏胡姆不远的亚美尼亚的一个小村庄里当教师。我给她写了一封信，要她在学年结束后回梯弗里斯，并把她回来的消息告诉给我，以便我也到梯弗里斯去。我在信中告诉她说：“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工作的关系，我每月至少要到梯弗里斯来一次。”

回忆起那久远的年代，我想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图马尼扬一家。

我姑母维尔基尼娅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她会写字，能看书，是个政治上很开展的人。她对于政治的了解当然并不那么深入，但她是全心全意地拥护革命，拥护布尔什维克的。

她的丈夫拉扎里·图马尼扬(身份证上用的是“加勃里耶勒”)多少有些文化。他是个店员，一心想自己开一个店铺。他从不浪费一文钱。最后终于买下一个小铺，他不雇用帮手和店员。但是他的“生意”并没有经营多久。有一次他的小铺发生了火灾。拉扎里·图马尼扬又成了店员。他们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座落在梯弗里斯的一个最偏僻的地区——苏尔普卡拉佩特山谷。

拉扎里·图马尼扬是个勤劳的、安分守己的老实人。这大概也就是他的“生意”不兴隆的主要原因吧！他和他的妻子不同，对于革命和社会主义毫不关心。可是他每天从头到尾阅读亚美尼亚保守的报纸《姆沙克报》。不仅如此，他还把这些报纸收集起来，并且整整齐齐地装订成册，他已经有几大本这样的合订本了。他政治上目光短浅，只相信这张小报上的东西。他的妻子却是一个有意志的妇女，她实际上支配这一家。她的丈夫很爱她，从来不敢同她争吵。

我对维尔基尼娅姑母讲了一年半以来我的不幸遭遇，并在她所能理解的范围内向她介绍了巴库革命事件的发展情况。当我告诉她，我们正在这里开秘密会议时，她表示赞成我们这样做。

有一次，菲利普·马哈拉泽对我说，孟什维克正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他连续换了几个秘密住址，但还是担心会被孟什维克逮捕。我决定和维尔基尼娅姑母商量一下。他们住的地方非常偏僻，邻居们都不关心政治，从这些条件来看他们家是一个很理想的秘密住所。我问姑母是否同意让一个著名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员、一个孟什维克正在追捕的好同志住在她的家里。她毫不犹豫地同意了。为了慎重起见，我对她说：“你可要知道，这事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他暴露了，你们全家都要受连累。”她回答说，她什么都不怕，并准备承担一切风险。于是我问她：“你丈夫对这件事的看法呢？”她说：“这你放心。我去同他说，

他不会反对的。”

第二天夜里，我把马哈拉泽带来，介绍给姑母全家。姑母给马哈拉泽看为他准备好的房间，并请他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对于主人的亲切接待，菲利普感到很满意。

菲利普在这里住了很长时间。他很少进城。每当他需要和同志们见面时，同志们就自己到这里来找他，每次只来一两个人。他去参加边区党委会的会议时，一般是在晚上很晚才出门，并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规定，回来时也是如此。

从那以后，我每次来梯弗里斯，都住在这里，并且经常和马哈拉泽谈得很久。我们彼此更了解了，关系更密切了。

在这里我想起很久以后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这件事与马哈拉泽和米哈·齐哈卡雅都有关系。

我们来到莫斯科参加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开会的前一天，我在苏维埃第三号楼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处遇见了马哈拉泽。我们都按照规定填写了履历表，领取了代表证。

米哈·齐哈卡雅这位老同志也在我们中间。登记员怕他填写履历表有困难，便主动要代他填写。他问米哈·齐哈卡雅：“您是哪一年入党的？”米哈回答说：“你就写老早了。”登记员不同意地说：“这样不行，要指出是哪一年入党的。”米哈环顾四周，说：“喏，那个共青团员正在填写履历表。”他指着马哈拉泽说：“你去看一看他填的是哪一

年？我比他早十年，你就这样填。”我们周围的人个个都惊得目瞪口呆，因为我们都知道，马哈拉泽从1891年就参加了革命运动。我们的米哈·齐哈卡雅多么早就走上革命道路了啊！

直到1919年12月，菲利普·马哈拉泽还一直住在图马尼扬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事件。他在这里领导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

后来我听说，有一次菲利普违反秘密工作的规定，在白天出去了。在大街上敌人立刻认出他来，并把他逮捕了。只要是以前见过他一面的人，凭他那大胡子（甚至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他也舍不得剃掉！）就不难认出他来。菲利普随身带着拉扎里·图马尼扬的身份证。于是警察发现了边区党委会的秘密地址，进行了搜查，搜出并没收了许多党的重要文件。逮捕了房东和他的十七岁的正在上中学的儿子（他曾多次完成菲利普和我交给他的个别的任务）。

但是，发生这次事件以后，维尔基尼娅·图马尼扬仍然很关心菲利普。她通过我十三岁的弟弟阿尔焦姆（正在上小学，当时也住在他们家里）往监狱里给她的丈夫、儿子和菲利普送东西。

一个亚美尼亚的同志不久前在档案馆里发现一份文件，他带来给我看。读者对这个文件或许是感兴趣的。原来，维尔基尼娅在她丈夫和儿子被捕之后，曾到亚美尼亚驻梯弗里斯领事馆要求进行干预，以争取释放他们。

正如我们从这个文件中所看到的，维尔基尼娅非常机智灵活，她只字未提马哈拉泽。她把在她家里搜出的全部文件都说成是我带去的，因为当时孟什维克政府追捕不到我。

现在我就引用一下这份文件。

“致外交使团参赞 M. 图马尼扬公爵。

谨荣幸奉告，两天前，德谢格村（亚美尼亚——阿·米·注）居民维尔基尼娅·图马尼扬太太前来申诉，12月1日特种支队在支队长的带领下搜查了她的住宅，没有搜出什么东西；同时，还搜查了她邻居的房间，发现了布尔什维克派印发的传单和书籍。居住在这个房间里的是十三岁的小学生阿努沙万·米高扬和他的哥哥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后者曾从巴库到这里来住了几天。特种支队因为没有找到这些违禁印刷品和书籍的主人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便逮捕了图马尼扬太太年满六十岁的丈夫加勃里耶勒·图马尼扬和他的儿子加伊克，十七岁，七年级的学生。图马尼扬太太来此报告，她恳切地请求您帮助释放她的丈夫和儿子。被捕者现关在麦捷赫斯要塞。

领事司司长（签字）

1919年12月29日。”

我弟弟回忆搜查维尔基尼娅姑母家的详细经过时说：“那天我病了，躺在靠近窗户的沙发床上。我们正在准备吃午饭。突然从院子里传来了皮鞋践踏小卵石发出的响声——房子被包围了……”

姑母急忙把一些文件塞进我的床垫底下，剩下的文

件都扔进燃烧着的煤油炉里。这时宪兵冲了进来。他们奔向煤油炉，一把抓起了还没有烧完的文件。于是开始了搜查。

我被从床上推了下来。这时姑母高喊：‘你们别碰他，孩子有病！’但已经没有用了：文件被从床垫底下搜了出来，他们动手打我。因为我不说我哥哥阿纳斯塔斯在什么地方，他们又打我。

在这同时，在另一个房间里宪兵正在拷打并审问拉扎里和他的儿子加伊克。后来就把他们带到监狱去了。

为了找寻密室，警察动手拆屋里的间壁。他们始终没有找到密室在什么地方，因为密室很巧妙地用碗橱伪装了起来。（碗橱挡着一个备用的通向果园的地下出口，秘密工作者开会时万一被发现，可以从这里逃出去。）

维尔基尼娅姑母把送到监狱去的东西巧妙地盖上一层抓饭：她把信放在一个深盘子的底上，上面盛抓饭。警察用勺子在饭里舀了舀，检查有没有违禁的东西放进去。但，不知是因为勺把太短还是盘子太深，信还是送到了收信人的手里。

布尔什维克阿维季克·阿鲍维扬也被关在那间囚室里。”

维尔基尼娅·图马尼扬不仅是一个聪明的、思想进步的妇女，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母亲。她生了七个孩子。有三个死于传染病，余下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参加了共产党。加伊克·图马尼扬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

大学毕业后，就在红军中任职。后来他又毕业于军事学院，到过正在进行内战的西班牙。卫国战争期间，他一直在前线担任坦克部队军事委员会委员，并在远东参加了解放满洲的战斗。现在他是预备役中将，副博士，在莫斯科的一所大学里任教。

我调到莫斯科工作之后，维尔基尼娅·图马尼扬和她的丈夫同我母亲一起长期住在我家。维尔基尼娅的丈夫终年八十岁。维尔基尼娅和我母亲和睦相处，亲如同胞姐妹。她们是在同一星期去世的。维尔基尼娅享年八十五岁，我母亲享年九十三岁。三位老人并排安葬在新圣母公墓。

* * *

我们回到巴库后，便向党委会汇报了此行的总结。我们的工作得到党委会的赞许。当前就是要贯彻我们和边区党委会共同通过的决议，首先是贯彻关于召开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此外，在我们去梯弗里斯期间，这里又积下了不少工作要做。

在巴库工会理事会工作的共产党员没有费多少周折就使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召开南高加索、达格斯坦和里海以东地区工会代表大会的决议。通过了以巴库工会理事会的名义向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格斯坦和里海以东地区工会发出的有关的呼吁书，并确定4月5日为召开边区工会代表大会的日期。

正如我已讲过的，(早在1917年底选出的)高加索工

会理事会仍然在梯弗里斯进行活动，但该理事会实际上既不特别期望，也没有可能把它的影响扩大到格鲁吉亚以外去。巴库工会理事会乃是阿塞拜疆所有工会的领导中心。在巴库工会理事会中工作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窃据了许多领导职务）同意召开全高加索工会代表大会。他们以为，靠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工会（在这些工会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势力很强）的支持，他们能够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及代表大会选出的各种机构中取得领导地位。

我们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措施，以争取我党的胜利。我们决定尽一切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靠拢布尔什维克的“古墨特”和“阿达列特”、同情布尔什维克的工人以及在政策上同我们互相配合的阿塞拜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选为工会代表大会的代表（首先是在巴库地区）。根据巴库常委会的意见，选举工作全部由阿纳什金、米尔佐扬和波尔托拉茨基等同志负责。

在高加索工会理事会中发号施令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被巴库工会理事会提出的这个倡议搞得手忙脚乱。他们虽然不反对召开全高加索工会代表大会，但是在与召开这次大会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上同我们争论不休。

首先，他们反对里海以东地区和达格斯坦的代表参加大会。他们坚持主张这次代表大会应当纯粹是“南高加索的”代表大会。他们采取这种立场的真实企图，是要把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里海以东地区和达格斯坦的代表

排除在代表大会之外。

其次，孟什维克提出代表大会应当在梯弗里斯，而不应在巴库召开。他们说，梯弗里斯是南高加索的中心，而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在梯弗里斯召开的。

在代表人数的名额问题上，他们争得尤其厉害。他们坚持主张拥有一百五十名以下会员的工会与拥有几千名会员的工会要一视同仁，各派一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格鲁吉亚会员少的小工会居多，而巴库则相反，大都是拥有几千名会员的大工会。孟什维克的这一主张不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蓄意削弱巴库无产阶级在工会代表大会上的作用。

最后，孟什维克要求大会不得讨论任何政治问题。按照他们的想法，代表大会应当纯粹是工会的代表大会。

为了使孟什维克找不出借口破坏全高加索工会代表大会，我们决定对他们做些让步，同意在梯弗里斯召开代表大会，但是他们必须全部放弃其余的反对意见。虽然我们做了让步，但还是无济于事。孟什维克在接到巴库工会关于召开全高加索工会代表大会的呼吁书之后，便决定于同一时间召开格鲁吉亚工会代表大会。

梯弗里斯只有个别的工会派出代表前来参加大会。在这些工会（制革工人工会、药剂师工会、五金工人工会）的理事会中，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占大多数。梯弗里斯的代表中有象洛米纳泽和姆扎瓦纳泽这样的共产党员，还有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皮鲁莫夫和

国家杜马前议员阿尔沙克·祖拉鲍夫。

工会代表大会于4月7日在巴库开幕，而4月11日在梯弗里斯召开了格鲁吉亚工会代表大会。虽然如此，在巴库和梯弗里斯之间仍继续就召开全高加索工会代表大会问题进行着谈判。

在巴库召开的代表大会决定派一名代表到梯弗里斯去最后结束这次谈判。我被提名为代表。（早在3月20日召开的工会理事会的会议上我应邀参加工会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的工作。）

4月初，巴库党委会派我到梯弗里斯去同边区党委会就一些对我们说来是重大的问题交换意见，所以格鲁吉亚工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我正在梯弗里斯。

4月13日我在格鲁吉亚工会代表大会上发言。

在保存下来的代表大会的记录中，对我的发言做了这样的简述：

“巴库代表米高扬同志发言。他号召格鲁吉亚无产阶级从本国狭隘的圈子里走出来，寻求实现整个工人阶级大联合的途径。

巴库无产阶级将尽一切努力实现这样的联合。巴库无产阶级坚持在巴库召开代表大会，只是因为它认为巴库工人阶级在当前离不开自己的领导人。

巴库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敌对的阵营正处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状态，都在警惕地注视着对方，伺机而动。在这种时候，如果工人阶级的领导人离开巴库的话，英军司令部就可能乘机出动，而事情的结局就可能有利于他们。缺乏经费也是

我们不能到梯弗里斯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有这样一些考虑，但是如果不是在议事日程问题上存在原则性的分歧的话，巴库的代表为着实现工人阶级的统一还是会到梯弗里斯来开会的。

巴库无产阶级认为，当前政治问题还没有解决，是谈不上工会的问题的，所以巴库无产阶级认为政治局势问题必须列入议事日程。

讲演人接着指出：尽管各党的观点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但梯弗里斯和巴库的无产阶级必须并肩前进。他肯定地说，巴库工人阶级，特别是共产党员们不反对格鲁吉亚实现独立，他们认为彼此走的道路可以有所不同，但民主力量必须同心协力地去打击工人阶级的共同敌人。

巴库共产党人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不准备用武力强迫格鲁吉亚接受苏维埃政权。然而我们号召格鲁吉亚的无产阶级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政策，同全体工人阶级联合起来。

讲话人最后号召格鲁吉亚民主力量在敌强我弱的斗争中支持巴库无产阶级，因为当巴库的阶级弟兄正在同阶级敌人进行殊死搏斗的时候，格鲁吉亚工人阶级是不能袖手旁观的。”

因为孟什维克早就把一切都决定好了，所以我代表巴库无产阶级所做的这个呼吁当然是无济于事的。

巴库工会代表大会继续开到4月15日。会上工人运动中的各派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政治斗争。我的同志们不仅要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作斗争，而且还要同以祖拉鲍夫为首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作斗争。

祖拉鲍夫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他

采取的是与我们的路线很接近的中间立场。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使工人阶级内部各派和解，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一个能团结所有人的决议。但是这个决议却是一个没有明确政治目标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在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党团团结一致，同“古墨特”和“阿达列特”共同战斗。同我们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阿塞拜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他们的领袖鲁胡拉·阿洪多夫在发言中明确指出：“现在在红色的莫斯科已经庄严宣布共产主义的口号，社会主义革命正席卷整个欧洲，然而这一革命的巨浪至今还没有波及到我们这里。社会主义者过去和现在一贯号召无产阶级要团结一致。你们应当在地方上不倦地宣传这一团结的口号。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取得政权，也就是说没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决议，都是毫无意义的。

政权我们得而复失了。为了使这个教训不再重演，我们必须跟着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走，而不能跟着那些先是把英国人请来，随后又把土耳其人请来的人走。英国人和土耳其人共同扼杀了苏维埃政权。我号召你们向红色莫斯科看齐！”

我的同志们不得不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大会的各个委员会里进行长时间的、顽强的斗争。问题在于连一些处于动摇状态的布尔什维克（例如印刷工人联合会的委员、共产党员哈奇耶夫）也被祖拉鲍夫“有魔力的”劝

说说服了。现在我从印刷工人工会的机关报《警钟报》中摘引一段话，说明这样的党员当时思想是多么的混乱：

“巴库（而且不仅是巴库）无产阶级怀着极大的兴趣和不安的心情注视着南高加索和里海以东地区工会代表大会的进行。尽管三派报告人的结论是共同的（如果一些无足轻重的与当前的局势无关的小分歧除外的话），然而这些报告还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并不是就报告本身的实质问题进行争论，而是由于从前的过失、错误和所受的委屈而互相指责。应当说句公道话，这场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有害的争论是共产党员同志们挑起来的。他们今天的心理状态不妨说成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有一位同志甚至提出了类似这样的论点，他说：‘我们很熟悉你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阴谋诡计。今天你们到我们这里来，明天，如果反革命得势的话，你们就会伙同无产阶级的敌人来打我们。’

这个发言是轻率的，这只能解释为共产党员同志们‘火气太大’。但是大多数代表并没有为这种‘火气’所左右，大会通过表决的结果表明它决心要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尽管共产党员要求以他们的提案（这个提案确实是很鲜明的、准确的和明确的）为基础，但代表大会还是认为应该赞同祖拉鲍夫的建议，即：三个提案在实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可以交给审查委员会去制定一个统一的提案。我们指出这一切，绝不是要在什么人面前破坏共产党员同志们的威信或颂扬祖拉鲍夫才智过人，因为那样做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仅仅希望共产党员同志们能克制一下自己的火气，并且收起那种对于寻求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的社会主义者来说是不相称的咄咄逼人的胜利者的‘姿态’！”

审查委员会企图制定一个能够综合大会各派意见的决议案，不出所料，他们的这个企图结果完全失败了。于是三个决议案——共产党人-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决议案和调和主义分子(祖拉鲍夫的追随者们)的决议案都被提交大会表决。最后，我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代表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共产党员提出的决议案。

《警钟报》呼吁所有的党派都参加社会主义战线，并停止党派纠纷，我们拒绝了 this 呼吁。如果其他政党和属于这些政党的个人表现出有决心为革命的事业而奋斗，那末我们并不反对在政治斗争中的具体问题上同他们行动一致。但是，我们当然不能停止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不能把共产主义思想和模棱两可的机会主义的空话混为一谈，不能抹煞共产党人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间的鸿沟，不能停止批判他们过去的叛卖活动以及他们今天对资产阶级所采取的妥协主义的政策。

巴库党委会对印刷工人工会主办的《警钟报》所采取的错误路线不能熟视无睹。(该报是“独立的社会思想的机关报”，从1919年3月10日起每周出版一次。)

印刷工人工会理事会理事阿尔沙克·哈奇耶夫是报社的主要负责人。早在10月革命前，他就是一个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新生活报分子”)，后来才参加我们党的。现在他思想又动摇了。在他的带领下工会理事

会中的其他共产党员（理事会中共产党员占多数）执行的是“独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路线。这一事实表明巴库党委会当时还不能使所有的共产党员都接受应有的影响。

到4月，当全高加索工会代表大会在巴库开会的时候，《警钟报》的错误路线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警钟报》发表文章，拥护祖拉鲍夫的观点，号召所有的社会主义政党——从右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到共产党人——实现大联合，“向工人说明各党处于分离状态的巨大危害，把党派之争搞臭”。

对于这种错误言论，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我们把印刷工人工会理事会中全体党员找到巴库党委会，对他们说，他们的报纸所执行的路线是与党性不相容的。我们极力说服他们，甚至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纠正报纸的错误路线，他们就是自外于党。

当时的工会主席是印刷工人波尔托拉茨基。总的说来，他是一个好党员。但从对报纸的领导工作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缺乏远见。由于工会的日常事务很忙，他把领导报社的工作委托给哈奇耶夫，这样哈奇耶夫便掌管了编辑部的全部工作。最后，我们终于说服了他们，而哈奇耶夫则保证他服从党的纪律。

从5月1日起，《警钟报》开始作为工人的报纸和印刷工人工会的机关报问世了。该报的编辑是洛米纳泽。这样，我们便有了自己的党报。党报的出版对于我们开

展政治工作有很大帮助。

* * *

从里海以东地区回来不久，我听说一个新消息。原来，在巴库工人代表大会中窃据领导职务的孟什维克早在1919年1月就提出要巴库无产阶级争取建立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市自理机关。按照他们的意图，这个自理机关今后要同工会并立，并取代工人代表会议。

孟什维克千方百计地要搞掉工人代表会议这个巴库无产阶级的新的组织形式。工人代表会议是在英国占领巴库的条件下，在革命群众中自发地产生的；在政治总罢工中，她壮大成长，现在已经成为巴库全体工人的强有力的领导机关。

巴库的共产党员当时曾提出建立巴库工人、水兵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他们号召工人：“你们要提出立即召开工人、水兵代表苏维埃的要求，你们要紧紧地团结在工人利益的唯一捍卫者——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周围。只有俄国共产党才能领导巴库无产阶级走上为建立工人、水兵代表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正确道路。”

同志们告诉我说，在1919年1月22日举行的巴库工人代表会议的一次会上，在压倒多数的代表的一片掌声中通过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成立工人、水兵代表苏维埃的建议。

我得知这个消息，当然非常高兴。但同时又觉得很为难。我思想上有些担心，产生了怀疑，不过当时我并没

有对同志们讲。我要自己再考虑考虑，并检验一下我的想法是否对。当我对这个问题已经形成肯定的意见的时候，我就在巴库党委会的一次会议上谈了自己的看法。那时，巴库工人代表会议的领导权又转到我们手里。根据亲眼见到的一切，使我确信：在这个已经建立起来并得到公认的巴库工人阶级的组织中蕴藏着巨大的力量“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建立另外一个组织来替代这个组织呢？”在巴库党委会的会议上，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我们还没有把握一定能在未来的苏维埃中取得可靠的多数的时候，最好是先等一等。巴库的政治形势仍然是很紧张的。英国的将军们，阿塞拜疆政府中的可汗和别克必然会认为苏维埃的存在是对现存制度的一种威胁，并立即加以解散。

我对同志们说：“工人代表会议是一个现成的组织，并正在把巴库广大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成为巴库工人阶级的坚强的有代表性的组织。工人代表会议实际上已得到承认，无论是英国占领当局还是地方政府都不能无视它的存在。他们不得不接受我们的函件、照会，并进行研究，给予答复。”我进一步阐述我的想法说：“如果今后总的政治形势比较有利，客观条件容许我们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工人代表会议改组为工人、水兵代表苏维埃。”

其他党委委员没有对我的看法本身提出异议，然而他们对于这样的问题表示困惑莫解：怎么能够不承认巴

库工人代表会议根据共产党员的提议而通过的建立苏维埃的决议呢？怎么能撤销党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口号呢？

我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根本不需要撤销这个口号和不承认工人代表会议的决议，只要不抓紧进行就行了。不要坚持尽快贯彻所通过的决议。如果有人提起这个问题，就这样解释说：要在适当的条件下，经过必要的准备才能贯彻这个决议。

我说，当前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我们已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人代表会议，巩固各区的工人代表会议。我相信，当我们致力于这项工作时，关于立即建立工人和水兵代表苏维埃的问题，人们也就会自然而然地不提了。

经过讨论，同志们同意了我的意见。

在工人代表会议的一次会上，不知怎么又提起了建立工人和水兵代表苏维埃的问题。我们心平气和地向代表们解释说，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工人代表会议，一旦时机成熟，就成立苏维埃。经过这样一解释，代表们也就不再提这个问题了。

几个月之后，这个问题又提了出来。奇怪的是，这一次是阿塞拜疆政府主动提出来的。大概是在7月里，政府通过劳动部向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提出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的建议。

政府的这个建议使我们感到非常惊奇。于是，我们就琢磨，他们是在搞什么鬼呢？我们终于明白了，执政的木沙瓦特党（顺便说一句，该党在穆斯林工人中间的影

响正在削弱)无权出席工人代表会议并参加其工作,看来他们是企图在苏维埃成立之后,通过政府官员和一些落后的穆斯林工人在苏维埃中取得代表权,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可以在选举过程中,使用弄虚作假、施加压力和进行迫害等种种手段,然后象孟什维克在梯弗里斯所干的那样,把巴库苏维埃变成他们的驯服工具。

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拒绝了政府的这个建议。

* * *

巴库党的工作继续广泛而深入地发展。但是,由于没有同苏维埃阿斯特拉罕,也就是说没有同党中央取得联系,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们看不到党中央的报纸。党的金库已经空虚,又没有收入的来源。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开始寻找与阿斯特拉罕建立联系的途径。

我们决定买一条渔船,派一名代表带着我们的信乘船到阿斯特拉罕去。但是,我们连买一条船的钱都没有。刚巧那几天里海合作工会理事会理事共产党员希加·约阿涅相到我这里来。他说:“我知道你们需要钱用,工人代表会议也缺乏经费。我想我可以帮帮忙。”于是,他说,早在1918年,巴库工人代表苏维埃便把大量的铁轨、枕木和小货车运往连科兰,以便把粮食从“内地”运到连科兰码头。但不久巴库苏维埃政权便失败了。这些材料也就都没有动用,现由巴库苏维埃的特派员负责保管。约阿涅相对我说,如果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做出相应的决

定，他可以通过巴库苏维埃在连科兰的特派员承办把这些物资卖给私人的事宜，把所得的收入交给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他说这笔交易完全是合法的，因为巴库工人代表会议是巴库苏维埃的唯一继承者。

经过商量，我们决定以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名义给约阿涅相开一张相应的证明。当我把委托书交给约阿涅相的时候，说句老实话，我十分怀疑这笔交易（当时我觉得非常没有把握）会取得圆满的结果。

但是说也奇怪，约两个星期后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收到了在连科兰所售物资的全部款项。这笔钱对我们说来是巨大的物质上的支援。

现在可以买船了，我们要伊塞·多夫拉托夫设法买船。他是一个很能干的、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者。交给他的任务不管多么复杂，多么困难，他都能顺利完成。

达弗拉托夫买到一条渔船。我们派一个很可靠的水兵萨拉伊金和另外两个水兵带着我们的信到阿斯特拉罕去。我们要他们了解一些必要的情报，还要他们多带一些党的刊物和“尼古拉”旧币回来。这种纸币当时在苏维埃俄国已经作废，而在南高加索却仍然很值钱，至少要比“克伦票”^①和当时南高加索资产阶级政府大量发行的纸币值钱得多。

小船顺利地到达阿斯特拉罕，四、五个星期之后，于

^① 克伦票——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政府所发行的二十卢布一张和四十卢布一张的纸币。——译者

5月份的后半月，又平安地返回巴库。他们给我们带来了党的刊物和一笔（确切的数日记不起来了）“尼古拉”旧纸币。

他们还带回了谢·米·基洛夫的信，他是1919年初到阿斯特拉罕担任领导工作的。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在信中告诉我们说，阿斯特拉罕缺乏汽油，所以我们的飞机不能起飞。邓尼金匪帮不断轰炸阿斯特拉罕，却遭不到惩罚。苏维埃俄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立即着手购买汽油和船只。这是我们对红军的最好的支援。不久，古巴诺夫、罗戈夫、萨拉伊金等同志在多夫拉托夫的领导下，建立了一支著名的从巴库到阿斯特拉罕的海上运输队。

在巴库购买汽油是很困难的。英军司令部对汽油的销售实行了严格的控制。经海路从巴库往外运（除波斯外）汽油是绝对禁止的。出海的船只只要在码头经过极其严格的检查。但是，我们终于买到了汽油，并运了出去。这是经历了很大的困难的。每一次都要取得当局的许可才能把一批数量可观的汽油运到连科兰或波斯去。还要设法搞到船只，挑选经过专门训练的船员，并且在起航时要使敌人“无懈可击”。由于多夫拉托夫和他的同志们机智灵活，我们一个夏天往阿斯特拉罕发出了十二艘装汽油的帆船。

如果说购买汽油和船只，并把它们从巴库发出去是非常困难的话，那末从巴库到阿斯特拉罕一路上更是要

冒生命危险的。邓尼金匪帮的军舰控制着伏尔加河三角洲，不停地在海上窜来窜去。在有利于航行的刮风天，帆船还能够迅速地绕过把守着伏尔加河主航道的邓尼金的军舰，然后顺着河的支流驶到阿斯特拉罕去。但在不利于航行的天气下，小船就不得不长时间地停在海上，这样很容易被邓尼金匪帮的军舰发现。记得我们发出的第一批船中，有一只在离阿斯特拉罕约三十五俄里的地方，就是这样落到邓尼金匪帮的手中的。除米沙·苏杰金之外，全体船员都被枪杀了。

我们当时派到阿斯特拉罕去的所有船上的船员都是最忠实的同志，真正的爱国者和可靠的共产党员。在整个那段时间里，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参加水运工作的同志有人因为害怕而使事情失败或成了内奸。参加水运的米沙·苏杰金的英勇事迹是大家都熟悉的。他遭到敌人的严刑拷打，神智昏迷地躺在被枪杀的同志们的尸体中间。苏醒过来之后，便混在邓尼金匪帮的伤兵中间，设法偷偷逃了出来，随后，在几个认识的水兵帮助下，赤身露体，光着两只脚，饿着肚子，逃回了巴库。当我们看到他的时候，简直是象从地狱里出来的样子。即使这样，在那次事件之后，他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而且又乘着同样的船进行同样危险的航行——从巴库到已被我军占领、但仍然被邓尼金匪帮从海上包围着的克拉斯诺沃斯克去。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在枪林弹雨之中，他又一次和果戈别里泽一起脱了险。第三次（这一次他带领一大批

人)乘“埃季奇卡号”小汽船于 1920 年开始了新的危险的航行，到被邓尼金匪帮封锁的克拉斯诺沃斯克去。光荣的水兵罗戈夫也立了很多功。他是海上运输队的领导人之一。他曾多次独自一个人乘小船往返于巴库和阿斯特拉罕之间。他在一次这样的航行中壮烈地牺牲了。

航运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费加·古巴诺夫是在 1919 年 10 月牺牲的。由于天气条件恶劣，他在彼得罗夫斯克附近被邓尼金匪帮捉住了。邓尼金匪帮百般折磨他，然后把他扔到大海里去了。全体船员也同时被邓尼金匪帮杀害了。1906 年的老党员布尼阿特·萨尔达罗夫也是这样壮烈牺牲的。他和另外几个同志所乘的那条船在从阿斯特拉罕返回巴库的途中被英国人截住了。全体船员都被枪杀了。

我们共发出十二条船，到夏末损失了四条。每一次都有新的船只载着抱着必死决心的新的船员，走上这条危险的航程。当时我们有许多同志牺牲了。我以万分悲痛的心情怀念着他们……

在那国内战争的艰苦年代，巴库共产党员通过往阿斯特拉罕运送汽油，给红军和苏维埃俄国以巨大帮助。更不用说因此我们同阿斯特拉罕、莫斯科和党中央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这在当时对我们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为苏维埃阿塞拜疆而斗争” 这一口号的诞生

哪个决定正确？五一示威游行；准备经济总罢工。

当时巴库的革命形势急速发展，一个接一个的政治问题和布尔什维克战略战术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这些年轻的，缺乏经验的领导人面前。由于我们已经长期失去和党中央的经常联系，不能从那里得到必要的指示，所以困难就更加重了。边区委员会倒是有一些相当有经验的同志，但是他们在梯弗里斯，对巴库的斗争形势不十分了解。他们认为，我们过高地估计了拥护我们的力量。

我们本来就对自己的决定感到责任重大，这一切又进一步使我们强烈地感到自己的责任。

我们相信，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对巴库工人运动的领导，为武装起义和夺取政权培训和武装工人战斗队。我们原打算在解冻通航时举行武装起义，那时苏维埃军舰可以从阿斯特拉罕来援助我们。但是，我们还来不及和阿斯特拉罕方面商定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不能确定，这个舰队能否来，如果能来的话，什么时候来。这就耽误了起义日期的决定，因为如果在没有得到阿斯特拉罕方面肯定的答复前举行起义，对我们来说这将是政治冒险，拿起义当儿戏。

应当在什么样的口号下举行武装起义？这个问题也使我们巴库党委会的领导同志伤脑筋。当然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口号下进行！但是这里还有一些微妙的地方：要懂得是在阿塞拜疆和南高加索这样复杂的民族国家中进行起义。这里有三个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阿塞拜疆以木沙瓦特党为首，在格鲁吉亚以孟什维克党为首，在亚美尼亚以达什纳克党为首——已经存在一年多了。在这样的条件下，解决民族问题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如何把这种解决办法和苏维埃政权的口号结合起来？

我一次又一次地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高加索地区的苏维埃政权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国家形式？如何确定它的领土疆界？

全俄4月党代表会议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要求广泛的区域自治。”高加索边区党代表大会1917年10月也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但是，如何具体实现高加索的区域自治呢？是否将出现一个统一的高加索和南高加索自治省？是否应该保持旧省份的现有疆界，还是选定一个别的什么划分原则？这些问题任何人都未曾回答过。

我们知道这样的例子：苏维埃政权在塔什干取得胜利以后，就宣布成立土尔克斯坦苏维埃自治共和国，而对中亚细亚现有的省、州未作任何调整，对地区内部结构也未作任何变动。这样的例子对我们是否适用？对此，我个人是给予否定的回答的。我明白，不能不顾高加索地

区存在民族国家这一事实。尽管当时这些国家实际上是处于英国占领军司令部的统治之下，但在形式上它还是独立的。我们预料到，这种占领制度是暂时的。很清楚，没有阿塞拜疆工人、农民和先进知识分子的积极支持，要取得胜利，尤其是巩固这一胜利是不可能的。在阿塞拜疆资产阶级国家存在的一个不长的时间内，阿塞拜疆人民亲眼看到了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但另一方面，早先在知识分子中以及在一部分农民和工人中燃起的民族主义狂热开始渐渐熄灭，因为执政的阿塞拜疆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仅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做一件好事，相反，却使他们的生活条件日趋恶化。商品缺乏，货币急剧贬值。工业由于失去俄国市场，不能出售石油和购买商品而发生最严重的危机。政府既没有开办一所新学校也没有设立一所新医院。土地仍然掌握在地主手里，他们掌权后更加蛮横地欺压农民。所有这一切更加激发了工人、农民的阶级觉悟，同时也使他们同先进知识分子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基于这一切的考虑，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当前这场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中，我们阿塞拜疆共产党人应该提出的任务是：变“独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阿塞拜疆国家为独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它将与苏维埃俄国和南高加索各苏维埃共和国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应当提出“苏维埃阿塞拜疆万岁！”的口号并在这样的口号下领导群众起义。

我们确信“为苏维埃阿塞拜疆而斗争”的口号是正确的，并开始在国内向各方面的同志征求意见，以便在巴库党委会正式讨论这一口号前了解到在这方面都有哪些不同意见。这样提出问题对俄罗斯共产党员说来感到如此的突然，以致于他们不能一下子就明白，为什么提出这个口号。他们纷纷向我提出问题：“阿塞拜疆是否将直接加入苏维埃俄国？如果不直接加入，它将以什么形式与之联系？”还提出其他许多问题。我说：居住在阿塞拜疆的各民族都将有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可能发展自己的文化。但我极力将话题的重点转到另一个问题上。我问他们：“如果我们向农民、工人和阿塞拜疆的知识分子说，随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阿塞拜疆民族国家将不复存在，那么，我们还能够把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吗？”这么一提，给人们以强力的印象。说实在的，如果在胜利以后，建立起一个阿塞拜疆苏维埃国家的话，那我们就能够把那些至今仍然和我们疏远的各阶层居民吸引到我们这方面来。

几天后，当了解到已经准备就绪，于是就把这个问题在巴库党委会上提了出来。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党委会通过了“为苏维埃阿塞拜疆而斗争”的口号，并决定将这一口号提交巴库党代表会议讨论。代表会议定于1919年5月初召开。

党委会会议以后，我们和卡拉耶夫、古谢伊诺夫、阿加耶夫碰了头。他们对我们这一决议感到非常高兴，因

为这有利于同木沙瓦特分子斗争。

巴库党代表会议同意了巴库党委会的意见。“为苏维埃阿塞拜疆而斗争”的口号从此就成了巴库党组织的战斗纲领。

不久，我们去梯弗里斯参加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的例会。梯弗里斯的同志知道了我们这个决议后极为不满。他们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立场，不肯承认南高加索地区任何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这些国家事实上已经存在。不考虑这一事实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当的。

记得，最起劲反对我们的是我的老同志和老朋友菲利普·马哈拉泽，同他一起反对我们的还有其他几个同志。但他们要使我们放弃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可能的。看到他们如此固执，我们便说，把这一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全高加索党代表会议讨论吧。

我们清楚地知道，提出关于苏维埃阿塞拜疆这一问题的意义超出了这个共和国的范围。如果我们的提法是对的话，那么，关于苏维埃格鲁吉亚、苏维埃亚美尼亚的问题也都应该提出来。

* * *

“五一”快到了。巴库工人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因此，来自各方面的成堆的问题急待研究解决，使我们大家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提前开始认真准备我们所面临的“五一”游行。这种准备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单是要号召更多的工人走上街头，当然我们毫不

怀疑工人们将会是很多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挑选足够数量的可靠而又有经验的游行队伍领导人。他们在游行中能维持必要的秩序,防止任何冲突事件发生,提防示威游行可能受到警察或占领军的挑衅,不给敌人用武力镇压游行造成任何借口。此外,考虑到我们的经费普遍不足,于是我们要求各企业的工人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自己动手、自己出钱准备好游行所必需的标语牌、口号和旗帜。在这方面,我们指望工人组织能发挥最大的主动性。例如,巴库党委会的那面红旗就是他们自己动手作的。区党委也是这样(当时区党委已在巴库各区建立了)。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用自己的经费作了大约十来个很不错的标语牌,上面写着:“全世界苏维埃共和国万岁!”“第三共产国际万岁!”“打倒国际帝国主义!”“打倒反革命分子!”“无情地镇压反革命!”等口号。

因为当时在巴库驻扎着相当庞大的英军警备部队,因此我们准备了数十个用英文写成的标语牌,上面有这样的口号:“五一”是工人的国际节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大团结的日子,是无产阶级在争取和平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成友谊的日子。记得,在准备这些标语牌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了一个懂英语的人,他是英军司令部里的一名工作人员,做翻译工作。但就是他,据后来有人告诉我,也把口号写错了好几处。

为了使游行队伍更加宏伟壮观,我们租用了三部卡

车。一辆车上摆着一个一俄丈^①大的五角星；另一辆车上是体现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真人造型；第三辆车上也是一个真人造型，上面站着一个高举着大锤的锻工。此外，我们还从那些同情我们的巴库乐师和歌手中组织了一个相当大的合唱团。

根据我的记忆，各区都为举行“五一”游行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

游行的计划大致是这样的：工人先在本区以工厂或采油场为单位集合，召开群众大会，然后有组织地排成游行队伍，奏着乐，举着标语牌，打着旗前往市中心——自由广场。当时没有扩音器，因此，在广场上同时搭起了四个讲演台。游行队伍绕场一周后，要通过城市的各主要街道向滨海大街前进，然后沿着花园街，经过英军司令部和英军兵营，再顺着尼古拉耶夫大街，经过阿塞拜疆国会，最后到工人俱乐部。预定在这里举行结束的群众大会。会后，游行群众必须有组织地平静地各自回家。

阿塞拜疆政府和英军司令部预感到我们正在准备的这场示威游行声势浩大，并害怕他们的士兵被“赤化”，所以禁止士兵在这一天离开兵营，毫不客气地把他们关在里面。

“五一”早晨我们的《警钟报》出版了庆祝“五一”专刊。记得上面刊登有：“国际无产阶级的五一劳动节万

① 一俄丈合 2.134 米。——译者

岁!”“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万岁!”等口号和几篇纪念“五一”节的文章。

游行开始前,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各工会理事会理事以及城区的工人在工人俱乐部附近集合,然后我们大家前往自由广场。

来到广场以后,各讲演台指定了发言人,这时广场上已挤满了人。各区游行队伍打着工厂、企业单位的大旗,唱着歌,奏着乐一批接一批地来到广场。许多工人还带来了家属。当巨大的人流从各条街道涌向广场时,呈现出一幅相当动人的场面。这些游行队伍没有穿过广场,而是每个游行队伍有组织地依次经过所有四个讲演台。台上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代表、“古墨特”的代表、“阿达列特”以及左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向各区、各企业致欢迎词和发表演说。所有的发言简短而鼓舞人心。他们讲话的内容都是革命的号召和党的口号。人们对这一切以高昂的情绪,“乌拉”的欢呼声和热烈的赞扬声表示欢迎。整个广场和邻近的街道挤满了直接从油田赶来的象石油一样黑色的大群工人。

当游行队伍刚开始从广场向滨海大街出发的时候,想不到出现了一帮木沙瓦特派的游行队伍,大约有三、四百人,他们打着蓝旗和绿旗,而且这些旗子相当多。

但是他们并没有能引起任何反应。工人游行队伍按着自己的路线若无其事地从他们旁边走过去。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载着真人造型和五角星的大卡车。巴库

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成员，各工会和党的代表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一路上，游行队伍没有遇到任何障碍。看不到警察，也不见有英军巡逻队。我们的游行进行得这样平静而有秩序，对此我们感到十分满意。

突然，在我们游行队伍的对面出现了两辆英军坦克，沿着街中心缓慢地向我们开来。我们大家心里顿时出现了一个疑团：这是要干什么？怎么办？如何对付？

我们主席团的同志迅速交换了一下意见以后决定：那怕坦克向我们身上开来，我们也决不后退一步。我们紧紧地挽起手，更加高声地唱起歌，继续向前走。当然，我们的心情很紧张，不知道这一切将会有什么结局。但我们外表上却不露声色。我们沉着而坚定地向前走去：管它呢！坦克步步逼近，真是千钧一发，眼看再有几米，坦克就要压到我们身上了。就在这一刹那，坦克突然转向一旁，停了下来，它给我们让了路！

我们为自己的沉着而感到自豪，并以更加高昂的情绪继续前进。不一会儿，在滨海大街上又出现了一长列载着印度雇佣兵的英国车队。这个车队也同样地向我们开来。但快到我们跟前时，也不得不拐到一旁，等我们的游行队伍从他们旁边开过去。

这样，我们沿着花园街来到了一所带有阳台的两层楼房跟前。这是一座独家住宅，我很熟悉它，因为一年前我受巴库革命委员会的委托，在这座房子里逮捕了一个有名的石油资本家塔基阿诺索夫，现在英军司令部设在

这里。英国军官站在阳台上注视着我们的游行队伍。

我们分析了一下情况以后，立刻决定在英军司令部前面举行群众大会。我登上了一部卡车，发表了一篇简短的讲话，内容是反对占领阿塞拜疆的英帝国主义及其盟国的武装干涉，反对殖民主义压迫，要求武装干涉者和反革命势力给东方各民族以自由。发言时，我感到遗憾的是英国军官不懂俄语，而我们也事先没想到要召开这个大会，因此也没带个翻译。

当我结束了自己的讲话以后，一个年轻小伙子，看样子是个大学生，突然跳上卡车，请求允许他把我的发言译成英语。他的声音很大，沉着，坚定。游行群众向他热烈鼓掌。而英国人呢，以他们固有的冷静，不动声色地听完了这个发言，看来他们感到吃惊，但没有任何表示。

游行队伍继续前进，走了二、三百米，我们看见了一座三层楼房，这是英军兵营。英国士兵从窗户里看着我们的游行队伍。游行群众顿时活跃起来。他们一边喊着，一边以各种手势表达自己对士兵们的同情和友谊。而我们那位突然出现的翻译用英语同他们进行交谈。我们专为英国士兵而准备的“直观宣传品”即那些英文标语牌，在这里正好用上了。

后来游行队伍来到了阿塞拜疆国会大楼，这里我们同样组织了群众大会。开始我发言，然后由卡拉耶夫用阿塞拜疆语发言。我从卡车上向国会议员讲话时顺便还说了句：“地主资本家先生们，请你们记住：到下一个‘五

一’国际劳动节，在这所大楼举行会议的，将是阿塞拜疆的工农代表苏维埃！”

果然，第二年“五一”节的前两天，苏维埃政权在巴库取得了胜利。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就设在这所资产阶级国会大楼里。幸福的获得解放的阿塞拜疆人民象欢度节日一样在这天举行了“五一”游行。

游行队伍继续向工人俱乐部大楼前进。工人俱乐部的阳台上布置好了讲台。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召开了群众大会。大会到晚上六点左右才结束。

然后兴高采烈的游行群众开始分散回到各区去。

应该说，这一次游行和那年“五一”节的整个庆祝活动一样，不仅在工人中，而且在市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以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回来了。”他们感到惊奇的是，整个巴库的大街挤满了举着旗帜和标语牌的游行工人，而当地的资本家和警察却躲在自己的房子里和兵营里。看来，他们是无能为力了。这在所有巴库人的思想上是一个巨大的转变。

* * *

第二天，我们正聚集在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办公室，商船队海员代表团突然来了。他们焦急地告诉我们，他们得到英军司令部的命令，要他们准备十八条船，把武器、弹药和军队运往彼得罗夫斯克，去支援邓尼金镇压达格斯坦的革命起义。其中一些船顺路去恩泽里装军火，然后运往彼得罗夫斯克。代表团问我们该怎么办。

当然，我们不能允许英国人去帮助邓尼金扑灭达格斯坦的革命起义。不过，为了使海员们不致遭到可能的报复，我们决定采取灵活的策略。我们指示海员代表团不要公开去违抗英国人的命令，而是向他们表明：没有巴库工人代表会议的批准，他们海员不能执行英军司令部的命令，因为工人代表会议是他们的领导中心。海员们按照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指示对英国人表示，他们什么也不知道，只听从工人代表会议的指示。“要是代表会议批准，我们就一切照办。”

第二天，英军司令部的代表来到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他说，他们急需十八条船，并请求代表会议下令将这批船提供给英军司令部。

听英国军官讲完后，我们对他说，这个问题需要提交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讨论，因此只能在第二天予以答复。

在主席团会议上，我们决定不改变原来的立场，无论如何也不能给英国人船只。

翌晨，英军司令部代表到我们这里来听取答复。我们对他说，他们要船是为了运送武器和弹药去镇压起义，也就是去进行战争，因此，我们作为战争的反对者不能满足英军司令部的这一要求。英军代表听完这样的答复，掉头就走，但马上又回来了，并对我们说：他们只准备要四条船，用来装运药品和粮食，而不是去运送军队和武器。我们回答说：在当前的条件下，运送这类物资等于是间接地支持战争，所以我们对此也不能同意。我们同英

军司令部的谈判到此结束。大家都清楚：商船海员的罢工实际上就从此开始了。

应该提一下，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候，巴库铁路工人代表团也来到了代表会议主席团。他们告诉我们，英国人从海路调运军火的企图失败后，又竭力设法通过铁路把这批军火运往彼得罗夫斯克和迭尔卜特。但是他们铁路工人不想给运，所以来征求意见，问我们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军火从铁路上运走。

现在不仅巴库海路、铁路运输工人和职员开始了带有政治性的局部罢工，而且我们与英军司令部也发生了直接冲突。

来自巴库市各区的消息证实了局势异常紧张：工人们目前的状况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要求立即开始早已准备好的总罢工，争取签订集体合同，而且许多采油场的工人，还没有等罢工委员会指示，就开始了经济罢工。

巴库党委会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当前的局势。同过去一样，我们不急于马上就开始总罢工。但形势逼人：如果不立即宣布总罢工，那么一些地区已经开始了的罢工，就将一个个地被镇压下去。而且工人代表会议规定5月3日前石油资本家、政府和英军司令部必须就集体合同以及与阿斯特拉罕易货问题作出答复的限期已到。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应当宣布总罢工。

这一切都发生在我们等待代表们来巴库出席预定的

高加索边区共产党秘密代表会议的日子里。鉴于当时的形势，有人建议会议改期，代表们返回各共和国，在巴库总罢工结束后再举行会议。但当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共产党员艰苦的工作环境不允许这样做，代表们有可能被捕。而且，他们（其实我们也是如此）缺乏足够的经费。因此，尽管条件极端不利，我们仍然决定举行党代表会议。

5月2日晚，巴库党委会会议结束后，又召开了全巴库党代表会议。会议听取了巴库政治形势报告，并同意我们党委会在这一问题上所采取的方针。

这次会议上最重要的问题是讨论“为苏维埃阿塞拜疆而斗争”这一口号。代表会议确认了口号的迫切性。现在我们可以更有信心地去出席将在5月6日开幕的高加索边区党代表会议了。

遵照党代表会议的决议，5月4日召开了巴库工人代表会议。我们按照新的方法选举了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即每五十名职工推选一名代表（过去各企业推选代表时，不管职工人数多少）。

由于这个缘故，工人代表会议的组成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建议选举新的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建议被通过了。代表们是逐个地选举产生的，每一个候选人都经过讨论。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由共产党人提名的候选人都被通过了，因为绝大多数代表是支持我们的。阿加耶夫、阿纳什金、阿齐姆扎杰、古巴诺夫、伊勃

拉基莫夫、伊里英、米高扬、丘拉耶夫当选为新的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委员；果戈别里泽、卡兹别科夫、波尔托拉茨基和斯图鲁阿当选为候补委员。

我受委托就举行总罢工问题向大会作了报告。这篇报告的摘要刊登在《警钟报》上。现援引如下：

“同志们，正如你们所记得的那样，布尔什维克政权在1917年迫使资本家接受了集体合同。后来，资本家重新掌权，并且拒绝履行这一合同。于是工人代表会议为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开始为恢复这一集体合同而斗争。企业主只打算增加三百六十卢布，并以此来安抚我们。但是工人委员会制定了集体合同，全面向他们提了出来，并为了同企业主达成协议，整整斗了三个月。但是就连那些一贯主张妥协的人们最后也认识到，要想通过谈判同资本家达成协议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发出最后通牒，限定5月3日前作出回答。结果答复却是：关于提高工资——不同意，合理定额——不接受。企业主们向我们挑战了，我们工人绝不能后退，必须奋起应战，继续斗争。既然集体合同是必需的，那就应该为此而斗争。

但是应该从更广阔的角度看这场斗争。要知道，有工业，才谈得上集体合同；工业若是毁灭了，集体合同也就成为一纸空文。而巴库石油工业的问题，也就是巴库本身的存亡问题，整个阿塞拜疆存亡的问题。

这里的一切都取决于石油，能够运出石油就有钱，也就有了满足工人要求的基础。今年开航已有两个月了，但什么东西也未能运出。两亿多普特石油就这样积压在那里！据石油资本家说，在有运载工具的情况下，每天只能运出石油日采量的百分之

十。但就是这些石油也无处可运：南高加索的梯弗里斯、埃里温、巴统不需要这么多的石油。

前几天，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资本家前来以实物换取石油。但他们得知这里的石油价格很高，于是扬言说，他们宁愿用更低的价格向这里出售石油。

这就很清楚，无论处在何种政治形势下，巴库没有俄国，就如同俄国没有巴库一样，无法生存。这不仅是共产党人的看法，也是阿塞拜疆当局的想法。他们需要钱，而他们的货币急剧贬值，威信扫地。不是今天，就是明天，阿塞拜疆政府将发生财政经济破产。

然而盘踞在这里的英国人企图镇压布尔什维克，尽管他们非常清楚，布尔什维克终究是要胜利的。正因为他们知道这一点，所以只要他们还在这里当权，他们就要尽力干，那怕是捞回本钱也好。

然而很清楚，他们也无法摆脱困境。

例如，现在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上那儿搞钱来支付薪饷呢？没有钱，石油无处可运，整个社会生活将因此而停顿，这将使所有的居民受到致命的威胁。即使现在开始输出石油，也只能运出很少一部分。

这就是说，应该减少采油量。但如果不能运出石油，这也无济于事，我们仍将挨饿。谁不相信这一点，那就请他回忆一下，在这里一公斤黑面包贵到十五个卢布时的情景吧！

阿塞拜疆政府同意易货，而英国人却进行阻挠。于是软弱无能的政府只好对他们让步。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扼杀苏维埃政权。他们象一伙强盗，闯进我们的家里，抢劫、放火，为所欲为。巴库无产阶级自己应当把这些老爷们赶出去。

我们应该出来赞成易货并为之而斗争！

莫斯科国民经济会议的代表前几天在这里说，他们有十亿俄尺布匹、还有鞋和其他商品可用来进行交换。可见，易货是完全有条件的。

巴库无产阶级应该投入战斗。他们的利益就是整个文明社会的利益，就是文明的利益。

不要以为，我们的敌人——英军司令部——真是这么可怕。要知道，他们害怕自己的士兵，不信任他们，而士兵们也不信任自己的长官。‘五一’节前不让士兵们走出营房，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最好证明。士兵们得到我们的英文传单很高兴。很清楚，在英国人那里革命也为期不远了。但是他们在这里远离祖国，犹豫徬徨，归家心切。

由于英国人不信任自己的士兵，所以他们也就害怕逮捕我们。胜利必将属于我们！全体劳动人民的同情在我们一边，因为我们是为争取所有的人和为所有的人而斗争的。

我以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的名义建议就在今天作出决定，投入有组织、有计划的斗争，避免过火行为，反对那些阻挠我们与阿斯特拉罕建立联系的人们。

当然，在这场斗争中，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但宁可遭到一些牺牲，也比以后大家饿死要好。

海员同志们已经开始斗争，他们拒绝提供轮船运送军队和装备去援助‘志愿队’^①，这些‘志愿队’和英国人一道妄图象屠

^① “志愿队”是沙皇将领组织的白卫反革命军队。1918年至1920年，“志愿队”依靠外国武装干涉者的积极支持进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战争。——译者

杀布尔什维克一样去屠杀达格斯坦人民。因此，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下令海员不给一条船。英军当局用解雇所有海员来进行威胁。海运部门主管人勃拉翁在给水运工作者联合会的函件中写道：‘鉴于你们昨天的决定，现通知如下：如果这一决定不予以撤销，我将于5月2日起暂停发给邮船以外一切船只的薪水。此外，如果“凡城号”、“赤道号”、“厄尔布鲁士峰号”和“西方号”拒绝出海的话，根据昨天的命令，我要求你们把全体船员从这几艘船上赶走。’

海员们将同我们在一起！铁路工人将支持我们！

英国人想用饥饿扼杀我们。然而将不是他们扼死我们，而是我们扼死他们！（热烈鼓掌）”

围绕我的报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人发了言。所有的发言者，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右翼“古墨特”党人，都表示赞成宣布罢工。其中有个发言者建议宣布政治罢工，但其他人（这是大多数）举出各种理由拥护经济罢工。铁路工人代表表示，他们准备立即开始罢工。海员也表示了同样的意见。

一个名叫苏姆巴特的阿塞拜疆工人作了很精彩的发言。他说：“穆斯林工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的利益。他们可能脱离自己的队伍。为了避免这一点，必须在他们中间进行专门的工作，解释罢工的任务。穆斯林工人承受着世界的和当地的帝国主义分子的双重压迫。只有在俄国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他们才能获得解放。”一个叫米纳耶夫的海员在讲到即将开始的罢工时，以“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万岁！”的口号来结束自己的发言。这

些话,尤其是因为出于一个俄国海员之口,博得了所有与会者暴风雨般的掌声。

我在闭幕词中,特别详细地谈了政治罢工的问题。我说:巴库无产阶级富有进行政治总罢工的传统。这个武器我们今后仍将掌握在手中,以便在适宜的时机运用它。但要求把当前这次罢工宣布为政治罢工,是不对的,甚至是有害的。在这次罢工中,我们提出的纯粹是经济上的要求——集体合同和易货。只有我们的敌人——木沙瓦特党人和占领者为了找借口镇压罢工工人,才会给我们的罢工贴上政治标签。因此我们暂时不提出任何政治要求。在这次罢工中,我们既不反对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也不反对英国占领军。当然,经济罢工可能带有,也往往带有政治意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罢工都要成为政治罢工。这次,我们应严格坚持经济要求。

代表会议一致通过如下决议:

“巴库工人代表会议听取了主席团的报告。报告指出必须签订集体合同和同阿斯特拉罕易货,以便把巴库工人和阿塞拜疆全体居民从饥饿的死亡线上,从财政、经济危机中拯救出来,避免因石油不能运出而发生停产的局面。大会通过如下决议:无论如何要通过经济罢工达到接受集体合同和向阿斯特拉罕输送石油的目的。罢工开始和结束的日期,同罢工程序一样,委托主席团和中央罢工委员会决定。中央罢工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团,各区两名代表,各工会两名代表,边区总工会一名代表,海员——一名代表,铁路员工——一名代表。罢工委员会

聘请的各党代表只拥有发言权。”

应该指出，那时工人代表会议完全按另一种方式开始同英国占领军打交道。

我想起这样一件事：5月4日工人代表会议开会的时候，我从主席团出来到走廊去，在走廊里碰见了一个又高又胖的英国军官，他正向讲台走去。我以为他走错了地方，不知道礼堂里正在开工人代表会议的例会。于是我便向他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他却用一口流利的俄语平静地回答道：

“我知道。我过去不止一次出席过这样的会议。”

这个军人是沃尔顿大尉，后来在各种场合我们还同他打过交道。

我对他说：“您不能出席这个会议。不过也可能准许您出席。请等一下，我去问问。”

我到会场作了临时的发言。我说英军司令部的代表希望出席会议。据他说，孟什维克过去曾允许他出席这样的会议。

大会一致拒绝沃尔顿的请求，认为英军司令部的代表不能出席会议，同时，建议英国士兵推选出自己的代表出席我们的会议。工人代表会议将象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高兴地接待他们，但它“不能接待帝国主义的代理人”。这一决议在暴风雨般的掌声和赞成声中通过了。

我把这一决议通知了沃尔顿。他感到很惊奇。我以代表会议的名义请他向英军士兵转达我们的邀请。

5月5日，由工人代表会议推选出的罢工委员会举行会议。委员会通过关于开始罢工的决议，并向阿塞拜疆部长会议主席、英军司令部（通过沃尔顿大尉）、石油企业家联合会理事会发出了巴库无产阶级的请愿书，而且把抄件发给所有的船主、企业主以及劳动部长。其内容如下：

“中央罢工委员会遵照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今年5月4日的决议，宣布于今年5月6日起开始经济总罢工，并向石油企业家代表大会提出以下要求：

1. 接受工人代表会议制定的集体合同。
2. 同阿斯特拉罕建立易货，解决未被满足的一系列其他经济要求。

如果你方表示愿意满足我们所提出的要求，中央罢工委员会将准备同你们进行谈判。”

实际上水路和铁路运输系统的罢工早在5月5日就已开始，目的在于阻止军用列车、军用物资运往达格斯坦的邓尼金军队。当时邓尼金的军队已采取军事行动镇压革命的山民。

南高加索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又提出了民族问题；在罢工的日子里；我们被逮捕；孟什维克新的叛卖行为；逃出巴库监狱；罢工的教训。

5月5日边区党委会委员和南高加索党代表会议的代表聚集在巴库。边区党委会举行了会议。在会上，我们向前来开会的同志介绍了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件。他们赞同关于总罢工的决议，并同意我们的做法，即：尽管巴库形势十分复杂，但不能推迟召开边区党代表会议。包括我在内的几个负责领导罢工的巴库同志，被允许可以不出席代表会议的所有会议。

参加边区代表会议的代表（其中包括外地来的代表）大概有二十五到三十人左右，确切的人数已记不清了。从外地来的代表中我记得有：马哈拉泽、米沙·奥库贾瓦、奥拉赫拉什维利、纳泽列强、沙维尔江、托罗舍利泽、姆拉维扬、拉多·杜姆巴泽、费多尔·卡兰塔泽、卡霍扬、格奥尔基·斯图鲁阿、别索·洛米纳泽。其他人的名字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出席会议的还有达格斯坦和北高加索的代表。代表会议是在卡斯帕罗夫家的住宅里举行的。记得第一次会议是5月7日早晨9点开始的，当时我们决定会议要开到深夜，中间只作几次短时间的休息。米沙·奥库贾瓦当选为代表会议主席，果戈别里泽和米尔佐扬当选为大会秘书。

会议首先听取了各地区的报告。此外还听取了两个总结报告：一个是设在弗拉基高加索的边区党委会提出的关于北高加索地区的工作报告，报告人是菲利普·马哈拉泽；另一个是萨尔基斯·卡西扬代表梯弗里斯领导核心所作的报告。因为我正在出席中央罢工委员会的会

议，所以我没有赶上听这两个报告，只参加了对报告的讨论。

同志们严厉地批评了边区党委会在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工作中的缺点。后来我听说，马哈拉泽总是千方百计地进行解释，为边区党委会工作中的缺点“寻找根据”。我还听说，卡西扬的报告总的说来是很枯燥的。卡西扬虽然承认边区党委会领导不力，但是他企图把这种情况都用条件困难以及缺乏领导干部来解释；而条件困难则是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和亚美尼亚的达什纳克党人造成的，领导干部缺乏是因为许多同志到北高加索去了。

我在报告中介绍了巴库和阿塞拜疆的形势。

从大会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尽管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共产党人不断遭到迫害，但是，那里党的工作近几个月来颇有起色。在工人中间以及一些县的农民中间共产党人的影响扩大了。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许多地区正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达格斯坦的小资产阶级山区政府的权力只能伸展到捷米尔—汉—舒拉和迭尔卜特。达格斯坦的其它地区则处于达格斯坦省党委会领导下的起义队伍的控制之下。

在邓尼金匪帮和革命的起义队伍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战斗。邓尼金匪帮占领了彼得罗夫斯克，然后又占领了迭尔卜特。我们知道，尼古拉·基卡罗和阿斯兰别克·什利波夫领导的游击队正在切禅山区进行活动。至于达格斯坦的情况，我们巴库的同志早在代表会议之前就知

道了，因为从3月份起达格斯坦的同志经常到我们这里来汇报情况。

代表会议通过了积极支持战斗的达格斯坦的决议。

会上洛米纳泽对边区党委会从梯弗里斯工人代表苏维埃中召回一批共产党员代表一事提出了正确的批评。我们这样做是使自己丧失了一个虽说并不好、但毕竟是能够传播共产党人声音的合法讲台。

民族问题是会议辩论的中心议题。这一辩论最初是从菲利普·马哈拉泽批评巴库共产党员提出的“独立的苏维埃阿塞拜疆”的决议而引起的。马哈拉泽不顾生活本身发生的新情况，仍然教条式地坚持旧的立场。我们巴库的共产党员理所当然地在会上批评了马哈拉泽。

我们着重指出，“木沙瓦特”的力量，就是用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口号来迷惑人。如果我们把这一口号作为自己的武器，当然赋以我们自己的苏维埃的内容，这样我们就能够在那些违背本阶级利益而支持“木沙瓦特”的劳动群众面前揭露“木沙瓦特”。劳动群众将会按照他们本阶级的利益去行动，他们也就能从民族欺骗的迷雾中摆脱出来。我反驳马哈拉泽说，现在的情况和1917年完全不同，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也是错误的。我们当时没有支持斯捷潘·邵武勉提出的关于把南高加索地区划分为三个部分，并在边区建立三个民族自治区的主张。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三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实际上已经存在一年多了。尽管它们的独

立是表面的，因为实权掌握在英国占领军司令部手里，但不能不看到存在民族国家这一事实。如果按照马哈拉泽所建议的那样，不承认民族国家，我们就必然会使自己脱离阿塞拜疆人民中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小资产阶级阶层；而如果不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建立紧密的联盟，在高加索的条件下苏维埃政权要取得胜利并想站住脚是不可能的。

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这表明我们同马哈拉泽以及支持他的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同志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语言。于是我们坚决表示，我们不能放弃独立的苏维埃阿塞拜疆这一口号，不过作为一种妥协的办法我们不对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提出这个口号，但要以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同志不反对我们的主张为条件。于是我们就这样达成了协议，同时商定，这个问题最后由俄共(布)中央去决定。

会议一直开到深夜。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离开会场时，天已经亮了。上午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新的边区党委会。

大会代表返回各地去了。在罢工进行期间，斯图鲁阿、马哈拉泽、姆拉维扬和洛米纳泽暂时留在巴库。

重新当选的边区党委会就组织问题通过了一项新的决议。根据我们的提议建立了边区党委会巴库局，由在巴库的边区党委会委员组成。我们被授予广泛的权力，可以决定有关阿塞拜疆的一切问题，并在以后就这些问题

向边区党委会作报告。这种组织上的改组对于更有效地指导迅速变化着的形势是必要的。巴库局实际上已经成为领导阿塞拜疆布尔什维克全部工作的机构。

* * *

我已经说过，中央罢工委员会决定在5月6日发动总罢工，并规定夜里三点钟停止供电作为开始罢工的信号。记得把全市所有的企业和机关分成三个组。第一组有发电站、铁路和水运部门；第二组是其余的企业和团体；最后，第三组即后备组包括自来水厂、屠宰场、医院和合作社。

我们知道，虽然采取了种种保密措施，但是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仍然有可能被捕，所以我们决定成立后备的罢工委员会，并预先确定了它的人选。罢工委员会的第一套班子有五个人，他们是古班诺夫、卡拉耶夫、米高扬、斯图鲁阿和丘拉耶夫。我们任命果戈别里泽为后备的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此外，还是为了防备万一，我们又建立了以阿纳什金为首的罢工委员会的第三套班子。当时曾决定，当罢工委员会第一套班子进行活动的时候，第二套、第三套班子的同志不参加罢工的领导工作，而要各自在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中所担任的岗位上进行工作。如果第一套班子被捕，第二套班子自动地接替他们；还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候补委员也自动递补为主席团正式委员。委托后备的罢工委员会在征得各区的同意之后挑选后备的区代表参加中央罢

工委员会；委托各工厂和各企业委员会领导本单位的罢工。当时还决定，动员二十名负责干部归中央罢工委员会调动，以执行罢工委员会在罢工期间交给的各项任务。责成青年委员会派出必要数量的人员组成罢工委员会纠察队：他们负责罢工委员开会地点外面的保卫工作，一旦发现警察，要立即报告，还要执行罢工委员会交给的各项事务性工作。

罢工的条件非常困难，必须对全部工作实行严格的保密。为此，决定：罢工的领导人不得在我们合法活动的中心——工人俱乐部露面；罢工委员会每天开会两个小时左右，每次开会都要换会址（会址照例是保密的）。应邀前来参加会议的各区同志一般先到工人俱乐部，然后再由我们的青年地下工作者分批把他们带到开会的地方。在会议结束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会场。这样做是为了使混进来的内奸在会议结束之前不致离开会场去告发开会地点。为了使中央罢工委员会委员和区罢工委员会委员之间保持联系，确定工人俱乐部为秘密接头的地点；如果工人俱乐部被查封，就改在印刷工人协会和石油工人协会秘密接头。

正如预先规定的那样，夜里3点整灯灭了。罢工开始了。

铁路和水运部门的工人和职员前一天就开始罢工了，现在第二批企业单位和团体也和他们一起参加了罢工。

但是否所有企业的工人都罢工了呢？这个问题很自然地使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担心。早晨各区会有汇报送来，我们焦急地等待着。

我们担心政府料到要举行罢工，会连夜逮捕发电站工人并派工贼到发电站重新供电。于是我们特意派了一个人去发电站把机器的主要部件卸下来并藏在可靠的地方；没有这些机器部件发电站是不可能供电的。我们特别担心巴依洛夫发电站的情况，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在那里的影响仍然很大。

应该指出，一般说来巴依洛夫、白城和巴拉汉内这三个巴库发电站在罢工中能起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不能不考虑到城里突然一片漆黑给居民造成的巨大的心理上的影响；第二，断电会使形形色色的工贼无法活动，如果他们是混在巴库工人中间的话。

清晨获悉，在我们计划之内的所有企业都罢工了。当局立即开始逮捕工人领袖，特别是在我们的影响还不够大的阿塞拜疆工人中间进行逮捕。当局采取了欺骗、造谣和威胁的手段。结果在穆斯林占多数的一些地方，罢工开始时不够坚决，有时候工人甚至同意复工。鉴于这种情况，罢工委员会于5月6日召开全体会议，听取了各区的情况报告。

就整个情况来说，罢工进行得很顺利，并且是团结一致的。政府继续采取镇压措施：逮捕发电厂的最熟练的技术工人，并且用暴力强迫他们上工。巴依洛夫发电厂

有几个工人就是这样被拘留了。罢工委员会立即下令在罢工进行期间暂时把发电厂的熟练技术工人转移到别的地区去，以免警察找到他们。这一点是做到了。但事后才知道，我们在巴依洛夫发电厂的同志并没有来得及把机器部件藏起来。总之，发现了不少漏洞。我不得不专程赶到白城，以便通过我们的同志争取使停电的决定得到执行。

政府官员找不到工人，于是就逮捕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或把他们赶出家门。敌人的镇压变本加厉了。但是，镇压的办法在个别场合对穆斯林工人还能起些作用，但用这种办法来对付另外一些有觉悟的工人是根本不能遂其心愿的，而只能更加激起工人的仇恨。

政府、英军司令部以及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民族集团，他们之间一向都是勾心斗角，可是现在却串通一气来反对我们。他们极力对我们进行挑衅和诽谤。宪兵、警察和政府的狗腿子在穆斯林工人中间散布种种流言蜚语，例如，他们胡说什么罢工不是为了改善阿塞拜疆工人的生活，而是俄国人和亚美尼亚人专门为了反对整个阿塞拜疆，其中也包括反对穆斯林而搞起来的；还胡说什么俄国人已经武装起来，要屠杀穆斯林。

在那些日子里，只有《阿塞拜疆报》没有罢工，因为该报印刷厂的排字工人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反对罢工的木沙瓦特分子。这家报纸通篇都是对我们的谩骂和诽谤。

特别是5月8日，《阿塞拜疆报》发表了一篇在英国

占领者的指使下炮制的所谓政府呼吁书。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在呼吁书中对罢工的意义和目的进行了歪曲和捏造，围绕着罢工问题大造有利于他们和占领者的社会舆论。呼吁书认为工人代表会议宣布的总罢工是政治性的，是由“同情布尔什维克、反对阿塞拜疆民主的分子和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走狗所领导的，其目的是要反对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基础和国家体制”；呼吁书号召巴库工人复工，并宣布委派一名部长“和企业家、工人共同商讨工人们提出的正当的经济要求”。但是，工人能否响应他们的号召，当局显然没有把握，于是便威胁工人说，如果不复工，就要受到惩罚。他们公开扬言，“凡是破坏政府、公共机关以及私人团体正常工作，将根据战时法令予以惩办”。

该报在发表政府呼吁书的同时，还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木沙瓦特党”巴库委员会的号召书。号召书毫不隐讳地说：“布尔什维克欺骗工人，把他们推上了危险的道路，唆使他们举行冒险的罢工。然而他们却对你们说，这是什么经济罢工。这是谎言！这次罢工是政治性的罢工，并且是为了要达到布尔什维克所追求的目的……同志们，你们不要相信那些伪装的冒险家和造谣者的话。”

我们的敌人竭力把事情说成好象是布尔什维克这些苏维埃政府的“走狗”要打内战，要杀光穆斯林等等。5月8日，还是那家《阿塞拜疆报》在一篇题为《罢工的真相》的文章中胡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很快就要给正在恢复

⑤
五
下

安定的生活的阿塞拜疆带来一场流血惨祸——民族倾轧和政治上的残酷斗争，其悲惨情景巴库无产者是深有体会的……工人俱乐部里的政治狂人为了达到其卑鄙的目的，公然撒谎，大造谣言，并且无耻地用失业和饥饿来威胁工人群众。”

对于资产阶级报纸的这种挑衅行为绝不能置之不理。我们知道，报刊的鼓动工作对于坚持罢工能够起巨大的作用，所以早在罢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便决定出版《罢工委员会消息报》。我们把这件工作委托给印刷工人工会理事会理事阿尔沙克·哈奇耶夫。尽管有警察的迫害和其他困难，我们还是出版了两期《消息报》。但是警察不久就占领了所有的印刷厂，不准报纸继续出版。于是，我们改出小型传单。

委托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起草一篇专门给英国士兵的呼吁书，说明我们的罢工是经济性的、和平的罢工，要他们不要干涉罢工，因为在他们自己的祖国英国工人为争取实现经济利益经常举行这样的罢工。我们提醒英国士兵，他们的司令部企图驱使他们充当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

记得呼吁书写好后，便译成英文，并铅印成传单。我们委托青年工人中的国际主义者青年工人联盟的成员——巴库的女青年到英军士兵中去散发这些传单。在此以前，她们就奋不顾身地帮助我们完成党的各种任务。当时我们估计英国士兵或水兵不会因为女青年向他们散

发传单而对她们下手；若是男人就可能因此而被逮捕。应当看到，女青年后来向我们汇报她们执行任务的情况时是多么兴高采烈啊！

罢工是在艰难曲折中进行的。虽然在名义上这是一次总罢工，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得不在每一个工厂企业、每一个地区同许许多多政府的狗腿子、警官和宪兵进行坚决的斗争。这帮家伙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工作：在工厂鸣汽笛诱骗工人，威胁工人，对他们采取恐怖手段，进行逮捕等等。

当然，敌人的这一着在一部分工人中起了作用。有的地方罢工没几天就复工了。但大多数工人仍在英勇地坚持斗争。

警察加紧搜捕罢工委员会委员。我们日以继夜地工作着。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和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开会地点，有时一天之内不得不变换几次。各区不断有当地的罢工委员会委员被捕。但是尽管如此，罢工的领导机构仍继续进行活动：后备的骨干分子接替了被捕同志的工作。

5月8日，中央罢工委员会通过工人俱乐部接到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劳动部提出的关于举行谈判的建议。我们提出谈判的先决条件是：释放所有被捕人员，立即停止镇压和挑衅，保障我们的代表团的人身安全。

劳动部同意了这些要求。于是由罢工委员会推选的我们三名代表——卡拉耶夫、丘拉耶夫和我当晚便前往

劳动部。

我们走上二楼，进了一间大会议厅。部长萨菲丘尔茨基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他让我们在他右边就座，我们的对面是资方代表——三个上了年纪的肥头大耳的家伙，一个俄国人，一个阿塞拜疆人，一个亚美尼亚人。稍远一点坐着工厂的厂监以及国会议员阿比洛夫。英军司令部的代表沃尔顿大尉单独坐在一边。

我们事先已商量好，在谈判中由丘拉耶夫和卡拉耶夫担任主角。应当说，丘拉耶夫对集体合同中规定的条款最了解，并且熟悉为争取签订这一协议而进行的斗争的全部细节。而卡拉耶夫要强调指出向阿斯特拉罕输出石油的重要意义，坚持要求搞好同苏维埃俄国的易货，阐明这样做不仅对巴库工人，而且对阿塞拜疆的整个经济都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说，他们把我们所以提出这些要求的原因讲得很有根据，说明巴库工人目前的困难处境，指出如果输往阿斯特拉罕的石油问题不立即得到解决，石油工业将会陷于崩溃，巴库将遭到毁灭和饥馑。

工厂厂监、阿比洛夫和英军代表始终一言不发，他们没有参加谈判。

资本家一个接一个地发言，他们激烈地争辩说，合同中的一些重要条款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声称，如果往阿斯特拉罕输送石油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就拒绝签订任何一种集体合同。于是我们又不得不和英军司令部面

对面地进行斗争了，而英军司令部是明令禁止向阿斯特拉罕输送石油的。当时完全没有往外地运输石油的技术设备，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建立起来这样的设备。巴库的石油工业正面临绝境。

谈判还在进行，我离开了座位，来到沃尔顿大尉跟前。我问他是否向英国士兵转交了工人代表会议要他们派代表的邀请书。他回答说，邀请书已转交给司令部，大概司令部已通知士兵了。于是我问他对我们就这次罢工向英国工人发出的呼吁书怎么看。沃尔顿回答说，很遗憾，我们五一节的标语和呼吁书的英文很糟，错误很多，他读起来很困难。我笑着回答他说，巴库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后，我们一定请他本人担任我们的翻译，那时我们的呼吁书和宣言文理就会比较通顺了。他酸溜溜地笑了一笑。

应当指出，在这次会上，萨菲丘尔茨基部长扮演了一个十分可悲的角色。他推说英军司令部不准向阿斯特拉罕输送石油，认为这样做是帮布尔什维克的忙，所以阿塞拜疆政府也不能这样做。关于集体合同，他说，除了一些条款，特别是权利方面的条款（如：招工、解雇等等）之外，他将尽量让企业家们签订这个合同。此外，他建议削减我们要求增加工资的数目。

辩论持续了将近三小时之久。我们很清楚，谈判不会有什么实际结果。

于是，我向部长作了大致如下的声明：我们知道，往

阿斯特拉罕输送石油不仅是对巴库工人的支持，而且也是对苏维埃俄国的支持。我们主张向俄国提供这样的支持，因为阿塞拜疆人民最好的朋友是苏维埃俄国，而不是英帝国主义者。同时，我们并不反对阿塞拜疆的独立，苏维埃俄国也不会去推翻现存的阿塞拜疆政府，如果它同意向苏维埃俄国出售石油的话。在这里阿塞拜疆和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我说，这一点从你们政府关于希望和阿斯特拉罕易货的声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由于英军司令部的反对你们变卦了。那末，请问阿塞拜疆的独立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你们是在维护谁的利益呢？是英国占领者的利益，还是阿塞拜疆的利益呢？社会主义的部长先生，请您直截了当地回答我们吧！

萨菲丘尔茨基含糊其辞地嘟囔了几句什么“不能无视现实状况”，就要各方说出自己最后的意见。

丘拉耶夫表示，在向罢工委员会报告之前，我们代表团没有权力放弃罢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因为只有罢工委员会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明天我们召集中央罢工委员会会议，讨论你们的建议，然后再做答复。”

资本家们也答应把我们谈判的情况向石油企业家联合会报告。部长在会议结束时声称，政府做出的关于在谈判期间不逮捕罢工者的保证仍然有效。

谈判到此结束。

我们刚刚走出大门没有几步，就被五个身高体壮的

警察围住了，他们宣布我们被捕了。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是被请到劳动部来进行谈判的，我们的人身安全是受到保障的，但还是无济于事。萨菲丘尔茨基显然欺骗了我们，他真是一个大骗子，说了话不算数。卡拉耶夫便以国会议员的身分，坚持要警察和我们一道上楼去见劳动部长，他现在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问一问他对我们怎么办。幸亏卡拉耶夫是国会议员，这对警察起了作用，他们听从了我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了部长的办公室。我们对部长说：“让我们怎么能相信你这位社会主义的部长的诺言呢？难道你当真没有勇气遵守自己的诺言吗？”

萨菲丘尔茨基装作很过意不去和很吃惊的样子，对警察发了一顿脾气，命令他们放我们走。我们出了大楼，便迅速散开，分头走进漆黑的小巷，以免再落入敌人的圈套。

5月9日，英国将军米尔纳用一种粗野语气公然宣布，英国军队所以要占领南高加索是为了“在这次和平会议彻底解决领土问题以前维护法律和秩序……”

我，本通告的签署者，以驻南高加索英军总司令的身分特此宣布：

居民的义务是完全安分守己，各守本分……如有违反自己应尽之义务者，则依战时法令制裁……凡违反本通告之任何一条规定者，将被送交军事法庭，处以死刑，或者根据情况给予轻于死刑的惩罚”。

几百年来，英国殖民主义者无论是在非洲，还是在亚

洲通常都是这样干的。然而这位威武的将军这一次却忘记了,现在不是那种时代,那种人了……

起初,我们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青年们出色地完成了联络任务,他们机智勇敢,忠心耿耿。但是,保密工作一天比一天困难了。要寻找新的会场,特别是为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这样的大型会议寻找会场是非常困难的。

5月9日早晨预定要分区召开工人大会,因为不仅要收集关于斗争进行情况的报道,而且还要支援工人们,提高他们的斗志。于是决定罢工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都分别到各区参加工人大会,并在大会上发言。

我和丘拉耶夫前往黑城,出席在诺贝尔饭厅召开的工人大会。饭厅里挤满了人,进不去饭厅的工人成群地站在街道上,宪兵也一排一排地站在那里。

发言都相当简短。但令人感到黑城的工人情绪都非常高。当地青年出色地为我们组织了警卫工作。当大会结束后,我们走下讲台,穿过人群时,护送我们的青年工人多次给我们更换帽子。他们领着我们走只有他们才熟悉的那些小巷和门洞,然后把我们领上大街,让我们坐上一辆四轮马车。我们前去参加在石油工人工会召开的罢工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例行会议。

这一次违反了秘密工作的规定,因为在这里开会已是第二次了。不过在会场周围还是布置了可靠的青年纠察队。

我们一面听取各区的情况汇报，一面立即向各区的领导人作指示。我们听说，英军司令部已经把英军一个工兵营派到巴依洛夫发电厂，企图使发电厂恢复供电。（后来得知，他们企图发电的计划不但没有实现，反而由于不懂操作规程，有两个人丧了命。）巴拉扎雷火车站的情况最困难，在那里资产阶级政府还是把火车发了出去。

早在罢工一开始的时候，一些被停止担任被选任职务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向我们表示，他们愿意为我们做一些一般的工作。我们同意了，何况有些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在这样做了。当时在巴拉扎雷没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于是便把社会革命党人列勃鲁赫作为我们的特派员派到那里去了。应当说，这些转向我们这边来的社会革命党人在初期还算认真执行罢工委员会的各项任务的。但是斗争越是激烈，他们也就越来越快地滑向无政府主义。例如，在巴拉扎雷，他们建议拆除铁轨、炸毁路基，以便使火车不能通行。（资产阶级政府利用工贼以暴力手段迫使工人还是把一部分火车开走了。）他们还建议炸毁通往城市的输电线等等。

当然，这些建议我们都坚决拒绝了。

中央罢工委员会正在开会的时候，我离开会议室到隔壁拐角上的一间大屋子里去；那里也是工会的办公室。我突然发现警察把毛瑟枪口从四面八方对准了我，并大声喝道：“站住！”我立即转身跑回会议室，告诉同志们我们被警察包围了。我刚刚对他们说完：必须销毁哪怕是

可能给我们造成任何一点不利影响的所有文件，这时一个警官带着两个宪兵就进屋了。

应该说，所有在场的人此刻都表现出惊人的镇静。命令我们到一个大房间去。必须马上销毁文件。我手上的文件相当多。我们把文件撕成碎片。幸好我们趁乱把所有文件都销毁了。

房间里一共有四十个人：除了罢工委员会委员，还有各区的代表、青年通讯员和正在用油印机干活的同志。（油印机是我们不久前买来印传单的。）

他们把我们带到街上，让一大群警察围着我们，把我们带到宪兵队去。在大街上，我们昂首阔步，高唱革命歌曲。行人们停了下来，他们好奇地、怀着明显的同情目送着我们。

到了宪兵队便查问我们的姓名。路上我们已商量好，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丘拉耶夫、阿纳什金和我承担全部责任；警察认识科瓦利和米尔佐扬，他们两个人可以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但不能承认参与罢工的领导；多数同志是警察局不太熟悉或根本不认识的，必须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不承认参与罢工的领导；其余的同志不会有什么危险，不必隐瞒自己的姓名。

已经商定罢工委员会委员古班诺夫要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在登记的时候，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动摇了，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不久前从梯弗里斯来的格奥尔基·斯图鲁阿也同我们一起被捕。警察局知道他是罢工

委员会委员，但并不认识他。侦缉处处长问：“你们谁是斯图鲁阿？”我们回答说：“斯图鲁阿已经回梯弗里斯去了。”这样警察局未能证实斯图鲁阿也在我们当中。在审斯图鲁阿的时候，他说自己叫阿哈巴泽。罢工委员会委员卡拉耶夫也被捕了。他利用他是议员的身份，要求立即释放他，他果然被立即释放了。

了解清楚被捕人的身份之后，侦缉处长宣布，丘拉耶夫、米尔佐扬、科瓦利、阿纳什金和我五个人要同其余被捕者隔离开。此外，他又向我和科瓦利宣布，因为策动武装起义，奉英军司令部的命令逮捕我们，由英军司令部直接处理。关于这一点现在仍保存有一份很有趣的文件，即巴库侦缉局局长给巴库省长的报告。

后来，我们五个人被带到警察局侦缉处。其余的同志继续留在宪兵队，不晓得下一步的情况将会怎样。我们被押着在大街上走，一大群青年——国际主义者青年工人联盟的成员，盯着看警察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

我们被关在侦缉处的一间又黑又脏、窗户残缺不全的小屋子里。我们都累得精疲力尽，都想就地躺下睡一会儿。五天来，我大概总共只睡了几个小时。但是在这里还是睡不成。我们刚刚蜷缩着身子打了一个盹儿，就从隔壁房间里传来了可怕的喊声和惨叫声，警察正在那里拷打被捕的人。喊叫声对我们的心情当然是有影响的。眼看就要轮到我们的了。

终于把我们带到巴库侦缉局局长法塔利别科夫的办

公室。他问我们的名字，我们说了自己的姓名。法塔利别科夫开始审问丘拉耶夫和科瓦利，极力地刺伤他们的自尊心，企图让他们承认自己是布尔什维克。他对他们说：“你们这些胆小鬼，从来不敢坦白招认，而我已经对这种无谓的耗费时间厌烦透了。”他对一再声明自己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科瓦利特别凶。英国人显然指示法塔利别科夫，不管科瓦利是否参加罢工，都要逮捕他。我们为他辩护说，我们五个人中只有米尔佐扬、阿纳什金和我三个人是布尔什维克，丘拉耶夫是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而科瓦利是群众。

法塔利别科夫还是不相信他们两个人不是布尔什维克。在我们要求他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审讯之前，他一直喋喋不休地用问题来折磨他们。于是他让我们写一张字据，说我们三人是布尔什维克，丘拉耶夫和科瓦利与布尔什维克党毫无关系。应该说，我们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我们本来可以简简单单地写我们是共产党员或布尔什维克（这样一来，必要的时候可以设法支吾过去），但我们却写了我们是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党员。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个党在阿塞拜疆是非法的；单单凭是这个党的党员这一条，就会很容易地落入英国占领者的魔爪。

在法塔利别科夫之后，又把我们带到他的助手巴丘林——一个沙皇上校那里去受审。他怎么也弄不懂，什么是工人代表会议、代表会议主席团、工人俱乐部和罢工委员会。他把这些概念混得一塌糊涂。看来，他是一个

很爱唠叨的人。当他谈得兴高采烈的时候，便情不自禁地对我们说，他正在研究文学，甚至自命为剧作家，正在写什么悲剧。为了显示他对布尔什维克为反对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而进行斗争这一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解，便非常“形象地”对我们说：“假如在教堂的圆屋顶上，挂着散发着香味的热烤羊肉，还有卡赫齐亚^①葡萄酒、水果和其他丰富美味的食品，人们便会顺着墙爬上去，都想先拿到烤羊肉。于是，他们从墙上滑了下来，摔了下来，你拉着我的胳膊，我扯住你的腿，一个个都摔了下来。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达到预期的目的。你们的斗争也是这样的。诸位先生们，难道至今你们还不明白吗？你们何必毁掉自己的生命呢？何必为了追求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而去冒险呢？”

宪兵队白匪军官的“哲学”说教使我们听了真是嗤之以鼻。我们当然不想就这个题目同他辩论，只是一笑了之。看样子，他还有点自鸣得意呢！随后，他一个一个地详细地讯问我们，但态度已不那么粗暴了。他问我们叫什么名字，什么地方人，在巴库住在什么地方，是哪一个人的党员以及我们对罢工持什么态度。他一边审问，一边认真地记下了我们的供词，并让我们签字。

夜里两点钟左右，令人厌倦的审问终于结束了。巴丘林给英军司令部参谋部打电话，询问下一步怎样处理

^① 卡赫齐亚是南高加索格鲁吉亚的平原，境内有卡赫齐亚山脉。该地区产葡萄。——译者

我和科瓦利，因为我们是归英军司令部直接管的；把我们送到军舰上去，还是送进监狱？得到的命令是：暂时都送进监狱。

后来他草拟了一份将我们五个人送进巴库中央监狱的决定，送法塔利别科夫签字。这个文件现在也保存在档案馆。

夜里三四点钟，我们被带到中央监狱。我们五个人都被关在五层楼的一间囚室里。这幢楼是关押死刑犯人和终身苦役犯人的。囚室的门都是厚厚的铁门，铁门上有一个陀螺式的视孔。我们要求给我们床，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们就睡在水泥地上，但睡得象死人一样。

第二天，副省长来到我们囚室。我们又要求给我们床，并要求给我们换地方，因为我们现在既不是死刑犯，也不是终身苦役犯。顺便说一句，记得当时我还同副省长开了一个玩笑，我说，监狱设备条件好，对于他个人的利益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说不定在我们之后，他本人也可能在这里坐牢。不知道是这句话起了作用，还是他原来是一个明智的人。但不管怎么说，总算给我们送来了床。

不久，一些刑事犯捎来了由于积极参加罢工而被捕的同志们写给我们的字条。在这所监狱里已关有二百人左右。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已向监狱当局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我们转到他们那里去。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要砸门。当天我们就搬到二层楼，和同志们在一起了。监狱当局显然很心虚，他们不敢对犯

人使用武力。

这里的条件好得没法比，甚至不完全象监狱。我们五层的囚室是整天锁着的，而在这里只是通向另一座楼的门锁着，各囚室的门是开着的；被捕的人可以随便互相来往，在楼里散步。

为了欢迎我们，临时举行了歌舞、朗诵联欢会。我们大家都很高兴，不过我们每个人当然对狱外同志的情况仍然十分担心。罢工进行得怎样？是否遭到了破坏？关于这些问题我们谁都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没过多久，我们收到了狱外的同志夹在送来的食物里的一封信和新的罢工委员会印发的一张传单。（原来，在我们被捕一小时之后，新的罢工委员会就开始了工作。过了三四个小时，他们就印发了第一张小型传单。）传单通知工人说罢工委员会委员已经被捕，但罢工委员会新的领导班子正在开展工作，斗争仍在继续。传单最后提出了“巴库工人胜利万岁！”的口号。

当时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但我们一直在想，同志们今后将采取怎样的政策呢？罢工的结局将会是怎样的呢？我们被关在监狱里，很难向狱外的同志提什么建议。

不久，随着食物又捎来了一张5月10日的《阿塞拜疆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一条载有武器的驳船被扣押》的简讯，其内容完全是虚构的。简讯说在军港内扣押了一艘《白色号》驳船，船上发现“四门远射炮和大量炮弹、机关枪、步枪和约二百万发子弹……据可靠消息，这

条船是前‘里海舰队中央委员会’留下来的，鉴于最近发生的事件，拟用这批武器武装参加罢工的布尔什维克工人。”

我们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们写一篇声明，向国会社会主义党团提出抗议，以便能够在国会宣读并在报上发表。得到监狱当局的允许后，我们便写了一篇声明，揭露《阿塞拜疆报》对我们的挑衅和诽谤。

档案馆现在仍保存着法院检查官5月13日写给巴库中央监狱长的一封信，信中写道：“随信附上在押犯人丘拉耶夫、米高扬、阿纳什金和科瓦利的声明，我请你将声明退给他们，并向他说明，鉴于该声明对官员使用了侮辱性词句，我不能予以转交。”

过了不久，我们的声明不知怎么被送到孟什维克办的《火星报》，并于1919年5月20日发表了。这份报纸现在还保存着：

“发自中央监狱

声 明

致国会社会主义党团——供报界发表
和在阿塞拜疆国会会议上宣读

我们的敌人出于挑衅的目的，硬把罢工说成是政治性的罢工。巴库工人代表会，它的主席团以及中央罢工委员会通过各种讲演、报告、决议以及他们的行动一再强调指出，罢工纯粹是经济性的。事实上，罢工所提出的要求（签订集体合同和易货），

甚至赞赏政府的声明以及政府为实现上述要求而采取的办法，——这一切只能说明罢工的经济性质。

然而，《阿塞拜疆报》和官方的正式代表却以明明是虚构的事实和文件为根据，千方百计地宣扬并论证罢工的政治性质，说什么罢工的目的是要发动武装起义，反对阿塞拜疆的独立。他们以此来为宪兵镇压工人，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用武力镇压罢工进行辩护。

当局的代表和尼古拉时代的宪兵队极尽挑衅之能事，他们竟然说在市内的一条驳船上‘发现了’似乎是属于工人代表会议的整舱整舱的武器、子弹、步枪、炮弹和远射程炮。

所有这些‘事实’和‘物证’完全是明目张胆的挑衅和伪造，根本不值一驳。但是，这些‘事实’和‘物证’在阿塞拜疆人民群众中可能被信以为真，所以我们认为有必要对那些不自量力的诽谤家们的挑衅‘活动’予以回击。

在驳船上发现的大量的装备是比切拉霍夫和被解除武装的里海舰队留下来的。根据英军当局的命令，并在得到它的同意之后，该船由港口负责人、邓尼金的走狗格里戈里耶夫大尉管辖。无论阿塞拜疆警察局还是政府对此都是十分清楚的。但是政府却利用斗争的有利时机，厚颜无耻、丧尽天良地‘发现了’他们早就知道的邓尼金的军火库，并随心所欲地把它说成是工人代表会议的‘财产’。在当局的协助和同意下，邓尼金匪帮修建了不少这样的军火库，想必城里还会有；它们还在‘被发现’中，并继续被强加在工人代表会议头上。当形势不允许他们嫁祸于人的时候（象只是由于社会主义者的坚决要求才逮捕沃斯克列先斯基时那样），当局便闭口不提他们发现了邓尼金反革命匪帮的官方代表沃斯克列先斯基的军火库，而这个沃斯克列先基本人则立即被

释放了，使他有可能跑到邓尼金那里去‘报告’。

从政府的狗腿子的所做所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和邓尼金匪帮暗中勾结，并与南高加索的帝国主义占领者公开达成协议，他们的目的是要使巴库无产阶级丧失领导人，对无产阶级进行血腥镇压，以便使外国帝国主义占领者和当地的以及俄国的反革命分子的反动联盟更牢固地盘踞在无辜的饥饿的工人的尸体之上。

然而，我们要警告他们，诱骗巴库无产阶级进行这种流血冒险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全部真正的而不是虚构的事实无不证明巴库无产阶级并不是要举行武装起义来反对阿塞拜疆政府，而是要通过和平罢工的办法争取实现他们的迫切的经济要求。让那些不自量力的挑衅者拿出证据来，证明在逮捕中央罢工委员会和各区罢工委员会委员的时候，或者在搜查他们的住宅的时候，搜出了一支手枪、一颗炮弹，有一张纸片上提到武装起义，发现了军事行动的蛛丝马迹吧！他们是拿不出证据来的。

此外，许多穆斯林工人，其中不仅有社会主义者，而且还有木沙瓦特党人，都积极参加了工人代表会议、中央罢工委员会及各区罢工委员会的全部工作。国会议员卡拉耶夫同志是工人代表会议副主席兼罢工委员会委员，他对全部情况都是非常了解的。我们没有背着他干过任何事情。与我们有密切来往的还有国会议员阿比洛夫同志。他们两个人中谁能问心无愧地说，在我们的全部活动中有要进行武装斗争的迹象或证据吗？他们谁都不能这么说。

如果能找到公正的审判官或法官，他们一定会使那些把和平罢工说成是武装起义，并用他们明知是虚构的事实来加以证实的人，成为可耻的被告。

除了前面所说的这一切，我们还要痛斥劳动和司法部长萨菲丘尔茨基对我们所采取的卑鄙手段！

5月7日晚，在对工人的要求和政府的建议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劳动和司法部长当着工厂厂监、企业家代表和英军司令部代表的面，代表阿塞拜疆政府向我们正式宣布：在谈判进行期间绝对保障罢工者的人身安全，以便心平气和地讨论政府的建议，并和平地取消罢工。我们相信了部长的诺言。第二天，我们公开地，在没有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的情况下召集各工厂、企业的代表开会，向他们传达政府的建议，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议刚刚开始，一大批警察就背信弃义地包围了会场。我们全部被捕，同我们一起被捕的还有许多偶然来到会场的人以及从工厂、企业来的工人。

我们在这里向阿塞拜疆全体公民公布事实真相，同时强烈抗议阿塞拜疆政府针对巴库无产阶级所采取的卑鄙的手段。

1919年5月11日 于中央监狱，15号楼112号囚室。签名：丘拉耶夫、米高扬、阿纳什金、科瓦利。

编者按：这份声明是通过检查长发给社会主义党团的。

但是由于表面上的理由，检查长并没有把这篇声明转发出去。”^①

这样，我们的声明没有被送到国会。因此非常值得回忆一下右派社会主义者——他们是国会议员——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多么可耻的角色。

正如我们后来从《阿塞拜疆报》中所知道的，政府的首脑在国会会议上宣称：“政府深信，这次罢工不是什么经济罢工，完全是具有政治目的的。我们有根据证明工人

^① 见《火星报》1919年5月20日第93期。

代表会议的本地领导人是按照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指示和计划行事的……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走狗企图煽动本地的工人反对阿塞拜疆共和国，为了使这一罪恶活动得逞，他们诱骗工人参加罢工，用好象是经济上的要求来掩盖他们的政治目的……如果需要的话，政府将毫不迟疑地把那些显然是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走狗驱逐出阿塞拜疆国境……”

政党的代表发言后，国会通过了决议案。决议案中宣布罢工为“反对阿塞拜疆国家的政治行动”，并完全赞同“政府所采取的坚决措施”。

社会主义党团没有反对政府关于罢工性质的声明，没有反对政府威胁要对罢工者进行镇压。诚然，国会社会主义党团没有投票赞成这一决议案，但却提出了这样一个措词：“国会听取了政府的说明后，赞同政府为了维护治安而采取的措施，现转而进行例行的事务。”

在这段措词中，他们胆怯地回避了罢工的性质问题，但同时却又公开赞成政府旨在“维护治安”而采取的措施。

这样，社会主义者就赞成了政府镇压参加罢工的群众。这样，右派社会主义者就在工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

我们在狱中听到一些传说，说狱外的一些同志围绕着停止罢工还是坚持继续罢工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提起停止罢工，水兵们、黑城的工人、大部分铁路工

人和所有俄国工人们连听都不愿意听。

但是，在巴拉汉内、苏腊哈内和其他的石油区，木沙瓦特分子用欺骗、虚伪的允诺和镇压的手段迫使部分工人在一些企业复了工，并开出了几列火车。造成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工人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带头人，因为当时许多工人中的积极分子（其中包括阿塞拜疆人）都被关进监狱。在巴库就逮捕了二百多名党组织和工人组织的领导人。

在那些日子里参加罢工的穆斯林工人减少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很难指望坚持长期的罢工斗争和夺取罢工斗争的胜利。

早先赞成罢工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现在刚刚碰到困难就灰心丧气，打起了退堂鼓，并在各地鼓吹停止罢工。但是他们遭到了进步工人的反对。例如，孟什维克罗赫林想在停止罢工的问题上“捞取资本”，就请求允许他在黑城工人的集会上就必需停止罢工的问题作讲演。我们的同志们很了解那里的工人的情绪，所以就允许他去讲演。结果怎样呢？罗赫林遭到了工人们的愤怒斥责。他在那里出了丑，什么也没捞到就滚蛋了。

5月11日，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和穆斯林中的右派社会主义者互相勾结，召开了所谓的各党派的联席会议。这帮人的目的，就是背着工人们合法选出来的中央罢工委员会，把领导巴库无产阶级的权力抓到自己的手中，并向敌人投降。

我们巴库党委会的代表也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但是我们的代表很快就明白了这是在策划新的叛卖行动，于是我们的代表就拒绝参加关于罢工问题的讨论。我们的代表发表声明说，这次会议无权决定任何问题，只有合法选出的中央罢工委员会才有权决定罢工的前途，接着就退出了会场以示抗议。

但是冒牌的各党派的联席会议还是讨论了关于罢工进程的问题并通过了决议：立即无条件地停止罢工。会议的组织者在巴库工人中相当广泛地散发了这一叛卖性的决议，有的人就“上”了他们的“钩”。

当时考虑到非常复杂的形势，巴库党委会在菲利普·马哈拉泽参加的情况下，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决定撤销罢工的基本要求，但提出了以立即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并停止继续镇压作为必要的条件。

在取得阿塞拜疆政府同意满足这个要求的保证后，中央罢工委员会5月12日通过决议：“停止罢工，于5月13日中午12时复工。”

但是停止罢工远远不是如此简单和容易的事情。水兵们和黑城的工人们坚决反对这一决议。

据后来萨尔基斯告诉我们说，有将近六千名工人和许多水兵在自由广场上召开了大会。所有会议参加者满怀战斗的激情要求继续罢工。我党的发言人费了很大的劲来说服他们必须停止罢工。但大会的参加者还是通过了一项决议：“继续罢工，直到所有被捕人员被释放时为

止。”

而政府呢，在得到中央罢工委员会关于停止罢工的决议后，却拖延履行自己关于同时释放所有被捕人员的保证。不管怎么说，5月12和13日已经过去了，但是还没有释放一个人。

只是在这个时候才明白，自由广场大会的参加者所通过的关于释放所有被捕人员后才停止罢工的决议，要比相信政府诺言的中央罢工委员会的决议更为正确。

* * *

不久，我们五个人就被转押到第一中央监狱的主楼里，那儿已经关了三十七个人。他们是5月9日在中央罢工委员会开会时和我们一起被捕的。唯一的妇女——维拉·戈罗金斯卡娅被关在另外一个地方。

这样，在这座主楼的牢房中一共关了四十二个人。我们之中有各民族和各党派的代表，他们大多数是党员和非党工人积极分子，但也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除我们五个人以外，5月9日被捕的还有：P. 沃斯卡诺夫、A. 麦谢里亚科夫、Г. 谢麦尼斯基、O. 弗列尔、Л. 卡普兰、米尔·巴希尔·卡苏莫夫、И. 伊萨金、H. 麦尔克利、M. 马赫穆多夫、E. 罗焦诺夫、B. 阿南尼耶夫、C. 波波维扬茨、格·斯图鲁阿、M. 列利欣、K. 齐蒙、П. 奥尔洛夫、维·戈罗金斯卡娅、B. 洛米纳泽、古谢伊恩·库利·克尔巴拉伊·穆赫塔尔—奥格雷、Я. 舍林、З. 波科诺夫、M. 查列夫、M. 扎洛夫、Ф. 迪加年科、Ф. 苏坚科、Г. 斯捷潘扬茨、

Я. 巴宾科、Н. 丘赫切涅夫、С. 伊柳欣、И. 科柳皮扬亚什金、Н. 利亚霍夫斯基、И. 甘久林、Н. 波麦兰采夫、И. 勃拉戈钦内、Т. 克里沃伊、В. 列勃鲁赫、Н. 罗果夫、Ф. 古巴诺夫。

他们都是根据阿塞拜疆政府的命令被关进监狱的。正如现在还保存着的原巴库警察局长、骑兵大尉古基耶夫所签署的第 2223 号命令中所规定的，关押“期限为一个月”。

为了不使狱中的时间白白度过，我们决定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来进行政治教育。

在这个监狱里，被捕者可以在楼里来回走动，我们就利用这个条件把大家召集在走廊里，为他们举办了若干次讲座。记得我们最初几次讲座的题目是：《民族问题与共产党》、《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个题目是我讲的，第二个题目是洛米纳泽讲的。同时我们还建议出席听讲的文化水平较高的社会革命党人舍林和列勃鲁赫以及一个法律系大学生孟什维克波波维扬茨作补充报告。他们同意了。他们发言后便展开了大辩论。无论是听众，还是我们讲演人自己都发了言。

我和洛米纳泽讲了几次。应该指出的是，我们有力地批判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观点，把他们的论据驳得体无完肤。所有听讲演的人，无论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群众，都感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威力和我们论敌所持观点是多么软弱无力。

这一切使作补充报告的人十分恼火，以致第二天断

然拒绝参加辩论。三个论敌——两个社会革命党人和一个孟什维克——都回自己的囚室去了，而我们又继续进行了几天的宣传工作。

5月14日，监狱当局通知我们，说除了十个人以外，所有被监禁的人不久即将获释。这十个人中有工人代表大会主席团委员，其中我和科瓦利两人被指控准备武装暴动，做为特别重要的罪犯列入交英军司令部处理的名单中。

顺便应该说一下，对科瓦利的控告完全是一场误会。科瓦利早先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后来才成为我们亲密的好同志。但他从来不是共产党员，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他连想也没有想过。他只是做了一些一般的工会工作。看来，是把他当作科瓦列夫了，后者确实是共产党员。我记得科瓦列夫还和我以及一些同志一起参加过巴库党委军事委员会。

我一直在想：他们到底根据什么确凿证据指控我准备武装暴动呢？占领军掌握我的什么罪证呢？

我党确实在准备武装起义。我们的军事委员会一直在极端秘密地进行这一工作。军事委员会搞来武器，将这些武器保存在特殊的仓库里，并培养了一批干部。但关于这些，警察一点也不会知道。否则的话，其他一些同志早就被捕了。因为他们直接从事这项工作，而且比我参与的还多。

后来我回想起这么一件事：在罢工前几天，有三个工

人来到我们工人俱乐部，当着科瓦列夫的面告诉我说，在港口停着一只驳船，载有三千支步枪和其他武器，还说政府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条驳船，因为驳船上没有警卫，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武器。

记得，当时我们对此感到十分惊奇，并不止一次地询问他们，船上是否确实没有任何警卫。他们说，对这只驳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什么警卫也没看见。

他们说的这些，在我们看来是不大可能的。木沙瓦特政府和英国占领军在港口活动了半年多，却一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条驳船，这是很难令人置信的。但同时我们又想：“万一真有这么回事呢？”这样，他们的情报又使我们感到高兴。

但是当时我们无法对这条驳船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我们得到这个消息是在总罢工开始前两天，而在罢工期间不管采取什么行动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我们决定：如果这些工人汇报的情况是确实的话，那末罢工结束后，我们将设法把部分武器运到达格斯坦和连科兰，用来武装在我党领导下在那里进行活动的革命部队。

不久政府就在报上公布，说那只载有武器的驳船是工人代表会议的。这时我们才明白了，那三个送情报的工人中，显然混有城防司令格里戈里耶夫企图引诱我们上圈套而派来的奸细。

此时，我坐在监狱里想，他们能拿出什么具体的证据来证实他们指控我“准备武装暴动”是有根据的呢？当时

我回忆起有关这只驳船的全部经过后才明白，原来他们是想把我和科瓦利与这只倒霉的驳船连系起来，给我们捏造一个“罪名”，好交给英国军事法庭审判，或者经过波斯把我们押送到印度，而这在当时的条件下就等于处死。

当时在监狱里的巴库党委委员在小范围内对所有这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制定了各种脱险的方案。这些方案的制定人和灵魂是不知疲倦的、坚强而又非常有办法的斯图鲁阿。起先他建议组织我们的同志从外面袭击监狱。后来又提出了一个建议：借检查囚室的机会，当两、三个监狱看守象往常一样走进我们的牢房时，我们就袭击他们，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冲出监狱。最后他还建议锯开囚室窗栅，越狱逃走。

所有这些方案在技术上都是很难实现的。这些方案多半会失败的，但我们还是准备去实现它们。

通过给我们囚室加灯油的工人，我们和外面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并弄到了一些小锯，还有做梯子用的绳子。这样我们可以顺着梯子从窗口爬下去。但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卫兵总在窗下走来走去。这就需要选择时机，当卫兵向别处看的时候，对他们进行突然袭击；或者采取某种其他的方式冲出监狱逃跑，并让一辆事先准备好的敞篷轻便汽车在不远的地方等候我们。

当然，这些都是担着很大风险和冒着失败的危险的。当监狱当局宣布我们这批被捕人中大多数将很快被释放时，越狱逃跑的计划也就完全丢到一边了。

但是死亡的危险仍然在威胁着我和科瓦利。我们大家都期望，指控科瓦利的误会迟早会弄清楚的，他不会有什么危险。而我的问题就复杂得多了，因此斯图鲁阿提出了营救我的一个新办法，要我装扮成另一个同志逃出去。我个人不想采取这种办法出狱，因为这样做势必有人要代替我吃苦头。可是关于这一点同志们根本不让我发表意见。

斯图鲁阿说，代替我留在监狱里的同志不会吃很多苦头，只不过多坐几个星期的牢罢了。“而你，阿纳斯塔斯，”他说，“却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

决定通过了。有很多人自告奋勇地要代替我留在监狱里，但必须找一个外表最合适的人。巴库党委会的事务干事格里沙·斯捷潘扬茨是最合适的人选。而且他特别坚决要求代替我留在监狱里。大家都同意了。于是斯图鲁阿着手改变我的外貌。不知从哪儿拿来了一把又旧又钝的剪刀。斯图鲁阿用它给我修剪胡子，简直是一根一根地拔掉的。疼极了，但是只好忍受着。然后给我换上了斯捷潘扬茨的衣服，而把我的衣服给了他。

我们万万没有预料到，这样快就释放我们。那一天晚上十点钟左右。通常牢房的门在这个时候已经上了锁，并且一直要锁到天明。可是这时监狱当局有几个人突然来到了我们的楼房。当然，我们这些被捕的人立即纷纷走出自己的囚室，集合到走廊里。一个监狱官宣布，除了即将叫到的十个人外，其余的犯人都立即释放。我

们感到很惊奇：通常都是早上释放犯人，不知为什么决定夜里释放我们。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塔奇耶夫纺织厂的妇女代表团，带着孩子从傍晚开始就聚集在国会大楼附近，坚决要求释放我们，因为被捕人中有几个是阿塞拜疆人，是他们工厂的工人。罢工前有一次我曾到过这个工厂，还在会上讲了话，记得这个会一直开到深夜。这个工厂位于离城很远的兹哈，工人们劝我不要在这么晚的时候回去。于是我就留在他们那儿过夜。我同许多工人，特别是同他们工厂委员会主席、共产党员卡法罗夫交上了朋友，那天我正好就是在他家过的夜。

监狱长开始叫即将获释的人的名字。每个被叫到的人要答应一声，然后站到靠近门的指定地点。当叫到斯捷潘扬茨时，我答应了一声走出来，站到了被释放者中间。当时我手里拿着一个大枕头，几乎遮住了我的半边脸。（在场的狱吏中有几个人，当我在监狱办公室向国会写联名信时，曾同他们打过交道，他们可能认出我来，如果认出我来的话，那末营救我的整个计划就会象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点名结束后，便把我们这些将要释放的人，从监狱的楼房带到办公室。和我并排走的同志尽力掩护我，使我不致在他们中间显得突出，免得引起监狱当局的注意。

我们走进了办公室，室内光线很暗。桌子上空悬挂着一盏灯，灯光只能照到这张桌子上。屋内其他地方都很昏暗。狱长助理坐在桌旁。在他面前放着一本打开着

的厚厚的被捕者的花名册。他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叫到他面前，向我们提出问题，然后将我们的回答和名册上登记的内容进行核对(姓、名、父称、出生地点、省、县、乡)。

因为我知道通常在这种情况下大致会提哪些问题，所以白天就从斯捷潘扬茨那儿了解到了我所需的情况，并把它们背得可以说是滚瓜烂熟。

因此，在等着叫我的时候，我相信是不会遇到任何意外和困难的。

忽然我听到，狱长助理问起第一个被叫到的同志在巴库的地址。

我知道这个问题自己是无法回答的。因为早晨忘了问斯捷潘扬茨了。事情是这样引起的：被捕时我拒绝说出自己的地址，而这种心里因素在我与斯捷潘扬茨谈话时，在某种程度上起了作用。这样就使我陷入了十分难办的困境。

我马上把这一情况悄悄地告诉了斯图鲁阿。他听后并未慌张，而是立即走到狱长助理的桌子跟前，想看看在狱人员名册，这样也许能知道一星点名册上登记的斯捷潘扬茨的地址。但这个未能做到。怎么办呢？想个什么办法呢？我们中的一个同志(已经记不清具体是谁了)知道这件事后，建议我这样说：我是到办公室来写声明的，因此不打算隐瞒我就是米高扬。但即使从我没有请求过允许我写声明这点来说，这种做法也是天真而又不能令人相信的。况且一般在夜里，在释放犯人时，被捕的人是

不写声明的。很明显，这个办法是行不通的。

这时，在我脑海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念头：就说我的家离这里很远，而且夜里门是锁着的，能不能让我留在监狱里过夜，到早晨再“出狱”呢？我和斯图鲁阿决定就这么办。

当轮到我到狱长助理跟前去的时候，我就问他：“能让我在牢房里再过一夜吗？”他拿起电灯对着我，以便看清是谁在和他讲话。

“你姓什么？”他问。

“斯捷潘扬茨，”我回答道，并想：“他马上就要认出我来了，……”但办公室内光线很暗，他没能认出我来。

“你等一会儿，”他说。

我心里很高兴。我没能出狱当然是很遗憾的，但越狱计划却不会暴露了。

可是，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假若我一个人留在这里过夜，就很容易引起狱吏的注意。于是为了掩护我，有三、四个我们的水兵也要求留下过夜。他们说他们的舰艇停泊在海上，夜里没有地方可去。他们的要求得到了允许，我这才放下心来。

但是，根据一切迹象可以看出，不肯罢休的格奥尔基^①并未死心。他一直打算想出另外一种什么方法以摆脱当前的困境，并且不管有多大的困难也要救我出狱。

① 即斯图鲁阿。——译者

几分钟后，他走到我跟前小声说：“波波维扬茨外表很象你，刚刚审问过他，我劝他留下来代替你，这样你今天就可以出狱了。”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出乎意料，并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事，以致我都不知说什么好了。

而斯图鲁阿甚至不等我回答就走到波波维扬茨跟前，劝他装作斯捷潘扬茨留在狱中过夜。

起初波波维扬茨不愿这么干，甚至感到恼火，但斯图鲁阿极力劝服他：“米高扬有判死刑的危险，而你以斯捷潘扬茨的名义留在监狱过夜不会有什么危险，你大概顶多多蹲一两个星期的监狱，也就没事了。”

况且波波维扬茨是孟什维克，并不难被释放。

波波维扬茨实际上已经不反对了，他说：“刚才我还说自己是波波维扬茨，怎么能又说是斯捷潘扬茨呢？”

“好吧，”斯图鲁阿说，“那么，就由别人来代你回答。”

斯图鲁阿让我演这出戏。因此当叫到被释放者中的波波维扬茨时，我走出来站到了被释放者中间。当叫到“我”的姓“斯捷潘扬茨”时，波波维扬茨没有吭声，另一个同志代他答应了。于是他就留在被允许在狱中过夜的五个人当中了。

我们这些将要获得自由的人被带到凉台上，马上就要被释放了。但事情并不那样顺利。

有一个将被释放的人要求立即发给他身分证，因为没有身分证是不能随便在城里大街上行走的。这样又耽

搁了一下。而狱吏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我们的秘密，那时就会把我拘留起来。这时，还是那个闲不住的斯图鲁阿走到那个不适宜地大声吵闹的同志面前，凑到他耳边小声规劝他说：

“不要吵着要身分证了，明天你就会拿到的。”

那个同志听从了他的劝告。

在打开监狱大门之前，又一次数了一下我们的人数。这次只是按“个儿”数了一遍。一切都很顺利。大门打开了，我们自由了。

我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终于出来了。”

为了不致重新落入警察的魔爪，大家朝着不同方向各自散去。这样做是对的，因为后来我们知道了，我们中间有一批同志，就是因被怀疑越狱逃跑而再次被捕，他们重新被带回监狱，直到事情弄清后才放出来。

我和斯图鲁阿俩一起走，专拣一些偏僻的小巷走。这样很快就到了卡斯帕罗夫家的秘密住所。下面就是女主人的大女儿玛丽娅·卡斯帕罗娃关于这件事的回忆：

“记得有一天半夜里，阿纳斯塔斯和格奥尔基从监狱逃出后来到我们家。这是一次多么勇敢而又成功的越狱行动呀！在这以前不久，阿塞拜疆政府逮捕了北高加索的领导人之一——安德日耶夫斯基，并把他转交给了英国人，而英国人又把他交给了邓尼金当局。他们在马舒卡把安德日耶夫斯基绞死了。知道这件事以后，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以防其他被捕的同志也发生类似的情况。

那天晚上我们在家里焦急地等着格奥尔基的到来，一直等到深夜。听到门铃一响，我们所有的人——我、罗沙和其他人就向门口奔去。格奥尔基进来了。大家马上把他围了起来。起初我们谁也没发现在他后面还站着一个年轻人。这就是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大家都在为他的命运担心，因此他的突然出现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让他坐下，紧紧地围住他，激动地听他讲述如何幸运地逃出监狱的全部经过。”

我们后来知道，那五个留在监狱过夜的同志回到了牢房，等了大约一个小时（正如我们事先就商量好的那样），估计我们已经脱险后，就叫来了监狱看守，并对他说：米高扬不见了。看守听后吓坏了，急忙跑到办公室去查看花名册。查的结果是：我没有出狱，波波维扬茨被释放出去了，而斯捷潘扬茨到过办公室，然而又回到牢房过夜来了。

看守回来了，并开始审问到底是怎么回事。斯捷潘扬茨说他根本就没有出囚室的门，因为他事先得到允许在监狱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出狱。波波维扬茨说他到过办公室，请求留下来过夜并得到了允许。看来，要想弄清所有这些复杂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最后看守宣布：五个人中谁也不能出狱，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走了。

第二天我们的朋友们到检查官那里要求释放留在监狱过夜的同志，因为“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对其他犯人的逃跑负责”。最后终于把他们释放了，而狱长助理却因此被捕了。

在苏维埃阿塞拜疆的档案馆里现在还保存有一份巴库第一中央监狱狱长在1919年5月15日所作的记录。在记录中记载着与我越狱有关的事件。就在不久以前还发现了两份与此有关的很有意思的档案文件。这两个文件是牵涉到那个替我吃过苦头的巴库中央监狱狱长助理巴依拉姆夫（他的全名是阿巴斯·库里·别克·巴依拉姆别科夫）的。

虽然太晚了一点，但我还想利用这一机会在此向巴依拉姆夫“表示歉意”，因为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因为我而蹲了整整一个月的监狱。（有趣的是：巴依拉姆夫为其吃苦头的那个犯人本人在监狱却总共只蹲了五天！）

* * *

第二天早晨我们与同志们取得了联系，并且在巴库党委会会议上碰了头。需要对形势作出估计，制定下一步的斗争策略，而首先就要找出营救狱中同志们的办法。

那时我们情绪饱满，尽管大家都为未能达到我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得不结束罢工而感到痛心。有一个同志甚至说出这样一种想法：“是不是宣布罢工根本就是错误的呢？”这个问题需要回答，况且孟什维克到处叫嚷，把罢工说成是共产党员的冒险行动，虽然在通过罢工决议时，他们也是投票赞成的。

我在这次会议上发了言，并提醒大家注意宣布罢工前所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这些领导同志都很清楚，迫使封锁了俄国的英国人给阿斯特拉罕打开石油运输通路

是多么的困难。突破这个封锁也是不大可能的。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宣布了罢工，这样做是很对的。因为第一，我们要考虑到工人们急迫的求战情绪；第二，应当领导这场斗争，并在这场尖锐的阶级搏斗中检验巴库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和共产党的影响。

大多数工人在罢工中都表现得很出色。我们党组织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毫无疑问，我们党在领导罢工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

一部分阿塞拜疆工人仍在受着木沙瓦特分子和右派社会主义者的影响。但这些天的斗争同时也表明，许多阿塞拜疆工人和俄罗斯工人团结一致，为反对英国司令部和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相当一大批阿塞拜疆的领导干部经受了战斗的考验。这是很大的成绩。只有个别的企业由于受到木沙瓦特分子的影响和政府的镇压才在中央罢工委员会就这个问题作出决定之前就停止了罢工。

毫无疑问，罢工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中央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当然遗憾的是这次罢工在所有被捕同志被释放出狱以前就宣告结束了。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立即营救他们出狱。

我说：“虽然我们并没有达到全部要求，但有组织地退出战斗这个事实，就说明我们没有失败。在这场斗争中我们受到了很好的锻炼，保持并加强了我们的组织性，提高了我们的阶级觉悟，我们更加团结一致。至少敌人未

能把我们搞垮。”

某些单位擅自停止罢工，这不仅仅是政府的镇压和木沙瓦特分子的欺骗宣传的结果，而且也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头子叛变的结果。因此，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反对木沙瓦特分子的斗争，特别要反对那些在阿塞拜疆的工人中有影响的分子，同时还要全力揭露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扮演的叛卖角色。

在这次巴库党委会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在第二天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总结罢工经验。尽管大家对所发生事件的评价不尽相同，但经过广泛的交换意见以后，在该做什么这一点上，我们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会议结束后，我马上和果戈别里泽一起着手起草工人代表会议决议草案（这个决议同时也就是果戈别里泽在大会上的报告提纲）。

5月16日召开了工人代表会议。我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因为越狱之后我应该隐蔽。卡拉耶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卡拉耶夫关于选举丘拉耶夫、米高扬和阿纳什金为名誉主席的建议。当时宣布这三个人仍在关押之中。

果戈别里泽代表中央罢工委员会做了详细的总结报告。大家对他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阿达列特”党的代表阿加扎杰完全同意报告人的意见。他放弃了自己的发言权，并要求出席会议的“古墨特”右翼头子、国会议员别皮诺夫对他的党内思想上的同伙

在罢工期间的卑鄙行为作出解释。

别皮诺夫千方百计为他们党的国会党团和“古墨特”党的右翼分子所扮演的不光彩的角色涂脂抹粉。

孟什维克在这次会上耍了一个花招。他们让什捷尔恩、波波维扬茨和列勃鲁赫作为他们的发言人出来讲话。这几个人都是与中央罢工委员会委员一起被捕现在才被释放的。他们的如意算盘是这几个人的讲话大家将会注意地听，并能产生预期的效果。果戈别里泽在报告中曾揭露孟什维克在罢工中的叛卖行为，而这些人就在发言中把矛头指向果戈别里泽报告中的这一部分。这些发言人一口咬定罢工失败的原因是组织工作没有做好，而罢工是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因此布尔什维克应对罢工的失败承担责任。工人代表们从座位上发出愤怒喊声，不止一次地打断了右派政党代表的发言。

在果戈别里泽做了明确的讲话后，代表中的一个木沙瓦特分子茹利弗加尔在座位上恶狠狠地喊了一句：“在这里开会的都是俄国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走狗。”然后退出了会场，表示抗议。

最后以 194 票赞成，3 票反对，24 票弃权的多数通过了共产党人提出的决议案。

决议中写道：

“在第一个回合中，巴库无产阶级就遇到了联合起来的敌人——国际资本和它在本地的走狗：可汗、别克、资本家以及他们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木沙瓦特党和达什纳克党。在竭尽挑拨、

造谣、无耻诽谤之能事，以挑起民族迫害和血腥屠杀方面，木沙瓦特党干得最为‘出色’。

他们通过许许多多的狗腿子把和平罢工诬蔑为反对穆斯林和阿塞拜疆‘独立’的武装暴动。当他们的谎言和挑拨无能为力的时候，刺刀和皮鞭就施展起威力来了。

所谓社会主义的右派政党，更确切地说就是那些过去旧政党的腐烂僵尸，最初他们也赞成罢工，但在艰苦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暴露了自己的叛徒嘴脸。他们不去支援进行斗争的战士，而是象一群乌鸦一样飞到战场上去扑灭斗争，并建立一个治丧委员会——各政党联席会议。

穆斯林假社会主义者的国会党团在第一天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表示相信政府，赞同刺刀、皮鞭和木沙瓦特党的挑衅行为。

巴库无产阶级虽然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有组织地退出了第一次战斗，为未来的战役保存了自己的无产阶级队伍，积累了首次战斗的丰富经验。

由于认为上次罢工不是斗争的结束，而是斗争的开始，是巴库无产阶级从中经受了战斗洗礼的第一次战斗，并且认识到引起罢工的原因不但没有消除，而且更加尖锐了，所以巴库无产阶级没有放下武器，没有停止斗争，而是更有效地准备新的战斗，组织和团结自己的队伍，加倍注意帮助自己的觉悟较低的同志——穆斯林工人，努力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叛徒党派的影响，并在‘阿达列特’共产主义小组和左翼‘古墨特’党人的帮助下，把他们组织、团结在巴库无产阶级的最高机关——工人代表会议的周围。”

这个根据共产党人的建议而通过的工人代表会议的

决议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写文章快手们大为发狂。他们天天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共产党人进行造谣和诽谤，不择手段地破坏共产党人的威信。他们大肆叫嚷巴库工人阶级失败了，工人代表会议的领导垮台了，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狂吠。

他们百般污辱共产党人，同时想方设法企图挽回他们的党及其领导人的影响，把这些人说成是与共产党人截然不同的唯一明智的、忠诚的、有经验和成熟的工人阶级的领袖。

他们没有能够在工人中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当中，却有一定的成效。这部分知识分子在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认识上被他们搞糊涂了。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钟声报》没有积极反击敌人在报纸上掀起的反动宣传，那时洛米纳泽是该报的主编。有一次我和他谈到这个问题，并建议他写几篇尖锐的、有原则性的文章，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在报纸上的叫嚣，同时正确评价罢工发生的原因及其结果。

“应该揭露孟什维克关于巴库无产阶级已经失败的谰言”，我对他说，“应该提高工人的斗志，加强他们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并号召他们准备在最适当的时刻投入新的战斗。”

洛米纳泽是一个很诚实的人，他坦率地对我说，在他看来，罢工就是以失败而告终的。我同他争论了一番，想证明事实正好相反。但那天我并未能彻底说服他。

当然，我对他很不满意，于是不客气地对他说，如果他不想写这些文章，那我就自己动手来写。

当时我想写两篇文章，一篇是批判我们政敌的观点并论证宣布罢工之前我们的路线；另一篇则准备写一写罢工的全部过程及其结局。

第一篇文章是在洛米纳泽从我这儿走后，在我和他这次激烈争论的印象下立即写出来的。而第二篇则由于一些紧急的事情缠住了我，始终没能写成。

1919年5月23日在《钟声报》上发表了《论上一次罢工》的文章。这篇文章至今仍然保存着。我认为这篇文章详细地描述了罢工的情景以及当时各阶级、各政党代表所持的立场。文章里还具体点了一些人的姓名。

“凶恶的鸢鹰冒充‘成熟而又能干’的政治家抬起了自己的头……”

一贯喜欢自命为‘老练的、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领导人’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先生们，你们在罢工前和宣布罢工的时候，连一句关于罢工不适宜或者条件不成熟的话都没有说，相反却是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或者热烈地主张立即宣布罢工。但现在当事情过去以后，罢工的结果已见分晓时，你们又大肆叫嚷什么罢工没有准备好啦，太仓卒啦，并从‘哲学’上把这些说成是罢工‘垮台’和‘失败’的原因。

说什么巴库无产阶级的共产党领导人所犯的‘无法挽回’的错误使罢工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

那些没有直接参加工人代表会议及其主席团工作的人，不知道在工人区和工人组织中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什么事情的人，

以及不了解无产阶级的物质上和法律上的处境,不了解石油工业状况——我们生活的源泉的人,根据妥协分子报纸上许多毫无价值而又空洞无物的文章可能得出这样不正确的看法:罢工宣布的不适时宜,过于仓卒,罢工完全可以推迟到更为有利、可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机。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而沉浸在无限的幸福之中,时而又是无穷的忧虑……陷入幼稚而愚蠢的境地。他们的心灵犹如磷光一般,忽儿微弱地闪闪发点亮,忽而熄灭消失于黑暗之中。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少考虑过去的客观现实和不可避免的未来。他们鼠目寸光,精神境界非常狭隘,仅局限于自己的小天地。

病态的革命同时又是病态的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种软弱无能和思想动摇的性格,在罢工过程中,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病态的软弱行为中暴露无遗。

这些旧时代的苍白的幽灵能够胸怀开阔地看待上次罢工吗?能够正确地认识并给它以应有的评价吗?能够冷静地弄清斗争的真正的原因和动力并指出今后斗争的道路而不是寻找什么‘无法挽回的错误’吗?不能,当然不能。这对于那些过去旧政党的腐烂僵尸来说是办不到的。

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不是时而革命热情迸发,时而又完全悲观失望,而是燃烧着永不熄灭的革命斗争的烈火,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轻易取胜的平坦道路,而是一条用利剑为自己开辟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洒满了正在升起的共产主义的阳光。

集体合同不是巴库无产阶级的新要求。早在1907年反动势力统治的岁月里,巴库无产阶级就为此而斗争过。1917年9月他们为争取签订集体合同曾宣布罢工并胜利地举行了罢工,那次

罢工是以巴库无产阶级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的……

无论是土耳其和英国帝国主义血腥屠杀的胜利，还是工人组织的被破坏，都未能使巴库无产阶级放弃集体协议，以及为之而进行的斗争。还在去年年底，巴库无产阶级刚刚从帝国主义强盗打击下恢复了元气，刚刚站立了起来，就提出签订集体合同，作为当前的战斗任务。

但是，巴库无产阶级由于失去了共产党人作为自己的战斗领袖（他们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反革命俘虏），同时他们感到自己的组织还没有全部恢复，因此接受了资本家的‘恩赐’（增加了工资，还有集体合同中其他几项条款），暂时放弃了继续进行直接的斗争。但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巴库无产阶级并没有卷起自己的旗帜，而是全力以赴地继续准备进行新的战斗。

集体合同转交给了‘调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由工人和石油资本家的代表组成的，由一个所谓中立人士的政府代表担任主席……

3月初，调解委员会中的工人委员（甚至他们中最热衷于妥协的人，如斯列普钦科）得出结论：鉴于资本家不进一步做出让步，这个委员会继续进行工作是无意义、无效果的。工人代表会议新的主席团和各区代表与调解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然而，鉴于进一步斗争的组织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他们决定继续进行这种‘妥协的把戏’，以便赢得时间，加强和加快组织巴库无产阶级的战斗队伍。就是在那个时候，即3月初，差一点就暴发了政治罢工，即社会革命党委员会的代表们曾经那样坚决地力争宣布的那个政治罢工。

由于我们的坚决主张，中央罢工委员会采取了共产党人的

久经考验的策略，即拖延和随机应变的策略，保存实力和团结战斗队伍的策略。这种策略既不是在敌人面前投降（象孟什维克罗赫林和丘拉耶夫所主张的那样），也不是完全不考虑我们的实力和形势，一味感情用事，为了“死得壮烈”而赤手空拳地扑向英国人的刺刀（象社会革命党的“幻想家”伊里英和别连基所主张的那样）。

我们的策略胜利了，因为我们没有投降，而我们的全部要求几乎都实现了。”

谈到上次罢工的总结时，我们给自己做的主要结论——这已在工人代表会议决议中特别强调指出过——就是必须全力加强我们在穆斯林工人中的工作，努力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叛徒政党的影响，在“阿达列特”共产主义小组和左翼古墨特党人的帮助下，团结在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会议的周围。

为此，巴库党委会不久专门召开了有左翼“古墨特”和“阿达列特”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关于阿塞拜疆工人在罢工结束后的情绪谈论了很多。

由于木沙瓦特的叛卖政策和民族政府的残酷镇压，甚至在一部分最落后的阿塞拜疆工人中也产生了革命的情绪。右翼“古墨特”在罢工期间，特别是在罢工结束后的卑劣行径对这部分工人的向左转也是个不小的促进。

应当使阿塞拜疆工人中向左转的倾向巩固下来。因此很多发言人在会上说，“古墨特”的左翼和它的右翼划

清界限，并从“古墨特”中把孟什维克清除出去，使之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时候已经来到了。

大约两个月之前还认为分裂不适宜而加以反对的卡拉耶夫和古谢伊诺夫，这次也同意认为分裂的时刻确实来到了。

最后达成协议：由“古墨特”中的共产党员利用自己在该组织领导中的多数，在最短时间内实现这种分裂。

这个分裂是在1919年7月实现的。“古墨特”中的共产党员与右翼分子彻底决裂了，后者退出了这个组织。这是我党的一个重大胜利。

就在巴库党委会的这次会议上，还提出了参加阿塞拜疆国会是否合适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卡拉耶夫提出来的。在开会之前他就不止一次地要求我们允许他退出资产阶级国会，因为他当时是国会议员。他对国会在罢工期间的行为感到愤慨，并表示不能再继续陷在这个“泥坑”里面了。

但我们大家一致表示反对，我们不能放弃利用国会这一合法的讲坛来进行政治斗争和宣传我们的观点。我们记得，党的工作的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的成功的结合，是列宁布尔什维克党的策略的基本原则之一。

卡拉耶夫被说服了，他不得不同意必须继续进行这项对他来说是极不愉快的工作。应该指出，他巧妙地利用自己国会议员的身分为党工作，而且干得非常出色。

给列宁的一封信

去莫斯科的信使；季格兰和舒拉见到列宁；莫斯科的援助；连科兰事件；鲁·阿洪多夫。

那时是 1919 年……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势非常危急。正是在这些日子里，7 月 29 日，列宁十分忧虑地说道：“我们看到，北方的摩尔曼，东方的捷克斯洛伐克战线，东南方的土尔克斯坦、巴库和阿斯特拉罕——英法帝国主义铸成的一切环节几乎连成一片了。”^①

我们日益迫切地感到同莫斯科、同党中央、同列宁建立有生命力的、直接的联络的必要性。那时，不能只凭自己的聪明智慧来解决极其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无法在既得不到党中央的建议和指示，没有必要的情报，又不能互相交流经验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更何况我们当时又是处在巴库和南高加索那种复杂的条件下。

当然，我们也很清楚，建立同莫斯科的联系，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不仅在地理上我们和莫斯科相距很远，而且我们之间还隔着一道反革命的战线。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同莫斯科建立联系。

早在罢工的前夕，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住处，他自我介绍说他叫季格兰·阿斯肯达梁，并说，早在 1918 年当

^① 《列宁全集》第 28 卷第 6—7 页。——译者

他还是个十七岁的小伙子时，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加入了党所领导的部队，然后同苏维埃军队一起撤退到阿斯特拉罕，从那里和一部分同志到基兹利亚尔去执行党的任务，以后，随同撤退的红军来到阿斯特拉罕。现在奉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帕杰林和阿斯特拉罕省党委会主席科列斯尼科娃的命令来到巴库，以便恢复同我们的联系，通知我们关于阿斯特拉罕的情况，并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带回阿斯特拉罕去。

我记得，除了一笔钱之外，他随身没有带来任何书面文件或材料。

他的外表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怀疑。相反，他给人的印象很好，是一个挺好的、讨人喜欢的小伙子。从一切方面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他说出了自己在巴库的住址。我们查对了一下，原来他的双亲在土耳其人占领巴库时牺牲了。邻居也都对他反映很好。我让他休息一下，并提醒他说，他很快就得返回阿斯特拉罕。

我写给党中央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的关于南高加索形势和我们任务的信，印在亚麻布上。信中讲道，由于南高加索和中央一年来失去了联系，我们在斗争中得不到中央的指示和帮助。我写道：“而您，——或完全不了解南高加索的真实情况，或被一些不负责的人提供的错误情报所欺骗，因此，不能保证您在对待我们边区的对外政策问题上，不犯重大错误。

谨借此机会，向您报告……”

给列宁的报告信是相当详细的。信中谈到了巴库和南高加索的形势,谈到外国占领军的统治,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政府的作用和政策,谈到在阿塞拜疆比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有着更多的“易燃物,有更尖锐的社会矛盾,有更坚实的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基础,人民对于现在的政府也更为不满和仇恨”。同时在阿塞拜疆还有在共产党影响和领导下的、组织得很好的工人阶级。信中还谈到,“巴库党组织承认了同苏维埃俄国保持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的独立的苏维埃阿塞拜疆”,“这一口号现在很得人心,它能把广大的阿塞拜疆劳动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发动起义。”信中还谈到了,我们的工人代表会议,巴库工人总罢工的开始和结局,谈到我们党在巴库工人中的影响的增长情况,谈到了我们同梯弗里斯的同志们关于独立的苏维埃阿塞拜疆的争论;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形势;谈到英国人伙同白匪军在彼得罗夫斯克横行霸道,以及他们破坏达格斯坦党委会的情况,谈到了达格斯坦农民的革命情绪和组织起义队伍的情况等……

我们报告列宁说,我们正在边区准备武装起义,建立起义据点,一经得知红军部队和海军准备支援我们,我们就能够采取行动。我们并请求列宁和党中央给我们派一些有经验的党的工作干部(特别是穆斯林出身的)到巴库来,并给我们寄些俄文、阿塞拜疆文和亚美尼亚文的党的书刊。

那么,派谁做为我们去莫斯科的第一个信使更合适

呢？我们大家商量来商量去，不知怎么地大家一下子都同意派季格兰去。当然，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这里忠诚可靠的党员少。我们很清楚，完成这样的任务仅有对党的忠诚是不够的，还应该特别机灵、富有经验。而季格兰非常熟悉从阿斯特拉罕到巴库的路，在回来的路上，他能更好地随机应变，越过一切障碍。

还决定派边区党委会执行局的事务秘书、二十岁的女共产党员舒拉·别尔增斯卡娅和他一起去。她是一个道地的巴库人。1918年她在北高加索工作过。那里的苏维埃政权被推翻以后，舒拉经格鲁吉亚军事公路转到格鲁吉亚，然后来到巴库。我们大家完全信任她。

她个子不高，瘦瘦的，很好看，看样子比二十岁要显得年轻，她简直象个小姑娘，象个中学生。然而，她在北高加索同反革命斗争时，就已经经历过各种艰险。

正是季格兰和舒拉应该把我们的信件亲手交给党中央委员会，交给列宁同志本人。（应该说明，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又象派季格兰和舒拉那样，派出了第三个信使——一个有经验的共产党员霍连·鲍梁，带着同样的信件去莫斯科。）

我们担心列宁会收不到我们的信，（我不知道，在莫斯科谁接待，信会落到谁手里，又会把它发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非常希望列宁能看到这封信，好象只有这样，中央才能了解我们的情况，并就我们所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给我们做出指示。因此，我们在信封的地址“俄国共产

党（布）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收”的下面画上了着重线。

关于我们的代表团是如何通过邓尼金占领区的情况，舒拉·别尔增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当大家建议我和季格兰一起去莫斯科时，我高兴地答应了。去莫斯科，亲眼看看苏维埃俄国，穿过边界和前线，经历艰险，克服重重障碍，这一切都非常符合我英勇立功的愿望，因此，我焦急地等待着出发的时刻。

那时，我们的年龄是：季格兰——十八岁，而我——二十岁。

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这是在1919年5月底。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关于阿塞拜疆和南高加索形势的报告，印在一块布上，在同样的一块布上，印上了委派我们去莫斯科、党中央委员会的委任书。

我们开始准备出发。季格兰穿的是一件军服式的上衣，我们把他这件衣服上的衬襟取出来，换上印有米高扬给中央的报告的那块布；把我们的委任书‘安置’在我的短上衣的衣角里。我们俩都领到了写有别人姓名的身分证，我的身分证用的是我已经牺牲的女友齐娜·叶列缅科的名字，季格兰用的是实科中学学生格里沙·佐拉鲍夫的名字。

这样，我们终于提着小旅行皮包，在车站买了到彼得罗夫斯克的车票，于傍晚离开了巴库。我们故意在快开车时才上了火车；车厢里很暗，只有几处灯笼里燃烧着蜡烛。

过了哈奇马斯站之后，车厢里开始喧嚷起来。一些人走进我们的包厢，并要求我们出示证件。他们看了季格兰的身分证后，用提灯直接对着他的脸照了一下，简短地命令说：‘出去！在走廊

里等着。’同时，他们自己也走出去了。

季格兰很快地把军服式上衣脱下来交给了我。应该说，季格兰穿着军服式上衣显得象个已经相当成熟的青年人；而现在，当他身上只剩下兰条衬衣时，加上戴着实科中学帽徽的学生帽，他很容易被当成比他年纪小得多的男孩子。

季格兰走出包厢，看到在车厢的一头站着一个显然是等着他的哨兵，于是，他赶忙转过身，从车厢的另一边出来往厕所里去了。然后，未被哨兵认出的季格兰便到旁边乘客很多的三等车厢，在一个上铺上躺下了。

当然，这一切我当时一点儿也不知道。突然，我听到一阵忙乱声。一些人手拿提灯走进我们的包厢，仔细地察看着乘客们的脸，小声说着什么……他们走了，又回来……。显然，他们是在搜查什么人。

季格兰怎么样了？不，要知道我是一点也不能显露出认识他的样子。把米高扬同志的报告送到莫斯科的任务，现在完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而这是主要的。我听见乘客们在谈论着：‘这个年轻人大概被赶下火车了。这里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赶下去，就枪毙了。’

第二天清晨，到了雅拉马车站。我坐立不安，便下了火车；心里想，或许能打听到点什么消息。异常幽美的大自然景色，芳香馥郁的南方树林，晶莹光亮的露珠，凉爽，清新……

突然，季格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高兴地跟我打招呼，装作好象偶然遇到一个熟人似的。他低声告诉我说，夜里，他们几次用提灯直照他的脸，但是，到底还是没有认出他就是‘那个’穿着军服式上衣的年轻人。

列车驶进彼得罗夫斯克车站，我们下了火车。戴着白色飘带

皮帽子的骑兵在城里到处窜来窜去，墙上挂着反苏维埃的标语和奥斯瓦格①的漫画。好象在昨天夜里，白匪军刚刚占领了这座城市。他们规定没有通行证禁止出城。

我们来到码头，试图说服一个船工跟我们一起到切禅岛去。我们答应多给钱（我们带着钱），但是，没一个人愿意去。昨天这还是可能的，而今天来了一道命令：‘没有通行证不准出海。’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到城防司令部那里去领取通行证。我们编造了一段经历，说我们想从切禅岛到斯塔拉-捷列奇纳亚去，寻找在土耳其军队进攻时从巴库逃到那里的父母。那个军官看了季格兰一眼后说：‘已经宣布征兵了，年轻人，明天你报名当兵去吧，你的年龄正合适。’

这下子我们可糟糕了！回去的路被堵死了，往前走又是吉凶莫测。我们决定，季格兰哪怕是步行也要回巴库去，由我一个人到切禅岛去。（因为并没有拒绝发给我通行证。）

我们在城里徘徊着，突然看到，霍连·鲍梁从小山坡上走下来。我们知道他和我们有着同样的任务。但是，他应该经过北高加索到苏维埃俄罗斯去，我们则经过切禅岛到阿斯特拉罕去。霍连告诉我们说，他搞到了一个非常高级的证件——调查在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难民情况的亚美尼亚委员会特派员的证件。他今晚乘坐的汽艇经过切禅岛。他建议我们也设法坐这艘汽艇走。

我们到旅店去了一趟，然后，就到码头去。汽艇停靠在那里，乘客已开始上船。其中大部分是背着口袋贩卖面粉的投机商。我们也上了船。为‘保险’起见，我们下到底舱。大约过了十五——二十分钟，白匪命令全体乘客都上去，要检查证件。我们到甲板上，

① 奥斯瓦格——邓尼金的反间谍机构。

看到码头上不太远的地方站着城防司令官，他旁边是一个穿军装的人。乘客们一个一个地走下船，向城防司令官出示证件，然后再回到汽艇上来。突然，季格兰不安地捏着我的手，小声地说：‘走近城防司令官跟前的那个人是安德烈·米亚格科夫，他是我实科中学的同班同学，……’怎么办呢？如果季格兰出示写有他同班同学佐拉鲍夫名字的学生证，那么，马上一切就会暴露。况且，米亚格科夫还知道，季格兰在1918年8月自愿加入了党领导的部队——红军。离开这里，不乘船了？可是，往哪去呢？码头上又到处都是军人，他们之中还有米亚格科夫。

剩下的未被检查过的乘客越来越少了。季格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米亚格科夫的行动。这时有一人来到码头，米亚格科夫向这个人走过去了。这时，季格兰走近城防司令官，向他翻了翻印有双头鹰的学生证，一转眼，他已回到汽艇上了。米亚格科夫转过身来，他根本就未看见季格兰，又回到了城防司令官身旁。

我们钻进一个小船舱，里面有一伙军官和他们的太太们。军官们吻着太太们的小手，对她们讲些恭维话，讲着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以使她们开心，用‘布尔什维克’这个可怕的字眼吓唬她们。

开船的汽笛终于响了，我们出海了。

我们来到甲板上。远方闪烁着彼得罗夫斯克的灯光。我们在汽笛旁边找了一块地方躺下，经过一个不眠之夜和令人焦虑不安的白天以后，我们很快就睡着了。我们睡得非常死，以致季格兰把自己的手放到汽笛的通气孔上，手被蒸气烫了一整夜，他都未感觉到。他手上一辈子留下了这块伤疤。

早上，我们来到荒无人烟的切禅岛。

我们到村子最边上的鲍洛京家去。伊万不在家，他妻子说，

他出去了，但是，说话就该回来了。伊万的弟弟费多尔在家里。和岛上所有的人一样，他也是个渔民，当然会撑船。这样，万一发生什么事，他可以把我们送到阿斯特拉罕去。

我们等待伊万回来。已经过去两天了，可他仍然没有回来。第三天，一个年轻的妇女跑进屋子里来，她伤心地嚎啕大哭着说，邓尼金匪徒正在挨门挨户地搜查，抓走了她的丈夫，正在拷打他，已经枪毙了一个人。

形势异常紧张，我们不能再等了。黄昏已经来临，我们坐在这间小农舍里，等于束手就擒。我们和费多尔商量好，今晚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里。费多尔出去‘侦察’——寻找合适的船。离我们约二百米远的地方有座灯塔。一个印度哨兵在灯塔附近有节奏地、慢慢地走来走去。（岛上有英国和邓尼金的基地。）

费多尔回来了，他找到了一条船。说实话，船非常小，但是，‘现在是5月，我们三个人坐这条船好歹可以划到阿斯特拉罕去。’费多尔‘叔叔’微笑着说。

漆黑的夜来临了。只看得见远处英国巡逻舰的灯光，而在岸边来回走动的印度哨兵的身影隐约可见。突然，费多尔悄悄地说：‘停住！’我们隐蔽起来。只听见小船在靠近沙滩时的沙沙响声，有人划船过来了，从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划过去了，随即，又是一片寂静。费多尔和季格兰小心翼翼地走上了小船。然后费多尔又回来了，他吃力地把我抱到了船上，把船推到水较深一些的地方，扬起了帆，我们就出发了。

夜色是这样美好，我们又这么顺利地搞到了人家的船，大海是这样地温顺平静，我们又遇上一路顺风，于是我们都安然地熟睡了。费多尔也睡着了。在我们十八到二十岁的人看来，他已经是个岁数相当大的人了（其实那时他才三十岁左右）。

黎明时，费多尔不安地叫我们。我们醒来了。环顾四周，听到远处的狗叫声，因为我们离岸边的村子已经相当近了。‘斯塔拉—捷列奇纳亚镇，白匪军的老巢。’费多尔说。一只小船离开海岸，向我们方向划来。风早就停了，船帆象块破布一样挂着，纹丝不动。‘收帆！’费多尔命令道，‘舒拉，你去掌舵，我和季格兰划船。使劲划！’追逐开始了。

已经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们离追逐我们的船越来越远：两船之间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显然，那只船已经不划了。村落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费多尔和季格兰还是一个劲地划呀划。一点风都没有，扬帆毫无希望。已经过了三个小时了。‘再也划不动了，’季格兰首先支持不住了。‘好了，不用划了，’费多尔允许了。

就这样，三天三夜，我们借助微弱的小风，慢慢地向目的地前进。有一次，我们听到大炮的轰隆声。‘什么地方正在进行海战？’费多尔说。一艘汽艇从我们身旁驶过，上面骄傲地飘扬着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旗帜。看到它，我们真是欣喜若狂。

‘乌拉！……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到家了！’”

当季格兰动身去莫斯科时，我给了他严格的指示：无论如何要把1919年3月下半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速记稿带回来。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因为我们这里得不到苏维埃俄国的报纸。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我们只是从传闻和资产阶级报刊的报道中了解一些。

我们委托季格兰和舒拉把信交给列宁本人。他们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在1919年7月和一批当时我们

非常需要的党的负责干部经过阿斯特拉罕和里海回到了巴库^①。这批负责干部当中有巴库著名的领导人：纳涅伊什维利、布尼阿特扎杰，加米德·苏尔塔诺夫。

* * *

列宁会见普通人时，他的态度总是使人们感到无比高兴。

下面就是别尔增斯卡娅的回忆录中关于她和阿斯肯达梁(季格兰)带着我们的信去见列宁的一段话。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蔼可亲地伸出双手，微笑地站起来迎接我们。

季格兰满怀激情地高呼：

‘代表巴库工人阶级向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致敬！’他由于感情很激动，拥抱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同志们，请坐下来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温和地让他平静下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我们所讲的每个细节都很感兴趣。

‘米高扬同志信中所说的连科兰在什么地方？’（他发音很软，把“连科兰”念成了“连科安”。）

‘米高扬同志的信中谈到卡阿巴赫（他把卡拉巴赫，念成了卡阿巴赫）的农民代表大会。卡-阿巴赫在哪里？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① 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取得彻底胜利以后，季格兰和舒拉被送去学习，后来他们成了优秀的冶金工程师。

在列宁办公室的墙上就挂着一张南高加索的大地图，季格兰把南高加索发生重大事件的地点一一指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看。

在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副俄国欧洲部分的大地图。上面用小旗子标明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

我们告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住在巴库一个绝密的地方。米高扬同志要求转告中央，奥尔忠尼启泽非常想回俄国，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他的这一愿望呢？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高兴地说：

‘谢尔戈还活着，他在巴库！一定要把他接出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要是能派一艘潜水艇去接他，那就太好了。’季格兰说道。

‘巴库附近里海沿岸的深度怎么样，潜水艇能靠近吗？’

季格兰回答说，在离迭尔卜特岸边不远的地方，对潜艇来说水深是足够的。乘普通的小船就可以靠近潜艇。

‘这个问题我们再考虑考虑吧。’最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说道。

在讲到英国军队在巴库的所作所为时，我们指出，英国士兵现在卖烟卷、巧克力糖和外衣。

‘噢，那么他们很快就该卖枪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着说。

‘真是个国家吗？’他问道。‘还有军队吗？还有自己

的货币吗?’

接着他马上又问道：

‘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就到了莫斯科？’

我们本来想用几句话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细节很感兴趣。

‘你们遇到危险了吗？’

我们向他讲述了我们经历的风险。我们讲到季格兰在火车上骗过了被派来监视他的白匪哨兵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笑了。

‘只是对任何人也不要讲你们是怎么来的。绝对不许对别人讲，对任何一个人也不能讲。’他一再叮嘱我们说。

突然，他出乎我们意料地问：

‘你们今后打算做什么，留下来学习怎么样？’

‘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们以青年人特有的果断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已向米高扬同志保证要返回巴库去。’

‘你们会英文吗？’

我们很遗憾地回答说，不会。

‘好吧，如果你们决定要回去，我们给你们一些印在香烟纸上的英文传单和给党组织活动的经费。所有这些东西我们都给你们藏到手提皮箱的夹层里。你们到共产国际克林格尔那里去取箱子。’

他又一次说：

‘对谁也不要讲你们来莫斯科的路线，对任何人都不要讲，那怕是亲近的同志也不能讲！’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是这样随便，这样亲切地同我们谈话的。他那样亲切地问这问那，以致我们早已忘记了斯塔索娃同志关于只准用十到十五分钟的时间向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报告的嘱咐。而且，就连事前准备好的汇报时要说的话也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了……

我们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里呆了四十分钟，然后满怀幸福和自豪的心情去执行他指派的任务……”

* * *

1919年3月底，几个党员从连科兰来到了巴库。以前，我们和连科兰没有建立必要的联系，所以，对当地真实情况知道得很少。

譬如，连科兰虽然是属于阿塞拜疆的，但后来一了解，实际上阿塞拜疆政府并没有在那儿行使权力。自苏维埃政权被推翻后，边区的统治权就落到了反革命军官和连科兰富农代表的手中。声称同阿塞拜疆政府保持“友好关系”的英军司令部，当然有能力制止“连科兰事件”的发生，并且使这个富饶的地区归自己的盟邦管辖。但连科兰的当权者是邓尼金的直接代理人，他们自然比阿塞拜疆民族主义者更合乎英国人的口味。

来的同志们说，他们已经把当地党组织分散的力量聚集起来了，并且在劳动农民中扩大了影响，赢得了威信。他们还告诉说，在连科兰军队中有相当多的人过去

是红军战士。他们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被派往那里去的，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他们就留在那里了，他们随时都会支持起义的。当地的阿塞拜疆贫农会反对木沙瓦特分子和白匪的情绪也很高。此外，在那些地方还有阿塞拜疆农民的起义队伍，地方党组织同这些队伍保持着牢固的联系。

考虑到这些情况，连科兰的同志们断定，在连科兰地区夺取政权完全是可能的。

这消息是如此重要，因此我们不得不仔细地核对有关情报，认真地考虑同志们的建议。

经了解，我们确实有力量夺取连科兰政权。但不靠外援要保持住这个政权，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一般说，建立这种小的“苏维埃绿洲”，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是因为没有希望扩大它，甚至没有希望保持住它。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有这样的设想，即航行期一开始，红海军就要着手准备夺取彼得罗夫斯克和巴库的战役。因而，从长远来看，占领连科兰又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连科兰地处里海岸边，又是一个良港，它能够成为红海军的一个良好基地。此外，当地盛产粮食，人口众多，这对于我们进一步在南高加索的其余地方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来说也是一种现实力量。

考虑了所有这一切，于是我们决定在连科兰推翻白匪军官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

记得，好象在4月15日到20日之间，戈果别里泽作

为巴库党委会全权代表出发到连科兰。和他一起去的还有阿加扎杰、古巴诺夫、斯塔罗茹克、卡涅弗斯基和其他人。他们依靠地方干部，在几天里就实现了变革，赶走了白匪地方当局，并在连科兰成立了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革命委员会。

5月2日在连科兰部队战士和城市劳动人民大会上通过的决议是值得提一下的。决议中写道：

“……全力支持唯一能够捍卫工农利益的苏维埃政权。我们深信，只有在第三国际——共产国际的统一旗帜下，同俄国工人联合起来，只有全世界劳动人民团结一致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够使劳动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我们要万众一心、拿起武器，时刻听从共产党人的召唤，齐心协力反对邓尼金—高尔察克的立宪民主党封建军官匪帮……和英法强盗。我们要求在穆干立即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并建立红军来捍卫这一政权。”

5月中旬召开了革命的穆干非常代表大会。大会开了四天。大会宣布建立穆干苏维埃政权，成立穆干苏维埃共和国，并选出了边区工农兵代表苏维埃。

总之，穆干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这些情况是果戈别里泽回到巴库后详细告诉我们的。

当时，与阿斯特拉罕建立经常的联系依然是我们急待解决的问题。我们设法建立和阿斯特拉罕的无线电联络，但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毫无结果。我们的一个同

志——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海员，布尔什维克，名字叫科热米亚金——自告奋勇乘小帆船从巴库海湾到阿斯特拉罕去。他的任务是：向那里汇报我们巴库的情况，并带回有关的情报。

尽管这次行动十分困难，但完成得很顺利。过了一个月，科热米亚金还是划着那只帆船和谢·米·基洛夫派来的两个同志一起回来了。其中有一个名叫季·伊·奥特拉德涅夫——乌里扬采夫的水兵，他是第十一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

当时第十一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阿斯特拉罕红海军司令部对巩固穆干苏维埃政权特别关心。正如我们设想的那样，他们打算利用连科兰和整个穆干作为舰队军事行动的基地，首先是为了陆战部队登陆。所以奥特拉德涅夫有潜入到连科兰并在那儿开展必要工作的任务。

从和奥特拉德涅夫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阿斯特拉罕方面怀疑从我们代表那里得到的情报。看来，科热米亚金有些夸大我们在巴库的力量和取得的成绩。那儿人们不完全相信他，所以又派奥特拉德涅夫来此地核实，核实之后再向他们提出有关巴库情况的报告，而奥特拉德涅夫本人就留在连科兰在巴库党委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同奥特拉德涅夫的会见使我们很高兴。那时季莫费依·伊万诺维奇才三十岁。1909年，他当工人时，加入了党。1916年他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时，因在舰队水兵中搞地下革命工作而被捕，并且被判处服苦役。二月革

命后曾任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党委会委员，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四月会议的代表，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委员，舰队公众民主法庭主席。1918年奥特拉德涅夫作为军事委员在斯塔夫罗波尔边区组建红军。以后，根据谢·米·基洛夫的提议，他在阿斯特拉罕战地军事法庭工作。

这人身体健壮，有一副开朗的俄罗斯人的面孔，一双聪明的大眼睛，总是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容。梳得平平整整的分头，剪得短短的小胡子，使他的外表显得很威严。奥特拉德涅夫是一个精力充沛、富有首创精神同时又很稳重和审慎的人，他给我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我们决定派他——不是一般的而是以特别全权代表的身分——到连科兰担任领导工作。我手边偶然地保存有一张1919年5月23日发给他的专门委任状，可以看出授予他的权限是很大的：

“此委任状系由俄国共产党高加索边区党委会发给奥特拉德涅夫同志。委派他为特命全权代表到穆干查明党组织和苏维埃机关的情况。他有权撤换不合适或不称职的干部，有权在必要的情况下改组和撤销现有机关，或建立新的机关。

各级党组织、全体同志和一切苏维埃机关对该同志要完全信任，在他执行任务时，要给以必要的支持和协助。

俄国共产党高加索边区

委员会执行部委员

阿·米高扬”

到连科兰后，奥特拉德涅夫很快就取得了当地同志们的信任和支持。在他的领导下，连科兰苏维埃政权很快地得到了巩固。

我们也曾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给连科兰以支持，首先是派遣久经考验的战士来加强这个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武装力量。那时我们有这样的战士。巴库的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后，几千名红军战士，经历了千辛万苦，来到了格鲁吉亚。但是在那里他们处境很困难：孟什维克当局对他们存有很大的戒心，甚至阻挠他们就业。逐渐地他们又先后返回巴库。巴库工人代表会议给他们以尽可能的帮助。还记得我们挑选他们之中最可靠的人，然后一小队一小队地派往穆干去扩充红军队伍。

应该说，穆干苏维埃政权一宣告成立，英军司令部和阿塞拜疆政府就宣布对连科兰实行封锁。不仅连一只轮船，甚至连一只小帆船都不许驶入或驶出连科兰。为此，海上和陆地上都实行了极严格的管制。

但我们还是不断地用帆船和渔船分批地把战士送往连科兰，每批二十到三十人。

记得，有四、五次（可能还要多）我们的小船落入警察的手里，我们的同志被关进了监狱，有的甚至被杀害了。

但是这种恐怖手段丝毫也不能动摇我们的决心，也丝毫没有动摇工人和红军战士去连科兰的强烈愿望。我们成功地向连科兰输送了近五百名有经验的可靠的战

士，这对连科兰是莫大的援助。

奥特拉德涅夫从阿斯特拉罕带来了通讯密码和一大笔“尼古拉二世”纸币，以满足连科兰和巴库的需要。这使我们第一次有可能在各地建立一些党的专职干部小组。此外，我们偿还了因买船向工人代表大会借的债，还拨了一笔款子作为救济来自北高加索的红军战士的基金。这时，我们也有了自己出版党的刊物的实际可能，因为尽管我们一再要求，但这种刊物（即使是俄文版的）从俄罗斯寄给我们的仍然很少。为了出版阿塞拜疆文的刊物，我们不仅吸收了“古墨特”（当时它还是统一的）中的布尔什维克和“阿达列特”中的工作人员参加这项工作，而且还吸收了一些阿塞拜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当时鲁胡拉·阿洪多夫是这个党的领导人之一。

我早在1918年巴库公社期间就认识了阿洪多夫。那时他主编阿塞拜疆文的《工人代表苏维埃消息报》。我是很喜欢他的。我们经常见面，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互相之间也很信任。在英国人占领巴库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日子里，我们之间的友谊更加巩固了。鲁胡拉·阿洪多夫的政治路线和我们所实行的政策实际上没有任何区别。尽管他年轻——他那时才二十二岁，——他是个坚强而有原则性的人，对革命事业非常忠诚。他中等身材，瘦瘦的个儿，总是挺整洁的，答应的事办起来很认真，很守信用，唯一的缺点也许是过于急躁。

我知道，阿洪多夫精通阿塞拜疆文学语言。他笔锋

犀利。他的俄语和文学修养都很好，所以我们那时很想吸收他参加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译成阿塞拜疆文的工作。此外，他还能吸引一大批阿塞拜疆知识分子（其中也包括他们党内的知识分子）来参加这一工作，这在当时也是我们所希望的。

我和他进行了商谈。我对他说，译文的出版工作由巴库党委会负责。他表示同意，但希望无论是翻译还是出版，都能由他的党来完成，而资金则由我们巴库党委会来支付，因为他的党没有经费。我当然拒绝了这种建议，记得，我甚至表示很不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怎能由左派社会革命党用共产党的钱来出版呢？！

“您的想法是绝对不行的”。我向他表明了态度，要他再次考虑我的建议，并希望他考虑好了通知我。

过了几天，他给我寄来了一张简短的纸条，这个纸条现在还在，上面写道：

“阿·伊·米高扬同志：

您不止一次地向我建议辞去目前的职务，着手出版突厥文的小册子和书籍的工作。在这之前，由于自己不能作主的原因，我无法离开印刷厂。现在由于我和主管人之间发生了冲突，我已离开了印刷厂。

如果您认为需要的话，我可以着手这一工作。如果您的答复是肯定的，有关工作条件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谈。

致以

同志般的敬礼！

鲁胡拉

又及：顺便应该告诉您一下，最近我要到一个地方去工作。请立即给我答复，以便我能斟酌情况决定。如果您所答应的工作不需要人的话，我也不至于失掉那个职位。

鲁·

1919年7月2日于巴库”

应该说明一点，当我产生建议阿洪多夫从事翻译工作的念头时，我曾打过这样的主意，在翻译的过程中通过深入地领会马克思和列宁学说的实质，他会从社会革命党人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事情的结果正是这样。

在收到阿洪多夫的短信后，我们立即会面了。他同意了我的建议。不久他就成了一个共产党员。1919年夏阿塞拜疆左派社会革命党同“古墨特”布尔什维克合并了。

关于阿洪多夫以及他后来是怎样成长为一个著名的党的活动家的，我还想提前说几句。

由于鲁胡拉·阿洪多夫在阿塞拜疆的共产党内很受尊敬，苏维埃政权胜利后，谢·米·基洛夫任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时，他就担任了中央委员会负责文化工作的书记。

出版阿塞拜疆文的书籍是实现共和国文化革命的最重要的条件。阿洪多夫极为热烈地希望阿塞拜疆的出版事业能得到广泛的发展，并为此而做了很多的工作。

首先他以极大的热忱从事阿塞拜疆文的马列主义书籍的出版工作。他把出版列宁的著作看成是自己一生中

的头等大事。

1924年年底，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对共和国的印刷基地实行技术设备更新。就在1925年，鲁胡拉·阿洪多夫被派往国外购买印刷设备，首先是购买能铸新铅字的整行铸字机。（这里说的是阿拉伯字母的字体改革。这种字母表和新采用的字母还要同时存在一段时间。）

同他一起去的有列夫·利弗希茨。在德国，他们找到了可以买下来的现成的铅字，但这种铅字却不合用。而在当时，新铅字只有美国能够制造。阿洪多夫和利弗希茨就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谢·米·基洛夫。党中央认为，他们应该到美国去一趟。

他们乘轮船前往纽约。刚到那里，阿洪多夫就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在健康检查时发现他患有沙眼，因而不准他在纽约上岸。把他送到了“眼泪岛”上的检疫站。检疫站是专为患有不准入境的疾病的人而设立的。

尽管苏联在纽约的商务代表处一再申请，仍然没有获准进入纽约市。唯一的办法就是返回去。但阿洪多夫又不肯空手回去。他说：“我办事一向有始有终，半途而废的事还从未干过。”

在同商务代表处的领导协商时，阿洪多夫坚持就是在目前这种条件下也要完成任务。商务代表处领导提醒他说，这样做他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鲁胡尔拉说：“我们到这里不是来游览的，而是来办事的。我留在这里并将

继续工作。”

于是，商务代表处和利弗希茨在纽约找了一家有关的商行。这家商行的代表多次到眼泪岛同阿洪多夫进行谈判。谈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一个多月，双方才把所需设备的详细清单最后确定下来。阿洪多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就在这时候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来到了美国。据利弗希茨讲，马雅可夫斯基出于好奇，准备去“眼泪岛”看看。当他从苏联在纽约的商务代表处得知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书记在这个岛的检疫站里隔离，并且不达到既定目的决不离开此岛的消息，马雅可夫斯基对这次旅行更感兴趣了，同时想亲自会晤阿洪多夫。但不知因为发生了什么事，马雅可夫斯基没去该岛，他们的会晤也就未能实现。

但是阿洪多夫的事迹使马雅可夫斯基对他产生了很高的评价。

1928年，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彭巴杜尔》出版了。马雅可夫斯基写这首诗是因为读了报上一条消息，说在餐车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阿洪多夫打了旅客一个耳光。但他未必想得起，这就是他在美国时使他如此感兴趣的阿洪多夫。他自己的诗中也这么写：

我不知道，
我击中了谁。

在诗中他刻划了一个专横的苏维埃官吏的鲜明形

象,但这个形象和报纸报道的打人的人却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这件事的确是有的。阿洪多夫把自己同车厢的一个旅客提的什么意见认为是对他的民族的侮辱,于是克制不住,打了这个人一个耳光。

报纸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当然是马雅可夫斯基写这首诗的依据。阿洪多夫本人后来对他一生中唯一的打人事件很后悔。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和谢·米·基洛夫对阿洪多夫评价很高,认为他是阿塞拜疆最优秀最有素养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

革命的骑士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他来到巴库;和卡莫结识。

关于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我是1917年春在巴库第一次从斯捷潘·邵武勉和阿廖沙·查帕里泽那里听说的。还在革命前,他们就和谢尔戈在南高加索党组织一起工作过。同志们都说,他是一个原则性很强的、英勇的革命家,是一个孜孜不倦的群众组织者。还在当时,听了他们的讲述,在我的心目中就形成了一个充满革命浪漫色彩的谢尔戈的鲜明形象。

1903年,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那年,十七岁的青年谢尔戈就参加了党,他把自己的一生

贡献给了党的事业。谢尔戈在巴库忘我地从事地下工作。1911年同弗·伊·列宁的多次会见以及列宁在巴黎近郊龙寿姆镇的党校所作的演讲，对奥尔忠尼启泽成长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奥尔忠尼启泽时说：“从那时起，他便成了一个我们最亲近的同志。”

在筹备1912年布拉格党的代表会议期间，谢尔戈在全党起了卓越的作用。作为召集会议的特派员，他到了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罗斯托夫、耶卡捷里诺斯拉夫、梯弗里斯、巴库和我国其他工业中心。在这些地方，在和孟什维克、托洛茨基分子以及调和派分子的极其尖锐的斗争中，他表现出巨大的才能，把各地党组织团结在列宁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思想周围。代表会议把奥尔忠尼启泽选入了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俄罗斯局。回到俄国以后，他为实现代表会议的决议作了大量的工作。

但不久沙皇暗探局把他逮捕了，他被判处苦役并永久流放。

在十五年的地下工作中，奥尔忠尼启泽有八年是在监狱、服劳役和流放中度过的。无论是梯弗里斯、苏呼姆、巴库的监狱、还是施利色堡要塞、西伯利亚和雅库次克的流放都没能摧毁谢尔戈钢铁般的意志，反而成了他学习斗争的大学，更加锤炼了他思想的坚定性。谢尔戈从来没有退却和屈服过，无论在革命年代，在国内战争的年代——在彼得格勒、乌克兰、白俄罗斯、在北高加索

和南高加索——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年代，都是如此。

现在暂时撇开回忆录的年代顺序，我想叙述一下关于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的事迹。他不仅是一位党和国家的活动家，而且曾与我共事多年，直到他死之前我们之间还保持着亲密的友谊。

谢尔戈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他的精神气质、他的政治和哲学见解、他的行为和生活方式——所有这一切，都是统一的、融合的、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他善于分析最复杂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他通晓党的政策和策略，善于掌握党和工人阶级的斗争方法。这里不禁产生了一个问题：他这一切是从哪里来的？要按他受过的教育来说，他只不过是一个军医啊。

我觉得这里正反映了这个杰出人物的一个最鲜明的特点。谢尔戈，这个从小就很有才能的人，随时随地都在学习——在革命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在当时各政党间进行的最严酷的斗争中、在克服党内分歧的过程中、在党内的尖锐斗争中、在地下小组的活动中、在顽强的自学当中、在和各式各样的人会见的时候——私人会见和在各种会议上的会见……他如饥似渴地吸取知识，并把这些知识变为自己的东西。监狱和流放也成了他生活和求知的极好的大学校。谢尔戈在施利色堡要塞里读过的那张书目单，始终使我感到吃惊。

谢尔戈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斗争。他是一个积极行动的人，对什么都感兴趣。因此他的政治和理论观

点是和他一贯以极大热情从事的事业紧密相连的。

显然，正因为如此，谢尔戈在我党斗争最艰苦的年代，才表现得那样出色。

1918年年底，巴库的苏维埃政权被颠覆。德国、土耳其军队进入南高加索：建立了三个与苏维埃俄国为敌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北高加索，德国人和邓尼金分子开辟了反布尔什维克的战线。红军失掉了来自中央的供给，遭受极大的困难：部队减员，不少人死于伤寒和饥饿。红军不得不撤到阿斯特拉罕，那里苏维埃政权还存在，可以得到一些供给，从那里可以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

奥尔忠尼启泽这时在弗拉基高加索。他是南俄特别委员和捷列克河流域地区防卫委员会领导人。他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和部队一起撤到阿斯特拉罕，还是留在当地同由工人和山区人民组成的游击队一起继续进行斗争？

谢尔戈决定留下来战斗到底。尽管胜利的希望很小，因为在后方是敌视苏维埃俄国的孟什维克的格鲁吉亚，同时又要受到疯狂的白匪军的进攻。

但是革命者的荣誉感使谢尔戈想到：应该留下来！他打电报给列宁说：“请您相信，我们大家宁愿在寡不敌众的战斗中牺牲，也决不会临阵脱逃而玷污我们党的荣誉。”

这些话反映了谢尔戈的全部形象。

过了半年，他才回到了俄国，并在国内战争的其它战

线上发挥自己的才能。

大约过了一年，他和红军部队一起回到了北高加索，山区人民热烈欢迎这位人民英雄。他们对谢尔戈无限信任……

在日常生活中，谢尔戈是一个很有风趣的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富有魅力的人。他不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但他具有一种独特的才能，他能一下子就和听众建立起紧密的、简直是心灵上的联系，并能以自己的真诚、直爽和朴实使听众为之倾倒。

平常他是一个稳重而镇静的人。但当他碰到不公正的行为、阴谋和谎言的时候，就变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那时他会怒不可遏、甚至会干出事后使他感到非常懊悔的事来。

有一次，一个当地犯了错误的名叫科巴希泽的人，竟然粗暴地攻击谢尔戈，好象指责他贪污。为此，他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当奥尔忠尼启泽回到高加索时，山区居民们为了表达对他的热爱和感激的心情，赠给了他一匹马。谢尔戈按照高加索的风俗接受了这个礼物，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匹马是他私人的财产，就把它放进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马圈，主要是在去参加隆重的阅兵式时才骑它。（那时参加阅兵的不仅有司令官们，而且还有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员。我还清楚地记得有几次谢尔戈骑着马参加了这样的检阅。）奥尔忠尼启泽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完全有权骑公家的马，而他也正是把人家送

给他的那匹马看作是这种公家的马。（顺便说一下，谢尔戈离开梯弗里斯以后，这匹马仍然留在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马圈里。）

然而科巴希泽却随心所欲地对整个事情进行了歪曲。

诬告谢尔戈这个水晶般纯洁而诚实的人贪污，简直是骇人听闻的。因此，听到了这件事后，谢尔戈怒不可遏，便打了这个造谣者一个耳光。

“案件”发生了。当时捷尔任斯基受党中央的委派来处理这件事。他得出结论说，奥尔忠尼启泽没有过错。

奥尔忠尼启泽的行为使列宁很生气。列宁写道：“……必须处分奥尔忠尼启泽同志，以儆效尤（由于我是他的一个朋友，在侨居国外时又和他一起工作过，所以我说这些话时就更感觉遗憾）……”^①

弗·伊·列宁批评了捷尔任斯基对奥尔忠尼启泽行为的评价，指出这种评价是错误的，并以他所特有的原则性说道：

“奥尔忠尼启泽对其他所有高加索的公民来说是一个当权者，”列宁就此事件写道，“奥尔忠尼启泽没有权力象他和捷尔任斯基所说的那样易于动怒。相反，奥尔忠尼启泽应该以一种超乎一般公民的自制力来约束自己……”^②（顺便说一下，列宁总是向那些在党和国家里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45卷，第361页。

^② 同上书，第358页。

身居要职的共产党员提出极高的要求，这又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谢尔戈对所发生的事件，从内心里感到苦恼，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为了说明事实的真相，他一点也不文过饰非地写道，这件事的发生不是由于他与科巴希泽之间的政治上的争论，而完全是由于对他本人的侮辱而引起的。

奥尔忠尼启泽还有一个特点。我们都知道，他有肾脏病。当时，如果病情特别复杂，可以请外国专家治疗。列宁不止一次地主张这样做。谢尔戈也到柏林去过。当时著名的鲍尔哈尔特教授证实了苏维埃医生的诊断，即应立即切除一个肾。

于是建议把谢尔戈送到柏林去动手术。但是他断然拒绝了。他说他要让那些在看病期间和他很要好的国内医生给他施行手术。他特别喜欢(照他自己对我们讲的，他简直是“爱上了”)一个老医生、过去沙皇的御医费多罗夫(列宁格勒人)。当时这个费多罗夫实在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是一个宫廷医生，甚至出席过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退位仪式，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

但是谢尔戈很了解费多罗夫本人，他相信这位医生，并且毫不犹豫地同意让他动手术。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所有的人，包括谢尔戈本人和我们这些人，当然还有喜欢谢尔戈那种开朗、豪放性格的那些医生，大家都对此感到满意。(应当指出，正是通过谢尔戈，全国才知道了费多罗夫这样一个出色的医生；

1933年费多罗夫获得了列宁勋章。)

医生们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向谢尔戈表达了自己的感情：在给他治病的过程中，他们制成了一种对肾脏病疗效很好的新的药品，他们把这种药叫做“谢尔戈津”，以此来表示对谢尔戈和他的夫人齐娜的敬意。据我所知，这种药至今仍为我们的医学界所采用。

我还想请大家注意谢尔戈的另一个特点，那就是他从不记仇，他是一个容易息怒的人，对任何人都不报复，任何时候也不暗地里对别人怀恨在心。

我还记得，1921年，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发生的一件事，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因为我本人也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

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前夕，由于正在格鲁吉亚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南高加索形成了一种非常紧张的政治形势，因此，谢尔戈不能到莫斯科去参加代表大会。

应当说，早在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前，由于托洛茨基分子所挑起的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我党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发生了很大的动荡。形成了一些有自己的纲领的派别集团，威胁着党的统一。尽管奥尔忠尼启泽在高加索，但在这次辩论中他立场鲜明，完全站在列宁一边。1921年2月在阿塞拜疆共产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工会问题辩论的报告时，他精辟地阐述了这场辩论的实质，并揭露了托洛茨基和施略普尼柯夫的反党立场，阿塞拜

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以压倒的多数支持了列宁的纲领。

奥尔忠尼启泽没有出席第十次代表大会，但会上在讨论党中央委员会候选人名单时，提到了他。

几个北高加索的军队代表突然从座位上站起来叫喊反对奥尔忠尼启泽当候选人。这些代表坐在最后几排，他们轰动了全场。其中一个人跳上台去，说什么奥尔忠尼启泽对一切都大声吼叫，发号施令，不把当地干部放在眼里，因此他不应当进中央委员会。

这个蛊惑性的发言影响了代表们的情绪，加之代表中有很多人当时并不了解奥尔忠尼启泽。

发言的是政治工作人员弗拉乔夫。他大概是由于牙痛，当时脸上还缠着白纱布，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弗拉乔夫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发言的时候，承认他在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反对谢尔戈，并非出自本意，而是由于托派的巨大压力，当时他也参加了托派。他说他在第十次代表大会期间参加了大会代表中托洛茨基分子的一个秘密会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关于把很多拥护列宁的同志排挤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其中就包括奥尔忠尼启泽。（后来弗拉乔夫脱离了托洛茨基主义，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站到党的正确立场上来了。）

斯大林发言为奥尔忠尼启泽辩护。他讲得很沉着、声音很小。他介绍了谢尔戈的经历，讲述了谢尔戈在地下活动中和在国内战争前线的工作情况，并建议把他选为中

央委员。可是，看来他未能说服代表们，他们继续喧闹。

于是列宁发言为谢尔戈的候选人资格进行辩护。他的讲话大概是这样的：早在地下活动时期，我就知道谢尔戈同志是一个忠诚、积极、大无畏的革命者。他在侨居国外时表现得很好，在1912年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在那时，他就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十月革命的准备和进行期间，他在彼得格勒积极开展工作。在国内战争时期，他是一个果敢的、有才干的组织者。但是刚才发言的同志对谢尔戈提出的批评中有一个意见是正确的，这就是他总是对别人大声叫喊，这是事实。他说话声音很大，但你们可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和我讲话时，也是这样大声叫喊。看来是因为他的左耳有点聋——列宁讲得特别温和亲切。他总以为别人没有听到他在讲什么，因此他才大声说话。但是对这样的缺点是不应当介意的……

列宁的话引起了代表们的微笑，甚至发出了善意的笑声。显然，由于列宁支持了谢尔戈当选，反对派对他的一切进攻都被击退了。（不过应该顺便指出，列宁从未原谅过谢尔戈的一点过错。）要知道，当时非常担心会出现很多反对票。列宁发言后，经过无记名投票，绝大多数的人投了奥尔忠尼启泽的票。同捷尔任斯基一样，在四百七十九张选票中他得了四百三十八张（只有列宁一个人是全票当选），这比当时许多著名的中央委员的票数还要多。

记得当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观察力使我非常惊讶，我也发现了谢尔戈的听觉比别人差，但是不知道他正是左耳有点聋。

在代表们回到各地后不久，奥尔忠尼启泽从一个代表（当时高加索军政治部副主任 B. A. 苏蒂林）那里知道了弗拉乔夫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但是，正如所料，谢尔戈一点也没有对弗拉乔夫记仇。

事情恰恰相反，1922年夏，谢尔戈和埃利阿瓦还有另外一个同志（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受中央委派到中亚细亚去检查工作，特别是同巴斯马赤^①匪徒斗争的情况。在那里，谢尔戈遇见了弗拉乔夫，那时他是土尔克斯坦军事委员会委员。

后来，弗拉乔夫对我们说，以奥尔忠尼启泽为首的检查小组很客观地了解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而对他个人没有提出任何特殊的意见。不仅如此，1922年年底，谢尔戈还提出要调弗拉乔夫到梯弗里斯去当高加索独立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而谢尔戈自己当时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弗拉乔夫说，不久，他被召到莫斯科党中央。斯大林接见了，问他同意不同意调动工作。弗拉乔夫表示同意。这时斯大林略带讽刺地问他，还会不会再反对奥尔忠尼启泽？弗拉乔夫回答说，当然不会了，因为我现在很

^① “巴斯马赤”——土耳其语“basmaq”，进行抢劫之意；后来指苏联内战时期在中亚参加反革命活动的一些土匪。——译者

了解奥尔忠尼启泽是怎样一个人，并且非常尊敬他。

一般说来，对谢尔戈不好的只是那些很少了解或者根本不了解他的人，这些人易于轻信各种各样怀有敌意的或者简直是极其庸俗的流言蜚语，而这种流言蜚语往往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着，是针对一些著名人物的。

还是那个 B. A. 苏蒂林说，在二十年代中期，他到莫斯科去时，和谢尔戈同坐在火车的一个包厢里。在一个车站上，苏蒂林走到站台，在书亭里买了一本当时出版不久、而且还很少有人知道的亚·绥拉菲莫维奇写的《铁流》。回到车厢以后，他问谢尔戈要不要读这本书，说他自己已经读过了这部小说，并且很喜欢它。

一听到这本书作者的名字，谢尔戈就有点生气地（当时苏蒂林觉得）说，他不想读这本书。在回答苏蒂林“为什么？”这个问题时，他说：“因为我认为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好人！”

后来弄清楚了，绥拉菲莫维奇在二十年代初，作为《真理报》记者被派到高加索。当时，谢尔戈作为一个苏维埃政府授予极大权力的中央全权代表在高加索工作。

那时高加索的情况很复杂。绥拉菲莫维奇没有弄清情况，没有弄清楚当时在高加索这个多民族边区进行的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各种微妙情况，却令人遗憾地受了各种谣言的影响，又没有亲自查对，就写信到莫斯科向列宁诬告了谢尔戈，把谢尔戈没有做过的事归咎于他。

谢尔戈是一个极其正直而诚实的人，对别人体贴入

微，关怀备至，他极端憎恨不公正的事情和诽谤行为，因此绥拉菲莫维奇对他的这种态度使他感到非常生气。

幸好，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之间的这个冲突，双方都很满意地解决了。由于看到全国对谢尔戈的尊重和爱戴不断增长，绥拉菲莫维奇认识到自己对奥尔忠尼启泽所作的仓促结论是完全错误的。1928年年底，他给谢尔戈写了这么一封信。

“奥尔忠尼启泽同志：

敬爱的同志：

几年前，我对您作了一件极不公正的事情。

无论我和谁谈起您——甚至反对过您的人——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反应说：奥尔忠尼启泽同志是一个最忠诚的革命者，最纯洁的党员。我一直注意地观察着您的政治工作，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做了不公正的事情。

不久前，我在克里姆林宫遇见了您，当我想到这就是我曾经非常不公平地对待过的同志时，我再次感到非常痛心。

我应该向您讲明这个问题。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亚·绥拉菲莫维奇

1928年12月7日”

当然，这封信不仅充分反映了奥尔忠尼启泽的形象，同时也充分反映了绥拉菲莫维奇的为人。这位诚实的作家，在没有给奥尔忠尼启泽写信向他承认自己无意中犯的错误之前，他的心情是不能平静的。此后，过去的事情也就忘却了。

在下新城工作时，我在党的代表会议、党中央全会和其他会议上，以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经常遇到谢尔戈。1922年3月我在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见到了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工作，但那时他的身体明显地不如以前了。医生要求他去治疗和休养。列宁自己对此也很清楚。

谢尔戈对列宁的健康状况非常关切，极力说服他到高加索去休养和治疗。记得好象是说服了列宁。至少，他和伊里奇商量好了这次休养和治疗的计划。关于这件事还保存着列宁给奥尔忠尼启泽的几封便笺，在其中一张条子里列宁写道：“……请您随便给我写几句，以便让我知道我们完全谈妥了，而且不会发生任何‘误会’。

我的神经仍然很痛，头痛也还没有好，为了认真治疗，我应该真正休息。

您是那么忙，所以您大概无法亲自去做我们昨天谈的那件事，而且您动手来做当然也是不合理的。请您找一个勤勉可靠、对细微小节都极为细心的人去做这件事。（顺便说一句，到那时我责骂的就不是您了，这倒使我心里舒服些）。”^①

列宁还写道，他盼望谢尔戈在一个月后能给他寄去“一个合适的地点（或几个合适的地方）的详细地图和情况介绍——海拔高度，僻静程度等等，以及这些地点及所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54卷第229页。

在县、省的详细介绍。”^①列宁在给谢尔戈写的另外的便笺中谈到这件事时，还说过，卡莫要求和他一块去，他也同意了。^②列宁还表示希望选择的地点不仅适合他本人，而且也适合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芙娜，他说，就这点来说，“波尔荣^③是很合适的。”^④但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终于没有能够到南方去。

我到罗斯托夫担任俄共（布）中央东南局书记（1922年5月）以后，我和奥尔忠尼启泽的会面就更频繁了。那时我对谢尔戈的工作和南高加索各个党组织的整个情况当然很感兴趣，因为我们是“邻居”，北高加索的许多问题，和南高加索的同类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和共同的。为了具体解决北高加索的许多问题，研究南高加索各共和国的工作经验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和谢尔戈的会面和交谈对我特别有益，因为他比我更了解北高加索和达格斯坦的情况。每当要去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体会议和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我同伏罗希洛夫（他当时也在罗斯托夫工作）总是跟路过罗斯托夫的奥尔忠尼启泽和基洛夫一起去。我们往返都是同坐一节车厢。旅途中，我们总象一起共事的亲密同志那样亲切地交谈，热烈地交换意见。

①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54卷第229页。

② 同上书，第230页。

③ 波尔荣——南高加索格鲁吉亚的著名温泉疗养地。——

译者

④ 《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第54卷第242页。

当时北高加索出现了许多复杂的问题，如民族问题，等级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引起了磨擦和激烈的冲突。我感到很难搞清楚所有这些问题，特别是我初到北高加索工作的时候，而谢尔戈几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和胜利后都在这个地区工作。他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非常了解当地干部，特别是那些在意见上经常和别人发生激烈冲突的同志。谢尔戈在北高加索党的干部和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们非常重视和信任他的意见。因此我利用一切机会同谢尔戈见面和联系，以便和他商量种种复杂的问题。

1926年7月在联共（布）党中央全体会议上，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和我都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在这以前，我们都在高加索工作。全会以后，基洛夫立即被派到列宁格勒任党的省委书记。再也不能容忍季诺维也夫任列宁格勒党组织的领导人了，他把党的基本队伍之一——列宁格勒党组织变成了反对派的堡垒。

派基洛夫担任此项工作是很合适的。此后多年的历史事实也证明，他圆满地完成了交给他的任务。他在列宁格勒使党的生活回到了正确的道路上，并为党挽救了几千名曾一度被季诺维也夫蒙蔽的党员。列宁格勒党组织又重新成了党中央的忠实支柱、列宁思想的体现者。

在肃清季诺维也夫反对派在列宁格勒的影响的斗争中，奥尔忠尼启泽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党的十四次代表大会期间，部分中央委员，其中有谢尔戈、基洛夫和我

前往列宁格勒，并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作了反对反对派、捍卫党中央路线的发言。

中央7月全会(1926年)后不久，通过了一项决议，任命我为国内外贸易人民委员，同时解除了我北高加索边区党委书记的职务。(至于我是如何当上人民委员的这段历史，是很有趣的，我下面再谈。)

过了一段时间，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把奥尔忠尼启泽从南高加索调到北高加索，任他为北高加索边区党委书记。南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的委员向中央提出异议，反对把谢尔戈调往罗斯托夫，坚决要求把他留在南高加索。可是，斯大林坚持己见，所以中央仍维持原来的决议。后来我才知道，奥尔忠尼启泽也认为自己应该继续留在南高加索工作，但是他没有向中央提出异议，在新任命通过之后，他就到罗斯托夫去了。

当时就已经很清楚，即使应该把谢尔戈调离南高加索，那么也只应调他到领导全苏的工作岗位上去，他当时已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事实也正是如此。没过两个月，政治局又通过新的决议，提名奥尔忠尼启泽为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个职位实际上已经空了三个月之久了，因为捷尔任斯基逝世后(1926年7月)，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瓦·弗·古比雪夫调任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了。

在1926年11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和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联席会议上，批准了委任奥尔忠尼启泽为党中央

监察委员会主席的提案。尽管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有很多反对派分子以及他们的头目，但是他们一个也没有发言反对谢尔戈，结果他以仅仅一票反对、六票弃权当选为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

这次新的任命是非常恰当的，对党也是非常有利的。谢尔戈始终不渝地捍卫列宁的政策，同反对派作坚决的斗争，同时他对误入歧途的人却十分耐心，他不同意“轻率地”把他们开除出党。根据列宁思想的精神和列宁关于维护党的队伍的统一的教导，谢尔戈尽可能客观地看待这种或那种问题，没有特殊必要决不使分歧尖锐化；他竭尽全力同分裂党的活动作斗争，不允许不同的政治纲领存在。

党内各方面的同志都很满意由奥尔忠尼启泽这样一个人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当时某些党组织热衷于把那些由于受蒙蔽而跟着反对派走的、那怕是老党员也要匆忙地开除出党。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和整个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是由久经考验的、忠于党的统一事业的老布尔什维克组成的）常常接连几个小时和那些受蒙蔽的党员谈话，帮助他们认识自己的错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达到了目的。当然这里只是指中、下层领导干部，至于反对派的头子们，则已经不可能把他们“改造”过来了。

奥尔忠尼启泽同反对派作过激烈的斗争，他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说：“同志们，革命不是儿戏，哪怕

仅仅是开始去动摇领导革命的党，那么任何革命都会断送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多次讲过这个问题。我们没有任何权利容忍动摇我们的党和我们的革命的行为。而反对派的活动正是导致这个后果。”^①

1929年第五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批准了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当时面临的任务是动员所有力量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纲领而斗争。谢尔戈又担任了新的工作：1930年11月他被任命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在完成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在新的条件下管理蓬勃发展的工业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当时决定从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中分出轻工业和木材工业，单独成立相应的人民委员部，并把食品工业合并到供应人民委员部。而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的其余部分——重工业的所有部门——都划归重工业人民委员部。奥尔忠尼启泽担任了重工业人民委员。

我国开始建设巨大的黑色冶金企业，大矿场和新的机器制造工厂。当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具有生产技术知识的干部，这些人应掌握先进技术，并能保证以必要的形式对企业进行经济领导。

谢尔戈在完成这些任务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谢尔戈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全党享有崇高的威

^① 见《联共(布)十五次代表大会 1927年12月速记报告》，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1年版，第1卷第436页。

信，他的威信以及他本人的感召力大大鼓舞了重工业工作人员发挥巨大的创造力，这就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创造了前提。

同时，重工业的工作人员也都以自己的人民委员而感到十分自豪。谢尔戈在党内很快就博得了“重工业战线总指挥”这一荣誉称号，他的全部活动也证明了他无愧于这个称号。

谢尔戈善于选拔有才干的人，特别是从青年中选拔，他给他们以各种支持，同时考查他们，而当他们犯了错误的时候，督促他们改正。

正是根据谢尔戈的推荐，年轻的共产党员工程师扎维尼亚金被任命为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冶金联合工厂的厂长，后来扎维尼亚金成了部长会议副主席。当时还年轻的冶金工程师捷沃相也是他提拔起来的干部之一，他任命捷沃相为“特种钢”联合工厂的领导人，后来是黑色冶金工业部部长，也成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有才干的组织者利哈乔夫也是谢尔戈发现的。利哈乔夫先是莫斯科汽车制造厂的厂长，后来是人民委员。

谢尔戈对合理化建议者非常重视，总是把一些重要的创议向全苏推广。他在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斯达汉诺夫运动开始于煤炭工业部门，后来遍及所有的经济部门。谢尔戈善于激发起人民群众的热情，并把这种热情引导到完成实际的、具体的任务上去。

谢尔戈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发展重工业上，但同时也不忽视人民消费的直接需要。那个时期，食品工业的根本技术革新已经开始。因此，它迫切需要相应的装备和机器。在这一方面，奥尔忠尼启泽总是给予非常宝贵的援助。我当时领导着食品工业，在具体解决制造食品机器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得到他热情的支持。

谢尔戈总是不断地提醒大家，企业中的日常劳动并不是寻常的事情，而是伟大的、鼓舞人心的事业。谢尔戈为提高生产水平，为保持厂院、车间的干净整洁，为改进劳动现场的组织工作，为实行和发展经济核算制度，为提高生产利润率而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谢尔戈所开创的事业在现代革新者的卓越创举中开花结果，他为这一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智慧、自己的精力和组织才能。

最后，我想再一次指出谢尔戈作为一个同志的优秀品德。他不易和别人接近，但对人能真诚相见，对同志总是特别热爱和关怀。

前不久，我读到1928年2月13日奥尔忠尼启泽寄给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克·叶·伏罗希洛夫的一封信。信里谢尔戈提出了在高加索参加斗争的八位同志，建议在即将向国内战争有功人员授奖时予以奖励。他认为这几个同志是应该奖励的，而当时却被忽略了。

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就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关于基洛夫，谢尔戈在这封信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你对他的了解并不比我差。尽管如此，我还是说几句。在阿斯特拉罕被围困期间，正是谢·米·基洛夫鼓舞着四面联系都被切断了阿斯特拉罕捍卫者坚持斗争。1920年，奉高加索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基洛夫穿着我们那双旧雨靴从阿斯特拉罕跑到圣十字，然后又同军队一起向北高加索挺进。1921年，当我们向孟什维克所把持的格鲁吉亚进军的时候，他又亲自送我们穿过马米松山口。在这个山口，我们的军队一面清除道路上一俄丈半深的积雪，一面前进。应该说，只有基洛夫亲自在场才能够鼓舞几乎是衣不蔽体和赤脚的红军战士去建立这样的功勋。”

从这封信中我才第一次知道，正是奥尔忠尼启泽提议授予我和其他同志战斗红旗勋章，以表彰我们参加在巴库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但是，无论谢尔戈还是其他同志从来没有向我提起过这件事。1921年春天，当国内战争结束，我国已展开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奥尔忠尼启泽本人被授与了战斗红旗勋章。

还可以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究竟是怎样的一位杰出的、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但这一切已是人所共知的了。因此，我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强调指出：谢尔戈也是一个杰出的人。用高尔基的话来说，是一个第一个字母需要大写的人。

谢尔戈是一位忠诚的、真正高尚的革命骑士，布尔什维克真理的坚定不渝的旗手。“党性高于一切，先于一切”

是他喜欢说的一句话。他教导我国工业战线上当时还年轻的指挥员们说：“一刻也不要满足于既得的成绩，一刻也不要骄傲，同志们，因为骄傲只是无知的表现。”

在党和人民中，谢尔戈一直享有崇高的威望，他的名字到处传颂。这是我国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历史上的一个光辉的名字。

* * *

不过，我还是回过头来回忆 1919 年的事。

在这一年的 5 月，我们巴库的地下共产党员接到了梯弗里斯南高加索边区党委的通知。通知说，当时在梯弗里斯的奥尔忠尼启泽打算到莫斯科去。那时去莫斯科只有一条路，即由巴库经海路到阿斯特拉罕。因为苏维埃政权在阿斯特拉罕始终保持着，而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基洛夫是该地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

1919 年 1 月，我们的第十一军在北高加索同邓尼金“志愿军”的优势兵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并被迫撤退之后，谢尔戈到了梯弗里斯。当时红军第十一军的主力部队在司令员列万多夫斯基的率领下退到加尔梅克草原和阿斯特拉罕。而其余部队则在奥尔忠尼启泽的统率下在高加索山脚英勇地战斗到最后一发子弹，然后进入了山区。谢尔戈把各个山村里的印古什人和沃舍梯人编成游击队，5 月初他越过高加索山脉和极难攀登的赫弗苏尔山岭到达了梯弗里斯。

谢尔戈同他的妻子齐娜伊达·加夫里洛芙娜一块到

了巴库。无论是在内战前线还是在后来的生活中，她都是谢尔戈形影不离的伴侣。还在雅库次克流放期间他们就结了婚。他们的亲密朋友都直接叫她“齐娜”。

已经牺牲的巴库人民委员阿廖沙·查帕里泽的妻子，布尔什维克瓦尔瓦拉·米哈伊洛芙娜要到莫斯科去，也同他们一块到了巴库。她同巴库的几个同志在里海以东地区的监狱里受了半年多的折磨。她要去莫斯科，她的两个女儿叶列娜和柳齐娅在那里。她们是在1918年巴库苏维埃政权失败之前不久同斯捷潘·邵武勉的妻子和几个小孩一块从巴库撤出来的。

同他们一块来的还有那个传奇式的人物，职业革命家卡莫（谢·阿·捷尔—彼得罗相）。他准备到莫斯科去见列宁。他有许多战斗计划，想报告列宁以取得他的同意。比如，他想与一部分同志潜入邓尼金司令部的驻地去把它炸掉。奥尔忠尼启泽很喜欢卡莫。三年以后，卡莫去世了，这使他万分悲痛。1922年7月18日，当谢尔戈代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在卡莫的葬礼上发言的时候，他激动得几乎讲不出话来，所以他的发言只记下了很少几句。“亲爱的卡莫！”谢尔戈说：“我和你是十八年前相识的。那时我还年轻。你把谆谆教导我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和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看作是你的责任……”^①

^① 《格·康·奥尔忠尼启泽论文和言论集》第1卷，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6年，第241页。

奥尔忠尼启泽在巴库的停留，是严格按照秘密工作的全部规定安排的。他的警卫人员是由青年团中最可靠的成员组成的。每天晚上，在秘密住所里我们安排谢尔戈同小范围的党的干部会见。我们向他详尽地汇报了工作情况和我们的计划。他对所有这些都很有趣。而且，他还想多收集一些新的情况，以便向党中央和列宁汇报巴库以及整个阿塞拜疆的局势。

那时，我们同梯弗里斯的共产党员就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这几个民族国家应该有什么样的国家体制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因此，当时了解奥尔忠尼启泽对这一重大政治争论的意见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奥尔忠尼启泽非常重视我们的这一争论，并且赞同我们的立场。我们对此很高兴，特别是因为他要到莫斯科去，能够在那里为我们的观点进行辩护。

我曾经问过谢尔戈，当时执政的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是否知道他在梯弗里斯，是否曾企图逮捕他。他微笑着说，他们当然知道他到了梯弗里斯。但有趣的是，早在沙皇时代奥尔忠尼启泽就很了解的孟什维克头子诺依·饶尔丹尼亚，认为有必要转弯抹角地转告谢尔戈，让他不要上街，因为英国人会逮捕他。这件事应该这样理解：孟什维克既不打算逮捕谢尔戈，但同时也不打算阻止别人逮捕他。

我同谢尔戈以及其他党员同志主要是在夜里会面，并采取了严格的防备措施。会面地点是在我那间自从越

狱之后就在那里躲避的秘密住所。有一次是在卡斯帕罗夫家的秘密住宅里会面的。

谢尔戈很高兴地回忆起他第一次来巴库从事党的工作时的情景。那是在1907年初，他当时二十岁。他用阿萨杜拉耶夫采油场医疗站医生的职务作掩护，在石油企业的工人中全力以赴地从事党的工作。谢尔戈在巴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风暴中受到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锻炼。他总是亲切地怀念着这一工人运动的中心。

他还给我们讲述了当年奉列宁之命从国外回到俄国后，他是如何在巴库召开了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会议，为布拉格党代表会议选举组织委员会的。他特别有感情地回忆了斯捷潘·邵武勉积极参加这次会议的情景。

谢尔戈接着回忆说，巴库大逮捕之后，俄国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会议转移到了梯弗里斯，在叶·季·斯塔索娃的住处继续举行。就是在那里，会议通过了选举布拉格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的决议，制定了参加布拉格会议代表的选举程序。谢尔戈作为组织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从梯弗里斯返回了巴黎，并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汇报了所作的工作，受到了所有代表的赞扬，特别是受到了列宁的赞扬。

记得，谢尔戈在答复我们的询问时，给我们详细地讲述了第十一军在北高加索失败的情况，以及1918年初当地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的情况。

谢尔戈很谦虚，因此他当时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印古

什季叶山区作战时以及穿过高加索山脉时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但不说我们也清楚，他为此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

有一天晚上，我们给谢尔戈安排了一次与几个阿塞拜疆社会党人的会面。他们在国会中有自己的代表。记得参加会晤的人有阿利·盖达尔·卡拉耶夫、米尔扎·达乌德·古谢伊诺夫、萨麦特·阿加马列—奥格雷。这些同志作了大量的对我党有利的工作，我们对此也给了很高的评价。

这几个同志向奥尔忠尼启泽详细地介绍了国会的情况、木沙瓦特政府的情况以及阿塞拜疆地区的局势，向他汇报了按照他们与边区委员会巴库局共同制定的计划所进行的工作。谢尔戈对这次会面非常满意。

谢尔戈在巴库共呆了四天。6月13日白天他同一部分同志坐渔艇离开了巴库。我们决定把谢尔戈的命运托付给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勇敢的有经验的海员罗戈夫。应该说，那时我们已不那么担心渡海会失败了。因为由多夫拉托夫领导的“海上运输队”总是安排得很好的。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焦急不安。四个多星期以后，我们才知道他们顺利地到达了莫斯科。他们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走了将近十天才到达阿斯特拉罕。那样的天气，从安全的角度来讲倒是最适合不过的。因为停泊在彼得罗夫斯克基地的邓尼金的军舰都躲到港口里去了。如果

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我们的船只为了躲避邓尼金匪徒，却不得不躲在里海以东地区沿岸偏僻的海湾里。

罗戈夫后来说，风暴使容易晕船的谢尔戈非常痛苦。这次航行简直使他精疲力尽，他甚至曾经想要下船上岸。但同志们劝住了他不能那样干，因为岸上是白匪的天下。

* * *

那些天，卡莫到我那儿去过两、三次。尽管在此之前我已经知道了一些他的英勇事迹以及列宁对他的信任，但只是在那时我才初次与他熟识。

卡莫在生活中很谦逊，非常纯朴，不喜欢谈论自己。

前不久在翻阅高尔基的作品时，我注意到了他的一篇关于卡莫的出色特写。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本人对卡莫是非常了解的。

在还没有认识卡莫之前，高尔基已经听到过关于他的许多十分惊人的神话般的故事。还在第一次俄国革命英勇斗争的日子里（那时作家第一次知道卡莫这个人），他就感到难以相信这个人，“那么多简直是神话般的勇敢行为，总是马到成功；既有非凡的机智，又有儿童般的单纯。”

高尔基是一位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创作想象力的作家。但他仍然觉得，如果把他所知道的卡莫的事迹都写出来的话，那么“任何人都不会相信在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人物，而且读者必定会认为卡莫的形象是小说家的

虚构。”

卡莫出身于工人，理论上并不很强（顺便说一句，他对这一点总是感到苦恼的），但却是一位自发的、天生的、坚定的革命者，他始终不渝、忠心耿耿地履行自己的党员义务。正如了解他的人们都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对他来说，革命工作就如“空气和粮食”一样不可缺少。

卡莫无比勇敢。勒·克拉辛说得非常对：“有时，人们会觉得，他被成功惯坏了，有些恶作剧，有些胡闹。但他所以这样，并不是出于年轻人的轻率，并不是出于浪漫主义情趣，也不是为了吹牛，而是有别的根源。他搞恶作剧时搞得很认真，但同时象是在梦中一样，不考虑客观现实……”

可以举出许许多多卡莫近乎卤莽的勇敢行为的例子，但看来最令人惊叹的功勋还是他装疯的事：当他受党的委派在柏林工作期间，他被威廉二世政府交给了沙皇宪兵，并被沙皇宪兵带上镣铐关入了梯弗里斯精神病院。在将近三年的时间内，他完全靠着自己的想象力伪装失去了理智。居然蒙蔽了最有经验的精神病医生，骗过了所有的看守人员，最后到底逃出了医院。

阿·马·高尔基对他 1920 年见到的卡莫作了非常逼真的描写：“他结实有力，有一张典型的高加索人面孔。一双温和的、乌黑的眼睛，目光善良、十分机灵而又严厉。他穿一身红军战士的制服……”

我很快便发现，详细询问他革命工作已使他厌倦，他

完全被别的事情吸引住了。原来，他在准备进军事学院学习……

简直不能相信，我所知道的那个神话般勇猛的卡莫，那个有着超人的意志、惊人的自制力的卡莫同我面前那个坐在堆满教科书的桌子前的卡莫会是一个人。

真是不可思议，经过那么长期的紧张的斗争，他却仍然是一个那么单纯可爱的同志。依然保留着青春活力，依然朝气蓬勃。

卡莫在内心还没有结束自己的青年时代，他象一个小伙子一样浪漫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女人……他以一种只有健康、强壮、纯洁的青年才会具有的那种抒情诗般的热情谈论自己的爱情……

他在谈到他必须到国外去工作时，就象谈论自己对女人的爱情一样，感情同样是那样的强烈。

‘我请求列宁说：“让我去吧，我在国外将会是一个有用处的人。”

‘列宁说：“不行，你去学习！”你看，有什么办法？他知道我该干什么。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笑起来象孩子一样。你听到过伊里奇是怎样笑的吗？’

卡莫爽朗地微笑了，但马上脸色又变得阴沉了。抱怨军事科学太难懂了……

他的美与众不同，是一种特别的、不是一眼就能发现的美丽……”

高尔基继续写道：“我觉得卡莫是那种认为未来比现

在更现实的革命者之一。但这绝不是说他们是一些幻想家，不！这是说，他们的洋溢着阶级的革命热情的力量是那样协调一致，那样牢固有力地凝聚在一起。这种力量培育着理智，是理智生长的土壤，而且仿佛是理智的先行。

除去革命工作以外，他们的阶级所生活的整个现实，在他们看来就如同恶梦一样。而他们自己所生活的客观现实——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未来。”

请原谅我抄录了这样长的引文。但我认为阿列克塞·马克西莫维奇在这里已经非常准确地刻画出了卡莫的形象。不能比他说得更好了。

那时，在我们会面的时候，卡莫对我们如何在穆干建立起了苏维埃共和国很感兴趣。他总是怀疑地说：“你们怎么能相信所有这些同志呢？要知道他们处在白匪的包围之中。他们可能叛变，可能是叛徒，可能贪生怕死！”

他在一次谈话中甚至对我说：“我留在这儿，不跟谢尔戈一块走，你同意吗？请派我到连科兰去考验那里的领导干部。”他提出了这样的计划：他以我们的特派员的身分与几个同志到连科兰去，化装成白匪，然后夜里突然把连科兰的领导同志抓起来，假装要把他们带去枪毙。这时，其中谁要是害怕起来，开始求饶或者出卖同志，他就把他们枪毙掉，而把那些表现得很坚定的同志留下来。卡莫说，到那时，就可以绝对相信经过这次考验的人是决

不会使我们上当的了。

我虽然断然拒绝了这种考验人的“方式”，但不想去和他争论。我对他说：“所有这些同志我都非常了解。我们完全相信他们。况且，他们已经在不少场合表现出自己是有战斗性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何况采取这种考验方式是没有必要的，会使我们的同志感到是侮辱。”

卡莫显然由于未能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感到失望和遗憾。记得卡莫那时给我讲了很多他打算向列宁提出的计划。他希望自己有一支队伍去邓尼金后方进行破坏活动。这项“行动”计划他已经准备好了。卡莫谈到这个问题时对我说：“我到莫斯科去是为了取得支持和良好的祝愿。”

尽管那次我没有采纳他的计划，但我们仍然是好朋友。说实在的，卡莫当时没有和我过多地争论。他深信自己的建议是正确的，而我也说服不了他。当时他为我理解他，也未采纳他的建议而感到十分难过。

后来，莫斯科同意他组织一支队伍去干掉邓尼金和他的司令部，他挑选了他所需要的人，为了考验所有这些人，那时他便对他们采用了我曾经拒绝过的那个“方法”。

由卡莫最了解的人组成了一个特别小组，他们换上白匪官兵的衣服，在森林某处正在进行训练的卡莫的队伍突然遭到袭击。这个队伍的战士被解除了武装，并让他们站成一排，说是要枪毙他们当中的共产党员，并宣

布凡是“悔过”或声明自己是共产党的敌人，都予以宽大。

然而队伍中并没有发现怕死鬼。只有一个人声明他是皮尔苏茨基的奸细并拆开军服上衣衬里，从里面掏出了相应的证件。

卡莫非常满意自己用这种办法发现了一个叛徒。卡莫说明了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和其余的人象真正的朋友一样拥抱起来。可是整个这次“行动”使他们当中一个同志在精神上受了严重刺激，以致患了重病。这人就是杰出的布尔什维克谢尔盖·阿利卢也夫的儿子——费多尔·阿利卢也夫。

当列宁得知用这种“方法”考验人之后，非常生卡莫的气。

1919年9月底我们收到了谢·米·基洛夫的密码信，他通知我们说卡莫同志要到我们这里来。后来我们才知道卡莫是为了炸毁邓尼金司令部而来的。我们的任务是在最近两周之内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保证安全地迎接他们。记得当时这个通知使我们非常高兴，我们立刻着手准备。结果我们发现所有以前采用过的方法和手段都不适合接待这样多的人，特别是这样大量的炸药。

边区党委会委员，工人奇卡列夫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奇卡列夫和多夫拉托夫一起在我们这里负责这类工作。他和渔民联系很广。他的方案如下：在巴库以南四十俄

里的地方有个名叫布洛的小岛，那儿没有人住，只有渔民偶尔在那里捕鱼。奇卡列夫将找一只小船到这个岛附近捕鱼，这个岛就作为卡莫他们登陆的地点。然后让卡莫的人化装成渔民，把他们分批送上岸去，而把炸药先藏在岛上，以后再一部分一部分地运到巴库去。

我们向阿斯特拉罕汇报了这个方案。

但是卡莫迟迟未到。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十分焦急不安。一直到10月份，我到阿斯特拉罕去时，才知道他们耽搁的原因。当时我写信告诉了巴库的同志们：“卡莫他们由于马蒙托夫的袭击而耽搁了。但有消息说他们已经从莫斯科出发。应该等着他们。”

很快就在这个岛上接到了卡莫的小队，并顺利地把他们送到了巴库。可是炸药却落到了警察手里。我们的同志通过与警方有联系的可靠的人，终于保住了炸药，而且全部搞了回来。

统一战线的策略

苏维埃第一任驻波斯大使；我们购买武器；连科兰的失陷；南高加索各种力量的分布情况；在工人集会上；我们的秘密住宅；英勇就义；萨纳英之行；两次企图逮捕；和孟什维克在梯弗里斯的论战；革命的达格斯坦。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我不能不谈谈伊万·科洛米采

夫。1919年4月份他好不容易从波斯经过连科兰来到了我们巴库，在巴库党委会出现。我们就是在这里认识的。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人，是个无限忠于革命事业的英勇无畏的战士，当时他和我们一样年轻。

二月革命后科洛米采夫成了准尉，然后被派到波斯巴拉托夫将军的部队里，任克尔曼沙反间谍机关的领导人。随着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在士兵群众中不断加强，科洛米采夫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变化。他站到布尔什维克方面来了。他被选为1917年12月份在梯弗里斯召开的高加索军队第二次边区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团。从1918年春天起他成了恩泽里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他奉斯捷潘·邵武勉之命领导了俄国军队和财产的撤出工作。

1918年夏天邵武勉派科洛米采夫率领苏维埃使团前往波斯。巴库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后，1918年11月白匪军官捣毁了在德黑兰的苏维埃使馆。科洛米采夫只是在当地倾向进步的波斯居民的协助下才侥幸脱险。

他向我们详细汇报了德黑兰、波斯北部和连科兰的局势。

他急着要到莫斯科去，我们用小船顺利地把他送到了阿斯特拉罕。

6月份我们收到了科洛米采夫的两封来信。信中说我们请求的事他已经办到了，并且已托卡涅弗斯基和斯塔罗茹克经过穆干把钱带来。他写道，这笔钱主要是作

为在穆干建立军队和巴库委员会购买武器用的。他还告诉我们说，阿斯特拉罕没有阿塞拜疆文的书籍，他答应带来几个同志以便在穆斯林中开展工作。

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从他的信中得知，在和阿斯特拉罕党的领导人谈话后，他确信：“阿塞拜疆的问题将象你们过去解决的那样去解决，而不是按梯弗里斯的意见去解决。”

当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已和白匪紧密勾结起来，更加猖狂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科洛米采夫在了解阿斯特拉罕的政治局势和跟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斗争进程之后，建议我们改变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策略。“在巴库也不必对他们讲客气。我认为应该直截了当地向他们提出问题来，要么无条件地完全站到我们一边来，要么明确地反对我们……我觉得你们对丘拉耶夫也用不着客气。他要么转到我们这边来，要么就滚蛋！”

以上这些我不是不加思索地随便写的，而是长时间认真研究了中央政策之后才写的。因为中央的政策在阿斯特拉罕这里也不断地锤炼。你们的政策不应该背离中央的政策，所以我才提出上述建议……我确信你们在孤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方面缺乏坚定性和彻底性，你们还给他们某些职位，有时还让出阵地。”

我们在边区委员会巴库局和巴库党委会联席会议上详细地讨论了科洛米采夫的信和他对我们政策的批评意

见。我们没有同意他对问题的这种提法。

问题在于科洛米采夫没有考虑到俄罗斯和巴库处于不同的斗争阶段，他想把适用于苏维埃阿斯特拉罕的斗争方式机械地搬到情况截然不同的巴库来。我们认为自己的政策是正确的，并且已经完全被现实生活所证实，因此我们决定对于自己在这方面的立场不作任何修正。

科洛米采夫在谈到阿斯特拉罕的工作情况时写道，那里“全部庞大的工作都落在三、五个人的身上，毫无疑问，他们是非常有头脑和无限忠诚的……阿斯特拉罕本身的局势也不够稳定。在阿斯特拉罕工人群众中有一群坏蛋正在利用粮食不足这个问题来动摇政权……。”

科洛米采夫知道我们希望通航后红色舰队能到里海来，并在武装斗争中给予我们重大的支援，但他写道，舰队“大概要在察里津停留很久”。关于从阿斯特拉罕得到军事援助的前景的答复特别使我们伤心。他写道：“……在短时期内你们不要期望得到军事援助了，必需坚定地执行完全靠自己力量的方针。”科洛米采夫谈到我们最近的任务时写道：“最主要的任务是侦察敌军的力量，把敌军的人数、装备、特别是敌舰这方面的最详细情报送到阿斯特拉罕来……”接着他指出，我们应当收购武器：“只要在巴库(省里)和跟穆干接壤的波斯地区可以买到的武器都买。”

还在收到他这封信之前我们已开始巴库购买武器了。这件事仍然由我们党内的“商人”多夫拉托夫主管。

他挑选了一些合适的人员在城里特意为英国士兵开了一个饭馆。他利用因长途行军而疲惫不堪的英国士兵的弱点，首先是他们爱喝酒这一点，他把自己饭馆的工作安排得使他的顾客经常在付账时钱不够，这时他很乐意收下武器来顶账。饭馆显然很适合英国士兵的口味，一直生意兴隆，多夫拉托夫每天都得到大量付酒账的武器。

至于在穆干收购武器的事，则专有一部分地方同志在办理。我们收到一大笔款子后，就指示他们更多地购买武器。

* * *

6月里，穆干的军事形势变得极其困难了。这时，一帮帮的波斯土匪、被赶出连科兰的军官和富农们组成的白匪军和木沙瓦特匪徒对苏维埃政权发动了猖狂的军事进攻。穆干到处同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进行着激烈的战斗。穆干的红军部队撤退了。

6月底，形势万分紧急。白军攻入了连科兰，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奥特拉德涅夫在一次巷战中受了致命伤，几小时以后就在医院里死去了。革命的忠实儿子的生命停止了。但是苏维埃部队终于迫使敌人后退，守住了城市。由于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溃的敌人很快重新集结了兵力，7月下半月又发生了新的激烈的战斗。

7月初，我们从阿斯特拉罕获悉，红军一支区舰队在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堡（现称舍甫琴柯堡）附近，在同占优势的英国和邓尼金舰队的作战中遭到失败：红军的军舰

一部分被击沉，一部分被击毁，剩下的返回了伏尔加河河口。这样一来，红军的陆、海军这一年从北方到我们这里来的希望就完全破灭了。

我们讨论了当时的形势，首先是穆干的形势。

我们决定通知穆干的同志们，要他们在不得已的时候用他们现有的船只和渔船撤出穆干，首先让那些一旦被俘有生命危险的人离开。我们还建议把他们全部送到阿斯特拉罕或里海土尔克斯坦沿岸，到那里去与红军会合。那里的红军当时已占领了阿什哈巴德并向克拉斯诺沃斯克推进。由于我们考虑到同巴库和阿斯特拉罕难于保持及时的联系，因此，我们建议连科兰的同志们根据实际情况自己作出最后的决定。

后来我们知道，科洛米采夫当时在莫斯科被任命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驻波斯全权代表。他带领着一批工作人员乘摩托快艇从阿斯特拉罕直达连科兰，在那里与波斯的领事取得了联系，还办妥了到德黑兰去的一切手续。他肩负的责任要求他尽快地到达目的地。

但是，连科兰的局势更趋紧张了，使科洛米采夫未能走成。不知是他出不了城还是不愿丢下处于困境中的同志们不管，总之，他留在了连科兰，担负起领导同白匪军的斗争并奋不顾身地战斗到最后一天。

由于双方力量悬殊，反革命匪帮很快就占领了连科兰。剩下的红军士兵们试图乘渔船和划艇转移到里海的

土库曼沿岸。但是，英国和邓尼金的军舰在海上截住了他们的一部分并迫使他们驶向彼得罗夫斯克。科洛米采夫、坎杰拉基和我们另外的一些领导同志虽然上了岸，但仍被白匪抓住杀害了。

科洛米采夫——第一个苏维埃俄国驻波斯的全权代表——在波斯的本杰格里亚齐城附近被白匪军枪杀了。他是第一个为苏维埃政权献出了自己生命的苏维埃外交官。

在彼得罗夫斯克也有许多从穆干来的共产党员遭到枪杀。只有两小批连科兰的共产党员脱险了：一批是奥托·里达克带领的，他们穿过土库曼沙漠到了已恢复苏维埃政权的基孜耳-阿尔瓦特城；另一批是巴赫拉姆·阿加耶夫带领的，他们在阿塞拜疆当地农民的帮助下从陆路到了巴库。

穆干苏维埃共和国的史诗就这样悲壮地结束了。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和阿斯特拉罕同志们的设想（我们从谢·米·基洛夫同志的信中得知的），这个共和国本来应成为红军部队登陆和为建立苏维埃南高加索而进一步开展斗争的根据地的。

穆干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反革命的变化。

* * *

苏维埃俄罗斯在南方战线的形势变得越来越困难了。邓尼金借助英法联盟军的援助，大大加强了自己

的军队，并且迅速向北方推进；他们威胁着顿巴斯，企图直取莫斯科。

我国东方战线上则是另外一种形势：在那里，我军同高尔察克匪军的战斗进展顺利，土尔克斯坦的红军已转入进攻，击退了“里海以东地区政府”的反革命队伍，而且已经兵临克拉斯诺沃斯克城下。里海以东地区的全部解放指日可待。这种形势当然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尽管我们知道，由于当时英国和邓尼金的军舰封锁了里海沿岸，我们不能指望红军的实际援助。

我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考虑到首先是在连科兰失败的教训，因此决定不再组织新的起义中心，而是对以达格斯坦和切禅两地为主的几个现有的起义中心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因此，这些地方的起义，邓尼金一直未能镇压下去。起义者在赞格祖尔，卡腊巴赫以及阿塞拜疆的哈萨克县坚持了很久。在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下，在这些地区的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农民齐心协力，共同行动。

当时我们面临着极其复杂的任务。

首先，必须不让阿塞拜疆的工人阶级采取分散的、为时过早的政治行动，而应当积蓄力量，从组织上巩固党和我们的地下武装组织。在邓尼金战线的局势转变到有利于红军以前，应暂时放弃公开的武装发动。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援助。为此，我们组织了往阿斯特拉罕增援汽油的工作。另外，我们

还在邓尼金占领区建立了情报网，在那里组织收集重要的军事情报，并由我们的情报人员经常穿过前线送交红军指挥部。

第三，我们同邓尼金占领下的许多城市的党组织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并动员他们在白匪军后方组织破坏活动。

第四，我们还做到如下一点：使达格斯坦和切禅的山区游击队用相当强大的兵力对他们附近的邓尼金匪军后方进行更为频繁的袭击。

6月底，鲍里斯·舍鲍尔达耶夫完全出乎意料地来到了巴库。在巴库公社时期，他是海军事务人民委员会的副委员。事情是这样的：1918年，我们的军队从巴库往阿斯特拉罕撤退的时候——当时我们的轮船被迫停在日洛伊岛（关于这事，我在前面已经叙述过）——舍鲍尔达耶夫和两个同志设法上了岸，他们弄到一只渔船，坐着这只小船历尽千辛万苦，勉强活着到了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堡。他又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堡乘小船驶往阿斯特拉罕，然后被派到基兹利亚尔地区，以潜入达格斯坦，与当地起义者取得联系。舍鲍尔达耶夫非常机智，善于随机应变，因而出色地完成了交给他的这项任务。他在达格斯坦州党委会工作了一个时期，又从那里来到了我们巴库。

我们为自己的队伍增添了新的力量而感到高兴。舍鲍尔达耶夫年龄比我们大一些，同时他又有相当丰富的

军事经验。他恰恰在我们需要组织军事侦察的时候来到我们这里，来得真是太凑巧了。

边区党委会决定委派舍鲍尔达耶夫领导我们的情报工作。我们对该工作组织方面的问题作了深入细致的考虑。我们把邓尼金的后方——整个北高加索——分成了罗斯托夫、克拉斯诺达尔、阿尔马维尔、格罗兹尼等几个区，决定在每个区配备一个主要负责人，带领一个情报小组，保证情报人员都有必要的密码和通讯器材。舍鲍尔达耶夫任情报工作总部负责人，他有权亲自挑选需用人员。

当时英国人统治下的恩泽里和波斯境内的其他几个地点的情报网，也由舍鲍尔达耶夫情报总部领导。从南高加索地方党组织那里得来的军事情报，凡对红军指挥部有参考价值的，一律送往舍鲍尔达耶夫总部。

* * *

由于邓尼金的胜利，我们面前出现了一系列策略问题。邓尼金反动势力不仅威胁着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而且也威胁着南高加索几个民族共和国的生存。孟什维克由于仇视布尔什维克，对邓尼金的胜利反而感到高兴。但是邓尼金完全胜利也不会使孟什维克满意的。因为如果白匪军一旦得逞，未必会对他们客气。在一些执政党的报刊上和政府某些代表的讲话中，都反映出阿塞拜疆的资产阶级政府也同样感到惶惶不安。应该指出，邓尼金匪徒越是取得胜利，他们对待这个滑稽可笑的政府越

肆无忌惮。

对邓尼金军队的胜利最感到焦虑不安的，是南高加索的劳动群众。邓尼金的威胁不仅使拥护苏维埃政权的先进的工农发生波动，而且也使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南高加索部分居民产生波动，因为后者看到，邓尼金的胜利是对本民族所取得的成果的威胁。由于当时同邓尼金作斗争的，只有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俄罗斯，所以，对布尔什维克的不信任也就逐渐地由某种程度的同情所代替。

好象是在7月初，孟什维克政府的首脑格格奇科里，在梯弗里斯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中抛出了一句漂亮话，说什么他们孟什维克也愿意同“邓尼金将军的反革命势力”进行斗争，还说什么，“在此问题上不妨联合一切民主力量。”

我们当然十分清楚，格格奇科里并不打算同布尔什维克真正联合起来，也不打算与邓尼金危险作真正的斗争。他只想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在革命群众中取得威望。同时他还想给英军司令部及邓尼金本人造成一种印象，仿佛是在警告邓尼金，如果他进攻格鲁吉亚，全体人民毫无例外地都将一致起来反抗他。继孟什维克之后，木沙瓦特派的领导人也作了类似的发言。

接着，边区委员会巴库局和巴库党委会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向孟什维克和木沙瓦特派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一切民主、民族力量的统一战线，去和邓尼金匪徒作斗争。

梯弗里斯边区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同意了这项决议。根据上述决议，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向梯弗里斯工人代表苏维埃建议建立高加索劳动人民统一战线，以便同反革命进行斗争。

我们布尔什维克当时公开声明，我们不支持南高加索几个共和国现政府的政策，但与此同时我们准备支持个别政党、团体、甚至政府反对邓尼金的任何现实的斗争，为此我们建议召开南高加索工人代表大会，以便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及建立一个组织，去从事实上动员劳动者的力量与邓尼金进行斗争。同时我们说明，我们准备为此而动员巴库工人，把他们及整个我们的党组织武装起来——哪怕编制在资产阶级政府的武装力量中也行。

果戈别里泽根据我们的委托在工人代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建议，并说明了理由。这个建议被一致热情地通过。向梯弗里斯苏维埃拍发了相应的电报。

很快就从梯弗里斯收到了复电，说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并请求准许梯弗里斯苏维埃的代表到巴库来参加工人代表会议，以便了解和预先讨论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问题。他们这方面则又邀请我们巴库工人代表会议的代表去梯弗里斯商谈。

当时从梯弗里斯派到我们这里来的是格拉西姆·马哈拉泽、乌鲁沙泽，另一个人的姓名我记不得了。

我们知道，整个工人代表会议是拥护我们的，孟什

维克在会上发言搞不出什么名堂。我们担心的倒是另一种情况，担心工人们会打断他们的发言，从而在会场上引起双方关系不必要的紧张，这就会被孟什维克当作借口，中断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谈判。所以，我们会前就告诉我们的全体同志，要耐心听孟什维克的发言，并且让他们把话说完。

我们懂得，顺利实现统一战线的策略，还可以使我们接近南高加索其他几个共和国的无产阶级队伍。统一战线策略必定合乎工人的心意，它将提高我们党的威信，促进南高加索一切劳动群众的力量联合起来和邓尼金匪徒进行斗争，归根结底，这将是对同反革命势力进行艰苦斗争的全俄无产阶级的重大支持。我们明白了这一切，便决定在这个时期集中宣传南高加索无产阶级队伍的共同的主要任务——即反对邓尼金反革命危险的斗争，而不宣传那些造成他们分裂的分歧意见。

代表共产党人正式发言的人是菲利普·马哈拉泽（那个时期他在巴库），当时他是使用化名在工人代表会议上讲演的，虽然我们预先提醒他要克制，但他仍然没能掌握住分寸，他作了一个措词十分强硬的发言。从他的发言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看来我们同孟什维克再也没有可谈的了。

但是，会议的整个进程并没有让孟什维克找到破坏谈判的借口。工人们平心静气地听完了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代表的发言后，一致通过了共产党人提出的决议。

当时孟什维克代表团要求工人代表会议允许他们在一次工人群众大会上讲演，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请求。我还记得，在巴拉汉内开了一次工人群众大会，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在会上发了言。我们决定巴库党委会不推选正式发言人参加会议，而让工人们自己去同孟什维克辩论。结果工人们干得很出色。孟什维克的代表们灰溜溜地离开了巴库，因为他们没有料到工人群众同共产党人这样完全一致。孟什维克亲眼看到了他们在阿塞拜疆工人中间确实不可能取得成效，他们进而担心我们会成为格鲁吉亚工人阶级的“传染病”。

我们在制订统一战线的政策时，估计到可能有几种前途：如果孟什维克破坏了这一政策，我们实际上什么也不会失去，而只会在群众中进一步提高我们的威信；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希望南高加索工人代表会议能够开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事实本身对我们来说就将是一大胜利，因为在这次大会上毫无疑问我们将是多数，阿塞拜疆的工人阶级、亚美尼亚的铁路工人和达格斯坦的代表以及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工人都会跟我们。走的我们知道，如果这次工人代表大会能把同邓尼金的斗争变成现实的话，即使我们加入民族军队，我们的收获也会是很多的。

梯弗里斯苏维埃代表团离开巴库后，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代表团动身前往梯弗里斯。代表团的成员只有斯图鲁阿、古巴诺夫和我。

在我们同梯弗里斯苏维埃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谈判

开始之前，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对当地的共产党人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其中许多共产党员被关进了监狱，暂时还没有被捕的人也秘密地进行工作，因为没有任何进行公开活动的可能性。当统一战线问题的谈判开始后，孟什维克就停止了逮捕，甚至允许共产党人出版自己合法的报纸。

在梯弗里斯，我们立即同边区党委会取得联系，并同他们一起讨论了建立统一战线的前途。当时，许多梯弗里斯的同志抱悲观态度，菲利普·马哈拉泽和其他一些同志干脆说孟什维克“耍外交手腕”，根本不会同邓尼金进行任何斗争，当然也不会允许召开南高加索工人代表大会。他们还说比我们更了解“自己的”孟什维克。但是，我们以孟什维克原则上已经同意建立统一战线为理由，仍然决定贯彻自己的方针。

我们代表团在高加索沙皇总督的旧官邸里受到接见，当时这里是格鲁吉亚政府和梯弗里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所在地。接见我们的是格拉西姆·马哈拉泽，他在这以前去过巴库。他表面上很有礼貌，说话也心平气和。但是我们想从他嘴里弄清楚梯弗里斯苏维埃是否同意召开南高加索工人代表大会的一切尝试都毫无结果。马哈拉泽想尽办法避免直接回答问题，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当他实在无法敷衍下去时，他就抬出了什么“这个问题梯弗里斯执行委员会会有两种相反的意见，只有全体苏维埃才能最后决定这个问题”。而梯弗里斯苏维埃主

席就是他格拉西姆·马哈拉泽本人。

答应召开梯弗里斯苏维埃会议使我们非常满意，因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在广大工人听众面前发言的讲台。

这次会面之后，我们给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拍发了一份电报，电报说：“梯弗里斯执行委员会执行局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另一派反对，现在还没作出任何决定。最近几天要召开苏维埃会议，参加过巴库工人代表会议的梯弗里斯的代表——他们是组织委员会的成员——反对召开代表大会，结果如何，要看苏维埃会议。”

地方党报的定期出版和我们公开来到梯弗里斯使格鲁吉亚共产党人的活动明显地活跃起来，他们在梯弗里斯工人中的影响增强了。我们巴库代表既然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权，所以我们就决定把梯弗里斯苏维埃召开之前这段时间排满公开的演讲。我们参加了药房职工工会大会和皮革工人协会大会。这些工会的理事会里有很多共产党员。斯图鲁阿和我在会上作了巴库工人运动的成绩、统一战线在反对邓尼金威胁斗争中的任务等报告。我们号召梯弗里斯的工人在俄国革命和南高加索人民的严重危急关头和巴库人站到一起。

可以说，在所有会议上工人们都很欢迎我们，十分注意听我们的讲演，并一致通过了我们提出的各项决议。

这是一份保留下来的药房职工工会大会通过的决议：

“要求格鲁吉亚政府：

一、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立即向沙皇将军邓尼金匪帮及其帮凶宣战，直至彻底消灭他们；

二、停止同邓尼金的代表进行任何谈判——因为任何拖延都会加强前线 and 这里(后方)的反革命分子的力量；

三、为了斗争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工农统一战线。为此，必须立即改选工农兵代表苏维埃——其代表按比例的原则选举产生——和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是唯一能够把革命的民主力量团结在自己周围，并能采取具体措施来统一南高加索全体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

在人民宫我们举行了题为《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与南高加索各政府》的报告会，孟什维克没有推出正式发言人出席这次大会，与会者对我们的报告表现了很大的热情。会场情绪高涨，因为他们很久没有听到布尔什维克这样公开的演讲了。

而这时，孟什维克正在拖延召开梯弗里斯苏维埃会议。看来，他们在商量如何破坏这次会议对他们更为有利：既能把一切罪责推在我们身上，又能把他们自己洗刷得一干二净。边区党委会已获悉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破坏建立统一战线的决议。

但是，过了一周梯弗里斯苏维埃会议还是召开了。孟什维克方面推出了三名发言人：格拉西姆·马哈拉泽、朱格里和阿尔谢尼泽。

这几个发言人诬蔑布尔什维克提出统一战线的建议

是虚伪的，并造谣说布尔什维克俄国正在枪杀工农、迫害革命民主力量等等。

朱格里在这方面特别放肆。

我想离开一下正题，简单谈谈朱格里这个人。我是在1917年3月份同他认识的，当时他还是布尔什维克，我们两个在梯弗里斯党委会领导下的一个宣传组工作，我甚至两次同他一起在工人集会上发言。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其中的一次是在阿杰利哈诺夫皮鞋工厂的工人大会上。由于这个厂许多工人是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朱格里就用格鲁吉亚语发言，我就用亚美尼亚语发言。当时我很欣赏他的发言，而且一般说来，那时他给我们大家的印象还是不错的。但是，他本质上是一个名利欲熏心的家伙，所以终于背叛了布尔什维克。在梯弗里斯统一的党组织发生分裂的时候，他转向了孟什维克，从而保住了他在所谓“人民近卫军”——孟什维克的武装支柱——的领导职位；实际上不过是一支常见的讨伐队，他们不止一次参加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总之，朱格里是一个十足的叛徒。

格拉西姆·马哈拉泽与朱格里不同，他在梯弗里斯苏维埃会议上表现得更滑头，他狡猾地回避了粗暴的攻击。总的说来，在他们中间阿尔谢尼泽的发言比较文明。他的发言中没有挑衅性的声明，没有卑鄙的攻击，而是直截了当地坦率地宣称：我们是分道扬镳的，并且永远也走不到一起。

我还记得，当时孟什维克大演丑剧，他们又放了两个代表上台发言。第一个是有名的孟什维克右派、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俄国革命的逃兵——沃伊京斯基，他极力吹嘘格鲁吉亚的民主，为其大唱赞歌。其后发言的是原巴库孟什维克著名的头头之一、极端反共分子埃奥洛。他双手沾满了二十六名巴库委员的鲜血，我个人很了解他，恨透了他。他政治上早已声名狼藉，当时他从巴库溜走了，在梯弗里斯孟什维克那里找到了栖身之处，现在居然又摆出巴库无产阶级“专家”的面孔来发言了。

应该说明，梯弗里斯苏维埃已经一年多没改选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退出了苏维埃以示抗议，而补进苏维埃的全是些孟什维克的官员。我记得，大厅里大多数是带着帽徽和肩章的所谓“工人代表”，会场上的听众基本上是当官的。这里的听众同巴库工人代表会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简直使我们感到吃惊。大厅里工人很少。可是在楼上，尽管孟什维克进行了“过滤”，还是挤进了相当多的工人，其中还有共产党员。因此，如果说楼下大厅里的人是充满了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的话，那么楼上几乎全部都是拥护我们的人。只要楼下大厅一鼓掌，楼上就用口哨、喧哗声压倒楼下的掌声；而当楼上一鼓掌时，楼下也是吹口哨、叫喊。

我是第一个发言的巴库代表，本来我想平心静气、不带任何个人攻击地阐明我们的立场，并针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们的发言一一加以驳斥。但是埃奥洛的发言使

我失去了镇静，我决定不跟他辩论，只用一句尖刻的话回敬他。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讲：“在我回答前面发表的反对统一战线的意见和阐明我们的立场之前，我必须声明：我认为回答卑鄙齷齪的挑拨者埃奥洛这个早已被巴库无产阶级抛出革命航船的恶棍的下流发言有损于我的尊严。”

我刚讲完这句话，大厅里马上传来了难以想象的喧哗声，而楼上却响起了掌声和赞同的呼声。大厅前几排有几个人从座位上站起来，叫喊着“挑拨者！”、“骗子！”、“狠狠地揍他！”、“打死他！”向我扑来——有的挥舞着拳头，有的甚至还掏出了手枪，会场上一片混乱！

于是主席团的成员决定叫自己那些大吵大闹得太过分的党内同僚们安静下来。还是那个朱格里，以主席团的名义宣布，虽然“米高扬讲的完全是造谣和诬蔑”，仍然应该让我把话讲完。“然后我们再针对他们所有‘诽谤性的指责’进行回击。”

这样，会场上才平静了一些。

我也就开始用比较平静的语气逐一驳斥在我之前的孟什维克发言人的种种论据，指出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党和对苏维埃俄罗斯的攻击，同时努力使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一点上：邓尼金的危险现在不仅威胁着苏维埃俄罗斯，而且也威胁着南高加索各族人民。我说，虽然邓尼金现在不断取得胜利，但这是暂时的，他不可避免地将在俄罗斯南部遭到惨败，正象高尔察克在东部遭到惨败

一样，虽然高尔察克在失败前占领了整个西伯利亚、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一部分。我斥责孟什维克的头目们耍两面派的罪恶行径，证据是：他们一方面跟巴库工人代表谈判建立反对邓尼金危险的统一战线，同时又同邓尼金的代表在梯弗里斯进行秘密谈判。

当时大厅里，说得缓和一点，是不安静的。从前几排继续不断地传来恶狠狠的反驳声和喊叫声，而楼上还是象以前一样地鼓掌。但是，尽管这么嘈杂，我还是讲完了我要讲的一切。

下一个代表我们发言的是格奥尔基·斯图鲁阿。他的发言内容充实，语气平静，再一次激起了楼上的掌声和楼下大厅里敌对的叫喊声，因为他也揭露了孟什维克的背叛政策。

在他发言时，我懊悔地想：我怎么会上埃奥洛挑衅的当呢，由于我的急躁，让孟什维克在我们发言的刚一开头就找到了借口制造混乱！

原国家杜马孟什维克党团成员阿尔沙克·祖拉鲍夫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沉重的印象。1917年祖拉鲍夫由孟什维克提名选进了立宪会议。他很擅长演讲，1917年5月2日我在巴库听过他的报告。当时他宣传一种“中间”立场：他没有完全为护国主义作辩解，同时又批评临时政府。我还知道再晚些时候，他仍然不完全同意孟什维克的政策，而参加了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小组。

他在这次苏维埃会议上发言时，讲得相当明确，拥护

同布尔什维克一道与反革命白匪进行斗争的政策。应该说明，祖拉鲍夫的发言很有说服力——使人感到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有才干的演说家。他的话很容易使孟什维克派的工人理解。正因为如此，他的发言立刻就引起了主席团和部分会议参加者的敌视；会场上又嘈杂起来了，不仅大厅的前几排而且主席团里也凶狠地叫喊起来了。记得朱格里就骂了祖拉鲍夫一句“政治变色龙！”。祖拉鲍夫的“叛变行为”使孟什维克狂怒起来，他们站在座位上高喊“你滚吧，格鲁吉亚没你的位子，滚回达什纳克党的亚美尼亚去吧！”

从祖拉鲍夫面部表情就可以看出他的可怜而又悲惨的处境：因为落在他身上的辱骂正是出自昨天还是他的党内同志之口，这显然刺痛了他的心。说良心话，我可怜这个以前犯过错误、经常动摇而现在受压、众叛亲离的人。

朱格里第二次简短的发言是反驳我关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同邓尼金的代表在进行秘密谈判的说法。他说：“我们没有同邓尼金进行这样的谈判。——我们是同英军司令部在进行谈判。”他的这一“反驳”倒很象对我们所掌握的情报的证实，这就是说我们原来的推断是合乎逻辑的，他们通过英国人作为中间人的确在同邓尼金的代表进行着谈判，并且看来他们已经取得了某些成果，否则他们为什么要突然中断同我们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谈判呢？可以看出，他们跟我们

玩弄的这一整套“谈判把戏”的目的只是吓唬英军司令部和邓尼金的代表，正如常言所说的，为的是抬高自己的卖身价。

过了一些时候，所有这些就更清楚了，我们了解到英军司令部想在南高加索各共和国加强自己的势力，并利用邓尼金依靠英国人的供给和政治上的支持这一弱点，在邓尼金统治区与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确定了一条所谓分界线。关于此事，档案中还保留着一份很有趣的英军司令部的通知，通知说：“已指示邓尼金将军不准其军队越过此线往南，而高加索人员不得越过此线向北推进。南高加索方面应放弃任何反对‘志愿队’的侵略行动，并协助邓尼金将军，至少应保证供应其里海舰队石油和其他军需品。同时不得供应布尔什维克方面上述物资。”

这个通知是由驻南高加索英军司令Г·Н·科里少将签署的。

在梯弗里斯苏维埃会议快结束时，孟什维克提出了自己的决议，并以大多数票通过。

这样，真相已经大白。还在会议结束之前，我们已商量好在梯弗里斯继续留下来在工人中间做几次公开讲演，直到孟什维克不允许时为止。这个问题我们和边区党委会的同志们商量过，他们支持我们的意见。我们决定以巴库工人代表的身分在几个大会上讲演。地方同志们认为，这样的讲演能在工人中产生很大的影响。

第一次集会决定在梯弗里斯铁路联合总厂举行。我记得这个工厂约有三、四千工人。当时孟什维克把持着工会的领导，当然我们根本没想让工会委员会来帮助组织这个集会。他们干脆就不会让我们进厂。

梯弗里斯党委会通过铁路工会理事会理事阿巴基泽同志——我们的同志——起了作用。我们同他约好，下班前五分钟在所有车间宣布召开群众大会，让工人们机车车间集合。事情果然成功了。我们集合了约一千人。工会委员会的委员们出来反对开会，说什么集会没准备好，什么预先没对任何人宣布过这件事，很多工人不在，所以集会必须推迟到明天举行，好把所有的工人集合起来等等。

在斯图鲁阿发言主张立即开会之后，工人们以压倒多数通过决定开会。

斯图鲁阿和我在大会上作了讲演。我们讲了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斗争，讲了邓尼金不仅是俄罗斯工人阶级的威胁而且也是南高加索工人阶级的威胁；揭露了孟什维克破坏建立统一战线和拒绝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政策。我们代表巴库无产阶级宣布，阿塞拜疆工人决心同我们的共同敌人邓尼金斗争到底。我说：“当我们最优秀的同志关在监狱里，昨天和前天又有成百的工人和革命者被捕的时候；当高加索工人的领袖、老革命家米哈·齐哈卡雅被投入库泰伊斯监狱的时候，邓尼金的将领们和军官们却公然在梯弗里斯的大街上大摇大摆地游逛，并

组织反革命匪帮反对俄罗斯工人。”全场爆发了愤怒的吼声，大家高呼：“孟什维克可耻，打倒他们！”“恢复我们齐哈卡雅的自由！”“统一的工人战线万岁！”——这就是大会的回答。

继我们之后，还有许多人上台发言。有工会的孟什维克、有铁路工人、有本地的共产党员。形势显然对我们有利。

的确，当大会到了投票表决的时候，绝大多数与会者通过了我们提出的决议，这个决议声讨了孟什维克，谴责了他们破坏统一战线、迫害革命者、包庇和援助邓尼金反革命势力的罪行。

大会刚一结束，我们就设法迅速地、悄悄地离开了工厂，免得落入赶来的警察的魔掌。我们及时躲开了。

我们在南高加索建立反对邓尼金匪帮的统一战线的尝试就这样结束了。以后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再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在格鲁吉亚地区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一直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由于亚美尼亚达什纳克政府当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持“中立”态度，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同他们谈判过。

阿塞拜疆的情况则是这样：当南高加索面临邓尼金进攻的直接危险时，木沙瓦特派也围绕这一问题而大造舆论，甚至开始了同邓尼金威胁作斗争的准备活动。我们巴库党委会的代表，同时还有“古墨特”和“阿达列特”的代表同木沙瓦特派会晤过好几次。起初会谈进行得还

不错。我们在工人区，尤其是在穆斯林工人中间进行了大量的动员工作。木沙瓦特分子企图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甚至准备组织工人大游行。这个问题在各党的联席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因为我们对游行示威缺乏准备，我们的同志便建议稍稍延期举行。木沙瓦特分子不赞成这个建议。

在我们中间也发生了争论。一些人提出不参加这个游行示威，要抵制它。另一些人虽然也承认我们准备得不好，但仍认为抵制这种游行示威是政治上的错误，应该积极地参加。

后一种观点被认为是正确的。虽然在这次游行中共产党的拥护者不多，但是我们的演说家卡拉耶夫、果戈别里泽和阿加耶夫在大会上，尤其是在穆斯林工人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表明，木沙瓦特派和格鲁吉亚孟什维克一样，他们并不准备同邓尼金斗争，而是侈谈斗争，以便提醒英军司令部保护他们免遭邓尼金的威胁。他们还想利用这类谈论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他们的党在工人中间的名声。但是恰恰第二个目的他们没能达到。

不久，同邓尼金打仗的事，他们甚至口头上也不谈论了。原来是这样，英军司令部通知了他们，说只要他们用石油和其它物资支援邓尼金，而不把石油卖给苏维埃俄国，邓尼金就不会入侵阿塞拜疆。这进一步在劳动人民面前暴露了木沙瓦特党的本来面目。至于俄国共产党(布)

巴库党组织、共产主义组织“古墨特”和“阿达列特”在穆斯林工人中的阵地则更加巩固了。

这样，虽然反对邓尼金统一战线的策略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为建立这个统一战线所作的斗争，无疑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 * *

在当时地下活动的条件下，那些从事秘密工作的、忠诚可靠的人们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些人的家里我们会面，通过他们我们相互联系，他们的住宅往往变成我们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战斗指挥部。

从1919年年初起，卡斯帕罗夫家就成了巴库布尔什维克地下工作者主要的秘密活动场所。它从未遭到破坏，直到1920年4月末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恢复的那一天，一直很好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这所住宅女主人的女儿玛丽娅·卡斯帕罗娃回忆说：

“我们住的那所三层楼房位于城市正中心的资产阶级区（在检疫所大街和克拉斯诺沃斯克大街的拐角处）。我们的住宅在三楼。在我们下边，在二楼，就住着房东本人阿达莫夫。这座楼里所有的住户都是些有钱的人。这一切对我们秘密工作的计划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的确很难相信：巴库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我那善良、聪明的母亲立刻就同意利用这所住宅进行革命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共产党领导人常在我们家进

行秘密会见和召开会议。经常到我们家来的有：谢·奥尔忠尼启泽、阿·米高扬、卡拉耶夫、菲利普·马哈拉泽、瓦诺和格奥尔基·斯图鲁阿、舍鲍尔达耶夫、马米亚·奥拉赫拉什维利、卡莫、加米德·苏尔塔诺夫、布尼阿特·扎杰、米尔札·达乌德·古谢伊诺夫、列万·里戈别里泽、萨尔基斯、格奥尔格·阿里哈尼扬、别索·洛米纳泽、伊塞·多夫拉托夫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里隐避了相当长的时间。1919年春天，就在这所住宅里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党高加索边区代表会议。

可是警察有一次还是闯进我们家来了。事情是这样的：有人从院子里警告说，警察正向我们这里走来。当时我们家的大人——祖母、妈妈、婶婶——和孩子们都在家。当警察推开餐室的门时，他们看到这样一副情景：祖母、妈妈、两个孩子：格拉奇娅和列瓦以及婶婶——一个年轻漂亮的妇女，安然地坐在饭桌旁。他们正喝着茶，吃着酸牛奶。看到这样一副和睦而悠闲的家庭生活景象，警察们甚至连门坎也没迈，就极力道歉，然后就溜走了。其实，经过里海从阿斯特拉罕给巴库党组织运来的金币和纸币正藏在隔壁的房间里，同时家里还藏着武器。”

卡斯帕罗夫一家是不寻常的。上了些年纪但还精力充沛的塔吉娅娜·卡斯帕罗娃是一位善良的母亲、热情好客的主妇。她一般是不参预政治性谈话的，但对革命事业却忠心耿耿。她清楚地知道布尔什维克使用她的住宅会使她和全家冒多么大的风险。但是我们从未发现她

对继续干这种十分冒险的事情产生过哪怕是丝毫的怀疑或动摇。她无所畏惧。我们总是感到她对我们是那样一贯地热情和关心。

她有五个孩子。三个大的已经参加了我们党的行列，并积极地给我们以帮助，特别是在建立秘密联络和安排会见方面。

她的大儿子万尼亚是一个年轻的医生。（后来当谢·米·基洛夫在列宁格勒时，万尼亚担任了列宁格勒省党委的组织部长。）女儿玛丽娅是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的事务秘书。二女儿罗莎是彼得堡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三女儿格拉奇娅那时还是一个中学生，后来她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他们的小弟弟列瓦当时还完全是个小孩子，后来也成了一个共产党员。

关于罗莎，我想专门讲一讲。1917年春天，她从彼得堡回到巴库。在巴库，她参加了所有的布尔什维克举行的集会和演讲，经常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在十月革命前，1917年8月，罗莎就加入了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队伍。

1918年3月，在木沙瓦特分子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叛乱的日子里，罗莎在一个部队医院里工作。人们经常谈论，她是怎么样地不怕敌人的子弹，穿着白工作服，站在救护卡车上，沿着城市街道两旁的战壕东奔西跑。她给受伤的红军战士包扎伤口，运送重伤员。我第一次遇见她正是在一所部队医院里。（当时她也给我包扎受了伤

的脚。)她美丽、乐观、关心别人、总是面带微笑,她简直是迷住了伤员们的心,她一来,大家都感到高兴。

1918年夏末,当土耳其军队逼近巴库时,她自愿走上前线。在那里,她冒着敌人的炮火运送伤员,大家都很喜欢她。她同战士们一起在前线一直坚持到巴库保卫战的最后一天。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后,罗莎开始从事地下活动。

我记得当我们挑选经过考验的最可靠的党员到邓尼金后方去工作时,罗莎·卡斯帕罗娃坚决要求也派她去做这个危险的工作。她的母亲没有反对这一点,但是当时她的心情是可以想象的。同罗莎一起去的还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卡嘉,她刚刚嫁给我一个要好的同志——一个巴库的共产党员科斯佳·鲁缅采夫。科斯佳带领一批同志被派往罗斯托夫和诺沃契尔卡斯克地区。他被捕了,在邓尼金那里坐牢,只是由于红军的进攻才死里逃生。

罗莎从邓尼金后方给我党高加索边区委员会送来的系统的情报,包括对邓尼金阵营政治经济情况的具体分析,说明了在复杂的工作条件下,她成长得是多么快。玛丽娅·卡斯帕罗娃说:“她给我母亲的信,充满了对母亲的关心和极力安慰她的愿望,‘不要老是惦念我!我很平安!’她在一封信中写道。为了能使母亲完全放心,她又写道:‘把我的短衫、活衬领和淡紫色的项链捎来!’”

1919年秋天,我们得知了罗莎、卡嘉·鲁缅采娃、苏连·马加乌佐夫和另外几个同志在阿尔马维尔被逮捕的

消息。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有一段时间，我甚至避免到卡斯帕罗娃家去，因为我总觉得我对不起他们。罗莎的母亲知道以后，就让同志们转告我说，她由于我长时间不到她家去而感到奇怪。我又开始到他们那里去，并亲眼见到了这位母亲的惊人的坚定和勇敢。从外表上看，她一点没有流露出悲痛的心情，收拾收拾就到她女儿坐牢的阿尔马维尔去了。那时候阿尔马维尔在邓尼金后方。

塔吉娅娜·卡斯帕罗娃好不容易到了阿尔马维尔后，不仅为自己的女儿，而且还为女儿的所有同志奔走和操心。她每天都到监狱去，设法和他们见面，把带去的衣物交给他们，并和被捕同志的亲属建立这样那样的联系。

很快，所有被捕的同志被转移到了皮亚季戈尔斯克。尽管白匪军一伙对他们严刑拷打，但终究没能得到年轻共产党员们的一句供词，没能摧毁他们的意志。朋友们为罗莎和她的同志们的处境焦虑不安。当时也在巴库监狱里坐牢的我们地下工作委员会的成员鲍里斯·舍鲍尔达耶夫从狱中写信给玛丽娅·卡斯帕罗娃说：“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罗莎的情况和她的结局将会怎样？为了使你感到同志们的支持，不致产生消极的念头，我多么想对她说些美好、热情、同志式的话啊！”

和罗莎在一起被捕的年轻共产党员中有后来幸而得救的塔玛拉·娜扎罗娃。她谈到“在监狱里我初次同罗莎和卡嘉认识。罗莎给我很深的印象。这是一个聪明、

乐观的姑娘，有一双美丽的、炯炯有神的大眼睛。我们读了很多书，一般是朗读。罗莎读得很好，我们就紧紧地围住她，兴高采烈地听她读。我记得有一本库普林短篇小说集。罗莎特别喜欢《石榴石的手镯》这篇。我们常常同她一起彻夜不眠，因为几乎每天夜里，都在监狱的院子里枪杀我们的同志。

罗莎从狱中给亲属和同志们写的信中所表现出的坚强和勇敢精神是惊人的。在遭到毒打和拷问之后，她写道：“我们有希望恢复健康，请你们设法使我们不被杀害，其他都是无关紧要的了。”在另一封写给母亲的信中，罗莎写道：“我非常不愿意死，因为我还年青！要知道，我还几乎没有开始生活，而现在突然就要死去！让这些悲观思想见鬼去吧！要不，他们会认为我怕死。简直是笑话！从被捕那天起，我从未哭过，甚至没掉过一滴眼泪。我将这样一直坚持到最后，……”

在写给她非常喜爱的小弟弟，八岁的列沃奇卡^①的信中，罗莎写道：“我多次非常亲切地吻你，每天晚上我都久久地想念你们。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好孩子，不要懒惰，不要把手弄得‘一堆墨水’。列连卡^①！我有好多话想给你写，但是你现在还不懂。你可别忘了我啊！”

给哥哥瓦尼亚的信中，她写道：“大家都已入睡，而我还在写信。明天是我的生日，我象一个小孩子一样，

① 列瓦的爱称。——译者

一边写一边想，明天亲人们将给我带些什么来。真好笑！”

在红军的打击下，被击溃的邓尼金部队从皮亚季戈尔斯克逃走了。在退却时，邓尼金匪徒把罗莎、卡嘉、苏连和其他同志转移到了格罗兹尼。罗莎的母亲收到了女儿的一封诀别的信，上边说，她们就要被运走处决。为了安慰和鼓励母亲，罗莎写道：“亲爱的妈妈，青鸟^①将重新给我们带来幸福。”她嘱咐要把可爱的弟弟列瓦培养成坚强的忠诚的布尔什维克。^②收到罗莎的信后，母亲又急急忙忙追去，并且碰巧她坐的正是押送犯人的那列火车。但是，她没能见到罗莎。在红军到来之前不久，1920年2月20日，罗莎和卡嘉在格罗兹尼被绞死了。在她们牺牲之后，苏连·马加乌佐夫也被杀害了。

在遇难前的几小时，苏连曾从狱中给朋友们的两封信，信就写在从衬衣撕下的布上。这是多么惊人的信件！多么巨大的精神力量和勇敢精神！

这里，我把这两封信援引如下：

“亲爱的塔马拉，向你致最后一次同志式的敬礼。12点。我正等着死亡的到来，但感到精神饱满。生活，——

① “青鸟”——是比利时资产阶级作家莫利斯·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的剧作《青鸟》的主题；全剧以“青鸟”作为幸福的象征。——译者

② 共产党员列夫·卡斯帕罗夫从伟大的卫国战争初期就上了前线，在同法西斯侵略者的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

就其全部意义来说，还是我未曾经历过的领域。我已来不及实现自己最后的愿望。我和罗莎被分开关着，她很英勇。被判处绞刑的共十六人。向同志们问候，热烈地吻你们。苏连。”

在第二封信中，苏连写道：

“亲爱的朋友们！命运使我目睹了我的光荣的同志们的牺牲。失去亲爱的好罗莎，我感到无比难过。她牺牲得十分英勇：勇敢地、毫无怨言地、无所畏惧地走向刑场。牺牲的还有年青的工作人员卡嘉。

她们将永垂不朽！请向罗莎的母亲转达我的问候，并请安慰她。一个这样光荣、无畏的同志的母亲不应悲伤和流泪。有这样的女儿的母亲是幸福的。我被关在死囚牢房，已经是第三个昼夜，在等待着自己命运的到来。十五个革命者中，有七个人大概今天要被绞死。我将以罗莎和其他同志为榜样，勇敢地走向刑场。永别了，祝你们健康。苏连。”

就这样，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这些无限忠于列宁事业的、勇敢的、年轻的英雄们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象这样的英雄是很多的。

这里，我稍微离开了我的回忆录的主题，因为从精神上感到需要谈一下我在自己生活的道路上所认识的那些还很年轻的人们，哪怕只是几句。他们的生活，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今天青年一代的好榜样。

* * *

记得 1919 年 6 月底，我到梯弗里斯去参加边区党委会议，我决定那怕是只花两、三天的时间，也要顺便到故乡去看一看亲友。

和我同坐一个车厢单间的是一个不相识的官员。从各方面判断，他是去赴任的。事情是这样的：在我们村的旁边有一座炼铜厂，而这个地区都属于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之间的所谓“中立地带”。这一地带当时由英军司令部指派的官员来管理。

我的旅伴是格鲁吉亚人。他问我到哪里去，是干什么的。我回答说，到萨纳因村去探望母亲，我在巴库油田当办事员，并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姓名。

隐瞒我的真实姓名是没什么意义的，因为如果他想知道，那就不难打听到。况且我想，地方行政机关没有什么理由来找我的碴儿。

我们海阔天空地聊着，但我却避开了政治争论，甚至政治性话题，而他也不勉强。

火车进了一道峡谷，两边是陡峭的悬崖，铁道就沿着湍急的迭尔卡特河岸蜿蜒而去。这条河并不大，但水流很急，发出哗哗的响声。我欣赏着故乡大自然的美景，现在这一切要比过去童年时代，更深地触动了我。

我已有一年多的时间没到故乡了。这是充满着急剧事变，充满了痛苦和欢乐的一年。可以说，我这次回来，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周围的一切我都感到异常的、无比的美，好象哪儿也没见到过，而且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再

看到这样引人入胜的美景：遍布森林的山峦，奇异的峭壁，湍急的小溪……

将近中午，到了阿拉维尔迪。就在这个车站上，有一座属于法国公司的老的炼铜厂。

还在路上，我的旅伴告诉我，这个工厂的工人比以前少多了，而且由于技术故障和组织工作不力及其他原因，工厂一直未全部开工。我已讲过，这个工厂有党的地下组织，1917年我在那里的工人集会和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曾讲过话，他们曾推选我为高加索边区党代会的代表。但是，考虑到我这车厢房间中的旅伴是属于官吏阶层的，当然，我不能而且也没有对工厂，特别是工厂的工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

下了火车，在车站附近我碰到一个同村的熟人，我们就一起动身走了。我们村子象这个狭谷里的其他村子一样，也座落在一个很高的山坡上。我们沿着一条险峻的从小我就很熟悉的人行小道走着，费力地攀着岩石，爬到比山谷里的河水高出近三百米的高处。我的旅伴叙述着村里的生活，并问我在那里工作，从什么地方来，打听我的情况。他大概对我的出现感到很吃惊，因为这里传说我已经死了。在路上我们又碰到一个同村人。应该提一提的是我们村子里习惯于跟所有相遇的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人都打招呼。这个同乡从我们旁边走过时，向我点了点头，但他显然没有认出我来。这时，我的旅伴就问他：“你怎么啦，不认识他了？”他仔细地看了看，

后退了几步，看来是极为惊奇地，两手一摊说：“死人又复活了，这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然后他走到我跟前，拥抱我，因为我们曾经有个时期是很要好的。

虽然离村子还不到三公里远，但是由于是陡峭的上坡路，所以我们走了将近整整一小时才好不容易地到达。我没有见到父亲，在我这次回家前一年他就去世了。我和母亲相互扑了过去。她满面泪水，不断地感谢上帝保佑儿子还活着。我的许多亲属都来了。大家都在问我，我就一一应答。

当时正好是吃午饭的时候，我很满意地吃完了母亲端到桌上放到我面前的东西。母亲高兴极了。她坐在我旁边，一直看着我，好象总看不够似的。她是不大了解政治的，所以我没有同她谈政治方面的事情，只说我生活得很好，在巴库工作，因此她用不着为我担心。而她却问起我：“怎么回事呵，不是纷纷议论你被英国人逮捕而被杀了吗？”午饭后，我在村子里蹓跹了一番，看看村子里有什么变化。在村子里，我们大家都彼此认识，因此我们的散步就变成了许多的交谈。我到墓地去看了一下父亲的坟。在父亲面前，我是感到很内疚的。那是在1918年春天，当时梯弗里斯与巴库之间的铁路交通是最靠不住的，人们预料马上就要中断的。这时，我收到从家里打来的电报，说父亲病危，要我回去看看，和父亲诀别。做儿子的责任促使我想马上回去，而这就意味着我将失去返回巴库的可能。我不能冒不能返回的危险而抛下巴库的革命

工作。况且，我也没有把握，在我赶到家的时候父亲还活着。现在，我站在父亲的面前，默默地请他宽恕。

当时，我家就靠我哥哥来维持。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两年应征入伍，在部队服役六年多，于1917年年底回到家乡。现在他做木匠，继承着父亲的职业。在这几年中，家里生活得还是不错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我们家里只有两只奶羊，现在已经有了奶牛了。弟弟阿尔焦姆前不久在农村四年制学校毕业了。我决定让他到梯弗里斯去，依靠姑母维尔基尼娅·图马尼扬的照顾继续求学。所以从1919年9月开始，弟弟就住在梯弗里斯姑母家里，在亚美尼亚学校学习。

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凉台上围着桌子吃晚饭的时候，邻居的儿子来了。我和他是童年的朋友。他走到我跟前问了好，然后就把我叫到一旁告诉我，他在中立区的民警队工作，他是来预先告诉我，他的上级决定要逮捕我。因此，他建议我当晚就逃跑。我感谢了他。我们继续吃晚饭，对谁也没有谈这件事。

当人们都散去，已是睡觉的时候，我对母亲和哥哥说，今天晚上我要走。他们很奇怪，很伤心，怎么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我只好向他们说明我今天晚上如果不走，我就要被捕。我决定即使睡几个小时也好。在这之前，我与妹夫炼铜工人阿科普商量了一下，应该怎样走才能避开警察的追捕。而最危险的地方是河上那座古老的石桥。我很走运，桥上谁也没有。这样我们就顺利地

过了河，朝着与梯弗里斯相反的方向走去。事情很清楚，不能在阿拉维尔迪车站候车。于是我们向萨纳英车站前进。但我们决定，就是那里我也不应该马上就去的。因此，阿科普单独到那里去，以便去找我的一个亲戚，他在这个车站上有一个小售货棚。在这种情况下，这对我们是很合适的。阿科普把为我买车票的钱转交给了他，并且和他商量好，要他在火车到达之前，把我隐藏在他的售货棚里，以免别人看见。然后我和阿科普一道出发到了我姑母居住的奥德宗村去。姑母很好地接待了我们。

当时发生了一件可笑的事情，或许值得提一提。记得在交谈的时候，姑母对我说，我的母亲想娶她邻居的一个女儿给我哥哥做媳妇。这个姑娘的母亲同意了这门亲事，而她的父亲还有点犹豫不决。“走吧，一起到他们那儿去一趟，”姑母对我说，“顺便你去认识一下那个姑娘和她的父母，到那儿瞧一瞧，帮我把这门亲事说妥。”

我同意了。

我们受到很热情的欢迎和良好的款待。对选作我哥哥的未婚妻的那个姑娘我很满意，对她的父母我也很满意。在交谈之际，我就直率地问姑娘的父亲是否同意把女儿嫁给我哥哥。

他仔细地注视着我的眼睛，想着什么似的停了一会说：“我同意把我的女儿嫁出去。但是不嫁给你哥哥，而是嫁给你。”

这个出乎意外的转变使我大吃一惊，因为不管怎么

样我是来这里给自己的亲哥哥相亲的啊！我说我暂时还不打算结婚。“除此之外”，我说，“您也知道，按老规矩我不能比哥哥结婚早。”

到此，我们的谈话就结束了。相亲这个偶然的差事我没有完成。

傍晚，我们又出发了，以便在列车到达之前赶到车站。天已经黑了。阿科普走在前面察看动静。前面一切都很平静，所以他就满意地回来了。这样，我们就一起到车站去。大约要等十至十五分钟火车才来。在小售货棚里等过了这段时间之后，我就从主人那里拿到了车票，悄悄地进了车厢，坐到一个角落里。

火车开动了。在阿拉维尔迪车站停车三分钟——这是一个最紧张的时刻：警察将会突然闯进车厢来检查证件吗？然而，这样的事终究没有发生，这一站顺利地通过了。我到达了梯弗里斯，随后就到了巴库。

* * *

1919年7月，我重新来到梯弗里斯参加党的边区委员会会议。会议地址选在马马-达维德山的山坡上最后一排房子里，在经过考验的但不特别出名的共产党员裁缝拉日登家中。警察几乎不到这一带来。我们觉得从秘密工作这一观点看来选择这个地方是很合适的。已作出决定，我们要一个一个地到达会址。离这所房子几十步远有我们的同志，负责监视是不是有“尾巴”盯着我们。

我沉着地向拉日登家走去。

在没到达之前，我决定查看是不是有人盯梢，我走进商店，在里面待了两、三分钟，装作要买什么东西的样子，然后走上大街。我没看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更加放心地继续走去。

在拉日登家里我碰到来自弗拉基高加索的两个同志——格奥尔基·斯图鲁阿和斯拉文斯基。

过了几分钟，突然两个警察闯进屋里。其中一个年纪大的对我说：“您是米高扬？”“是。”我回答道。“您被捕了。”——“为什么？”——“我有克迪亚特别部队长官的命令。”（这是臭名昭著的迫害共产党员的孟什维克的队伍。）

警察宣布另外两个同志也被逮捕。

格奥尔基·斯图鲁阿在这种情况下非常机智，当场就和警察交谈起来，这个警察姓利帕尔季亚。格奥尔基劝他不要逮捕我。他时而讲格鲁吉亚语，时而又转用俄语：“您可以逮捕我和这个同志，我们不反对，我们和您去监狱，但无论如何您也不应逮捕米高扬。”他解释说，邓尼金分子和英军司令部都在盯着米高扬，如果你们逮捕了他，孟什维克政府把他转交英国人，英国人又把他转交给邓尼金，他将被处死。“您要知道”，他说，“不会经过很长的时间，也许就经过半年，布尔什维克将在高加索取得胜利，那时候大家将知道您，利帕尔季亚，在逮捕和杀害米高扬的事件中是有罪的。那时，您也就完了，所以首先请您想一想自己吧。”

警察开始解释应该绝对服从长官的命令。他说：“何况当米高扬在街上走的时候，克迪亚从窗口看到并认出是他，派我盯着他并逮捕他。我怎么能不逮捕他而空手回去呢？”斯图鲁阿找什么新的理由回答警察的这些辩解，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最后利帕尔季亚说：“好吧，我把你们两个留下，而把米高扬带走，否则我没法在长官面前交代。”

当时斯图鲁阿说：“没有米高扬我们不会留下来，我们一块走。”就这样我们一块走了。一路上格奥尔基反复地说，不能逮捕我，否则将来一定要后悔的。

终于，警察流露出动摇的语气。他说：“我有家，如果他们开除了我，我怎么养活我的全家呢？”斯图鲁阿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回答说，这些都不需要他担心，因为我们将给予他所需要的物质上的帮助。利帕尔季亚沉默了。当时斯图鲁阿说：“给你和你的同事五千卢布，如果你现在放了我们，晚上你到国家剧院去，那里有一个姑娘带着钱，您走到她跟前告诉她，您姓什么，她就会把这笔钱交给您。”

利帕尔季亚同意了。于是，我们三人分散开，各自穿过小巷，回到自己秘密住所。我记得，这件事是正当我们走近离克迪亚的司令部不远的法院楼房的时候发生的。

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晚上利帕尔季亚如数拿到了这笔钱。这些钱是由当时在梯弗里斯过暑假的我的未婚妻阿什亨交给他的。

有趣的是，过了十五年左右我收到利帕尔季亚的一封信。他描述了当时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并请我写书面证明：他真的在逮捕过程中放了我。为了得到养老金，他需要这个证明。

* * *

我已经说过达格斯坦是当时革命事件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那里建立了非常巩固的党组织。在苏维埃政权的旗帜下起义运动顺利地发展了。达格斯坦游击队英勇、果敢地袭击邓尼金部队的后方，使邓尼金遭受了很大的损失。达格斯坦的铁路工人和彼得罗夫斯克港口的职工进行了积极的革命斗争。

达格斯坦的布尔什维克一直和巴库党委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依靠它的支持。阿塞拜疆的布尔什维克组织给达格斯坦的同志很大的帮助，给他们送去武器、钱、书籍，同时派人到那里去。应当指出，我们边区委员会的委员加米德·苏尔塔诺夫在所有这些工作中起着特殊的作用。在先进的巴库工人和共产党员中间，不少人来自遥远的达格斯坦山村。他们和同乡们保持着联系，积极地影响他们。例如我清楚地记得两个杰出的出生于达格斯坦的工人——积极的共产党员卡齐马麦德和阿伊金别科夫。这是两个特别引人注目的人物。记得特别是在1917年春天，我为了党的工作刚到巴库时，他们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达格斯坦当时不但跟巴库有联系，而且跟阿斯特拉

罕也有联系。谢·米·基洛夫密切注视着达格斯坦政治斗争的发展。1919年初正是在他的直接参加下,把有名的布尔什维克布伊纳克斯基和一批军事工作人员从阿斯特拉罕派到达格斯坦。布伊纳克斯基在加强达格斯坦党的工作和同我们建立紧密联系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到1919年夏天,共产党人在达格斯坦的影响大大地扩大了(特别在山村),以至武装起义成了现实问题。起义应该在1919年5月举行。达格斯坦的同志们深信起义一定会成功。但是不知为什么起义的日期拖延了一些时间。在这期间山区反革命政府决定转入进攻,并想一下子平息“骚乱”。当警察局发觉地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领导者们召开秘密会议时,就把他们逮捕入狱。

关于这一点,我在1919年7月19日向中央汇报:“山区共和国政府采取公开叛卖行为,于5月5日与邓尼金停战,并和邓尼金缔结了协定,逮捕了所有准备起义的领导同志(达三十五人),并把他们转交到彼得罗夫斯克志愿队手里。他们至今未被处死,因为我们把在连科兰逮捕的邓尼金分子宣布作为人质。最近他们举行了军事审判,结果是乌卢比·布伊纳克斯基、阿勃杜尔·巴加勃·加吉·马戈马-奥格雷、阿勃杜拉赫曼·伊兹马依洛夫、塞勃·阿勃杜尔·哈利莫夫和马吉特·阿利-奥格雷五位优秀同志被判处死刑。”

布伊纳克斯基和他的同志们牺牲以后,1919年秋天山区政府被解散(这次是被邓尼金分子解散的),这时把

卡兹别科夫同志从巴库派到了达格斯坦。在达格斯坦大家对他很熟悉，因为1918年他曾是达格斯坦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而当那里的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以后，他又在巴库的党组织工作。卡兹别科夫到达格斯坦以后，就积极地参加了达格斯坦的省党委工作。

从1919年6月开始，由基洛夫从阿斯特拉罕派来的鲍里斯·金鲍尔达耶夫非常积极地参加了达格斯坦劳动人民反对邓尼金的七月起义的准备活动。

在准备起义和反对邓尼金军队的斗争中，我们的边区党委会对达格斯坦给予了竭尽全力的帮助和支持。

应该提一提关于当地宗教界在达格斯坦人们的共同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当地宗教界当时分成两派。达格斯坦有的宗教人士，与以宗教长戈增斯基为首代表剥削阶级上层人物利益的反动僧侣相对立，站在革命的贫民一边。甚至在不少的情况下他们与共产党配合行动。

在国内战争年代里，达格斯坦的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斗争中，不止一次地利用泛伊斯兰运动积极活动家阿利-加吉·阿库申斯基和乌宗-加吉（当时他们在群众中很有影响）去削弱内部反革命势力和组织反对武装干涉者及白卫军的斗争。尤其是达格斯坦的同志们在吸收广大贫民阶层参加起义队伍的过程中，他们俩给予了不少的协助。例如当时就流传着阿利-加吉·阿库申斯基在达格斯坦山村积极协助动员贫民反对邓尼金斗争的事迹。

北高加索很多地区的居民都卷入了起义运动。战斗

互有胜负。但是游击队每次袭击都使白卫军部队遭受很大的损失，而最重要的是，他们使邓尼金部分武装力量离开了与红军作战的前线，从而在那些困难的日子给了红军有力的支持。

1919年11月《真理报》发表了我写的关于高加索山区居民起义的性质和动力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内容可能至今还对读者们有一定的意义，因此特引述如下。

我指出，由于在沙皇制度下历史上形成的种种原因，山区劳动群众远远脱离了政治生活。二月革命在这方面引起的变化也很微小。

只是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而特别是随着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广大的印古什人、切禅人、沃舍梯人、达格斯坦人和高加索其他民族的广大山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才成熟起来，认清了自己的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中去。他们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挺身保卫这个政权，为反对白匪而斗争。正是十月革命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享有与其他各族人民一样的自由和平等。在苏维埃政权的帮助下，他们摆脱了哥萨克的不堪忍受的压迫和专横，同时夺回被沙皇制度用暴力从他们那里夺走、并转给了富裕的哥萨克的那些土地。

在谈到邓尼金匪帮的入侵时，我写道，开始山区人民“还没有完全认清，向他们逼近的邓尼金反革命的性质，因为他们还没有懂得，苏维埃政权能否存在是关系他们

生死存亡的问题。”

这就是山民们在和“志愿队”匪徒斗争中开始时没有拿出“全部力量”，没有全力以赴的原因。从而不自觉地加速了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失败。”但是，他们很快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认识到，将军的爪牙们和哥萨克的“好汉们”的政权给他们带来的到底是什么。

“邓尼金一开始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狰狞面目，”文章写道，“他的忠实的同伙，血腥镇压波斯革命的刽子手，耀武扬威的利亚霍夫将军烧毁了所有的山村。只要是他见到的，不管是男人、女人、儿童或者老人都不放过，一律枪杀。在这个问题上，他倒是一贯坚持无条件的‘一律平等’的原则。这样，在1月和2月份，几十个印古什人和切禅人的山村全部被毁灭了。在4月份和后来在7月份，又在达格斯坦和印古什再次制造这样的惨案，以便取得更大的效果。邓尼金分子用这样的手段来制造恐怖并迫使人们对其政权表示“尊重”之后，便委派他的小沙皇们充当每一处山区人民——即达格斯坦、切禅、印古什季叶和阿塞梯人的统治者。邓尼金分子还把那些军官和思想反动的当地人组织成为讨伐队。他们把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强加在居民的身上。缴纳这些捐税，就使得这些本来不富裕的山区居民彻底破产，而对贫民来说，连摊派的一半款项也缴不出来……

山区的劳动群众终于领会了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给他们的‘实物’教育，积蓄了力量，作好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应当估计到：那时山民们还没有巩固的政党、报纸和知识分子干部），他们齐心协力，坚决同残暴的敌人战斗。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通过决议：不给邓尼金任何东西，并与之作殊死的斗争。热爱自由的

高加索山区的雄鹰们，投入了为争取自由，反对邓尼金黑暗统治的神圣战斗。三个多月的时间，所有山区广大人民群众都燃起了普遍起义的烽火。”

我在文章里写道，对于我们党和苏维埃政权来说，重要的是弄清山民运动的性质。在这个运动中，社会的和阶级的分化的因素明确地显露出来。这个起义表明山区贫民不仅反对邓尼金，而且也反对邓尼金在山民中间的代理人。

“当邓尼金匪帮向高加索推进的时候，山区贫民们咬牙切齿地进行了公开的或隐蔽的反抗。而山民中的有产阶层则与他们完全相反，那些旧官吏、旧军官和富农们不但尽力帮助邓尼金在山区里巩固下来，而且还恳求他派军队驻扎在大的山村里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心甘情愿地为屠杀人民的刽子手效劳，攫取统治者（邓尼金的“全权代理人”）的地位，如区长、乡长等等；补充镇压贫民的队伍。邓尼金压迫和掠夺山区人民的罪恶勾当都是狡猾地借山区反革命分子的双手来干的。因此，贫民们对奴役者怀有无比的仇恨，他们不仅仇恨邓尼金匪徒，而且也仇恨“自己的”山民中的反革命分子……

山区里还留下了不少的俄罗斯红军。也有许多志愿者来帮助举行起义的山民。穆斯林山民不但给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以隐身之所，而且热情地拥抱他们，亲切地接待他们。对他们十分爱戴和感激，和他们同心协力地展开了反对俄国的将军和军官的战斗……

山民们的处境使他们能够正确地认识他们运动的性质和寻找自己的盟友。他们没有去请求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地主资产阶

级政府，而是找布尔什维克委员会，请求帮助，并希望知道布尔什维克和红军是否很快就要回到他们那儿去。

起义的山民劳动群众下定决心，决一死战，与自己的同教者和社会叛徒们组成的资产阶级走狗政府彻底决裂。

高加索山区的游击队向工农红军伸出了兄弟之手，他们不摧毁由黑帮匪徒在山区人民和社会主义俄国之间建立的壁垒，就决不罢休”。

又一次被捕

审讯；在巴库监狱；从监狱到监狱；我们获释了。

在巴库我不得不在十分秘密的条件下工作。我不参加任何公开的会议，只出席过几次巴库党委会在工人区秘密举行的全体会议。这种会议，一般都是在俱乐部的舞台后面举行的。并且，为了打掩护，在会议进行时，有工人业余文艺团体在俱乐部的礼堂里排演节目。

巴库党委会执行局的会议（由于人数不多）在城里的秘密住所举行：有时在卡斯帕罗夫那里召开，有时在切尔诺莫尔季克的住宅里，或者在我们的某一个可靠的同志那里召开。

那时，我住在切尔诺莫尔季克家里。这所住宅是空着的，因为主人住在别墅里。有一次，果戈别里泽领着两个同志到我这里来。一个是阿维斯·努里贾尼扬，由于在巴库的工作关系我很了解他。另一个是不久前才认识

的尤里·菲加特涅尔。他秘密地从北高加索经过格鲁吉亚，到巴库来找我们。在北高加索的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以前，他一直是捷尔共和国的人民委员。菲加特涅尔前几天刚从达格斯坦回来，他是被我们派到那里去了解情况的。他来找我就是汇报自己出差的情况。他们两个，不论是努里贾尼扬还是菲加特涅尔都是很好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我们长时间地讨论了当前的政治问题。也谈了很多关于各地区的形势和工人代表会议的活动情况。还拟定了一系列提案，准备提交巴库党委会和边区委员会执行局讨论。

我们的会面持续了很久，天气热得难受，在屋子里连呼吸都感到困难。就在这时，果戈别里泽突然建议说：“走，我们到海里去痛痛快快地洗个澡。我想是没有任何危险的。阿纳斯塔斯，警察大概不会在海滨浴场等着你吧！”天气热得把我们都要“熔化”了，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这个富有诱惑力的建议。

傍晚，我们离开了住宅，穿过几条小巷，顺利地来到了市区的海滨浴场。海面非常平静。我们非常高兴地在温暖的海水里游了很长时间，游泳使我们爽快多了，也有精神了，以至完全忘记了酷热，况且炎热也开始减退了。可是，都感到肚子饿了，这时我们才想起还没有吃午饭。然而，不论是我还是我的朋友们家里都没有吃的东西。这时，又是这个富有首创精神的果戈别里泽建议找个饭馆

好好吃一顿。而我主张最好是随便找个食堂。但是，果戈别里泽反对我的建议，他说，从地下工作的观点来看，最好是到饭馆去，因为警察特务一般都注意监视工人食堂，在那里倒可能把我认出来。而在阔气的资产阶级饭馆里，倒比较安全，因为谁也不会想到在那里会有布尔什维克。

这种理由仿佛是有说服力的。果戈别里泽就把我们带往他以前常去的“季利普丘尔”饭馆。

饭馆里灯火通明，四周坐着穿着漂亮的男女顾客，他们在那里说笑、饮酒。果戈别里泽领着我们穿过大厅，坐到一张放在灯光较暗的角落里的空桌旁。他要了“带血的”煎牛排，记得好象还有卡赫齐亚葡萄酒。

我们津津有味地吃着，情绪非常愉快，什么危险都忘记得无影无踪。吃完煎牛排之后，我们正在盘算着：是否再来一份？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警官带着两个警察突然出现在大厅里。事情很清楚，我们落网了。我抓住警官穿过大厅正在向我们走来的这个空隙，低声对果戈别里泽说，要他就逮捕我们的问题和警官展开辩论，因为这时我才想起口袋里还装着几份秘密文件。我焦急地考虑着：怎样才能甩掉这些文件……

这时，果戈别里泽强烈地抗议对他的逮捕。因为当时他是巴库工人代表会议主席，所以可以说是不可侵犯的人物。警官当然看着他，而两个警察一会儿看看警官，

一会儿看看果戈别里泽。我看了看四周，发现谁也没有注意我，连看热闹的人都望着果戈别里泽和警官，于是，我就悄悄地从口袋里掏出文件，塞到台布底下。

在这之后，我才松了一口气。现在我可以随便冒充什么人了，这里应该说明一下，藏在台布底下的文件里有一张委任状，是写在一小块白色亚麻布上的（与现在的戏票大小差不多）。上面注明，委任状是发给埃什巴同志的，他由党中央派来高加索进行党的工作。上有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叶莲娜·斯塔索娃的签名，并盖有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章。就在发生这件事的前一天，埃什巴确实来到了巴库，到过我那里，并留下了这个委任状。我把它放在口袋里，还没来得及藏起来。埃什巴和涅斯托尔·拉科巴一样，都是阿布哈兹共产党公认的领导者。

警官终于中断了与果戈别里泽的争吵，转过身来问我是什么人。我回答说：“我是个教师，是无党派的，从梯弗里斯来这里找工作。我姓捷尔·伊斯拉耶梁（我有用这个名字的护照）。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应我安排工作的请求接待了我。他答应帮忙，并且邀请我和其他两位同志（也是因工作安排问题访问他的）和他一起吃饭。”其他的同志也作了同样的回答。当时，我们的态度都非常镇静。我们被带出了饭馆，在警察的押送下把我们带往最近的大概是第五警察段。

沿途，我焦急地考虑着：在审讯中我应该把哪个住宅说成我的住址呢？切尔诺莫尔季克的住宅是一定不能供

出来的,因为他的住宅里收藏着我们党的一些重要文件。最好是说一个我们没有存放任何秘密东西的住宅,而预先又向主人打过招呼,在必要的时候,我就说是他的临时住户:这就是我们后备的秘密住宅了。

街上完全黑了,但是人很多。我们偶然地迎面碰见了奥尔加·沙图诺夫斯卡娅。看到我们被警察押送着,她非常地惊奇。借着闹市里拥挤的机会,我低声对她说,要她去通知同志们,同时,把我将要在警察段说出的那个住所收拾好。

在警察段,审问我们的是另外一个警官。果戈别里泽把饭馆里说过的那些话向这个警官重复了一遍,并且再次要求立即释放他,关于我们的情况他什么也没说。接着我们三个人又分别向警官叙述了自己的“传奇”。这一切似乎都没有引起警官的任何怀疑,他都信以为真。我们要求释放我们,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罪过。然而我们没有被释放。这一夜和第二天的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警察段里度过的。这里我想起了扣留在这个警察段时的一段插曲。

巴库有一家饭馆的老板是列万·果戈别里泽的家乡,并且待他很好。列万经常到他那儿去吃饭。不知怎么的,他知道了果戈别里泽被捕了。可能是我们被捕时,正好在饭馆里的那些人告诉他的。就在我们被捕的第二天早晨,他捎给我们一个大篮子,里面装着非常好吃的烤羊肉串,新鲜面包和一个大西瓜。这对我们真是

出乎意外的好礼物。

末了，在中午的时候把我们押上两辆敞篷汽车。在警卫的押送下，驶往巴库郊区的巴依洛夫监狱。到了那里，让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不大的牢房里。铺上床垫、枕头都没有，就是一块光木板。但这些并不太使我们发愁，睡木板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由于天气热得要命，也用不着盖被子。吃得很坏，直到两天以后同志们以果戈别里泽的名义给我们送来了食物。这时，果戈别里泽还和一个看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说服了这个看守同意往外面指定的地点转交我们的一封信，答应为此将好好酬劳他。由于这封信有可能落到监狱管理当局手里，所以信是用寓言式的语言写成的。信的内容是希望同志们通过送信人告诉我们，他们在采取一些什么措施来营救我们。

还在我们被捕之前，我们就知道了，大约在十天前，被捕的鲍里斯·舍鲍尔达耶夫就关在这个监狱里。这个人的性格沉着、坚定，从来不发火，就是在争论的时候，他也不急躁，说话慎重，不爱讲废话。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一个共产党员。

我们甚至猜不到，他是怎样被捕的，只是推测，在帮助他搞英军司令部证件的那些人中有人出卖了他。当时，他打算弄到证件，以这个司令部军官的身分，到邓尼金方面去的。记得，我甚至谈过这样的想法，可能舍鲍尔达耶夫不是一下子就被捕的，而是在他的联系被暴露，从

而使得我们的侦察系统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之后才被捕的。这对于舍鲍尔达耶夫本人和其他许多同志都是最危险的事情。

现在，在我们关在囚禁着舍鲍尔达耶夫的监狱的时候，我们决定无论如何也不能急于和他取得联系。我们对他不可能有any帮助（就象他不可能帮助我们一样），而很容易把情况弄得复杂起来，因为只要发现我们同舍鲍尔达耶夫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我们都要吃苦头的。

我已经提到过的那个看守人，倒是个正派人。他不仅把我们的信送出去了，而且还给我们带来回信，这样做还不止一次。

狱外的同志拟定了两个营救我们的方案。

第一个方案是他们给我们送来锯子。用锯把临街的一个窗户上的窗栅锯掉。晚上，在约定的时间里，我们就从这个窗户越狱。这时哨兵已经被隔离开了，而等在附近的一辆敞篷汽车，将把我们运到指定地点。另一个方案是通过看守把手枪带给我们，在约好的那天晚上牢房关门之前，我们就解除看守们的武装，把他们统统关在我们的那间牢房里。这时，我们就通过狱中的走廊跑到外面去，同志们就在那里等我们。

我们考虑了这些方案，觉得这两种办法都是很冒险的。由于很难预料到可能发生的各种复杂情况，所以在这种或那种情况下都有遭到失败的可能。我们通知狱外的同志们，在我们还没有最后决定采用哪一种方案之前，

两个方案他们都进行准备。同时我们让我们的朋友们请作为国会议员的卡拉耶夫采取有效措施来营救被非法逮捕的工人代表会议主席果戈别里泽，这样一切问题可能容易解决些。

牢房里热得难受，连呼吸都越来越困难。加之在紧张的工作以后，突然陷入一种很不习惯的无事可做的状况，我们感到一种特别的说不出的难受。甚至感到一种使人软弱无力的懒散。我一直苦恼着，想到我怎么居然违反地下工作的规定，同意了果戈别里泽的建议，干出这样冒失的事情，既害了自己，也连累了同志。结果是我们自己把自己赶进了监狱。尤其使我们苦恼的是狱外那些突然被中断的大量党的工作正等着我们去做。我想常常有些错误是无法补救的，这回就是这样。当然，我不能特别责备果戈别里泽，因为对这件事情我要负更多的责任：就年龄来说，我当时24岁，比他大；就政治工作经历来说，我比他长。所以我本应该更慎重一些。

但是这些使人痛心的念头也被这个果戈别里泽给驱散了。由于他乐观、活泼，常常开玩笑，总是使气氛很活跃，这一切使我们精神振作。而阿·阿维斯·努里贾尼扬却相反，他特别消沉，总是用阿塞拜疆语哼着一支忧郁的歌曲。就我所记得的歌词内容，大概不外乎这么几句：

我的牢房里又热又挤，

而心里更是悲伤……

阿维斯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入党还不到一年，

应该指出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入党，往往就预示着被投入牢房，甚至有牺牲的危险。但是，他始终坚持共产党员的立场。我这里说的是以后的事情了。大约过了一年以后，阿维斯就成为一位起义和为苏维埃政权在亚美尼亚胜利而斗争的积极领导者，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出是一个忠诚而奋不顾身的战士。

阿维斯忧伤的歌声使果戈别里泽很生气，所以他常常要阿维斯不要唱了，免得使别人心神不安。

我们同牢房的第三个同志尤里·菲加特涅尔是一个严肃、沉思的人，不开玩笑，而且也不喜欢玩笑，也可能他不懂得什么是开玩笑。尤里·菲加特涅尔躺在床铺上，忧郁地凝视着天花板，长时间地在想着什么。我总觉得他在耽心，他会遭到一个很熟悉的共产党员，皮亚季戈尔斯克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安德日耶夫斯基那样的悲惨的命运。（安德日耶夫斯基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有声望的活动家。有一个时期他简直名震北高加索。1919年春天，他和一批同志一起翻过高加索山脉，穿过格鲁吉亚到我们巴库来。他马上参加了党的工作。我同他碰见过几次，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热情、精力充沛的工作者，忠心耿耿的革命家。从来不愿游手好闲，总要活动、工作和斗争。安德日耶夫斯基很快被木沙瓦特当局逮捕了。看来是遵照邓尼金匪徒的要求把他交给了英军指挥部，于是英军指挥部又把他转到北高加索交给了邓尼金匪徒。这一切进行得如此迅速，以至于我们来不及采取行动。记得当

时我们大家对这个损失都感到非常沉痛……)

我们牢房里收到了狱外同志送来的报纸，这给我们单调的生活带来了一定的生气。我们开始研究和讨论目前的事件。就这样过了约一个星期。

有一次晚上十点钟左右，看守长把我们的牢房门打开，并且说：“先生们，请你们准备一下，要把你们从巴依洛夫监狱转到中央监狱去。”这个意外的通知使我们大家非常震惊。因为我们知道，平时在晚上8点所有牢房门的钥匙都交给监狱长，只有到第二天早上7点，钥匙才还给看守们，他们才能再开牢房门。这次已是夜间而钥匙却在看守那里，并且这么晚了还要把我们转送到其他监狱去。记得当时我们考虑：不可能是简单地把我们转到中央监狱去。我们一致坚决表示，不同意在夜间转到其他监狱去，我们也决不出走这个牢房。看守回答说，有个高级长官到监狱的办公室来了，他是专门为了我们的转移而来的。对此，我们又说：“去向长官报告，我们坚决拒绝离开这里。”

看守走后，我们就相互交换意见：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结果一致认为这不可能是转到中央监狱去。很可能将我们从这里押出去，以便连夜把我们装上船，转交给英国人。我们坚决拒绝在夜间出去，因为考虑到在白天能跟外边取得联系，也许还可能采取一些措施。

过了一会，宪兵队的长官、看守和好多警察来到牢房，他们挤满了整个走廊。对于立即离开牢房的要求，果

戈别里泽回答：“我们不能同意你们的要求。夜里我们那里都不去。明天白天你们把我们转到那里都行。”

当时宪兵队长又重复了自己的要求。他说，如果我们不肯自愿走，就将用武力把我们押走。

我们想，看来他们真的会这样做，还可能狠狠地毒打我们。大家看着果戈别里泽。他想了一下说，我们表示抗议，但也不得不屈服于暴力。

警察们紧紧地围着我们，带着我们经过走廊来到监狱办公室。过了几分钟，我们看到：鲍里斯·舍鲍尔达耶夫被带进来了，这又是一个意外！我们和他没有什么共同的案情，有关他的事他们一次也没有审问过我们。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他的姓名。

我们在监狱办公室时，更加确信，他们不是简单地想把我们转到其他监狱去，而是跟舍鲍尔达耶夫一起转给英军当局。鲍里斯·舍鲍尔达耶夫被带到办公室时，还完全是睡眼惺忪的样子。他向四周看了一眼，认出了我们，他用手摸了一下脸，用一种含糊不清的声音说：“啊，现在我什么都明白了！”很清楚，他也怀疑这里有问题。但我们对他的话不能有任何反应，甚至也不好同他打招呼，而是装出我们之间互不相识的样子。

我们站着等候下一步会怎么样。突然一个看守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绳子，走进来问他的长官：“这个行吗？”我忍不住开玩笑地问：“先生们，你们想干什么，准备绞死我们吗？”监狱长对我回答说：“因为手铐在中央监狱

里有，而我们这里现在没有。所以我们用这根绳子代替手铐把你们绑在一起。”

接着他们就这样做了。将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放在背后，用绳子绑起来，同时也就相互拴住了。绑完以后，经过灯光暗淡的走廊，在严密的警戒下把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带到外边。那里已经准备好卡车。警察和我们一起爬上了卡车。

这是一个温暖而平静的月夜。走出牢房呼吸新鲜空气是很舒服的，但心里却愁闷异常。在警察的监视下，我们彼此之间不讲话，说实在的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大家好象都在猜想，等着我们的将是什么……

我们驶过的那条路是一条沿河岸的马路。当卡车开进码头时，我们大家都料想卡车马上就会停下来，然后把我們装上轮船。当我们的卡车没有减速，开过码头驶向中央监狱时，我们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

与座落在城郊的巴依洛夫监狱不同，这个监狱位于市中心。周围是住房。监狱的建筑物原来是阿塞拜疆的一个资本家塔基叶夫建造的磨粉厂，后来他把这座房子献给了沙皇政府作监狱，所以这个监狱又称为塔基叶夫监狱。

他们把我们带到五层楼，这楼里都是终身苦役犯和死刑犯，我以前曾经在这里坐过牢。

到了这里，他们把我们的手松了绑，邻近牢房的囚犯都醒了，他们从门缝里看我们。突然一个牢房里发出一

个声音：“米高扬同志？”幸亏旁边没有警察。我马上走到这个牢房的门旁，轻声地说：“我不是米高扬，而是捷尔-伊斯拉耶梁。”看来他已经明白了我的意思，因为这个牢房里后来再也没有发出什么声音。这一切进行得很快，而且声音很小，所以没有被看守发现。他们把我们继续往前带，让我们住在走廊尽头的牢房里。几天以后我找到了机会，在我们放风的时候，我上厕所时走到那个牢房的门口问道，谁在里边。原来那里关着一个红军战士，我在他所在的旅曾担任过政委。这个人我并不认识，但是他还记得我。重要的是弄清楚了他是按照我们党组织的决定和首长的命令进行了一次暗杀活动。——用毛瑟枪打死了一个姓格洛瓦尼的家伙，格洛瓦尼原先是共产党员，后来成了奸细。关于这件事我以后再讲。

我们住的那个监狱里，被捕的人都住在单人囚室里。而我们五个人关在一间这样的牢房里。我们直接睡在混凝土地上。

不久外面给我们送来了床单、枕头，给我们安排好转送食品，这些东西仍是以给果戈别里泽的名义送来的。除了报纸我们甚至还得到书籍。记得，我是多么高兴地读了契珂夫的短篇小说。

给我们传送食物、书籍和报纸的是一批高年级的女学生。她们是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成员。她们以极大的热情非常认真地来做这些工作。应当指出的是，他们竟能瞒过看守的检查，成功地把我们所必需的情报纸条塞

进食物的包装里。

从报纸上我们知道：英军指挥部着手从阿塞拜疆撤走军队，只在巴库留下一名代表。看来他们认定，英国人在阿塞拜疆的影响和总的地位已经巩固了，已没有什么会威胁他们的统治了。从我们收到的狱外来的字条中得知，我们的同志在巴库党委会积极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争论这一事件对革命斗争的意义，希望弄清占领军从巴库撤走的真正原因，因为当时非常令人担心的是，英国人撤走时会把巴库城交给在俄国南方继续进攻的邓尼金匪徒（后来，实际未被证实）。

突然，在我们党报上意外地发生了辩论。作为报社的编辑，洛米纳泽没有得到巴库委员会的同意，就发表了一篇冗长而内容混乱的社论，文章断言，英国军队从南高加索撤走不仅意味着英国人的崩溃，而且意味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崩溃。当时在狱中的共产党员认为这篇文章是错误的，是与我党的政策背道而驰的。过了两天出现了以“达尼尔松”为笔名的萨尔基斯的文章，它基本上正确地批评了洛米纳泽的观点。过了一天我们又读到了洛米纳泽的答辩文章。报纸上的这场辩论对我们大家来说是这样突然。我们从狱中给外面的同志写了一封内容相当尖锐的信件，信中谴责了这场当时不必要的，甚至对我党的工作是有害的辩论。就问题的实质而言，我们表明同意萨尔基斯的观点，而不同意洛米纳泽的立场。我们要求立即停止辩论。同志们自己也意识到犯了错误，因此

辩论停止了，分歧未造成损失就被消除了。

在这次被捕之前我是不吸烟的。和我一块坐牢的同志都吸烟，而且吸的很多，特别是果戈别里泽。他劝我学抽烟，我坚决不抽，我说这没有一点好处，我对吸烟没有任何兴趣。当然，那时我不是考虑自己的健康。果戈别里泽坚决要使我相信吸烟使人感到很大的愉快。他是一个很出色的鼓动员——只要回想一下那次洗澡和到饭馆里吃饭的事就知道了。这一次我又听从了他的劝告，开始抽一点烟了。最初我还不喜欢这玩艺儿，但渐渐地我也上了瘾。这是后话了。从这以后我连续抽了十二年的烟，这样影响了我的身体健康，我才坚决彻底地戒了烟，以后一直再也没有抽烟。

果戈别里泽显然是因为年轻和性格特别活泼，有些几乎是孩子气的顽皮。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我们这间在五层楼上囚室的窗户开得非常高。要站在方凳上，才能看到平房的平坦的房顶，哨兵在那上面来回走着监视牢房的窗口。我们囚室里只有一个方凳子。果戈别里泽把它放在窗子跟前，站在上面久久地看着哨兵。等到哨兵朝对面方向走去的时候，果戈别里泽大声地喊他：“阿斯科尔，哎，阿斯科尔！”（阿塞拜疆语——士兵）哨兵转身回来，果戈别里泽就很快地弯下身子。哨兵没看见窗口上有什么人，就继续走动。一找到合适的机会，果戈别里泽就重复自己的叫喊，这样连续多次。由于这种喊叫士兵简直要气疯了，他老是举着枪，寻找向哪个窗口开枪，但

他谁也看不见。果戈别里泽就高兴得哈哈大笑。我劝他停止这种淘气，说道：“列万，你应该明白，你用叫喊刺激士兵，他会有什么过错呢？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履行军队的命令，执行任务，对你并没有什么妨碍。而你偏戏弄他，弄不好他真会开枪的。他未必打中你，但如果子弹头穿过窗子碰到囚室的天花板上，就可能弹回来打中咱们当中的哪个人。这样做不好，何况也很危险。”只是经过这样劝说以后，果戈别里泽才停止了嘲弄士兵的把戏。

我们经常在想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才能得到释放。外面的同志们在为此而努力，但暂时他们没取得什么成效。记得有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一向很严肃的尤里·菲加特涅尔象演说家在讲台上一样，皱着眉头，很生动地作着手势说：“应当向工人提出口号，提出口号！”果戈别里泽立即响应，他幽默地模仿着尤里重复说：“应当提出口号，提出口号！”我们都笑了。我们笑不只是因为果戈别里泽很滑稽地模仿菲加特涅尔，而且也笑尤里的建议。这个建议在当时的条件下简直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不怀疑作为工人代表会议主席的果戈别里泽反正能够获释的。外面的同志为此正在采取一切措施。因此，为了果戈别里泽而去召集工人举行游行，“向他们提出口号”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其他人，这个建议也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在狱中都用的是别人的名字，这些化名对巴库的无产阶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说出我们的真实姓名又会给自己造成很大的危险。需要用其他方

法。我们不怀疑我们的同志们将为此进行一切必要的工作。况且，当果戈别里泽释放以后，他自己也将投身于这一工作。

无论是在巴依洛夫监狱，还是在这里，象对其他犯人一样，还是不让我们到院子去放风，我们整天坐在牢房里。

每天在规定的时间内把所有的犯人放出来上厕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其他被捕者，刑事犯；他们对我们象对“政治家”一样地尊敬。况且果戈别里泽闻名全城，享有很高的威望，而我们又是他的同志。有两个格鲁吉亚人对我们特别关心。我们的看守是一个上了年纪、性格相当善良的俄罗斯人。有时，甚至看他觉得可怜，犯人不理睬他的命令——上厕所后应立即返回自己的牢房。他们对他毫不理睬；互相之间继续谈话，他下命令，但犯人都听他的。

记得我们刚来这个监狱的第一天有这么一个场面。我们觉得很奇怪，这里看守和犯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多么奇特的关系：看守由于无能为力，对付不了犯人，差一点哭起来。这时，突然一个中等个子，三十岁左右体格强壮的格鲁吉亚人，外貌很有意思，面带着倔强刚毅的神气，看来是在其他犯人中受到尊敬的人，他想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突然喊道：“你们胡闹什么，魔鬼们！马上回自己的牢房！”这些话说得这样威风，带着不容反驳的口气，大家顿时平静下来，默默地散开各回各的牢房了。当时

我们坐在自己的囚室里，通过敞着的房门目睹了这一场面。这个格鲁吉亚人走近我们的牢房说道：“知道吗，就是这样一批胡作非为的家伙，如果你不干涉，什么秩序也不会有，看守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然后他走进我们的牢房，问我们有没有烟。果戈别里泽给了他卷烟。他吸着烟，于是我们交谈起来。他保持非常尊严的样子。

他走后，我们讨论了很久，这个刑事犯有什么长处使他有可能对其他犯人有这样的权力。而且不仅对于他们，因为不久我们就确信，连看守对这个人也是特别尊重的。

有一次我们囚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看守进来通知说，他奉命要带我们五个人到监狱的院子里去照像。这对我们来说并不完全是愉快的，因为在狱中他们可能从像片上认出我来。而我们出狱以后，警察局的密探就更容易监视我们。我向果戈别里泽谈了这个想法，他同意我的看法并建议设法让像片拍不成。当把我们带出牢房时，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格鲁吉亚人，总是在果戈别里泽周围转来转去，同我们一起走到院子里。在我们下楼梯的时候，果戈别里泽用格鲁吉亚语和他谈了些什么，还给他解释了些什么。果戈别里泽小声地对我说，他和这个同乡说好了，让他把给我们照了像的那些底板曝光。对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我们共有五个人，可院子里没地方可坐，只得都站着。不知为什么这样的合影使摄影师不

满意，于是，我们当中有人拿了两个扔在院里的锈桶，把桶倒放当作“椅子”。我和菲加特涅尔年龄稍大一些，就坐在这两张“椅子”上。其他的人站在我们的背后。照像结束后，我们就和摄影师天南海北地大谈起来。摄影师也是个很健谈的人。我们把他紧紧围着。我看见格鲁吉亚人在照像机旁边转来转去。过了一会儿，看样子他结束了自己的“工作”，走到一边去了。看到了这一切以后，我们就巧妙地结束了谈话，和摄影师告别。格鲁吉亚人走近来说：“事情很顺利，把胶卷暗盒弄坏了。”我们感到很满意，一切都搞得这样好。大家都相信我们的合影没有拍成，一直到1920年巴库苏维埃政权成立以后，检查宪兵队档案的同志们却给我们看了他们在那里的档案室里发现的、我们认为没有拍成的那张像片。这一次我们却为像片拍成而高兴。因为不管怎样这张像片使我们非常清楚地回忆起在那过去的岁月里的生活和斗争，这张像片一直保存在我身边。

从外面没有传来任何有关我们要被释放的令人快慰的消息，而从我们自己这一方面也得不出什么明确的结论：宪兵队将会怎样对付我们。早晚要释放果戈别里泽，只有这一点是清楚的。然而为什么把鲍里斯·舍鲍尔达耶夫合到我们一起来了呢？这一点我们不明白。我们认为他们决不会掌握舍鲍尔达耶夫和我们当中哪一个人有什么联系的材料。奇怪的是自从在警察局里审问以后，再也没有对我们当中任何人进行过审讯，侦察还在进

行，可就是不审问我们！

我一直惦记着放在饭馆桌布下面的那些文件。毫无疑问，服务员在收拾餐厅时一定发现了，如果他们把文件交给警察局，那我们的处境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了。

后来知道，服务员在打扫食堂时果真发现了那些文件。但他们即没有把这些文件交给管理人员，也没交给警察局。其中一个服务员把这些文件带到了工人俱乐部，交给了工人代表会议的秘书，以便转交给巴库党委会。这里我想说明：那个服务员并不是共产党员，那时在饭馆的职工中间根本就没有一个共产党员。

很快，我们又转到了监狱的另一处牢房。这里关押着普通刑事犯。这里的走廊要长得多，牢房也大一些。房子和走廊之间不是墙，而是一排带小门的铁栅栏。看守用钥匙把小门都上了锁。每间牢房里都关着许多人。监狱看守把我们关进专门为我们准备好的囚室里，这里没有其他犯人。看守在楼道里来回巡逻，时时刻刻监视着牢房里的动静。只有当他背向囚室时，我们才能悄悄地做点事。而他走近我们的时候，我们甚至很难避着他讲话。

走廊里总是非常嘈杂。囚犯们拌嘴和争论的喊叫声一阵一阵地从囚室里传了出来，甚至还经常打起来。我们被吵闹得头都疼了。到夜里才能安静些。在这里我们直接睡在石头地板上。

过了一天，不知怎的，看守长带着一个家伙到我们这

里来了。看守走近我们的囚室，冲着我问：“你是米高扬吗？”当时我呢，正象平常所讲的，眼睛都没眨一眨，便回答说：“这你是从哪里听来的？我是捷尔-伊斯拉耶梁，我根本不认识米高扬。”果戈别里泽也插进来说：“难道你还不知道，米高扬早就在梯弗里斯了。他是从这里越狱逃出去的，现在还在那儿呢！”于是，我们的谈话就到此结束。

他们走后，我们就议论起这个情况来了。显然，已有人认出我了，但到底是谁呢？我们是否打消了看守的怀疑呢？他真的相信米高扬在梯弗里斯吗？有可能他不相信。他要把我查清并不费事。在警察局里可以找到认识我相貌的人。果戈别里泽特别担心。他建议往外递个条子，要我们的同志派一个人赶紧找到这个看守，威胁他一下，就说，如果他向上报告狱里政治犯的任何情况，并使得他们的处境变坏，那他要当心自己的脑袋。而如果他保证不这样干，那他就会得到一笔钱。事情就这样办妥了。以后查明，正是那个看守认出了我，但他保证不说出去。

又过了两三天，看守长来通知释放果戈别里泽。这使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果戈别里泽同我们告别时，要我们别泄气，他一定想办法尽快营救我们。

过了一个星期，果然看守来通知说，我们中间有三个人获释，而在监狱里只有鲍里斯·舍鲍尔达耶夫了，他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关于鲍里斯的这个消息是个很不愉快

的消息，尤其是他的工作与我们军事侦察机关的活动直接有关。我们为他的处境非常担心。同时也知道，要救出他将要克服多么大的困难，但是表面上我们没有流露出担忧的情绪，因为我们一直假装着彼此不认识。

释放我们时，监狱长宣布说：“阿塞拜疆政府不想让你们留在阿塞拜疆，”要把我们驱逐出境。

给了我们三天时间作准备。我们甚至也不能反对，因为被捕时，我们是假装不久前为了寻找工作而来阿塞拜疆的。

就在那一天，我们在卡斯帕罗夫家这个秘密联络地点和自己的同志见了面，讨论了“根据当前的政治局势我们应该到哪里去”的问题，决定从安全的角度出发，最好去格鲁吉亚或亚美尼亚。委托多夫拉托夫到这两个政府在巴库的代表机关去为我们办理必需的签证。多夫拉托夫首先找了亚美尼亚代表机关，然而，遭到了拒绝，它不接待我们这些布尔什维克。

格鲁吉亚代表机关发给了我们三个人入境签证，为了不引人注目，我们决定分别离境。同志们怕阿塞拜疆政府知道捷尔-伊斯拉耶梁就是米高扬，担心阿塞拜疆政府在路上要对我进行迫害，就决定让国会议员卡拉耶夫护送我到边境。卡拉耶夫是作为议员因公务出差到边境地区去的。我们就象互不相识的人一样，坐在同一节车厢的单间里。一个阿塞拜疆的警察押送我去边境，但他看到国会议员坐在我旁边，就没进来，几乎一直站在

过道里。卡拉耶夫走到过道警察的身边，用阿塞拜疆语同他兴致勃勃地谈起话来。看来，取得了警察对他的好感。当我同卡拉耶夫“认识”了以后，要了茶水，也没忘记那个警察。一切都进行得很不错。

一路上当车厢里剩下两个人时，我同卡拉耶夫进行了亲切的交谈。他是一个讨人喜欢、有学问而又朴实的人，并且是一个很健谈的人。他谈了许多他的经历，谈到他怎样在梯弗里斯工作，也谈到来巴库的情况。我以前就认识他，但这一次我特别珍视他那种极其诚恳的态度。总的说来，我是亲眼看着他一步步地转到布尔什维克这方面来的。在复杂的环境下，他表现得很好，完全是一个坚定、沉着的政治活动家。

到了格鲁吉亚边界，我们需要转乘另一列格鲁吉亚火车。押送我的警察遵照指示，应正式地把我交给格鲁吉亚警察当局。我当然非常不愿意这样做。如果我能作为一个买了梯弗里斯火车票的普通公民来换乘去格鲁吉亚的火车，以致格鲁吉亚警察当局从最初就不知道我是一个被驱逐到他们那里去的人，那就好多了。于是卡拉耶夫又请押送我的警察到车厢里来喝茶，同他进行友好交谈。国会议员的盛情厚意使警察感到受宠若惊。在谈话结束的时候，警察完全软化了，卡拉耶夫对他解释说，一般说来，押送被驱逐者到他确实离开阿塞拜疆边界，就算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完全不必要“亲手直接”把我交给格鲁吉亚警察当局。警察爽快地同意了，当我们到了边

界车站时，卡拉耶夫和警察只是把我送到格鲁吉亚的列车旁，我上了那辆车，和他们告了别，火车就开动了。警察亲眼看到，我确实“被驱逐出境”了。

在梯弗里斯呆了几天以后，我改换了姓名，又秘密地回到了巴库，参加了地下党的工作。

而在这段时间内，果戈别里泽和卡拉耶夫受边区党委会的委托，在尽力设法营救鲍里斯·舍鲍尔达耶夫出狱。他们对检察长和能决定此事的其他官员们，采取了各种方法来施加影响。根据各方面情况看来，当局并没有掌握什么对舍鲍尔达耶夫特别不利的有分量的材料。实际上，他也没有任何反对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的行动。以他为首的侦察机关始终是在邓尼金匪徒的后方进行活动。所以阿塞拜疆当局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把舍鲍尔达耶夫的案件扩大化。

舍鲍尔达耶夫的一张纸条很使边区党委员会巴库局担心。在这张纸条上写着，刑事犯们开始找他的麻烦，向他要钱，否则就要惩治他。（舍鲍尔达耶夫通过我们的青年同志经常收到外面送来的一些食品。看来，刑事犯们认为鲍里斯是个有钱人，于是对他进行勒索。）鲍里斯在纸条上还写着：即使给这些刑事犯们一笔钱，也是无济于事的，恫吓和勒索还会继续下去。因此他没有要钱，而是请求采取比较能根本解决问题的措施。这封信使我们很担心。果戈别里泽承担了对他进行帮助的责任。

果戈别里泽了解巴库刑事犯中的某些习俗和“传统”，于是就通过认识的那位饭馆老板，同一个刑事犯们都有点害怕的格鲁吉亚人进行了会面。

同这位格鲁吉亚人的谈话产生了效果。

没过多久收到了舍鲍尔达耶夫一张纸条，他说，发生了“奇迹”：不仅没有威胁他，而且刑事犯们对他很恭敬。他摸不着头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终于把舍鲍尔达耶夫从狱中营救了出来。当他知道我们是怎样作出这个“奇迹”时，他愉快地笑了。

阿塞拜疆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

“古墨特”和“阿达列特”；在英国士兵中进行的政治工作；把合作社争取到我们方面；资产阶级政府的恐怖行动；南高加索共产主义青年代表会议；给库泰依斯狱中的米哈·齐哈卡雅致敬电。

巴库工人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了。由于普遍的通货膨胀，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了。开采出来的大量石油卖不出去，石油的开采量逐渐缩减，资本家当然还得支付石油生产的费用，而实际上却得不到必要的收入。有些资本家靠银行的帮助还能勉强维持着，另一些可就破产了。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在五月罢工期间许下的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诺言，果然不出所料，成为一句空话。那

些相信政府而未支持罢工的工人们大为失望，大家都看清楚了这个骗局。

在这种情况下，“古墨特”和“阿达列特”积极开展工作，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这两个组织由于工人积极分子的参加显著地扩大了，对阿塞拜疆地区的巴库无产阶级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俄共(布)各区的党组织对党员加强了教育工作，他们在工会中的阵地得到了巩固。作为党的宣传基地的工人俱乐部的活动以及对我们来说还是新事的工人消费合作社的工作，都大大活跃起来了。

武装起义的准备正在顺利地进行：制订行动计划，训练干部，收集武器。

提出了建立独立的、与南高加索各共和国保持密切联系的苏维埃阿塞拜疆的战斗口号。这个口号宣布以后，我们，尤其是我，最关切的就是党的组织方面的问题了。

当时在我们阿塞拜疆还存在着重叠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进行武装起义看来是不可能的。

我已经说过，“古墨特”和“阿达列特”两个组织联合了穆斯林共产党员。而这两个组织又都隶属于我党巴库委员会。“阿达列特”主要是在巴库和穆干进行活动，而“古墨特”的活动却遍及整个阿塞拜疆。巴库委员会则对整个党的工作实行全面领导，同时协助达格斯坦的党员。

还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阿廖沙·查帕里泽就对“古墨特”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个组织出席大会的代表尤

西弗扎杰请求给它物质上的帮助。维·巴·诺金支持他的请求。查帕里泽接着诺金发言，他说：“这个组织有自己的名称，但请不要认为这是在我们的组织内出现了第二个‘崩得’。

从开始到现在‘古墨特’和我们党的组织都是亲密无间的。”查帕里泽进而保证说：“‘古墨特’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为了把阶级觉悟灌输到穆斯林工人群众中去，为了把他们和俄国革命的无产阶级联合在一起，为了这一事业它还要忘我地工作。”

果然如此，“古墨特”象“阿达列特”一样，在引导穆斯林劳动群众参加革命运动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而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提出了新的任务，这些任务的解决要求实行全党统一的组织原则。这一点在夺取政权前夕显得特别尖锐。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作为苏维埃阿塞拜疆领导核心的党组织应当成为一个怎样的组织。

具体说来，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更为恰当地签署向工人、农民发出的起义号召书呢？

如果号召书只是由一个组织发出，那就难以指望它发生效力。如果把“巴库委员会”、“阿达列特”和“古墨特”的名称都签署上，那广大群众就会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三个署名。

把阿塞拜疆所有的共产主义组织合并为一个组织的思想经过酝酿终于完全成熟了。我们确信，这个组织应

该是统一的阿塞拜疆共产党，它要团结所有的阿塞拜疆共产党人，并成为俄国共产党（布）及其全高加索边区组织的组成部分。

组成这样一个统一的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共产党员的支持。于是，这个问题就提交给大组去讨论，“古墨特”，“阿达列特”和我们布尔什维克党巴库委员会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讨论。

开始，意见发生了分歧。“古墨特”最有威信的领导人之—卡拉耶夫主张保留“古墨特”作为全阿塞拜疆的组织（他设想把“阿达列特”也合并到“古墨特”），同时保留独立的俄共（布）组织（俄共（布）组织与统一的“古墨特”并存）。另一个威信也不低的“古墨特”领导人米尔扎·达乌德·古谢伊诺夫则建议取消“古墨特”和“阿达列特”，建立一个与俄共（布）组织并立的突厥共产党。

在这次会上发言的我们巴库党委成员中有一些同志既不同意卡拉耶夫的意见，也不同意古谢伊诺夫的意见，而认为必须取消“古墨特”和“阿达列特”，把这两个组织的所有成员都并入俄国共产党（布）。

过了不久我们才知道，“古墨特”的著名领导人之一 C. M. 埃芬吉耶夫在巴库苏维埃暂时失败而撤退到莫斯科以后，于 1919 年 7 月 26 日在《民族生活》报上发表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目前，扩大‘古墨特’组织活动范围的条件已经成熟，因为社会主义的俄罗斯需要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东方千百万人民群众中去。”

不仅旧俄罗斯帝国的穆斯林需要，而且波斯、土耳其、阿富汗和其他国家的穆斯林也需要组织起来和进行党的工作。这个任务现在就落在‘古墨特’的身上，它是东方共产主义的战鼓。”

读了这篇文章，我们都感到非常惊奇：怎么可以按照宗教的特点提议把各民族所有的穆斯林，而且不仅是俄国的，还有东方其他国家的穆斯林都联合到“古墨特”里来呢？

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和讨论我们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这就是阿塞拜疆所有的共产党员，不管他们是那一个民族的，都应该加入一个统一的共产党。

当我们把这个问题提交党的边区委员会梯弗里斯局讨论时，他们不支持我们的意见，因为梯弗里斯的同志们对现状不愿作任何改变。当时在格鲁吉亚仍然保持着一切地方组织直属高加索党的边区委员会，在格鲁吉亚不设领导中心的旧体制。

亚美尼亚共产党人的情况有些特殊。因为还在1918年中期以布尔什维克诗人阿伊库尼为首的一批亚美尼亚共产党人就成立了亚美尼亚共产党，以便在西亚美尼亚人（由于俄军撤退他们也离开了土耳其）中间进行工作。他们在梯弗里斯出版自己的报纸。当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加强了反对共产党的恐怖活动时，这个小组就转移到北高加索，因为那里有苏维埃政权。后来，他们同红军部队一起离开了北高加索，以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的身分驻在莫斯科，并作为一个独立的党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但是，这个小组虽然自称为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然而它却同南高加索，特别是同亚美尼亚没有任何联系。他们是在苏维埃俄国进行工作，即在当时居住在莫斯科、萨拉托夫和中俄罗斯其他城市的那些亚美尼亚共产党人中进行工作。应该指出，他们得到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承认和支持。

我们在高加索关于他们的活动毫无所知，而他们自己也没有让人知道他们的情况。只是在1919年秋天我们才知道，这个中央委员会以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领导机构自居，不经我们边区党委的批准，就集合了一批共产党员，准备派他们经过阿斯特拉罕和巴库去亚美尼亚领导当地的党组织。

当时在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工作的共产党人都一致谴责阿伊库尼这些人的立场，谴责他们无视南高加索各共和国共产党的真正领导核心——南高加索党的边区委员会。这些共产党人都不愿意同阿伊库尼一起工作。

在这以前，亚美尼亚共产党人决定成立一个领导亚美尼亚共产党组织实际活动的中心——亚美尼亚委员会，它作为俄共(布)的一个州委员会，在党的边区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

记得，我们巴库共产党人表示赞成象阿塞拜疆一样，成立统一的亚美尼亚共产党。同时，我们与亚美尼亚共

产党人一起拒绝承认阿伊库尼这伙人成立的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我们认为中央委员会应该在亚美尼亚共产党成立大会上，或者在亚美尼亚党组织代表会上，经合法选举产生。

建立统一的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问题(象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一样)最后应由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来决定。

我们懂得，在这条道路上还存在着很多困难、争论。但是，我们坚信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

* * *

庞大的占领军警备部队驻扎在巴库，使得我们不得不和英国士兵进行必要的接触，向他们说明我们的观点、想法和任务，戳穿英军指挥部极力推行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虚伪宣传。这个问题在五月总罢工的准备期间变得尤其尖锐，因为英军指挥部可能要用他们的军队来对付我们。

我们只有两名年轻的翻译，而他们的英语又不行。我们通过阿斯特拉罕多次向党中央请求，从共产国际中派两、三名英籍的党员来，以使用他们来作政治工作。最后，好象是在6月份，来了这么一位名叫杰克的同志。

此人不太年轻，老是叼着个烟斗，他沉着，冷静，甚至有点冷淡。他的俄语水平达到完全能自由交谈的程度。我见过他好几次，向他介绍情况，给他讲在英国警备部队中进行宣传工作所面临的任务。我们交给他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就是在英国警备部队中建立共产党支部。在

这方面我们和他没有发生过任何分歧。

在向杰克说明他面临的任务时，我建议他利用英国士兵疲于战争，厌恶服役，急于回家，缅怀乡土的情绪来进行工作。

然而，英军司令部的首脑们也看到了，在巴库的这种形势下，他们的士兵正在涣散瓦解。因此，他们就相当频繁地大批调换士兵。这就使我们在英国士兵中建立的共产党支部常常被拆散，因而不得不常常重建组织。

有一次，我请杰克带一个英国党员士兵到我的秘密住处来谈话。我是想对于“活生生”的英国士兵党员有个了解。

杰克给我带来一位年青的英国兵。他身材高大，举止端庄，表情严肃，穿着一套白色的殖民军夏季制服，不穿普通的长裤而却穿短裤。客气一点说，当时我们觉得这身制服相当古怪。可这毕竟还是制服。

他聚精会神地坐在我的对面，那副拘束的样子表明，他不是准备进行同志式的谈话，简直象是在长官面前等待命令似的。

我向他提了几个问题，杰克作翻译。我问他何处生人，入伍前干什么，有家没有。之后就详细地问他，是什么因素使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在这方面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同时，还问他所在的部队其他士兵的情绪。他回答得清楚明白，谨慎而又简单，没有一句废话，没谈任何细节。

我们的谈话内容不算丰富。我记得，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问题在什么地方——是特殊教育的结果，还是英国人的特殊性格，还是什么别的原因。我只知道我们谈不拢，因此也就没有留他再谈下去。看起来，要想谈得好，他需要事先在精神上有某种准备。而当时却没有这个准备。当然，一般说来，这是一个讨人喜欢，不算糊涂的小伙子。我向他表示感谢，这样我们就分了手。

当时杰克在英国士兵中开展了大量的工作。1919年8月的下半月，英军撤离了巴库。巴库的《阿塞拜疆》报曾报道：8月24日在“大都会”饭店大厅，阿塞拜疆政府为英军指挥官举行了告别宴会。所有的部长、议员和外国代表都出席了，政府首脑乌苏别可夫和英国沙捷卢奥尔特将军互致“亲切的”祝酒词。

* * *

我在前面已说过，巴库党的工作者维克托·纳涅伊什维利、加米德·苏尔塔诺夫及达达什·布尼阿特扎杰在1919年7月底从阿斯特拉罕来到我们这里。他们都是些党内有经验的老同志，在巴库的苏维埃政权遭到暂时失败以前，他们一直在那里积极开展活动。维克托·纳涅伊什维利在巴库党委会中积极工作。1918年5月当达格斯坦的反革命势力开始抬头时，他被派到那里担任达格斯坦地区的特别委员，并被授权指挥帮助巩固达格斯坦苏维埃政权的赤卫军。由于巴库和达格斯坦苏维埃政权遭到暂时失败，纳涅伊什维利和一些同志只好去阿斯

特拉罕。苏尔塔诺夫在加强巴库赤卫军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布尼阿特扎杰积极协助建立和巩固巴库县的农民苏维埃，领导当地人民和反革命进行斗争。

我们对于纳涅伊什维利、苏尔塔诺夫、布尼阿特扎杰重返巴库感到很高兴。这是第一批从阿斯特拉罕到阿塞拜疆来工作的著名的巴库共产党人。

有一天夜里，我们代表当时巴库党的领导，在黑城一个工人家里和这几位同志在小范围内开了一个会。在这一次会议上，要我给他们介绍巴库的整个形势和当时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我们希望新来的同志们尽快地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并迅速地积极开始工作。

同志们的到来使我们有可能在最近的日子里加强阿塞拜疆各县的工作。那里反对地主的农民革命浪潮汹涌澎湃，党组织正在努力领导这次运动。

苏尔塔诺夫和布尼阿特扎杰被委派到阿塞拜疆内地。他们的到来使农民运动更具有组织性了。布尼阿特扎杰、卡拉耶夫、古谢伊诺夫、纳涅伊什维利和尤西弗扎杰在哈萨克城召开的农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很成功。他们使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这给木沙瓦特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们的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但结果他们却成为少数。大会的成功是一个征兆，它反映了整个阿塞拜疆农民的情绪。

毫无疑问，纳涅伊什维利、苏尔塔诺夫和布尼阿特扎杰都是我党卓越的活动家。他们以后的工作也有力地证

实了这一点。1920年，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恢复以后，他们之中的两个人(苏尔塔诺夫和布尼阿特扎杰)进入阿塞拜疆第一届革命委员会。而在以后的年代里，他们又都担任了阿塞拜疆苏维埃政府的高级领导职务。纳涅伊什维利被选入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担任书记。

* * *

1919年6月或7月，里海合作社联合会的理事希加·约涅阿相向工人代表大会的秘书提出请求，说有要事要和我见面。

约涅阿相到我这里来了以后，向我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计划。

他说：“很快，我们合作社联合会理事会就要改选了。在本届理事会里，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只有我一个人，大多数都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这次理事会选举中，如果能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的话，布尔什维克完全有可能获得多数票。”

合作社联合会有好几千人，但其中许多人都很消极，甚至不参加会议。譬如说，参加这次改选会议的人数就未必能超过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约涅阿相进一步谈他的计划说：如果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有八百至九百名布尔什维克加入到我们的合作社里来，并都参加这次改选会议，那么共产党就很有把握获得多数票。这样，联合会的领导权转到共产党人手中也就有保证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对合作社工作的了解是非常模糊的。

从同约涅阿相长时间的谈话里我明白了，由于我们对合作社的工作估计不足，犯了多么大的错误！要知道，合作社就意味着在面包房、商品仓库、商店和采购站工作的大批劳动人民群众。有了合作社，我们就能把自己人合法地派到各个地区去。

能够利用这一切来为我们党的秘密工作服务，这该多么好啊！能够利用面包房和商品仓库来保藏武器，利用商店来保存和散发党的文件，这该多妙啊！把党的组织工作干部分布到各合作社中去，在他们因公外出时就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建立联系和秘密联络点以及完成其他类似的工作，这又该是多么巧妙啊！

谈话的结果立即向巴库党委作了汇报，这次汇报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同志们惊奇的是：怎么我们在此以前竟未想到这点。于是，马上就作出决定，号召上千名共产党员和青年共产主义组织的成员，即巴库及巴库各区的青年工人国际主义联盟的成员，参加合作社。组织加入合作社及在社员中开展工作的任务就交给了我们最有经验的组织者萨尔基斯，瓦夏·叶戈罗夫和伊塞·多夫拉托夫。特别是多夫拉托夫应负责利用合作社这一机构来实现党的各项意图。

巴库委员会的决定顺利地执行了。在里海联合会的选举大会上保证了共产党员的可靠多数。在表决新的理

事会和监事会的成员时，通过了我们提出来的名单。

这一切完全是出乎孟什维克意料之外的，然而他们认为这纯粹是偶然的，因此宣布这次选举为非法的，并决定重新召开改选会议，他们想尽办法来动员他们的成员，但是仍然没有成功。在第二次会议上，与孟什维克所作的一切努力相反，上次的决议仍被多数票所确认。孟什维克没有别的出路，他们不得不把工作移交给新的理事会。

这是我们一次巨大的政治胜利。后来这个合作社组织在开展党的工作和准备武装起义方面，给了我们不少的实际帮助。

* * *

在9月初的一天，正当我们准备去梯弗里斯参加党的边区委员会的例会时得知，从阿斯特拉罕来的一只载有人员、文件和武器的小船落到了阿塞拜疆警察局的手里。必须想尽办法进行营救。

这最好通过穆谢维来进行。因为他是阿塞拜疆政府反谍机关的长官，我们和他有联系。

1918年的下半年，穆谢维就参加了“古墨特”，但他和卡拉耶夫一样，很快就表示希望加入共产党。我们吸收了他，但这件事我们要他在任何场合对任何人都不要讲，要和原来一样。因为对于这一点我们有自己的打算。

我们主要要穆谢维完成三方面的任务：当我们和阿斯特拉罕的联系一旦遭到破坏时，帮助营救人员和物资；向我们汇报政府方面为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而准备

采取的一切手段；向我们报告一切有关邓尼金的奸细在阿塞拜疆活动的情况以及邓尼金和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往来的情况。

我们和穆谢维约定，由工人代表会议的合法工作人员果戈别里泽和他接头，向他传达任务和从他那里收取情报。

因此，当我们去梯弗里斯的时候，就委托果戈别里泽把被扣留的人员和东西从警察局的魔爪下营救出来。为此，决定把他留在巴库。他很理解这项任务，并高兴地留了下来。

过了两天，我已经是在梯弗里斯了，我们从巴库来的电话里得知那里发生了非常事件。在9月5日夜里12点，穆谢维、阿舒姆·阿利耶夫在“新世界”饭店被杀害了，列万·果戈别里泽受了重伤，杀人凶手是以前副省长的堂兄弟谢伊德别科夫。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我们立即动身去巴库，在穆谢维、阿利耶夫安葬后的第二天就到了那里。

果戈别里泽身上有两处被子弹打穿：一处，子弹打中腹部，从肝脏穿出；另一处，打中肩部。他的伤势虽如此严重，幸而生命没有危险。

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的直接代理人对穆谢维和阿利耶夫进行的暗杀行为，震动了巴库所有的工人。当穆谢维和阿利耶夫安葬时，巴库工人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

游行。大家告诉我们就在举行葬礼的这一天，工人们从早晨就到工人俱乐部集合，几千工人成群结队从这里涌向停放着牺牲者遗体的最大的穆斯林清真寺。在清真寺院子里举行了群众集会。会上阿比洛夫、洛米纳泽发了言。大会后，工人的游行队伍沿尼古拉耶夫大街前进，经过国会，在那里发表了声讨刽子手的愤怒的演说，在穆斯林公墓举行安葬，那里又组织了第二次群众大会。

穆谢维和阿利耶夫的被暗杀，强烈地影响了巴库的穆斯林居民。在阿塞拜疆的工人和职员中间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不满情绪更增强了，而布尔什维克“古墨特”的威信大大地提高了。

穆谢维一死，当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还得感谢穆谢维，由于他，我们在政府反间谍机构中保留了自己的人，我们后来仍然能够长期地得到这些人的帮助保持和发展我们同阿斯特拉罕的联系。

果戈别里泽的体质健壮，恢复得相当快。两周以后他就出了院，并且开始工作。他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这个事件的全部经过。

当我们通过穆谢维的帮助，把从阿斯特拉罕来的同志从警察局营救出来以后，果戈别里泽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和穆谢维谈一谈。为此果戈别里泽来到“新世界”饭店，在那里他装作偶然遇见了穆谢维和阿利耶夫，于是作为一个熟人他就在他们的桌旁就坐。果戈别里泽要和穆谢维谈的话很简单。在谈话就要结束的时候，在饭店里

出现了一个阿塞拜疆政府的军官和一个男人。他们在邻近的桌旁就坐。这两个人一出现，穆谢维就把话题一转，诙谐地谈起邓尼金分子和布尔什维克来，而且声音大得连旁边的人都听得到。

那个来到这里的军官也插嘴讲起来。他说话很放肆，显然是想挑起一场争论。这时，与穆谢维和果戈别里泽同桌的阿利耶夫看到争论就要变成争吵，不想和这个他早就认识并且恨透了的家伙再谈下去，就对穆谢维说：“让我们下次找个清静地方再谈吧！”

军官找了个碴儿，装作受了侮辱的样子，打了阿利耶夫一个耳光。这样一来，他们便打了起来。果戈别里泽用劲地拉开他们，把军官拖到一边。但是，军官突然拔出了手枪。这时，果戈别里泽急忙跳到他跟前，一把抓住了他持枪的那只手，并将自己的手指伸到了扳机的后面，不让军官开枪。但是，那个家伙从果戈别里泽手里挣脱了出去，将果戈别里泽推在一边，便向阿利耶夫开了枪。

然后，军官又对果戈别里泽开了枪。从桌子那边站起来穆谢维还没来得及掏出手枪，一颗子弹就把他打死了。之后，军官又向果戈别里泽开枪。他认定果戈别里泽已经死了，就走掉了。果戈别里泽开始呼救，但无人答应。

果戈别里泽说，一会儿，他迷迷糊糊地看到来了一个警官。这个警官并不向在场的人详细询问出事的情况，而是自己编造了一套关于这件事情的说法，并极力想把这种说法强加给目击者。他说：“这件事我比较清楚。这

儿来了个士兵，想逮捕阿舒姆·阿利耶夫这个连科兰的布尔什维克。穆谢维提出抗议，并向他开枪。于是，那个士兵为了自卫，开枪还击，把三个人都打死了。”

果戈别里泽听到了这一切，愤怒地喊道：“您在撒谎！您这样捏造不觉得可耻吗！”警官转过身来，见果戈别里泽还活着，便挖苦地说：“啊！原来您还活着呀，果戈别里泽先生？”

很快，市行政长官古基耶夫也来了。看见负了伤的果戈别里泽，他傲慢地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来：“哼！活该！”

过了三个多小时，警察们才把果戈别里泽拖进了敞篷警车，把他送进了医院。但是，在医院里，直到早上六点钟才给他进行治疗。后来，医院里来了个叫奥金舍维奇的外科大夫，他为抢救果戈别里泽尽了一切努力。

全城各区，抗议白色恐怖的大规模工人集会接连进行。这些集会的性质，可以从巴库黑城区工人集会上所通过的决议中看出：“我们黑城区的工人，讨论了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关于我们的穆谢维和阿舒姆·阿利耶夫两同志被害、工人代表大会主席果戈别里泽同志受致命重伤的公告，我们抗议对工人阶级领袖实行的白色恐怖，并声明：我们决不能容忍这种野蛮行径，将竭尽全力同资产阶级刽子手作斗争。我们要求依法严惩杀人凶手。我们要求把一切公开和暗藏的邓尼金的走狗从阿塞拜疆共和国

驱逐出去。我们宣布：在安葬那一天，我们将在黑城所有的工厂里停止工作。我们号召巴库城的工人对杀害工人阶级领袖的刽子手和杀人犯给予应有的回击。处死一切刽子手和杀人犯！打倒一切公开和暗藏的邓尼金走狗！”

在刚刚发生的惨案的直接影响下，我们的一些同志在讲话中，在报纸上，号召以红色恐怖来回答白色恐怖。

在边区党委讨论这一问题时，我们对这些同志说，尽管从人之常情来说，他们的要求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政策观点来看，我们不能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代表人物采取报复性的恐怖行动。“我们党原则上反对把恐怖行动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你们很清楚。”我们对他们说，“在当前的情况下，我们要坚持党的这条路线。”同志们对此都表示同意。

然而，联系到这件事，也许应该谈一下，根据党的审判会的决议，我们曾不得不采取措施干掉两个叛徒。事情是这样的。1919年春，我们从监狱回来不久，出现了格洛瓦尼问题。这个问题是斯图鲁阿提出来的，当时果戈别里泽也在场。

从作为专职的党的工作人员在巴库开始做党的工作时起我就认识格洛瓦尼。当时因为没有住所，所以我在巴库党委会办公室里住宿。

格洛瓦尼被认为是一个老的社会民主党人，表现很好，很谦虚。他也没有住所，因此，跟我一起睡在党委会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

我们偶然得知，在巴库的苏维埃政权暂时失败而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上台以后，在先是土耳其、后是英国占领的情况下，格洛瓦尼曾到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的反间谍机关里干过事。

这一事实是斯图鲁阿查明的，他也认识格洛瓦尼。

这个消息不仅使我们大吃一惊，而且还包含着严重的后果。格洛瓦尼很了解我们，他在反间谍机关干事会出卖很多人的。斯图鲁阿告诉说，格洛瓦尼不久前遇到了一个名叫玛罗的女党员（他是在党的工作中认识她的），死皮赖脸地要到她那里去作客。那时，我们党的有经验的干部还很少，而如果格洛瓦尼继续他的“活动”的话，就会使我们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格奥尔基·斯图鲁阿建议，让他去消灭这个危险的叛徒。他打算去见格洛瓦尼，请他到饭店去喝咖啡，就在那里药死他。

我们同意应当摆脱格洛瓦尼，并委派斯图鲁阿和其他两个同志一起组织对格洛瓦尼的审判。至于斯图鲁阿提出的由他本人执行判决的建议，我们断然拒绝了。因为他是巴库党的领导成员，如果他遭到意外的话，对我们的组织将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我们决定再次会面，讨论怎样更好地对格洛瓦尼实行惩办。

我当时想起萨法罗夫也在巴库。我在前线，在和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就对他很了解，知道他是个十分勇敢而又无私的人。

我们见面时，我问他能不能找到一个人去完成党的

委托——消灭一个叛徒。萨法罗夫说他很乐意去完成这一任务，他那儿有一些曾和他一起在前线打过仗的可靠的人。

于是，我们让玛罗去邀请格洛瓦尼到她家作客，她家好象是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街上，我们把这个地点告诉了萨法罗夫。

几天之后，我们的这一任务就完成了……

在英军司令部管辖下的里海舰队的军舰上，经过这个司令部进行的人员清洗之后，忠于革命事业的指挥员和水兵就所剩无几了。但是，空额很多，因而我们能够往舰上安插我们的人。

我们把舰队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写信告诉了在阿斯特拉罕的谢·米·基洛夫，谈了我们的想法：如果从阿斯特拉罕给我们派来一些可靠的海军专家和水兵，而由我们把他们安置到舰上去，一般来说，我们能够夺取这些军舰。

对我们信的反应相当快。6月份近三十名技术人员和水手就乘往阿斯特拉罕运汽油的一些小船来到了我们这里。

我们立即安排他们的住所和工作。来的基本上是非党群众，但都是一些倾向革命的水手。

在那时，巴库与中俄罗斯不同，没有禁酒法令，伏特加和葡萄酒可以自由出售。于是来到巴库但没有立即安置好的水手中有些人开始酗酒了，这是十分危险的。为了防止其余的水手酗酒和腐化，我们整顿了纪律。只有一

个年轻的水手不听任何劝告，要求增加津贴，显然是他酗酒的钱不够。我们拒绝了他。于是他威胁要到阿塞拜疆警察局去告发一切。

使人嗅到一种危险恫吓的气味。在巴库党委会上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讨论。我们焦虑不安，决定给这个水手增加几天的津贴，以便先把他稳住，同时派巴库团委书记巴尔哈绍夫专门处理这个问题。过了一些时候，巴尔哈绍夫说毫无进展，这个水手继续进行讹诈，威胁要向警察局告发他所知道的一切。他已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完全腐化的人。于是我们委托团委会对他进行审判。由别索·洛米纳泽协助共青团进行这项工作。

共青团判处叛徒以死刑。这个判决由巴库团委会的一个委员执行了。

现在应该再谈一谈至今我还记得的一件事，那就是我们决定消灭邓尼金司令部的一个头面人物，我们把这看作是给白匪的应得的惩罚。

这是关于处决沙皇将军巴拉托夫的事情，巴拉托夫当时是邓尼金在梯弗里斯的主要代表。消灭巴拉托夫的决议是由边区党委会通过的。委派阿尔卡基·埃尔巴基泽(阿戈尔基亚)和另一个同志(他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去执行这一决议。

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任务还没有执行。

记得有一次我来到梯弗里斯，在和菲·马哈拉泽交谈中，我对这些同志迟迟不执行我们的决议表示不满。

有一次，在梯弗里斯的一条街上碰到了萨法罗夫。他对我说：“我知道你们要打死巴拉托夫，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我也知道你们的人在跟踪、侦察、监视巴拉托夫，但是他们对于执行判决显然是在拖拉，什么也没有搞成。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我一定干掉巴拉托夫”。

我回答说，这件事我们已专门派了人。

但萨法罗夫继续坚持说：“我能把这件事做得又快又准。我监视巴拉托夫已将近两个星期了，我知道他住在米哈伊洛夫大街，知道他什么时候从家里出来，还认识他的汽车，我甚至已选好了一颗可以隐蔽的树，我是一个优秀的射手，一定能打中他”。

我告诉萨法罗夫说，我不能一个人决定这件事，需要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在边区党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我建议派萨法罗夫去执行对巴拉托夫的判决。

我记得参加会议的埃尔巴基泽为此对我很不满意，认为我的提议是对他不信任的征象，他说他们已做好消灭巴拉托夫的一切准备，于是我收回了上述的提议。

过了两天，埃尔巴基泽和一个同志来到我们的秘密住所，说明天他们将消灭巴拉托夫，事成之后就到这里来。

果然，第二天当我走在街上的时候，在齐齐阿诺夫斯基坡道附近听到一声剧烈的爆炸，我明白了，这是我们的同志为了打死巴拉托夫而扔的炸弹。我立即回到住所，因为十分清楚，马上就会开始大规模地搜捕共产党员。

后来得知，当巴拉托夫经过维里斯基坡道时，果真是埃尔巴基泽往他的敞篷汽车里扔了一颗炸弹。将军的副官被炸死，而巴拉托夫本人受了重伤。

埃尔巴基泽开始奔跑，后面有人追，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后背，把他打死在库拉河岸。

* * *

南高加索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彼此没有联系。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从1917年就存在的名叫“斯巴达克”的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在艰难的秘密条件下进行活动；在阿塞拜疆另有一个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名叫巴库及巴库地区青年工人国际联盟。

我们意识到我们在青年中间的工作很薄弱，因而建议巴库青年的领导人同“斯巴达克”的领导同志取得联系，争取召开南高加索共产主义青年代表大会。依我们看，这样的会议应该在巴库举行。这里我们工人阶级的组织相当强大，能为大会提供最好的条件。同时在这里开会会有助于提高工作水平。

我们的这个建议被采纳了。1919年9月22日秘密召开的南高加索共产主义青年代表大会在工人俱乐部里开幕了。有十三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代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的一千三百名成员。当然，这个数目现在看来好象是很少的。但是在当时，这是一股相当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大会正好无愧地、光荣地显示出了这一点。尽管参加会议的代表很

少，会议却始终充满高昂的政治热情。

大会的代表满怀激情地选举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自己的名誉主席，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米哈·齐哈卡雅为主席团名誉成员。

卡拉耶夫、洛米纳泽、阿加耶夫、苏连·阿加米罗夫和我代表我们边区党组织参加了会议。我代表边区党委会向大会致了贺词，并就当前的形势作了工农青年的任务的报告。

会议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各地区的汇报上。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议的代表对各地区的情况很不了解。

在代表格鲁吉亚参加会议的代表中，我很熟悉鲍里斯·兹涅拉泽和加列金·加尔达希扬。

还在革命前我和兹涅拉泽就在马克思主义青年小组中一起工作过。1917年3月我和他一起曾在梯弗里斯这些小组的代表会议上为捍卫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斗争。他是一个有才干的、坚持原则并且完全献身于革命斗争的布尔什维克。久别重逢，我们两个人都很高兴。

还有同我中学的同学加尔达希扬的会面也使我感到非常高兴。那时他就已积极地从事政治工作并在梯弗里斯的“斯巴达克”组织中起着相当显著的作用。苏维埃政权胜利以后，加尔达希扬到医学系学习，后来成为一个有才能的外科医生，是全国有名的外科医生罗扎诺夫亲近的助手之一，随后他又成了亚美尼亚保健人民委员。

也就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和代表亚美尼亚“斯巴

达克”的古卡斯·古卡相见面，并对他有了深刻的了解。除了在大会议上的正式的报告以外，他在个别交谈中详细地给我讲述了亚美尼亚的共产党员和斯巴达克团员在达什纳克党的统治下进行工作的艰苦情况。

古卡相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相当成熟的共产党员。他跑遍了亚美尼亚的许多地区，一面建立斯巴达克小组，同时做了大量的党的工作。以后古卡相在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英勇地牺牲了。亚美尼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至今仍在悼念他，共和国的一个地区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卡拉耶夫代表布尔什维克组织“古墨特”向青年代表大会致贺词，他在发言中特别详细地讲述了在阿塞拜疆工农青年中进行工作的各项任务，同时指出在这项工作中普遍存在着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代表布尔什维克组织“阿达列特”致贺词的阿加耶夫也同样提到这个问题。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简要地阐述了苏维埃俄罗斯的国际形势，也阐述了国内形势和在前线的总的情况。这正是邓尼金在南俄打败红军，而红军则在东线横扫高尔察克匪帮，沿乌拉尔和西伯利亚一线挺进的时候。我表示深信红军一定能战胜邓尼金，指出，等待着邓尼金的将是和高尔察克同样的命运。这一点博得了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讲完了南高加索的政治形势，我又讲了在准备武装起义的斗争中边区党委会对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共青团

组织以及全体南高加索劳动青年提出的基本任务。我号召共青团员们加强反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斗争，因为当时在南高加索各民族的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有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我说：“老一辈背上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沉重包袱。这在很多方面分裂和削弱着他们在阶级斗争中的队伍。虽然民族主义情绪在青年中也有所散布，但青年的民族主义情绪比较少，比较容易吸收他们参加国际革命斗争……边区党委会很重视第一届南高加索共产主义青年代表大会。虽然代表人数很少，但会议有重大的意义，因为会议代表了南高加索的所有主要地区。你们的任务是：作为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成部分，在组织上巩固南高加索所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统一。俄国的共青团员，有的英勇地战斗在国内战争的前线，捍卫着苏维埃政权的胜利成果；有的卷起袖子、全力以赴地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里，在南高加索，我们大家在另一种条件下工作。我们的任务是在组织上把工人阶级以及城乡劳动人民中的优秀青年团结在共青团的队伍中。应该积极地宣传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广泛地开展政治宣传鼓动。但这还不够。一个青年革命者不应仅仅局限于吸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而应该把这些思想贯彻到行动中去，应该积极地投入革命斗争。现在，在摧毁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时期，为我们当代青年提供了一个大显身手的良好机会。”

我提到必须十分慎重地吸收青年工人、农民、学生加入共青团组织。“不要忘了我们暂时还在秘密条件下工作，不要忘了我们还面临着同无政府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的种种表现作艰巨斗争的任务。”

在会议过程中，暴露出一些意见分歧，它反映了代表们进行工作的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差异。分歧的一方是“斯巴达克”的成员，另一方是巴库青年联盟的成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分歧是他们彼此无联系，互相脱离的结果。我指出：“毫无疑问，当你们开完了这次南高加索共产主义青年大会离开这儿的时候，在观点上你们彼此接近了，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政治上巩固了自己的队伍。”

我继续说：当前南高加索青年有很好的机会去致力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具体准备工作，培育集体主义的精神，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最高的阶级表现形式，是个人和群众溶成一体的一场同心协力的战斗。有些知识分子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看成一场悲剧。这是受了骗或者是糊涂观念。其实社会主义社会和个人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对抗性的矛盾，因为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主义是把个人和社会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接着又讲了共青团在工会中的工作和把落后的青年工人提高到先进水平的任务。

我很详细地讲述了共青团的组织原则以及与党组织的关系。我说，在一切具体工作中，共青团必须有很大

的独立性，不允许党组织对青年团进行过多的干预。共青团应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南，在全力帮助党解决面临的各项任务的同时，培养战士善于正确地分析形势，分析实际问题，甚至是最复杂和意料不到的问题；在自己的成员中培养斗争的意志和胜利的信念；善于组织群众并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带领群众前进。我讲了在共青团组织中，青年工人必须起骨干作用，并再次强调了和民族主义的流毒作斗争的必要性。

我在自己的报告中强调指出：“革命组织的民族隔离状态损害无产阶级运动，分裂他们的队伍，使这个民族的工人和另一个民族的工人对立，这只能使资产阶级从中渔利。我们尊重民族语言，但是语言对我们来说只是彼此交际的工具。可以用不同的语言说话，但组织应该是统一的——国际主义的组织。

所以，南高加索共产主义青年组织的首要任务是培养青年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无产阶级觉悟，使之自觉并善于和民族主义的对立情绪作斗争，巩固各民族青年之间的兄弟友谊。”

在会上展开了热烈的辩论。代表们作了多次发言，这对于澄清观点是有益的。大家感到争论是很有成效的。因此，尽管发生过争执，大会一致通过了决议：把南高加索所有共产主义青年组织联合成全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所属的统一的南高加索的组织。同时一致选出了南高加索共青团边区委员会。

会议最后通过了“告全体南高加索工农青年书”。在这个号召书中着重指出：“鉴于南高加索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民族关系，鉴于南高加索地主资产阶级中的一批民族主义分子一贯在当地居民中卖力地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为了维护本联盟的利益和南高加索各阶层青年的利益，南高加索青年工人、农民共产主义联盟认为必须同腐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的民族沙文主义的毒素作无情的斗争，并要求联盟的每个成员经常不倦地宣传国际主义精神和各民族亲如兄弟的思想，作为全俄共产主义青年团组成部分的南高加索地区青年代表大会只承认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因为只有共产党才是工农利益的鲜明代表者。”

“告全体南高加索工农青年书”最后号召全体工农青年团结起来，为争取全南高加索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斗争。

会议通过了给第三共产国际、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和米哈·齐哈卡雅的致敬电。在会议进行期间，米哈·齐哈卡雅正在库泰依斯监狱。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政府由于害怕齐哈卡雅和他的朋友们在人们中间的巨大威信和影响而把他和其他一大批共产党员监禁在库泰依斯狱中。

在致敬电中说：“无产阶级青年代表大会通过您向高加索的全体共产主义无产者致敬。高加索的压迫者和叛徒们妄图用逮捕高加索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米哈·

齐哈卡雅的办法来侮辱高加索的无产阶级。代表大会坚信这些压迫者和叛徒们决不能主宰局势。不久的将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国际的红旗必将飘扬在高加索上空！而您正是为争取这一理想而奋斗的战士。苏维埃高加索万岁！”

莫 斯 科

按照边区党委的指示；首次和基洛夫见面；在列宁那里汇报；在全俄东部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叶·德·斯塔索娃；几点总结。

巴库的党组织和革命运动在1918年失败后到1919年上半年，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到了恢复。

在我们给弗·伊·列宁的信中已正确地指出，成立“独立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机构，对高加索和苏维埃俄罗斯的无产阶级运动肯定是有害的，“……然而它在启发和提高群众的阶级觉悟方面却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围绕民族共和国独立的思想而产生的民族分化和‘诸民族各种力量联合’的过程，急剧地被阶级分化和工农群众在共产党旗帜下实行国际联合的深刻过程所代替。脱离苏维埃俄罗斯向本族资产阶级靠拢的过程被脱离本族资产阶级向苏维埃政权、向苏维埃俄罗斯靠拢所代替。”^①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类1目，存档编号745，第2页。

高加索边区党委会遵照全高加索共产党巴库会议的指示于5月底召开了改组后的全体委员会。会议在谢·奥尔忠尼启泽参加下经过详细的讨论，决定不去反对民族共和国，而把推翻现存的各共和国政府并在其管辖范围内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苏维埃共和国作为主要口号和当前的首要任务，争取它们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与苏维埃俄罗斯实现自愿的联合。^①

因此首先必须详尽地定出准备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然后在亚美尼亚进行武装起义的计划，确定实施计划的最适当的时机，使我们的行动与红军挺进的计划相配合。

解决党的组织问题已提上了日程而且愈来愈显得重要。但在这方面还没有统一的想法。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了。

凡此种种都需要高加索边区党组织采取新的措施，需要去莫斯科汇报情况并得到必要的指示。况且在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失败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还没有一个边区委员会委员到党中央去过。高加索边区党委会决定让我代表边区委员会去莫斯科向中央汇报情况。说实话，当同志们推选我时，我真高兴。我预感到亲自见到列宁的高兴。当时在巴库已知道8月份将在莫斯科召开全俄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第5类1目，存档编号745，第4页。

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实际上大会是在1919年12月召开的〕，9月26日巴库及巴库地区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发给了我委任状，上面写道：

“此委任状由巴库中央工人代表会议主席团发给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委任他为代表出席11月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①

去莫斯科的路程只有一条：乘渔船经里海走五、六天到阿斯特拉罕。这条路是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支从巴库往苏维埃俄罗斯运送航空汽油的船队开辟的。

我们的船得从市中心街心公园码头出发。搞到了五个以去波斯为名的乘客的正式证件。

原定10月8日出发，但没能走成，因为警察局已探听到我们这次出发的消息。

一到码头，我发现警察在我们船的附近活动，我没往船上去，趁警察没认出我，我就离开了码头。这段故事后来舒拉·别尔增斯卡娅是这样回忆的：

“与阿纳斯塔斯同行的有奥尔加·沙图诺夫斯卡娅、斯卡奇科、季格兰和另外一个同志。船得从这个城市的街心公园码头出发，搞到了五个以去波斯为名的乘客的正式证件。晚上，四个人已经到了船上；等着阿纳斯塔斯，为了安全起见，他在临开船时才来。

突然来了一些警察，四个人都被捕了。但警察却不

^① 苏联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1235类6目，存档编号81，第77页。

把被捕者马上带走，显然还想等什么，看来他们已经知道阿纳斯塔斯了。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人出卖了他们。

奥尔加和季格兰都在想，怎样使阿纳斯塔斯免于被捕呢？最主要的是不让他上船。当奥尔加沿着堤岸的街心公园被带到警察所去时，阿纳斯塔斯迎面走来。他没有马上看到警察，刚想招呼奥尔加，而奥尔加却一声不响地从旁边过去了。季格兰要求带他去解手。下了船，他就张望着，看阿纳斯塔斯来了没有？为了拖延时间，他换来换去地找地方。又过了片刻，阿纳斯塔斯来了，阿纳斯塔斯立刻就看出了是怎么回事，他叼着烟卷走到季格兰跟前说：‘有火柴吗？借个火。’季格兰回答他：‘一根也没有，走吧！’警察催着季格兰快点完事，根本没留意那个想借火抽烟的过客，反而对他嚷道：‘走开，走开！’警察不让外人与被捕者接触，所以想尽快把季格兰带回船上去。结果警察要等的那个乘客始终没等到，也就只好把抓到的四个人带到警察所去了。

天已黑了。警察所里都在等候所长回来，但仍不见他回来，原来他到省长那里参加晚会去了。暂时只好由一个警官进行审问。奥尔加装做一个寡妇，说她的丈夫是个商人，突然在波斯死去了。这个忠贞的妻子要到波斯去取回亲人的尸体。她痛哭流涕，悲叹不已，说她失去了生活中的唯一安慰。斯卡奇科装成到波斯贩卖烟草的商人，他要求释放他和他的伙计（季格兰装扮成伙计），威胁说因拘留而遭受的全部损失一概由警察局负责。

被捕者的眼泪、吵嚷、威胁、外表的阔绰(特别是他们的讲究的穿戴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一切使得警官有点不知怎么是好。但他不能做任何决定:‘先生们,警察所长一回来就会释放你们,我不能放,没有这个权力。所长吩咐过要等他回来’。

于是随便找个地方,马马虎虎地坐下来,大家都有点打瞌睡了。突然深夜里,来了一道命令:‘你们自由了,可以走了’。大概是阿纳斯塔斯想了办法:通过别人给了警官一大笔贿赂。

一出警察所,我们就立刻沿着巴库要塞狭窄的纵横交错的街道向四面散开。几乎就在这时,传来了警笛声、脚步声——开始追捕了。然而,在迷宫一样的要塞里隐藏是不困难的。后来才知道,被捕者刚刚释放,警察所长就回来了,马上进行追捕。但怒气冲冲的商人和他的伙计、号啕痛哭的寡妇这些身分复杂的人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次未能成行,又委派另一组人极其秘密地准备从另一个码头出发。

这时,水运协会主席费加·古巴诺夫也要到阿斯特拉罕去。我就和他商量,从保密观点来看,如何走更合适。是两人乘一条船呢,还是在同一天先后分别乘不同的船出发。我们选择了比较正确的第二种方案。

我们设想,如果一条船失败了,那么另一条船还是能够设法到达阿斯特拉罕的。

过了几天，我扮成去恩泽里(波斯)运送烟草的商人，按照约定的时间，秘密地乘一艘机帆渔船从巴库出发。我完全按照秘密工作的规定来到码头。为了避免在码头上引人注目，我在开船前的最后一刻到达。我是一身地道的“商人打扮”。为了打掩护，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送我的两个巴库党委会的工作人员，也打扮得很象那时经常出没于码头的普通商人。

在船上还有一个高加索山地人的代表(他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是去找基洛夫的，准备建立同十一军的联系，希望对在高加索山区活动的起义队伍给予支持。

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我们启程了。这一次，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们从容地坐上了小船，顺利地离开了巴库港。小船通过海滨驰入大海。当然，我们不是开往伊朗，而是开往阿斯特拉罕去了。

通常，谁要是出海，都期待一个风平浪静的免受颠簸的好天气……回想那时，我们恰恰相反，希望狂风暴雨，希望刮起暴风……

航程漫长而又危险。马达的力量太弱，全靠帆起作用，若是风平浪静的天气，船帆就起不了作用。除此以外，我们知道，那时控制着里海的邓尼金舰队，在天气好的时候，总是沿着航道到处巡逻，控制得非常严密；而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通常就停泊在港湾。

我们幸运的是，当我们离开港口后没多久，就刮起了大风。在底层唯一的一个小船舱里，拥挤不堪，闷得难

受。所以我们就坐在甲板上，呼吸着新鲜的海风，沐浴着飞溅的浪花。

船小浪大……坐在船尾回头望。只见那波涛滚滚的海水掀起三、四米高的巨墙，猛扑过来，似乎要把你吞没……而我们这只小船，仿佛被一种奇妙的力量所驱使，飞驰向前。每次急速地攀上了浪峰，然后和它一起急剧而下，准备再一次攀登……

我们开始还有点害怕，大海的漩涡似乎一下子要把我们吞没，但后来我们也习惯了，甚至为力挽狂澜的人们感到自豪……

从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堡(今称舍甫琴柯堡)到基兹利亚尔海岸这一段航路，我们可能首先碰到很大危险，因为这里是里海最窄的地段，任何一条过往的舰艇一定能发现我们的小船。

记得在第三、四天上，当我们已快到亚历山大罗夫斯基时，海上虽仍是波涛滚滚，但天气却大大好转了。为了等到“好的”(即暴风雨的)天气和黑夜，我们决定拐到附近的一个空荡港湾里——卡拉-博加兹海湾去，以便避人耳目，等到合适的天气再在夜晚乘着顺风继续航行，绕过危险的地段，进入伏尔加河三角洲。

在港湾里，我们遇见了一位哈萨克老人和一个十一、二岁的男孩。除他们以外，那儿什么人也没有。老人在这里靠捕鱼为生。原来他差不多已经五个月没有看到面包了。我们当时还有多的面包，就分给了他几个。

老渔夫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宰了只羊，在篝火上烤了羊肉，熬了鲜美的鱼汤，热情地款待我们。我们很好地休息了一下，在黑夜即将来临的时候，又上路了。老人坚持让我们拿了些鱼在路上吃。

我们悄悄地溜过亚历山大罗夫斯基，又航行了差不多一整天。随着离伏尔加河越来越近，在我们眼前，海也渐渐变了颜色：先是深蓝色的，后来越来越黄……这已是注入里海的伏尔加河的水了。

这说明：我们距伏尔加河口很近了。

我们都知道，邓尼金的军舰在伏尔加河三角洲入口处正在进行严密的巡逻。

水位逐渐变浅了，和大型敌舰相遇（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的可能性越来越少了。

临出发之前，我们预先在小船里藏了三支军用步枪，几支毛瑟枪和手榴弹。如果邓尼金匪徒抓住我们，我们就给他们以应得的惩罚。不管怎么样，即使牺牲了也不能让他们捞到便宜。我们就这样严阵以待地驶近伏尔加河三角洲，密切注视着有没有邓尼金的舰艇的出现。水面上一望无际，什么船也没有。

日暮中，我们发现远处有一艘军舰迅速地向我们驶来，但我们还辨认不出是白匪的还是我们红军的。

他们鸣枪警告要我们挂旗，因为我们在行进中根本就挂任何旗帜。

我考虑一下后，命令挂白旗。我的船员同志们表示

反对说：“怎么能这样呢？我们是共产党员，怎么突然挂起白旗来呢？”

我只好向他们解释说，挂白旗有个好处，就是表面上表示不抵抗，向我们驶来的这只军舰看见白旗，就不会开枪。当他们靠近后证明是我们红军的，那就万事大吉；一旦发现是邓尼金的，那我们照样可以动用武器，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我们决不投降。

旗挂起来了。船停止了前进，落了帆，关了马达。我们惴惴不安地等待军舰的靠近。这是最紧张的时刻，我们真是象平常所说的那样，要孤注一掷了。

军舰越来越近。我们全神贯注地看着：是谁的军舰？大家都仔细看：舰上有没有带军官肩章的？我们什么肩章都没看见。看样子，是红军的！我们放心了。军舰靠近了。三个没有带军衔符号的海军从舰上跳到我们船上，其中一个是指挥员。

我作了自我介绍，对他们说我从巴库来到阿斯特拉罕去找基洛夫有事，详细情况我不能谈。“请送我们到阿斯特拉罕去找基洛夫吧，我们船上所有的一切就当作你们的战利品啦，其中还有很多烟草，大概你们正缺这玩艺儿。”

水手们对此很满意，他们确实已经很久没有见到烟草了，只能拿各种代用品凑合着抽。

我们上了军舰，第二天(10月16日)就到达了阿斯特拉罕。

* * *

我被送到基洛夫的住所，他不在家。出来一个老太婆，看样子是这所住宅的女主人，我问她，基洛夫在哪儿？她说：“一早就到苏维埃去了，在做报告呢！”

当时阿斯特拉罕食品供应很差，后来我在城市的大街上走了走，一些地方在沿街售卖渍苹果，偶尔还可碰到卖鳊鱼干的。其它什么东西都没有。

基洛夫当时的处境很困难。他忙着到各处去，向大家进行宣传解释，主要是使那些饿肚子的人振作起精神来。几小时后，基洛夫终于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在这以前约有半年的时间，我们仅仅是经过频繁的通信熟识的。

我们见了面就好象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

我把准备在党中央委员会汇报的全部内容详细地向他讲述了一遍。我们特别详细地讨论了帮助高加索山区起义者的一些具体问题，还拟定了加强从巴库往阿斯特拉罕运送汽油的措施。

基洛夫是个朝气蓬勃、聪明好学的人。他思考问题明确、清楚，很快就把这些问题的全部细节搞得一清二楚了。他肯定了我们对所有问题采取的立场，这就更加鼓舞了我，使我深信那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将会在党中央委员会上得到很好的研究。

基洛夫的精明强干、灵活机智、当机立断，给我的印象是惊人的。看得出来，这里的党政军的工作都是由他

来过问的，由于他受到同志们的信任，在同志中间享有崇高的威望，领导起来总是得心应手。在阿斯特拉罕逗留期间，在和基洛夫频繁的接触中，我们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成了终生的朋友。

当时的基洛夫给我留下的印象是精神集中、举止端庄，具有非常坚定性格的严整的人。他的外表就使人产生好感。他身材不高，但很结实，很讨人喜欢。他的嗓音有点特殊，具有很不寻常的口才。每当他一上台讲演，立刻就使听众着了魔。

在个别交谈中，他说话不多，但把自己的意思说得非常清楚、明确。他善于听别人的讲话，喜欢尖锐泼辣的字眼，他自己就是一个善于叙述的人。

后来我才明白，基洛夫和列宁之间有频繁的电讯联系，基洛夫定期向列宁汇报、请示，把在阿斯特拉罕得到的来自高加索的消息转告中央。

在我到达的当天，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就把我已到达阿斯特拉罕并且即将去莫斯科一事电告列宁。在长长的电文中，基洛夫向列宁汇报了从我这儿听到的一些情况——在H. Ф. 基卡罗领导下的切禅山民起义的规模及邓尼金准备采取的镇压办法。基洛夫引用我的汇报，在电文中说：

“8月底开始的高加索山民——达格斯坦人、印古什人、切禅人及卡巴尔达人的起义成了高加索的舆论中心。除了一小撮叛徒、卖国贼——卖身投靠邓尼金的军官外，

为邓尼金的横暴逼得走投无路的山区各族、各阶层人民，在没有任何援助的情况下坚决反对邓尼金的横征暴敛，坚决拒绝提供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炮灰，他们带着仅有的步枪和匕首同哥萨克军官匪徒们展开决定生死的血战。甚至担负着供应前线 and 起义部队全部复杂任务的妇女、儿童和老人也是群情激昂，摩拳擦掌，因为所有男子都应征入伍了。不能作战的居民用大车和马把村里所有的东西都给战士们送到前线去。一个又一个的新胜利鼓舞着异常英勇的起义者，而大量的战利品增强了起义队伍的战斗力和队伍的装备。当时山区人民的武器装备是很缺乏的。在一系列战斗中仅达格斯坦人就缴获了三百多万发子弹，十六门大炮和几十挺机枪。达格斯坦山区各据点的邓尼金警卫部队全部被消灭，在那里光被打死的哥萨克就达三千人……高加索山民的胜利对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来说是有利的，对他们来说，山民们起了反对邓尼金的坚固的掩体作用。但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却罪恶地在袖手旁观，无动于衷，没有给起义者任何帮助。”^①

和基洛夫商定，我在阿斯特拉罕停留几天，因为我要等费加·古巴诺夫，我和他约好了一同去莫斯科。

在阿斯特拉罕时，我意外地得知这个城里有一大批以阿伊库尼为首的亚美尼亚共产党员准备到高加索去。在这里举行了由这些同志参加的一次会议，会上阿伊库

^① 《谢·米·基洛夫论文、演说、文献集》(1912—1921年)，1936年莫斯科俄文版第1卷147—148页。

尼做了报告，而我则进行了反驳。

我声明，亚美尼亚共产党和南高加索党的边区委员会不承认阿伊库尼为首的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和他的一伙人同亚美尼亚地方党组织没有任何联系。这些组织的工作由不久前成立的亚美尼亚党委会所领导，亚美尼亚党委会不承认阿伊库尼一伙。阿伊库尼及其中央委员会不是由亚美尼亚共产党员选出来的。亚美尼亚共产党员是南高加索党组织的成员，承认边区党委会的领导。边区党委会和阿伊库尼一伙人没有任何共同之点。我说，这正是这伙人分裂南高加索共产党员队伍、破坏南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当前的统一的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

我指出，那些准备去高加索的同志如果不再按阿伊库尼的指示办事，而是谦虚地、按照组织纪律参加地方党组织，就完全能够指望得到亚美尼亚共产党人和南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的热情接待和支持。

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支持我，这是出于意料之外的。

我焦急不安地等待古巴诺夫。我担心他会落入邓尼金的魔掌。我们的担忧被证实了：白匪截获了那只小船，古巴诺夫被捕，不久就牺牲了。

我只得一人前往莫斯科。和莫斯科没有定期的交通来往，火车一星期至多只有一次，乘车去莫斯科只好等机会了。

基洛夫对我说：“这样的机会是有的。几天后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斯米尔加将带领一批军事工作人员乘专车来这里。他要在阿斯特拉罕停留一两天，你完全可以随他们一同去莫斯科。”

事情也正是这样。10月26日我动身去莫斯科就是乘坐斯米尔加返回的那列火车。基洛夫在10月24日先打电报给斯塔索娃，27日又拍电报给列宁和斯塔索娃，通知他们我已启程去莫斯科。

大约走了两星期光景，我们才到达莫斯科。当时铁路运输经常出事故。燃料不足，机车车辆被摧毁，铁路上秩序混乱，火车中途接二连三地停车。

在整个漫长的、无可奈何的旅途中，我继续思考对党中央委员会的汇报。即将来临的和列宁的第一次见面使我心情激动，我想了很多……

我来到莫斯科，当时苏维埃俄罗斯的情况十分困难。国内战争正在进行，反革命叛乱在国内不断发生。到处是饥荒和瘟疫。

首都的生活充满了非常紧张的气氛……

当时的党中央委员会设在沃兹德维任卡（现在的加里宁大街）的一座大楼里。他们让我到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办公室去。当我走进这个不太宽敞、光线不足的办公室时，一个高个子淡黄色头发的女人，外表给我的印象仿佛是个贵族，站在一张不太讲究的桌子旁边正和另一个同志谈话。她听到关门的声音后，向谈

话人做了一个手势，停止了谈话，随即转向门口。她问我找谁，有什么事。我作了自我介绍，并说：“我要见中央委员会书记斯塔索娃同志。”这时我听到一个简短的回答：“我就是。”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已经从基洛夫拍来的电报里知道我要到莫斯科的消息。她和蔼地笑着让我坐下等她的那个同志把话谈完。几分钟后，我便开始回答她的问题了。

* * *

斯塔索娃详细询问我是怎样到达莫斯科的以后，就让我到克里姆林宫去见列宁。她说，列宁嘱咐她，我一到莫斯科，就马上送我到她那里去。就在当天晚上列宁在自己的办公室单独接见了。我刚一推开列宁办公室的房门，他就亲切地微笑着，从写字台旁边站起来，出来迎接我，和蔼可亲、朴实地和我握了手，问我一路上情况怎样。列宁让我坐在靠写字台旁边的椅子上，自己也坐到了原来的地方。

“请讲吧，讲吧……”

当我开始讲的时候，列宁立即变成了另一个人：全神贯注，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眼神变得严肃认真。

我听说列宁是一个朴实的人。然而我所想象的，还远不如亲眼一见。他一下子就造成了一种毫无拘束而又认真的谈话气氛。刚开始时我很激动，但是很快就镇静下来了，大胆而从容地开始向他汇报。

我讲了从1919年春天以来的半年中阿塞拜疆布尔什维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关于巴库无产阶级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的情况，关于党的秘密工作同合法的活动形式相结合的情况。我讲到在巴库有由各个企业代表组成的工人代表会议——类似工农兵代表会议，在经常活动着。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机构，而且在实践上领导着巴库的工人运动。今年3月，我们共产党员，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多数从代表会议的主席团里排挤了出去，在代表会议普通成员的支持下，掌握了代表会议和主席团里的领导地位。

我说，在1919年初巴库工会也掌握在孟什维克手里，在组织上、思想上都很薄弱，有时甚至无所作为；但是我们仍然在工会里、在巴库地区的工人俱乐部里夺得了领导地位，把它们变成在工人中间开展群众性政治工作的基地，变成党组织的联络点和接头的地方。我谈了全高加索工会代表大会是怎样进行的，大会通过了共产党员提出的决议，还提到格鲁吉亚只有几个工会的代表来到这里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在孟什维克领导下的工会，预感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将处于少数，就没派出代表，而举行了自己的格鲁吉亚工会代表会议，从而脱离了全高加索工会组织。

我认为有必要向列宁报告，我们战胜了孟什维克的努力，在里海合作社联合会理事会改选中获得了多数，把管理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合作社成了我们党工作的一个

据点。利用它的一些企业来安插失业的共产党员，以业务工作的名义派人出差来从事党的工作，建立组织联系，进行秘密接头和其它工作的地点。

还在来莫斯科的途中，我一直想着即将实现的和列宁的第一次会见，考虑着怎样更好地作汇报。我决定首先只讲事实，然后再分析、概括、作出结论。我就是这样做的。当我讲事实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是我刚想作结论的时候，他就很客气地打断了我的话，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的走动着，详细询问了一些补充的事例。他走到地图旁边说：“啊，这个在哪儿？我们来看看，达格斯坦在哪儿？切禅在哪儿？”我们看着。“在那儿有多少游击队？”——列宁又问道。我回答着，又开始总结。列宁又提出了问题，而且问得更详细了。这时候我才明白，我应该很详细地讲叙事实，不应急于作结论，列宁自己会得出结论，他的总结自然比我要好。

我向列宁汇报了南高加索各共和国和达格斯坦、切禅、印古什季叶以及卡巴尔达的政治形势。我指出，在阿塞拜疆形成了大好的革命形势。不仅在巴库，而且在各县都已展开了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反对地主、争取获得土地的斗争。共产党员已经能够掌握对这个运动的领导。

连科兰苏维埃共和国惨遭失败后，在哈萨克县和卡腊巴赫展开了最强烈的反政府运动。在达格斯坦、切禅、卡巴尔达正在进行着反邓尼金军队的游击斗争。

由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努力和木沙瓦特政府的支

持成立了高加索山区人民政府，但是实际上这个政府没有权力，那里的决定性力量是红色游击队。

在基兹利亚尔地区特别是在诺沃罗西斯克和图亚普谢地区活动着一些由不满的农民、前北高加索红军和邓尼金部队的逃兵所组成的叫作“绿军”的队伍。他们进行着反对邓尼金的军事行动。为了利用他们同邓尼金作斗争和破坏邓尼金的后方，党的边区委员会正在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同他们建立联系。

列宁问：“南高加索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经济状况怎么样？”

我回答说，格鲁吉亚的情况还比较好。在阿塞拜疆虽有开采出来的大量石油，但由于丧失了俄罗斯市场，无法输出销售，经济处于萧条状态。

在达什纳克党人统治下的亚美尼亚情况最为严重。人民普遍贫困，没有工业，耕地不足，这里的经济状况是灾难性的。大约三十万从西亚美尼亚和俄国军队一起来的亚美尼亚难民陷入了极其可怕的境地。被大吹大擂的英国和美国的援助，实际上微不足道，人民仍在挨饿。

列宁问，南高加索民族主义政府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我回答说，他们互相之间勾心斗角，领土的争执使他们相互分裂。在夏天，各政府代表曾举行会晤，企图协调他们的合作，但没有产生效果。

在格鲁吉亚，与孟什维克政府的愿望相反，内部的社会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大多数工农积

极分子，正规部队的某些分队不仅对我们有好感，而且准备根据我们党的号召举行起义。在有些地区和某些部队里甚至有时不能防止过早的自发行动，例如，在波提、米哈依洛夫、兰奇胡塔、苏呼姆等地就是如此。

在亚美尼亚无论是经济状况还是政治局势都很严重。共产党遭到残酷迫害，他们只好被迫进行地下活动，因为没有任何合法工作的可能性。在人民群众中间，那些对现状不满的人，强烈地向往俄罗斯。如果战胜了邓尼金，那么亚美尼亚的劳动人民，包括穆斯林在内，就一定会起来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突然列宁讽刺地笑了一下，问道：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是怎样实行民主的？

我回答说，在孟什维克统治下的格鲁吉亚，没有丝毫的民主气氛。相反，他们残酷地镇压在某些县里发生的农民起义，逮捕了我们党的大批同志，没有经过任何审讯和审判就把他们关在监狱里。连列宁侨居瑞士时认识的米哈·齐哈卡雅也被逮捕了，关在库泰依斯监狱。当然，更谈不上出版自由了。布尔什维克不能够出版任何公开的报纸和小册子，他们在地下进行工作。

列宁对我所说的话反应很强烈，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我很了解这些孟什维克！别指望从他们那里得到别的什么东西。

我说，在格鲁吉亚，有一个时期布尔什维克的一种报纸刚开始出版，但是还不到两星期，就被孟什维克封闭

了，当时我们正想建立反对邓尼金的统一战线。夏天，邓尼金在前线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并且有入侵高加索的危险，居民中的小资产阶级阶层甚至连南高加索的各政府对此也感到惶惶不安。为了在高加索给邓尼金制造困难，从而帮助红军，我们向小资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民族政府提出反对邓尼金入侵危险的统一行动的建议，并答应在这方面给予他们以全力支持。我们的号召得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响应，在劳动群众的压力下，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同意进行谈判和召开全高加索工人代表大会，来组织反对邓尼金入侵的斗争。我们利用这段时间在梯弗里斯工人中间进行了公开的讲演。但是孟什维克看到，开展起来的运动助长了布尔什维克的声势。他们从英国代表那里得到了不让邓尼金入侵南高加索的保证以后，就同我们中断了一切谈判。一个镇压共产党人、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新浪潮开始了。

我告诉列宁，南高加索党组织正在顺利地准备武装起义，正等待着中央委员会关于起义时间的指示。我们自己确定不了最适宜的时间。党中央委员会了解前线的局势，我们希望在红军接近高加索时举行起义。

我接着说，在阿塞拜疆除了俄国共产党(布)，还有两个党组织，即由当地的阿塞拜疆族工人联合成的“古墨特”和由来自波斯的工人组成的“阿达列特”。所有共产党组织的代表经过一些争论后，得出结论：共产党员队伍的分散状态同当前的形势和面临的起义任务是不适应

的。早先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成立的“古墨特”和“阿达列特”，在引导穆斯林工人参加共产主义运动方面曾起了很大作用，而现在则需要一个统一的不受民族限制的共产党组织。

既然我们提出了建立同苏维埃俄罗斯紧密联系的独立的苏维埃阿塞拜疆的口号，那么联合各共和国的所有共产党员，并属于俄共(布)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阿塞拜疆共产党就应成为这样的统一组织。

我告诉列宁，阿塞拜疆共产党员的一致意见和今年7月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相矛盾，根据这个决议，“古墨特”被认为是具有省党委权力的独立的阿塞拜疆共产党。

我接着说，亚美尼亚共产党人和俄共(布)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不承认在莫斯科的以阿伊库尼为首的亚美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他和他的一伙人同亚美尼亚地方党组织没有任何联系。

为了领导亚美尼亚的所有共产党员，亚美尼亚共产党组织在地下选举了委员会，叫做亚美尼亚委员会。亚美尼亚委员会隶属于高加索边区党委会，通过边区委员会而隶属于俄共(布)。亚美尼亚委员会承认边区委员会的领导，而不承认阿伊库尼的组织。阿伊库尼的这个组织也只承认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直接领导，而拒绝高加索边区党委会的领导，不打算加入高加索边区党组织，从而分裂了高加索党的队伍。

我对列宁说，在阿斯特拉罕时，遇到一批亚美尼亚共产党员，和他们一块的还有阿伊库尼，他们打算到高加索去。我参加了他们的会议，并发言反对阿伊库尼的立场。所有出席会议的人通过了我提出的决议案。而阿伊库尼则陷于孤立，并决定回莫斯科。

我说：“没有高加索共产党人的团结，高加索共产党就不能设想取得胜利。”

我幼稚地以为列宁在谈话过程中或者在结束时马上就会直截了当地对我提出的问题给予明确的回答，讲一下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和想法。

列宁说，所有这些问题——关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共产党的问题，关于他们和边区委员会的关系问题，——就象我提出的其他问题一样，需要在中央委员会研究和讨论，然后做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为此，要我写一份书面材料，后来，我就这样做了。

至于把同一组织的共产党员不分民族而按地区和生产部门的原则联合起来，列宁说这是完全正确的。在俄国边疆地区成立的独立国家里，共产党组织作为独立组织而活动并隶属于俄共(布)，这也是正确的。

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这第一次会面和谈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 * *

和列宁会面后，我回到沃兹德维任卡，被安排住到苏维埃宫的第三座楼。（原来的神宫巷，现在的代表大街。

现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就在这座楼里。)我到莫斯科是第一次,无论电车或别的市内交通工具都没有,为了送我去目的地,给我派了一辆汽车。

第二天早晨,我打听到了邵武勉家的地址,原来就在和这座楼同院的一所住宅里。我到了他们那儿。叶卡捷琳娜·谢尔盖耶芙娜·邵武勉坚持要我搬到她那儿住。又象在巴库时一样,邵武勉家成了我自己的家。

第二天早晨,斯塔索娃按照头天晚上约好的那样又接见了。我向她详细地讲述了高加索的局势和边区党委会提交中央委员会研究的问题。然后我根据斯塔索娃的建议,到了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长克·季·诺沃戈罗采娃那儿,并把这一切情况告诉了她。她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她是一个严肃的、善于分析问题的党的工作者。待人朴实、和蔼可亲。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今年年初逝世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全俄执行委员会主席亚·米·斯维尔德洛夫的妻子。

* * *

很多天里我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反复思考着同列宁的谈话。没想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高加索的所有问题这样关心备至,甚至连细节都询问到了。他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反复询问在巴库和整个阿塞拜疆,在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达格斯坦、切禅以及高加索其他民族地区所发生的一切。

原来以为，他哪能顾及这些呢！而俄罗斯共和国的国内外形势仍然是极其严重的。在年底，据中央统计局向列宁呈报的资料，苏维埃政权的势力只达到共和国的三十三个省，总共不过七千五百万人口，大约相当于沙皇俄国人口的一半。这主要是粮食不能自给的省份。

英国军队从阿尔汉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往南，向沃洛格达推进。尤登尼奇的白匪军队就在彼得格勒附近，于9月底转入进攻，10月中旬逼近彼得格勒。在当时主要的邓尼金战线上，10月底发生了转折，邓尼金匪军北进已被阻止，他们被赶出了奥廖尔，邓尼金进犯莫斯科的直接威胁解除了。但是，年底的局势仍然是复杂的。在东方战线上，在高尔察克的压力下，苏维埃军队被迫于10月中旬向托波尔河一带撤退。除了几个国防工厂外，其他工厂都停工了。苏维埃共和国几乎已失掉了原料、燃料和粮食的来源。金属产量降到了最低点。同苏维埃土尔克斯坦的联系被杜托夫的哥萨克军队切断，因此对俄罗斯的棉花供应停止了。

列宁对胜利的信心是多么坚强啊！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他还能够用两个多小时，详细询问我在遥远的南高加索发生的情况，当地共产党员所迫切关心的问题以及我们打算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 * *

1919年3月成立了共产国际，列宁还在四月提纲里就论述了成立共产国际的必要性。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

大会的召开，为各国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实行思想上、组织上的联合打下了基础。共产国际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联合的根本区别就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共产国际的会议上，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的共产党员、欧洲、美洲的无产者同殖民地、附属国的劳动者第一次在革命运动的历史上联合起来了。当时举行的东部共产党组织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1919年11月22日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了。我想作为来宾列席这次会议，以便了解情况，学习一下这些组织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

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里举行。但不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而是在能容八十名左右代表的米特罗凡耶夫大厅里举行的。

会议开幕的那天，列宁的出席对大家来说是一件意外的高兴的事情。列宁在向代表们表示祝贺的同时，马上就说道：东部各民族对帝国主义的态度和这些民族的革命运动，现在是最重要的问题。他指出：“东部各民族的革命运动，目前只有和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才能顺利地发展，才能有所成就。”^①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95页。

他详细地讲述了红军的胜利和国内战争中的转折以后，补充说：“我们现在对高尔察克、尤登尼奇和邓尼金的胜利，说明世界帝国主义反对各国和各民族争取解放的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他接着说：“我想，红军所做的一切，它所进行的斗争和它取得胜利的历史，对东部各族人民会有巨大的世界意义。”^①

列宁讲到取得这些胜利的原因和帝国主义内部瓦解的意义的時候，把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到确定东部各民族的斗争性质和任务，以及解决这些任务的办法上，正象他所说的：“这些任务的解决方法，你们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但是在俄国所开始的共同斗争中能够找到。”^②在俄国，工人的斗争已成功地同农民的斗争结合起来了。这一点，在国际范围内也必须做到，虽然可能采取其他的形式。

列宁最重要的一个理论结论可概括为：“社会主义革命不会仅仅是或主要是每一个国家的革命无产者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的，这个革命将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一切殖民地和國家、一切附属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③

正是因为这样，列宁在对东部各民族代表们的讲话时说：“今后在世界革命发展史中（从这个革命开始时的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96—97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③ 同上书，第102页。

情况看来,它还要继续很多年,需要人们做很多工作),在革命斗争中,在革命运动中,你们将要发挥重大的作用,将要把你们的斗争和我们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汇合起来。……同其他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斗争。”^①

东部各民族劳动群众应该知道:“国际无产阶级是东部各民族亿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唯一同盟者。”^②

列宁着重谈了关于探索全世界先进的无产者与经常生活在中世纪条件下的东部劳动群众之间这一联盟的特殊形式问题。他强调指出:“你们面临着一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所没有遇到过的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为依据,适应欧洲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和实践运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这样的条件。”^③

列宁将无产阶级革命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灿烂思想具有光辉的奠基意义。列宁在俄国穆斯林各族人民的党员代表大会上作讲演时,直接向东部各民族人民揭示了他们在苏维埃国家和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持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前景。

今天我们看到,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战胜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怎样地促进了东西方国家革命力量的增长。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已建立起来了。正是由于世界社会主

①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卷第103—105页。

② 同上书,第105页。

③ 同上书,第104页。

义体系、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所有为争取自己独立而进行艰苦斗争的被压迫民族的统一行动及互相支持，正是由于促使现代社会发展的三股伟大革命力量的联盟，才使得老的殖民主义制度发生了崩溃和原先被压迫的民族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列宁的这些思想还是这样的新鲜和具有现实意义，这一点从下面的事实可以看到：1969年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文献就是以列宁的这些思想作为基础的。某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提出用“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去夺取世界革命胜利的新出笼理论，这些人枉费心机的妄想与列宁的这些思想相距又何等远啊！

列宁强调指出了东部各族人民在世界革命中日益增长的意义。他不仅谈到了苏维埃俄国对东部人民的革命运动将给予援助，而且还指出了东部各族人民正在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对西方无产阶级争取本国革命胜利的斗争也是极大的支持。

列宁的演说给所有到会者深刻的印象。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列宁的公开演说。我注意到，列宁没有去谈论那些代表们急于讨论然后做出相应的决定的具体问题。在会议召开之前，列宁与代表们举行了专门座谈，了解了那些使代表们焦急的问题。列宁的讲话象是在提示大家，只有经过全面的讨论弄清楚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革命斗争的新问题之后，才能解决这

些具体问题。

我还参加过这届代表大会的其他几次会议。代表大会约进行了十天。

我有向发言的同志们学习的愿望，想吸取他们解决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河流域的穆斯林民族问题的宝贵经验，因为我对这个民族的生活几乎一点也不了解。

俄国共产党人在民族问题上的理论是其他任何一个党都不能相比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及其过程中，列宁全面地研究了民族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在当时具有特殊现实的意义。列宁特别阐明了1903年党的纲领中有关民族自决权的原则，这项原则规定了各民族有权要求自决乃至分离出去。当然，正如列宁自己所强调的那样，这完全不意味着布尔什维克是提倡和主张分离。列宁写道，无产阶级“承认各民族平等，承认各民族都有成立民族国家的平等权利，把各民族无产者之间的联合看得高于一切，提得高于一切，而从工人的阶级斗争着眼来估计一切民族要求，一切民族的分离。”^①但是列宁坚决地主张俄国各民族享有自决乃至从俄国分离出去的权利，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是留在统一的国家里还是分离出去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列宁坚决主张殖民地人民获得自决权和从宗主国分离出去的权利。这是殖民地自由和独立的口号，这比那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411页。

些对待被压迫人民的许多所谓“权力平等”、“恢复人道主义”等慈悲动听但却是空洞无物的论调要实际得多。

要知道，欧洲的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不赞成殖民地的自由，不赞成殖民地有从宗主国分离出去的权利，因为他们追随本国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政策。机会主义分子就象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干的那样，宁愿鼓吹什么“文化自治”。列宁在这方面的著作对于右翼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有力的打击。

俄国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中央局的工作在讨论过程中受到了十分尖锐的可以说是无情的批评。它各方面的工作都不能令人满意。可以看到，伏尔加河流域和乌拉尔河流域许多省的工作是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些地方，由于高尔察克、捷克斯洛伐克军团、杜托夫匪首以及其他敌人的进攻，政权曾多次地更换。

大会发言者在看法上存在着异常激烈的争论和冲突。使人感到，在解决民族政策的具体问题的观点上有很大的分歧。情况甚至发展到产生了势不两立的派别。特别是涉及到鞑靼人和巴什基尔人之间的关系时更是这样。

去参加会议时我没有想象到这样的情况。有许多事情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会议最初几天的情况使我产生沉重的印象，但是我为能了解到这地区的许多实际情况而感到满意。

在其他发言者当中有阿塞拜疆“古墨特”组织莫斯科小组的代表伊斯拉菲尔别科夫。他顺便讲到了我来到莫斯科的情况，讲到了我援引了巴库的同志们意见的声明，说在“古墨特”党的旗帜下不可能很顺利地阿塞拜疆地区进行工作。

必须说明的是，我到莫斯科后不久会见了当时也在这里的纳里马诺夫和“古墨特”的其他积极分子。我把阿塞拜疆的情况和任务详细地告诉了他们，并特别详细地谈了我们在巴库所提出的建立统一的阿塞拜疆共产党的必要性的观点。与我的估计相反，他们同意了这个观点，这使问题很容易地就解决了。

总之，这次代表大会使我国东部各族人民年青的民族干部受到一次很好的教育。大会促进了对民族建设和各民族相互关系等重要问题的看法互相接近，促进了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研究；这次代表大会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因为列宁提出了新的、十分成熟的、深刻的关于落后国家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特点和进程的思想。

* * *

关于叶·德·斯塔索娃，我还想说几句话。她是我们的革命事业的伟大战士，是在列宁的领导下参加创建我们党的同志之一。

……同列宁谈话后的第二天，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接见了，要我也给她介绍一下我们党组织的工作、高加索的政治形势以及要求中央委员会解决的问题。她

和我第一次长时间的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实事求是、明确具体、审慎持重。

我这次来到莫斯科曾多次找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和她讨论我们工作中的各种问题。由于常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去，我曾多次见到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同从国内战争前线及地方党组织来中央的同志们作事务性的交谈。我越来越佩服她的异乎寻常的工作能力、坚定的目的性、明确性、灵活性和一丝不苟的精神。

1920年，当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取得胜利以后，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书记的身份来到我们巴库。在我离开高加索前的几个月里，我有机会和她一起同心协力地工作，我和她都是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领导的在巴库召开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筹备处成员。我记得她总是专心致志，善于坚持原则立场。从她的谦虚可以感到，她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光明正大的人。当涉及到执行党的决定的时候，她铁面无私，严格要求自己 and 同志。我再说一遍，从外表上看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很严肃、孤僻，可是她对党的年青的干部非常热情，爱护备至。她很乐意并且善于和年青的干部一起工作，尽力把自己异常丰富的经验介绍给他们。而且，她几乎象慈母般地关怀着我们，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她随时准备给予必要的帮助。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是闲不住的。甚至在她上了年纪，身体健康状况恶化的时候，她还继续坚持党的工

作。她很注意对青年进行教育，她讲述过去的经历，进行文艺创作。凡是到她那里要求帮助或求教的人，都受到殷勤的接待。她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中的缺点反应很尖锐，特别是当这些缺点损害到公民的权利的时候。

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的一生都是这样。记得在她去世的三年前，当我知道她住在医院里时，我曾看望过她。她详细地询问我关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工作。我向她讲述了她所关心的一切问题。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认为必须规定这样的制度：国家机关各级工作人员都必须认真对待劳动人民的申请和申诉。她说：“我自己经常收到很多人民来信，并且为此花了不少时间。……你们应当尽力使人民来信、申请和申诉得到公平合理的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个公民，不论是谁，都应该能够保卫自己的合法利益和权利。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何况劳动人民的反映可以使我们知道，在国家机关的哪些环节上有破坏法纪和轻视劳动人民利益的现象；在哪些部门和地区苏维埃机关工作进行得较好，在哪些部门和地区工作进行得较差，以便及时采取措施来改变这种状况。”

我表示同意她的这些看法。我知道，她自己经常审阅劳动人民的申请，因为我经常收到她要求我审阅某些申请书的便条；当人民的来信中提出了重要的问题时，她多次打电话给我。甚至在住医院的时候，只要身体稍有好转，斯塔索娃就审阅人民的来信。

在她家的办公桌上我常看见放着一叠叠整齐的文件。有的已经拆开看过了，有的正待处理。给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的信件，有的来自遥远的雅库梯亚，有的来自中亚细亚和高加索各共和国；有的来自我国的大城市，也有的来自我国的小村庄。每一封信她都给予答复。斯塔索娃经常喜欢讲，和劳动人民通信，是政治活动的一种形式，是和劳动群众联系的一种形式。她收到的大量来信，是她同人民群众有着密切联系的鲜明见证，她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事业。

只是由于工作上才和叶·德·斯塔索娃有过接触的许多人，觉得她是一个孤僻的，甚至是严厉的人。这只是最初的印象。她的朋友和同志都知道，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是一个感情丰富很重感情的人。例如，大家都知道，她是多么喜爱并深刻地理解古典音乐。

1966年夏，有一天奥尔加·沙图诺夫斯卡娅打电话给我说，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身体不舒服，想要我到她那里去。我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立即和沙图诺夫斯卡娅一起到了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那里。她躺在自己不大的卧室的床铺上。病情很严重。我们和她交谈了几句。她说话很吃力，她说很想听贝多芬的音乐。她家里既没有电唱机、唱片，又没有录音机。我儿子的家也在这幢楼房里，我给他打了电话，我的孙女送来了电唱机和几张贝多芬的唱片。看来，音乐给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带来很大的快乐，也使她的病痛减轻了一些。

在这以后又过了约两个月，我和克·叶·伏罗希洛夫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无名士兵纪念碑奠基大会。在大会结束后，我对他讲了上次去看斯塔索娃的情况，并建议他和我一起去看望她。他欣然同意，于是我们就到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那里去了。她看到我们非常高兴。我们跟她讲述了刚刚结束的大会和莫斯科军民隆重游行的情况。直至我们离开前，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的情绪一直很好。临走时我们还在想，她的身体有好转，没有任何危险。

1966年12月31日，我决定去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那里祝贺新年。我没有想到她已经不行了。她处于昏迷状态，呼吸困难。一个年青的女护士在给她做按摩，想使她保持呼吸和心脏跳动。医生们很快就来了。他们的一切抢救都已无济于事，过了一会儿，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去世了。……

这位卓越的女革命家的光辉形象，我将永远崇敬地铭记在心里……

* * *

我们不只一次地讨论了在英国干涉者占领期间巴库党组织处于地下时所经历的一切。

时间过了还不到一年，而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在武装干涉者到巴库后不过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们的党组织事实上已经不存在了。数千名共产党员转移到阿斯特拉罕，或疏散到其他地区去了。二十六

个巴库委员惨遭杀害。一大批共产党员被投入监狱。在巴库只剩下一些个别的党员。

后来，开始逐渐地形成了一些人数不多的小组。接着，这些小组互相建立了联系。从12月中旬到翌年2月底，巴库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又得到了恢复。诚然，它当时的人数还很少。巴库党委会的恢复，不完全是按照常规来进行的：党组织的积极分子没有经过代表大会，没有经过选举就汇合在一起了。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承担了领导核心的任务，并在地下活动的条件下，迅速地在组织上取得了成绩，在政治上扩大了影响，于3月上半月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大会完全按照党章的规定，选出了巴库党委会。

到1919年秋天，党组织已有近两千名党员，入党要经过严格的选择。只有那些事实证明是忠诚、善于斗争、勇敢无畏、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的人，才被接收入党。

情况发展得非常快。工人的政治觉悟也同样迅速地提高了。年轻的干部在同许多敌人的直接较量和面对面的斗争中锻炼成长，积累了做组织工作和领导工作的经验。

到1919年秋天，我们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获得了毋庸置疑的政治影响。背叛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党派的代表们，在工人群众的组织中完全声誉扫地，并从工人组织的领导岗位中被驱逐了出去。

那时发生的事件千变万化，象闪电一样，照亮了工人

的思想，消除了他们的许多幻想。英国人被看作是文明同盟者的观念永远破灭了。对妥协主义党派及其领袖的信任也发生了根本动摇。他们的叛徒嘴脸逐渐开始暴露，在参与残酷镇压巴库委员以后终于暴露无遗了。

这一切都发生在最艰难的国内战争环境里。这场战争一方面是本国资本家和地主，而另一方面也是他们的外国同盟军——武装干涉者强加给苏维埃俄国的。

工人们钦佩红军和共产党反对人数众多的敌人而进行的英勇斗争。这进一步增强了群众对布尔什维克事业的正义性的信念，唤起他们为苏维埃政权的最后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

巴库的共产党人曾不得不在失去与莫斯科、与党和苏维埃政权中央机关的一切联系的情况下，工作了好几个月。为了适应迅速变化着的当地的斗争形势，必须独立地掌握斗争方向，制定斗争策略，自己作出相应决定。

回顾所走过的历程，我们有充分根据作出以下一些总结：我们建立了巴库地下党组织，夺得了巴库工人代表会议——这个在英国占领期间在我们这里出现的独特的工人议会的领导权；牢固地巩固了共产党在各区工人代表会议、工人俱乐部、工会和合作社中的威信；恢复了同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共产党人的联系，同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的联系，同达格斯坦、北高加索的共产党人以及里海以东的布尔什维克的联系；加强了党对阿塞拜疆地区各县共产党员的领导工作。

而最出色的成绩，就是共产党员在很短的时期内在阿塞拜疆劳动人民落后层中动摇了他们对“自己的”民族政府的信任，消除了认为“自己的”资产阶级要比其他任何别的资产阶级（例如俄国的资产阶级）都好些的幻想。那些认为阿塞拜疆的工人和农民将很快从“自己的”政府那里获得物质生活的改善、获得各种政治权利和发展精神生活的条件的想法，象肥皂泡似地破灭了。

有影响的反革命政党“木沙瓦特”被孤立了，它曾在工人面前大吹大擂地发表蛊惑人心的声明，实际上却毫无保留地支持资产阶级政府。

布尔什维克在工人中的宣传有良好的基础并得到了支持。阿塞拜疆工人的政治觉悟提高了。在农村也是这样，农民们开始懂得，地主是连一寸土地也不愿意让给他们的。如果说，某些农民以前还幻想“自己的”民族政府会给他们土地，那么现在，当他们得到的是枪弹而不是土地的时候，他们的头脑迅速地清醒了。

布尔什维克利用一切合法的机会来加强各组织的工作。为此目的，我们甚至不忽视象阿塞拜疆议会这样一个十分糟糕、但毕竟还是有代表性的机构（那时在议会中“木沙瓦特”分子居于领导地位）。

而当邓尼金直接威胁到南高加索时，我们提出了建立同这一危险作斗争的统一战线的主张。虽然，梯弗里斯的孟什维克最终破坏了建立这样的统一战线（他们因此在政治上遭到了很大失败），但为建立统一战线而进行的

斗争过程，以及我们在巴库和梯弗里斯关于这一问题的谈判和演说，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们揭露了孟什维克、木沙瓦特和达什纳克的叛徒本质，加强了布尔什维克的影响，包括对那些在这以前还是跟着这些党派走的工人们的影响。

当然，我们这儿也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利的。在确定策略和总的行动方针时，我们中间常有意见分歧和激烈的争论，曾发表过各种不同观点，进行过斗争。

这是很自然的。在复杂而多变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里，不是对一切事情马上就能深刻分析和准确评价的。

但通常在辩论和争吵的过程中，局势就明朗了。一般来说，我们都能得出一致的统一决定。

当然也曾有过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经过争论没有立即得出一致的结论。例如，我们提出的反对邓尼金统一战线策略对我们大多数同志说来本不应该有什么怀疑。当时我们曾认为不会有人对这个策略的正确性提出怀疑。

然而，我们中间有些同志却认为和妥协主义党派搞统一行动的主张本身就是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是同资产阶级政府搞统一行动。例如，洛米纳泽就谈过这样的想法。他在别的问题上也发表过自己的特殊见解。但他的态度是十分诚恳的。很清楚，他是认识上的错误。后来在讨论一些有争论的问题时，他常常是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放弃自己原来的立场。但有时，特别是在统一战

线问题上，他十分坚持自己的观点。

由于党组织领导人对这个重要问题未取得一致意见，所以把这个问题提到巴库党代表会议上进行讨论。会上，洛米纳泽、阿加米罗夫和沙图诺夫斯卡娅反对我们的观点，希望大会也不支持我们。但他们弄错了。我是这个问题的报告人。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积极支持统一战线观点的其他同志，其中包括萨尔基斯。表决时，反对我们提出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只有洛米纳泽、阿加米罗夫两票。他们不仅没有获得新的“同盟者”，甚至还失去了一个人——沙图诺夫斯卡娅，因为她认识到自己错了。就连洛米纳泽本人，在实际贯彻统一战线策略的时候，也认识到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并和我们一起行动。

后来，在巴库党代表会议的一次发言中，他说：“我之所以曾经反对过统一战线，只不过是由于一时糊涂。现在，我完全明白了。当时巴库党组织以最好的方式实现了这个策略，真是太好了。”洛米纳泽的坦率、诚恳给大家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记得，还有一个关于工人组织参加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政府劳动保护机关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这个问题在巴库党委会上讨论过数次）。那时，劳动部建立劳动保护管理局，邀请工会代表和其他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它的工作。孟什维克们很起劲地“推动”这件事情（他们甚至偷偷地背着我们在南高加索、里海以东地区和达格斯坦革命工会的四月代表大会上，在一大堆各色各样

的决议中，塞进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相应决议)。

巴库工人的处境十分艰难。敌人越来越横行霸道。工人无论在哪里都得不到保护。某些同志——萨尔基斯、洛米纳泽和其他一些人提出了关于我们必须参加政府劳动保护机关的问题。他们用以说明的理由，并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仅仅是因为参加以后至少可以稍微改善一下工人的状况，可以更好地同专横霸道作斗争等等。

这个问题在我们这儿讨论得异常激烈。我坚决反对这项建议，认为，我们参加资产阶级政府机关是根本不能允许的。我确信，这种参加只能加强落后工人中的错误观念，似乎资产阶级政府也会改善他们的状况。

巴库党委以绝大多数否决了关于参加劳动保护机关的建议。

在下一次会议上，洛米纳泽和萨尔基斯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来讨论。因为他们当真认为，工人状况的改善取决于此。但巴库党委会拒绝重新审议原来的决定。后来，这个问题又不止一次地被提出来讨论：一会儿被提到边区委员会，一会儿被提到党的代表会。然而，巴库党委会原来的决议一直没有被推翻。

当我们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以后，在快到秋天的时候，我们常问自己：该怎么办？工人的状况继续恶化，所有石油仓库都装得满满的，企业主减少石油开采量，关闭油井，解雇工人，降低工资等等。资本家从经济上开始进

攻了。工人们自发地急于采取行动。个别的工人积极分子小组在会上作出了举行罢工的决定。

根据巴库五月罢工的经验，我们清楚地知道，经济问题取决于政权问题，不推翻旧政权，工人的生活就不可能得到改善。

我们反对这种单独的行动，认为它只能削弱工人的力量。我们号召有组织地积蓄力量，保存实力到明年春天，那时，有可能把石油从巴库运到阿斯特拉罕。除此以外，我们指望春天能得到红海军的援助。

当然，不是所有人（其中也包括我们党内的一些人）都相信我们能阻止工人采取个别行动，说服他们等到明年春天。

在这里，值得谈谈关于原埃津什米特主要工厂的工人罢工运动。在那里，我们有一个力量很强、在工人中影响很大的党支部。然而，当这些工厂工人的状况变得特别困难的时候，工厂委员会事先没有得到巴库党委会的同意，就宣布了罢工。我们请工厂委员会和党支部的领导人到巴库党委会来。他们当中有个叫米尔·巴希尔·卡苏莫夫的工人表现尤为特殊。他坚持要我们相信他们通过的决议是正确的，说他们没法顶住工人的压力，罢工反正是要自发开始的等等。

巴库党委认为，这次罢工是不适宜的。但鉴于罢工已经宣布并实际上已经开始，我们决定为了表示团结而支持它，尽管我们不相信这次罢工能取得什么良好的结

果。此后，我们的报刊和工人代表会议也支持了这次罢工。但正如所预料的那样，这些工厂的工人只得到企业主的一些微小让步。大概过了一个星期罢工就停止了。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这儿发生了有关工会工作的一场争论。那时在工会工作的某些领导同志，米尔佐扬、阿纳什金，对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从工会中驱逐出去的方针是否正确产生了怀疑。理由是他们中间有经验丰富和非常能干的工作人员。而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保证布尔什维克对工会实行坚强的领导，至于其他一切对我们来说都是次要的。

但是，我们考虑到一些同志的愿望，还是在工会里保留了几个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中最有经验的活动家。这些人不追求工会的领导地位，因此对我们来说并不构成特别的危险。过了不久，我们的同志和我们一起感到很高兴，因为以前他们感到害怕的一些工作，现在他们能很好地胜任了。

我们中间产生的一切分歧都相当平静地消除了。我们的分歧从没有导致原则上的不一致，以致在党内形成派别和集团，这是十分重要的。换句话说，我们的分歧从未危及到我们的统一。

我简直不记得我们这儿有什么要政治阴谋和搞派别活动的事；诚实的革命原则精神、对列宁思想的忠诚、良好的自觉性和组织性在我们这里的一切方面都占主导地位。这首先要归功于巴库党组织的光荣传统，这传统是

我们的老同志，当然首先是斯捷潘·邵武勉和他的战友培育起来的。

我们这些巴库党组织领导中较年轻一代的代表，在1919年英国占领期间，在艰苦的地下工作的复杂条件下，严格地维护了这些优良传统。这次处于地下状态，在巴库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历史上已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同沙皇专制制度作斗争的年代里。第二次并不是第一次简单的重复，而是为苏维埃政权在阿塞拜疆取得彻底胜利，为把巴库变为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党的坚不可摧的堡垒而进行斗争。

回顾过去走过的道路，我们试图用自我批评的精神弄清，我们在处于地下的情况下是否犯过某些大的、原则性的政治错误？

由于巴库布尔什维克组织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我们可以怀着伟大的自豪感说，在英国占领和木沙瓦特资产阶级政府统治时期，在地下工作复杂的条件下，巴库组织虽受到严重的损失——失去许多富有经验的领导者，但它以革命的无产阶级青年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对列宁党的伟大旗帜保持了忠诚。

南高加索苏维埃的诞生

由莫斯科返回巴库

同米·瓦·伏龙芝和瓦·弗·古比雪夫的会见。——十一军开往巴库。

我在莫斯科呆了两个月左右。1920年1月初，我同米哈伊尔·卡希阿尼、弗拉基米尔·伊凡诺夫-卡夫卡斯和奥尔加·沙图诺芙斯卡娅等几个同志一起离开莫斯科。由于冰冻，经过阿斯特拉罕的水路无法通行，我们就取道塔什干和当时红军已经解放了的克拉斯诺沃斯克返回巴库。

从萨马拉到塔什干，我们和米·瓦·伏龙芝乘火车走了一个多月。当时伏龙芝在中亚指挥作战。

在塔什干，我同另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瓦·弗·古比雪夫初次相识。1919年末，他做为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员来到土尔克斯坦，当时巴斯马赤白匪还在这个地方继续胡作非为，这个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加强这个地区的苏维埃政权。

为了研究当地的形势和了解各类人物的情况，古比雪夫不知疲倦地工作着，并以清醒的头脑解决各种问题，

这种精神当时使我非常惊叹。到处都可以感到，在土尔克斯坦党组织中，同志们都非常尊敬他，也很了解他，爱戴他，把他当作亲人。不论在日常的生活和工作中，还是在与同志的接触中，他都极其谦虚和朴实。是一个有非凡的个人魅力，对周围同志非常关心的人，同时有着巨大的毅力，并善于把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后来，我经常同瓦列利安·弗拉基米洛维奇见面，我们的初次相识后来发展成了巩固的终生的友谊。

在塔什干，一次我有机会在直通电话里同谢·米·基洛夫进行详细的交谈。那时（1920年3月6日），由于尚未解冻，由阿斯特拉罕去巴库的水路仍旧不通。有几个同志从巴库来到了里海以东地区，他们向我们很详细地讲了那里发生的情况。

我向谢·米·基洛夫讲了格鲁吉亚的情况。那里起义遭到了镇压，许多革命者被逮捕或遭屠杀，格鲁吉亚党的积极分子很少得以幸免。

“所以，”我向他说，“运动的中心现在已转到了阿塞拜疆。”在阿塞拜疆，尽管共产党开始遭到政府当局的镇压（特别是在格鲁吉亚事件之后镇压得更凶），但当时我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仍然很快地在扩大。

我把阿塞拜疆布尔什维克关于加强武装起义准备的决定及为此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告诉了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同时还谈了关于武器和经费的援助问题，关于这一点，在这里，在土尔克斯坦我和有关同志已经谈妥。我还

请求他尽力改善巴库和达格斯坦的供应，首先是武器和军服，因为这些东西当时极端缺乏。

当我告诉他这些情况后，谢尔盖·米罗诺维奇表示感谢，同时让我以后经常同他联系。他答应立即考虑我提出的这些要求和建议，同时保证一定给巴库以最有效的援助。由于当时巴库已经开始了共产党的镇压，那里的形势使他非常不安。他担心地说道：“我们的同志不要张惶失措才好。”为了鼓舞同志的斗志和情绪，他非常希望我向他们详细讲讲“高加索战线的大好形势。”

他说，在阿斯特拉罕（以及整个苏维埃俄国）石油、汽油和机器油很紧张，要求我快些把这些东西给他们送去，越快、越多越好。

我向他保证说，我们巴库以及整个阿塞拜疆的共产党员革命的情绪是高昂的，他们没有被镇压所吓倒，最近他们已开始较经常地得到关于苏维埃俄国形势的详细消息，苏维埃的胜利鼓舞着他们。

关于向阿斯特拉罕送石油产品的问题，我向基洛夫坚定地保证，一旦开航，我立即把此事安排好。

许多年后发表的我与基洛夫谈话的记录^①，没有完全反映出我们谈话时那种亲切、诚挚的气氛和感情；而这种感情始终贯穿在我和我的至友谢尔盖·米罗诺维奇多年的友谊之中……

^① 《谢·米·基洛夫论文、演说、文献集》俄文版第1卷，第218—220页。

我离开塔什干，经过阿什哈巴德到克拉斯诺沃斯克去。当时在阿什哈巴德正在召开劳动者代表大会。米·瓦·伏龙芝建议由我代表巴库无产阶级向大会致贺词，对土库曼劳动者取得的胜利表示祝贺。

在克拉斯诺沃斯克，同志们正在收拾他们从巴库开来的那艘汽艇，准备启航。由于邓尼金的海军还在里海进行破坏活动，为预防意外，在汽艇上架上了大炮和机枪。

我们的汽艇驶向阿塞拜疆里海沿岸地带，以便秘密进入巴库，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反动的木沙瓦特政府。在中途，船上的罗盘坏了，我们迷失了方向，很长时间都无法确定我们所处的位置。忽然岸上出现了灯火。有的人认为这是伊朗恩泽里（帕勒维）港口的灯塔，有的人则认为这是达格斯坦的灯光。

当时艇上有一个有经验的水手谢苗诺夫，他根据岸边岩石确定我们是在迭尔卜特的海岸附近。但谢苗诺夫认为在这里上岸是不可能的，何况当时海面还有风浪。

于是决定驶往彼得罗夫斯克。我们只知道红军已接近达格斯坦，但不知道红军当时具体在什么地方。早晨我们开始靠近彼得罗夫斯克。当时我们是这样考虑的：如果港口没有船只，那就是说港口已经解放，白匪已经逃走。不久，我们看到，停泊处和港内什么船只都没有，这就是说，道路已经通行了。但是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港口是否布雷了呢？所以我们就慢慢地、小心地向码头

靠近。

船顺利地靠岸了。红军战士把我们接上了岸。从战士那里我们得知，十一军的指挥部就设在这里车站上的专门列车上。我们向指挥部的车厢走去。我又一次见到了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和谢·米·基洛夫。在那儿，他们把我介绍给十一军军长米·哈·列万多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米哈诺申。

我记得谢尔戈为十一军的胜利进军欣喜若狂。但更加使我们大家欢欣鼓舞的是阿塞拜疆就要解放了，这些年来，为了阿塞拜疆的解放，巴库的无产阶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战斗并付出了重大的牺牲。我们期待在阿塞拜疆解放后，接着就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解放……而这样的前景在当时是非常现实的。那时，在各条战线上，苏维埃政权都不断取得胜利。在北高加索，红军已经击溃了邓尼金的部队（当时仅仅在克里木半岛上还有白卫军在苟延残喘）。十一军解放北高加索后，便开到了资产阶级统治的阿塞拜疆国界。列万多夫斯基让军队做好新的战斗准备，他把先头部队部署在萨穆尔河左岸，装甲列车部队也集中在这里。

我们到达彼得罗夫斯克的第二天，洛米纳泽从巴库秘密地来到了这里，当时他是巴库党委会的委员。他向我们讲了巴库布尔什维克武装起义的准备情况。“虽然巴库党的许多领导同志被关在监狱里，”他向我们说，“在城里依然保存着相当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有能力领导这

次起义。”除此之外，自然对红军的援助也寄予很大的希望。

列万多夫斯基向我们传达了高加索战线司令图哈切夫斯基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奥尔忠尼启泽的命令：要求我军于4月27日开进阿塞拜疆去援助巴库工人。于是我们委派洛米纳泽立即秘密返回巴库，告诉巴库的同志们红军前去援助他们的日期。

记得，当时有一件事使谢尔戈非常挂心：绝不能让木沙瓦特分子炸毁油田！当敌人看到自己的末日已到时，是很可能采取炸毁油田这种绝望行动的。奥尔忠尼启泽告诉我，对此列宁曾给过他专门的指示。所以我们责令洛米纳泽，要他返回巴库后告诉巴库党组织，把防止油田被炸做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列万多夫斯基向我们介绍了当时战场上的形势。根据侦察情报，阿塞拜疆木沙瓦特政府仅有三万军队，两万驻在亚美尼亚边界，一万分散在各个居民点担负警卫。巴库城内约有两千步兵，一个士官学校和一个炮队。在接触线上与我军接触的只有三千多人。这样，木沙瓦特政府就没有很大的力量在通向巴库的道路上对十一军进行重大的抵抗。这就使我们无需经过艰苦的战斗就可以实现巴库工人的宿愿，帮助他们建立起苏维埃政权。当然，如果红军再向前推进，主要集中在亚美尼亚边界的木沙瓦特军队就会给我们造成困难。后来发生的情况证明正是如此。

记得当时我们制定了我军协同作战的详细计划：四辆装甲列车在叶弗列莫夫^①的统一指挥下冲进巴库，骑兵在右翼行动，步兵乘列车和步行紧跟在后面。不久前从巴库秘密来到这里的果戈别里泽被任命为骑兵师政委。

我希望尽快地进入巴库，因此要求列万多夫斯基帮助我同首批部队一起进入城市。他说，进入巴库的首批部队是装甲列车。它的任务正是先于其他部队冲入巴库石油区，援助巴库工人确保那些极端重要的设备。“所以，”列万多夫斯基向我说，“如果您想早些进入巴库，就得同这支部队一起出发。”我要求十一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基洛夫允许我这样做，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建议我以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特派员的身分前去。

离开莫斯科之前，当时我们早就估计会比红军部队早些进入巴库。因此，叶莲娜·德米特里耶芙娜·斯塔索娃建议我在进入巴库以后就着手组织侦察工作，把所得情报转交给红军指挥部。他们对我进行了指导，还向我提供了侦察工作所必需的资料、密码、经费和贵重物品。去巴库时这些东西我都带在身上，但与我同行的同志谁也不知道。带上这些东西乘坐就要参加战斗的装甲列

^① 后来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叶弗列莫夫做了奥廖尔军区司令。卫国战争开始后，他当了军长。在莫斯科西部组织冲破敌军战线的战斗中牺牲了。在维亚兹马为他建造了纪念碑。

车是很冒险的，所以我和奥尔忠尼启泽决定，把这件事告诉奥尔加·沙图诺夫斯卡娅，并委托她把这些贵重物品带进巴库。沙图诺夫斯卡娅扮做一个女护士，顺利地把这些东西带进了巴库，转交给了高加索边区党委会司库员伊·伊·多夫拉托夫。

卡希阿尼和伊万诺夫-卡夫卡斯基同志随十一军的另一部分部队进入巴库。在这之前他们在莫斯科的莫斯科河南岸地区做党的工作，现在他们准备到格鲁吉亚去做地下工作。在路上我们结成了好朋友。和我们同行的还有共产党员扎维娅洛娃，她是被推荐到巴库妇女中做地下工作的。

从阿斯特拉罕随十一军同行的还有著名的阿塞拜疆共产党员穆萨别科夫和贾比耶夫同志，他们是1918年巴库苏维埃政权失败后临时撤退到阿斯特拉罕的。他们在俄罗斯苏维埃政权下已经经过了一定实际工作的锻炼，急欲回到故乡去。他们是忠于党的热情的活动家，很有才干的党的工作干部，回到巴库后他们立即担负了阿塞拜疆苏维埃的领导工作。

同他们一块从阿斯特拉罕出发到巴库的还有穆谢伊勃·沙赫巴佐夫和他的妻子柳芭，他们俩也都是共产党员。我们暂时把他们留在迭尔卜特做党的工作。后来沙赫巴佐夫成了阿塞拜疆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

我从彼得罗夫斯克到装甲列车停留的地方时，在迭尔卜特地区碰到了装甲车司令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

奇·叶弗列莫夫和政委杜金。叶弗列莫夫的指挥所设在《第三国际》号装甲车里，车隐蔽在距萨穆尔河（与阿塞拜疆为界）桥二、三百米远的树林里，所以对岸根本发现不了它。

当时已是温暖的春天，树木已披上了绿装。

叶弗列莫夫读了列万多夫斯基签发的十一军指挥部的命令。命令非常简短而又很不寻常。他限令部队于4月27日出发，以勇猛的袭击攻入巴库，依靠工人队伍的支持于十一军主力到达之前在巴库油田设防固守，以防敌人纵火破坏。

“我们几点开始行动？”我问叶弗列莫夫。

“命令只规定了行动的日期，”他回答说，“而没规定行动的钟点，既然这样，那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权决定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究竟什么时候行动？”

“夜间，零点五分到十分。越早越好。”

列万多夫斯基军长这一命令是怎样被执行的呢？

我们了解了装甲车的准备情况，同战士们进行了交谈。我们的侦察人员报告说，阿塞拜疆军队就在对岸，附近有一列装甲车来往行驶，这列装甲车的指挥官是一个格鲁吉亚人。

同叶弗列莫夫共同研究了这种情况后，我们决定要同这个指挥官进行谈判，尽最大的努力摸清楚，桥上是否埋有地雷，桥上守卫队同邻站联系用的电话、电报线架在

什么地方。

大桥是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桥的这一头站着我们的哨兵，而在桥那头则是阿塞拜疆的岗哨。我们走近阿塞拜疆哨兵，请他转告装甲列车指挥官，我们希望他到桥上来和我们会谈。哨兵叫来了守卫队长。队长说，装甲列车已经开到另一个车站去了，我们的要求现在无法转达。我们请他等车回来时办理这件事，他答应了。

看来守卫队长对我们的态度还不坏。于是我们决定冒更大的危险，想法到大桥那边去看看。

一些阿塞拜疆的士兵向我们走来。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为了不暴露我们的来意，打消他们对我们的戒心，我们就跟他们聊起来了：

“我们是到你们这边来做客的。可惜我们没有伏特加，我们那儿不准喝酒。你们这里大概有白兰地吧？”

“白兰地没有，但是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守卫队长说。

“那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给你们钱，明天这个时候再来，那就可以大喝一场罗？”

我给了他们一叠钞票，这些钱正是我们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而专门带在身上的（钞票是沙皇时期的，在我们那里这种票子一点也不值钱，可是在阿塞拜疆这种钱甚至比当地的票子还值钱）。

我们跟士兵们说，我们之间不会再打仗了。以国会议员别皮诺夫为首的阿塞拜疆代表团已经到莫斯科进行

谈判去了，就要签订和约了。

我们问他们的生活怎样。他们说：“如果你们感兴趣，就去看看吧。”

我们走到离桥几米远的守卫室，那里有几间不大的营房，大约可驻 50—60 人。

我和叶弗列莫夫注意地观察了沿途的一切情况，肯定了桥上没有埋地雷，同后方联系的电话线是沿着铁路路基架设的。

我们和阿塞拜疆的士兵边走边谈，做出同他们友好的姿态。他们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阿塞拜疆是一派和平景象。

突然，换班的哨兵来了，吹着唢呐，敲着鼓，士兵们踏着音乐的节拍行进。

“情况不妙，”我们想。“如果新的守卫队长象士兵一样简单，那还好。如果他是一个反动军官，一下子把我们抓住，甚至扣留起来，那可怎么办。”为了不引起他们的疑心，我们毫不拘束地继续说笑。既然已经奏起了音乐，我们干脆跳起舞来。士兵更加对我们有了好感。幸好，新的哨兵队长是个爱说话，挺随和的人。但我们还是决定赶紧回去，因为我们担心，他们很可能突然清醒过来，把我们抓起来。在告别时我们对他们说，请准备好白兰地，明天我们还要来。

就这样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自己这边。这一次冒险行动很顺利地结束了。并且我们还了解到不少情况。如果

我们真的被他们抓起来，成了他们的俘虏，那可就糟了。要知道再过几个小时我们就要行动了。还好，总算顺利地结束了。

没过二、三个小时战士报告我们说，阿塞拜疆装甲列车的指挥官来和我们会晤了。

我们走到桥中间。他们的装甲列车指挥官也来到这_里。他高高的个子，比叶弗列莫夫的年岁大一些。留着小胡子，脸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稍胖，但外表很神气。他举止严肃，一副官场气派。我们彼此作了自我介绍。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沙皇军队的上尉罗尔德基帕尼泽。为了麻痹他的警惕性，使他对我们有好的印象，同时也要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在谈话的过程中对他说：

“再也不会打仗了。您是沙皇军队的上尉，是个有经验的指挥官，如果您在我们这边，早就当上师长了。因为我们那里军官不多。到我们这边来吧，我们非常欢迎您。”

这之前，这个军官还很镇静，说话也很有分寸。但听了我们的建议后，他扯大了嗓门嚷嚷道：

“你们怎么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呢！我是一个库泰依斯省的贵族，在战场上负过伤的俄罗斯军队的军官，”他指着脸上的伤疤接着说，“想让我投靠布尔什维克，这绝对办不到！”

“您干嘛这么激动呢，上尉先生！我们那里有许多军官，他们过去在沙皇军队里服过役，而现在在我们那里

工作。”

“不，这绝不可能。”他回答。

“随您的便吧，这种事是自愿的，不好强迫。”

我们毕竟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手了。

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麻痹了阿塞拜疆官兵的警惕性，没有使他们预感到我们在准备进攻。

…… 4月26日深夜，温暖，寂静，明月当空。

叶弗列莫夫和各装甲列车的指挥人员进行了谈话，做了一些必要的指示。十一点半时召开了装甲列车全体人员和步兵会议。叶弗列莫夫宣布开会。他具体说明了军指挥部交给装甲列车的战斗任务，他的发言只占了五、六分钟。我也很简短地讲了一下我们这次行动的政治意义，阿塞拜疆作为东方的大门对于世界革命胜利的意义，巴库石油对于我国整个经济的意义。我们要准备付出一切代价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以勇猛的突击冲入巴库。

红军战士进入车厢各就各位。

我和叶弗列莫夫在装甲列车的炮台上，车前挂着一辆平车，上面站着两个领有特殊任务的红军战士。

叶弗列莫夫手里拿着表，正好是零点十分，他下令开始行动。

为了不要过早地暴露目标，我们悄悄地、小心翼翼地前进。装甲列车开上大桥，接近了阿塞拜疆的哨所。那里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有人问。

“到巴库去。如果你们愿意，就和我们一道走吧。”我们答道。

这个时候两个红军战士从前面的平车上跳下来，找到了叶弗列莫夫告诉他们的地方，切断了从守卫室通向亚洛马车站的电话、电报线。

两个红军战士报告完成了任务后，叶弗列莫夫大声地命令：

“步兵下车！”

阿塞拜疆的士兵四散奔逃。他们当中有人开了火，但很快就停了。大约过了十五分钟，装甲列车向前开过去了。

根据侦察，在装甲列车前去路上的左边，离亚洛马车站不远的树林里驻有宪兵队。为了消除这个祸害，让步兵下车悄悄地潜入树林，包围宪兵队的营房。我们的大炮向宪兵队的营房轰了几炮，经过短时间小规模战斗，宪兵也四散逃窜了。在这场战斗中由拉脱维亚射击手所组成的步兵部队牺牲了三个同志，还有几个人受了伤。

但是，又出现了新的危险。在亚洛马车站附近的轨道上有一辆升火待发的机车。叶弗列莫夫担心这辆机车会向我们迎面开来，撞击我们的装甲列车，破坏我们的军事行动。于是他下令朝机车的前轮开炮。我们的优秀炮手第三发炮弹就命中目标，机车一下子就栽倒在泥地里。

我们驶近车站，车站上一个人都没有。我和叶弗列莫夫带着卡宾枪下了车。我刚要进车站大厅，叶弗列莫夫把我拦住了。

“不行，可不能这么干。”他说完以后就掏出一枚手榴弹以防不测。推开门，我们走了进去。候车室里空无一人。我们又打开了隔壁大厅的门，看见桌子、椅子后面藏着十五、六个铁路职工和几个乘客，其中铁路职工大部分是俄罗斯人。我们就对他们说：

“干嘛要藏起来呀？怎么，你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吗？”

“不，我们不反对。”他们回答说。

“红军来了，铁路职工应该坚守岗位。”

在场的一个人穿着林务官制服的肥胖的阿塞拜疆人非常惶恐不安，他问能否让他到他自己办公的车厢里去，我们当然允许他去，因为我们要尽力造成一种和平进军的气氛，而不是战争的局面。

我们和铁路职工们谈了几句后，就委托他们完全恢复亚洛马车站的正常秩序。在那里我们留下了两个红军战士。

当第二天天亮时，我们从前进的装甲列车上看到铁路两旁的农民在地里耕地和播种。我们的装甲列车隆隆地行进着，车上的红旗迎风飘扬。农民们不断地高举双手向我们欢呼。我们也高呼口号回答他们的欢迎：“苏维埃阿塞拜疆万岁！”“阿塞拜疆和俄罗斯人民的友谊万岁！”

在胡达特车站附近我们遇上了木沙瓦特的装甲列车，他们在一座小山后面向我们的装甲列车开火，但打的不准，一发也没有命中。我们没有还击，因为目标看不清，我们不想白白浪费炮弹。

我们小心翼翼地前进着，担心路上埋有地雷。木沙瓦特的装甲列车继续向我们射击，但离我们越来越远，很快就完全消失了。在胡达特车站我打电话给前方车站，问阿塞拜疆的装甲列车和它的指挥官罗尔德基帕尼泽是否在那里。过了一会儿，罗尔德基帕尼泽接了电话。

我们让他投奔到红军方面来，他又断然拒绝了。

装甲列车驶进哈奇马斯车站时，我们看见很多工人在整修破坏了的路基。工人们对于红军进军的关怀使我们深受感动，无比高兴。这样，我们就可以毫不耽搁地前进了。我们的装甲列车到站以后，在车站上举行了群众大会，车站上所有的人都参加了。我们讲了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意义，讲了各族人民的友谊，还讲了维护正常秩序的必要性。

突然，一个人含着高兴的眼泪朝我扑过来，把我抱住了。我一下子就认出他是巴库的共产党员佩列维季耶夫，我们曾在一起作过地下工作。我们互相拥抱。记得我对他说，现在不是流泪的时候，应该工作。就在会上，我们宣布他为哈奇马斯车站革命委员会的主席。

我们开进苏姆加伊特车站。路上叶弗列莫夫把我们进展的情况照例向列万多夫斯基作了汇报。指挥部知道

我们在什么地方，看来，他们对我们的进展很满意。可是，在苏姆加伊特车站，我们突然接到了列万多夫斯基的电报。电报中说，《第三国际》号装甲列车已经远远地脱离了主力部队，有被消灭的危险。因此，需要后退一些，以便和自己的部队保持较近的距离。

电报令人很不愉快。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改变原来的命令，发生了什么情况？除了谨慎之外，我们再也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理由。我们开始研究当时的情况。如果后退的话，敌人会认为我们要撤退了，他们就会破坏铁路路基。怎么办呢？我们答复列万多夫斯基说，我们现在在苏姆加伊特，也就是说铁路沿海地区已经过去了。如果我们后撤，木沙瓦特政府的里海舰队就会从海上开炮打我们，而现在这种危险地区我们已经闯过去了。在汇报的末尾我们写道：现在后退已经不可能了，而应该继续执行原来的命令——冲入巴库，而我们正是这么做的。

因为列万多夫斯基下达的撤退命令语气不是十分坚决的，所以我们决定不等接到他的回电就继续前进。

还在哈奇马斯车站，我们就弄到了巴库最近的报纸。从报纸上我们得知，4月27日晚阿塞拜疆政府将在巴库举行外国代表招待会。

我对叶弗列莫夫说：“如果我们能占领巴拉扎雷^①，切断外交官们离开巴库的铁路，不让他们逃到梯弗里斯，

① 巴拉扎雷——铁路枢纽站，这里有通往巴库的支线。

那就好了。”

他看了看表，想了一想说道：

“大概还来得及，他们溜不掉。”

“你知道为什么拘留这些外国代表对我们这么重要？”我问叶弗列莫夫。“如果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们就可以拿他们作人质来交换被英国人逮捕的革命者。”

叶弗列莫夫支持我的建议。外交官们还没来得及离开巴库就被我们逮住了。但是，过了一些时候，齐切林就给我们打来了电报，要求我们释放他们。我们只得按照外交人民委员的要求办事，把他们放了。

外交官事件使我想起了我和一个叫沃尔顿的英国大尉之间发生的一件事，关于沃尔顿这个人我已讲过了。当时他挖苦我们在英国士兵中散发的传单，说英语写的太蹩脚，因而达不到宣传的目的。我也以讥讽的口吻回敬沃尔顿，说苏维埃政权一旦在巴库获得胜利，我们一定愉快地聘请他本人做我们的高级翻译。我的话使得沃尔顿很尴尬，他只得苦笑了一下。

当我对叶弗列莫夫讲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两人都开心地笑了一阵。你想，如果沃尔顿碰巧同其他外交官一起被我们抓住，再一次听到让他当我们的翻译，那时他那副嘴脸该多滑稽可笑呀！……

……当我们快到巴拉扎雷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炮火朝我们的装甲列车打来，叶弗列莫夫命令步兵下车，在装甲列车两侧沿着铁路前进。装甲列车前面有几个红军

战士一边走一边检查铁路上是否埋有地雷。装甲列车行驶得很慢，半夜才到巴拉扎雷。

在巴拉扎雷我们举行了一个简短的群众大会，很多工人都参加了这个会。然后我们把当地支部的党员（大约有三十人）集合起来，把步枪发给了他们。我们从当地工人中任命了巴拉扎雷的车站革命委员会。

叶弗列莫夫在电报局了解到阿塞拜疆政府曾请求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派一列装甲车前来的事情。格鲁吉亚政府已下令拨出一列装甲车以及其他一些卫队。因此叶弗列莫夫决定派出一列装甲车深入到叶丽莎白波尔（在沙皇时代这样称呼阿塞拜疆的古城格扬札）方向一百五十到二百公里的地方。如果出现了格鲁吉亚的装甲列车，避免和他们接触，但要炸毁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桥梁，使其在两昼夜之内不能前进，以待我们主力部队的到来。其余装甲列车的任务是保证十一军部队顺利向前挺进。

夜里，卡莫从巴库给我打来电话，通知我说，我们的同志已要求处于武装起义的威胁之下的阿塞拜疆政府把政权和平地交给共产党。慑于巴库工人的高昂斗志，并得知我们的装甲列车已经攻占了巴拉扎雷，我红军部队已全面迫近，阿塞拜疆政府决定接受布尔什维克的要求。4月27日深夜，他们把被捕的布尔什维克从狱中释放了出来，并交出了政权。实际上木沙瓦特政府的部长们早已逃之夭夭了……

这个消息使我感到欢欣鼓舞，我对卡莫说，我们马上

离开这里，清晨就可到达巴库。装甲列车又前进了，但是驶得很缓慢，因为我们仍然担心路基上埋有地雷。

4月28日清晨六时许，我们的装甲列车顺利地到达了巴库车站。卡莫迎接了我们。我们和他一起乘汽车前往阿塞拜疆的国会大厦。而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们已经在这里开了几小时的会了。

再见了，巴库！

自由的五一节；东方各族人民代表大会；我告别了巴库。

当我们到达巴库的时候，正是旧的资产阶级政权垮台，而新的苏维埃政权尚未建立的时刻。因此，在街上我们遇上了还在值勤的警察。他们还不知道，城里的政权已经更换了。一大早，店铺就开门营业。看来，一切如故……

当地的赤卫队已开始担负起保护油田和油库的任务，并帮助维护城市正常秩序。为了执行任务，他们都带有武器，这些武器是他们早些时候秘密积存下来的，或是根据米·瓦·伏龙芝的命令由我们无畏的勇士、共产党员水兵斯托罗茹克从土尔克斯坦前线直接运到巴库的。

1920年4月27日深夜举行了阿塞拜疆苏维埃政权成立典礼。新政权是由临时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及其

主席纳·纳里马诺夫领导的。

当我们乘汽车在城里驶过时，看见许多房子的墙上都贴着阿塞拜疆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通告：

“全体同胞们!!!

莫斯科列宁：

根据巴库革命的无产阶级和阿塞拜疆劳动农民的意愿建立的阿塞拜疆苏维埃独立共和国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现在宣布木沙瓦特的旧政府是人民的叛徒和国家独立的敌人，同时宣布与协约国和苏维埃俄罗斯的其他敌人断绝一切关系。

由于无力单独抵御内外反革命的联合进攻，阿塞拜疆革命军事委员会建议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与我们结成共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兄弟联盟，同时请求他们立即派遣红军部队给予实际的援助。

阿塞拜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纳里曼·纳里马诺夫、米尔扎·达乌德·古谢伊诺夫、加米德·苏尔塔诺夫、阿利莫夫和阿利·盖达尔·卡拉耶夫。”

我们乘车到了国会大厦。进门时，我们高兴极了。记得，正是一年前巴库工人在这里举行了五一示威游行。当时的情景，甚至最细小的情节都生地动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了当时群众集会的场面和我在卡车上的演说……想起了我讲的最后一句话：“地主、资本家先生们！请你们记住：明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在这里举行会议的

将是阿塞拜疆的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

回忆起这一切是多么令人高兴啊！现在整整过了一年，在五一节前夕，苏维埃阿塞拜疆工农政府真的在这里召开会议了！巴库革命者的宿愿终于实现了。这时我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令人难忘的形象——我们的朋友巴库人民委员们……多么可惜，他们现在已不能和我们在一起了！

两天两夜我们都未曾阖眼：既没有时间，也不想睡觉。我们内心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和热切渴望工作的心情……

4月30日，十一军开始进入巴库。在这以前的两天中我们的《第三国际》号装甲列车是巴库的唯一的武装力量，其余的部队都还在路上。

奥尔忠尼启泽、基洛夫、列万多夫斯基和米哈诺申来到了巴库。他们参观了我们的装甲列车的驻地，祝贺红军战士袭击的胜利。奥尔忠尼启泽授予叶弗列莫夫战斗红旗勋章。

记得，对于叶弗列莫夫受勋，我们大家和他一样感到高兴。当时很少有人得到红旗勋章，这是那时唯一的战斗勋章。这是承认叶弗列莫夫作为一个红军指挥员所建立的巨大功勋。

同叶弗列莫夫相处只有两、三天，可是他在我的记忆里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斗争和生活中往往有这种情况，几天之中对一个人的了解有时比多年的共同工作中

的了解还要深刻。我十分尊重和喜欢这个过去素不相识的同志。大家都很爱戴他，他在战斗中临危不惧，沉着果断，深得同志们和部下的信赖。这位指挥员英雄给我留下的这一切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记得，当时我请求奥尔忠尼启泽授予斯托罗茹克以红旗勋章，表彰他成功地把武器从土尔克斯坦前线运到巴库，表彰他在从巴库把汽油秘密运往阿斯特拉罕一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在挤满了工人的巴库剧院里，在热烈的掌声中我把勋章授予了斯托罗茹克。

五一节来到了。这一天步兵的主力部队开进了巴库城。从清晨起红军战士就一队一队地从街上走过，他们很疲倦而且满身尘土，但是情绪高昂，欢欣鼓舞。从各个地区、各厂矿企业来的工人和家属们都涌上了街头。军民大联欢开始了。拥抱，欢呼，一片欢腾景象。这一天巴库的五一节是多么美好、多么欢乐啊！在街头路口，在广场上，到处都有群众集会。

工人代表会议召开了。各厂矿企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个工人阶级的代表机构。会场不断响起向列宁、红军、苏维埃俄罗斯热烈致敬的声音。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代表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红军向会议致贺词，祝贺巴库无产阶级和阿塞拜疆全体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胜利，祝贺社会主义的旗帜已经在阿塞拜疆上空飘扬。

在几天时间之内，红军部队进驻了阿塞拜疆的所有中心城市。红军开到了孟什维克统治的格鲁吉亚和达什

纳克党盘踞的亚美尼亚边界。

* * *

但是阿塞拜疆的和平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5月下旬集结在省会格扬扎(今称基洛夫阿巴德)的阿塞拜疆封建主,伙同从巴库逃出来的部长们、反革命的军官和官吏们发动了武装叛乱。开始了巷战,结果叛乱被镇压下去了。但没过两个星期,被击溃的叛匪窜到了卡拉巴赫,在那里又发动了叛乱,这次叛乱也被我们镇压下去了。过了一些时候,在其他几个县里也开始了反革命骚乱,但很快被平息下去了。

列万多夫斯基所指挥的十一军和阿塞拜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作战平息了这几起叛乱,在这些叛乱中都有被从当地逐出的木沙瓦特军队参加。

下面我想谈谈对列万多夫斯基这位杰出的人物的印象。

米哈伊尔·卡尔洛维奇·列万多夫斯基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果断而刚毅的指挥员。他善于思索,沉默寡言。他的发言往往很简短,但总是经过深思熟虑并且很有内容。

这位优秀人物的主要特点是他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和卓越的军事才干,他无限忠于党、忠于苏联人民。

* * *

后来我们才知道,红军开到阿塞拜疆以后,在亚美尼亚最大的党的中心亚历山大波尔(现称列宁纳坎)起义者

群情激昂。在群众的压力下，亚历山大波尔市党委会请求亚美尼亚党委会准许他们为推翻达什纳克政府而发动起义。5月10日，亚历山大波尔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

在同一天，卡尔斯也举起了起义的旗帜。然后，萨雷卡马希，卡夫塔尔卢，诺尔—巴亚泽特，沙木沙金和伊吉万也都相继举行了起义。后来起义浪潮又波及到赞格祖尔。在所有这些地区，革命委员会都宣告推翻了达什纳克政府，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以上这些情况亚美尼亚共产党很晚才向巴库和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报告。因而我们在巴库没讨论过这个问题，当然也没有任何援助起义者的计划。红军这时正在忙于镇压木沙瓦特匪军的叛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和野战司令部也在这些起义的地方。不久传来了悲惨的消息，在亚历山大波尔，起义三天就被镇压了，接着其他地方的起义也被扑灭了，许多起义者被捕。十一个领导人，其中包括阿拉维尔江，穆萨耶梁，加里布扎尼扬和古卡相，他们都被杀害了——这些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

以上情况我们是从亚美尼亚同志要求支援哈萨克县亚美尼亚起义者的信中得知的。我立即给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拍了电报，发往舒沙城。可是他已到别的地区去了。电报是从舒沙转寄给他的。这封电报还保存在奥尔忠尼启泽的档案里。下面就是电报全文：

“舒沙来电记录：

高加索前线高加索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泽同志：

20日晨亚美尼亚起义者的代表团将来我处。他们电告了亚历山大波尔起义的失败，请求给予亚美尼亚哈萨克县起义者以军事援助。

卡拉汗来电表示，俄国应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进行调解，俄国红军可暂时占领有争议的地区。根据起义人民的要求红军有充分的理由进入亚美尼亚境内。

可以立即采取那些措施，请电告。

米高扬”

那时红军还忙于镇压木沙瓦特叛乱分子。不经中央同意地方上任何人都无权对这样重要的政治问题做出决定。此外，当我们面临这个问题时，起义在一些主要城市里已被镇压下去了。

5月起义在亚美尼亚虽然失败了，但这次起义在争取推翻达什纳克党反人民政府，建立亚美尼亚苏维埃政权，并使其与俄国苏维埃结成联盟的斗争中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次起义是群众性的。它说明了亚美尼亚社会主义革命形势正处于高涨。它在亚美尼亚劳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次起义的失败为同年11月全亚美尼亚起义的胜利作了准备。

11月29日亚美尼亚宣布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2月28日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

成立。

这样,在整个南高加索都建立起了苏维埃政权。

* * *

摧毁了阿塞拜疆叛乱的全部策源地之后,领导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和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一起采取了一些政治经济措施以铲除地主和资本家赖以生存的土壤。阿塞拜疆革命委员会很快就颁布了一项法令: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它收归国有并交给劳动农民使用。这一措施从经济上挖掉了地主的老根,使农民更加拥护苏维埃政权。

1920年5月下旬,巴库石油工业部门中的二百五十多个私营厂矿企业再次(第一次是在1918年,巴库的苏维埃政权失败以前)被收归国有。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了国有“阿塞拜疆石油”联合公司。应该尽快地把储备的大量石油从海上运往俄国,那里燃料极端缺乏。经过阿斯特拉罕的水路已经通航。与此同时还应增加石油的开采量。

为了完成这些重要任务,奥尔忠尼启泽把当地的同志组织了起来。从莫斯科来的А·П·谢列勃罗夫斯基在这方面对我们帮助很大。谢列勃罗夫斯基是个老布尔什维克,有经验的工程师,有才能的组织者。他负责“阿塞拜疆石油”联合公司的领导工作。依靠石油工会,依靠海员协会,依靠以前在业务上同我们有联系的那部分懂技术的知识分子,他妥善安排了石油开采和向阿斯特拉罕

运输石油的工作。

1920年6月13日，巴库工人、士兵、海员代表苏维埃第一次大会隆重开幕。奥尔忠尼启泽向大会致了贺词并被选为巴库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常任主席。就这次大会上委托谢尔戈代表巴库的无产阶级向骑兵第一军致以兄弟的敬礼，祝贺他们在和波兰白军的作战中首战告捷，并把巴库工人的礼品——金质短剑赠给该军军长布琼尼和骑兵第一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伏罗希洛夫。

谢尔戈的工作非常多，要胜任这么多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但他身强力壮，年青有为——当时只有三十四岁。他总是朝气蓬勃，精神抖擞，好象从不知疲倦似的。我们当时是日以继夜地工作，休息日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谢尔戈喜欢骑马，但我们只有两次抽出了时间骑马到巴库郊外去野游。有机会在这么安静的环境中彼此谈心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谢尔戈不仅要管第十一军和阿塞拜疆的工作，他还主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局以及整个南北高加索党组织的领导工作。他经常到斯塔夫罗波尔、罗斯托夫、格罗兹尼、克拉斯诺达尔、弗拉基高加索(现称奥尔忠尼启泽)等地去，并在代表大会、积极分子会议以及其他会议上发表演说。巩固地方苏维埃政权的工作在紧张地进行着。山区各族人民第一次获得了民族自由发展的机会，他们有许多复杂问题需要解决。他们的经济生活也需要很好地安排。应该尽快地把粮食和其他食品运到莫斯

科。当时在北高加索粮食储存的比较多，而在俄罗斯中部的各城市却正在闹粮荒。

红军不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国内战争已近尾声。谢尔戈不断地往来于城市和乡村之间，向苏维埃和党组织提出恢复经济的任务，要求他们把工作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

但是，1920年8月，事情就开始明朗了：协约国妄图再次挽救已被粉碎的反革命势力，唆使地主资产阶级统治的波兰向苏维埃俄国进攻。虽然列宁和苏维埃政府进行了许多尝试，想用和平方式解决和波兰的关系问题，但波兰白军还是点燃了战火。与此同时，协约国以武器援助弗兰格尔匪帮，这使他们不仅巩固了他们在克里米亚的阵地，而且还把乌拉盖的陆战队运到库班地区登陆，并在那里发动叛乱。

8月20日，谢尔戈收到了列宁的电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责成谢尔戈火速动身去参加消灭弗兰格尔陆战队的战斗。谢尔戈立即离开了巴库。9月4日他已电告列宁说，弗兰格尔陆战队已在阿赫台尔卡地区被击溃。但弗兰格尔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他又从克里米亚向北进犯。他的部队装备很好，都是英国、法国、美国供给的。

我党中央不得不再一次号召全国人民奋起自卫。以其他地区的党组织的做法为榜样，阿塞拜疆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动员百分之十的党员到前线去。共和国工会理事会决定动员百分之二的会员参军以补充在前线同波兰白

军和弗兰格尔匪帮作战的部队。巴库工人、红军、水兵代表苏维埃通过决议动员自己代表的百分之五到前线去。

* * *

距第二次全俄国东方各民族党组织代表大会还不到一年，1920年9月就召开了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许多外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参加了这次大会。

负责筹备这次代表大会的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1920年6月末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全世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部分代表。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大会筹备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许多国家的名义向东方各族人民建议召开整个东方劳动人民代表大会。

筹备大会的主要组织工作是由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和叶莲娜·斯塔索娃做的。因为我也参加了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所以对大会的各种问题都比较了解。

将来参加代表大会的有：前俄罗斯帝国(其中包括南高加索各共和国和达格斯坦)的少数民族的代表，北高加索其他地区少数民族的代表，居住在土尔克斯坦共和国各族人民的代表，希瓦、布哈拉、巴什基里亚、鞑靼、卡尔梅克的代表；中国、印度、阿富汗的代表，波斯、土耳其、日本的代表以及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的代表。

当时必须和所有这些代表团取得联系。和波斯人、土耳其人建立联系特别困难。但当时巴库已经有了土耳其共产党人(苏勃希、苏利曼·努里)的办事处，同时也有

波斯共产党人的办事处，于是我们就通过这两个办事处安排邀请他们国家的代表。这两个办事处还帮助我们同印度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取得了联系。

当时决定不仅要吸收共产党员参加代表大会，而且还要吸收东方各国革命组织的代表和有反帝思想的党外人士参加大会。

大家一致决定在巴库市召开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西方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和东方争取民族解放的先进战士的聚会。把会议的地点选在巴库不是偶然的。巴库这个遭受过国内外资本压迫的工人城市不仅是阿塞拜疆人民争取政治经济解放斗争的舞台，而且也是东方社会主义思想兴起的中心。现在巴库更加荣幸了，三十七个民族的代表将云集在这里，共同商讨联合起来为消灭帝国主义压迫，争取东方各民族的解放而共同斗争的大事。

来参加这次大会的共有一千八百九十一名代表，其中有一千二百七十三名共产党员，这样，党外人士就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前来开会的代表中共有五十五名妇女。

前来参加大会的客人有来自欧洲、美国等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代表：匈牙利的贝拉·库恩，英国的克维尔奇，法国的罗斯麦尔，美国的约翰·里德……中国派了八名代表参加大会，其中一位姓王的被选为东方行动宣传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是在代表大会最后一次会议上

建立的。

代表大会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召开的：我国刚刚经历了外国武装干涉的巨大风浪；击溃了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高尔察克、邓尼金、尤登尼奇匪帮；英国已经开始同我们和平谈判，但同时它又唆使白卫波兰向我们进攻。这正是这样一个时刻：红军在驱逐波兰白军的战争中暂时失利，资本家又蠢动起来。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刻，反帝斗争的浪潮迅速从俄国扩大到整个东方，这完全出乎资本家的预料之外。

1920年9月1日，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代表大会前夕，巴库苏维埃召开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报告。由于共产国际的代表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团乘坐的火车即将到达，代表们决定组织欢迎。火车是在夜里到达的。全体苏维埃代表和许许多多工人代表团都到车站去欢迎。把客人们直接从火车站送到剧院，苏维埃的会议又继续进行。会议一直开到了早晨四点多钟。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会上宣读了贺词，讲演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约翰·里德在自己精彩的演说中讲道：

“我在这里代表帝国主义列强之一的美国的革命工人发言；美国正对殖民地人民进行着剥削和压迫。

你们东方各族人民，亚洲各族人民，还没有经受过美国统治。你们了解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的帝国主义分子而且仇恨他们。你们大概认为‘自由美国’的统治可能

会好些，它会解放殖民地人民，会维持他们的生活，会保护他们。

不！菲律宾的工人、农民，中美洲的人民，加勒比海诸岛的人民，他们知道在‘自由美国’的统治下生活意味着什么！

例如，菲律宾人民。1898年菲律宾人起义反对西班牙政府残暴的殖民统治，美国人帮助他们，但当西班牙人被驱逐后，美国人却赖在那里不想走了。

当菲律宾人起来反对美国人时，这些‘解放者’却动手屠杀菲律宾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拷打折磨他们。最后战胜了他们，夺去了他们的土地，强迫他们干活，强迫他们为美国资本家增加利润。

美国人答应让菲律宾人独立。不久将宣布成立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资本家将要离开那里了，菲律宾人将不再为美国资本家创造利润而继续劳动了，因为美国资本家给了菲律宾的头头们一部分利润：让他们做官，给他们土地和金钱。这样，美国资本家就造成了也是靠工人创造的利润而过活的菲律宾资本家阶级。使菲律宾人继续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究竟对谁有利，这不是很清楚了吗！

古巴的情况就是这样。古巴在美国人援助下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现在她是个独立的共和国。但美国的百万富翁霸占了一切甘蔗种植场。只有一小部分土地例外，那是美国百万富翁给予统治古巴的资本家的。每当古巴工

人要选举不为美国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政府时，美国就把军队调到古巴，强迫古巴人民投票选举压迫自己的人。”

这位年轻而有远见的革命者的讲话，虽然是在半个世纪之前发表的，却生动地描绘出了美帝国主义今天压迫亚、非、拉人民的种种方法。这是约翰·里德在共产党人集会上最后一次的讲话。就在这年，1920年，他因患伤寒病在俄国去世了。苏联人非常尊重这位美国革命者，把他安葬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墙旁的红场上。他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出版了几百万册，它将引起后世很大的兴趣。列宁对约翰·里德——美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给了很高的评价。

象约翰·里德的讲话一样，匈牙利代表贝拉·库恩的讲话直到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为了征服殖民地人民，帝国主义剥削者正在动员欧洲的工人，”贝拉·库恩说，“他们千方百计要把欧洲工人拉到自己一边。他们从殖民地人民身上榨取超额利润，然后分给工人一点点，以此来收买他们。这在英国和德国是常见的事。他们想用这种方法使工人离开革命道路。另一方面，特别是最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加紧策划，利用殖民地人民尚未觉悟，召募殖民地的军队去反对欧洲工人，妄图以此来维持其被工人阶级冲击得摇摇欲坠的国家政权。

同志们，我本人就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种阴谋诡计的一个目击者。当我们匈牙利的工人和贫苦农民夺取了政权，法国资产阶级立即妄图借伊斯兰教殖民地军队

的手扼杀我们的革命。

由于语言不通,我们和这些士兵打交道是多么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找到了使这些殖民地军队觉悟的方法。当他们认识到,是帝国主义者迫使他们把革命扼杀在血泊中时,他们都丢下了武器。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通常能在殖民地国家的当地居民中和在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阶级中找到能为他们效劳的人,从而使他们更便于以较小的代价推行其剥削政策,较少地流血……”

法国代表罗斯麦尔在谈到帝国主义的狡猾政策时说:“当需要打德国人时,当需要动员成千上万的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和摩洛哥人时,帝国主义向他们允诺各种各样的自由,但是在打败德国后第二天,这点可怜的自由,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

英国共产党代表克维尔奇在大会上作了生动的讲演。他说:“英帝国主义者是不列颠工人阶级的敌人,同时也是东方被压迫各民族的敌人。”因此,英国工人阶级反对不列颠资本家的斗争也就是东方被压迫各民族反对不列颠资本家的斗争。

会议开得很热烈,大家的发言都很有鼓舞力。与会者情绪高昂,会上充满着战斗的气氛,大家都表示决心为打败波兰白军,打败弗兰格尔,保卫苏维埃政权进行殊死的战斗。

大会的发言和整个会场的情绪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会上群情激昂，有的代表从座位站了起来，有的代表挥动手中的武器，宣誓要与欧洲工人团结一致反对压迫者。

许多代表亚洲各民族先进阶层的代表也以同样高昂的情绪发了言。所有这些发言反映了被压迫民族的觉醒，表达了他们为争取自身解放而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意志。

印度代表法兹马·卡迪尔宣读了印度一个革命组织的主席马罕默德·阿卜杜尔·罗别·别尔克所签署的声明。声明说，他代表三亿一千五百万印度的被压迫人民，向大会代表和苏维埃俄国代表请求援助。声明说：“大家希望，在不干涉内部事务和宗教生活的情况下，给我们提供这种援助。”

哈萨克代表雷斯库洛夫发言时感情十分激动。他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劳动者联合起来，把分散的东方革命运动和西方的运动联合起来……为了这个目的，我们来此开会，我们在这里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当土耳其妇女代表纳吉娅·哈努姆登上主席台时，全场响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她向男代表们说：“请你们听听我们的要求，并给我们以切实的援助：一、男女完全平等；二、保障妇女无条件地享受与男子同样的受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权利；三、夫妇权利平等；四、无条件允许妇女在立法和行政机关工作；五、在城镇、乡村各处建立妇女权力和保护妇女委员会。

承认我们有平等权利的共产党员已经向我们伸出了手，我们妇女将成为他们最可靠的战友。”

土尔克斯坦妇女代表比比努尔以阿乌埃列—阿塔（现称江布尔）市女工无产者的名义向大会致贺词。她向代表们保证说：“我们妇女从压迫和苦难的深渊中觉醒了，并且不断地把自己的优秀分子输送到你们的队伍中。我们也要不停地工作，为解放东方所有被压迫民族而工作。”

大会以暴风雨般的掌声通过了达格斯坦的布拉奇、土耳其的纳吉娅·哈努姆和阿塞拜疆的沙巴诺娃等妇女参加主席团的提议。

很遗憾，谢尔戈·奥尔忠尼启泽作为大会的一个主要组织者却没能出席会议。因为这时他正在库班河参加消灭弗兰格尔登陆部队的战斗。他向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拍来了热情的贺电。贺电说：

“我代表在库班河给了弗兰格尔陆战队以致命打击的并且彻底歼灭了这个陆战队的库班第九军，向东方各民族第一次代表大会表示祝贺。我虽未能直接参加这次大会，但我们非常高兴地注视着奋起反对西欧帝国主义压迫的东方。我们战无不胜的红军同阿塞拜疆的工人和农民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推翻了别克和可汗的政府，建立了红色阿塞拜疆，而你们现在正在它的首都开会。我们为此而感到无上光荣。解放的红色曙光普照整个东方的时刻已经为期不远了……”

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讨论了许多重要问题，讨论了

国际形势和东方各族劳动人民的任务，讨论了东方各国的苏维埃问题、土地问题、殖民地的民族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代表大会的一切工作都是按照不久前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的精神进行的。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十分关心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的工作。他对代表大会的评价很高。1920年10月15日，在莫斯科省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列宁说：“共产党人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以及东方的共产主义代表人物在巴库举行的代表大会所做的一切，是不能立即加以估价的，是无法直接加以估计的，但是，这是一种比某些军事胜利意义还要重大的成就，因为我们从这里看到：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活动、纲领以及反对资本家和帝国主义者的革命斗争口号，已经为全世界所公认，而且7月在莫斯科，9月在巴库所作的决议，经过一个长时间，将为全世界的工人和农民所领会和接受。

……这两次国际性的代表大会团结了共产党人并且表明了下述事实：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在一切东方的落后国家里，布尔什维克的旗帜、布尔什维主义的纲领和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方式，已经成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和一切落后的殖民地国家的农民谋求解放的旗帜，进行斗争的旗帜。苏维埃俄国在三年之内确实不仅打退了企图扑来扼杀它的敌人，而且赢得了全世界劳动者的同情。我们不仅击溃了我们的敌人，而且无论过去或现在，无时无

刻不在获得更多的盟友。”①

* * *

1920年夏天，当我国着手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又受到了新的军事威胁。由协约国重新武装起来的白卫将军弗兰格尔的部队又开始了进攻。国内战争的这个危险的策源地又重新燃起了战火。

在接到党中央委员会派我到下新城省党委主席团工作的决定时，我请求中央委员会改变这个决定，派我到前线同弗兰格尔去作战。

但中央委员会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定。

1920年9月底，我来到下新城（现称高尔基城）。几个月以后，我在这里被选为下新城省党委会书记。

我在南高加索的这段生活结束了……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第295—296页。——译者

封面
书名
正文